

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著

中国共产党庆阳历史

第一卷（1921-1949）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庆阳历史

第一卷（1921-1949）

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庆阳历史.第1卷,1921－1949/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098-1969-2

Ⅰ.①中… Ⅱ.①中… Ⅲ.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党史－庆阳县－1921～1949

Ⅳ.①D235.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7298号

责任编辑:王鸽子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240mm　1/16

字　　数:420千字

印　　张:32.75　35面彩插

印　　数:1－5000册

版　　次: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98-1969-2

定　　价:60.00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3072533

《中国共产党庆阳历史》（第一卷）
编　委　会

主　任：张晓兰　夏红民

副主任：周强　栾克军　阎晓辉

委　员：贺建宏　吕世福　郭光能　张桂山
黄正林　曲涛　赵晓红　刘秉政
张国定

《中国共产党庆阳历史》（第一卷）
编　辑　部

主　编：张桂山

副主编：赵晓红　刘秉政　张国定

编　辑：刘崇刚　文世芳　王永魁　慕彩霞
陈宗斌

校　对：罗清誉　任彦辉　赵婷婷　吴晓峰

大革命时期



王孝锡，庆阳籍早期共产党员，中共邠宁支部书记。



任鼎昌，庆阳籍早期共产党员，中共邠宁支部宣传委员。



王孝锡手迹



王孝锡烈士陵园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刘志丹，西北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



谢子长，西北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



习仲勋，1934年11月时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阎红彦，1932年6月时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



李艮，1932年7月时任陕甘游击队政委。



王世泰，1932年12月时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



汪锋，1933年6月时任红二十六军代理政委。



秦武山，1933年6月时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



王泰吉，1933年11月时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



高岗，1933年11月时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



张秀山，1934年5月时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



关向峰，1934年5月时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



杨森，1934年5月时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



惠子俊，1934年9月时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



张邦英，1934年9月时任中共陕甘边南区党委书记。



黄子文，1934年9月时任陕甘边南区革委会主席。



张策，1934年11月时兼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西区办事处主任。



蔡子伟，1934年9月时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秘书长。



张景文，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会委员长。



黄子祥，1933年11月时任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团长。



郭宝珊，1934年11月时任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



陈国栋，1934年冬时任红四十二师第一团团长。



高锦纯，1934年冬时任红四十二师骑兵团政委。



刘景范，1935年4月时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李富春，1936年5月时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



马锡五，1936年5月时任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贾拓夫，1936年1月时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

前　言

庆阳位于甘肃省东部、陕甘宁三省交汇处，因居陇山（即六盘山）以东，习称“陇东”。庆阳有着悠远厚重的历史积淀、灿烂辉煌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近现代历史上，庆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谱写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篇章。

庆阳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最早播下革命火种的地方之一。1927年，王孝锡、任鼎昌等革命先驱在宁县太昌镇创建甘肃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中共邠宁支部，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庆阳革命斗争的序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庆阳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和西北红军的摇篮。大革命失败后，遵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西北党组织在陕甘边界地区开展“兵运”活动，点燃了武装斗争的烽火。1930年10月，刘志丹领导著名的“太白起义”，打响了共产党人在甘肃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边区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1931年10月，陕北游击支队与南梁游击队在华池县林锦庙会师。1932年1月，按照陕西省委指示，会师部队在正宁县月明塬北柴桥子村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2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自此，有正规番号的西北红军正式诞生。

1932年4月，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寺村塬组建赤卫军和农民联合会，建立红色政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创建了包括甘肃正宁、宁县和陕西旬邑部分地区的寺村塬革命根据地。寺村塬革命根

据地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陕甘边地区的首次实践，标志着陕甘边根据地的诞生。1932 年 8 月，在国民党及地方军阀势力的大举进攻下，游击队撤离寺村塬。1933 年初，刘志丹、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又投入创建以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6 月，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创建根据地遭敌重兵围追堵截，几乎全军覆没。在寺村塬、照金根据地相继失守，陕甘边革命斗争和红军出现危急的关键时刻，刘志丹、习仲勋和陕甘边党组织力挽狂澜，于 8 月召开陈家坡会议，统一了党内思想，保存了革命力量。11 月在合水包家寨召开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确定了以南梁为中心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方略，使陕甘边革命斗争重新沿着正确方向发展。1934 年 4 月，根据地军民经过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粉碎了国民党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根据地快速发展到陕甘边界十几个县的广大地区。11 月，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正式的工农民主政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荔园堡正式成立，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反映出陕甘边党与红军逐步成熟与壮大，在西北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之后，根据地各县区相继建立红色政权。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大力发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各项社会事业，使根据地进入蓬勃发展时期。1935 年 2 月，国民党政府调集陕甘宁豫晋 5 省军阀 4 万余兵力向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陕甘边主力红军与陕北红军联合作战，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围剿"斗争，成功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包括陕甘两省 20 多个县、范围扩大到北起神府、南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的广大区域、人口超过 100 万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

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是八路军三大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1935年8月底至10月中旬，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红一方面军先后落脚陕甘根据地。1936年5月，红军西征重返陇东，首战取得曲子战斗的重大胜利。在随后两个月时间里，西征红军开辟了陕甘宁边界纵横200多公里的新苏区，为迎接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6月，中共陕甘宁省委、省政府从吴起镇刘家渠迁至环县河连湾。11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在环县境内发起了著名的山城堡战役，重创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在陕甘边区消灭红军的阴谋。山城堡战役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结束长征的最后一战，也是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有力促进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12月，西安事变爆发，驻扎在陕甘宁边境定边、环县、盐池一带的红军主力途经庆阳，南下驰援张学良、杨虎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各部又回师北上，红一军团驻防正宁、宁县一带，红十五军团驻守庆阳驿马关，刘伯承等率领的援西军驻防镇原，红军中央教导师进驻庆阳城和环县。1937年8月，除留守部队外，驻守庆阳的红军各部分别被编入八路军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师，相继开赴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根据地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抗战稳固的后方基地，又是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试验区。面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对陇东根据地发动的颠覆和蚕食活动，陇东军民在党中央和边区党政军的领导下，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坚决斗争，取得了反对两次"陇东磨擦事件"的胜利，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的西南大门，保卫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安全，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陇东根据地模范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积极进

行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建设，开展精兵简政、减租减息、拥军优属、互助合作、整顿"三风"等各项工作，培育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成为全国最文明、最进步的地区之一。在陇东最早试行的"三三制"政权建设模式，是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建设上的一大创举，为陕甘宁边区和新中国政权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在陇东诞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为解放区的司法工作树起一面旗帜，对新中国的司法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刘巧儿"原型——华池县温台乡女青年封芝琴反对包办婚姻、追求婚姻自主幸福的事迹改编的电影评剧《刘巧儿》，推动了我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宣传普及，影响了新中国几代妇女的婚姻观念，极大地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在陇东这片革命沃土上诞生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绣金匾》《军民大生产》三首红色经典民歌广泛流传，唱响中华大地。在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陇东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成为陕甘宁边区重要物资供应基地，享有"陇东粮仓"美誉，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赞扬。大生产运动中，陇东根据地涌现出一大批生产英雄和劳动模范。1943 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对领导大生产卓有功绩的党政军干部给予隆重奖励，关中分区党委书记习仲勋，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分区专员马锡五、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华池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李培福被授予劳动模范称号，毛泽东分别为他们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忠心耿耿，为党为国"、"面向群众"。华池县城壕村被评为大生产模范村，张振财、孙万福等分别被评为特等和甲等劳动英雄。

解放战争时期，陇东解放区既是边区保卫战的重要战场，也是解放大西北的重要战略物资保障基地。1947 年春，国民党胡宗南、马步芳部共 25 万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陇东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敌后游击战争，配合西北野战军进行了"迎王战役"、西华池战役、

陇东战役等重大战役和战斗，粉碎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收复了大部分失地。陇东人民响应党中央“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号召，积极参军参战，开展战勤服务，组成浩浩荡荡的担架队、运输队跟随西北野战军转战数千里，谱写了战斗打到哪里支前队伍就跟到哪里的英雄壮歌，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全国进军。陇东地方部队配合解放军主力横扫残敌，经过浴血奋战，至7月底迎来了庆阳全境解放，庆阳的历史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庆阳各族人民从此迈上了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征程。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庆阳人民培育和凝结了以艰苦奋斗、面向群众、不怕牺牲、开拓创新等为主要内容的庆阳老区精神和以坚定信念、顾全大局、实事求是、自强不息、执政为民等为主要内容的南梁精神，共同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魂，在革命战争年代产生了重要的力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今天，它们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永远是庆阳人民宝贵的政治优势和强大的精神支柱，是不断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胜利的不竭动力源泉。

《中国共产党庆阳历史》（第一卷）编著工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实事求是的修史原则，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新时期党关于历史问题的指导方针为准绳，力求客观真实、全面系统地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庆阳地方党的组织创建、发展和壮大的全过程，准确记录党领导庆阳人民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光荣革命历程，总结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阐述庆阳革命斗争历史在党的伟大历史中的地位作用，颂扬老一辈革命家和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们的英雄业绩、伟大精神和崇高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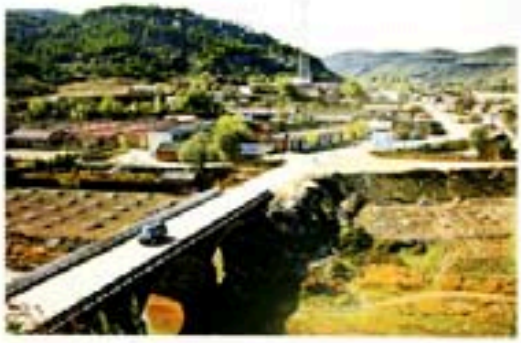
这部书的出版，能够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中小学生学习地方党史提供内容丰富、史料详实、观点鲜明的教材，为深化党史研究、总结党的执政经验、弘扬党的艰苦奋斗精神、继承和发扬光荣革命传统起到积极的作用，必将更好地服务和推动庆阳老区经济社会转型跨越科学发展。



霍维德，1937年4月时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蔡畅，1937年1月时任中国共产党庆阳县工作委员会第一任书记。



太白起义发生地—合水县太白镇



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旧址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布告



二将川农民联合会赤卫队队旗



南梁寨子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印章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条章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印章



列宁小学课本



列宁小学的学生在上课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创办的党刊《布尔什维克的生活》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创办的刊物《红色西北》



包家寨会议旧址



阎洼子会议旧址



毛泽东给刘志丹的题词



毛泽东给谢子长的题词



中央红军长征三营纪念馆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板桥战斗遗址



河连湾陕甘宁省委省政府旧址



南梁革命纪念馆



南梁革命纪念馆大门



山城堡战役纪念碑



邓小平（右一）和红一军团部分领导在正宁合影



1937年3月红军援西军在镇原驻防时司令员刘伯承（左三）、参谋长李达（左五）与战友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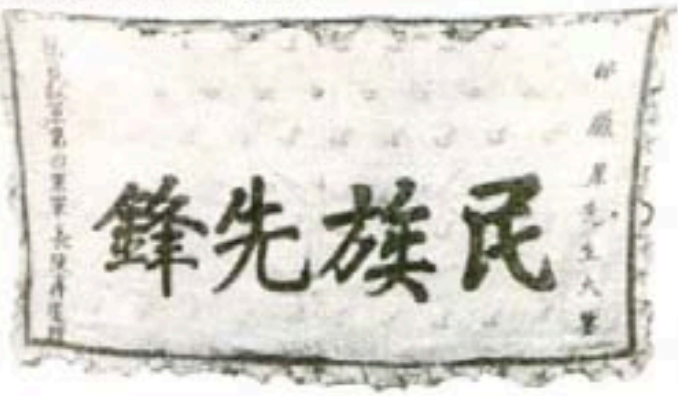
邓小平出具的借粮凭证



正宁县宫河王录村邓小平住地旧址



正宁县五顷塬乡南邑村习仲勋旧居



援西军第四军军长陈再道给捐献军粮的镇原士绅赠送的锦旗

抗日战争时期



袁国平，1937年7月时任中共陇东特委书记。



马文瑞，1937年10月时任中共庆环分区党委书记。



李铁轮，1938年1月时任中共陇东特委书记。



段德彰，1942年12月时任中共陇东分委书记（代）。



王宏坤，1937年10月时任三八五旅旅长。



王维舟，1940年4月时任陇东专署专员。



甘渭汉，1943年1月时任陇东军分区政委。



耿飚，1941年1月时兼任陇东军分区参谋长。



彭绍辉，1943年6月时任抗大七分校校长。



李培福，1937年10月时任华池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农民诗人—孙万福。



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张振财。



刘巧儿原型—封芝琴



曲子庆环分区驻地旧址



四家城三八五旅旅部旧址



华池县赤华池抗大七分校旧址



华池县豹子川军民大生产纪念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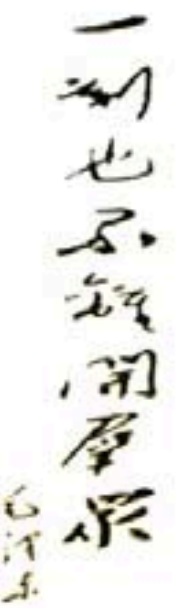
1937年三八五旅司令部人员合影



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右三）和战友在一起



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千（右）、政委肖元礼（左）和参谋长袁润（中）在驿马关合影。



毛泽东给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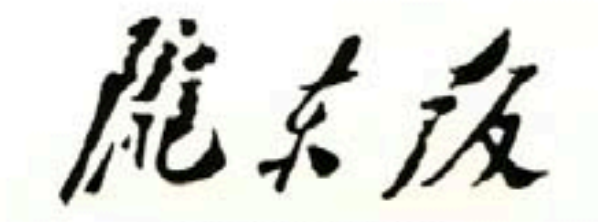
毛泽东给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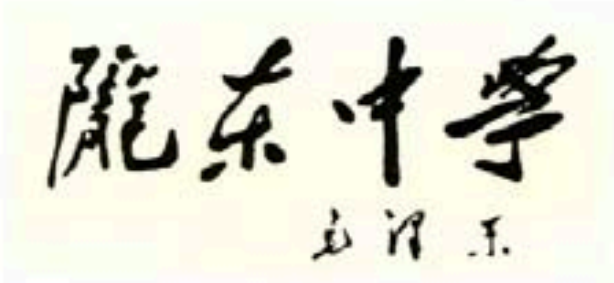
毛泽东给华池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李培福的题词

仲勋同志
无的利道在第一位
毛泽东

毛泽东给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的题词



毛泽东给陇东报的题词



毛泽东给陇东中学的题词



马锡五审判方式版画



陕甘宁边区政府给刘志仁颁发的奖状



林伯渠给张振财书写的奖状



陇东分区的民主普选

解放战争时期



李合邦，1945年10月时任中共陇东地委书记。



朱开铃，1946年5月时任陇东专署专员。



朱敏，1945年9月时任中共陇东地委副书记兼中共甘肃工委书记。



张仲良，1947年3月时任中共陇东地委书记。



孙作宾，1949年3月时任中共陇东地委书记（代）。



惠庆琪，1949年5月时任中共陇东地委书记。



王秉祥，1949年7月时任中共陇东地委书记。



李生华，1949年7月时任陇东分区专员。



黄罗斌，1946年3月时任陇东警备区司令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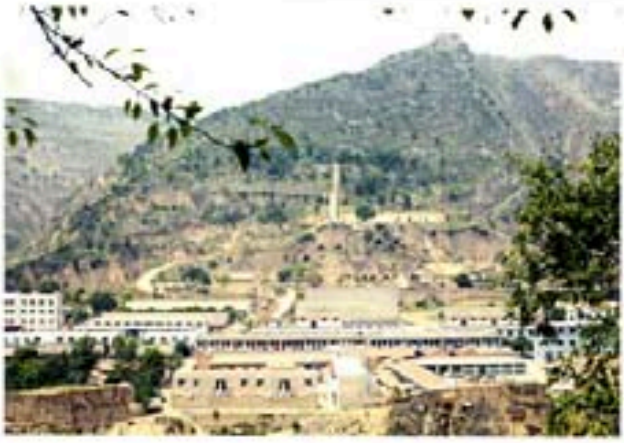
徐国珍，1948年2月时任陇东军分区司令员（代）。



刘殿英，1949年2月时任陇东军分区司令员。



马思义，1945年12月时任陇东回民骑兵团团长。



1947年6月，陇东战役中的合水战斗发生地——合水县老城镇。



1948年6月，贺龙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西府陇东战役的总结报告。



陇东老区人民支前担架队



解放战争初期，三五九旅赠给支前有功的曲子县担架队的锦旗。



陇东老区人民送军粮场景



陇东老区妇女做军鞋场景

目 录

第一编
中国共产党在庆阳的早期活动
（1921 年 7 月——1927 年 7 月）

第一章 党在庆阳革命活动的开端 …… （3）
第一节 辛亥革命后的庆阳社会 …… （3）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庆阳的传播 …… （9）

第二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庆阳的革命斗争
（1927 年 7 月——1937 年 7 月）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庆阳地方组织的建立 …… （19）
第一节 中共邠宁支部委员会 …… （19）
第二节 中共太昌临时区委员会 …… （23）
第三章 党在庆阳的早期兵运和武装斗争 …… （30）
第一节 党在国民党陇东民团军的兵运斗争 …… （30）
第二节 太白起义与南梁游击队的创建 …… （33）

第三节　党在国民党军陈珪璋部的兵运斗争 …… (37)
第四章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创建 …… (41)
第一节　南梁游击队的恢复与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 (41)
第二节　红色武装的扩大与整训 …… (43)
第三节　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成立 …… (47)
第四节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 …… (50)
第五章　陕甘边区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艰辛探索 …… (53)
第一节　陕甘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的诞生 …… (53)
第二节　陕甘游击队的反"围剿"斗争 …… (56)
第三节　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失陷 …… (62)
第四节　红二十六军的建立与照金苏区的开辟 …… (65)
第六章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 (75)
第一节　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方针的确定
…… (75)
第二节　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 (79)
第三节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 (89)
第七章　党在陕甘边区的发展壮大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 (98)
第一节　党在陕甘边区的发展壮大 …… (98)
第二节　陕甘边区党和红军支援陕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 (102)
第三节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扩大…… (106)
第四节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和县区苏维埃政权建设
…… (110)
第五节　"十大政策"的实施与根据地建设 …… (115)
第六节　陕甘边区第二、三次反"围剿"斗争 …… (123)

第八章 长征红军到庆阳……（140）
第一节 红二十五军在庆阳……（140）
第二节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庆阳……（146）
第三节 中共陕甘省委和关中特委的成立……（156）
第九章 红军西征与中共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164）
第一节 西征红军在曲子、环县……（164）
第二节 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
的成立与陇东新苏区的开辟……（169）
第三节 山城堡战役……（182）
第四节 红军主力部队驻防陇东和奔赴抗日前线……（186）
第五节 陇东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195）

第三编
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庆阳的活动

（1937年7月——1945年8月）

第十章 党在陇东的组织建设……（205）
第一节 中共陇东特委和陇东统战区的形成……（205）
第二节 庆环分区成立后的主要工作……（212）
第三节 关中分区成立后的主要工作……（217）
第四节 党在庆阳领导的武装力量……（224）
第十一章 党领导的反磨擦斗争……（235）
第一节 战略相持阶段陇东的复杂局面……（235）
第二节 陇东两次磨擦事件与反磨擦斗争……（241）

第三节　关中分区的反磨擦斗争……（254）
第四节　陇东分区的成立……（261）
第十二章　陇东抗日根据地党的建设……（265）
第一节　建立党的组织与扩大党的队伍……（265）
第二节　党的宣传教育工作……（270）
第三节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278）
第四节　陇东党组织的整风运动……（284）
第十三章　陇东根据地的抗日政权建设……（292）
第一节　陇东抗日政权建设及巩固……（292）
第二节　陇东抗日根据地的法制建设……（308）
第三节　陇东抗日根据地的支前活动……（313）
第十四章　陇东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建设……（319）
第一节　陇东根据地的减租运动……（319）
第二节　陇东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325）
第三节　陇东根据地的工商业和财税工作……（337）
第四节　陇东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及卫生工作……（344）
第五节　陇东根据地的历史功绩……（365）

第四编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庆阳的活动

（1945 年 8 月——1949 年 10 月）

第十五章　党在陇东解放区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373）
第一节　陇东解放区的民主运动与民主政治建设……（373）
第二节　陇东解放区的生产运动……（389）

第十六章　党领导下的陇东解放区的自卫战争……（399）
第一节　党加强陇东解放区的武装力量……（399）
第二节　党领导下的自卫战争准备工作……（403）
第三节　“迎王”战役 ……（409）
第四节　陇东解放区的自卫作战……（415）
第十七章　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420）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保卫战的序战——西华池战役……（420）
第二节　陇东解放区军民的反攻斗争……（428）
第三节　陇东战役……（432）
第十八章　陇东解放区的游击战争与西府陇东战役……（442）
第一节　全面坚持游击战争……（442）
第二节　西府陇东战役……（447）
第三节　陇东国统区党的工作……（456）
第十九章　陇东解放区的土改和整党整军运动……（461）
第一节　陇东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461）
第二节　陇东解放区的整党整风和新式整军运动……（471）
第二十章　陇东全境解放与支援解放大西北……（476）
第一节　陇东解放区的收复……（476）
第二节　陇东全境的解放……（484）
第三节　陇东人民支援解放大西北……（491）
第四节　庆阳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502）

后　记……（508）
附图 1　庆阳地区境内党组织分布示意图
（1927 年 9 月—1937 年 9 月）
附图 2　陕甘革命根据地分布图（1932 年 2 月—1935 年 2 月）

附图3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通过庆阳路线示意图
（1935年8月30日—10月16日）
附图4　红一方面军西征战役示意图（1936年5月19日—7月下旬）
附图5　山城堡战役示意图（1）（1936年11月）
附图6　山城堡战役示意图（2）（1936年11月）
附图7　红一方面军、援西军、中央红军教导师驻陇东示意图
（1937年2月—8月）
附图8　陕甘宁省、关中特区时期所辖陇东苏区示意图
（1936年5月—1937年9月）
附图9　八路军留守陇东示意图（1937年10月—1945年8月）
附图10　陇东分区（含关中分区新正、新宁县）行政区划图
（1940年8月—1945年8月）
附图11　陇东分区（含关中分区新正、新宁县）行政区划图
（1945年8月—1949年8月）



第一编

中国共产党在庆阳的早期活动

（1921年7月—1927年7月）

前　言

庆阳位于甘肃省东部、陕甘宁三省交汇处，因居陇山（即六盘山）以东，习称“陇东”。庆阳有着悠远厚重的历史积淀、灿烂辉煌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近现代历史上，庆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谱写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篇章。

庆阳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最早播下革命火种的地方之一。1927年，王孝锡、任鼎昌等革命先驱在宁县太昌镇创建甘肃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中共郁宁支部，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庆阳革命斗争的序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庆阳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和西北红军的摇篮。大革命失败后，遵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西北党组织在陕甘边界地区开展“兵运”活动，点燃了武装斗争的烽火。1930年10月，刘志丹领导著名的“太白起义”，打响了共产党人在甘肃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边区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1931年10月，陕北游击支队与南梁游击队在华池县林锦庙会师。1932年1月，按照陕西省委指示，会师部队在正宁县月明原北柴桥子村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2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自此，有正规番号的西北红军正式诞生。

1932年4月，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寺村原组建赤卫军和农民联合会，建立红色政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创建了包括甘肃正宁、宁县和陕西旬邑部分地区的寺村原革命根据地。寺村原革命根

据地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陕甘边地区的首次实践，标志着陕甘边根据地的诞生。1932 年 8 月，在国民党及地方军阀势力的大举进攻下，游击队撤离寺村塬。1933 年初，刘志丹、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又投入创建以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6 月，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创建根据地遭敌重兵围追堵截，几乎全军覆没。在寺村塬、照金根据地相继失守，陕甘边革命斗争和红军出现危急的关键时刻，刘志丹、习仲勋和陕甘边党组织力挽狂澜，于 8 月召开陈家坡会议，统一了党内思想，保存了革命力量。11 月在合水包家寨召开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确定了以南梁为中心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方略，使陕甘边革命斗争重新沿着正确方向发展。1934 年 4 月，根据地军民经过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粉碎了国民党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根据地快速发展到陕甘边界十几个县的广大地区。11 月，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正式的工农民主政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荔园堡正式成立，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反映出陕甘边党与红军逐步成熟与壮大，在西北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之后，根据地各县区相继建立红色政权。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大力发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各项社会事业，使根据地进入蓬勃发展时期。1935 年 2 月，国民党政府调集陕甘宁豫晋 5 省军阀 4 万余兵力向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陕甘边主力红军与陕北红军联合作战，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围剿"斗争，成功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包括陕甘两省 20 多个县、范围扩大到北起神府、南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的广大区域、人口超过 100 万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

第一章 党在庆阳革命活动的开端

第一节 辛亥革命后的庆阳社会

一、近代社会民主思想在庆阳的传播

庆阳位于陇山以东，习称"陇东"，地处陕、甘、宁三省区的交汇处，距西安、兰州、银川等中心城市较远，交通较为闭塞。这里山塬交错，沟壑纵横，与子午岭浑然相接，成为天然屏障，古书称其"联络关陇，襟带邠岐，山谷高深，地形险固"、"襟带秦凉，拥卫幽辅，关中安定，系于此也"。险要的地形，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庆阳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战国时期，庆阳为义渠戎国都城所在地；秦灭义渠后，在这里设北地郡，并修筑了秦长城和秦直道；汉唐时期，庆阳是都城长安的屏障；宋代庆阳是宋夏、宋金、夏金交兵的战场；元朝及明清两代，庆阳战事频繁；到了近代，列强的疯狂入侵和封建官僚腐朽统治的加剧，把庆阳人民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为了维持其没落统治，与帝国主义签订了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侵略，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权力和财政空虚的清政府，为了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和奢靡消耗，疯狂增加赋税摊役，加重对农民的剥削。19世纪末，西北战事连年，天灾人祸频繁发生，大部分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四处流浪，不少村庄十室九空，田园荒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动荡不安，阶级

矛盾十分尖锐。在这种恶劣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民心思变，一些民主进步人士开始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第二年在东京成立同盟会陕甘支部，甘肃留日学生张赞元任事务员。此后，同盟会在甘肃开始了活动。1907年，留日学生阎士璘、范振绪在东京创办《秦陇》报（后改为《关陇》《复声》），反对立宪，指斥时弊，号召推翻清政府。1908年，江南一带从事革命活动的同盟会会员王之佐、黎兆杖等受到清政府的通缉，纷纷来到甘肃宣传革命。与此同时，秦州（今天水市）人陈养源在上海开办"竞今书局"，和革命党人联系密切，托人将宣传革命的《民报》等刊物捎到秦州，在知识分子中流传，影响很大。在革命党人和进步志士的宣传影响下，民主革命思想开始在庆阳传播。

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在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推动下，以湖北新军为主力发动武昌起义，并迅速获得成功。各省纷纷响应，进而掀起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风暴，终于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辛亥革命后，民主革新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席卷全国，在陇原大地得到广泛推进。1912年3月15日，甘肃省临时议会成立，推选李镜清为议长，"甘肃国民党领袖"慕寿祺（镇原县人）为副议长。11月，慕寿祺被选为甘肃临时议长。随之，宁县临时议会成立。1913年春，镇原县临时议会成立，议长、议员依法选举产生。1913年3月，庆阳各县临时议会相继成立，并推选镇原人张宸枢为代表，参加北京临时参议会的选举。临时议会在慕寿祺等人的领导下，以"开通风气、启迪民智"为宗旨，捐资邮购京、津、沪、汉等地出版的各种民主报刊杂志，在兰州庄严寺（今兰州晚报社）设立阅报社，同时还传播同盟会《民报》《革命军》等进步读物，交流文化，宣传国是，为新文化以及民主革命思想在庆阳的广泛传播开启了先河。

二、黑暗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

辛亥革命后，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力量非常

强大，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3个月，就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政府所取代。1913年2月，甘肃开始实行军、政分治，撤销清朝府、厅、州等建制，庆阳撤销府制。是年冬天，袁世凯任命张广建为甘肃督军。张广建任甘肃督军期间，政治腐败，横征暴敛，甘肃人民对其强烈反对。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甘肃陷入军阀互争军政大权的混乱局面。地方势力乘机以"甘人治甘"为由向北京政府极力举荐陇东镇守使陆洪涛任甘肃督军，而宁夏护军使马福祥也企图以武力赴兰任督军，致使甘肃的争督风潮愈演愈烈。为平息事态，1920年底，北洋政府任命马福祥为绥远都统，陆洪涛为甘肃督军，帮统张兆钾为陇东镇守使。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推动和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形势不断发展，开创了民主革命的新局面。在这种形势影响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并将所属部队改为国民军。1925年10月，冯玉祥指派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带领国民军进驻兰州，收编了陆洪涛部，代行甘肃督军，办理军务。1926年初，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京、津地区的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帝反封建运动不断高涨，威胁到了帝国主义及其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在帝国主义的撮合下，奉系、直系军阀联合，在北方发动了对国民军的进攻。在这种形势下，甘肃地方军阀特别是野心勃勃的张兆钾，与直系、奉系军阀勾结，准备夺权。1926年5月，张兆钾接受吴佩孚的命令，派黄得贵、韩有禄为前方正、副总司令，带兵会同各路军阀进攻兰州，欲将刘郁芬赶出甘肃。7月，国民军发动反攻，黄、韩部和国民党部对垒于隆德、静宁两县境二十余日。后国民军援兵从西南夹击而至，黄、韩部大败。8月28日，张兆钾仓皇逃出平凉，经过华亭退到陕西。[①] 北洋政府在陇东的统治结束，从此庆阳进入20世纪最混乱的时期。

① 张国理、慕寿祺：《重修镇原县志》卷17《大事记下》。

张兆钾兵败后，其旧部"由平凉北原退至镇原，陆续开往西峰镇，溃军所过之处席卷一空，无业游民纷纷起而为匪，镇原农村遂破产矣。"[①]而且国民军也给庆阳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1926 年 8 月，国民军第二军姜宏谟部由陕西开往西峰镇，途径宁县太昌三不同一带，市镇村庄被抢掠一空[②]。黄得贵、韩有禄盘踞庆阳期间，想渗入庆阳的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以及本地民团与黄、韩军队展开了争夺战，庆阳陷入战乱之中。1926 年 9 月，黄得贵在肖金镇被刘郁芬部旅长佟麟阁率部击败，退入宁县境内，后与部三纲农民军发生战斗，移驻早胜镇。不久，韩有禄也率溃军来到宁县驻盘克镇。黄、韩部驻宁县期间，表面上约束部队，严禁抢劫掠夺，可是他们不仅向地方摊派粮秣军饷，而且"下层私下串通，暗地改装，趁夜以出，伙劫百姓"，极大地骚扰祸害了当地民众的生活。12 日，国民军韩复榘部进驻宁县政平。28 日，两军相遇激战，黄得贵部溃败，退入子午岭。第二年夏，黄得贵率部复出和韩有禄部会合，与国民军马鸿宾部二十二师激战数日，马鸿宾大败，黄得贵部连夜追击。国民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得知二十二师失败的消息后，急派骑兵第三师驰援，将黄得贵、韩有禄部击败，韩有禄被国民军击毙，黄得贵逃往大连，部队被国民军收编，马鸿宾部退守庆阳。

1927 年 6 月 25 日，国民党开封政治会议决定成立甘肃省政府，刘郁芬任主席，裁撤甘肃各道道尹，改设六区行政长，后又撤销区建制，改为省、县两级，庆阳各县直属省政府管理。第二年，县以下组织进行了改制。1929 年 8 月，庆阳各县推行区村制。

这一时期，庆阳农村的土地兼并更为突出。占人口不到 10% 的地主、富农霸占着绝大部分土地和生产资料，90% 以上的农民无地或缺少土地。庆阳、华池一带的土地，绝大部分被号称"八大家"的富豪霸占。大地主李子良一家占地 7 万余亩，牲畜 1000 多头，每年收租

① 张国理、慕寿祺：《重修镇原县志》卷 17《大事记下》。

②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第 246 页。

达四五千石(每石约200公斤),从庆阳到定边沿途农民大多都是他的佃户。华池县南梁一带有土地2.6万亩,被地主占去1.8万亩。正宁宫河镇大地主王宝璐家有数百顷良田,方圆十四五个村庄的农户几乎都是他的佃户,在兰州、陕西、宁夏有商号10余处。大量的土地兼并,使不少自耕农沦为佃农。

地主阶级在利用地租剥削农民的同时,还以雇工、高利贷等多种手段盘剥农民。难以度日的农民向地主借债1块银元月息达3至10分,并且要用土地或房屋作抵押,许多农民被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加之连年灾荒,出现了夏秋绝收、赤地千里的惨状,农民只能以树皮、草根、野菜充饥,吃尽树皮草根就吃"观音土①",成千上万的饥民、灾民饿死荒野,惨不忍睹。

除了饥荒战乱,封建官僚和地方军阀还随意向农民摊派,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官府乡绅相互勾结,高摊浮收,敲诈勒索,广大人民苦不堪言。张兆钾任陇东镇守使期间,为巩固自己在陇东的地位,一面以扩军为名,强招兵丁数百人,加强军事训练,培植亲信和后备军官,一面疯狂搜刮民脂民膏,在平凉大修将军府,在原籍渭原修建宅院厅堂,整修祖坟。为了满足私欲,从1923年起在各县征收烟亩罚款,无论农民种烟与否,均按地摊派,按户征收,残酷盘剥农民。军阀部队此过彼到,摊粮派款,更加重了人民负担。

沉重的封建地租和高利贷盘剥,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匪患的横行肆虐,军阀的连年混战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庆阳这块土地上的农民失去了安定的生活环境,被迫背井离乡,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渐衰落,商业贸易受到冲击,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陷入了灾难的深渊。

三、庆阳人民自发的反抗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庆阳人民在兵匪蹂躏、官绅压榨、

① 观音土,是庆阳马莲河流域河谷沉积的一种浅黄色土层,土质细棉松软,研压即成粉状。当地人称其为"观音土"。

地主盘剥的层层压迫下不堪其苦，走投无路，爆发新的反抗斗争势所必然。

鸦片战争后，发生在陕甘大地历时15年之久的回民起义，以董福祥为首领的庆阳饥民暴动，四川哥老会会徒刘天贵在庆阳、合水一带领导的饥民起义，西峰佛教徒帅仁帮、李学宗组织的饥民暴动等农民自发的反抗义举，点燃了庆阳人民抗暴抗税的烈火。辛亥革命后，饱尝压迫的人民纷纷奋起响应，庆阳爆发了一系列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和革命斗争。1911年11月，宁州哥老会首领彭四海（原籍四川）及汪兆黎等聚集数百人在宁县早胜镇起义。1915年7月，宁县知事征收禁烟罚款、验契等税，敲诈勒索，引起民愤。20日，盘克镇一带农民奋起打死县警备队队长刘朝俊，捣毁验契局，并联络各乡群众5000多人，围攻县城4天，抗议缴纳新税。抗税的消息一时传遍四方，宁县各乡镇群众立即仿效，"捣毁了所有的验契局，抄没地主绅士的家，肃清了新税机构"①。庆阳、镇原、合水、泾川、灵台、华亭等16县农民用"鸡毛传贴"，相互联系，形成声势浩大的抗捐运动。8月上旬，宁县四乡农民在王仲元、韩廷献、李庚元等人的组织下，传贴陇东各县，筹划组织民团，推举团总，准备开展长期的抗捐税斗争。8月27日，环县南乡团总张九才等响应陕北起事农民军，率领3000多人攻克环县城，杀死县知事等6人。随后，庆阳、合水、镇原、保安、富县农民数万人前往响应，公推张九才为总司令，围攻庆阳县城，令陇东当局震惊。1924年4月，庆阳、合水、正宁等县农民组成的3000多人抗税大军在合水县店子村村民何永玺的领导下，包围合水县城一月有余，逼迫合水县知事减免税款。1925年，在陕西"红枪会"的影响下，正宁、宁县、合水、镇原等县"红枪会"相继建立。正宁县"红枪会"于1926年围攻县城，打败催粮要款的军阀黄得贵、韩有录残部。宁县"红枪会"在郜三纲的带领下，围攻县城，抗粮抗税。镇原"红枪会"首领陈彦明、张宗英等于1927年3月暴动，活动于太平、王

① 《甘肃文史资料选集》第10集

寨源、方山等地，与地方民团和反动当局对抗。在这些反抗斗争影响下，庆阳地区各县广大贫苦农民纷纷肩扛镢头、锄头，组织"镢头队"、"口袋队"，进行抗粮、抗捐斗争。华池南梁、乔河一带的"哥老会"、"扇子队"，葫芦河的"镢头队"等也四处活动，虽然未成气候，但却带动了抗捐、抗税及反封建斗争向周边地区迅猛发展。

这些大大小小的反抗斗争虽然由于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缺乏统一的组织行动和先进阶级的政治引导，在反动军阀、封建官僚和地主的威逼利诱、分化瓦解和残酷镇压下都失败了，但它充分显示了庆阳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鼓舞了广大农民的斗志，有力打击了清王朝和封建军阀在庆阳的反动统治，为中国共产党在庆阳领导武装斗争、创建根据地和红色政权，奠定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和群众基础。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庆阳的传播

一、五四运动对庆阳的影响

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的全国规模的爱国运动。它使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并由此引发一场广泛深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

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特别是青年中的一批先进分子，把自己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了起来，逐渐与民众结合，走向社会，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他们纷纷撰写文章、创办刊物或成立社团，介绍、传播和研究国内外的各种新思想。五四运动期

间，旅京求学的甘肃籍学生大都积极参加了这次爱国运动。北京大学庆阳籍学生王自治[①]参加了火烧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和痛打张宗祥的斗争。在运动不断深入发展的同时，王自治等甘肃籍学生及时把介绍鼓动北京革命斗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五·七日刊》《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通过书信、邮寄、自带等方式传到陇原大地，积极向本省学校和亲友通报运动发展的情况，呼吁他们起来声援，使五四运动的洪流很快发展到了西北。

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旅京甘肃进步学生为了更好地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思想、新文化以及他们对甘肃社会、教育、妇女等问题的见解和评论介绍到家乡，便开始筹商创办自己的刊物。在张明道、王自治等人的倡议下，1920年3月14日，甘肃旅京学生40余人在北京大学召开首次会议，"新陇杂志社"正式诞生。出席会议的都为杂志社社员，王自治被推选为编辑部主任，田炯锦[②]担任杂志的编辑兼校对工作。4月4日，王自治等人又组织在北大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讨论通过了杂志的宗旨和投稿简章，将杂志定名为《新陇》，5月20日，第一期杂志出版发行。

《新陇》大力宣传五四运动的意义，介绍五四以后出现的各种新

① 王自治（1889－1965），字立轩，正宁县宫河镇南庄堡人。少年时代，在村中私塾接受教育，后赴西安上中学。期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7年10月，王自治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19年，王自治和同学许德珩、张国焘、易克嶷、邓中夏、罗章龙、段锡朋、高君宇等领导、组织学生参加了五四运动，积极开展爱国运动。1920年3月，参与创建了《新陇》杂志，并担任编辑部主任，使新民主主义思想在陇原大地得到广泛传播。五四运动以后，王自治先后担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新兴国会议员、国民代表会议代表、陕西泾阳县县长、平凉中学校长、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院长、甘肃省政府参议、甘肃省政府水利专员、甘肃省水利局副局长、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首任副馆长等职务。编写了《1926年陇东张兆钾反冯斗争》《"双十二事变"在甘肃》等文史资料。1965年，王自治病故于兰州。

② 田炯锦（1898－1977），西峰人。五四运动时期在北京就读，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1928年留学美国，在伊利奥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曾发起创办《新陇月刊》，经常著文揭露甘肃镇守使张兆钾、孔繁锦之流的劣迹，抨击其贪暴行为。引文部分摘自《西峰文史》（第二辑），1996年8月。

思想，对甘肃各地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妇女问题等发表见解和议论。王自治在《新陇》发刊词中大声疾呼："甘肃的情况是暮气沉沉，大梦未醒"，"人家是一日千里，我们是固步自封，……这种情况如果不予改变，甘肃终将沦为野蛮"，"望陇人之觉悟奋发及污浊社会之改良。"为当时闭塞守旧的甘肃注入了一股清醒剂，开启了陇原新文化运动的先声。《新陇》第一期刊登了田炯锦《西洋近代思想与形势变迁的梗概》一文，深刻分析了当时社会的弊病，提出了"现在工场制盛行，没有一件东西是不合许多人的才力出产的，所以现在的东西，是社会出产的，不是个人出产的，所以保守的钱，应归之公众，不是个人私有"，"所以马克斯主张土地、资本归国有，一切经济的活动，都要以社会共同的利益做前提，不应该以私人发财做前提"等许多进步观点，在民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受王自治、田炯锦等进步青年的影响，当时在甘肃省立中山中学读书的西峰青年刘承尧[①]也给《新陇》杂志撰写文章，结合手工业工人、农民群众生活和与统治阶级斗争的具体事例，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21 年 3 月，西峰旅日进步青年刘养峰[②]把《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和《唯物史观解说》等著作带回家乡。此后，庆阳旅京学生集体筹款购买进步书刊寄回家乡，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冲破了庆阳思想落后闭塞的局面。

在王自治的倡导下，《新陇》杂志还刊登了《我们怎样创造新文化》《妇女解放中的阻碍及补救方法》等文章，提出要改变甘肃落后

---

① 刘承尧(1904－1951)，董志乡唐箭人。1924 年 7 月甘肃省立中山中学毕业，被平凉报社聘任为记者、副总编、总编。在北期间奔走全国各地，参与社会活动，宣传革命，发表文章，抨击黑暗势力和政府腐败。1927 年，冯玉祥部驻扎平凉，他投笔从戎，任冯玉祥部办公室秘书，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后被镇原县政府派往肖金任高等小学校长，并兼任肖金镇副镇长，董志乡参议员。四八战役中，刘承尧以参议员身份掩护 5 名解放军战士，并请医生治疗，伤愈送返部队。

② 刘养峰(1894－1960)，董志乡下刘村人。1914 年就读于兰州中学，毕业后留学日本。1926 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在吉鸿昌部十九师任职。1928 年复，代理宁夏省政府秘书长，后改任宁夏教育厅长。1933 年秋，投身家乡教育事业，号召学生起来抗日，抵制日货。建国后，继续投身人民教育事业。

面貌，必须"毁弃偶像，解放思想"，"本科学的精神，用科学的方法，去治一切学术"的主张，强调指出了"妇女解放的阻碍，在于没有同男子一样受到平等的教育"的原因。同时在初刊各期中，还连续发表了介绍国内各大学情况，积极鼓励甘肃青年去省外求学的文章，以期通过他们，输入新思潮于本省。针对陇东镇守使张兆钾，设陇东官银号，向陇东各县人民任意派款，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的现象，旅京陇东学生冯翰英、贺风梧、贾大均等20余人发起反对，王自治积极响应，在《新陇》杂志上刊登他们的《告陇东各县人民书》，深刻揭露了反动军阀为害甘肃人民的罪恶行径，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引起反动当局的重视。《新陇》还转载《新青年》杂志上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代表性文章，对当时庆阳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庆阳的影响

五四爱国运动，激起了中国人民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21年7月1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完全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促进了科学民主思想在陇原大地的广泛传播。庆阳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奔走于家乡和大城市之间，或著书立说，或办学启蒙，或于集镇街巷之间发表演说，大力宣传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军阀割据和剥削压迫。1924年8月，西

峰人刘立之[①]、张孝友、刘鸣舞 等人在《新陇》杂志上发表反对封建军阀、争取民众言论出版集会自由、争取独立的政策以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等言论，并印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小册子 300 多份，发动手工业者、农民、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开展宣传，散发传单。镇原、西峰、环县、合水、正宁等县先后创立了由青年学生、农民、手工业者、教师、旅外学子、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的救国会、国民社、民众教育演讲团、新民文艺宣传队等社会团体，宣传新思想和救国救民真理，揭露封建官僚和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动员群众奋起反抗。

1926 年 3 月，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创办《民声周刊》《醒社周刊》等刊物，庆阳早期共产党员王孝锡、任鼎昌、王彦圣等定期将刊物带回庆阳、华池、镇原、合水、宁县、正宁等县文化机关和学校。这些刊物对宣传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想，鼓舞群众斗争意志，打击反动势力，推动革命形势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在民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同一时期，镇原、环县等县在原民众演讲所的基础上成立了民众教育馆，开设阅报室，借阅新图书，介绍新文化，宣传新思想。在国内大环境的影响以及庆阳籍进步人士、知识分子和早期共产党员的倡导下，庆阳工人阶级、进步学生、爱国商人反帝反封建运动不断兴起，新思想、新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通过各种渠道在庆阳迅速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庆阳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三、王孝锡与青年社的活动

王孝锡(1903—1928)，字遂五，甘肃宁县太昌镇人。8 岁入太昌

① 刘立之(1906－1984)，名鸿志，字立之，显胜乡岳岭村人。青年时入冯玉祥部转战西北，解放前夕率部起义。张孝友(1905－1961)，肖金镇李城村人。平凉柳湖师范毕业后，投笔从戎，任冯玉祥部政治处工作委员会科员，随军转战。抗日战争时期曾出任甘谷县长、西和县长。1949 年初，率部起义。刘鸣舞(1905－1960)，显胜乡岳岭村人。1926 年平凉中学毕业后入冯玉祥部总政治部工作。1928 年被调往西安《革命军人新报》社工作，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的罪行。1931 年回平凉创办《新陇日报》，任社长，亲自撰文揭露地方军阀势力的贪暴行径。1935 年调南京，任北平政务委员会驻南京办事处少将秘书，1949 年起义。

义学读书。1918年考入平凉省立第二中学学习。平凉位于陕甘交界地区，有甘肃"旱码头"之称，也是新思潮传入甘肃的主要通道。五四运动爆发后，在各种新思潮新文化等进步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下，王孝锡有了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开始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1921年5月，平凉当局为封建遗老魏宝山举行"地方特别纪念会"，平凉二中组织学生参加纪念活动，王孝锡当场发表演说，公开反对封建礼教和学校的陈腐制度，引起校方不满，被学校以"唆乱秩序"的罪名开除。之后，他长途跋涉徒步到兰州学习，直到平凉二中校长被撤换，又返校学习，完成中学学业。

1924年3月，王孝锡考入西安国立西北大学。他在西北大学读书期间，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在中共陕甘特别区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共陕甘区委）的领导下，陕西民主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国共两党合作在西北大学建立了中山学院，招收农民运动班、军事政治班、妇女运动班、地方行政人员暑期训练班等，传播民主革命思想。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学生刘含初、魏野畴、李子洲等知名人士在西北大学任教。他们不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还是陕西早期共产党员。《新青年》《向导》《独秀文存》等进步刊物和书籍在学生中广泛流传。王孝锡在阅读了这些进步刊物后，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开始投身革命事业。1925年，"五卅"爱国运动爆发，西北大学是西北地区运动的中心，受刘含初、魏野畴等人的影响，王孝锡参加了"五卅"爱国运动。由于他在"五卅"运动中的积极表现，被吸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暑假，王孝锡开始在家乡宁县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当时宁县在外地求学的学生回到家乡过暑假，他利用这个机会，与同学任鼎昌、王彦圣（又名王晓时）、王之经等在太昌镇建立了"青年社"，参加的人员主要是太昌小学的青年老师和平凉省立第七师范宁县籍学生，共30多名成员。"青年社"以"改造社会"、"改造人生观"为口号，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良好影响。"青年社"也成为大革命时期甘肃省第一个农村进步青年团体。"青年社"成员走乡串户在农民

中进行鼓动和宣传活动，把新的思想意识和进步观念带进了落后的农村，鼓动农民遗弃旧风俗，动员男子剪发，女子放足，并带来自己收集的反映新风尚的照片给农民看，对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宣传，使新思想、新观点在落后闭塞的家乡生根发芽，为党的地方组织建立，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

暑假返校后，王孝锡更加积极参加各种进步组织和革命活动。当时，西北大学共产党员组织了平民学校，主要招收失学青年和劳苦群众。教学目的主要是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对农民宣传革命思想。从学校筹备、组织到成立，王孝锡始终是主要参加者之一。为了唤醒甘肃青年学生，王孝锡组织了有甘肃籍同学参加的"旅陕青年会"，陇东籍学生有10多人参加。并散发了《告陇东十七县父老兄弟书》，以此唤醒民众。经历一系列革命斗争的考验，王孝锡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1926年6月，经刘含初、吕佑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10月，国民军刘郁芬部进入甘肃后，在该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宣侠父、钱崎泉等作为政治工作人员也来到甘肃。12月，甘肃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甘肃省特别支部成立。1927年3月，为了加强中共甘肃党组织的工作和推进国民革命，王孝锡以西北政治委员会国民党党务特派员的身份到兰州整顿甘肃党务。王孝锡和共产党员胡廷珍、马凌山、保至善等人先后来到兰州。王孝锡整顿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并担任青年部长，加强了省党部的进步力量。根据兰州地区革命斗争形势和中共陕甘区委的指示，针对甘肃特别支部组织不健全的实际，王孝锡和胡廷珍等决定对中共甘肃特别支部进行改组。1927年4月17日，中共兰州特别支部成立，胡廷珍任书记，王孝锡任组织委员，马凌山任宣传委员。王孝锡还担任了甘肃省督办公署政治部主任、甘肃政治委员会会长及第二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处处长等职务，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4月，王孝锡组织成立了兰州青年社，任社长。青年社以兰州女子师范、兰州一中为阵地，在青年学生中积极活动，动员进步青年加入。先后加入的有300多人。青年社

举办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学习会，在兰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王孝锡的组织下，兰州女子师范创办了《妇女之声》，兰州一中创办了《醒狮》周刊，宣传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王孝锡在兰州的革命活动，有力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思想在甘肃的广泛传播。



第二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庆阳的革命斗争

（1927年7月—1937年7月）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庆阳地方组织的建立

第一节　中共邠宁支部委员会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庆阳社会状况

国民军统一甘肃后，1927 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民政府。7 月，汪精卫集团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1931 年，陕军杨虎城派孙蔚如率军进军甘肃，庆阳各县遂被陕军占领。1932 年，蒋介石又命其亲信朱绍良为甘肃省主席，甘肃落入蒋系军阀之手。1934 年，蒋军嫡系六十一师三六一团进驻西峰。自此，蒋介石的势力控制了庆阳。

在全国军阀混战愈演愈烈之际，陇东地区也是大小各派军阀武装此去彼来，战火连年。先后有甘肃地方势力黄得贵部，冯玉祥军孙连仲部，陕军孙蔚如、杨子恒部，还有固原杨万青、毕梅轩等多股军阀武装驻扰庆阳，扩充势力，争夺地盘。同时，谭世麟、陈珪璋等地方武装也乘乱崛起，烧杀抢掠，残害无辜。1928 年冬，赵文华、陈珪璋在子午岭聚众百余人，号称“甘肃义勇军混成团”，打家劫舍。次年 2 月，赵、陈率部击败前来进剿的宁县警队，于 4 月趁势南进宁县东原，部众发展到万人，又在庆阳驿马关击溃陇东民团谭世麟部，迫使谭退守西峰镇。此后，赵、陈部先后攻破正宁、宁县、合水、镇原县城，11 月，移驻宁县早胜镇，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庆阳大部分地区被陈珪璋控制。在围攻合水县城时，首领赵文华身亡，陈珪璋即统其众，整编为

"混成旅",自任旅长。1930年,陈珪璋接受冯玉祥收编,4月,率部驻西峰镇。此后,又攻占平凉,率部移驻平凉。1931年6月,陈珪璋投靠蒋介石,任"甘肃讨逆军第三路司令"。至此,庆阳、平凉为陈珪璋独占。1932年2月,陈珪璋被孙蔚如、杨子恒杀于兰州,这股陇东地方军阀势力遂被瓦解。此后,陇东各地土匪迭起,有大小数十股,到处杀人放火,敲诈勒索,残害百姓,肆虐乡里。土豪劣绅纷纷建立地方武装,对人民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兵匪交加的庆阳大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28年至1929年,甘肃发生严重旱灾,庆阳、镇原、宁县、环县、合水、正宁等县均属重灾区。这次大旱给庆阳各县农业生产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合水"旱已10个月,夏禾未收,秋禾未种"。环县从1928年5月到1929年4月旱灾持续1年,粮食绝收。华池县从1928年3月至1929年4月未曾落雨。镇原"入夏以来,骄阳肆虐,田禾干枯,秋后又未落雨,全无收成"。这次旱灾范围广,灾情严重,1929年春天粮价疯涨,饥民四处逃荒,人口、牲畜死亡严重。南京政府内政部视察甘肃灾情后,在报告中称:"甘肃有灾民二百四十余万人,陇东地区'迭遭兵匪,庐舍荡然,釜罄如洗。草根树皮,挖掘殆尽。死亡之余,或卧疾不起,或赤身无衣,此种奇灾,历所未有',面粉每百斤涨至银币二十五元。"[①]这次大旱灾中,庆阳地区死亡人数不计其数,区内田庐荒芜,村落焚毁,甚至发生人吃人的现象。西峰街头巷尾,到处挤满了乞讨的灾民,每日死亡几十人,在南门外挖了一个万人坑掩埋尸体,来不及掩埋的,野狗争食,惨不忍睹。流行于庆阳的谚语"人吃人、狗吃狗,鸦雀老鹞啃石头",是农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严重旱灾、连年战乱以及封建官僚和军阀的任意摊派、敲诈勒索,庆阳经济社会遭到空前破坏,农民生活极端困难。"民遭饥馑,而官府不恤民情,索粮逼款,饥民走投无路,纷纷起来反抗。"[②]残酷黑暗

① 魏虎德、贺秋萍,《庆阳近现代史》,第51页。

② 卢逵钧主编:《庆阳地区志》第4卷《军事志》,第380页。

的社会现实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庆阳人民起来推翻反动统治准备了条件。

二、中共邠宁支部委员会的成立

1927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领导西北地区党的工作。8月，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是月，根据陕西省委指示，王孝锡与胡廷珍从西安回到甘肃宁县太昌镇，与共产党员王彦圣、王之经、任鼎昌等人会合，共同研究行动方针，决定胡廷珍回家乡导河开展武装斗争，王孝锡等在宁县一带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进行武装斗争。王孝锡等人在宁县太昌镇重新整顿了青年社，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壮大青年社。为了提高青年社成员对党的认识，王孝锡组织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党宣言》等，并领导青年社开展反对当地反动统治的斗争。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在庆阳建立党组织的条件成熟了。1927年秋，中国共产党邠（陕西彬县）宁（甘肃宁县）支部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共邠宁支部"）成立，王孝锡任支部书记，王彦圣任组织委员，任鼎昌任宣传委员（后被派往平凉），王之经任青年委员。中共邠宁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甘肃建立的第一个农村基层党组织。其主要任务是：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宣传革命，发动工农群众，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推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蓬勃发展；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壮大党的组织。

中共邠宁支部的成立，是庆阳近现代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此，庆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有组织的革命活动，庆阳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它使灾难深重的庆阳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中共邠宁支部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根据庆阳革命形势

的发展需要，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党的地方组织的指示建立起来的。中共邠宁支部一成立，就根据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行动纲领，结合庆阳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实际，确定了主要任务和行动方针，成为庆阳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坚强的组织者和强有力的领导者。

中共邠宁支部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就组织动员庆阳广大工农群众和各阶层进步力量，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为自身的解放而努力奋斗。作为一切受压迫、受剥削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它注重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疾苦，向群众阐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目的和意义，使人民群众在觉醒的基础上自觉地加入到革命的行列之中，促使庆阳革命力量不断壮大。

中共邠宁支部的成立大大推动了庆阳人民革命斗争前进的步伐。中国共产党庆阳地方组织的成立，不仅揭开了庆阳人民革命斗争历史新的一页，也如星星之火，照亮了庆阳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路，加快了庆阳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进程。

三、“逐杨驱索”斗争的胜利

中共邠宁支部成立后，以宁县为工作中心，向彬县等周边地区发展。在发展党组织力量的同时，王孝锡又恢复和发展了早在1925年暑假时就在家乡建立起来的青年社，以读书会为掩护，以太昌镇为中心，组织进步青年学习《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浅说》《列宁主义浅说》和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革命理论，并结合实际进行讨论，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教青年学唱《打倒列强》等革命歌曲，使广大青年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在邠宁支部的领导下，宁县太昌镇的学生首先组建起学生会，附近各镇学校学生会也相继成立。在此基础上，王孝锡将和盛、焦村、新庄等地学校联合起来成立了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利用集日上街

演说，宣传革命，领导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当时，宁县农村一带经常有外国传教士以宗教为幌子，进行蛊惑麻痹人民思想的宣传。王孝锡组织学生当面和他们辩论，揭穿他们的文化侵略行径。太昌小学校长杨蕃昌顽固守旧，反对进行革命活动。王孝锡鼓动学生掀起"逐杨运动"，提出"打倒烂脏校长杨蕃昌"的口号，揭露杨蕃昌的贪污丑行，终于把杨蕃昌赶下台，由青年社成员赵灵洲担任校长。宁县县长索呈祥是一个贪官污吏，他在宁县任县长期间，贪赃枉法，向农民任意摊派捐税、粮款，农民不堪重负。为了给老百姓除害，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斗争，邠宁支部提出抗粮、抗款、抗捐和驱逐索呈祥的口号。王孝锡等组织进步青年及学生，深入开展社会调查，归纳了索呈祥罪状24条，并以"宁县绅民联合会"的名义，写信向甘肃省政府告状。平凉镇守使陈毓耀企图采取高压手段平息此事，追查写信人，更加激起了宁县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的义愤，在王孝锡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坚决斗争下，迫使当局撤去索呈祥的职务，追回赃款充作教育经费。

"逐杨驱索"斗争是中共邠宁支部成立后组织开展的较大规模和声势的反抗黑暗统治的斗争，不仅推动了庆阳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发展，而且使刚刚成立的庆阳地方党组织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受到了锻炼。

第二节　中共太昌临时区委员会

一、王孝锡参与发动旬邑起义

192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的《陕西工作决议》指出，实行工农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陕西革命发展的前途。要求陕西省委就此工作作出安排。5月，中共陕西党组织在旬邑发动武装起义。旬

邑地处陕西、甘肃交界，国民党反动势力比较薄弱。这里紧靠子午岭林区，地形复杂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这里的贫苦农民与统治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经常组织"红枪会"搞官府、杀豪绅，与地主土豪斗争。早在1927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就派吕佑乾在淳化、旬邑一带开展社会调查，随后又派徐经霖（徐铭勋）、吕凤岐、王浪波、蒲允升等到旬邑与王孝锡、许才升秘密联系，发动群众，组织力量，共同策划武装起义。许才升是当时旬邑高等小学校长，西安中山学院农民班毕业，早期共产党员，又是旬邑人，熟悉旬邑的各种情况。吕凤岐是旬邑高等小学教员，共产党员。

遵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旬邑地下党研究决定，待时机成熟，立即举行武装起义。5月7日，潜伏在旬邑县城内的起义队伍，先缴了警察局及守城警察的枪支，城外由农民组织起来的"红枪会"会员手持大刀、长矛、土枪越城而入，起义队伍很快攻占了旬邑县城，活捉旬邑县县长李克选和公安局长、粮秣委员及土豪劣神等7人，当日公判并予以处决。同时成立了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路军。王孝锡担任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委员。为了扩大起义影响，王孝锡提前离开旬邑县城，前往彬县百子沟煤矿，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工人暴动，配合旬邑起义。旬邑起义惊动了国民党当局，他们一面派旬邑民团围攻起义队伍，一面分化瓦解起义队伍。5月30日，在敌人疯狂反扑下，旬邑起义失败。起义领导人许才升、吕佑乾等7人被活埋。王孝锡因在百子沟煤矿幸免于难，王彦圣也受到追捕，他们先后化装离开旬邑，返回宁县太昌镇。

旬邑起义，是继清涧起义之后西北又一次声势较大的农民武装斗争。起义虽然失败，但它为党在陕甘边区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旬邑起义的失败，并没有使王孝锡等共产党人灰心，而是从旬邑起义中看到了农村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决心继续在宁县、长武、彬县一带开展革命活动，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为广大工农群众谋求解放。

二、中共太昌临时区委员会的成立

旬邑起义的经验和教训，证明了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回到宁县的王孝锡决定扩大党组织，组建革命武装，继续开展武装斗争。经过中共陕西省委批准，中共太昌临时区委员会随之建立，下设宁县、泾河川、长武3个支部，8个党小组，共有党员29名，隶属中共陕西省委。太昌临时区委以太昌小学为活动据点，在宁县和陕西的彬县、旬邑、长武一带开展革命活动。为加强大革命失败后党员的思想教育，王孝锡根据各支部党员的思想状况，制定出教育计划，提出青年社的任务是“宣传组织工农群众，进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组织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提高社会阶级觉悟。在此基础上，发展党员，使党的队伍不断壮大。1928年，王孝锡在向上级党组织的汇报中，对太昌临时区委建立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

中共太昌临时区委成立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庆阳组建扩大党组织、发展党员，不断壮大党的队伍，开展革命斗争坚强的领导核心，使党在庆阳的领导力量得到有力加强。

三、王孝锡在陕甘边界的社会调查

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村社会状况，把更多的群众组织和动员起来，把革命斗争推向更大更广的范围，1927年夏，王孝锡以行医为掩护在宁县、长武、泾川、正宁、庆阳、合水、镇原等县开展社会调查，写出了《农村阶级分析》一文。内容包括农村社会各阶级和农民生活的状况。王孝锡在对农村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后认为：地主，“其经济在这个社会上是占着最高地位，与绅士立于同等的地位，压迫贫农”；自耕农（中农）“可以自耕而食，自织而衣，在经济上的外交很少，常取各扫门前雪的独立保守主义”，对于政治漠不关心，对于社会问题很难注意得到。半耕农（贫农）的“土地很少，常有

食粮不足之虑，不得不乞求于地主的土地，常受地主的剥削，他们的经济是常不足的，不保险的”，所以，贫农是“有革命本质的”。佃农是农村社会中最没有地位的群体，是“社会上具有革命特质”的人。农村中的雇工“是资本主义社会之工人也，他们无家庭可言，无幸福、娱乐之可言，只有出卖劳动力于人，维持其不死，社会上最痛苦难堪的，莫过于这一等人”。

通过调查分析，王孝锡认识到地主、豪绅是革命的敌人，自耕农、半耕农、佃农和雇工是革命的力量，从而分清了敌我，增强了革命的信心。他坚信即使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在共产党领导下，认清敌友，坚持斗争，革命就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王孝锡通过深入调查和认真分析中国农村各阶层的经济状况、政治地位以及对待革命的态度后，1927 年 10 月，写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草案》①。他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草案》里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 15 条办法，主要包括：一切地主之土地，无代价的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成苏维埃政府的劳动贫民所公有，实现“耕者有其田”；寺院教会的土地，皇族、族官公产的土地、祠田族产的土地、官荒、沙田、湖田等土地，“一律归农民代表会议支配”；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是乡村中的革命机关，一切森林、矿产完全归苏维埃国家所有；一切豪绅、反革命的财产完全没收，废除一切苛捐杂税；改良农业，兴修水利，赞助农民的合作社运动，鼓励发展工业；颁布保护雇农、苦力的法律，保证无产而失去工作能力的人（寡、老、病、废）的生活等。

王孝锡在宁县等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后所形成的《农村阶级分析》一文，从陕甘农村各阶级、各阶层的特征出发，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他们的阶级本质特征，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问题，深刻指出广大农村中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佃户和雇工是“社会

① 此原件存甘肃省博物馆，见王维城等编著《史墨笔录》，香港华泰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版第 41 页。

上具有革命特质"的人，是党在农村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主要力量，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随后起草的《解决中国问题的草案》，提出了土地革命时期解决农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办法。这两份调查报告和毛泽东当时在湖南湘潭地区开展的农村调查后所形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有很多共同之处。为党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和革命武装斗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

四、中共太昌临时区委遭敌破坏

1928年，甘肃的宁县、泾川、庆阳、合水、镇原、正宁一带大旱，小麦减产过半，秋收无望，地主豪绅乘机囤粮，人心恐慌，迫使成群饥饿的农民自发拿起土制刀枪向地主抢粮。宁县南区农民王瑞珊、傅明玉、邵三纲组织的三支农民武装声势颇大，令地主豪绅和反动当局十分惶恐。王孝锡为建立革命武装，决定将这三支农民武装联合起来，统一组织领导，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作斗争。经过王孝锡多次说服和争取，三支农民武装终于联合起来，王瑞珊任总指挥，共有1000多人，分驻宁县早胜、石鼓乡和正宁山河镇一带。6月，王孝锡和王瑞珊商议攻打宁县县城。由于反动当局的挑拨离间和分化瓦解，傅明玉出走，邵三纲被杀，王瑞珊被捕牺牲，王孝锡组织农民革命武装的计划未能实现。

党组织在宁县一带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极大不安。11月，刘郁芬部军法处军官杨天枢携带密令来到宁县，与宁县县长密议逮捕王孝锡。26日，杨天枢利用和王孝锡是同学、旧友的关系，趁王孝锡不备将其逮捕。王孝锡被捕后被押送至兰州。在狱中，国民党军警多次对王孝锡严刑审讯，企图从他口中得到共产党的机密，但王孝锡始终坚贞不屈。对于王孝锡在狱中的表现，国民党甘肃当局向其中央执行委员会汇报说："近在宁县捕获在甘共匪首领一名……绝无

悔改之心"。[①] 12月30日，王孝锡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于兰州安定门外萧家坪城隍庙（今西北民大西侧山坡上）。行刑时，王孝锡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精神不死！"等口号，慷慨就义，年仅25岁。王孝锡牺牲后，中共邠宁支部和太昌临时区委遭到破坏，党在庆阳的革命活动暂时处于低潮。

五、王孝锡的革命诗歌

王孝锡作为甘肃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他对于革命视死如归的精神，为无数前赴后继的革命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成为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王孝锡创作的大量革命诗歌，成为他短暂革命生涯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他远大革命理想和坚强革命意志的真实写照，是中国革命文学宝库中灿烂珍贵的一页，永远激励着革命后人。

王孝锡上学时，就开始革命诗文创作，抒发豪情壮志。其在《秋风歌》中写道："志在振去从戎"[②]，表现了他救国救民的伟大志向。1921年4月，王孝锡在平凉中学先后撰写了《自强不息》《慎终于始》《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约友人赴东南各省参观教育书》《新旧文学评议》等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1924年，王孝锡在西北大学读书期间，阅读了许多进步刊物，忧国忧民思想更甚，写下了《牺牲者的悲哀》与《笼中的白燕》，均有独到精辟的见解。

王孝锡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深受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影响，诗文发生了质的飞跃，成为和敌人奋战的精神武器。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烈士英勇就义，王孝锡在兰州东教场参加追悼大会后，在《追悼北京死难烈士》中写道："诸君的鲜血，深注在我们的脑中。应当怎样

① 《陇东革命史料选辑》（二），中共庆阳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办公室，1985年印刷，第80页。

② 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办公室：《庆阳党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48页。

努力？前进！奋斗！杀贼！才能完成你们未竟之功……”[①]表现了义愤填膺、慷慨悲壮、前赴后继的坚定意志。面对旬邑起义失败、战友被害、敌人四处抓捕等残酷斗争和血与火的考验，王孝锡不但没有退缩，更加坚定了革命到底的钢铁意志和坚强决心。他在一首题为《决心》的诗中这样表白心迹：“任何力量，不能移我之心。任何力量，不堪动我之情。我的主义，驱使我不能一刻留停。我的责任，策励我不能一刻安宁。一腔热血，要浇遍地球西东”。[②] 这是他发自肺腑的革命誓言。

王孝锡被抓后，尽管身陷囹圄，但他对革命前途仍然充满希望。面对敌人的审问，王孝锡怒不可遏，严厉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反对中国革命的罪恶行径；面对酷刑拷打，他毫无惧色，极力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对党的机密一字不吐，始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在狱中毅然写下《铁窗朝霞》一诗：“静坐铁窗月影斜，献身革命不还家。朝阳翌日红光艳，胜利预兆出彩霞”。[③]

王孝锡的革命诗歌，是他，也是无数为革命前赴后继共产党人和敌人战斗的精神武器，其意义和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他的诗歌，有对亲人和战友的眷眷不舍之情，也有慷慨赴死不怕牺牲的浩然正气，更有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和向往。王孝锡烈士战斗的生活、艰苦的工作、杰出的贡献、崇高的人格、坚贞的操守以及他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诚，可歌可泣，永载史册。

① 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办公室：《庆阳党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49页。

② 祝世锋：《陇东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第23页。

③ 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办公室：《庆阳党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25页。

第三章　党在庆阳的早期兵运和武装斗争

第一节　党在国民党陇东民团军的兵运[①]斗争

一、共产党人在国民党陇东民团军的兵运工作

国民党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在中国革命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提出了领导工人、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加强军队和士兵工作的要求。

为了贯彻八七会议精神，1927年9月26日至27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农民斗争决议案》《军事运动决议案》等文件，强调了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的重要性，确定了掌握武装力量，组织革命的兵变目标任务。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夏，中共陕西省委组织的"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失败，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武装力量基本损失殆尽。在这种情况下，用兵运斗争方式创建西北红军就成为共产党人面临的急迫任务。刘志丹是党在西北从事兵运工作的杰出领导者之一，其兵运工作对西北红军的创建产生了深远影响。

① "兵运"是指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利用当地军阀扩充势力的机会，派遣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打入军阀部队内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做上层工作，争取动员士兵，从而掌握兵权，准备武装起义，创建红军的一种斗争方式。

刘志丹，名景桂，字志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陕西保安（今志丹）县金汤镇。1922年考入榆林中学，受革命思想影响，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进入黄浦军校第四期炮兵科学习。同年秋毕业，随军东征。是年冬，刘志丹奉命前往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部开展兵运工作，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1928年5月，刘志丹领导了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刘志丹继续在陕甘地区领导开展兵运工作。1929年2月，陕北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明确指出：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派党员到白军中去争取武装力量，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4月，陕北特委又在榆林红石峡召开会议，研究加强武装斗争的问题。提出了"变敌人武装为革命武装"的主要观点，通过了开展武装斗争的三种形式：白色——派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军队及民团中开展兵运工作，灰色——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力量，红色——发动组织工农武装，建立党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会议决定刘志丹接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会后，刘志丹、谢子长借助陕甘军阀扩充实力的机会，组织党团员和革命骨干打入军阀部队，准备再次起义，创建红军。

1930年初，刘志丹赴南梁一带进行社会调查，深入了解哥老会和民间武装的情况。不久，刘志丹、谢子长等人打入宁夏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开展兵运工作。当时，苏雨生正在扩充实力，委派谢子长为第十旅旅长，刘志丹为第八旅十六团中校副团长。后来，中共陕北特委军委又派张秀山、高鹏飞、李树林、贺晋年、郝怀仁等一批共产党员打入苏雨生部。他们在刘志丹、谢子长的带领下，在苏雨生部利用公开身份安插了由陕北地方党组织选送的以党员为主的学生兵近300名，在共产党员张东皎任团长的八旅十五团成立了"学兵队"，扩大了革命力量，培养了大批革命军事干部，在以后的靖远起义和西华池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打入苏雨生部不久，刘志丹、谢子长组织召开了曹又参、张东皎、牛化东、高岗、刘约三等33人参加的党员会议，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苏雨生与马鸿逵的矛盾已是一触即发，决定

苏、马一旦开战，他们便带领受共产党控制的各部队回转陕北和庆阳一带，以扩兵为名，发展壮大革命武装。不久，苏雨生在宁夏兵败，投靠了陕西的杨虎城，刘志丹离开了宁夏。

二、三道川事件

刘志丹离开宁夏后，谢子长脱离苏雨生部，带第十旅部属数十人转移到陕北保安金汤镇，与刘志丹共谋前往庆阳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部开展兵运工作。同时，在敌人力量薄弱的陕甘宁边界地区，收拢逃避敌人追捕的党团员和革命者，争取民团、哥老会和民间武装，开展革命活动。

1930年7月，谢子长派去宜川县后湫天山寨杨庚武部活动的阎红彦、雷恩均，带领他们拉出的周维祺营抵达金汤镇附近，与谢子长部以及脱离了军阀苏雨生、投靠谭世麟的张廷芝、张廷祥部会合。随后，谢子长、刘志丹带领这几支部队，一同开赴与陕西吴起交界处的甘肃庆阳三道川，欲在谭世麟部"挂名建军"。

会聚三道川后，谢子长出任谭世麟陇东民团军"清乡"司令部直属第三团团长，刘志丹任三团第一营营长，周维祺营改编为直属三团第二营，周维祺任营长，张廷芝担任由其部属改编的直属第二团团长。

部队整编后，应谭世麟邀请，刘志丹带杨树荣等几名共产党员，前往庆阳城的陇东民团军司令部，"帮助"谭世麟整训民团军，借机迷惑敌人。谢子长则率领新组建的部队在三道川加紧整训，准备发动起义，建立工农红军。

张廷芝见周维祺营人多枪好，便起了吞并这支武装的企图。8月，周维祺不顾对张廷芝父子吞并周部的险恶阴谋有所察觉的谢子长等人的反对，执意带领部属和阎红彦等人，跟随张廷芝去宁夏下马关帮其收罗旧部。折返途经三边安边堡时，张氏父子以庆功洗尘为名，合谋上演"鸿门宴"，缴了阎红彦及其所带骑兵的枪械，并予扣押，

将周维祺营70多人全部缴械。随即，张氏父子派百余骑兵直扑三道川，突袭了猝不及防的谢子长团部和刘志丹的第一营，使刚组建起来的队伍，遭到严重损失，部队被打散，谢子长脱险回到保安后，与从庆阳返回的刘志丹结伴前往绥德、米脂一带，寻找中共陕北特委。

三道川事件后，刘志丹、谢子长并未气馁，反而愈挫愈奋。他们在总结三道川事件深刻教训时，认识到搞武装斗争，不直接掌握军队是不行的。在创建革命军队的过程中，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争取一些条件，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根本途径是要创造为我党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因此，也更加坚定了刘志丹、谢子长独立建军的决心。

第二节 太白起义与南梁游击队的创建

一、太白起义

1930年9月中旬，刘志丹返回保安，同党支部成员曹力如、王子宜等一起研究兵运工作计划。这时，从三道川脱险的卢仲祥、刘约三、马福吉等陆续回到保安，贺彦龙、魏佑民等人也分别从延安、宜川、瓦窑堡等地来找刘志丹。杨树荣从庆阳回到保安，向刘志丹汇报说，原计划在三道川起义的事，谭世麟仍无觉察，还想让刘志丹继续担任其骑兵第六营营长。为此，谭世麟曾让驻合水太白镇的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副营长王凤珠协助此事。根据这个情报，刘志丹等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奇袭太白镇，消灭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夺取武器，创建一支独立的工农武装。随后，刘志丹派杨树荣去合水太白镇告诉第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骑兵第六营将开赴太白镇，让他们预先筹集粮草，*借此稳住敌人，同时调集人员，赶制民团军服装和旗帜。*刘志丹从保安民团中抽出部分人员，加上原骑兵第六营从三道川零

星回来的人员，共有29人，长短枪20余支，战马20余匹。刘志丹将队伍带到白沙川密林中，进行了必要的训练和动员。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9月28日，刘志丹率领队伍从白沙川出发，沿葫芦河前进，当天下午进驻太白镇。

太白镇地处陕甘交界，葫芦河与苗村河交汇于此。刘志丹的队伍当天住在李绪增的烧酒作坊里。当晚，在敌第二十四营中当兵的赵连璧以喝酒为名，来到作坊，向刘志丹报告敌第二十四营内部的情况。第二十四营有3个连，第一连驻在镇内一个骡马店里，第二连驻在河东岸的黄家砭，第三连驻在离太白镇几十里外的林锦庙，兵力比较分散，便于各个击破。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麻痹、迷惑敌人，刘志丹安排战士们连续两天分头与民团军官兵开展"交朋友"活动。30日晚，刘志丹与几个负责人详细分析了几天来掌握的敌情，认为敌众我寡，只有速战速决，智取敌人，才能战胜强敌。具体作战计划是，由刘志丹、杨树荣出面，以商筹粮草为由去找黄毓麟、王凤珠，伺机活捉，迫其令部队缴械，如若不成，就打死这两个反动军官；由卢仲祥负责带10余人与敌第一连官兵在烧酒坊"联欢"，伺机消灭敌人；刘约三和魏佑民在河边监视驻河东岸黄家砭敌第二连的动向。

10月1日早晨，刘志丹、杨树荣按照部署，来到敌副营长王凤珠的住处"商借粮草"，王凤珠派人请来黄毓麟商议此事。两名反动军官当即被刘志丹、杨树荣击毙。这时，在李绪增烧酒作坊里，敌第一连的官兵已酩酊大醉。听到枪声，卢仲祥一声令下，战士们把枪口一齐对准了敌人，除敌连长企图顽抗被击毙外，其余官兵全部缴枪投降。驻黄家砭的敌第二连听到枪声后，向山上逃跑，卢仲祥、刘约三、魏佑民率领20余名骑兵勇猛追击，打垮了敌第二连，又缴获了一些马匹和部分枪支弹药。中午时分，太白战斗胜利结束。刘志丹召集群众大会，宣布了黄毓麟、王凤珠及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的罪行。当晚，刘志丹率部在向林锦庙转移途中，巧妙抓获第三连连长马建有，然后迅速包围了林锦庙之敌，俘获了敌第三连的全部人员、枪支弹药和马匹。至此，作恶多端的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被全部消灭。

战斗中，击毙敌营长黄毓麟以下10余人，俘敌数十人，缴获长短枪50余支，骡马10余匹。[①]

太白起义，打响了共产党人在甘肃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军阀的第一枪，在西北建立了第一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开创了党在西北独立领导革命武装的先河，标志着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由兵运工作向开展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的转变。

二、南梁游击队的成立及发展壮大

太白起义后，刘志丹利用缴获的武器，组建起一支100余人的游击队，因这支游击队经常活动在南梁一带，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之为"南梁游击队"。南梁游击队的成立，揭开了党在陕甘边武装斗争的序幕。

为了扩大南梁游击队，更好地开展武装斗争，刘志丹委派作战勇敢、活动和组织能力强的赵连璧携带一部分枪支弹药，去太白一带扩大队伍，壮大力量。不久，赵连璧动员了几十名贫苦农民加入了游击队，并收编了太白民团军的残部和当地民团三四十人，队伍扩大到100余人，赵连璧带着这支队伍在太白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同时，刘志丹又派同守孝带一部分人在南梁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刘志丹带领游击队转战于陕甘边界的合水、安塞、保安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除劣绅，扩充兵力，操练队伍，部队连续在真武洞、镰刀湾打了几个胜仗，缴获了不少枪支。许多青年农民纷纷前往参军，游击队很快扩充到200余人，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注意。陕西军阀高双城率部分兵两路，直扑游击队在保安的驻地，妄图消灭游击队。

1931年2月15日，刘志丹接到延安地下党送来的敌军"进剿"游击队的情报后，决定转移合水，避开敌人"围剿"的锋芒，待机破敌。

①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甘肃历史斗争录》，第13页。

16日，游击队冒着漫天风雪向陇东转移，经过瓦子川、平定川、豹子川，18日到达合水固城川，与赵连璧、同守孝率领的队伍会合。这时，刘志丹在庆阳训练陇东民团军时结识的贾生财闻讯从陇东民团军中拉出40多人参加游击队，队伍增加到400余人。为了巩固革命武装，刘志丹将游击队带到合水县固城川麻峪村进行整编，共编为四个连，刘志丹任总指挥。第一连连长卢仲祥；第二连连长魏佑民；第三连连长赵连璧；第四连连长贾生财。在游击队中建立了党支部，杨树荣任书记。合水县民团团总唐青山闻讯率领40多人前来接受改编，刘志丹将精干人员插入各连，其余人员让唐青山带回继续扩充。

三、南梁游击队受挫

南梁游击队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后，向宁县转移。2月24日，游击队到达宁县盘克张皮原时突遭陇东军阀陈珪璋第五旅蒋云台部袭击。因游击队刚刚扩编，未经训练，战斗力不强，队伍在战斗中损失严重。一连连长卢仲祥阵亡，三、四连被打散，同守孝、赵连璧等又回到南梁、太白一带活动。刘志丹率100余人突出重围，到达宁县麻子掌一带。此时，大雪封山，弹尽粮绝，游击队处境极端艰难。刘志丹率领游击队转移至中部县（今陕西省黄陵县）小石崖一带坚持斗争，并与小石崖罗连城民团建立了统战关系，暂渡难关，使队伍得到休整和补充。3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刘志丹派人与苏雨生部再次谈判。经过谈判，游击队被编为苏雨生部的补充团，刘志丹任团长，杨树荣、陈鸿宾任副团长，驻防陕西省旬邑县职田镇。在驻防职田镇期间，刘志丹利用相对稳定的时机，率领补充团抓紧军事训练，加强政治学习，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还派人进山与贾生财、赵连璧联络，召集旧部，发展队伍。同时，积极做驻地附近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刘志丹告诫干部战士多与国民党军队下层青年官兵接触，争取他们，以便保护革命武装。是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高岗来职田镇，向部队传达了省委关于"利用补充团的名义，尽量扩大部队，积极

准备打红旗"的指示。根据指示精神，刘志丹抓紧时间筹集粮款、武器，整训和扩大部队，3个月后队伍又扩充到200多人。由于当地豪绅的告密，苏雨生对补充团开始有了戒备。6月，在一次打土豪筹粮活动中，一名土豪抗粮自杀，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指使苏雨生惩办刘志丹。苏雨生也正欲借机消灭刘志丹的队伍，便以开会为名，将刘志丹骗至彬县扣押，并派骑兵包围了补充团，补充团除一小部分人员成功突围外，大部分被迫缴械，编为苏雨生的运输队。刘志丹领导的武装斗争再一次受挫。

刘志丹被扣押后，苏雨生百般威逼利诱无果后决定判处死刑。在此期间，党组织及时联络当时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秘书长的地下党员南汉宸，利用杨虎城高级参谋杜斌丞与刘志丹在榆林中学的师生关系，积极疏通渠道，开展营救工作，使刘志丹被扣押了20多天后获释。

第三节　党在国民党军陈珪璋部的兵运斗争

一、在陈珪璋部的兵运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兵运工作，开展对敌斗争，1931年7月，陕西省委派马志贞、高岗来到彬县，指示刘志丹去陇东军阀陈珪璋部继续开展兵运斗争。此时，陈珪璋占据陇东，其部被国民党改编为新编第十三师，陈珪璋任师长。陕西省委认为陈珪璋急欲扩充势力，正是开展兵运斗争的有利时机，决定在甘肃搞5个旅的兵变。刘志丹便以收编李培霄的饥民武装归属陈部为由，与陈珪璋谈判，顺利打入陈珪璋部，开展兵运斗争。陈部警卫团团长刘宝堂因受刘志丹革命思想的影响而倾向革命，通过刘宝堂引荐，陈珪璋委任刘志丹为其部第十一

旅旅长[①]，驻宁县、正宁一带。陈珪璋还派刘宝堂带一个步兵营与刘志丹一道前往宁县、正宁，协助改编李培霄的饥民武装。后因陈部蒋云台和谢绍安旅将李培霄部击散，刘志丹的收编计划落空。刘志丹到达陇东，打出第十一旅的旗帜后，很快集合了张皮原、职田镇失散的人员。党组织派到陈珪璋部搞兵运工作的张秀山也来到宁县，任第十一旅手枪队队长。彬县党组织还派来了一批干部，组成1个学兵队。队伍很快发展到200余人，刘志丹带领100余人驻早胜镇，其余人员驻宁县县城，开展整训工作。

二、早胜事件与兵运斗争受挫

刘志丹带领部队驻防早胜期间，河套土匪高广仁率部千余人投靠了陈珪璋，编为陈部第十三旅，高广仁为旅长，驻守宁县早胜镇。不久，驻守陕西彬县的苏雨生部背叛了杨虎城，欲经陇东、北窜宁夏。杨虎城命令陈珪璋部在陇东堵截。陈珪璋即下令刘志丹、刘宝堂率第十一旅协助高广仁的第十三旅共同阻击苏雨生部，但高广仁与苏雨生暗中早有勾结，准备联合进占宁夏。8月，高广仁在宁县早胜镇以"商谈要事"为名扣押刘志丹和刘宝堂，并向第十一旅发动突然袭击，将其全部缴械。这一事件使刘志丹的建军行动又一次受挫。

早胜事件后，高广仁押解着刘志丹、刘宝堂等人，经过合水向宁夏北窜。陈珪璋命令驻西峰的第五旅蒋云台率部追击，在合水城关击败高广仁部。刘志丹等人又被蒋云台部押到合水。蒋云台借口宁县失守，声言要将刘志丹押送平凉交陈珪璋严加治罪。刘宝堂闻讯后急派副官送信告诉刘志丹，刘志丹在夜色掩护下摆脱蒋云台骑兵追击，来到合水蒿咀铺乡贾生财住地，后在贾生财的掩护下，又到罗家沟圈赵连璧住地。刘志丹留下马锡五帮助赵连璧整训部队，孤身回到保安，与党组织负责人曹力如、刘兆庆等联系，以取得党的指示，

①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128页。

继续组织革命武装。

除了刘志丹等组织的一系列兵运活动外，陕甘地区其他共产党人也积极从事兵运工作。1932年4月2日，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打入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的共产党员习仲勋等借国民党军队换防之机组织发动了两当兵变，率领全营3个连200余名官兵起义。5月初，谢子长、焦唯炽在靖远组织甘肃警备第3旅举行起义。10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共产党员李艮、周志学在平凉领导了蒿店兵变。这些兵运工作虽然在国民党和地方民团的"围剿"下失败，但扩大了革命影响，推动了陕甘边区革命活动的发展。

以兵运方式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陕甘边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宝贵实践。这种实践为在陕甘边区进行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残酷的兵运斗争让他们认识到：夺取革命的胜利一定要有党绝对领导的武装力量；只有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方，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才能存在和发展；一定要有和群众相结合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尽管共产党人开展的多次兵运工作遭到了挫折和失败，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领导的兵运工作及武装起义，是党创建红军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伟大斗争前奏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积极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首先，兵运工作及武装起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振奋了革命群众的精神。一系列武装起义的爆发，一扫大革命失败后庆阳白色恐怖的沉寂局面，点燃了陇原的星星之火，吹响了开展武装斗争的号角。发生在国统区的多次武装起义，极大震慑了国民党在庆阳的势力，引起了敌人的恐慌，扩大了党的影响，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

其次，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准备了力量。这一时期，正是西北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时期，兵运工作和武装起义的爆发，不但为陕甘边区军事斗争不断发展积累了经验和教训，使更多的共产党人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重要性，而且经过艰苦斗争的磨练，为革命培养和锻炼了刘志

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文瑞、王世泰、张秀山、贺晋年、马锡五等一大批优秀政治和军事干部，后来成长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将领和领导者。

最后，兵运工作和武装起义的领导者和参加者信念坚定、勇于探索、愈挫愈奋、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是革命前辈留给老区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永远激励后人奋发前进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

第四章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创建

第一节 南梁游击队的恢复与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一、倒水湾整编与南梁游击队的恢复

1929年至1931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陕甘地区组织的大大小小数十次兵变都失败了，这些失败引发了刘志丹等人的思考。刘志丹认为："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①]以刘志丹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单纯的士兵运动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发动农民，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

1931夏，刘志丹同马锡五一道来到南梁，深入考察当地经济、政治及群众生活状况。他们钻梢林，爬高山，食野果，饮山泉，踏遍数百里梢山，研究南梁的地理环境，从平定川、瓦子川到柳沟、麻地台、井岔沟、荔园堡、南梁堡、东华池等地，一路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刘志丹还奔走于贾生财、赵连璧、杨培盛三支农民队伍中间，做了大量耐

① 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载《南梁曙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使其坚定了革命信念。9月，刘志丹、马锡五来到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杨培盛部驻地，商议整编三支农民武装，建立一支独立的工农军队，实行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事宜。决定作出后，刘志丹指示赵连璧、贾生财率部到合水县倒水湾与杨培盛部会合，将三支农民武装进行了整编，并分编为三个大队。第一大队赵连璧任大队长，刘景范任副大队长；第二大队杨培盛任大队长，白冠五任副大队长；第三大队贾生财任大队长，谷聚山任副大队长。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全军共400余人，200余支枪。至此，被苏雨生、高广仁等反动军阀扼杀了的南梁游击队再次恢复起来。这支游击队的核心力量是刘志丹从事兵运工作培养起来的军事干部，游击队员主要由陕甘地区破产的农民组成，尽管这支队伍成分复杂，但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

倒水湾整编，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一次重要尝试，是党在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从兵运向武装斗争过渡的重要标志。整编后的南梁游击队是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的革命武装，开创了陕甘边区游击战争的新阶段。

二、南梁游击队的反“围剿”斗争

倒水湾整编后，南梁游击队依托南梁一带子午岭山区开展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其影响迅速在陕甘两省传播开来，引起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恐慌，调集军队向南梁游击队发起进攻。10月，张廷芝的1个骑兵连由北向南直扑南梁二将川，与此相呼应，陇东军阀陈珪璋部的1个营及合水地方民团也乘机由南向北进犯南梁大凤川。面对敌情，刘志丹决心利用南梁一带的有利地形和良好的群众条件，予敌以狠狠打击。命令第一大队北上二将川抗击张廷芝的进攻；第二、三大队迎击南线进犯之敌陈珪璋部及合水地方民团，粉碎敌人对南梁游击队的“进剿”。

在刘志丹的周密部署下，赵连璧率领第一大队首战二将川，旗开得胜，一举消灭张廷芝部骑兵连，缴枪20余支，战马40余匹。接着，与奋战在南线的二、三大队协同作战，彻底打垮了合水民团的进攻，迫使陈珪璋部退出南梁地区。这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南梁游击队不仅在军事上站稳了脚跟，打开了游击战争的新局面，使部队迅速扩大到400余人，而且在政治上扩大了党在陕甘边区的影响。从此，陕甘边区的武装斗争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

第二节　红色武装的扩大与整训

一、林锦庙会师

1931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派曹鸿涛、拓克芳、黄子文等与中共陕北特委派出的杨仲远、阎红彦等共产党员取得联系，在反动统治薄弱和群众基础较好的山西吕梁山区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装，约20余人，随后在吕梁一带，宣传革命，进行游击战争。4月，驻汾阳永安镇国民党军1个排起义，参加游击队，部队扩大到100余人。同年夏，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的指示，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拓克芳（后为阎红彦），政治委员黄子文（后杨仲远），副大队长先后为杨仲远、胡廷俊、白锡林，经济委员吴岱峰。8月上旬，国民党军1个师及1个炮兵团"进剿"晋西游击队。晋西游击队虽然予敌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伤亡严重，剩下30余人，70余支枪。9月，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到达陕西清涧县高杰村，后在陕北开展游击活动，并通过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找到了陕北特委。陕北特委十分重视这支革命武装，派大批党团员和群众骨干参加游击队，使队伍恢复到近百人，活动于安定、靖边一带。

在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之后，曾经进入山西吕梁山区

的师储杰、肖永胜、杨琪、杨鼎等率领的几支烟商保运武装，也因在山西无法立足返回陕北。这些武装当中有些人与陕北籍的共产党员阎红彦、杨仲远、强世卿、马云泽等有亲戚关系，受到过革命影响。刘志丹、谢子长也曾经派人到这些队伍中做争取和改造工作，使这些农民武装与游击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为了扩大革命武装，根据陕北特委的指示，晋西游击队与师储杰、肖永胜的烟商保运武装会合，10月初，合编为陕北游击支队，师储杰任支队长，杨仲远任参谋长。随后，杨琪、杨鼎等率领的烟商保运武装也加入陕北游击支队，队伍扩大到300余人。10月下旬，陕北游击支队转战陕甘边一带寻找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

这时，南梁游击队在取得保卫战的胜利后正在南梁地区休整。得知陕北游击支队开赴陇东的消息后，刘志丹派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刘景范前往迎接，并派马锡五动员群众，筹备粮草，做好迎接陕北游击支队的支前工作。随后，刘志丹率领南梁游击队抵达东华池，准备迎接陕北游击支队。

10月下旬，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与杨仲远、阎红彦率领的陕北游击支队在林锦庙胜利会师。陕甘边地区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

二、新堡整训

林锦庙会师后，革命武装发展到700余人，并迅速占领华池的二将川、城壕川、悦乐川等地。11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到南梁一带，与刘志丹一起领导这支革命武装。谢子长向部队传达了陕西省委关于整编部队、建立正式红军的指示，部队随即进行认真准备。为了摆脱游击队的给养困境，为组建陕甘红军创造条件，谢子长、刘志丹即率领部队移驻庆阳县新堡地区进行休整。谢子长率一支队驻扎悦乐川新堡一带。刘志丹率二支队驻扎城壕川张家沟门、王洼子一带。他们在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整训的同时，大力开展群

众工作，并积极着手解决部队面临的冬衣、供给等困难。这时，居于镇原毕梅轩部、固原杨万青部、静宁张应坤部、陕北三边张廷芝父子兵以及杨虎城、苏雨生军阀部队四面包围之中的陇东军阀陈珪璋，在平凉为谋其生存和扩大地盘，正在千方百计为自己拉拢势力，遂派人商谈收编南梁会师部队。经过认真讨论研究，队委会成员一致同意谢子长和刘志丹提出的"借水养鱼"的建议，决定利用军阀陈珪璋扩充实力之机，暂时接受陈珪璋收编，解决军需、生计问题。谢子长和刘志丹从麻痹敌人、利用矛盾、争取时机、休整部队的策略出发，即派出马云泽、刘约三前往平凉，在保持南梁会师部队独立自主的原则基础上，同陈珪璋进行了谈判，达成如下协议：南梁会师部队的番号定为陇东暂编十三师警备骑兵第二旅，暂住庆阳新堡一带；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兼参谋长，杨仲远任参谋主任，马锡五任军需主任；拨给过冬军衣鞋帽1000余套，军饷3000余元；拨给修枪造枪工具15驮，修械工人20余名；拨给西药一驮，军医、护士两名；派陈部警卫团团长刘宝堂前往新堡检阅会师部队。

新堡整训是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的，把会师部队原来的支队、大队、中队建制改成了团、营、连的编制，并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在团的中共支部之下，营设教导员，连设指导员，部队仍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保持着坚强的政治工作体系。谢子长、刘志丹、杨仲远、马锡五等组成的旅部，形成了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第一团团长师储杰，党支部书记马云泽；第二团团长由刘志丹兼任，党支部书记刘约三。第一团所辖第一营营长阎红彦，教导员阎润平；第二营营长杨鼎，教导员胡廷俊；第三营营长雷恩钧，教导员程玉清；第四营营长白锡林，教导员党永亮。第二团所辖第一营营长赵连璧，教导员白冠五；第二营营长杨培盛，教导员杨龚叔；第三营营长唐青山；第四营营长贾生财，教导员郜德章。每营辖四个连。刘宝堂草草例行了一下检阅程序，即宣告整编结束，部队遂投入了紧张的训练。由于陈珪璋送来了40余大车军需物资，军装、军费缺乏等困难迎刃而解，士气更加高涨。

三、南梁会师部队的政治军事建设

新堡整训结束后，谢子长和刘志丹为了加强会师部队的内部团结，灵活运用党的联合一切反蒋力量的统战政策，借庆祝整编的机会，举行了"十八弟兄"拜把子香堂大会，参加换帖的有谢子长、刘志丹、杨仲远、阎红彦、刘约三、雷恩钧、白锡林、程玉清、师储杰、杨琪、杨培盛等18人。刘志丹亲笔写的"金兰谱"，以"我弟兄志投意洽，结为金兰，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若有中途背盟叛离等情，天诛地灭。"为誓言。这个"金兰谱"言简意赅，既包含个人感情，又有明确的政治内容和斗争方向。这次拜把子香堂大会对增强会师部队的团结是十分有利的，对团结改造率部投向革命的商贩队、民团和饥民武装首领人物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使会师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这18人中间，除个别人外，多数人实践了"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的誓言，有的为党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赴汤蹈火，英勇捐躯，有的数十年为革命艰苦奋斗、屡建功勋。

南梁会师部队在新堡期间，谢子长、刘志丹领导部队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动群众抗捐抗税抗租，打土豪，给穷人分粮食、浮财，扩大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这样，就完全保持了这支革命武装的独立自主和革命性质，使陈珪璋企图将南梁会师部队变成军阀统治工具的阴谋未能得逞。于是，在刘宝堂返回平凉后不久，陈珪璋即调集一个营的兵力，向新堡周围集结，妄图"围剿"瓦解这支革命武装。谢子长、刘志丹对陈珪璋的反革命阴谋早有警惕。他们当机立断，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乘敌没有完成包围部署之际，率部从新堡出发，在庆阳六寸塬敌两个连，彻底粉碎了陈珪璋先是"收编"继而"围剿"的阴谋。12月下旬，陕西省委派荣子卿来到部队，传达了省委的指示：根据九一八事件后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和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变化，会师部队应改编为西北反

帝同盟军，南下关中地区，创建平原根据地。这时，部队经过月余的休整，军政素质得到了提高，遂离开新堡南下，迎接新的战斗。

第三节　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成立

一、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成立与三嘉塬整训

1931年12月底，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按照陕西省委的指示，离开新堡、悦乐，沿子午岭西麓南下，途中击溃陈珪璋部两个连的阻击。1932年1月初，部队到达正宁县北柴桥子村。在这里，谢子长主持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会上，陕西省委代表荣子卿宣布"西北反帝同盟军"正式成立，谢子长任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仲远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西北反帝同盟军委员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荣子卿任委员。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第一支队由原陕北游击支队改编，支队长师储杰，编为3个大队和1个警卫队，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第二大队队长杨蕴，副队长吴岱峰；第三大队队长雷恩钧，副队长陈玉清；警卫队队长白锡林。第二支队由原南梁游击队改编，支队长刘志丹，参谋长朱理凯，军需马锡五，亦编为3个大队和1个警卫队，第一大队队长赵连璧，副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队长杨培盛，副队长白冠五；第三大队队长贾生财，副队长谷聚山；警卫队队长刘丕杰。两个支队共约700余人。在两个支队中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以保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

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大会上，举行了授旗仪式，由中共旬邑县特

支代表第五伯昌授军旗[①]。谢子长、刘志丹、荣子卿在大会上讲话。会场群情振奋，掌声雷动。会后，西北反帝同盟军移驻正宁三嘉塬，整训待命。

部队到三嘉塬不久，阎红彦去西安汇报工作，带回《古田会议决议》《中央苏区情况》《红军制度》等小册子，指示部队要学习这个决议和其他有关游击战争的文件。刘志丹、谢子长经常讨论研究，并把《决议》精神多次向部队做了传达和解读。《古田会议决议》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深刻分析，并指出了纠正的方法，给这支新成立的部队以思想上的武器和行动的指南。在驻三嘉塬期间，部队中晚上有人出去抢东西，刘志丹、谢子长知道后，决定整训部队，开办军事训练班，学习中央红军游击战争和部队政治工作经验。实行中央红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还根据部队情况，提出了十大纪律，要求全体指战员严格执行。整训期间，谢子长、刘志丹经常深入到贫苦农民当中，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率领西北反帝同盟军开展打土豪斗争，将山河镇商会会长、大地主张占成在北柴桥子村开的酒坊没收，把100石粮食分给了穷苦农民。西北反帝同盟军给长期遭受兵匪扰害和地主恶霸压迫的正宁人民留下良好印象，播下了革命火种。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统一了部队思想，提高了认识，建立了制度，加强了部队的思想建设，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为后来建立陕甘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二、三嘉塬事件

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领导成员之间在建立根据地、部队行动

① 1929年初，旬邑农民起义失败后，外出隐蔽的崔维峻、崔廷儒、蒲玉阶、第五伯昌等回到旬邑，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建立了中共旬邑特别支部，崔维峻任书记，坚持开展革命斗争。到1932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派杜衡到旬邑，在中共旬邑特支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旬邑县委员会，杜思洲任书记，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见中共咸阳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咸阳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65至66页。

方针、改造教育部队及津贴供给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争论激烈。刘志丹主张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保安、庆阳、合水一带，因为那里敌人势力薄弱，活动范围大，党在这里搞了几年武装斗争，群众很拥护。谢子长则认为关中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影响力大，号召力也大，群众、部队容易发展。争论的结果，刘志丹同意了谢子长的意见，带着队伍南下，准备在关中地区建立根据地。

西北反帝同盟军是刚刚组建起来的队伍，主要由分散在陕甘边界地区的农民武装组成，此前很少受到纪律教育，懒散等不良习气比较严重，甚至沾染了吸食大烟恶习。一支队中有部分地痞流氓，经常吸食大烟；二支队也有沾染了土匪习气的人员。这样一支队伍，急需整顿和教育，使其成为真正的革命武装。在这个问题上，刘志丹、谢子长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如何整顿部队，在两位领导人之间也发生了分歧，谢子长提出，对那些成分复杂不可靠的人员，该缴械的缴械，该解散的解散，该枪毙的枪毙。刘志丹主张采取教育、改造为主的办法，不堪改造的个别清理。刘志丹也对二支队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顿，在部队整编完成后，刘志丹召开了第二支队党支部和各大队领导会议，研究整顿工作，清除了混入部队的十几名地痞流氓。①

在争论的过程中，部队南下到正宁县三嘉塬。春节临近，给养十分困难，部队决定通过打土豪来解决给养问题。1932 年 1 月 31 日（腊月二十四日），赵连璧部抢了永和集，还在双佛堂一带将老百姓准备过年的猪肉也强行提了回来。当地群众找谢子长告状，谢子长认为赵连璧抢永和集是土匪行为，必须采取措施，解决部队中存在的问题。谢子长召集了一支队干部大会，参加的有荣子卿、杨仲远、阎红彦、白锡林、胡廷俊、雷恩均等人，会议决定收缴二支队的枪，处决赵连璧。2 月 6 日（农历正月初一），以出发为名集合部队，在部队集合的过程中，一支队缴了二支队的枪械，打死了赵连璧、谷聚山等人，打

① 《刘景范 1983 年 5 月 16 日谈陕甘边早期革命武装斗争》，刘风阁、任恩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 315－316 页。

伤了白冠五，解散了二支队，开除了二支队40多名干部战士，给刘景范和马锡五两人1头毛驴作为路费，劝其回家，造成了三嘉塬事件。就在二支队被缴械的当天晚上，第一支队队长师储杰带领100多人出走，投靠了杨虎城。西北反帝同盟军由700余人锐减为200余人。事后，刘志丹去陕西省委汇报工作。

三嘉塬事件给刚建立起来的陕甘工农武装造成了巨大损失，产生了很大影响。关于"三嘉塬事件"问题，在《关于西北红军战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中说："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的现象是正常的，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①

第四节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

一、陕甘游击队的成立

由于三嘉塬事件削弱了部队的力量，三原县武字区和旬邑地下党组织动员了100余名青年贫苦农民前来参军，充实部队。为了加强对陕甘边革命武装的领导，更好地开展武装斗争，1932年1月，陕西省委派军委书记李杰夫来到西北反帝同盟军传达省委新指示：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在改编完成后立即南下渭北平原开展游击战争。

① 见中共党史研究室《党风通讯》1986年第8期，第4页。

1932年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在正宁县三嘉塬细嘴子锦章村隆重召开。细嘴子的麦场上搭起了一座高台，台上悬挂着巨幅横标，上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授旗典礼大会"。几百名战士系着红色"牺牲带"，表示为革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正宁、旬邑一带的老百姓抬着猪、羊，吹着唢呐，前来庆贺，整个会场既壮观，又热烈。会上，李杰夫代表陕西省委宣布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宣布了游击队的编制和主要干部名单。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治委员，杨仲远任参谋长。刘志丹因离开部队回陕西省委汇报工作，未任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下辖两个大队，1个骑兵队，1个警卫队：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政治委员杨仲远兼任；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政治委员高岗；警卫队队长白锡林，政治委员胡廷俊；骑兵队队长强龙光。全军共360余人。为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在部队中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委员会（简称"队委会"），李杰夫任书记，在各大队也建立了党支部。并举行了授旗仪式，中共旬邑县特支代表第五伯昌将一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红旗授给了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人们向往已久的红军终于诞生了。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第一次在西北地区公开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开了这支部队的性质和宗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地区领导的武装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二、陕甘游击队的革命活动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使正宁县三嘉塬、陕西旬邑县职田原上的老百姓，看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穷人自己的队伍，他们喜笑颜开，奔走相告。当天大会后，职田镇附近的几十个农民就找谢子长，控诉他们村一个姓董的土豪的罪行，请求红军替他们伸冤报仇。谢子长根据群众要求，召集队委会研究，决定当晚攻占职田镇。

职田镇距离三嘉塬20多公里，是面积比较大的一个集镇，驻有

敌人的区公所和数十人的民团。2日13日，谢子长命令骑兵大队出发包围职田镇，封锁各路口。当晚，大部队进占职田镇，国民党职田镇区长、团总全部就擒，还逮捕了唐碧武等8个恶霸地主。第二天职田镇逢集，游击队当场烧毁了区公所的文书、账本及逮捕的豪绅的账债契约，并开仓分粮。

陕甘游击队的成立和红军占领职田镇的消息，使国民党统治当局极为震惊，他们立即调动驻旬邑县境内的警卫团和附近民团共千余人，向职田镇扑来，妄图一举歼灭陕甘游击队。2月15日，国民党部队刚到阳坡头，就遭到谢子长率领的游击队的伏击，歼灭"围剿"之敌300多人，缴获枪支300多支，还有弹药及许多物资。

陕甘游击队接连取得旬邑县职田镇、阳坡头战斗胜利后，随即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南下陕西渭北的三原、富平、蒲城、耀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在渭北转战月余，歼灭旬邑、彬县、长武、宜君、耀县等地民团武装共约1000余人，力量不断发展，影响迅速扩大。

陕甘游击队纪律严明，对群众秋毫无犯，所到之处，发动群众，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可是，在分配财产时，群众只要粮食、牛羊，不要土地。究其原因，他们怕游击队走后没有保障。这就向红军游击队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建立革命根据地，使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有机结合。鉴于这种情况，谢子长在耀县香山组织召开队委会和指挥部会议，认真分析形势，总结陕甘游击队成立以后作战和发动群众斗争的情况，并讨论了陕西省委的指示。会议认为，建立革命根据地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但在什么地方建立，要具体分析。三原、富平地处渭北高原，交通便利，敌人统治力量强大，不利于建立革命根据地，必须走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决定游击队转移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香山会议，确立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为游击队开展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从此，陕甘游击队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第五章 陕甘边区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艰辛探索

第一节 陕甘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的诞生

一、正宁寺村塬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总指挥部根据陕西省委的预定方针，立即南下，向渭北地区运动，准备进入三原、富平地区开展武装斗争，执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任务。1932年2月15日，陕甘游击队在职田镇阳坡头伏击来犯之敌大获全胜。随后，游击队沿马栏河进入旬邑与淳化交界的土桥原一线，击溃照金民团，最后转战同官（今铜川）、宜君、中部（今黄陵）地区，3月中旬回师陇东。

当时，国民党陕甘两省军阀为争夺地盘展开激烈的混战，甘军暂编十三师师长陈珪璋在兰州被杀后，其陇东的残部变本加厉地向各地索粮派款，仅驻扎在正宁的残部百余人，就向四乡百姓索要款项达10万余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正宁南塬一带的农民组织起了多支"民团"抗粮抗捐。国民党正宁县政府在多次催粮无果后，扬言要"血洗南塬"。看到陇东出现高涨的革命形势，谢子长遂改变原定出击旬邑的计划，决定就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攻打正宁山河城，开辟革命根据地。

山河镇是国民党正宁县政府所在地，驻有陈珪璋部警卫团一个排，公安局所属警察三个班，包括县府公务人员共计不足百人。此

处，还有暂编十三师一个骑兵营，由谢牛率领驻距山河镇40多公里的早胜镇，十三师警卫团团副刘明发带两个排驻守宁县平子镇。3月19日夜，陕甘游击队同张彦升、杜兴邦率领的寺村塬一带农民"民团"及群众分兵两路向山河城进攻，但因向导迷路，错失战机，内应被捕，第一次攻打山河城战斗失利。当晚，陕甘游击队撤退到正宁县西坡四疙瘩村，在这里召开队委会，制定了下一步行动计划。会议作出五项决定：①赴南塬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土豪劣绅的破坏；②将自发组织的农民"民团"改编为赤卫军，以配合红军的武装斗争；③立即实现陕甘游击队的纲领；④发动和组织群众，准备再次攻打山河城，拔除敌人的据点；⑤成立革命委员会，创建陕甘边红色政权，开辟革命根据地。①

3月20日，陕甘游击队移驻正宁寺村塬，分驻寺村塬的新庄子、西城、碾庄子等村。寺村塬又叫永河塬或南塬，是正宁南部一条比较大的塬，由湫头塬、五顷塬等小塬组成。南接旬邑，东靠子午岭大梢山。陕甘游击队移驻寺村塬后，在荀仁村寺院召开会议，宣布将原来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杜兴邦任总指挥，巩世信、张进选任副总指挥，随后又成立了农民联合会、少先队等组织。同时，陕甘游击队积极发动群众，立即投入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项活动。谢子长、高岗、杨钟远等和其他队员一起，走村串户，张贴标语，访贫问苦，宣传红军的主张，向群众宣讲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大意义。

1932年3月22日，在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主持下，东至五顷塬，西至永和塬，北至四郎河川，南至正宁县与旬邑交界地以内72个村镇的赤卫队、农会代表和游击队指战员共1000余人，在寺村塬新庄子集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又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由15人组成，农民委员10人，游击队委员5人；李杰夫任主席，张静元、唐贵荣任副主席。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财政、粮食4

① 刘凤阁、任慕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20页。

个委员会。[①] 各村也分别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大村由5名委员组成，小村由3名委员组成，陕甘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由此诞生。

寺村塬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党在陕甘边区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民主政权。尽管这个革命政权存在的时间短暂，但却是党在陕甘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一次重要尝试，它传播了革命思想，给人民带来了希望，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革命政权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提供了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二、党在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革命活动

正宁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把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作为主要任务，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的粮食、牛羊及其它财产，镇压恶霸豪绅。游击队组织领导群众先后没收了西城村豪绅刘喜坤、于家庄豪绅赵元亨、琴宅豪绅赵秉义的土地、粮食和牲畜，分配给当地贫苦农民。游击队骑兵队还到正宁永和、彬县的永乐、北极和旬邑县的底庙等村镇抓捕土豪劣绅。陕甘游击队对豪绅区别对待。对一般豪绅讨保释放，对少数罪大恶极的严加惩办。3月底，游击队在荀仁村寺院召开了有上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审并处决了民愤极大的豪绅赵元亨和恶霸贾德功。长期受压迫的穷苦农民欢天喜地，拍手称快，用当地的地方小调唱道："中华民国二十年，红军起首三嘉塬。谢浩如、刘志丹，领导穷人把身翻。东靠黄河西靠山，锦章、细咀子扎营盘。枪声一响震四方，好像猛虎追恶狼。打土豪，分田产，打开仓，把粮散。车子推，口袋搭，家家户户吃白面。都是红军来的好，世道翻了个底朝天。"

---

① 据当时任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文书的李志合回忆，寺村塬革命委员会主席张静元，副主席唐贵荣。这里采用《陕西代表团杜斌丞报告》的说法，杜斌丞即杜衡。见《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164页。

4月1日，陕甘游击队在当地赤卫军和群众配合下再次攻打山河城。他们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将陈珪璋部增援的一个骑兵营击溃。由于缺乏攻城经验，加之山河城守敌凭借坚固的城防工事顽固对抗，红军连攻两日未克，第二次攻打山河城失利。2日，驻西峰镇的国民党军暂编十三师一个营赶来增援，红军给予援军以重创，歼敌200余人后，撤离战场，转回寺村塬休整。4月13日，游击队接到旬邑地下党组织报告，敌旬邑县城驻有陕军警卫团一个营部两个连及少数民团，防守不严。队党委决定奔袭旬邑县城。当日夜，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从寺村塬出发，拂晓与敌接战，出敌不意，大获全胜，歼敌300余人，缴枪400余支，子弹2万余发。并处决了敌县长、警察局长、土豪劣绅数人。攻占旬邑县城是陕甘游击队建队以来攻克的第一座县城，影响很大。一时红军声威大振，很快发展到近千人。在建队仅仅70天时间里，陕甘游击队依托寺村塬革命根据地，积极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选择游击战争的战略方向，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标志着党在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已经从徘徊中迈出了开展武装斗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步，是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端。

第二节　陕甘游击队的反“围剿”斗争

一、“左”倾错误的干扰与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撤销

中共陕西省委认为桥山深处的各县，缺乏大革命的影响，党的工作没有基础；认为这里地处穷乡僻壤，人口稀到极点，人民贫穷到了极处，游击队经济上毫无出路，且政治影响不大。认为游击队只有在渭北、西路等广大平原地区攻占一些城镇，经济上才有出路，也易于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加之游击队没有按照省委指示南进渭北地区，

1932年4月中旬，推行"左"倾错误的陕西省委负责人杜衡亲自到陕甘游击队视察工作，时刘志丹在完成安置伤员和向省委汇报工作的任务后，亦随杜衡归队。杜衡传达了省委指示，批评游击队"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党不可饶恕的罪恶"，提出了彻底改造游击队的15条措施。[①] 这一时期，由于斗争环境极其艰苦，游击队发生了极端民主和破坏纪律的现象，战士没有薪饷、粮食和鞋袜，住宿发生严重困难，部队中出现了不服从命令、自由行动、不遵守群众纪律等问题，杜衡附和并诱导这种消极情绪。他认为第一次攻打山河城失利是"逃跑主义"，并以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名"，撤销了谢子长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职务，派其到甘肃靖远搞兵运工作。命令游击队到旬邑县马家堡集结待命。4月18日，陕甘游击队进至马家堡，杜衡将陕甘游击队分编为三、五两个支队，分散活动。刘志丹任三支队队长，吴岱峰任参谋长；阎红彦任五支队队长，杨仲远任参谋长。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队委会即行消失，各支部党组织则直属省委。随后，三支队进入陕西永寿、礼泉、乾县、彬县一带游击；五支队进入渭北地区活动。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也因为游击队南下失去依靠而停止活动。

二、陕甘游击队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陕甘游击队进入渭北、西路地区后，强烈地刺激了敌人。为扑灭陕甘边燃烧起来的革命烈火，5月上旬，国民党军队调动数旅兵力，向陕甘游击队发动"围剿"。为了统一指挥，便于反"围剿"斗争，5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又命令两队集结于旬邑清水原，恢复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仲远任参谋长，黄子

① 见《中共陕西省委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决议》（1932年3月6日）。刘风翔、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123－126页。

文任政治部主任。队委会也相继恢复，刘志丹任书记。队党委恢复后，立即召开会议，讨论部队行动方针。刘志丹认为，井（岳秀）军八十六师的一个团，分驻于富县、洛川、中部、宜君各县，兵力分散，且距其指挥中心（旅部）延安较远，增援困难，为敌军薄弱部位；同时这一地区又是山地，便于我军机动。因此部队应北进作战。队党委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出击宜（君）中（部）洛（川）地区。

5月15日，陕甘游击队夜袭马栏，首战告捷，全歼守敌五一一团两个连，缴枪200余支。17日，红军沿马栏河经转角向宜君前进，首歼凤凰山守敌两个连，再歼焦坪镇、五里镇两个民团，一日三捷，计俘获人枪各500余。五里镇战斗后，部队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扩红、筹款。当地贫苦群众革命热情极高，纷纷报名参军，部队迅速扩大到1500余人，而且装备精良，除人手一枪外，还有三四十驮备用枪械。陕甘游击队在五里镇稍事休整后，继续北进。5月22日，开始向南迂回，进入白水县，歼灭尧科民团。继而锋回遽转，北赴宜君，再歼宜君民团。然后沿咸（阳）榆（林）公路西侧山地疾驰北进。23日袭占中部县隆坊镇，全歼守镇民团。红军在这里停留数日，一面休整部队，一面做群众工作。

这时，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特务团进入宜君，与八十六师五一一团会合，两敌于25日进抵中部（今黄陵），沿洛河两岸向北搜索前进。27日，陕甘游击队转移到富县吉子峴。此时，陕军警卫团已尾随而至，其便衣队已先机埋伏于庄内。正当红军忙于设营之际，敌先头分队与庄内便衣，突然向红军发起攻击。红军跃起反击，首战将庄内之敌驱逐，随即布阵拒敌。战斗愈演愈烈，敌军愈打愈多，后续梯队接踵而至。此时敌五一一团已绕于红军背后，并向两翼迂回，红军面临被包围的危险，且吉子峴东面背靠洛河，西、北两面为洛河支流环绕，南面沟壑交织，守则无依托，退则难机动，敌情与地形十分险恶。面对险情，刘志丹决计涉洛河向东突围，并放弃辎重，轻装疾进，出敌不意，安全突围。当红军踏上洛河左岸时，洪峰咆哮而下，将敌拒于右岸。是役红军虽然脱险，但舍弃了全部辎重，扔掉了三四十驮枪械，

部队也散失300余人。

5月30日，陕甘游击队进至洛川、富县、宜川三县之交的牛武镇。这时，敌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三团陈卓武部一个营，由宜川县城西进至英旺镇，企图阻拦红军东进。刘志丹决定，趁敌立足未稳，求以全歼。5月31日凌晨，部队从驻地出发，强行军奔袭英旺，上午8时，与敌接战，出敌不备，一举将其全歼，俘获人枪300余，战马200余匹，弹药2万余发。至此，敌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之五一一、五一三两个团，均被红军歼灭一个营以上，被迫转取守势，十七路军警卫团亦退回原防。陕甘游击队自5月15日夜袭马栏，至5月31日英旺获捷，历时半个月，转战七个县，挺进700里，历经9次战斗，8胜1负，歼敌八十六师二五六旅四个整连、一个整营及大量民团，共计俘获人枪各1400余，粉碎了国民党部队的"围剿"。游击队也发展到1500余人。

三、麻子掌、梁掌堡会议与南北分家错误的纠正

正当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之际，陕西省委领导人杜衡却认为，陕甘游击队在山区建立根据地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命令陕甘游击队东进陕西韩城一带，在平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6月23日，国民党军第四十二师冯钦哉部二五〇团，并山炮、骑兵各一个连，向红军发动进攻，韩城战斗打响，由于敌强我弱，韩城战斗失利，陕甘游击队人员损失过半，为避强敌，休整部队，游击队总指挥部决定向桥山转移。转移途中，部队再次遭受敌人重兵"围剿"，损失惨重，当总指挥部率第三支队退到宁县麻子掌时，只剩下200余人。由于韩城失败，部队出现思想混乱，领导之间在行动方向上也发生了严重分歧。为了统一思想认识，队委会在麻子掌召开会议。会上，政治委员李杰夫、政治部主任黄子文提出南下，主张到群众基础好的三原武字区打游击。刘志丹主张依托桥山，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其理由是：桥山地域辽阔，回旋余地大；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可东去陕

西，西进陇东；能扩大骑兵，利用步骑配合作战。会上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作出了分开行动的决定。刘志丹一再表示：我们不要因为打了一两次败仗就闹情绪，还是要行动一致开到山区去整顿，以准备再战。但刘志丹的意见未被采纳。会后，南下北上的部队各住一村，准备分开行动。

正在这时，阎红彦带领五支队百余人到了距麻子掌5公里处的梁掌堡，从群众口中得知红军要分开行动的消息，即分别找刘志丹、李杰夫谈了个人意见。他表示同意刘志丹的意见，不能分裂，应就地开展游击战争。这时原来主张分家的同志也考虑到党的利益，认识到分开不利。于是，在梁掌堡再次召开队委会议。由于阎红彦会前分别作了工作，并且支持了刘志丹的正确意见，会议作出了以桥山为依托，就地开展游击活动，伺机向南北发展的正确决定。会议推选阎红彦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

梁掌堡会议后，李杰夫回省委汇报工作。部队在盘克原经过短暂休整，将原来的三、五两个支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第一大队队长高山保、政委黄子文；第二大队队长兼政委刘志丹，副大队长吴岱峰；骑兵大队队长强龙光。

梁掌堡会议是陕甘游击队发展过程中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明确了游击队今后的发展方向，总结了失败的教训，纠正了南北分家的错误思想，统一了思想认识，保证了部队的团结和统一，为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四、西华池起义

西华池位于庆阳通往宁县的交通要道上，是合水县重镇，现为合水县政府所在地。当时驻扎的是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十一旅特务营第一、二连，由营副潘立廷指挥。从1929年开始，我党在这支军队中的兵运工作一直没有间断，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秘密在该部工作，地下党员主要有李树林、高鹏飞、曹胜勇等。1932年春，谢子长在靖

远兵暴失败后，指示杨林等人到庆阳国民党新十一旅组织兵运工作，自己去陕西省委汇报在甘肃的工作。按照谢子长的指示，杨林到西华池新十一旅特务营一连驻地，与时任国民党特务营第一连连长、特务营中共党支部书记高鹏飞取得了联系，准备在西华池举行起义。他们通过详细考察和讨论，认为在西华池举行起义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特务营的情况对兵变有利。二是西华池的地理位置对起义有利。另外，西华池距离红军游击队活动的盘克塬一带仅数十里，四周虽然有国民党军队驻防，起义成功后，可以从容地把部队拉到红军活动的游击区去。

为了保证起义顺利进行，高鹏飞派人与刘志丹进行联络，汇报了情况。刘志丹赞成举行起义，指示："欢迎举行起义，三天内红军不离开盘克塬，准备接应起义部队，如果条件不成熟，不可轻举妄动，以免暴露力量而遭不幸。"[①]要求他们一定要谨慎行事，周密部署，保证万无一失。得到刘志丹的支持后，高鹏飞召开党支部会议，秘密商议起义事宜。一切部署好后，1932 年 7 月 9 日，利用下午出操的机会，一连缴了二连的枪，高鹏飞集合全体官兵宣布特务营第一、二连全体官兵武装起义，揭露了国民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压迫剥削人民以及反动军阀压迫士兵、克扣军饷、不顾士兵死活的黑暗统治，宣传了共产党的革命宗旨和投奔红军闹革命的意义。当天晚上，起义部队开赴红军活动地区。10 日，与前来迎接的红军游击队骑兵队在宁县盘克塬武洛村会合，当晚与主力会合。12 日，红军在正宁县湫头原召开大会，欢迎起义军，庆祝西华池起义成功，将起义部队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高鹏飞任大队长，阎润平任政委。

西华池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陇东仅有的一次成功的兵运活动。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瓦解了国民党驻庆阳新十一旅特务营，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武装斗争树立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这次起义的成功，与刘志丹率领的陕甘游击队的

① 杨林：《西华池兵变》，《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 8 辑，第 29 页。

紧密配合是分不开的。起义成功后，刘志丹率领起义部队顺利开赴游击区，与陕甘游击队一起进行了整编，壮大了西北红军的力量。

第三节　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失陷

一、"左"倾错误对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危害

根据梁掌堡会议决定，陕甘游击队转入正宁一带就地开展游击活动。在行动方针上确定以正宁为军事后方，以此为依托向两翼展开。根据这一方针，第一大队和骑兵大队，北进庆阳游击；第二大队则去旬邑、耀县活动。与此同时，派出得力同志深入农村开展地方工作。这时，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由于陕甘游击队4月下旬的撤离已基本解体。但是，红色的种子已经撒播在群众之中。经过短期努力，五顷原、龙嘴子、南邑等村农会迅速恢复起来，还建立了乡级苏维埃政权，乡政权分别设有土地、军事、劳动、粮食、文化、青年、妇女等委员。

7月23日，李艮受陕西省委派遣，来到陕甘游击队任政委。他传达了陕西省委关于"彻底转变陕甘新苏区的机会主义领导，以创建陕甘新苏区与二十六军"的指示，已暴露出中共陕西省委"左"倾错误领导对陕甘游击队党委的严重不信任。李艮在正宁南邑连续召开六七天干部会议，批判所谓"机会主义领导"，指责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是"逃跑主义"、"上山路线"，空谈创建新苏区和二十六军问题，要求部队"停止游击战争"，"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限令20天内将五顷塬土地分配完毕；在队委会外又成立了一个秘密"队委会"，以向"反革命阴谋分子"作斗争。就在李艮整天泡在会议之中批判"机会主义领导"之时，敌人从容地完成了进攻游击队的部署。在敌发起进攻后，李艮又命令游击队硬攻和死守。8月13日，李艮命令陕甘游击队强攻王郎坡敌军据点，王郎坡是敌人进攻根据地的战术支点，易守

难攻。红军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死打硬拼，围攻两天未能取胜，部队伤亡60余人，16日撤出战斗，转移到三嘉塬一带待命。此后，李艮又命令红军进至五顷塬据守。李艮要求红军以阵地战保卫根据地，布阵待敌，坐阵挨打。但还没有来得及完成部署，就遭到尾追敌军的猛攻，部队仓促应战，伤亡30余人，阵地被敌军突破，部队又退到三嘉塬地区。8月19日早晨，敌人分兵三路，合击三嘉塬，红军奋力拼杀，巧借大雾突出重围。20日，部队转移到秦曲、狼牙洼一线。不料敌尾随而至，红军不得不继续转移到前马塬。21日，时值大雾弥漫，敌骑兵借大雾突入庄内，红军与敌展开巷战，短兵相接，战斗十分激烈，后分散突围，于24日转移到旬邑县马栏镇，陕甘游击队只剩下200余人。错误路线和错误指挥给陕甘游击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部队损失过半，寺村塬游击根据地陷落。

二、陕甘游击队丧失根据地后的艰苦历程

寺村塬根据地陷落后，李艮在万般无奈之下回省委汇报工作，陕西省委对李艮本人作了严肃处理，但仍然强调改造游击队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问题。为此，撤销了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重派谢子长回陕甘游击队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部队稍事休整后，进入耀县照金一带活动。9月上旬，国民党陇东绥靖司令部两个团从正宁、宁县早胜等地自西向东，敌八十四师一个团以同官为中心由东向西，陕西警卫团和陕西保安第一游击队由彬县、旬邑向北，富平、同官、耀县三县的民团向西，再次前来进剿，企图将陕甘游击队包围在耀县照金消灭。陕甘游击队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由杨柳坪向后山撤退，当敌军在照金扑空后，红军迅速回师，在北坟滩、柿坪等地大败敌军，生擒敌副总指挥党谢芳和耀县民团总指挥柴子发等300余人，缴枪400余支。不日，敌军又集结几个县的兵力反扑。红军为避敌锋芒，撤离照金。在离开照金时，刘志丹将特务队留下，交由两当兵变失败后回到照金进行革命活动的习仲勋领导，就地坚持游击斗争。

9月25日，陕甘游击队奔袭保安县城，再次失利，部队损失很大，第一大队队长高山保阵亡，第三大队队长高鹏飞、骑兵队长强龙光负伤。为避免战斗损失，以求短期休整，部队决定向富县方向撤退，准备经葫芦河转入南梁地区。后部队转移至南梁地区的平定川、豹子川一带，又遭敌高双成重兵袭击，部队再次受挫。

陕甘游击队几经辗转，于10月上旬进至陕西省保安县与甘肃省合水县交界的白沙川。这时，虽然暂时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但部队过冬所需粮食、服装供给面临严重困难。此时，谢子长在合水莲花寺主持召开了队委会会议，决定带领游击队进入子午岭的梢山地带，化整为零，分散游击，筹集军需，壮大力量。会后，刘志丹带领一个大队70余人，到合水的拓儿原一带活动；杨森、黄子文带领60余人到陕西三原武字区活动；阎红彦、杨仲远带领骑兵大队，到耀县、宜君一带游击，与中共陕西省委联系；谢子长带吴岱峰、高鹏飞等30多名老战士、伤病员，留在豹子川、平定川、瓦子川、墩儿梁一带，指挥各路红军游击队，与中共陕北特委联系，护理调养伤病员。

骑兵队在照金、三原等地兜了一大圈，既未寻到战机，没有同陕西省委取得联系，也未筹集到任何军需。阎红彦、杨仲远等召开了领导小组会议，决定北去秦陇古道。10月中旬，在耀县北老爷岭缴获与官府有勾结的巨贾商运50驮，筹集了许多现洋、衣物、药品。于是游击队迅速北返，进入合水县葫芦河。在谢子长等亲自护理下，高鹏飞、强龙光等大部分伤病员病情好转。谢子长又带领骑兵大队到安塞真武洞东、西营一带打土豪，缴获30多匹骡马，筹集了大批经费，还扩充了80多名骑兵。解决陕甘游击队自身给养困难的同时，谢子长还派高鹏飞、强龙光、冯金福等携带一大批现款，送交中共陕北特委和中央北方局，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后各部也陆续返回，全队集结于南梁二将川。经过几个月的分兵游击，发动群众打土豪，陕甘游击队筹集到大量粮款物资，部队恢复了战斗力。1932年12月上旬，各路游击队在合水县黑木头会合。12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再出桥山，南下渭北，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第四节 红二十六军的建立与照金苏区的开辟

一、红二十六军的诞生

早在1932年4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就明确指示："在积极开展当地的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的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区域的任务"①。并指出，为了实现这一任务，首先应该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队伍，编成经常的正式的红军，红军的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中共中央要求陕西省委"从自己的常委中选派一人去担任二十六军政委"②。根据中央的决议，6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陕西省委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工作的决议》，决定"成立红军一团"，"该部番号暂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独立团"。6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在讨论建立北方苏区问题时，专门研究陕西工作，确定立即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任命杜衡为红二十六军政委。8月25日，陕西省委又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决定在陕甘边建立红二十六军。

1932年12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南下到达陕西淳化县境内时，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开赴宜君休整待命，准备改编为红二十六军。随后，杜衡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代表的身份来到部队。12月19日，陕甘游击队转移到宜君县的杨家店子（今属旬邑）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2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3页。

集结。20日，杜衡召集陕甘游击队党员会议，宣布省委改编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决定。会上，杜衡指责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仲远等的正确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稍山主义"等等。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等同志的职务，并给谢子长留党察看三个月处分，给予阎红彦严重警告处分，强令谢子长、阎红彦到上海"受训"。杜衡还提出在改编中新任排级以上干部实行民主选举，候选人从战士和班长中产生，由政治委员任命。这一规定，实质上将陕甘游击队排以上干部集体撤职，把干部任免权抓在自己手中。

因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陕甘游击队由1500余人减少为200余人，无法实现中央有关组成一个师的要求，杜衡只好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12月22日，红二团召开党员和军人大会，推选班长王世泰为红二团团长。12月24日，在宜君转角镇（今属旬邑）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并举行改编授旗仪式。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王世泰任红二团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长，汪锋任团党委书记，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少年先锋队、政治保卫队，全军共200余人，有长短枪150余支。

对于杜衡的这些做法，广大指战员是有疑惑的。刘志丹、谢子长以高度的党性服从省委的决定，谢子长从党的利益和部队建设的实际出发，建议把刘志丹、杨仲远留下。刘志丹更是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修养，他心地坦荡，顾全大局，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积极协助团长王世泰做好工作。他鼓励王世泰说："边干边学嘛！你打了几年仗，总算是个老兵吧，我要不离开，会帮你的。"[①]帮助王世泰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并协助团长、参谋长指挥战斗。由于刘志丹工作出色，干部战士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

① 王世泰：《刘志丹与陕甘边根据地》，载《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10页。

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成立以后，肩负起了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重任。

二、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红二十六军诞生后，按照党中央关于在旬邑、正宁、三原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指示，确定在陕甘边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新苏区。部队在完成改编后，立即南下开赴照金地区。

照金位于陕西耀县、旬邑、淳化三县的交界，属耀县管辖。这里是子午岭的南端，山岳连绵纵横，地形崎岖不平，便于小规模红军开展游击战争。

照金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这里的群众大多是外来农民，生活十分贫困，他们不断进行抗捐、抗租和抗债斗争，有迫切的土地革命要求，有强烈的革命愿望。

照金又是红军的老游击区。1932 年夏，党组织派习仲勋到照金开展工作。同年 9 月，刘志丹在率陕甘游击队撤离照金时，曾将特务队留下来交给习仲勋领导，就地坚持游击活动，传播革命火种。

由于照金具有良好的条件，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成立以后立即投入了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2 月 27 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以声东击西的战术，首战焦家坪，全歼敌民团 60 余人，红军无一伤亡。焦家坪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为创建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战后，红二团经衣食村进至香山寺。该寺位于照金北部的笔架山，寺庙中储存有大量的粮食。红军占领香山寺后，没收了寺庙储藏的二三千石粮食，一部分赈济了灾民，一部分作为红军的给养。杜衡提出：香山寺距离照金只有 30 余里，是照金的要隘，在军事上占有重要位置，一旦被敌人占据，会对根据地造成极大地威胁，建议焚毁，大家没有表示异议。后又在万人饥民大会上征求意见，并举手通过焚寺的决定。当时，由红军具体负责烧寺，渭北游击队负责分粮。焚千年古寺，从军事角度讲，虽说对巩固根据地起到重要的作用，但从保护祖国文物来说，却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在此基础上，红二团广泛发动群众，组织贫农会和赤卫军，开辟了香山和九保两个游击区。接着，红二团又消灭了照金、旬邑民团各一部，使红色区域扩大到照金薛家寨地区。红军的影响日益深入人心，青壮年农民和灾民纷纷自愿参军，红二团扩建了步兵二连，吴岱峰任连长，高锦纯任指导员，全团迅速发展到300人，长短枪300余支。为了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军事干部，红二团正式成立随营学校。校长由李杰夫担任，汪锋任政委，学员30余人。

1933年1月中旬，红二团向西发展，协助地方党组织先后建立了旬邑、照金、香山、宜君、茅园等5支游击队。2月上旬，刘志丹率领红二团北上正宁，在三嘉塬、湫头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分财产，并在湫头塬与三嘉塬的交通要道石炭沟口设伏，全歼王郎坡民团，击毙敌团总赵世坤。3月下旬，红二团转入外线作战，攻克同官金锁关，打开了根据地工作的局面。

在主力红军的配合下，照金根据地的游击队武装也快速发展起来。3月，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后张秀山）任政委，统一领导各游击队。3月下旬，红二十六军直辖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辖渭北、泾阳、富平三支游击队，共300余人，后又在渭北组建了十多支游击队，初步形成了以红二团为主力、以地方游击队和赤卫军相配合的革命武装力量，为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党的建设也得到进一步加强。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兔儿梁正式成立，金理科（后为秦武山）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特委委员先后有李妙斋、周冬至、王满堂、张秀山，史克寿任青年团书记。特委成立后，领导照金人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发动群众支援红军。到4月底，以薛家寨为中心，东至沮河，西抵淳化塬畔，北至马栏川，南至爷台山，东西相距50余里，南北相距80余里的照金根据地初步形成，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又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后方基地。

在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斗争的基础上，4月初，在陕甘边特

委的领导下，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经过民主选举，再次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副主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下设经济、粮食、文化教育、内务、土地和肃反委员及赤卫军总指挥部等机构，工作机构驻薛家寨。中心任务是：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粮食、牛羊等，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青年团等群众团体，发动群众清除敌探奸细，颁布各种法令，开展戒烟、禁赌、宣传妇女放足等工作。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又在桃渠河、照金、老爷岭、马栏、七界石等地相继建立了区、乡、村革命委员会。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建设初具规模。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彻底摧毁了地主豪绅的统治势力，从经济上铲除了封建剥削制度，贫苦农民从此翻身做了主人，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正当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照金根据地人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之际，杜衡却继续顽固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给根据地的建设又带来了严重的危机。

当时红二十六军刚刚建立，力量弱小。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中间力量，壮大自己的队伍，刘志丹提出了“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①]的思想。据此，红军与一些民团建立了统战关系，中部县建庄何世兴民团，小石崖罗连城民团等，都与红军关系友好，他们或为红军掩护寄养伤员，或代购弹药物资等，对红军有一定的帮助。但身为党和红军领导人的杜衡，却不要统一战线，主张打倒一切，对白军、民团、土匪不加区别，一律消灭。1933 年 1 月，他命令红军攻打与红军有统战关系的庙湾夏玉山民团，结果战斗失利，部队受到很大伤亡，郑毅被撤销了参谋长职务，刘志丹继任参谋长。之后，夏玉山纠集附近民团，联合起来进攻照金苏区。1 月 27 日，红二团骑兵连遭夏玉山袭击，马匹损失过半。2 月 4 日，陕军骑兵团、特务团各

① 引自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载《人民日报》，1979 年 10 月 16 日。

一个营及夏玉山民团，三面包围红军苇园阵地，幸遇渭北游击队接应，红二团安全撤离后转入旬邑、正宁、宁县一带游击。红二团转战外线期间，照金根据地即被陕军占领，夏玉山民团在苏区进行疯狂报复，捕杀地方干部、伤病员和革命群众50余人。

4月下旬，国民党陕西当局调集4个团及旬邑、淳化、耀县、三原、同官、宜君等6个县的民团，分路进攻照金根据地。杜衡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的现实，提出"死守照金"的口号，结果连打败仗。这时，杜衡去省委汇报工作。杜衡离开后，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游击队在内线坚持斗争，红二团转入外线作战，粉碎敌人的"围剿"。此后，刘志丹率领红二团转入外线向西进击，在旬邑地区消灭了一些地方民团，后转兵北上，到宁县盘克塬一带开展游击活动。5月上旬，部队进入宜君地区休整，并与陕北一支队会合，加强了陕北一支队的力量。随后，红二团继续西进，到达宁县金村庙，消灭了一些民团，收编了国民党军一个连的兵变队伍，部队发展到近500人。6月17日，刘志丹、王世泰率领红二团完成外线作战任务，返回照金。

三、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如何扩大根据地，壮大红二十六军，在哪里建立根据地，成为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1933年6月17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团在照金苏区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边区工作和红二团行动计划。这时，杜衡也回到照金苏区，他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并提出4条理由：渭华地区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党的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人烟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配合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红二十九军，可以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西安等等[①]。实际上，陕南的红二十九军在1933年

① 王世泰：《刘志丹和陕甘边根据地》，载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革命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117页。

5月已经失败，红二十六军南下只会陷于孤军深入的险地。杜衡的南下方针遭到了刘志丹等人的坚决反对。刘志丹说："渭华暴动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①]但杜衡对刘志丹等人的意见横加指责，给他们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

6月21日，在杜衡的专断命令下，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被迫从北梁出发，离开照金南下。22日，红二团在三原二台子与渭北游击队会合。渭北游击队负责人再次对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提出异议，杜衡拒不接受意见，强令部队尽快南渡渭河。23日，杜衡借口有事要回陕西省委汇报，私自离开部队。杜衡离队后，汪锋代理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与刘志丹一道率领部队渡过渭河，越过陇海铁路，进至灞桥五里店，歼灭敌一个地主民团，击毁杨虎城军车10辆，缴获许多物资。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离开灞桥进入骊山。在刘志丹等的指挥下，红军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击溃了敌人的多次强攻，胜利突围，进入了秦岭箭峪口。后在蓝田县张家坪遭到强敌围攻，红军分三路冲出包围，刘志丹带领180余人，在焦家坪一带游击，汪锋带领80余人到蓝田活动，王世泰带领100余人向北转移。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汪锋带领的队伍被打散。王世泰带领的队伍，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战斗两月余。后在敌人加强围攻、红军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分散和化装突围。[②] 党在陕甘边地区历经千辛万苦创建起来的红二十六军，被杜衡的"左"倾错误断送了。刘志丹等人化装成货郎，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历尽艰险于1933年10月4日回到照金。幸存的红军官兵陆续分散返

① 引自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第一版，第229－230页。

回照金，开始了新的战斗。

四、陈家坡会议与照金革命根据地的陷落

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西北地区的革命形势陡然逆转。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福盛楼饭馆开会时，被敌人特务盯梢，杜衡等人被捕叛变。杜衡投敌后，出卖了知道的所有党组织和党员，使陕甘一带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和革命群众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杜衡还可耻地充当奸细，带领密探特务，冒充我地下工作人员，在西安大街上盯梢捕人，逮捕了前来西安汇报工作的陕甘边特委书记金理科及中央交通员冯鸣玉、省委技术科长刘政远等重要干部。新任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去西安寻找上级党组织，也遭敌逮捕。陕甘边特委与上级党组织及中央失去了联系。

1933年7月，陕西省委在获悉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消息后，在三原县武字区将地方红军武装渭北游击队扩大后编为红四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共120余人。红四团成立后，担负起主力红军部队的职责，转战三原、富平等地开展游击活动。国民党反动派调兵遣将，向渭北游击根据地发动进攻。在强敌围攻下，红四团为避免受损，撤离了渭北游击根据地，于8月初转移到照金苏区。渭北游击根据地遂告陷落。

7月21日，共产党员王泰吉率陕军骑兵团在耀县举行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下辖六个大队，共1200余人。耀县起义后，敌军调两个团兵力向起义军发动进攻。由于连战失利，加之不断发生叛逃事件，耀县起义失败，余部100余人在王泰吉率领下退入照金苏区，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此后，耀县三支队也转移至照金苏区。

红二十六军南下后，照金苏区陷于危急之境。陕西省委派高岗来照金开展恢复红二十六军的工作。此时，陕甘边党和根据地的干部对革命形势的认识出现了分歧。一种是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主

张"埋枪"搞秘密工作，把红四团带到渭北，分散游击，反对集中领导；另一种意见是继续坚持革命的主张。认为我们还有红军，根据地和红军也能够巩固和发展，因此，红军和游击队应集中领导，成立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扩大和创造陕甘边根据地。为了统一思想，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领导人习仲勋、秦武山等在耀县陈家坡主持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和正确分析形势，纠正了部分干部中产生的右倾悲观情绪和分散红军的错误主张。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和红军的任务等问题，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四团、耀县三支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陕北一支队及各路游击队，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

陈家坡会议是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陕甘边区党政军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决定组建陕甘红军主力部队，提出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红军，深入陕甘边地区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照金根据地的正确方针。陈家坡会议统一了党、政、军的认识，保证了党对陕甘边区革命事业的统一领导，是在西北革命斗争重要转折关头召开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为陕甘边区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思想路线和组织基础。陈家坡会议后，新组建的陕甘边红军主力在陕甘边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和临时总指挥部率领下，以崭新的阵容开展游击战争。

9月下旬，红军攻占旬邑县的张洪镇，缴枪200余支，并缴获大批物资。10月4日，刘志丹、王世泰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从终南山脱险后辗转归来，刘志丹被任命为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刘志丹总结了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教训，对习仲勋说："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习仲勋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刘志丹给予了较高评价："陈家坡会议总算纠正了错误观点，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

们重新干起来，前途就是光明的。”①

由于红军集中指挥，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使形势有了好转。10月12日，敌急调四个正规团和三原、耀县、淳化等六县民团共6000余人，发起了对照金根据地的进攻。刘志丹和陕甘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分析敌情，认为敌人“进剿”兵力较大，不宜在狭小根据地内与敌人周旋，要粉碎敌军的进攻，必须转入外线作战，深入敌后打击敌人，决定留下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主力红军北上陇东。

10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乘红军转入外线，后方兵力空虚之机，调集重兵进攻照金苏区的中心区薛家寨。陕甘边特委和红军领导人张秀山、吴岱峰、高锦纯、黄子文等率领留守薛家寨的照金红军游击队100余人同敌军展开了浴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无法挽救危局，薛家寨失陷。国民党军攻克薛家寨后，大肆抢劫破坏，对苏区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和野蛮洗劫。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土地委员王满堂、肃反委员王万亮和许多群众积极分子被敌人杀害，照金苏区陷落。

照金革命根据地虽然仅存在了6个多月时间，但它犹如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钢刀，直接威胁陕西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并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经验。它点燃了西北民主革命的火种，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① 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见《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64—65页。

第六章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第一节 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方针的确定

一、红军在庆阳的战斗与陕甘边区军事形势的扭转

1933年10月中旬，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照金苏区的"围剿"，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领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耀县三支队和陕北一支队等部队300余人北上陇东，转入外线，寻机歼敌。为了务求必胜，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首战奔袭合水。10月12日，部队由照金出发，沿子午岭北上，行程150多公里，15日到达合水县的黑木原。17日晚在夜幕掩护下，急行军进至合水城（今老城镇）东门下。当时，合水城内驻有西北军杨子恒部赵文治团1个连和民团近300人。红军以骑兵团一连和陕北游击队一支队担任主攻，王世泰为攻城总指挥。18日拂晓开始攻城，守军自睡梦中惊起，一半被俘虏，一半随县长康麟逃跑。合水县公安局局长李彦率部投诚。红军打开监狱，救出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长杨培盛，释放在押农民80余人。是役，红军大获全胜，共击毙、俘虏敌人200余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支，银元上万余。战斗结束后，总指挥部命令开仓分粮，赈济群众，并张贴标语，宣传革命道理，有不少俘虏参加了红军。

同时，对俘虏中民愤较大的豪绅杜家传、盐税局局长李德胜等予以处决，其余教育释放。当晚，部队宿营于包家寨子。合水老城战斗，是陕甘边主力红军攻克的一个重要县城，大涨了红军的志气。合水战斗后，红四团继续北上，在庆阳一带打游击。

红军攻克合水县城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急忙调遣重兵"追剿"红军主力。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采取疲敌战术，牵着国民党军兜圈子，选择有利地形予以消灭。10月19日红军主力离开合水，在宁县盘克塬与陕甘边特委后方机关及游击队会合后继续南下。10月21日在宜君县杨家店歼敌一个连。此后，刘志丹又毅然挥师北上，返回陇东。10月26日下午，红军主力部队在庆阳三十里铺消灭谭世麟部朱寿民团40余人，缴枪30余支，镇压了联保主任孙元俊，分兵捣毁三十里铺和华池柳树河天主教堂，活捉葡萄牙传教士薛神甫等2人。这时赵文治团由庆阳尾追而来，谭世麟部也从悦乐、元城方向堵截。10月27日，刘志丹等挥戈东进，跨越上里塬到达华池毛沟门。由于连续奔波作战，部队极为疲劳，刘志丹等决定在毛沟门作短暂休整。毛沟门是元城川支流辛家沟沟口的一个小村庄，村子里只有数十户人家，散居在沟畔和半山坡的窑洞里。红军到达后，分别驻扎在毛沟门附近各庄头。

10月28日拂晓，赵文治团800余人由毛沟门西辛家沟、南侧山岭两路袭来。担任警戒的红军战士发现敌骑兵后，迅速鸣枪报警。这时，刚刚起床的红军战士听到警报后，迅速集结。刘志丹、王泰吉命令耀县三支队占据毛沟门西玉皇庙岗阻击敌人，陕北一支队掩护群众转移，红军指挥部、红四团迅速占领河对面墩梁山有利地形。为了达到以少胜多，在反击中消灭敌人的目的，刘志丹和王泰吉决定将红军主力撤到北山，抢占制高点，控制了有利地形。上午9时，红军已全部撤至陈家峁，赵文治看到红军撤退，误以为红军是怯战动摇，即令部队拼命攻山，配以炮火向红军阵地猛烈轰击。下午4时，刘志丹、王泰吉下达反击命令，300多名战士犹如猛虎下山，一口气把敌压下沟底。在红军战士凌厉的攻势面前，敌溃不成军，狼狈而逃。这次

战斗，共毙俘敌200多名，缴枪200余支，弹药不计其数。赵文治团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团的建制。毛沟门战斗，是陕甘边红军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打出了红军的威风。

由于红军接连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群众的革命热情和斗争信心，也震撼了陕甘边界的国民党驻军和民团，迫使他们暂时采取守势以求自保，从而扭转了陕甘边区的军事形势，客观上为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二、包家寨会议

照金根据地失守后，陕甘边红军又面临无处立足的严重困难局面。在哪里建立根据地，一直是陕甘边区革命斗争中没有得到解决的根本问题。刘志丹一贯主张在桥山山脉中段陕甘交界的南梁地区建立根据地。照金根据地失陷后，刘志丹一面与王泰吉一起指挥反"围剿"斗争，一面再次认真地思考这个战略性决策问题。毛沟门战斗粉碎敌人"围剿"后，刘志丹认真总结三年来创建根据地的经验教训，及时建议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研究解决今后的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问题，总指挥部采纳了刘志丹的建议。

根据刘志丹的建议，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蒿嘴铺包家寨召开了联席会议。刘志丹、张秀山、高岗、王泰吉等党政军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以毛泽东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了照金根据地失败的教训。会议认为照金根据地失陷的教训是：第一，没有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和扩大以照金为中心区域的根据地；第二，照金离敌人统治中心太近，不宜建立根据地；第三，对建立根据地和发展红军力量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认真总结照金根据地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会议讨论了主力红军改编、根据地重建以及今后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作出了三项重大决策：

（一）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红

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把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三支队和红二团南下失败后归队的百余人与少年先锋队合编为红三团，把红四团逐步改为骑兵团，以适应长途奔袭、快速出击和步骑兵配合作战的需要。

（二）在陕甘边界桥山山脉中段的南梁地区建立中心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主力红军，建立红色政权，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三）划分三个游击战略区，组建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扩大根据地建设。

第一路游击区，以先前派出的强世卿领导的陕北游击队为基础逐步扩大。强世卿担任总指挥，魏武任政委，活动地区以安定县为中心，向周围发展，达到与南梁根据地相连接的目的。第二路游击区，以庆阳、合水、保安的三支游击队为基础发展壮大。杨琪任总指挥，开始没任命政委。活动地区以南梁为中心。任务是建立南梁根据地。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的游击队为基础发展壮大。总指挥先后为张明吾、王安民、陈国栋，政委张仲良。活动地区以照金为中心。三路游击区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并向南北发展，开辟和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包家寨会议作出的三项重大决策，其核心是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将陕甘边武装斗争重点转移到陇东南梁地区。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和红军认识到，在西北地区，由于敌强我弱，红军孤军奋战，要想保存革命力量，壮大红军，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就必须选择一个适当的地区作为红军活动的中心区域。包家寨会议根据刘志丹等的建议，决定将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放在南梁地区，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决定，因为南梁的地理环境和革命的主、客观条件都非常适合开展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建设。这里沟壑纵横，森林茂密，回旋余地大，便于红军的游击活动。南梁地区的群众深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南梁地处陕甘边境地

区，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薄弱地区。

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使刘志丹等红军领导人认识到，南梁中心区域的开辟，必须在广大区域的游击战争的配合下才能成功。为此，包家寨会议作出了建立陕北、关中、陇东三路游击区的策略方针，这样既可保证南梁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也使陕北、关中、陇东游击区的武装斗争在互相支援中发展壮大，从而达到扩大根据地，壮大主力红军的目的。毛泽东后来赞扬说，刘志丹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建立根据地，这很高明。①

包家寨会议是在陕甘边革命斗争危急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方略，是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军自觉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坚持从实际出发解决陕甘边区革命斗争实际问题的结果，它为陕甘边区后来革命斗争的发展和红色政权的建立指明了光明前景，是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由挫折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点。

第二节　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一、莲花寺整编

包家寨会议之后，刘志丹、王泰吉率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耀县三支队、陕北一支队等部队来到位于合水县葫芦河北岸的莲花寺。这里川道比较宽阔，两面山上灌木成林，十分隐蔽。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在莲花寺进行休整，并对部队进行整编。

1933年11月8日，在刘志丹、王泰吉的主持下，陕甘边红军全体军人大会在莲花寺召开。会上正式宣布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忠心耿耿　为党为国》，《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7页。

二师。师部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和直属警卫连。红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供给处主任刘约三[①]。下辖两个团，5个连，共500余人，战马200余匹。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耀县三支队和红四团少年先锋队合编为红三团，约280人，王世泰[②]任团长，李映南任政委，一连连长赵国卿，二连连长陈学鼎，少年先锋连连长王有福。由红四团一、二连编成骑兵团，约180人，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一连连长李志柏，二连连长高占胜。

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师、团成立了党委，师党委书记杨森，委员有高岗、张秀山、黄罗斌、黄子文、高锦纯等。连队成立了党支部，以加强党对基层组织工作的领导。刘志丹对建党工作非常重视，他经常以过去多次起义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为借鉴，要求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由于陕北一支队在安定一带打过游击，地形较熟，包家寨会议决定派队长强世卿、政委魏武率领一支队作为第一路游击区的基本部队，回到陕北开展游击战争。因此，莲花寺整编时，该部100余人未编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红四十二师还抽调魏武、惠泽仁、康健民等干部加强了陕北一支队的领导力量。莲花寺整编后，红四十二师在东华池为陕北一支队举行欢送大会。杨森代表红四十二师党委在会上讲话，他勉励陕北一支队回到陕北后，根据包家寨会议精神，以安定为中心，开展第一路游击区的活动，逐步向四周发展，以达到与南梁根据地连成一片的目的。陕北一支队政委魏武在会上表示坚决执行包家寨会议决议，发挥陕甘边红军的优良传统，开展游击战争，以实际行动配合红军主力在南梁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

---

① 据王世泰：《刘志丹和陕甘边根据地》记载，供给处主任王世泰，载《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127页。此处依据王世泰：《回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载《甘肃党史资料通讯》总第51期。

② 一说王泰吉兼红三团团长，此处依据王世泰：《回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载《甘肃党史资料通讯》总第51期。

莲花寺整编是陕甘边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它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整编了部队，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陕甘边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第二路游击指挥部及所属游击队的组建

莲花寺整编后，红四十二师立即兵分两路，扫荡陕甘边界的反动地主武装，以实现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东路由师部率红三团向东出击，进击咸榆公路，横扫沿线的地主武装。在甘泉县道佐铺一带消灭地主民团武装40余人，随后奔袭甘泉县城未克。部队转入洛河川，行至葡萄沟门时，遭到敌二五六旅一个营和地主民团武装200余人的联合进攻。刘志丹利用葡萄沟门庄子两侧的有利地形，命令红三团设伏待机，派一小部分部队佯装游击队，诱敌军进入埋伏圈。但敌军几次遭红军打击，进军慎重，行动缓慢。到了离村庄二三里的地方时，停止了前进，使红军的伏击计划未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下令撤出战斗，返回南梁。

西路由骑兵团向西北出击，经柔远川、二将川直捣南梁地区的敌军据点，沿途横扫反动武装。当时，张延芝匪部营长梁邦栋率陕西警备骑兵旅第二团新兵营在荔园堡、阎洼子一带为非作歹，随意派粮派款，敲诈勒索。南梁人民深受其害，无不切齿痛恨。骑兵团决定拔掉这个楔在南梁中心地区的反动据点。骑兵团秘密运动到荔园堡的东、西两山，包围了梁邦栋营。接着，红军派出小股部队化装成老百姓，秘密进入荔园堡，突然向梁邦栋营发动袭击，敌猝不及防，仓促迎战。这时，红军骑兵团疾驰而来，梁邦栋带领残部拼命向山上逃窜，山上的红军也发起攻击。在骑兵团的两面夹击下，敌军被围困在老鸦沟的半山腰中，突围无望，全部当了俘虏。

荔园堡战斗后，南梁地区的反动武装闻风而逃。骑兵团乘胜追击，在阎洼子、赵家沟一带肃清了地主民团，又全歼新堡民团。红四

十二师的这次行动，为建立南梁根据地扫清了障碍。

11月中旬，红三团、骑兵团会合南梁，驻扎在荔园堡至林锦庙一带。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决定，趁战斗间隙，配合地方干部开展工作。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协同地方干部分别在平定川、豹子川、太白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川一带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建立第二路游击队。同时决定在南梁一带建立后方留守处，把伤病员安置在平定川、豹子川一带治疗、休养。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游击战争的区域范围，红四十二师还抽出刘约三、吴岱峰等人员，带领伤病员及后方机关，来到平定川一带，一面照顾伤病员，一面着手组建游击队。在刘约三、吴岱峰等领导下，第二路游击区各地游击队纷纷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二路游击区先后建立了20多支游击队，比较有影响的有庆阳、合水、保安、安塞等4支游击队。

庆阳游击队，杨培盛任队长，习仲勋任政委[①]。这支队伍于1933年11月下旬在南梁小何沟成立，活动于华池县二将川、柔远川一带。到1934年夏，庆阳游击队发展到200多人，扩编为两个支队和一个骑兵队。一支队队长张志孝，二支队队长郜怀德，骑兵队队长马福吉。

合水游击队，张振东任队长，孙铭章任政委[②]。这支队伍于1933年11月下旬在南梁豹子川王街成立，活动于东华池、太白一带。到1934年夏，合水游击队发展到180余人，下辖三个中队，一中队队长朱虎虎，二中队队长赵生，三中队队长夏松柏。

保安游击队，刘约三任队长，王英任政委。这支队伍于1933年11月下旬在南梁成立，初建时只有10余人，在游击活动中，保安游击

① 据刘约三：《革命战争年代的回忆》记载庆阳游击队政委张志孝。此处依据《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庆阳地区组织史资料》。

② 据刘约三：《革命战争年代的回忆》和王世泰：《回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记载，合水游击队政委为孙帝国。此处依据《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庆阳地区组织史资料》。

队很快发展成一支100余人的地方红军武装。

安塞游击队，曹满栋任队长，王士贵任政委。这支队伍于1933年12月在南梁成立，刚组建时仅有七八人。此后，安塞游击队进入安塞境内活动，不久发展到50多人。

随着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南梁地区还陆续成立了庆北游击队、定边游击队、华池游击队、环县游击队、庆华游击队、柔远游击队等。这些游击队同主力红军互相呼应，互相支援，同时，又为主力红军输送了几百名战士，在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33年12月，红四十二师党委在林锦庙的梁沟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军事斗争的方针和南梁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会议决定，成立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杨琪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领导庆阳游击队、合水游击队、保安游击队、安塞游击队，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红四十二师主力南下支援关中第三路游击区的斗争，帮助建立第三路游击区的各游击队，成立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推动正宁、宁县、淳化、耀县、旬邑等地的游击活动。

1934年1月上旬，刘志丹、王泰吉率领红四十二师挥师南下，沿途取得了歼敌合水固城民团，正宁王郎坡民团、南邑堡民团等战斗的胜利。这时，王泰吉请求去豫陕边开展兵运工作，师党委经过慎重研究，同意了他的要求，并决定刘志丹接任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任政委。后王泰吉被时任淳化县第四区民团团总马云从出卖，遭敌逮捕，惨遭酷刑折磨，但威武不屈，1934年2月12日被敌杀害于西安。王泰吉的英勇就义，使陕甘边党和红军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指挥员，给陕甘边的武装斗争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三、第三路游击指挥部及所属陇东各游击队的组建

在开辟第二路游击区的同时，红四十二师南下第三路游击区，在正宁、旬邑、淳化一带发动群众，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和整编游击队，

扩大地方红军武装，使第三路游击区的革命形势又高涨起来。1934年2月，在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的帮助下，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正式成立，第一任总指挥张明吾，上任不久，被叛徒杀害，由王安民担任第二任总指挥，后在老爷岭战斗中，王安民英勇牺牲，总指挥由陈国栋接任，政委先后由黄子文、张仲良、张邦英担任。

第三路游击区主要地方武装有平子游击队、回民支队和宁县两支游击队。

平子游击队（又称正宁四支队），成立于1933年11月，何炳正任队长，殷云山任政委。有队员50余人，分为两个分队。至此，这支农民武装成为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1934年2月，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平子游击队发展到100余人，被改编为三路游击区第四支队，通常称为正宁四支队。不久，何炳正、殷云山调离，刘玉才继任队长，郭秉坤任政委。红二十六军组建第一团时，这支游击队被编为一团一连。

回民支队（又称回民游击队），成立于1933年秋季，王世平（回族）任队长，王世英（回族）任政委。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回民支队编为三路游击区第十六支队，又称"正宁十六支队"。回民游击队组建后与其他游击队协同作战，取得了许多辉煌战绩，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

宁县三支队，成立于1934年秋季，王德宽、鲁生治、卜凤鸣、杨兴才财先后任队长，李士新、刘永培、刘玉才先后任政委。1936年1月编入新宁独立营。

宁县一支队，组建于1934年冬，杨德民任队长，乔占才任政委。不久宁县一支队与宁县二支队合编，仍称宁县一支队。杨德民患病离队后，队长先后由张占荣[①]、樊登甲、王得胜、崔瑞山、王秉祥担任，乔占才任政委。宁县一支队后扩编为新宁独立营。

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又相继组建了正宁二支队、正宁三支队、

① 一说樊登奎。此处依据《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庆阳地区组织史资料》。

正宁五支队(队长张占英)、正宁八支队(队长刘富奎,政委赵德荣[①])、正宁十七支队、特务队、底庙游击队、耀县游击队、赤水游击队、鄜甘游击队、中宜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共计500余人。这些游击队在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的领导下,时而集中作战,时而分散活动,经历了多次艰苦的战斗,锻炼了部队,打击了敌人,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为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

这一时期,第一路游击区遭受了挫折。1933年11月15日,陕北一支队由陇东到达安定县境内。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11月20日,游击队仓促向驻守枣树坪的井岳秀部一个连发动攻击,经过激烈战斗,未克敌据点,部队伤亡很大。惠泽仁等牺牲,总指挥强世卿身负重伤,离队养伤,后被叛徒出卖,惨遭敌人杀害。陕北一支队由政委魏武率领向北转移,途中遭敌袭击,魏武不幸牺牲。为了摆脱困境,陕北一支队分两路继续北上至安定北部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但因给养困难,被迫分散活动。陕北一支队虽然未能实现预定的任务,但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影响,其中有不少革命骨干坚持战斗,为后来恢复陕北一支队,扩大陕北红军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红二十六军在庆阳的发展壮大

为了迅速开辟与发展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大力帮助发展地方游击队的过程中,又不断从地方游击队得到补充,使自身很快得到发展壮大。正规红军与地方武装互相支援、紧密配合、情同手足、共同发展。到1934年11月,红四十二师在原有两个团的基础上,又组建了红一团、红二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总兵力达1000余人。

红一团的组建。1934年9月,陕甘边特委和军委决定以三路游击指挥部所属的平子游击队、直属特务队为基础,并从宁县三支队、

① 即赵铁柱。

正宁五支队抽调部分人员，计200余人，组建红四十二师第一团，陈国栋任团长，张仲良任政委。开始编为两个连，第一连连长寇金财，指导员郭秉坤；第二连连长张治怀，指导员张嘉伯。红一团成立后，与宁县一支队配合，在宁县、正宁一带活动。瓦扇子战斗突围中，团长陈国栋负伤离队，政委张仲良也被调离，军委另派黄子文代团长，张文华任政委。经过一段发展，又新组建了一个骑兵连，后以正宁回民支队的大部为基础，编成第四连。红一团为巩固、发展和保卫陕甘边南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二团的组建。随着南梁根据地的创建，第二路游击队有了很大的发展。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决定以第二路游击队的保安、庆阳、合水、安塞游击队为基础，组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1934年10月10日，红二团在南梁阎家洼子成立，刘景范任团长，胡彦英任政委，孔令甫任副团长，王先荣任参谋长，朱奎任政治处主任。红二团下辖两个步兵连和一个少年先锋队，共计180余人。

郭宝珊起义与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河北南乐（今属河南）人，幼年随父逃荒来到陕西黄龙，在惯匪梁占奎手下当营长。在刘志丹等红军领导人教育影响下，郭宝珊表示愿意接受红军改编。1934年10月20日，郭宝珊在新堡正式宣布起义，率本营120余人来到南梁苏区，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任浪华任政委。西北抗日义勇军辖三个大队，一大队队长陶荣启，二大队队长王东来，三大队队长杨茂堂。直属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指挥。

1935年春，敌人对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大规模“围剿”，西北抗日义勇军转外线作战，参加了粉碎敌人“围剿”的黄大原战斗和六寸原战斗。后来，与红三团奉命北上陕北，在刘志丹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大小战斗十余次，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1933年11月中旬，红四十二师进入南梁地区，全面展开了创建

南梁根据地的斗争。位于陕甘边界子午岭中段的南梁地区有着武装割据的优越条件。首先，这里的农民深受地主和土匪的压迫，生活极端艰苦。同时，南梁一带兵匪成灾，主要有土匪赵老五、薛大牛、陶玉山、张廷芝、宋占彪、韩俊卿、徐老幺，加上当地民团头子谭世麟等达50多股。农民深受其害，有革命的要求。其次，南梁位于华池县、合水县和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富县边界的桥山山脉中段，这里沟壑纵横，地形复杂，森林茂密，交通不便，回旋余地大。以此为依托，进可直逼关中，畅制成榆大道，退可扼守山林，易守难攻，向东可进军陕北，向西可开辟陇东。独特的地理条件制约了国民党军队优势装备的发挥，是游击战争的理想场所。第三，南梁地区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一方面这里交通阻隔、消息闭塞，在由北洋军阀统治向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变迁过程中，新老军阀的政权更替造成了在一定时间内的权力"真空"；另一方面这里地域偏远、地广人稀，国民党当局在这一地区的行政和军事控制力相对薄弱。刘志丹决定利用当地暂时权力真空的时间因素和割据势力结合部的空间因素，积蓄革命力量，进行工农武装割据。

为了迅速打开根据地创建局面，红四十二师到达南梁之后，兵分两路，师部带领红三团向东活动，骑兵团向西活动。骑兵团在南梁周围积极展开军事活动，先在葛园堡、阎洼子、赵沟门一带肃清了小股敌人，后又全歼新堡民团与东路军会师于二将川，消灭了当地部分反动武装，拔掉了敌人一些据点，为建立南梁根据地创造了条件。红军在消灭了南梁及其周围一些民团武装后，积极开展地方建设。1933年冬，红四十二师党委派张策来南梁开展群众工作。1934年春节前夕，习仲勋也来到南梁。张策、习仲勋深入白马庙川、玉皇庙川、葛园堡川、小河沟等地的贫苦农民中，访贫问苦，热情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组织建立各种群众团体，并把伤病员安置在平定川、豹子川一带治疗和休养。地方工作有了很大的起色。

在张策、习仲勋等领导下，首先在金岔沟成立了第一个农民联合会，白阳珍任主任，贺二任副主任。接着又在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

川等村建立了农民联合会，把农民、手工业者、妇女组织起来。还在南梁、小河沟、荔园堡、豹子川、东华池建立了5个赤卫军大队，约1000人。南梁、小河沟、豹子川为第一大队，队长郑德明，辖三个中队；玉皇庙、马莲岔一带为第二大队，队长高生贵，辖三个中队；白马庙川为第三大队，队长朱志清；二将川为第四大队，队长为杨生贵；葫芦河为第五大队。赤卫军主要用梭镖、大刀、猎枪和少量步枪武装自己，承担站岗、放哨、送信、监视土豪恶霸、转移伤病员和保护群众的任务，巩固保卫南梁根据地。赤卫军在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和壮大根据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地还建立了贫农团、雇农工会、妇女会和儿童团等群众团体。这些群众组织的活动非常活跃，对根据地各项工作特别是支持革命战争、扩大红军和土地革命均起到很大作用。

1934年2月，红四十二师主力在刘志丹率领下，由第三路游击区返回南梁地区。这时陕甘边地区的群众武装广泛建立起来，地方游击队得到了迅速发展，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赤卫军三位一体的根据地武装力量。到1934年2月，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经过短短四个月的发展，已经扩大到包括保安、安塞、甘泉、鄜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宜君和中部等十几个县的部分地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为了统一领导陕甘边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巩固后方，支援游击战争，2月25日，陕甘边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恢复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会上选举习仲勋任革命委员会主席，白天章、贾生秀任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文化等委员会。张步清任土地委员长，张钦

贤[①]任劳动委员长，杨玉亭[②]任财政委员长，呼志录任粮食委员长，贾生秀任肃反委员长，边金山任军事委员长。同时成立了保卫队，郭锡山任队长，直属革命委员会领导，负责革命委员会的安全保卫工作。革命委员会的恢复和建立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

第三节　陕甘边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一、陕甘边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与西华池大捷

从1934年2月开始，国民党反动派部署了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敌军采取分片负责的划区"驻剿"和竭泽而渔的"进剿"、"堵剿"手段，对陕甘边红军实施反复"清剿"。这次"围剿"中，国民党调集8个团的正规军及各地方民团，总兵力达1万余人，兵分八路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心区梯次推进，以达到逐渐缩小红军主力的活动区域，限制红军的机动作战能力，压迫红军主力于南梁地区，迫使红军在狭小区域与其作战，进而全歼陕甘边红军的企图。

国民党"围剿"陕甘边根据地的部队构成是：第一路，驻守耀县的干部团；第二路，驻守耀县小丘的孙友仁特务团；第三路，驻守正宁的国民党甘肃警备第二旅一个团；第四路，驻守庆阳的甘肃警备第二旅一个团；第五路，驻守旬邑的何高侯团；第六路，驻守合水的甘肃警备第二旅一个团；第七路，驻守洛川的冯钦哉部一个团；第八路，驻守保

① 郭刘力贵、张光编著：《人民英雄刘志丹》记载，劳动委员朱永清，三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② 郭刘力贵、张光编著：《人民英雄刘志丹》记载，财政委员武生秀，三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安的高双城部一个团。各地民团武装配合敌正规军的进攻行动。"围剿"的具体部署是：以驻守庆阳、合水一线的甘肃警备第二旅的两个团配以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分兵"进剿"；以驻守耀县、旬邑、洛川、正宁、保安等地的六个团陈兵堵截。敌人妄图实现其在中宜一带截击红军不能东进，封锁洛河一带阻止红军不能北退，南面大军压境使红军不能交锋，西部重兵扼守使红军不能突围，最后逼迫红军与其在南梁地区决战，达到聚而歼之目的。

当时陕甘边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总共不过1300多人，而且武器装备极差，敌我力量悬殊。刘志丹针对敌人平分兵力和战线过长的弱点，决定集中主力红军，跳出外线，寻找战机，粉碎敌军"围剿"。在军事部署上，以第二路游击队一部坚持在南梁中心区内线开展斗争，第三路游击队各部牵制和袭击南线敌军，使其不敢冒进；以红四十二师主力红三团、骑兵团和第二路游击队的一部跳出外线，采取机动灵活、声东击西、避敌主力、击其疲弱、各个击破的战术，积小胜为大胜，最后彻底粉碎敌军的"围剿"。

2月上旬，刘志丹率四十二师主力红三团、骑兵团500余人由南梁秘密出发，经宁县、正宁南下，突然出现在照金以北地区。敌军误以为红军主力南进，慌忙调集南线"进剿"部队沿旬邑、耀县、淳化一带截击，防止红军南下关中。红军当即转首向北，挥师同官、宜君方向的咸榆公路作战，在姚渠歼敌一个排，在石板歼敌民团一部，在五里镇歼敌一个连。不待敌人查明动向，红军又转兵西北，涉过沮水，在店头歼敌民团一个排。此后，红军经槐村庄、张村驿、黑水寺，过太白镇回到南梁根据地东华池一带，作短暂休整。3月下旬，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主力和庆阳、合水两支游击队再次出击外线作战。红军主力由南梁北上，渡过洛河，扬言要向安塞、安定进军，虚张声势。当部队行至保安刘家砭，距保安尚有40公里时，突然调兵向西，经过小蒜川，奔袭阎家砭，出其不意，歼灭了陕西警备骑兵旅张廷芝部的一个连。接着一举围歼了该部驻中河岔的一个营，又在崖窑歼敌一个辎重连，取得了歼敌4个连及民团一部的胜利。红军还攻取了张廷

芝部的一个兵工厂，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修造枪炮的机器，而且有几名修械工人自愿参加红军，为后来开办南梁兵工厂打下了基础。当晚红军封锁向西的交通要道，隐蔽作战意图。翌日，红军主力继续西进，长途奔袭庆阳县元城镇，抓获元城川大豪绅、国民党庆阳县第四区区长高明山，歼灭元城民团30余人，包围了谭世麟老巢元城，然后迅速南下，在赵梁子打垮了谭世麟的儿子谭振武率领的骑兵连。

在这一阶段反"围剿"作战中，陕甘边红军主力南下照金，东出宜君，北上保安，西进庆阳，迂回外线，转战千里，歼灭敌陕军第四十二师、陕西警备骑兵旅、甘肃警备二旅及民团各一部，达到了调动敌人，迷惑敌人的目的，为红军以后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战机。

红军在赵梁子取得歼敌一个骑兵连的胜利后，谭世麟向敌甘肃警备二旅驻合水的王子义团求援，王子义立刻令其团副率两个营及一个机炮连赶往元城增援。当敌军赶到元城一带时，红军经五蛟、悦乐、城壕川进至合水县赵家原，摆出攻打合水的架势。合水敌军见红军主力兵临城下，连忙命令抵达元城的部队星夜兼程向合水回援。没等敌人赶回合水县城，红军于4月2日早晨，转兵合水南原，中午抵达西华池。敌军两次扑空，不顾疲备，紧追红军不放。

王子义团是1932年秋天红军歼灭敌赵文治团之后，新来换防的正规步兵团。他们骄横自负，不可一世，大有把红军一口吞掉的架势。在驰援合水时，王子义欺骗部下说："红军都是土匪，身上有银元和大烟土，但是没有钢枪，尽是些大刀长矛，抓住后拿绳子一捆就行了。"因此，敌人骑兵的马鞍后都带着一捆绳子，叫嚣要捆红军。

就在敌人气势汹汹扑向合水县城之时，刘志丹却指挥红军离开赵家塬，于4月2日中午突然攻占合水县重镇西华池。恼羞成怒的敌人赶了四五十公里来到合水县城，又人不离鞍、马不停蹄地掉头向西华池追来。西华池是个古老的城镇，当时只有二三百户人家。城墙前有外壕，外壕前面是开阔地，地形对红军展开火力十分有利，刘志丹便决定在此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下午3时许，红军干部正在开会，突然接到二路游击队侦察员报

告说，发现敌一个团的正规军正在赶来。刘志丹冷静分析，敌军有两个营和一个团部直属机炮连共7个连，约600余人，红军也有骑兵、步兵7个连，约500人，加上第二路游击队的武装，敌我兵力大体相等，敌军虽然武器装备好，战斗力强，但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疲劳不堪，战斗力已大大减弱。红军士气高昂，取得胜利有较大把握，另外，西华池处于东西两侧临沟的南北狭长平原地段，中间夹着破旧的小城，地形对红军步兵骑兵协同作战十分有利。据此，刘志丹决定在西华池歼灭这股敌军。他当机立断，命令干部返回部队指挥作战。刘志丹登上西华池的城墙，看见敌军在一里以外，以两路纵队的行军队形向红军猛扑而来，当即命令红三团从正面狙击敌人，骑兵团从侧后投入战斗。王世泰指挥部队集合，命令红三团第一、二连隐蔽在北门外的一条横沟渠下待命，先锋连防守北城墙，掩护第一、二连的冲锋。

骄横的敌人在进至距红军阵地三四百米时，散开队形攻击前进。进入伏击圈后，红军突然开火，打得敌人慌乱后退。一连一排排长李守成见敌后撤，忙率全排战士向敌展开追击。敌人困兽犹斗，顽强抵抗，李守成阵亡。敌人气焰更加嚣张，狂呼乱叫着反冲过来。王世泰急令三团战士集中火力射击，把敌人压了下去。顽固的敌人，以为红军人少，武器不如他们，接着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这时，骑兵团在刘志丹的指挥下，已迂回到敌后，切断了敌人的退路，直捣敌人的临时指挥部和机炮连。

在红军的前后夹击下，敌人溃不成军。这时，二路游击队也在杨琪指挥下，从东沟畔包抄过来，将逃散的敌人又赶了回来。在北城墙上担任守城任务的先锋连战士，也奋不顾身，跳下城来，冲向逃敌。在红军的合围打击下，敌人无力抵抗，大部分缴械投降，少数逃到西沟畔后，又被张秀山带领的一队骑兵堵住，进退无路，只好当了俘虏。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除敌团副带领十几人侥幸逃脱外，其余全部被红军歼灭或俘虏。这次战斗，红军共毙伤敌200多人，俘虏约500人，缴获步枪600余支，八二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骡马50余匹，炮弹数十箱。红军只伤亡四五人。

西华池战斗是陕甘边红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这次战斗打出了红军的军威，是红四十二师成立以来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对于粉碎敌人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战斗结束后，刘志丹率领红军主力回到南梁革命根据地，部队驻扎在东华池一带进行休整补充。

二、高凤坡战斗与南梁中心区的艰苦斗争

经过短暂的休整，刘志丹、杨森又率领红军主力部队，再次南下关中，支援第三路游击区的反“围剿”斗争。5月10日，杨森率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在淳化县三里原，将敌陕西保安团两个连紧紧包围，敌盘踞村落负隅顽抗。骑兵团经过激烈拼杀，全歼敌军180余人。从战斗缴获的敌军机密文件中，刘志丹掌握了敌军新的“围剿”计划：以甘肃警备第二旅仇良民的一个团和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为主攻部队，由庆阳、合水一带向南梁根据地中心区域长驱直入；冯钦哉部一个营配以几百名地方民团武装由鄜县黑水寺一带向太白围堵；敌井岳秀部驻延安、保安的一个团从东、北两线进行战略配合，进击南梁，妄图一举将南梁中心区的红色政权摧毁。同时，为对付活动在照金地区的红军主力，增调马弘章骑兵团由南向北“追剿”红军，李贵清部在正宁山河一线负责堵击，何高侯部一个营和民团武装数百人在淳化、土桥一线负责堵击，冯钦哉部的两个营在杨家店、转角镇一线拦截，敌人企图切断第三路游击区与南梁中心区的联系，堵死红军回师通道，将红军主力围歼于照金地区。

面对新的敌情，红四十二师党委在照金召开会议，研究反“围剿”行动方针。鉴于红军主力在第三路游击区处境险恶，师党委和刘志丹决定：红军主力迅速北上，跳出合击圈，回师南梁根据地，争取战场主动权。会后，立即进行了紧张的动员和部署。

5月中旬，红军四十二师主力离开第三路游击区北返。红军由耀县照金一带出发，经香山河、油房沟，准备从马栏一带跳出敌人的合

围圈。但部队在行军途中，经侦察得知沿马栏至刘家店一线都有敌重兵严密封锁。刘志丹当即召开干部会议，重新研究行军路线，决定以红三团为前卫，骑兵团为后卫，连夜急行军，天亮前赶到正宁五顷塬，绕道跳出敌军的包围圈。

次日早晨，红军到达五顷塬下面的峴子。不料，敌马弘章的骑兵团突然尾追而至，同红军后卫部队骑兵团展开混战。团长王世泰即带红三团一个连在五顷塬西侧山峁上阻击敌人，其余部队继续突围。红三团阻击部队撤退后，红三团先锋连奉命在五顷塬西侧高凤坡阻击敌军，掩护主力突围。先锋连在众寡悬殊的形势下，打得十分顽强，阻止了敌军的攻势，保证了主力部队的安全转移。红军主力转移至雕翎关时，又遇敌冯钦哉部一个营及200余民团的堵截，部队奋勇冲杀，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

高凤坡战斗，红军主力冲破了敌军的合围圈，赢得了反"围剿"斗争第二阶段的战场主动权，粉碎了敌军在照金地区消灭红军主力的企图。但是，战斗中红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部队牺牲30余人，另有20余名红军战士受伤被俘后，宁死不屈，被凶残的敌军拉到正宁县山河镇的老爷庙内活埋。战后，当地群众怀着悲痛的心情将牺牲的红军战士安葬在五顷塬高凤坡上。地方党组织和当地人民还到五顷塬一带的梢林中四处寻找负伤后分散隐蔽的红军战士，待其伤口治愈后送回部队。1934年6月，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以寻找到的高凤坡战斗中失散的正宁三嘉籍10余名红军战士为骨干，建立了第五支队，习惯上称"正宁五支队"。1935年，该部编入新正独立二营。

因高凤坡战斗红军损失较大，刘志丹、杨森立即改变了回师南梁的计划，决定红三团、骑兵团兵分两路转移外线作战。与此同时，陕甘边特委和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南梁根据地的游击队、赤卫军立即动员群众坚壁清野，进山隐蔽，相机袭扰敌人。

三、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与陕甘边根据地的巩固

在主力红军转至外线后，甘肃警备第二旅仇良民部和谭世麟的

陇东民团军1000余人于1934年5月上旬进入南梁中心区。仇良民和谭世麟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国民党反动军队还在马背上驮着铡刀，到处搜捕和杀害南梁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及革命群众。5月13日晚，敌军将李青山、张侯福、曹思聪等36名红军游击队员、苏维埃政府干部和革命群众拉到阎洼子台地里活埋。穷凶恶极的仇良民、谭世麟匪军，还用铡刀将共产党员、南梁地区第一个农民联合会——金岔沟农民联合会主席白阳珍等6名乡村干部杀害。

5月20日，仇良民、谭世麟匪军窜进保安县芦子沟。刘志丹的父亲和妻子因及时转移脱险，但敌人杀害了刘志丹的其他亲属数十人，烧毁了其房屋，还掘开了刘家祖坟，焚骨扬灰，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

在这期间，转移至外线的两路红军主力部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纵横驰骋，连战告捷。红三团在刘志丹、王世泰率领下，从正宁五顷塬向合水太白镇转移途中，于合水县和尚塬与敌冯钦哉部骑兵团一个营及鄜县民团激战终日，将敌击溃。然后，红三团北上转战洛河川。6月20日，在保安县马子川，刘志丹、王世泰率领红三团给井岳秀部的精锐部队高玉亭营和金鼎山民团以沉重打击。当时，刘志丹带领的红三团只有三个连200余人，而高玉亭营则是井岳秀的精锐部队，加上民团兵力达700余人，战斗一开始，高玉亭命令其"敢死队"抢占制高点，企图切断红军的退路。红军先发制人，夺取了制高点，连续5次击退敌军的集团冲锋，二连和先锋连在团长王世泰的率领下，以机枪为掩护，向敌人发起冲锋，将"敢死队"歼灭大半，其他敌人退回保安。此战红军歼敌4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

接着，刘志丹、王世泰率红三团挥师南下，挺进大凤川，连夜与甘肃警备第二旅窜犯南梁根据地的一个营展开白刃搏斗，歼敌大半。此时，红军骑兵团在杨森、高锦纯、赵国卿的率领下，在进入中部小石崖休整之后，配合第三路游击队各部东出咸(阳)榆(林)大道，截获敌军汽车一辆，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此后，骑兵团又转战延长、临镇一带，在交道塬取得歼敌一个连的胜利。

在主力红军的支援下，各路地方红军游击队也主动出击，接连获得重大胜利。庆阳游击队袭入保安柳村洼，直捣敌张廷芝部的后方；保安游击队连续袭击吴旗镇、宋家砭、金鼎山、王家桥等敌军据点，重创和消灭大批敌人；合水游击队继两次袭入合水县城之后，又在宁县盘克塬、合水固城川连续伏击敌军骑兵，歼敌100余人。

至此，陕甘边红军和游击队、赤卫队经过大小30多次战斗，歼敌3000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在中心区域，以南梁为中心，东起蔡家沟，西至五蛟堡，南到固城川，北抵吴旗镇，方圆200多平方公里内的敌据点都先后被拔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包括淳化、耀县、中部、宜君、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鄜县、甘泉等18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

反"围剿"斗争胜利后，陕甘边红军抓住有利战机，向敌人发起了新的攻势，捷报频传。1934年11月15日，刘志丹、习仲勋获悉敌环县县政府在曲子新城集中5个区的反动民团整训，决心拔掉这个隐患。他们命令骑兵团从南梁出发，到达悦乐附近与庆阳游击队汇合。当时，骑兵团三个连有200余人，庆阳游击队60余人，两部会合，共有步、骑兵战士300余人。当晚，骑兵团和游击队干部在悦乐镇召开军事会议，制定具体作战方案，会后部队连夜行军。途中消灭了庆阳孙家湾民团。按照预定方案，骑兵团一连一排作为先头部队，提前到达曲子新城，他们将马匹隐藏后化装进城。16日拂晓，红军骑兵团和庆阳游击队到达曲子，立即向敌发起猛攻，敌民团和保安队遭到突然袭击后，顿时乱作一团，稍作抵抗就四散逃命。环县民团团总李恒泰被红军堵在群众家中活捉，保安队长崇敬义率20余人逃到曲子北台，也被红军包围活捉。整个战斗仅用了半个小时就胜利结束。此次战斗，红军击毙国民党区长朱文成，俘敌近百人。缴获战马十几匹，长短枪60余支，子弹及其他物资一批，红军无一伤亡。国民党环县县长化装脱逃。

战斗结束后，红军在曲子新城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审并处决了李

恒泰、崇敬义等反动分子3人，并将一部分缴获的粮食和衣物分给了当地贫苦农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红军骑兵团和庆阳游击队在完成预定任务后，于当天晚上撤离曲子新城，回到南梁根据地。

接着，红军主力又发起了拔除反动据点五蛟堡和刘坪堡的战斗。五蛟堡和刘坪堡是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在庆北苏区边沿上的最后两个反动据点，经常对庆北苏区群众敲诈勒索，派粮派款，枉杀无辜，奸淫妇女，干尽了坏事，庆北苏区人民深受其害。11月29日，红二团、红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庆阳游击队，包围了盘踞在五蛟堡和刘坪堡据点的谭世麟匪军。在红军的强大攻势下，两个据点的敌军弃寨而逃。

1935年1月，在获得敌长武县城兵力空虚的情报后，红四十二师决定化装奇袭长武。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率领骑兵团从南梁根据地出发，强行通过敌军三道封锁线后向长武县城发起猛烈进攻，敌守城自卫团100余人被歼。泾川县城守敌闻风弃城而逃。杨森率领骑兵团乘胜消灭了瑞店等据点的反动民团，胜利返回南梁根据地。

红军闪击长武和奔袭曲子新城的影响极大，各地的报纸都作了报道。这些报道，使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及时了解到陕甘边红军及根据地的消息。这几次战斗起了沟通中央红军与陕甘边红军联系的作用。

在西线作战取得一系列胜利后，陕甘边红军主力又转锋向东，对陕北延安、安塞一带的敌军发起猛烈攻势。1935年2月上旬，杨森率领红四十二师骑兵团挺进陕北。2月12日，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在延安高桥川口，向井岳秀部一个营及民团发动突然袭击，歼敌100余人。

这次反“围剿”斗争是对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的第一次严峻考验。广大军民不仅经受住了这次考验，而且在斗争中壮大了红军，建立了革命政权，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七章　党在陕甘边区的发展壮大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第一节　党在陕甘边区的发展壮大

一、南梁根据地基层党组织的发展

陕甘边区党政组织在领导主力红军反"围剿"斗争的同时，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基层政权，积极有效地开展党的基层组织建设。1932年春，刘志丹派共产党员黄德明到葫芦河一带宣传革命，筹建农会、赤卫队，发展党组织。6月，正式成立石马坪农会和葫芦河赤卫队。黄克秀任农会会长和赤卫队队长。1933年3月，在红二十六军和黄德明的具体帮助下，葫芦河赤卫队扩建为东华池赤卫军大队，黄克秀任大队长。同年6月，由黄德明单线发展黄克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月，发展共产党员15名，于合水县龚家沟门罗家洼小学正式建立了葫芦河党支部，黄克秀任支部书记。同年冬，刘志丹在连家砭老城发展党员4名。葫芦河党支部辖赤卫军大队、葫芦河、枣剩砭、安子坪、连家砭5个党小组，由黄克秀（兼）、雷步胜、何长汉、万进学、潘应乾分别担任党小组长。1933年冬，张策、习仲勋先后来到南梁，动员发动群众，培养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白马庙党支部，张志德任支部书记。1934年5月，张秀山、惠子俊、强家珍、马仰西等开辟了庆北根据地后，帮助建立了庆北游击队，赵向魁任队长，任有升任指导员，先后成立了农民联合会和庆北办事处，发展党员40

多名，在杜家河、武家河、城壕建立了3个党支部。这些基层党组织的建立，在巩固根据地和动员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照金苏区失守后，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赴西安寻找陕西省委恢复关系未果，其他委员分散活动，红四十二师党委代行陕甘边区特委职权，统一领导陕甘边红军和地方党的工作。随着苏区日益发展壮大，为了加强和改善党对苏区工作的领导，确保红四十二师党委集中精力加强军队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1934年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恢复中共陕甘边特区委员会，张秀山任书记，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等工作机构。同时，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陕甘边苏区的革命武装力量，刘志丹任军委主席，王世泰等12人为军委委员。会议还决定杨森接任红四十二师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兼任参谋长。会后不久，又增补张邦英为特委组织部长，张静元为特委宣传部长。继张秀山之后，惠子俊任特委书记。这次会议对健全和加强陕甘边区党的领导，推动根据地政权建设和革命武装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阎洼子会议

1934年7月28日，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和陕北军政主要负责人在南梁附近的阎洼子召开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张秀山、杨森、龚逢春、郭洪涛、贺晋年、高岗、张邦英、张策、王世泰及红二十六军连以上干部和陕北游击队支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主要内容：总结陕甘边根据地和红四十二师革命斗争工作；传达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北方代表的两封信；研究商讨陕甘边、陕北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

会议由谢子长主持。会上，杨森代表红二十六军党委汇报了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扩大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情况。谢子长对杨森代表陕甘边党和红军所作的关于党政军建设的汇报以及今后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建议表示赞同。

谢子长以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信中对红二十六军的战略转移进行了莫须有的批评，指责红二十六军领导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错误。

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郭洪涛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批评红二十六军不能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把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南下失败，说成是刘志丹"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在无端指责面前，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杨森等陕甘边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严肃认真地总结了陕甘边区的工作，坚持了以南梁为中心逐步扩大根据地的正确方针。

这次会议决定：(一)由谢子长率领红二十六军主力第三团去陕北，与陕北游击队配合作战，共同粉碎敌人对陕北游击区的第一次"围剿"，并调拨100支步枪和数百块银元支援陕北游击战争；(二)撤销高岗的红四十二师政委职务，由谢子长接任。

阎洼子会议是陕甘边和陕北党和红军领导人联合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深入讨论分析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斗争形势，第一次使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游击区确立了互相配合和协调作战的正确方针，从而加强了陕甘边和陕北军事斗争的联系。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是重要的，会议所形成决定是正确的。但是，会议对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的无端指责是错误的。会上，刘志丹等人顶着压力，抵制了"左"倾错误的干扰，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保证了陕甘边党和红军及根据地建设的顺利开展。

阎洼子会议结束后，陕甘边特委进行了组织上的调整，决定由工人出身的惠子俊担任特委书记，张秀山任庆阳游击队政委。

三、《七月决议》

1934年7月下旬，中共陕甘边特委部分领导人刘志丹、张秀山、

高岗、杨森、习仲勋、张邦英等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会议，讨论和制定党的工作计划，制定并发布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亦称《七月决议》。

《七月决议》强调把党的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在党的思想建设上，决议针对"党的政治工作不够深入"、"一切工作远远落后于客观形势后面"的状况，强调加强思想建党，成立特委训练班和部队短期训练班，培养干部，指示领导方法；在党的组织建设上，决议强调党要加强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健全完善各级党组织，发展党员，使党真正成为群众的核心。为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决议强调提拔得力干部担任区委书记，并吸收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的贫雇农积极分子入党；在党的作风建设上，强调领导必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建议，做好群众的工作，尤其是做好妇女同志的工作，鼓励广大妇女参加洗衣队、慰劳队、缝衣队，更好地为红军服务，不断密切党群关系。

《七月决议》强调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目标任务是："创造中心苏区、转变临时政权"，"务必于十月革命纪念日成立正式苏维埃政权"。强调在抓好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建设的同时，要积极创造条件，转变临时政权，于十月革命纪念日正式成立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并强调要加强党对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发展农联会、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组织；要创造南梁中心苏区，恢复照金苏区，打通陕北苏区。并在巩固老苏区的同时，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创造新苏区的任务。

《七月决议》对部队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加强军事训练和发展工作。首先，把扩大红军作为部队建设的中心工作。责成第二路游击队和第三路游击队于两个月内各完成扩大一个团红军的任务，建议红四十二师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扩大一个师红军的任务，将红四十二师扩大为一个军。其次，决议重申扩大部队的关键是巩固部队。同时，决议还要求各级党组织抽调部分同志打入敌人内部，组织革命兵变，瓦解敌人，壮大自己。再次，决议强调要组织群众，广泛

开展游击战争。决议特别强调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组织要想方设法购置武器，开展对敌斗争，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

《七月决议》强调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是陕甘边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要求除了分配苏区的土地以外，必须向四周去开展，在各游击队区域内，群众斗争高涨的地方，立即开始分配土地。

《七月决议》提出了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的原则和方法，还对开展游击战争、群众工作、肃清右派等问题作了规定。

《七月决议》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组织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解决陕甘边区实际问题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它初步提出了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入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七月决议》不仅明确了陕甘边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奋斗目标、主要任务，也对推动陕甘边根据地加快发展作出了正确部署。《七月决议》标志着以刘志丹为核心的陕甘边党和红军领导干部在思想政治上的成熟，标志着陕甘边根据地建党建政建军工作的进一步成熟。1941 年，《七月决议》作为党的重要文件被收入到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一书中。

第二节　陕甘边区党和红军支援陕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一、陕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艰苦局面

在陕甘边红军的配合和支援下，陕北游击战争快速发展起来。1933 年 7 月 23 日，陕北特委在佳县高祁家洼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

定：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组建工农红军，巩固扩大陕北第一支队和延安、延川、安定、清涧等根据地；在清、绥地区组建第二支队，在神府地区组建第三支队；其他地区也要创造条件，尽快地组建游击队和根据地。

1934年1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谢子长回到陕北，任中央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协助陕北特委加强对游击队的领导，恢复了陕北一支队，扩大了二、三支队。2月3日，郭洪涛、李铁轮等领导吴堡县抗日义勇军举行暴动，成立了陕北第四支队，活动于绥米佳吴边地区。3月18日，陕北第五支队在绥德成立，活动于绥德东南和吴堡南区。当时，陕北游击战争遍布11个县，逐渐形成了安清、绥米佳吴和神府三个小块游击根据地。1934年5月，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向陕北各游击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敌人以连、排为单位，进入各游击区进行烧杀抢劫和破坏村庄活动。为粉碎敌军的"围剿"，7月8日，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阳道卯正式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下辖第一、二、五支队。一支队，谢绍安任队长；二支队，白雪山任队长，张毅忱任政委；五支队，崔正冉任队长，马万里任政委，王子文任副队长。全军共300余人。7月17日，在谢子长指挥下，陕北红军游击队一、二、五支队攻克安定县城，打开监狱，救出了被捕的党员和群众。这次战斗的胜利，鼓舞了陕北人民的革命斗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为了扑灭陕北的革命烈火，国民党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配合地方民团加紧对陕北游击区进行"围剿"。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仅凭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力量无法粉碎敌军的进攻。7月25日，谢子长率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来到南梁，与红四十二师共同协调粉碎敌人"围剿"的行动。阎洼子会议结束后，谢子长率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和红四十二师第三团返回陕北，8月15日，到达安定西区。这时敌人的"围剿"已经开始，总兵力约万余人。

敌人的作战部署是：北线，第八十六师二五八旅刘润明部"围剿"神府区，其主要兵力部署在神木东南沙峁、盘塘、万镇一线，其目的在

于隔断神府与佳米之间的联系。南线为敌之主攻方向，由高双成二五六旅和二五八旅各一部，追随大量豪绅武装，沿大理河、无定河，在青阳岔、石湾、双湖峪、绥德、薛家峁、清涧一线，对安绥清地区构成一个马蹄形包围圈。在战术上采取分散配置，以连排为单位驻点，逐村蚕食，逐块推进，向中心压缩。在兵力使用上，以班排为单位出击，又分为"驻剿"、"追剿"两个蚕食方式。其"驻剿"部队企图以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手，摧毁红军的群众基础。其"追剿"部队主要是捕剿苏区武装力量。敌人的主要进攻目标是苏区中心区域安定地区。在这一主要作战地区上，敌人又选了两个突击方向：一是由绥德沿淮宁河大道经田庄西进安定东区，一是由石湾沿大理河支流川道，向安定西区窜犯。敌军这一部署，是"撒豆战术"。井岳秀把他的全部兵力像"撒豆"一样，散开于广大地区的数百个城镇据点。这样便形成敌人的致命弱点：兵力分散，且无后备力量。针对敌军这一部署，谢子长确定了集中使用兵力对敌之分散配置的反"围剿"对策。在攻击方向上，决定消灭由田庄、石湾向苏区腹地推进的两路敌军，并向绥德方向佯动，威胁敌人的军事重地。

二、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在陕北的作战

8月17日，红军集中红三团，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全部，突然包围了由石湾方向进至安定县金武塌的敌军两个连，担任主攻的红三团奋勇冲杀，一举将该敌全歼，缴枪近百支，首战告捷。金武塌获捷后，红军挥戈东进，向白区深入，经南沟岔、老君殿，向绥德地区接近。当红军进至薛家峁一线时，敌人立即派兵拦截，红军与敌战于张家圪台，痛歼敌军两个排。歼敌40多人，并击溃增援之敌一个连。张家圪台一战，牵一发动全局。绥德是此次"围剿"敌军的大本营，田庄、薛家峁则是绥德的两扇大门。红军向薛家峁地区接近，恰是刺向敌人心脏的一枪。在敌情不利的情势下，谢子长率军转锋南下，直取清涧县河口镇。8月26日的河口镇战斗中，红军击溃敌军一个连，

拔除了这个对根据地威胁很大的据点。不幸的是，战斗中谢子长身负重伤。河口战斗后，红军挥师北上，在横山的董家寺击溃敌军一个营。红三团到陕北战场后，四战四捷，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推动了陕北根据地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反"围剿"胜利后，红三团掩护谢子长到安定、延川根据地养伤。9月中旬，红三团凯旋回到南梁。

在红二十六军的有力支援下，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取得重大胜利，陕北的革命形势也随之迅速发展，游击队发展到20余支，1000余人，赤卫军达2000余人。1934年8月28日，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惠塬里召开会议，决定建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9月18日，第一支队和第八支队在安塞会合，编为陕北红军独立师第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马佩勋，参谋长路文昌，全团共200余人。由此，陕北的第一支正规红军诞生了。

为了配合和支援陕北红军游击队的斗争，10月初，杨森、王世泰、黄罗斌等再次率领红四十二师第三团转战陕北。10月5日，红三团与陕北九支队一道，在清涧县折家坪全歼敌军一个连。10月10日，红三团与陕北红军独立一团协同作战，击溃敌军驻安定县长蛇湾的一个连，歼其大半。随后，红三团与独立一团挺进安定县玉家湾，敌高双城部一个炮兵营闻风而逃，红三团返回南梁根据地。

在红二十六军的有力支援下，陕北红军队伍不断壮大。1934年9月18日，陕北三支队在神木王家庄改编为陕北独立师第三团，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漠，参谋长刘鸿飞，辖3个步兵连，200余人。红三团成立后，井岳秀视这支红军为眼中钉，以八十六师为主力，连续进行了多次"围剿"。红三团在成立不到3年的时间里，就进行了5次反"围剿"的战斗。11月4日，陕北二支队在大冯家山改编为陕北独立师第二团，团长郭育仁，政委马万里，参谋长惠世良，全团共300余人。1934年11月中旬，陕甘边特委派杨琪到陕北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巡视员，协助开展陕北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经过陕北军民的英勇战斗，逐渐使被敌分割的苏区连成一片。

1935年1月25日，在安定县白庙岔召开了陕北苏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苏维埃政府，马明方任主席，霍维德、崔田民任副主席。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1935年1月30日，陕北红军独立师在安定县白庙岔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朱子修任参谋长，下辖第一、二、三团。

红二十六军北上陕北，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密切配合，协调作战，使国民党反动派陷于被动，处于固守据点的境地。西北人民革命斗争的烈火则在更大更广的区域内猛烈地燃烧起来。

第三节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扩大

一、庆北苏区的开辟

庆北，指原庆阳县北部今华池县中西部的温台、悦乐、城壕、柔远等地。1934年以后，党在庆北地区逐渐打开了局面。1934年2月，张秀山率游击队在华池柔远一带发动群众，揭露土豪劣绅勾结民团欺压群众的罪行，宣传革命道理，先后在柔远、杜家河、武家河、城壕川一带成立了3个农民联合会和10余个农民联合会小组。6月，在杜家河召开群众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庆北办事处。办事处下设土地、劳动、经济、肃反、文化等委员会，马仰西任办事处秘书长兼文化委员长，主持办事处的日常工作。办事处兼有党政二重职能，机关先后驻温台田家河、定汉龙门庄。不久，庆北办事处改为庆北县苏维埃政府筹备处，边金山任主席。庆北办事处成立后，领导庆阳以北今华池县中、西部地区的广大人民，组织赤卫军、贫农团、雇农工会等群众组织，建立了许多农民联合会，庆北苏区开始形成。庆北苏区东与南梁中心区相接，成为南梁中心苏区西部的重要屏障。1934年12月，

在庆北办事处主持下，在柳湾沟柏树掌村正式成立了庆北县苏维埃政府，强家珍任主席，高世清任副主席，县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肃反、文化委员会，政府秘书长马仰西，办公地点在龙门庄。庆北县苏维埃政府下辖田家河、柔远、城壕三个区。1935 年 4 月，国民党军向陕甘边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庆北县失陷，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到陕西甘泉洛河川一带，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1935 年 10 月，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后，庆北办事处再次成立，李培福任主任。办事处开始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随着情况的变化和工作的需要随时转移，先后由杏泥沟转移到杨寺岔和麻子崾峴。1936 年初，又转移到了刘家沟刘懋功家里。这时候机构逐步健全，设立了粮食部、财政部、肃反部等，还办了一个干部训练班，培训了一些干部。庆北办事处成立后，一面开展游击战争，成立了庆北游击队，李培福兼任总指挥，很快由最初成立的 12 人发展到 200 余人。一面恢复苏维埃政权，相继恢复了柔远、温台、城壕、悦乐等区政府和群众组织。1935 年 11 月，陕甘省委成立后，为了恢复老苏区，提出"以华池为中心，向陇东发展"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省委派原庆北苏区创始人马仰西为巡视员，到华池战区指导工作，并加强同庆北的联系。1936 年春庆北办事处遭袭后，与华池战区合并成立庆华县。不久陕甘省委决定撤销庆华县，仍恢复华池县，马仰西任县委书记，高生荣任苏维埃政府主席，下辖白马、林镇、柔远、温台、城壕 5 个区政府。

庆北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庆阳县北部地区建立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它的创建，拓宽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范围，在陇东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南区党委和南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根据《七月决议》关于恢复陕甘边南区红色政权的要求，第三路游击区大力发展革命武装力量，扩建和新建了二支队、三支队、正宁

四支队、八支队、正宁五支队、十七支队、回民支队、特务队、宁县一支队等游击部队，共达1000余人。各游击队打击地主豪绅，为民除害，如剪除长乐原的恶霸任茂祥，月明原的劣绅李自来、马五娃等，这些活动对于发动群众，恢复和巩固南区红色政权起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第三路游击区游击队武装迅速壮大，1934年9月，陕甘边特委和军委决定，以正宁四支队、特务队为基础，并从宁县三支队、正宁五支队抽调部分人员，在正宁湫头组成红一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红一团组建后，配合第三路游击区各游击队进行了一系列战斗，消灭了大量的地方民团反动武装，相继以湫头、照金、小石崖为中心，在正宁、宁县、淳化、耀县、中部、宜君、同官等县的一部分地区建立了红色政权，使南区的革命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由此，陕甘边南区革命根据地在更广大的区域发展起来。1934年11月，陕甘边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在中部县的小石崖同时成立，陕甘边特委派组织部部长张邦英任南区党委书记兼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黄子文任革命委员会主席。随着形势的发展，1935年7月，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移驻正宁县三嘉塬，后又移至正宁南邑，唐洪澄继任南区党委书记，张邦英任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南区革命根据地南与渭北游击区相呼应，北与南梁中心区相连，它所辖的赤水、淳耀、永红等县的红色政权是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陇东红色政权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新正县党组织建设。1934年2月，张仲良带领第三路游击队到湫头孟家河一带，开辟革命根据地，着手湫头地区党组织的筹建工作。不久，受中共陕西省委的派遣和指示，中共早期党员、渭南中学教师杜宛和杜林治、李尚勤等3人来到正宁五顷塬开展革命活动。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培养教育，先后发展郭廷藩、郭存信、左怀玉、郭自发4人为正宁地区首批中共党员。7月下旬，成立了正宁县第一个党小组。10月，陕甘边南区党委成立，加快了党组织建设，湫头地区又发展了李进荣等15人为中共党员，并在南邑西头村成立了正宁县第一个党支部，郭存信任党支部书记，秦善秀为组织委员，郭廷藩为统

战委员。第一个党支部成立后，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先后又在南邑、湫头、龙嘴子、孟家河、巩家斜、西城秦家店、西沟、石家湾子、三嘉、上官庄等地发展党员70多名。1935年7月，建立了三个区委：一区湫头，书记李四娃；二区三嘉，书记路俊德；三区长舌头（现属陕西旬邑），书记张树壮。8月，在湫头峴子村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新正县委员会，卢永财任书记，李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赵澄璧任宣传部长兼县委秘书，郭廷藩任统战部长，田德发任妇女部长。在县委领导下，不久又成立了三个区委，四区湫坡头（现属陕西旬邑），书记李树荣；五区长乐，书记秦天绪；六区底庙（现属陕西旬邑），书记赵清保。1935年下半年，新正县委又在山河镇秘密发展屈则声、阎春风、李文玉等5人为中共党员，并成立了山河城关地下党支部，屈则声任党支部书记，受中共新正县委统战部领导。

永红县党组织建设。1935年11月，在正宁县下南坡头西村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永红县委，赵红军任书记，赵清宝任副书记。1936年初，因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永红县委工作人员转入地下斗争，永红县委解散。

新宁县党组织建设。1933年秋开始，平子游击队、宁县三支队陆续发展了一批党员，到1935年初成立了党支部，有党员10多人，卜凤鸣任支部书记。这是王孝锡建立的中共邠宁支部被破坏后中国共产党在宁县恢复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随着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宁县党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1935年10月，在九峴南嘴子栗文述家，由李德录主持，成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米世英任党支部书记。关中特委成立后，派焦怀兴到宁县帮助筹建县委，建党工作进展很快，先后在西坡、贾邑川、寺沟洼（现均属正宁县）、九龙川、九峴原、平道川、金村原等地发展党员40多人，建立起7个支部。1935年11月，在杨家原子召开了党员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中共新宁县委，焦怀兴任县委书记，李德录任组织部长，王秉祥任宣传部长（后与李德录调换）。

第四节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和县区苏维埃政权建设

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1934年秋，根据《七月决议》关于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转变为正式的工农民主政府的精神，陕甘边特委着手筹备召开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刘志丹为大会起草了政治决议案和军事决议案，蔡子伟等起草了土地、财政、粮食等决议案及其他文件。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是：雇农5人选一名代表，贫农10人选一名代表，中农20人选一名代表，地主、富农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种选举方法体现了很强的阶级性，保证了贫雇农在工农民主政权中的政治和组织优势。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于1934年11月1日在南梁葛园堡召开，到会的工农兵代表100多人。在历时7天的会议期间，代表们认真讨论了根据地政权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会上，刘志丹、习仲勋、蔡子伟等向代表们介绍了全国革命斗争及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介绍了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的基本情况，总结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政工作的经验，并分别作了关于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的报告和讲话。大会一致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会议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决定正式成立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并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成员。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任副主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

委员会。李生华任土地委员长，张钦贤任劳动委员长，杨玉亭任财政委员长，呼志禄任粮食委员长，郝文明任肃反委员长，惠子俊任工农监察委员长，蔡子伟任文化委员长，张文华任政府秘书长。会上还选举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赤卫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朱志清任赤卫军总指挥，郑德明、梅生贵任副总指挥，梅生贵兼任参谋长。在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队的基础上，还组建了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郭锡山任大队长，宋飞任副大队长，辖三个中队，共100余人。

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荔园堡隆重召开，参加大会的除正式代表外，还有南梁地区的群众、红军、游击队员、赤卫军共计3000余人。主席台悬挂"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巨幅红色会标，整个会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呈现出一派节日的热烈景象。会上，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同志和各界代表先后讲话。刘志丹郑重地向习仲勋颁发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大印。大会之后，在荔园堡马洼子台上举行了阅兵仪式，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全副武装，接受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的检阅。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是陕甘边区党和红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指导陕甘边革命斗争实践中取得的最伟大成果之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最早的正式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西北地区根据地建设和政权建设取得的最重要成就，它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创造了必要条件，在中国革命政权建设史上有着独特的、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二、庆阳各县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各县的革命委员会或办事处等临时红色政权相继转变为苏维埃政府。当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管

辖着近20个县的部分地区的红色政权，其中在陇东的县级红色政权的情况是：

（一）华池县苏维埃政府。1934年11月7日，华池县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河沟门宣告成立，贾生秀任主席，李彦任副主席，下设土地、劳动、财粮、肃反、青年等委员会。华池县苏维埃政府管辖着四个区：一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高生荣，管辖小河沟、豹子川、东华池、林锦庙一带；二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崔生荣，管辖玉皇庙、郭峁畔一带；三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白登贵，管辖荔园堡、河沟门、白马庙川、白沟门、郭峁湾一带；四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边海旺，管辖二将川、刘坪一带。1935年9月，华池县改为华池战区，原来的4个区合并为白马、林镇两个区。1936年春庆北办事处与华池战区合并成立庆华县。不久，陕甘省委决定撤销庆华县，仍恢复华池县，辖白马、林镇、温台、柔远、城壕5个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高生荣。

（二）庆北县苏维埃政府。1934年12月，庆北县苏维埃政府在柳湾沟柏树掌村正式成立，强家珍任主席，高世清任副主席，县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委员会（委员长李培福），劳动委员会（委员长党生喜），财政委员会（委员长高登州），肃反委员会（委员长朱培福），文化委员会（委员长马仰西），政府秘书长马仰西（兼），县政府所在地为龙门庄。庆北县苏维埃政府下辖三个区：一区苏维埃政府（又称田河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培福；二区苏维埃政府（又称柔远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天孝；三区苏维埃政府（又称城壕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兴仁。1935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向陕甘边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庆北县失陷，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到陕西甘泉洛河川一带，苏维埃政府许多工作人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同年秋，在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后，庆北办事处再次成立，李培福、李树林先后任办事处主任，恢复了柔远、温台、城壕三个区，并逐步向五蛟、元城方向发展。1936年春，庆北办事处与华池战区合并成立庆华县，庆北县撤销。

（三）庆北县革命委员会。1935年春，受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

席习仲勋委派，王英等人在吴旗县三道川以南，华池县元城以北的地区成立了赤卫军、贫农团等群众组织，并建立了临时红色政权——庆北县革命委员会。这个临时的红色政权大约存在了3个月左右时间，它和庆北县苏维埃政府之间是并列关系。

（四）合水县革命委员会。合水县太白镇一带属南梁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1934年11月中旬，在连家砭老城成立了太白区苏维埃政府，潘应乾任主席，高清荣任副主席。1935年2月，在太白镇成立了合水县革命委员会，李彦任主席。同年4月，因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合水县革命委员会转移至陕西甘泉洛河川一带，太白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转入地下斗争。9月，合水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李彦在错误"肃反"中被杀害，合水县革命委员会和太白区苏维埃政府均解散。

（五）新正县苏维埃政府。正宁县南塬一带是陕甘边红军最早开辟的游击根据地，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1934年7月，五顷塬乡革命委员会成立，郭自发任主席，何正兴任副主席。同年冬，南邑、湫头、巩家斜、西城、西沟、石家湾子以及龙嘴子回民乡的临时革命政权相继成立。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湫头、三嘉、长舌头三个区的临时红色政权。1935年春，成立了新正办事处，郭廷藩任主席，封振宝、杜宛协助工作，机关驻地先在槐树沟，后迁至两顷塬。新正办事处下辖湫头、三嘉、阳坡头（今属陕西）三个区革命委员会。三嘉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唐世英，机关驻南庄子村；湫头区革命委员会，主席赵思廉，机关驻湫头镇。

1935年8月，陕甘边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决定在正宁、旬邑、彬县接壤地区重新设立新正县。在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张邦英的主持下，新正县在湫头镇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新正县革命委员会[①]，郭廷藩任主席，左怀玉、李进荣为副主席，下设财政部（部长高仰月）、粮食部（部长高学智）、军事部（部长张占英）、土地部（部长张

① 一说为正旬彬革命委员会。

崇林)、劳动部(部长左怀玉)、文教部(部长张化民)、公安部(部长张有本)等七个工作机构,不久又成立了湫坡头、长乐、底庙三个区革命委员会,加上原来的湫头、三嘉、阳坡头三个区革命委员会,共辖六个区革命委员会,新正县革命委员会机关驻湫头镇。同年10月,新正县革命委员会正式转变为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任职未有变动。全县辖6个区,人口3.7万。

(六)新宁县苏维埃政府。1934年秋,陕甘边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在黄陵县小石崖成立。11月,在子午岭的上畛子成立了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宁县办事处,南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刘永培兼任宁县办事处主任,李尚勤任副主任,机关先驻九峴,后驻金村。1935年11月,新宁县在杨家塬子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新宁县苏维埃政府,杨有鹏任主席,胡金玉任副主席,下设粮食部(部长王立元)、财政部(部长杨万恒)、保卫部(部长王清殿)、教育部(部长屈纪军)、军事部(部长谭得智)、土地委员会(主任胡金玉)等工作机构。新宁县苏维埃政府先后驻杨园子、左家川、石鼓、下齐家等地。县苏维埃政府下辖一区苏维埃政府(又称九峴区),主席张荣德,副主席张恩元,机关先后驻马洼、南嘴子和月牛坡等地;二区苏维埃政府(又称金村区),主席杨玉山,机关先后驻金村、武洛等地;三区苏维埃政府(又称湘乐区),主席朱正元,机关先后驻巴原、石鼓等地,管辖4个乡苏维埃政府;平子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永康,机关驻平子镇。新宁县政府成立后,荏掌办事处归属新宁县领导,在荏掌、宋家庄一带建立的乡政权归属第二区。新宁县所辖区域东至芦宝梁、西至石鼓的黑庄子、南至西坡、北到盘克的罗候堡,共有人口3万多。

(七)荏掌办事处。1935年春,受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派遣,共产党人王占奎、吕兴财、许兴堂等来到宁县盘克塬的荏掌、潘村、罗候、武洛一带开始革命活动,秘密成立了宁县荏掌办事处,许兴堂任主任,王占奎、吕兴财任委员。荏掌办事处在合水游击队黄克秀部的帮助下,组建了游击队,队长张生才,指导员郭秀宁,并建立了农民联合会和赤卫军等群众组织。荏掌办事处管辖范围主要是盘

克、茬掌、罗候、武洛一带，至1935年冬，茬掌办事处与新宁县苏维埃政府取得组织联系。

（八）永红县苏维埃政府。为巩固和扩大陕甘边南区革命根据地，南区革命委员会派赵红军在正宁的下南坡头、旬邑底庙一带秘密串联，发动群众，建立基层红色政权组织。在此基础上，于1935年11月，在正宁县下南坡头西村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永红县苏维埃政府，选举梁文汉为苏维埃县政府主席，李银清为副主席。永红县苏维埃政府管辖南坡头、罗沟圈、郭村、榆家庄、寺村、店子河、底庙、房家塬、牛家坡等十几个村庄。不久，因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永红县苏维埃政府人员转入地下斗争，永红县政权解散。

第五节 "十大政策"的实施与根据地建设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了推动边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支援前线，巩固与扩大革命根据地，提出并施行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即土地政策、财经粮食政策、军事政策、对民团政策、对土匪政策、各种社会政策、肃反政策、对知识分子政策、对白军俘虏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等。

一、开展土地革命斗争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主要的经济政策。1931年中共中央提出的《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大会土地法草案》规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被没收的旧土地所有者，不得有任何分配土地的权限。雇农，苦力，劳动农民，均不分男女，同

样有分配土地权限。老弱残废以及孤寡不能自己劳动，而又没有家属可依靠的人，应由苏维埃政府实行社会救济，或分配土地后另行处理。"[①]1933年3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中要求："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祠堂庙宇及反革命富农的土地，将土地平均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地主绝对不能在任何名义的掩盖之下分得土地。富农只有在他自己耕种的条件下，分得一份劳动土地。土地应按人口与劳动力的标准来分配。在分配土地时，不仅要考虑雇农和贫农的利益，而且要顾虑中农的利益。只有在基本农民愿意和帮助之下，才能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一切农民过去的欠债与租税应立即废除。"[②]按照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指示，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就已经开展了以打土豪、分浮财、废除地主债权为内容的土地革命斗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边区政府发动根据地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以分配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斗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按照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和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决议案》精神，并结合陕甘边地区的具体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法令，这些政策、法令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没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二)分川地不分山地；(三)中心地区分土地，边境地区则不分，边境区因苏区扩大而变成中心区时，仍进行分土地；(四)田、苗一齐分，农民最需要的是苗，若分田不分苗就会降低农民的情绪；(五)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没有牛羊或少地少牛羊的雇农、贫农和中农；(六)阶级划分是依该户的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及其剥削与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的；(七)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八)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九)根据地的边缘地区不分土地，等到边缘地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1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82页。

区发展成为中心区域时再分土地。

为了使上述政策得到充分贯彻执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各县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会，认真履行土地革命法令、政策，组织、发动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分配工作由土地委员会领导，最初担任土地委员长的是张步清，由于他家境比较富裕，对土地革命不热心，刘志丹建议由贫农出身的李生华担任土地委员长，苏区的土地分配才得以展开。南梁中心区域的分配土地工作是从1934年春开始的，先后在华池县及庆北县的柔远、温台、城壕三个区进行了分配土地工作，像玉皇庙川、白马庙川、二将川、白沙川、豹子川等几道大川的分配土地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地富分子威风扫地，人民群众扬眉吐气。在土地斗争中，首先由土地委员会调查掌握和没收地主的全部财产，然后再定成分，进行分配。在分配时，首先照顾雇农和佃农，然后再按成分给其他缺地的农户分配。山地是采取拨块的分配方法，要多少就给分多少。对其他财产的分配，也是先照顾雇农佃农。给地主什么也没有分，组织他们进行"打生产"。给红军战士和家属优先分给一份土地，在给白军中当兵的暂时不分地，但留有公地，待他们回来后再分。1935年春，由于农户增多，又采取抽多补少的办法进行二次分地。

整个苏区分配土地工作是从1935年秋季全面展开的，中心是解决土地的所有制问题。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也进行了土地分配工作。新正县、宁县土地分配的具体做法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先行试办，在新正县南岭村开始，取得经验后，转到了一区三乡。随后又分成3个组，在三乡、八乡（回民乡）和宁县进行。分配的办法是，对地主的土地没收，富农的余额土地征收。征收的标准是平地5亩以上，山坡地10亩以上，远避山地20亩至30亩以上。清查了农户人口及田地总亩数，踏勘了土地的远近肥瘦，在原耕地的基础上，核定土地和人口应分的亩数，讨论通过后宣布，确定分得田地的所有权，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在不巩固地区，只是宣布政策，暂不土改。由

于方法对头，土改运动进行的比较顺利。截至1935年底，陕甘边苏区各县实行土改后，方圆五六百里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农民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陕甘边区分配土地工作历时两年之久。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了《陕甘苏区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划分阶级的标准，规定了豪绅、地主兼商人、游民无产者（习惯上叫做流氓），宗教职业者，红军战士中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分子，土地革命前去当白军团丁的分子及其家属，逃跑的群众、反革命分子等特殊问题的处理办法，领导广大群众正确地开展了土地革命斗争。1936年，依据农户经济状况，按雇农、贫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划分了阶级成分。

通过土地革命，极大地激发了陕甘边区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热情，获得土地的贫苦农民，积极从事生产，粮食产量有了增加，农民的生活也有了改善，进入根据地的农户也多起来。如南梁葛园堡一带原来只有农户5户，后逐渐增加到20余户，大都是根据地建立以后迁来的。[①] 这些都说明根据地分配土地的政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陕甘边区的土地革命，消灭了千百年来存在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为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奠定了可靠的群众基础。

二、发展根据地经济

在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的基础上，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依照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精神，制定了商业、金融、贸易、财政、粮食等方面的法令和政策，其内容是：

① 刘凤阁、任恩公主编《红二十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426页。

成立集市，发展贸易，保护小商贩，允许和鼓励白区小商贩来苏区做生意。发行边区货币，建立苏区金融体系。繁荣苏区经济，改善边区人民群众生活，解决红军的供给。

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保障军粮供应，保证人民生活。苏区政府的财粮主要取之于豪绅、地主，或在市场购买。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备，对农民不征粮。争取"二流子"[①]参加生产。

对红军家属、残废人员、孤寡者等实行救济。建立牧场，喂养猪羊，减轻人民负担。

为了繁荣农村经济，发展根据地的生产，满足群众的生活需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减轻农民负担，扶持农民发展生产。主要是不向农民征粮，派款，使其休养生息。党政军的开支，主要靠"打土豪"解决。在土地分配中适当留出一部分土地作为"红军公田"，由村苏维埃政府经营。其收获一部分用于优抚红军的家属和烈属，一部分用于帮助过往的红军游击队零散人员。政府办了一些小牧场，把打土豪没收的牛羊适当留出一部分，组织专人集中放养。耕牛用于为贫苦农民耕田，羊只主要供作军用。组织互助合作社，集资支持农民发展生产。兴办荔园堡互助合作社时，南梁苏维埃政府号召机关、部队捐款支持，红三团一次捐款50多元。党政军人员全部实行供给制，从边区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红军战士，经济待遇一律平等。通过这些措施，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十分注重商业贸易工作，在荔园堡设立了集市，确定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日为集日，为当地农民提供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市场。每逢集日，荔园堡周围数十里的群众纷纷前去赶集，买卖猪羊、牲畜、家具、山货、布匹、粮食、小吃及其他生活用品，生意兴隆。习仲勋、蔡子伟等政府领导经常到集市了解情况，鼓励群众发展生产，活跃经济。对从白区来的商贩，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也

① "二流子"指那些游手好闲、骗钱害人、装神弄鬼、不务正业的人。

采取了争取、欢迎和保护的政策，并采取各种办法，同白区比较开明的商人建立合作关系。为了鼓励白区商贩到苏区做生意，在习仲勋的指示下，苏维埃政府将苏区的山货和羊畜廉价卖给白区的商贩，使他们有利可图，又通过白区的商贩把苏区缺少的布匹和其他物资想办法运进来。一些商人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逐渐同情革命，千方百计给苏区输进货物。为了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商贩们或者昼伏夜出，或者买通敌人的稽查关卡人员，疏通了白区与苏区的物资流通渠道。红白区间的经济交流日益活跃，根据地的生产也得到较快发展。

为确保苏区经济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在南梁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苏币，群众称其为"苏票"。制币厂设在南梁的油坊沟，只有三名工人，完全靠手工刻版，印在布上后又刷上桐油。布币的票面精致，美观耐用，币值分为一角、二角、五角和一元四种。起初，有部分群众对使用"苏票"交易有疑虑。边区银行的工作人员每逢荔园堡集日，就背上银元去赶集，与部分对"苏票"有顾虑的群众进行兑换，一元布币兑换一块银元，边区的布币逐渐在人民群众中建立起良好信誉。

三、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十分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政策，主要内容包括：

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即红校），培养干部；兴办列宁小学，提高根据地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文化水平。颁布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广泛地向根据地人民宣传禁烟、禁赌、放足的好处。信任政治上可靠的知识分子，分配适当工作，并注意予以培养。

当时，南梁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南梁地区没有一所学校。边区政府成立以后，习仲勋、蔡子伟等发动群众办学校，首先在荔园堡的转嘴子办起了第一所列宁小学。霍建德、张景文（女）任

教员，在校学生六七十名，校舍是没收地主的一所房子，教学条件十分简陋。师生们自力更生，架木板当课桌，垒土台当凳子，用石板当黑板，扫锅黑当墨汁。教材是自编的油印或手抄本。文化委员长蔡子伟自己动手为学生编写课本。这些教材通俗易懂，完全是新的革命内容，多采用顺口溜的形式，朗朗上口，好学易记，既是文化课，又是思想教育课。以后，苏维埃政府又在太白、荔园堡等地陆续办起了几所列宁小学。

苏维埃政府还十分重视成人的文化教育，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成人扫盲识字班。同时，广泛开展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的活动，建立了禁烟、禁赌、放足委员会，发布了相应的法规，并制定了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反对封建迷信等条例，开展了以"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脚、劝男子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影响群众，引导群众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为了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广大干部和人民，陕甘边特委创办了党内刊物《布尔塞维克》作为特委机关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创办了不定期的刊物《红色西北》。这两个油印小报，对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起了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

随着南梁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武装斗争的深入发展，部队和地方政权迫切需要大批党政军骨干。1934 年 10 月，陕甘边特委在南梁创办了红军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军事主任，马文瑞、蔡子伟等兼任教员，学员主要来自部队中下级干部，还有少数地方干部。教学内容主要有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问题。政治课包括"工农红军"、"共产党"、"土地革命"、"六大决定"；军事课包括"制式教练"，"尖兵活动"、"游击战术"等，刘志丹亲自担任军事课教学；文化课因学员文化程度较低，基本以扫盲为主。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干部教育工作，将红军干部学校改为党政干部学校，培训对象除来自红军外，还有各级苏维埃政府选派的地方干部。党政干部学校办了两期培训班，前后共培训干部

200多人。这些干部结业后，多数回到了原工作单位。党政干部学校的创办，提高了陕甘边区军政干部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方面，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吸取以往革命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对各种社会势力进行认真分析，区别对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加以改造利用，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对有政治背景的土匪，为群众所痛恨的惯匪，坚决消灭，对一般土匪，则采取各种办法去争取改造。如对政治土匪张廷芝部和惯匪杨谋子部等，红军采取了坚决打击和消灭的方针、政策。面对郭宝珊率领的绿林武装，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团结、争取、教育的政策，促其率部起义，参加红军。

对极端反动的地主民团坚决消灭，对同情、靠近共产党、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民团，则与之建立统战关系，互不侵犯。对既不反对，也不愿接近共产党、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民团，在实际斗争中教育他们，使之转变对共产党、红军和红色政权的认识，并向苏维埃政府靠拢。

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建立长期的统战关系，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发动群众去清除。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缠等会道门组织，采取争取的政策，逐步予以改造。对白军俘虏一般采取教育、改造的政策。

在肃清反革命工作中，分清主犯与从犯，区别对待。对属于敌探及确有证据的反革命分子一般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若群众愿出面作保，且不杀也无损于革命的，可以保释予以感化；对确有证据的反动豪绅地主，采取镇压的政策；一般豪绅地主只向其要粮索款，并不杀掉；处决人犯需经过群众大会，不搞秘密杀人。

在劳资政策上，最初规定给雇农发单衣、棉衣、手巾等物，但个别

雇农好吃懒做，于是政府规定凡是雇农一定要参加劳动；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老人、残废人员，均实行救济政策。为了打破旧的社会体系，根据地还成立了一些群众组织，如雇农工会、贫农团等。雇农工会由雇农组成，在中心苏区设总会，各县设分会，村设村会；贫农团在各区设区团，乡设乡团，村设村团。雇农工会和贫农团是根据地乡村社会新建立的群众组织，受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其成员是根据地政权培养起来的新的乡村社会先进分子，他们在分配地主土地、组织动员民众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为巩固根据地采取的上述政策和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及根据地建设的顺利进行，推动根据地的革命事业取得很大进步，使南梁地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成为贫苦农民向往的好地方。

第六节　陕甘边区第二、三次反"围剿"斗争

一、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方针的制定

陕甘边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不仅使地方军阀慌了手脚，而且蒋介石焦躁不安。1935 年春，蒋介石急调陕、甘、宁、豫、晋 5 省军阀，计 4 万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新的"围剿"。敌人的兵力部署是：北线，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 3 个团部署在保安、定边、靖边、横山、榆林、佳县、神木、府谷一带"剿防"；东线，晋军七十一师，集结在黄河东岸各要点驻防，并派遣第二〇六旅 2 个团西渡黄河进驻吴堡和宋家川、辛家沟、绥德县的义合镇一带"剿防"；南线，敌杨虎城部第四十二师 4 个团摆在宜君、中部、洛川、鄜县、甘泉一线，固守咸（阳）榆（林）大道，作为战略警戒；西线，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的 3 个旅，加上陇东警二旅，共 7 个团的兵力分别进驻曲

子、庆阳、合水，布成新月形的战线，向南梁地区逐次推进；在西南面，胡宗南部第六十一师杨步飞部6个团分别进驻合水、宁县、正宁地区，楔入南梁、照金之间待机。为了割断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联系，蒋介石从河南洛阳地区调来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4个团进驻延安、安塞、延川、清涧、绥德、米脂一带，并向陕北苏区进攻。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中调集了陕西、甘肃、山西、宁夏、河南五省军阀及嫡系部队6个师约30个团共4万余人的兵力。为了平息各军阀部队之间，尤其是井岳秀部与高桂滋部之间的矛盾，蒋介石还派出参谋团，进驻绥德，调解各军阀的关系，监督部队的行动。

当时，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的红军主力部队不到4000人。为了将两块根据地联合起来，实行统一指挥领导，共同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2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等率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北上，与在赤源县水晶沟灯盏湾养伤的谢子长就建立统一的机构反"围剿"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2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陕北赤源县周家峪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由刘志丹主持，讨论了统一两地党政军的领导和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等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选举惠子俊为工委书记，习仲勋任工委委员，刘志丹为军委主席[①]。不久，又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周家峪会议是西北红军发展时期一次重要会议，统一了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的军事指挥和党的领导，为粉碎国民党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围剿"，为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月18日，刘志丹发布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动员令》在分析了全国和陕甘边革命形势后，着重分析了敌情，认为敌人这次"围剿"的规模虽然很大，但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敌人弱点很多。蒋介石把自己的嫡系部队摆在第二线，驱使非嫡系为先锋，

① 一说谢子长。

而各派系又各有自己的打算，都以保存实力和地盘为目的，只有高桂滋部冒险进犯。打败高桂滋部，就能打乱敌人的"围剿"计划。因此，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决定，红军反"围剿"的任务是集中兵力，打破高桂滋部的防线，然后向南、向西发展，逐步将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动员令》还详尽地部署了红军的作战计划。为有效地打击敌人，红四十二师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作战；红一团进至耀县柳林地区钳制敌六十二师；红二团在完成阻击马鸿宾部三十五师的任务后，向环县、三边发展，开辟定边、环县新苏区；骑兵团相机东进宜川，积极向韩城一带游击；留当地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暂时放弃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向洛河川一带转移。《动员令》最后要求，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树立必胜的信心，坚决服从命令，反对游击习气，以不怕牺牲的精神夺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就在反"围剿"部署刚刚下达，反"围剿"斗争即将展开的关键时刻，谢子长因伤势恶化，于1935年2月21日逝世。谢子长的逝世是西北红军和陕甘边、陕北根据地人民的巨大损失。

1935年2月初，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向陕甘边苏区发起了进攻。敌军由宁夏出发，兵分两路：一路经中卫、环县、曲子进抵悦乐；一路经固原、西峰、庆阳进驻六寸塬。2月21日，敌占领了庆阳、新堡、悦乐、元城、柔远等地。敌人采取"堡垒"战术，在到达悦乐后，一面强迫群众移民并村，建立"战略村"，企图割断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一面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修筑碉堡，仅在新堡、悦乐、五蛟、柔远等地就修筑碉堡30余座。

在敌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朱志清、副总指挥梅生贵率领第二路游击区各游击队、赤卫军用疑兵之计，迷惑打击敌人，他们在老爷岭的山头搭起许多毛毡帐篷，在密林中升起了许多红旗。白天，游击队高举红旗到处游击。夜晚，漫山遍野点燃篝火，并派出小股部队不断骚扰敌军，造成主力红军在老爷岭一带据险

抵抗的假象，迫使敌军在老爷岭以西地区滞留了一个多月，胜利完成了掩护红军主力部队的战略行动。

二、南梁中心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按照既定的作战部署，红四十二师第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骑兵团向东挺进，迎击由宜君、中部、鄜县、甘泉地区向根据地进犯的敌四十二师冯钦哉部，歼敌两个排。后因敌军密集，无法捕捉战机，遂回师陇东，迎击进犯陇东之敌。3月下旬，骑兵团经元城川南下奔袭，消灭了进犯五蛟的敌骑兵部队两个排，歼敌50余人。

在此前后，红二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发起了田嵬岘战斗。当时，敌三十五师一〇五旅马殿邦团占领了悦乐后，以一个营的兵力防守田嵬岘。敌军进占后，一面强迫群众集中，建立“战略村”；一面选择有利地形，修工事筑碉堡，准备在摸清红军虚实后，向南梁发动进攻，在未摸清红军主力部署之前，固守悦乐。驻守在田嵬岘的敌军以一个连的兵力控制附近的高地，并在上面修筑了大量工事。红军部队兵分三路进攻田嵬岘据点：红二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南梁政府保卫大队担任主攻，从正面直插田嵬岘高地，合水、庆阳游击队两翼夹击，对高地上的敌军实施迂回包围，并阻击来援之敌。拂晓，战斗打响，红二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向敌军发起猛攻，经半小时激战，红军将驻守高地的敌军一个连全部歼灭。赶去增援的敌营部和另外两个连又受到合水、庆阳游击队阻击，无法前进。红二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及政府保卫大队乘胜追击，与合水、庆阳游击队配合，从三面包围敌军。敌军见三面被围，处境孤立，惧遭全歼，逃回悦乐。这次战斗歼敌1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

在红二团等部队取得田嵬岘战斗胜利后，红三团、骑兵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又发起了六寸塬战斗。当时，红四十二师接到合水游击队报告，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一〇五旅冶成章部的一个营进驻合水县六寸塬，修筑工事设营扎寨。杨森和张秀山（谢子长负伤后，张秀

山任红四十二师政委)决定,趁敌立足未稳之机,将其歼灭。

4月3日凌晨,红军经长途行军到达六寸塬附近。拂晓前,西北抗日义勇军首先攻进村子,歼敌20余人。天亮后,开始向山梁上的敌军阵地发起进攻。由于敌占据有利地形,修筑了工事,火力猛烈,红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多次冲锋未果,伤亡严重,加上敌一〇五师赶到,形势不利,红三团主动撤退,六寸塬战斗失利。战斗中,骑兵团团长赵国卿负重伤,红三团团长王世泰受伤。

六寸塬战斗后,红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由张秀山率领开赴陕北,参加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陕北地区的作战。骑兵团、红一团、红二团和各路游击队,由杨森指挥,坚持陕甘边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4月14日,敌三十五师占领二将川、荔园堡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寨子湾,南梁苏区沦陷。敌500多人紧紧追击转移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人员。4月16日,习仲勋等政府工作人员在豹子川、白沙川交界的张岔岭被敌人包围,赤卫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梅生贵指挥队伍阻击敌人,且战且退,掩护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转移。战斗一直持续到后半夜,待退到乔子川时,终于摆脱了敌人追击。战斗中梅生贵伤重被俘,壮烈牺牲。

此后,习仲勋率政府保卫大队、赤卫军和机关工作人员,经过连续拼杀,又突破敌军的三次包围,转移到陕甘边东区洛河川的石峁湾。20多天后,敌军尾追而来,习仲勋又率领陕甘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转移到洛河川的阎家湾。6月上旬,陕甘边党政机关迁至洛河川下寺湾,从此以后,下寺湾成为陕甘边苏区的中心地区。

敌三十五师侵入南梁根据地后,根据地人民在游击队的带领下,坚壁清野,把粮食、灶具全部埋藏,把牛羊赶进山林隐蔽。敌人杀害干部,活埋群众,焚烧房屋,企图从群众口中得知红军、游击队及南梁政府工作人员的去向。根据地人民以生命掩护革命干部和军队,敌人一无所获。为了彻底摧毁根据地,敌人进行并村,实行保甲制度,将南梁根据地的中心区南梁堡、小河沟、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的房屋

全部烧毁，村庄变成一片废墟。国民党军队还严刑拷打走出山林的群众，追问红军、游击队及政府工作人员去向。并张贴告示，悬赏捉拿习仲勋等陕甘边区政府领导成员。声称抓到习仲勋，赏洋2000块，马两匹；抓到贾生秀，赏洋1000块，马1匹。同时，国民党地方政府网罗地主"还乡团"对人民实行反攻倒算。"还乡团"熟悉地形和情况，仇视革命，他们四处搜捕残害共产党员和红军伤病员，加重了根据地的灾难。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红二十六军骑兵团、红一团、红二团继续纵横驰骋在陕甘边根据地的广大地区，牵制了西线、南线、西南线三面敌军的行动。南梁根据地的游击队、赤卫军，除跟随主力红军转战陕北外，都转入地下活动，侦察敌情，打击敌人。

三、陕甘边区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根据西北军委的指示，1935年5月中旬，红二十六军骑兵团由下寺湾挺进宜川、甘泉一带活动。5月21日，红二十六军骑兵团在宜川的屯石崾峴歼灭敌民团武装160余人后，北上临镇。此时，西北前敌总指挥部命令骑兵团开赴延长作战，当骑兵团到达延长时，战斗已经胜利结束，西北前敌总指挥部遂将缴获的170余匹战马补充给骑兵团，扩建了第四连。此时骑兵团已拥有兵力500余人，战马500余匹。此后，骑兵团配合红一团在宜川、鄜县、澄城、合阳、宜君、中部一带开展游击活动，扫荡了观音堂、芝川、甘井镇等50余个反动民团据点，打土豪，分粮食，摧毁反动政权，开辟了洛川、中部、宜君游击区，控制了咸榆大道，切断了敌军的交通运输线，牵制了南线敌四十二师冯钦哉部的进攻，有力地配合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作战。7月，骑兵团在完成任务后，回到下寺湾地区。

7月中旬，红二十六军第一团进军宜君、中部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随后红一团退回陕甘边南区根据地，配合第三路游击区的各游击队，以正宁湫头塬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3月，国民党军驻

底庙的一个骑兵连进犯下南坡头，新正四支队阻击失利。红一团闻讯将敌击退。4月，回民支队在正宁龙嘴子一带设伏袭击敌军一个骑兵连，俘敌连长以下7人，缴获步枪6支，机枪1挺。4月1日，红二十六军第一团和宁县三支队开赴宁县金村塬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当红一团由瓦扇子行军到金村庙附近时，得知金村庙已驻扎敌三十五师马培清骑兵团。红一团立即向湘乐川转移。敌三十五师骑兵团穷追不舍。红一团由湘乐川北上盘克塬，在半坡受到优势敌人前后夹击。危急时刻，红一团二连连长张治怀率领全连战士凭借有利地形阻击敌军，掩护主力突围。在二连的有力掩护下，团部及一连、先锋连、宁县三支队安全突围。这次战斗，红一团损失严重，团长陈国栋负重伤，二连长张怀治等30余人壮烈牺牲，20余人被俘。突围后，红一团转移到九岘塬桃树庄一带休整补充。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坚持在陕甘边苏区的西北部和东北部开展游击活动。4月21日，红二团在杨青川伏击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警三团一个骑兵连，全歼敌军，并用缴获的战马扩建了一个骑兵排。5月20日，又在保安县顺宁川和安塞川的五城镇，全歼敌民团100余人。接着北上定边，深入敌八十六师的后方活动，摧毁了张廷祥匪部设在韩家集的一个修械所，扫荡了敌人的保甲政权，逼迫靖边、安边据点的张廷芝等匪部撤退。然后，红二团又挥师南下，奔袭驻守吴起镇（今吴起县）民团，解放了吴起镇。红二团在两个多月的游击活动中，粉碎了敌八十六师警三团对保安苏区的“围剿”，开辟了定边以东，靖边以西、以北的大片游击区。6月，红二团奉西北军委命令，加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作战序列，北上靖边作战。

在红二十六军部分主力部队坚持在陕甘边苏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南梁中心区的地方红军武装也积极开展对敌斗争。3月，庆阳游击队大部编入红四十二师第三团，随主力北上陕北，其余人员在元城进行整编，下辖环县、镇原、定边3个游击队。整编后，庆阳游击队时而集中，时而分散，灵活机动地开展斗争，部队得到很快发展，达到100余人。4月中旬，庆阳游击队突破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的包围

后，在麻地台又一次进行整编，正式成立庆北游击队，下辖2个大队，7个分队。庆北游击队成立后，奉命在保安、吴起、定边、靖边一带开展游击活动。8月，李培福联络失散的老游击队员李树林、田生弟等10余人，以此为骨干，在二将川一带重新组织起庆华游击队，共60余人。庆华游击队在南梁地区打击敌人，发动群众，恢复红色政权。此时，红二十五军长征来到陇东泾川一带，敌三十五师前去阻击，南梁中心区一带敌人大部撤离，李培福、李树林等人加紧南梁根据地的恢复工作，先后恢复了温台区、柔远区、城壕区、白豹区的红色政权。9月，恢复建立了庆北办事处，南梁根据地中心区基本上得到了恢复。9月下旬，华池战区成立，崔凤鸣任党委书记，高生荣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机关驻地在南梁李沟门。一区苏维埃政府（又称白马区苏维埃政府）由原二、三、四区部分地区合并组成，机关驻南梁闾洼子，辖玉皇庙、白马庙、刘坪三个乡苏维埃政府，区政府主席李兴高；二区苏维埃政府（又称林镇区苏维埃政府），由原一、四区部分地区组成，机关驻林镇梁沟门，辖三个乡苏维埃政府，区政府主席安仲成。在华池战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南梁根据地人民拆碉堡、平战壕，重建家园，迅速消除战争创伤，各乡、村的红色政权都逐步恢复和建立。

在陕甘边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赤卫队的配合下，陕北主战场捷报频传。4月15日，张秀山、吴岱峰、黄罗斌率领红二十六军第三团，郭宝珊、任浪花率领西北抗日义勇军离开南梁，北上陕北。4月21日，红二团在杨清川伏击国民党警二旅二团骑兵连获胜。22日，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在横山寺儿畔首战告捷，歼灭井岳秀部一个精锐连。

1935年5月1日，红二十六、二十七军[①]在安定（今子长县）白庙

① 红二十七军，是陕北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之一。1935年1月30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陕北独立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师长杨琪，政治委员张达志。同年9月18日，改编为第八十一师，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1937年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115师334旅一部，参加抗日战争。

岔会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白坚任政治部主任。此时，高桂滋的王牌郭子封营进入苏区杨家园子以及周围村庄，前敌总指挥部决定"乘敌立足未稳，集中力量消灭这个营"。5月7日至9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主力在吴家寨、马家坪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共歼灭高桂滋部7个连，俘虏1000余人，缴获捷克式步枪1000余支，捷克式轻机枪60余挺。5月10日，安定县城国民党军队弃城逃跑，红军占领安定县城。这次战斗，消灭了高桂滋总兵力的1/4，给其以沉重打击。由于高桂滋是这次"围剿"红军的急先锋，对高部的打击，使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不敢轻举妄动，敌军被迫收缩战线，采取守势。

5月10日，西北军委在安定县玉家湾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郭洪涛、高岗、崔田夫、马明方、张秀山、高长久、张达志，主要研究红军下一步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先打延长、安塞之敌，打通陕北、陕甘边两大苏区，使之连成一片，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5月下旬，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摆出要攻打绥德、清涧的态势，高桂滋八十四师在准备拦截时，红军则秘密南下到延长县大连沟一带隐蔽待机攻打延长县城。驻守延长县的高桂滋八十四师直属骑兵连、民团、矿警等共计400余人，红军先引诱民团出城100余里后，于5月20日拂晓攻打县城，全歼国民党守军。民团在返回县城时也被红军消灭。此役生俘国民党延长县县长和骑兵连连长，毙伤俘敌400余人，缴获长短枪400余支、轻机枪15挺，无线电台1部，战马100余匹。延长被红军占领后，延川国民党军弃城逃往清涧，延川也被红军占领。6月4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由延长县城出发，昼夜兼程南下，奔袭甘泉县城。甘泉守敌四十二师一个营已知悉红军解放延长、延川的消息，加紧戒备，严密防守。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赶到甘泉时，发现敌军戒备森严，偷袭计划无法实现。刘志丹立即改变计划，沿洛河川西进，到陕甘边中心苏区的下寺湾一带休整补充，待机破敌。

6月20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围攻敌安塞县城兴隆寨。战斗开

始后，红二十六军第三团担任主攻。红二十七军第二团挖地道爆破。当天红军炸开城墙，攻进城内，歼敌200余人，俘获敌新旧两任县长，缴获了全部敌公文档案和关防印信，解放了安塞县城。

6月22日，红军全歼李家塌寨子据点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和民团武装400余人。此后，安塞境内各据点的敌军闻风披靡，安塞游击队和陕北游击队第四纵队扫荡残敌，安塞全境解放，陕甘边、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由组建时的2100余人发展到3000余人，全部装备了新式武器，并配备了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等火力较强的武器，作战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此后，北线之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继续向根据地进攻。前敌总指挥决定以敌八十六师作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下一阶段作战的打击目标。经过慎重分析，刘志丹和前敌总指挥部决定攻克靖边县城，打击敌八十六师，解除陕甘根据地北线的威胁。

按照前敌总指挥部的作战方针，6月28日凌晨，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进入进攻阵地，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发起强攻，在东南城角打开突破口，夺取东门。上午，红二十七军第一团投入战斗，突破敌军的防御，夺取敌军城隍庙据点，与红二十六军部队形成夹攻态势。经过反复争夺，红二十六军部队攻占钟鼓楼，全歼敌军。此时，西北抗日义勇军也经过激战，歼灭西山寨守敌，控制制高点。红二十七军第一团一部攻占北城门楼。城内大部敌军被歼灭。残敌退据祖师庙，负隅顽抗。红军各部向敌发起最后攻击，敌营长屈子鹏见大势已去，带领几个残兵逃窜中被红军击毙。红军歼敌600余人，靖边县城解放。

6月30日，在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北线攻势下，保安县城守敌八十六师一部弃城而逃，红军兵不血刃解放了保安县城，保安境内仅剩下旦八寨土围子一个敌人据点。至此，北线敌八十六师的"围剿"行动被彻底粉碎，南线进攻敌军被迫撤退，西线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闻风而逃。蒋介石精心部署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被红军彻底粉碎。

第二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是一次空前伟大的胜利。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红军在5个月的反"围剿"斗争中，歼敌正规军5000余

人，缴获步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迫击炮8门，解放了定边、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6座县城，打通了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联系，进一步扩大了革命根据地。这时，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北至长城，西到环江，南到淳耀，东到黄河，形成了南北1000余公里，东西500余公里，包括20多个县广大的红色区域。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的战术水平和战斗力有了较大提高，不仅学会了打游击战、运动战，而且初步积累了阵地攻坚战的经验，红军主力的正规化建设也有了较快发展。

四、陕甘边区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开始

1935年7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在对陕甘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又向陕甘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妄图消灭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这次"围剿"规模更大，先后调集了东北军、中央军和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阀部队，兵力达15万余人。为了统一指挥这次"围剿"，国民党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蒋介石自任总司令。敌军的"围剿"兵力部署是：在东面，阎锡山的晋军主力沿黄河一线从陕甘革命根据地东线进攻；在西线，除原来的陕、甘、宁三省军阀部队外，又投入东北军8个师的兵力，沿环县、庆阳、合水至彬县、长武一线向根据地推进；在北线，敌八十六师和八十四师在清涧、绥德、米脂、横山、神府等地驻防；在南线，东北军主力第六十七军等部沿洛川一线向根据地大举进攻。蒋介石在这次"围剿"中采取的作战方针是以东北军为进攻主力，以根据地南线为主攻方向，运用南进北堵、东西夹击的战术，企图聚歼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于陕甘地区。

7月21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到达杨家园，刘志丹召集团以上干部召开反"围剿"军事会议，研究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原则及军事部署。会议决定，集中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趁敌之

隙，各个击破，积小胜为大胜，粉碎敌人的"围剿"。在蒋介石的"围剿"部署完成前，首先打击深入东线一带根据地的晋军先头部队，挫败晋军西渡黄河的企图，然后挥师南下，趁敌立足未稳之际，寻机歼灭深入根据地南线一带的东北军六十七军一部，粉碎敌人的"围剿"。为了保证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作战行动，红二十六军第一团和骑兵团仍在洛河以南和咸榆大道东西两侧的苏区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迟滞南线敌军的行动。陕甘边各路游击队、赤卫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牵制西线敌军的行动。

按照作战方针，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和游击队、根据地群众迅速作好了反"围剿"的准备工作。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乘敌人整个"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机，先发制人，迎头痛击西渡黄河的晋军先头部队。8月11日，刘志丹率领红军主力突然挥师吴堡，向磨家塬晋军据点发动进攻，经过苦战，歼灭磨家塬据点敌军及增援部队，歼敌600余人。敌军误以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要北上神府，在黄河两岸增兵加强防御。根据敌情特点，刘志丹用声东击西战术，声言北上打通佳（县）、吴（堡）、神（木）、府（谷）苏区的联系，造成敌军部署上的失误，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则秘密南下，寻机再战。

8月中旬，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延家畔打垮敌军一个营后，转进到绥德东南部的新庄一带待机。8月21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定仙塬歼李生达部2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980余支，轻机枪69挺，"八二"迫击炮2门，骡马80余匹及其他军用物资一批。定仙塬战斗打垮了东线之敌的攻势，东线战场形势得到扭转。

8月下旬，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迅速向南运动，准备寻机歼灭南线的敌东北军。8月25日，红军抵达延川县文安驿一带。这时，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等人来到文安驿。8月27日，在文安驿召开前敌总指挥部会议。在反"围剿"作战方针上，西北代表团成员要求红军全线出击，提出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在作战形式上，要求红军运用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阵地战。在行动方向上，要求以洛川作中心，积极向定边、陇东发展，以马栏为中

心，向同官、富平、泾阳发展。要主力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苏区内敌人的支撑点，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敌军的中心据点①。

文安驿会议之后，刘志丹和前敌总指挥部被迫进行攻击瓦窑堡的准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沿水坪川、青坪川两路向瓦窑堡城郊外围运动。同时，刘志丹命令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到南线侦察敌情，了解东北军的作战规律和装备情况，以保证尔后红军主力南下作战的胜利。8月30日，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在团长黄罗斌、政委马佩勋的率领下，南下鄜县地区。9月10日，红三团与鄜县游击队、甘泉游击队密切配合，诱出驻中部龙坊镇的敌东北军一一〇师两个营，并采用伏击战术，歼敌一个营，俘敌200余人。此时，从俘虏口中得知东北军进驻延安后，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的重要情报，红三团上报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命令红三团转移至洛河川的下寺湾一带集结待命。

这时，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刘志丹的率领下，进抵瓦窑堡郊外集结。在勘察敌人城防工事后，刘志丹认为在敌人坚固的防御体系下，依红军现有的装备和兵力，硬打强攻必遭失败。经过研究，刘志丹决定放弃强攻瓦窑堡，另寻战机歼灭敌人。

此后，刘志丹又对清涧县城守敌的布防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清涧县城的敌人兵力更多，防御工事更强，地形更险要，更不能硬攻。刘志丹决定奔袭北线的横山县城，趁敌不备，歼灭敌人。横山一旦得手，石湾镇守敌二五八旅高双城部可能不战自退，根据地能进一步巩固，还可以牵制敌八十六师对神府苏区的行动，有利于集中力量打击南线的东北军。

9月11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各部向横山县城发动偷袭行动，虽攻城未克，但还是达到了打击北线敌人，巩固苏区的战略目的。敌八十六师为了加强横山地区的防御，被迫撤回"围剿"神府苏区的部分兵力，减轻了红军独立三团和神府各游击队的压力，神府苏区的危急

① 保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第82页。

局面得到扭转。但陕甘根据地仍然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困难。

五、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

陕甘边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西北地区取得的重要成果，不仅在中共党史上而且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第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为陕甘革命根据地重要现成部分，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己创建的武装力量，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坚持武装斗争，在全国的广大农村先后开辟了十多块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占主导地位，导致苏区党的组织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丧失殆尽。"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①]在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中，各根据地红军被迫先后撤离，进行战略转移。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下，自觉抵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陕甘边区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带领广大军民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国民党军两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在鼎盛时期，陕甘根据地东临黄河，西接环江，南到淳耀，北达长城，南北1000余公里，东西500余公里，辖30余个县的广大红色区域。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这块革命根据地在党和红军最危急的时候，发挥了非常重要和特殊的作用。由于有了陕甘革命根据地这一重要的战略依托点，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结束长征后，审时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7页。

度势，作出了将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这里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革命成功地实现了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最终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第二，陕甘边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进行长征。这次战略行动的决策者事前心中并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长征中，中央政治局曾几次召开会议讨论落脚点的问题，有的没有定论，有的虽然决定了方向和目标，但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未能实现。1935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岷县的哈达铺，从缴获的国民党报纸上得知陕甘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毛泽东等提出到陕北去。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召开的红军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①]"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党中央决定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选在陕北，"到陕北只有七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进阵地"。[②] 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长征以来，这个一直困扰中央的全局性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避免了国民党军接连不断的堵截追击，结束了一年来的长途跋涉。并在这里休养生息、整合力量、整编队伍，为新的发展做了政治、军事和物质上的准备。有了陕甘革命根据地这个落脚点，革命力量渡过了最低谷，实现了由被动到主动的伟大转折，开始了中国革命新的历史时期。

第三，陕甘边根据地成为八路军三大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1935年6月，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在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中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

① 《杨成武回忆录》，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75页。

② 萧华：《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111页。

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西北办事处划陕甘根据地为陕甘省、陕北省和关中、神府特区。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为了实现这一策略，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积蓄力量，争取空间，在 1936 年春夏两季，红军发起东征和西征战役。尤其在西征战役中，解放了甘肃、宁夏的大片地区，使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1936 年 11 月，发生在环县境内的山城堡战役，客观上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山城堡战役后，红军主力部队陈兵于陇东地区。1937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在陇东一带驻扎的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援西军、中央红军教导师等部队陆续开赴抗日前线。红军主力部队是在陇东驻防期间完成了出征前的思想动员、军事训练、兵员补充、粮草及武器弹药准备等重要工作，保障了红军抗日部队的顺利出征，对"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建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国抗战的发动，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①

第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党和国家培养造就了一批高级干部。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发展是和拥有大批党的优秀干部分不开的，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不但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而且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军事斗争思想和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以及在陕甘边区局部执政的正确理念和成功实践，在中国革命斗争史和党的执政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陕甘边根据地锻炼、成长起来的一大批优秀军事指挥员和革命干部，除了刘志丹、谢子长英年早逝外，大多成为陕甘宁边区和解放战争时期乃至建国后各条战线党和国家的领导骨干。在党的七大会议上，陕甘宁边区代表团的 144 名代表中，

① 宋金寿主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 页。

有50多人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工作过，从陕甘革命根据地成长起来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在党的七大代表中约占8%。一些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如高岗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习仲勋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汪锋、马文瑞分别任全国政协第六、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还有一批人担任省部级的领导干部和人民军队优秀的指挥员，在各条战线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第八章　长征红军到庆阳

第一节　红二十五军在庆阳

一、红二十五军途经庆阳的主要战斗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创建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11日，为了适应革命发展形势，避开国民党重兵"围剿"，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会议，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向平汉铁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当时红二十五军直辖4个团，共2980余人，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政治部主任郑维三。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省委率领下，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12月10日，红二十五军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进入陕南，成立鄂豫陕省委，吴焕先任省委书记，程子华、徐海东任副书记，并创建了鄂豫陕苏区。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在威逼西安的行动中，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的意向。7月15日，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到达红二十五军驻地，带来了中共中央数月前发出的文件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川西并继续北上的确切消息。当天晚上，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陕西省长安县洋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征北上，到陕甘苏区与二十六军会合，配合中央红军北上。16日，红二十五军从洋峪口出发，又踏上长征的道路。这时，红二十五军辖二二三团、二二五团和

手枪团，包括军部直属队，全军近4000人。8月2日，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境内，先后在两当、天水、秦安、静宁、隆德、平凉等地打击国民党军队，切断西兰公路，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大量有生力量，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8月21日在平凉泾川四坡村的反击战中，年仅28岁的红军高级将领、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身负重伤壮烈牺牲。吴焕先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创始人之一，是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主要领导人。他的牺牲，是党和红军的重大损失。

红二十五军在隆德、平凉、泾川和灵台等地的活动对国民党震动很大。蒋介石命原驻防宁夏金积、灵武、中宁一带的国民党三十五师移防陇东，围堵北上的红军。1935年8月15日，宁夏马鸿宾部三十五师开始由宁夏进入陇东地区，步兵一〇三旅和一〇五旅先后取道预旺、环县，进驻庆阳（今庆城县）、合水、环县、宁县、正宁等县布置防务。根据国民党中央和甘肃省政府的部署，国民党庆阳当局和地方民团在红二十五军到达平凉一线后，也开始布防和堵截北上的红二十五军。8月16日，甘肃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胡抱一给镇原县县长邹介民发电报要求“防剿”红军。镇原县接到电报后，为堵防红军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一方面派出人员打探红军的消息，另一方面整理地方武装，修筑碉堡，以备阻击红军。8月25日，胡抱一又下令各县县长传知四乡村民将粮物移贮城镇，进行坚壁清野，并要求限期办理。8月26日，胡抱一训令建立封锁线，以阻止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等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合。

尽管国民党庆阳当局严密防范，红二十五军还是在8月30日晚从平凉四十里铺渡过泾河向镇原进发，先头部队当日到达镇原新城。8月31日，红二十五军经临泾镇到达新城。红二十五军在新城休整一天，镇压了正在这里视察碉堡的国民党镇原县警察局局长党效贤、南三镇特税卡长孟维铎等；从国民党新城乡乡长家收缴麦子5石，为部队补充给养和救济贫苦百姓；还刷写了标语，向群众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红二十五军到达新城时，马鸿宾的三十五师骑兵团受命驻防镇原县城。9月1日，红二十五军离开新城，三十五师骑兵团从县城出发尾追。红二十五军兵分两路，一路沿洪河东下，经桃园、张毛，翻过原郑，下茹河川，北上临泾塬，经毛家铺、唐家洼，过太平，绕西峰镇向合水板桥进发；一路翻过申家塬，下茹河川，经路家坡，西绕县城，继上临泾塬，越交河口，过孟坝到驿马关奔合水板桥东行。两路汇合后向庆阳县赤城进发。3日上午，红二十五军在赤城塬畔和国民党三十五师骑兵团马培清部遭遇，毙敌10余人，击退敌兵。当晚，红二十五军宿营板桥。

4日凌晨，红二十五军二二三团的战士们如数清点归还了老乡的东西，支付了合理报酬，将村头和院落打扫干净后，由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继续前进；参谋长戴季英带领军部及二二五团集合后，派出二二五团担任警戒任务。天亮时，马家军骑兵赶至，蹚过马莲河，冲击红军集结的板桥镇，但遭到锦坪塬头警戒的二二五团三营的猛烈阻击。马家军骑兵团长马培清命令其所属一、三两营顺川冲击，骑兵补充营向北进攻二二五团三营，步兵马维麟连向南进攻，骑兵二营作为机动兵力，相机行事。当时，戴季英正在给官兵讲话，军长程子华看军情紧迫，催促部队赶快出发。但由于马家军是骑兵，机动性强，进攻速度快，二二五团刚出发，就遭到大队马家军骑兵的突然袭击，部队一下子被冲散。在紧急时刻，戴季英指挥军部带领二二五团一营先行撤退，留二营打掩护。

徐海东带领二二三团在去包围国民党合水县城的路上，听到枪声越来越密，立即骑马返回到板桥附近北山梁察看军情。由于二二五团三营多半是陕南出发时编入的新兵，战斗经验不足，被马家军骑兵冲散。徐海东看到形势危急，忙叫警卫员传令二二三团停止前进，二二五团一营也折回来迎战。

锦坪塬全是开阔地带，二二五团二、三营被马家军骑兵几面围攻，伤亡严重，团长方炳仁壮烈牺牲。为了阻击马家军的进攻，徐海东亲自指挥三挺重机枪和警卫人员一起还击。马家军骑兵看到火力

凶猛，马上调转头逃命。但由于红二十五军战士一时难以撤退，火力一弱，马家军骑兵又快速冲上来。徐海东命令三营何教导员带部队战士守住塬边的一个墙圈，吸引马家军主力，掩护其他战士迅速转移。但马家军骑兵不去攻墙圈，却直奔徐海东而来。部队越打越少，马家军已经攻上了锦坪塬。在警卫人员的催促下，徐海东和二二五团政委张明先只好骑马突围。马培清见此情形，急令一股马家军骑兵去追，妄图活捉徐海东。在相距仅有四五十米的关头，二二五团一营政委刘震赶到，架起机枪向敌追兵猛烈扫射，徐海东终于脱离险境。

板桥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损失较大的一次战斗。副军长徐海东险些被俘，二二五团团长方炳仁壮烈牺牲，二营营长陈彦宾及坚守在锦坪塬上的部分战士受伤弹尽被俘，三营200余人或牺牲或失散。但红二十五军官兵在战斗中表现出了顽强拼搏的精神和英勇不屈、抗击强敌的气概，共歼敌300多人，成功实现突围，主力部队安全转移，保存了革命力量。

二、豹子川会议

红二十五军从板桥镇撤出以后，为了迅速摆脱马家军的追击，在庆（阳）延（安）公路两侧的山岭之间，一边与马家军骑兵周旋，一边快速翻山前进。9月4日晚，红二十五军在甘漱子川口宿营，后卫部队在山头燃起篝火，吹起军号，召唤失散的战士归队。5日，红二十五军继续沿着山岭前进，一面急行军，一面阻击马家军。行至合水县杨坪乡西北面的黄草崾岘时，红二十五军后卫部队又与马家军骑兵发生一次战斗。战斗中，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继任团长张成毅牺牲。红二十五军沿子午岭的黄毛岭继续东进，所经之地人烟稀少，无粮可筹，加之道路崎岖难行，部队体力消耗很大，最后全军断粮，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昏倒在地。就在这极端困难之时，恰遇赶羊商贩路过，经协商，红二十五军将四五百只羊全部买下充饥，部队终于渡过难关。

9月6日，红二十五军穿越子午岭林区，终于摆脱马家军的追击，到达太白镇；接着翻越木瓜岭，途经东华池，于9月7日到达华池县豹子川。部队在此进行了休整，并在豹子川召开了中共鄂豫陕省委会议，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郭述申、赵凌波、张照先、田守尧、张希才等参加会议。会议决定徐海东任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兼红二十五军政委，戴季英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会议对红二十五军进入陕甘根据地与陕甘红军会师作了政治动员，要求部队整顿好军容，讲究礼节礼貌，遵守纪律，注意团结，注意向陕甘红军学习，向陕甘苏区人民学习。

豹子川会议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中共鄂豫陕省委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调整补充了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领导班子，加强了对部队的领导，明确了部队的行动方向，为实现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奠定了基础。

三、根据地军民热烈欢迎红二十五军

1935年7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得知红二十五军北上的消息后，在下寺湾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大会，红二十六军部分将士、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干部、政治保卫队以及延安、富县几个邻近区的赤卫队代表参加了大会。习仲勋在大会上指出，最近有一支兄弟部队要到陕甘苏区来，各个方面要积极做好迎接的一切准备工作。马锡五重点强调了粮食工作，明确提出根据地军民要十分重视粮食问题，保证兄弟部队来到后有足够的粮食供应。甘洛县第一区区委书记王英在会上表示要种好庄稼，多打粮食，迎接兄弟部队的到来。

9月，红二十五军进入陕甘根据地后，陕甘边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积极打探其行踪，广泛动员根据地群众进行支援。红二十五军刚开始进入根据地时，因为说话口音不同，有些群众不知道红二十五军是什么队伍，纷纷逃走。但当群众知道来的是红军时，都相继回来，红二十五军所到之处，根据地群众像接待亲人一样腾房子、碾米

磨面，送猪羊，热情慰劳，分外亲切，到处洋溢着欢迎亲人的喜庆景象。

四、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

1935年9月8日，红二十五军从豹子川出发向陕北挺进。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等亲自前往永宁山迎接。在下寺湾一带休整的红二十六军第三团也派团长黄罗斌为代表，到刘家堡欢迎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9月9日，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永宁山，见到了前来迎接的习仲勋等。习仲勋立即将这一喜讯报告中共西北工委。中共西北工委接到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北的报告后，立即发出了《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动员全体党员及全苏区的每个劳动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会合，庆祝红二十五军北上的伟大胜利。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坪镇，习仲勋主持举行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大会，中共西北工委指示陕甘红军回永坪镇与红二十五军会师。刘志丹接到指示后，亲自起草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召开干部会议，号召全体指战员向红二十五军学习，主动搞好团结，密切配合作战，争取更大胜利。

9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永坪镇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9月17日，在永坪镇召开了中共鄂豫陕省委和中共西北工委联席会议，会议主要解决统一领导和下一步军事行动的方针问题。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决定改组党的领导机构，除代表团全面负责陕甘根据地的党、政、军各项工作的领导外，还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同时，改组军事领导机构，聂洪钧任西北军委主席。为了统一指挥三支兄弟红军部队，三支红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七十五

师，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3400多人；第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山，2500多人；第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2500多人，全军8400余人。9月18日，红十五军团在永坪镇召开了盛大的联欢会，宣布红十五军团成立。徐海东、刘志丹分别讲话，号召红军要兄弟般的团结，并肩战斗，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而英勇作战。

红二十五军是红军长征进入甘肃途经庆阳的第一支队伍，也是第一支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的红军队伍。红二十五军8月30日进入庆阳，9月8日从豹子川出发进入陕北，在庆阳境内活动10天。期间，多次打退敌人的围追堵截，打乱敌人部署，胜利完成了战略性转移，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红二十五军的西征北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积极主动配合中央红军和红军主力战略行动，表现了很强的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有效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对红一、四方面军的围追堵截，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节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庆阳

一、红军长征落脚点的确定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率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瑞金，开始了长征。中央红军经过浴血奋战，行军将近一年，于1935年9月18日抵达哈达铺。哈达铺是陇南一个较为繁华的小镇，镇上有集市、邮政代办所等。红军在哈达铺宿营时获得了一张国民党的《晋阳日报》，从中获知陕北刘志丹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5万，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

队20万人。在邮政代办所缴获的《大公报》上也登载了一些关于刘志丹、徐海东等红军在陕甘活动的消息。根据这些消息，党中央判断：有一支红军队伍在陕甘地区活动，陕甘革命根据地依然存在。

9月20日晚，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博古、王稼祥、罗迈、李维汉、彭德怀、杨尚昆等出席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组织工作和干部问题及部队整编。9月22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了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毛泽东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号召全体指战员："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进阵地。"[①]会议决定把革命大本营安放在陕甘，并宣布将红一方面军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第二纵队司令员彭德怀兼任（后为彭雪枫），政委李富春；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委邓发。9月23日，中央红军离开哈达铺，向陕北进发。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哈达铺作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前进的决定，改变了之前在川西北提出的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改变了俄界会议提出的经过甘东北和陕北在靠近苏联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为把长征的落脚点确定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做了准备。9月27日晚，中共中央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将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这一决策的实施，保存了红军的基干力量，使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转移到了抗日战争的前沿阵地，实现了党的北上抗日的总目标，也使得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大本营，为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中央红军长征在庆阳的主要战斗和活动

1935年10月初，中央红军到达静宁时，甘肃省第三区督察专员

① 杨成武：《忆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199页。

公署就开始布置防范红军的措施，以防止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并要求环县、镇原作好重点防范，进行坚壁清野。10月9日，中央红军进入镇原县孟庄村。在向当地地主刘杰家筹粮时，刘家开枪打伤了红军战士。红军攻克刘家堡子，没收了100多只羊，八九担面粉和大米。中央红军在孟庄村补充了给养，还积极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农民群众了解到红军是替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后，都愿意帮助红军，当向导，送粮食，抬子弹等。

中央红军到达镇原后，国民党庆阳当局再次给各县县长发电通报红军到达地点，并要求进行截击。由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军不得不继续行军。9日晚，红军先头部队离开孟庄向三岔镇挺进。10日，主力部队跟进，行至唐家塬、塔儿洼一带时，与国民党三十五师骑兵部队发生战斗，毙伤敌300多人。当晚，红军在三岔镇宿营。三岔镇位于镇原县北部，距县城约50公里。这里北有马家河，西有米家川河，两河在此相汇为蒲河，故名三岔。镇上有10多家私人杂货店和一些零星住户，还有一座天主教堂。宿营时，毛泽东住天主教堂，周恩来、彭德怀等住教堂旁的窑洞，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住不远处的窑洞。

在三岔，红军摧毁了国民党保安队南山湾堡子，打了几家土豪劣绅，除补充部队给养外，粮食、牲畜都分给了当地穷苦农民。当时，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已得知党中央率陕甘支队即将到来的消息，徐海东、刘志丹等人派骑兵给毛泽东送来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的信件。毛泽东看完信后异常兴奋，向正在休息的红军指战员宣布："同志们，我们就要到陕甘根据地了，咱们的陕甘红军派人来接我们了！"①

此时，国民党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也作出在洪德、悦乐以西地区消灭陕甘支队的部署，国民党马鸿宾的三十五师，毛炳文的第八师陶峙岳部、第二十四师李英部，何柱国的第三师郭希鹏部、第二师白凤翔部皆尾追而来，一时陇东大军云集。10月11日，敌八师、二

① 陈庚：《长征日记》，中国长安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70－474页。

十四师分三路星夜进至莫家塬，其骑兵部队进至马家塬，骑兵第六师由庆阳向环县开进。得知这一情报后，彭德怀、毛泽东给叶剑英、邓发、彭雪枫、李富春等发电通报敌情，并部署了以第一纵队为左路，以第二、第三纵队为右路的两路行军路线。

10月12日，左路第一纵队经肖家园子、殷家城、桑家洼进入环县，向小南沟方向急进；右路第二、第三纵队经演武、半个城、贾驿一线前进。13日，彭德怀发电报给毛泽东："目前向陕北前进会合二十六军是唯一正确的行动方针，建议经耿家河、木瓜城向靖边、横山方向前进，决不宜向正北再走，过多迂回会给敌人先我占领木瓜城、环县、靖边，隔断支队与二十六军会合提供机会。"[①]根据彭德怀的建议，红军到达环县车道、虎洞之后折向东行军。同时，毛泽东给彭德怀发报指示，洪德一线有敌，我军到达及通过洪德城、环县一线，须准备与可能到来的骑兵作战。敌小则消灭之，敌大则钳制之，而从其间隙乘夜通过该线。14日，陕甘支队到达环县河连湾、洪德城一带时，果然遭到守敌的阻击。第一纵队立即组织火力向河连湾守敌发起攻击，歼敌100多人。战斗中，曾经在突破乌江、攻占腊子口立过大功的战斗英雄毛振华壮烈牺牲。当晚，部队在洪德、河连湾宿营。毛泽东、周恩来等住在洪德杏儿铺一群众家的窑洞里。

红军到达河连湾时，周围敌情十分严重。10月14日晚，毛泽东在给彭雪枫的电报中指出："曲子镇十一日到骑兵，环县及二十里沟口本日有到骑兵可能，明日可能截击你们。二十里沟口有敌步兵一营。"[②]要求二、三纵队必须乘夜通过洪德城、环县之线，次日到达耿家湾以南地区宿营，然后与一纵队取平行路线东进。根据毛泽东指示，左路军乘夜通过环县洪德线，15日经万家湾、曹家湾直向耿家湾行进，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随左路军行动；右路军在15日从玄城沟

① 《彭德怀给毛泽东的电报》(1935年10月13日)，李占平主编，《走进落脚点》，庆阳市党史研究室2006年印行，第240页。

② 《曲子镇、环县有敌》(1935年10月14日)，《三军大会师》(下)，第579页。

出发，抄小路走捷径，经齐家塬、许家塬向兴隆山前进，叶剑英、邓发随行。15日晚分别宿营耿湾黑城岔和四合塬的兴隆山。兴隆山又名东老爷山，地处群山环抱之中，是陕甘宁三省交界处的一处道教胜地，有古庙20余座。当晚，叶剑英、邓发、蔡树藩、张经武等住宿在兴隆山的神庙内。红军尊重当地群众宗教信仰，严格遵守教观纪律，充分体现了红军的优良作风。

红军宿营黑城岔、兴隆山时，马家军三十五师马培清骑兵团已追至河连湾。16日，陕甘支队左右两路军分别从宿营地出发，沿彭德怀建议的行军路线出环县，第一纵队到达定边县木瓜城附近，第二、第三纵队经陕甘苏区华池县的艾蒿掌、铁角城，向定边县白马崾峴前进。至此，陕甘支队已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行军到庆阳北部乔川（今华池境内）时，陕甘支队受到根据地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接待，仅陶村农民秦满库一人就捐献黄米、黑豆6石，牛4头，羊50多只。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时属甘肃庆阳县管辖），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11月3日，驻在甘泉下寺湾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聂洪钧、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于同日召开会议，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

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在庆阳境内行军10天，行程约315公里，胜利到达吴起镇，结束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移，将革命大本营放到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从此，中国革命揭开了崭新一页。

三、陕甘边区迎接中央红军的活动

陕甘边区的党和红军在外有强敌进攻，内有“左”倾错误危害的严酷环境中，孤军奋战，忍辱负重，终于成功地保存了陕甘边区这个“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创造了长征落脚点的地域条件。同时，刘

志丹、习仲勋等在与上级党组织、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领导陕甘边区党和红军积极扩大活动范围，形成一定声势，制造舆论氛围，为沟通与党中央的联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5年7月下旬，在收到甘泉、延安、鄜县教育局和高等学校转来上海中央局印发的"八一宣言"材料中得知中央红军准备北上的消息后，陕甘边区党和红军积极开展了长征红军将要路过地区的群众工作。8月初，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主持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在研究陕甘边区工作的同时，也专门研究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工作。在8月5日通过的《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案》中，对于长征红军行动方向的判断作出了正确的估计，明确提出要高度重视中央红军将要到达地区的工作。

为了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习仲勋、刘志丹等领导陕甘边区各级组织，积极开展根据地恢复工作，摧毁敌人的政权，为红军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扫清了道路。9月，在习仲勋等领导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恢复建立了庆北办事处。9月下旬，华池战区成立，崔凤鸣任党委书记，高生荣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华池战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南梁根据地人民拆碉堡、平战壕，重建家园，迅速消除战争创伤，各乡、村的红色政权都逐步恢复和建立，这对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起到了重大作用。在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地人民甚至将陕甘红军的宣传材料散发到了甘肃南部一带，积极在甘肃敌占区广泛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和陕甘根据地红军胜利的消息，为中央红军在甘肃顺利长征准备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当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境内，当地群众听说来的部队是红军，立即开门迎接，并热情地为红军腾出房屋，置办粮草。

中央红军在庆阳期间，除了在行军中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外，还广泛地宣传党的政策和政治主张，使庆阳人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红军走时将住过的房子、院子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吃了谁家的东西都留下了钱。红军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和优良作风深深影响

和感动了广大人民，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完全信任和拥护。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后，当地群众将这一特大喜讯传遍了整个陕甘边区。赤源县委派了赤卫军大队长赶着牛、羊慰劳中央红军。陕甘晋省委也派人前去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苏区人民全体行动起来，为中央红军碾米磨面，赶制棉衣、棉鞋，保证了中央红军的物资供应。

四、党中央纠正陕甘苏区错误肃反

早在1935年6月，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出的中央驻西北代表团来到陕甘革命根据地，执行"左"倾错误方针。7月15日，在中央驻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西北工委扩大会议在永坪镇召开，决定在根据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开展肃反。9月，中共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事委员会改组后，"陕北肃反"全面展开了。

在"肃反"中，"左"倾错误的执行者采取了"逼、供、信"的手段，造成乱供乱抓，株连无辜。他们先是拘捕在后方工作的西北军委和原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干部，接着将"肃反"扩大到前线。先后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杨森、张秀山、杨琪、张策、刘景范、马文瑞、郭宝珊、蔡子伟、黄罗斌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原陕甘边苏区军队营以上、地方县以上的领导干部和从白区来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被逮捕，200多名党和红军干部惨遭杀害，一些干部被调离重要工作岗位，致使党组织和干部队伍严重削弱，军心动摇，民心不稳；地主、富农乘机煽动反攻倒算，以致保安、定边等苏区发生"反水"情况；加之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未完全粉碎，使陕甘苏区陷于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的当天，中共党员、赤安县六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景全就向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杨尚昆汇报了西北苏区错误"肃反"的有关情况。20日，毛泽东分别接见了定边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玉海和保安县（今志丹县）独立营教导员龚逢

春、赤安县游击队一支队队长张明科。他们向中央汇报了西北根据地"肃反"中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捕、被杀害的情况。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十分震惊，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①]"一切候中央解决"。[②]并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前往下寺湾制止错误"肃反"的发展。

10月28日，中共中央到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下寺湾后，召开工作会议，吸收地方党支部书记以上同志参加。会议决定撤销中央驻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撤销西北军委，成立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和中央民主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承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陕北苏维埃政府。同时决定：张闻天、李维汉、秦邦宪、王首道和董必武先行去瓦窑堡，接管被"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控制的西北军委保卫局，解决错误"肃反"问题。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③]

10月30日，毛泽东等率领陕甘支队继续东进，抵达甘泉县道佐铺，听取了徐海东、程子华等同志的汇报。11月2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了欢迎大会，庆祝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3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常委会议，听取原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负责人关于西北根据地"肃反"及劳山、榆林桥战役情况的汇报。中央决定成立党务委员会，由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王首道、郭洪涛等组成，负责审查陕北苏区的错误"肃反"问题。

11月7日，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刘少奇等率领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着力解决错误"肃反"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过问，参与处理。先期到达的王首道等在瓦窑堡仔细审阅了案卷，经调查研究，证明刘志丹等同志的"罪状"纯属诬陷。中央抵达瓦窑堡的当天即将刘志丹、习仲勋等18名被捕同志先期释放。张闻天、周恩来和

① 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②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0页。

③ 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毛泽东先后接见了刘志丹等同志，并亲切地安慰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①]刘志丹毫无怨言，立即代表全体获释同志感谢党中央的正确处理。他还一再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顾大局，绝对服从中央的调遣，要向中央红军学习。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受迫害的同志都不计个人恩怨，勤恳工作，使西北红军和中央红军兄弟般团结。

11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关于《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中共陕甘晋省委个别领导人在"肃反"工作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11月3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党务委员会作出决定，给在陕北错误"肃反"中犯错误的聂洪钧、戴季英以党纪处分。同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在瓦窑堡召开平反大会，公开宣布刘志丹等无罪，并予以分配工作。

党中央及时制止和纠正"左"倾错误"肃反"，挽救了西北革命的危机，恢复了陕甘根据地的往日生机，这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站稳脚跟，进而保障陕甘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实现以陕甘根据地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方针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直罗镇战役与陕甘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1935年11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领中央红军离开下寺湾，沿洛河川南行。11月6日，到达甘泉以南的象鼻子湾，与刚刚结束张村驿战斗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为了统一领导和指挥在陕北苏区的红军，11月7日，西北军委正式宣布了11月3日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恢复了红一军团建制，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

① 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蒋介石极为不安，调集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以董英斌部4个师为西路，自庆阳、合水出动，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以王以哲部1个师为东路，先由洛川前推，然后经羊泉镇沿葫芦河西进，企图东西合围，围歼红军于葫芦河、洛河之间地区。为粉碎敌人新的进攻，毛泽东、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部，尔后转移兵力，各个歼灭。

11月20日，在飞机的掩护下，敌先头部队第一〇九师兵分三路沿葫芦河谷及南北山地向直罗镇进攻，红军以一部兵力节节抵抗，逐渐将敌诱入直罗镇红军预设的伏击圈。11月21日子夜，红一方面军主力分别由待机位置向敌迂回包围，并于拂晓时突然向敌发起进攻。第一军团从正北和西北方向，进攻直罗镇北山，断敌退路；第十五军团从西南、正南和东南三个方向，进攻直罗镇南山及东南地区，阻敌东逃。激战至14时，敌第一〇九师大部被歼，其残部500余人退入直罗镇东南土寨负隅顽抗。此时，敌东西两路援军已迫近直罗镇。为继续歼敌，红一方面军以少数兵力围困敌第一〇九师残部和阻击西援之敌第一一七师，主力则向西迎击东援之敌第一〇六、一一一师。该两师遭我阻击后，因害怕被歼，于23日纷纷沿葫芦河西撤。红一方面军乘胜追击，在张家湾地区歼敌第一〇六师1个团。被我军包围在直罗镇东南土寨的敌第一〇九师残部待援无望，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24日上午被红军全歼，师长牛元峰被击毙。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

直罗镇战役共歼敌1个师又1个团，俘敌5000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调整其战略部署，为红军积蓄和发展新的战斗力量，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赢得了宝贵时间，也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第三节　中共陕甘省委和关中特委的成立

一、中共陕甘省委的成立

中共中央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在谋划和组织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同时，即着手开展巩固和恢复政权的工作。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简称西北办事处），撤销陕甘晋省，将原来陕北和陕甘边苏区划分为陕北省、陕甘省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区，统一由西北办事处领导。同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两个省委和两个特委的工作。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行政区划调整后，原属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即由陕甘省领导。11月，中共陕甘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在甘泉县下寺湾正式成立，不久又移至鄜县（今富县）套洞塬。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富春，宣传部长李一氓，白区工作部长张策，秘书长曹力如，共青团书记白向银；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生玉（后李生华、朱开铨接任），副主席朱开铨，军事部长肖劲光，裁判部长和土地部长朱开铨，工农检察部长任泽宜，财政部长张慕尧，内务部长马仰西，教育部长王之匀，粮食部长杨玉亭，国民经济部长马锡五，办公室主任杨培源。陕甘省下辖甘洛、鄜县、宜川、红泉、肤施、中宜、华池、庆北8个县，其中位于庆阳的是华池、庆北两县，其余均在陕北。

华池、庆北原属南梁革命根据地，马鸿宾占领南梁后，这里成为游击区，红二十六军和部分干部北上陕北后，留下的同志继续在此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10月，华池战区工作委员会成立，领导苏区的游击战争，并恢复了两个区的苏维埃政权。在庆北苏区，李培福联络失散的游击队员开展游击战争，并于1935年10月恢复了庆北办事

处，李培福任办事处主任。庆北办事处成立后，积极组织开展游击战争，成立了庆北游击队，李培福兼任总指挥，队伍很快由最初成立的12人发展到200余人。同时，还相继恢复了柔远、温台、城壕、悦乐等区政府和群众组织。

1935年11月，陕甘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派原庆北苏区创始人马仰西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回到华池战区指导工作。为加强与庆北苏区的联系，华池战区党政机构先移至二将川的山庄，后迁至武家河，并召开了华池战区工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所有干部迅速深入发动群众，恢复基层组织。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苏区的区、乡政权和党的组织基本得到恢复。1936年4月，陕甘省委决定撤销华池战区与庆北办事处，合并成立庆华县，后改为华池县；成立华池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马仰西任县委书记，高生荣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机关驻地刘坪，下辖白马、林镇、柔远、温台、城壕5个区政府。

二、中共陕甘省委在庆阳的工作

陕甘省委成立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当时的形势，决定把发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做好战勤保障工作作为中心任务。在直罗镇战役中，陕甘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全力以赴支援前线，动员群众坚壁清野，隐藏部队，筹集粮草，还组织了数百人的游击队、担架队，及时护送、转运伤员和物资。

直罗镇战役后，陕甘省委召开了一次省委全体会议。针对党员数量很少，干部十分缺乏的实际情况，省委强调建党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大胆的，猛烈的发展党员，普遍建立支部”。[①] 要求在一个月内发展党员2000名，并将任务分配给各县。同时告诫各县、区在吸收党员时要纠正过去不深入群众、不相信群众、不在群众斗争

① 《关于12月发展党员与建立支部工作》（陕甘临时省委通知第一号），陕西省档案馆3号目录第33卷。

中吸收积极分子入党、考察时间过长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积极在根据地群众中公开吸收党员，并号召各县创建模范党支部。陇东各级党组织根据陕甘省委的通知精神，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了具体的工作计划。凡是有党员的乡村，都以党员为骨干，先建立党的支部或小组，再以此为核心迅速发展党的力量；在没有党员的乡村，则由县委或区委派出党员干部深入乡村，利用各种群众集会，宣传党的主张和党的纲领，从群众中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壮大党的队伍。一些新苏区还派出游击队保护群众利益，铲除欺压群众的恶霸，扩大党的影响。在党组织发动下，陇东各地涌现出不少积极分子，纷纷要求加入党的组织，自愿为保卫红色政权而流血牺牲。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党的力量不断壮大，到1936年初基本达到了每个乡都有党支部的目标。华池县还举办了干部培训班，对党员和干部进行政策教育，以提高干部工作能力。

陕甘省委还大力加强地方武装建设，为巩固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提供了保障。1935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发展陕甘游击战争的决定》指出："游击战争不但为着配合红军主力作战，而且它本身带有创造、巩固与扩大苏区的任务。因此，游击战争在这方面，同红军主力的作用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①]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陕甘省军事部对发展和扩大地方武装做出具体部署。在1935年12月工作计划中，要求全省各独立营总兵力要扩大到2000名（其中关中特区独立营扩大到400名），并为红一方面军扩红320名；要求各县以区为单位建立一支游击队，以中心乡为单位建立游击小组。从1935年12月至1936年初，陕甘省所属陇东各县在原地方武装的基础上，逐步恢复或扩建了合水独立营、庆北游击队、庆阳游击队、华池保卫大队等地方武装，并集中时间进行整训，提高了战斗力。地方武装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打击敌人，如庆北游击队深入到曲子八珠塬一带活动，扩大了红军影响。各县区还组建了许多游击小组，在苏区内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284页。

发挥了惩处敌人、消灭土匪、保卫群众斗争果实的作用。在游击战争和地方武装大发展过程中，由于环境复杂，干部力量薄弱，游击队发展迅猛，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和偏差。一些出身不好、思想不纯的人，甚至是反革命分子混入游击队，导致个别游击队组织不纯，发生了几起叛变事件。陕甘省委和省政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加强了对游击队的整顿和训练，清除了混入游击队的不良分子，进一步密切了同群众的关系，增强了战斗力。为加强对地方武装的统一领导，1936 年 1 月 15 日，陕甘省委作出决定：以后一切地方武装部队行动，改由县委决定，军事部执行。

根据中央有关土地政策的指示，陕甘省委对过去陕甘晋省委采取的一些"左"的土地政策进行了纠正和调整。1935 年 12 月 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提出在苏区当土地革命深入时，应当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对于富农，只取消其封建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而且苏维埃政府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与发展工商业等的自由。[①] 对地主的政策，中央随后也作了调整："对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一律没收，没收之后，仍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地主耕种份地之数量与质量，由当地农民群众多数的意见决定之。"[②]根据中央的土地政策精神，陕甘省委严格掌握政策界限，逐步调整了对地主、富农的政策，纠正了"将地主赶上山去吃草"的"左"倾做法，使富农也愿意发展生产并进行各种工商业活动，减少了工作中的盲目性和偏差的发生，使土地革命适应了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华池、庆北苏区人民在陕甘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下，努力生产自救，迅速消

① 《中央关于改变富农策略的决定》（1935 年 12 月 6 日），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 72 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1936 年 7 月 22 日），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 74 页。

除战争创伤，积极参军参战，大力支援前线，根据地又呈现出兴旺发展的景象。

三、中共关中特委的成立

1934年陕甘革命根据地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在1935年一年时间中，国民党反动派集中兵力对陕甘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围剿”，华池一带几经“围剿”，斗争极为残酷。此时，陕甘边南区尚没有遭受敌人大规模军事进攻，为红色政权的发展提供了机遇。1935年10月，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转变为陕甘边南区苏维埃政府，并陆续建立起新正、新宁、永红、赤水、淳耀等5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共辖19个区的党政组织，还组建了新正、新宁、淳耀等县的独立营。在建党、建政和建立地方武装的基础上，南区根据地还在广大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南区党委还在1935年冬季举办了干部培训班，并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在新正、赤水、淳耀、新宁等县进行土改运动，打击乡村封建势力，满足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1935年11月，中央决定在陕甘边南区成立关中特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并派贾拓夫、习仲勋负责关中特区工作。根据中央指示，贾拓夫、习仲勋于1936年1月下旬来到陕甘边南区，主持召开了关中特区成立大会。大会宣布，陕甘边南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关中特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贾拓夫任关中特区党委书记，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仍由原陕甘边南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副主席张邦英担任，并增补习仲勋为副主席，张德生为组织部长。关中特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驻新正县南邑村。

四、中共关中特委的主要工作

关中特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积极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

教育。贾拓夫向特区的广大干部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纠正了过去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关门主义，并结合消除错误"肃反"的影响教训，教育干部正确认识错误"肃反"的危害。特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还创办了一份油印关中小报，及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反映特区工作情况和经验。在各项工作全面开展的基础上，各级党政组织积极培养并吸收了大批群众积极分子入党，新正、新宁、永红等县党的基层组织有了很大发展。新正县由原来的3个区委发展到6个区委、28个乡党支部。新宁县在原来九岘、金村两个区委、11个乡党支部的基础上，又在湘乐、石鼓一带建立了3个区委、4个乡党支部，党员数量有了很大发展。

为加强主力红军建设，关中特区党委成立了关中军区司令部，江华任司令员，贾拓夫任政委，张邦英任政治部主任，将新宁、新正、淳耀三县的独立营依次改编为关中独立第一、二、三营，统一领导红一团和关中独立第一、二、三营。特区党委和政府还大力加强各县游击队建设，发展和整顿地方武装。新正县又组建了特务队、二支队、三支队、十七支队，新宁县新建了十八支队、二十支队、二十一支队。在地方武装支持下，新宁县苏区不断扩展，1936年3月又开辟了第三区，辖九龙川、石鼓、湘乐、鲁家塬等4个乡级政权。

关中特区在沟通苏区与白区党组织的联系工作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许多从白区到陕甘边根据地或由根据地去白区工作的党员干部，往往经过关中特区，由当地武装人员或秘密交通护送。1936年3月，中共中央派刘少奇从瓦窑堡去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就是经由关中特区化装出去的。王世英等从上海进入陕甘根据地找党中央汇报工作，也是从关中特区进入苏区的。关中特区党委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想方设法，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艰巨任务。

关中特区党委和政府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富农政策的决定》，纠正了前一时期土地革命过程中存在的错误做法。但在纠正过程中，又产生了右的偏差，将部分富农改为中农，将已没收的土地归还原主，使一些农民失去了土地，这种现象在新正、赤水等县比较严

重。特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发现问题后，派出工作组及时纠正了错误，调动了农民春耕生产的积极性。

1936年三、四月间，国民党趁红军主力东征之际，调集东北军6个师的兵力及地方保安队、反动民团，对关中特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红一团和关中独立第一、二、三营与鄜县两个独立营奉命在鄜县杨家塬、套洞塬阻击敌军进攻，掩护关中特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机关安全转移。战斗中，关中独立三营营长卞德荣英勇牺牲。4月，中央决定将独立第一、二、三营合编为关中独立第三团，陈国栋任团长，刘永培任政委，黄超天任参谋长。此后，红一团和关中独立第三团开赴瓦窑堡，担负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光荣任务。

1936年5月，在敌人的重点进攻下，关中特区陷落。根据中央指示，关中特区党政机关决定留下习仲勋、汪锋、林凤岐等少数干部率领游击队依靠群众就地坚持斗争，贾拓夫率关中特区党政机关的大多数干部从新正县向北转移。后习仲勋奉命调离，汪锋等在赤水县的七界石坚持斗争，并组建了关中工作委员会，汪锋任书记。

1936年9月，在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派习仲勋、张策、郭秉坤返回关中特区领导苏区工作。9月下旬，习仲勋在淳耀县槐庄子主持召开会议，恢复了关中特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任特委书记，霍维德任苏维埃政府主席。随后，习仲勋在赤水县七界石主持召开关中特区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决定以县为单位整顿和扩大游击队；成立关中游击队指挥部，郭秉坤任总指挥，习仲勋兼任政委，以统一领导关中游击队；进行统战工作，争取进步和中间的民团、保甲，孤立和打击少数敌人；整顿各地党的工作，健全党的组织生活；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在敌人后方开辟新苏区。

七界石会议是关中特委恢复后一次重要的会议，为关中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制定了正确的政策，使关中地区各项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仅一个月时间，全特区游击队发展到14支500余人。其间，国民党反动派又对关中特区发动了一次"进剿"，但迅速被地方武装击溃。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基本停止了对苏区的军

事行动，关中特委决定以县为单位，组织力量全面出击，10多天时间收复全部苏区，并开辟了新的区域。

中共陕甘省委和中共关中特委是中共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后，为适应革命发展需要，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下成立和开展工作的。中共陕甘省委和中共关中特委成立后，恢复建立基层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吸收和发展党员，补充壮大地方武装，配合反"围剿"斗争，贯彻落实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对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壮大红军力量、加强苏区基层政权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九章　红军西征与中共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第一节　西征红军在曲子、环县

一、西方野战军的组建与西征战役的发起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根据共产国际提出的方针，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不断升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的形势变化，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问题。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代表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大了对东北军、西北军统战工作的力度。同时，对南京方面也在探寻合作渠道。然而，蒋介石集团仍然不放弃"剿共"政策，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周围部署重兵，企图消灭转移到西北的革命力量。面对这种局势，根据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陕甘根据地的军事

任务，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征。东征从1936年2月20日开始，因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顽固阻挠，为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于5月5日结束。东征扩大了红军力量，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

东征中，刘志丹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34岁。刘志丹是陕甘边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西北红军的缔造者。他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革命意志和摧毁黑暗旧世界的信念无比坚定，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才能和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异常险恶的对敌斗争环境中，尤其在"左"倾错误的排挤、打击，以至迫害下，他始终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光明磊落，顾全大局，矢志不渝地维护和捍卫了党和革命的利益，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建立丰功伟绩，深得西北党的干部、红军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他的牺牲是西北革命斗争事业的巨大损失，他的英名和功迹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他永远活在陕甘人民的心中。

东征红军回师陕甘革命根据地后，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反动集团仍坚持"剿共"政策，拒绝议和，调集16个师、3个旅的兵力，继续"进剿"陕甘革命根据地，以其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的1个师2个旅、阎锡山晋绥军1个师又1个旅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协同高桂滋部、井岳秀部的2个师进攻陕甘根据地东北部地区；以东北军的五十七军、六十七军和西北军的三十八军从西南部进犯；以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部驻陕甘边界的定边、惠安堡、环县、庆阳一线，防止红军西进。

为了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围攻，消灭"宁夏二马"，巩固和扩大苏区，打通和苏联间的国际联系，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1936年5月14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召开的党中央负责人及红一、红十五军团干部会议上，决定发起西征战役。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布西征战役命令，

决定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同时要求争取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和一切抗日武装，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随后，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为主组成红军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聂鹤亭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5月19日和20日，红军西方野战军分左、右两路相继从延长、延川地区出发西进。红一军团（左权任军团长兼参谋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为左路军，辖第一师、第二师、第四师及骑兵第二团；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为右路军，辖七十三师、七十五师、七十八师、骑兵第三团及警卫团。左路军经蟠龙、安塞到吴起镇集结，准备攻占陇东地区的环县、曲子。右路军经蟠龙到靖边新城堡集结，准备攻安边、定边。

5月27至28日，右路军从新城堡出发，继续向西北前进，用佯攻宁夏之态势，迫使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部慌忙将三十五师由庆阳、环县抽调回援宁夏，除留下少量兵力布防外，所遗防地暂交东北军接管。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一面电告东北军不要妨碍红军占领环县、曲子和洪德，一面电告西方野战军，令左路军红一军团从吴起镇向西南进至甘肃华池元城，派一部分兵力向庆阳游击，阻击东北军由庆阳北上，但只坚决打击马鸿宾部，不与东北军作战。

二、曲子镇战斗

按照西征总体战略目标，1936年5月底，彭德怀率领的西征军从陕北出发到达环县八珠塬，指挥部设在八珠塬农民李凤存家里，并在此召开了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西征第一仗是夺取曲子镇。5月28日，红一军团以红二师为前卫部队秘密向曲子镇方向运动。为了隐蔽行动，红军采取夜行军和强行军，宿营地和具体任务均不交待明确，每天下午4时出发，第二天9时以前宿营。在发现红军的动向后，国民党西安"围剿"司令部立即调马鸿宾的一〇五、一〇三旅在元城、庆阳、曲子一带堵截，阻拦红军西进。但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

一〇五、一〇三旅属于西北马家军，张学良难以调动，马鸿宾又不在师部，布防之事拖延两天，给红军接近曲子一个有利机会。

6月1日，红二师在师长杨得志、政委肖华的率领下，从庆阳三十里铺、环县八珠塬、胡家南塬向曲子镇进发，构成了对曲子镇的包围态势。曲子镇是庆阳通向宁夏的咽喉要地，国民党环县政府驻地。曲子镇建有土城，方圆不过1公里，城墙高2丈，墙厚6尺许，墙四周有碉堡，还有护城沟深达丈余，易守难攻。国民党驻守曲子镇的部队除马家军三十一师骑兵团外，还有一〇五骑兵旅旅长冶成章及旅部。

红军攻打曲子的部署是：梁兴初的红二团担任主攻，曾国华的红五团担任助攻。战斗从下午开始，经过半小时的激战，红军从东南城角攻入城内，同敌展开巷战。由于红军没有巷战经验和攻入城内的红军兵力有限，在敌人强大的攻势下，红军退出城外。当红军再次发起攻击时，左权和聂荣臻来到阵前，调整部署。红二团首先攻进去一个连，接着后续部队和红五团也攻入城内，将守军残部压缩在几孔石窑内。冶成章身负重伤被活捉，曲子战斗结束，西征红军解放曲子县后，立即组建了曲环工委，习仲勋任工委书记。

曲子镇战斗消灭一〇五旅旅部及骑兵团大部，毙100余人，俘旅长以下15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200余支，迫击炮两门，骡马数十匹，骆驼10余峰，汽车5辆。冶成章等被俘虏后，红军按照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给予特殊优待，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电示左权、聂荣臻等，要求特别优待冶成章，治好伤后送到后方，谈话后即送其回宁夏。对俘获官兵也送回去了二三十人，对回民给以优待。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对冶成章影响很大，他被释放回宁夏后，便脱离了马家军，并对党之后在回民军队中的统一战线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马岭、阜城战斗

在红二师攻打曲子镇的同时，马鸿宾部骑兵一〇五旅二〇九团

第三营由营长马彦章带领，从庆阳出发北上增援冶成章，行至离庆阳县城30多公里的马岭附近，下马休息，埋锅造饭。此时，红一军团四师在师长陈光、政委黄克诚率领下进至附近的东山。在山上，他们发现山下村庄烟雾弥漫，侦察兵报告有敌骑兵活动。红四师令部队利用山地沟壑作掩护，迅速接近村庄。这时马部正准备吃饭，红军对其发起突然袭击，马彦章丢下部队，翻身上马独自逃命。马部乱作一团，有的抛下武器、行李，有的丢下马匹，钻山逃跑。红军俘虏副连长以下40余人，缴获枪炮30余支(门)，还有8峰骆驼。

红二师曲子首战告捷，继续向庆阳县城挺进。庆阳县城是陇东的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红军西征也把庆阳作为重要目标。在红军宿营阜城时，马家军三十五师一〇三旅就在附近的孙家湾子、倪家园子宿营。在阜城发生了一场富有戏剧性的战斗。一方面是红军对打不打一〇三旅意见不一致，聂荣臻认真分析了双方态势后认为要打，打对红军有利，接着便部署部队向倪家园子运动，准备构成包围。另一方面，马家军对打不打红军也犹豫不决。在一〇三旅旅长马玉麟尚未决定之时，一〇五旅二〇九团团长马绍武和一〇三旅二〇六团团长马文清就擅自带着各自的部队进攻红军，一头扎进了红军早已布好的口袋。6月3日，红军主力一、二、四师对进入包围圈的马家军发起攻击，很快将其打乱。敌二〇九、二〇六团向阜城西边的塬上溃退，红军乘胜追击，取得了阜城大捷。这次战斗，敌军除小部分逃脱外，大部被消灭。共俘虏敌官兵1400余名，活捉了敌旅团长；缴获步枪1000余支，轻机关枪10挺，迫击炮数门，骡马数百匹。

红一军团挺进陇东三战三捷，很快控制陇东南北大道，给马家军以沉重打击，为扩大苏区创造了有利条件。面后，红一军团继续挥师西征，6月4日，解放了环县、洪德城等大片地区，接组织通知，6月10日，习仲勋赶赴洪德任环县县委书记。之后，西征野战军进至宁夏七营、清水河一线。右路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下，逐次解放了靖边、定边、安边、盐池等地区，完成了西征第一个阶段的任务，即占领陇

东。截至1936年7月初，经过两个月的作战，西征红军取得了重大胜利，战果辉煌。据统计，共消灭马鸿宾的主力3个团，缴获步枪1500余支，俘敌2000余人；俘虏敌旅长1人，缴获无线电报机2架；扩大抗日红军800余人；筹得抗日基金4.5万余元；新扩了纵横350公里的抗日根据地，占领了定边、花马池、环县、曲子镇、宁条梁、豫旺、同心城、七营等重要城镇，[①]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东西长达500公里，南北宽300余公里，辖县城30余座的陕甘宁苏区，基本上达到了中央"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目标，为全部红军进入陕甘宁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第二节　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与陇东新苏区的开辟

一、中共陕甘宁省委的建立与陇东新苏区的开辟

开辟新苏区，建立革命政权，是西征的重要任务之一。193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为配合红军西征，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行政区划作了重新调整，撤销陕甘省，设立陕甘宁省、陕北省，关中、神府特区。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组织部长罗梓铭，宣传部长李一氓，白区工作部长蔡畅，军事部长萧劲光，青年部长陈时夫，妇女部长李学菁，秘书长左觉农。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锡五；副主席朱开铨，兼任裁判部长和土地部长；秘书长杨培源；财政部长杨玉亭，兼任粮食部长；内务部长王子易；教育部长王之匀；国民经济部长赵耀先；保卫局长郑自兴。陕甘宁省建立的同时，陕甘省

① 《红军胜利统计——西征以来至七月初止》，《红色中华》(1936年7月9日)。

被撤销，陇东境内的华池县划归陕甘宁省管辖，其余陕西境内的6个县归陕北省管辖。

1936年6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庆阳、洪德城线及其东西地区是西方根据地的重心，是镇原以北人口经济条件较好地带，应与一军团一个师及军团政治部一半及陕甘宁红军主力全力负担，亦限七月半完成初步赤化。"[①]根据这一指示，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立即着手扩大根据地。到6月底，陕甘宁省的范围扩大到11个县，在曲子、环县、华池、赤安、赤庆、固北、豫旺、豫海、定边、安边、盐池等县恢复和建立了县级政权，其中陇东境内有7个县。陕甘宁省委相继在上述各县恢复和建立健全了县、区党的组织。

1936年7月，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党政机关从吴起镇刘家渠迁至甘肃省环县河连湾。1937年春，又先后在陇东统一战线区域成立了中共合水、庆阳、驿马关、镇原、宁县5个县委和西峰、固原两个工委，区乡级党的组织也相继建立。

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建立，适应和满足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在随主力红军西征过程中，广泛开辟根据地，建立基层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发展和壮大党员队伍，为巩固和发展陕甘宁边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陇东新苏区各县县委和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陕甘宁省成立后，陇东地方干部即随同红军主力一道西征，积极配合西征红军开展地方工作。红军解放一处地方，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立即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先后建立了曲子县、环县、豫旺县、定环县、豫海县、赤安县、固北县和安边县等苏维埃政权和中共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其中曲子县、环县、定环县、赤安县、固北

①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与甘肃》，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81页。

县在今庆阳市境内。

曲子县县委及苏维埃政府。1936年6月1日曲子解放，2日即宣布成立中共曲子县委，刘昌汉任县委书记，王国荃任组织部长，白彦博任宣传部长，朱子休任军事部长，白凤鸣任妇女部长。接着成立曲子县苏维埃政府，李培福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李生华任副主席，刘益山任内务部长，边廷任财政部长，高兆钧任保卫局长，李天华任粮食部长，徐晓达任土地部长。成立了县游击大队，方振邦任大队长。还建立了八珠、马岭、合道、木钵、土桥、天子、曲子、悦乐8个区基层苏维埃政府，42个乡苏维埃政权和地方党的基层组织，同时建立了曲子、马岭两支游击队，配合政府开展打土豪、分配土地和维持地方社会治安。

环县县委及苏维埃政府。1936年6月，红军西征解放环县，成立中共环县县委，习仲勋任县委书记，王琢章任组织部长，吴仕芳任宣传部长，王三才任军事部长，张又生任统战部长，郝明珠任妇女部长。同时成立县苏维埃政府，由刘占奎任主席，耿汉邦任副主席，蔡士范任内务部长，郭项山任财政部长，拓鼎文任保卫局长。县委县政府机关初设洪德，后迁至杏儿铺。习仲勋在环县县委书记任上尽管只有两个月时间，但在动员群众、建立和巩固地方政权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很快建立了环城、洪德、虎家洞子、山城、黑城岔、郭家塬、马坊塬7个区苏维埃政府。区政府下设乡政府，环城区建立了8个乡政府，6个乡支部；洪德区建立了7个乡政府，3个乡支部；虎家洞子区建立了6个乡政府，6个乡支部；黑城岔区建立了6个乡政府，4个乡支部；马坊塬区建立了4个乡政府，1个乡支部；其他两个区也建立了乡政府和乡支部。

定环县县委及县苏维埃政府。1936年7月，豫旺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刘昌汉任县委书记兼苏维埃政府主席，机关驻甜水堡，下辖8个区。12月，土匪赵老五偷袭了县苏维埃政府驻地，迫使县机关迁至河连湾。次年3月，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撤销豫旺县，成立定环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由原豫旺县委、县苏维埃政府人员

组成，下辖耿湾、山城、塬原、罗儿峁峴4个区。1937年10月定环县撤销，辖区分别划归环县和陕西定边县。

赤安县县委及苏维埃政府。1936年10月成立赤安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慕纯农任县委书记，王幕宁任组织部长，张志明任宣传部长，高文秀任军事部长。县苏维埃政府由陶贵耀任主席，李志明任副主席，张续堂任内务部长，赵文彩任财政部长，杨佐凤任土地部长，李生宾任保卫局长。赤安县地处华池、环县、定边的交界处，县机关设在元城子，下辖6个区。1937年7月赤安县撤销。

固北县县委及苏维埃政府。1936年9月，中共陕甘宁省委在西征红军地方工作团的协助下，于甘肃环县和宁夏固原交界处建立了固北县苏维埃政府。由于干部缺乏，中央组织部临时从中央党校调来陈德政任县委书记，张明珍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建立了毛井区、车道区、庙儿掌区3个苏维埃政府，还有草庙子和二龙山两个游击区，辖12个乡苏维埃政府。1938年春，中共庆环分区党委根据中央关于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为了便于加强领导和开展工作，决定撤销固北县。毛井、车道、庙儿掌三个巩固区并入环县；草庙子、二龙山两个统战区交给设在三岔的中共固原县委领导。

三、党在陇东新苏区的主要工作

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进驻河连湾后，新苏区得到不断发展和扩大。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央组织部在1936年8月中旬就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等给陕甘宁省委发出指示。关于发展党员，要求陕甘宁省委"大量的发展党团员，必须吸收群众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到党里来"。"目前陕甘宁新苏区发展党员的标准，不应苛求政治中表现积极的分子，就是介绍党员最好的对象。对于知识分子以及稍识字的分子，如果是积极参加革命工作的，我们应不疑惧的吸收入党，因为在陕甘宁文化落后的地方，这些分子对我们尤为需要。"关于地

方基层政权，由于陕宁交界的新苏区地域辽阔，人口稀少，要求"区与乡的范围应当缩小，区、乡二级的领导机关的人员亦减少，以少而精为原则。乡的大小，一般的以10里至15里为标准，区的范围一般的以5个乡为宜"。关于如何开展新苏区的工作，首先，要发动新苏区的"积极分子"，使党的每一个组织"都落在群众中有信仰的积极分子的手里"；其次，既要依靠从老苏区来的干部，又要排斥老苏区干部的"自高自大，看不起当地干部的心理，相反地，要具有信任当地干部的信心，和耐心教育和帮助当地干部的精神"。再次，在新苏区开展工作，不能采取"搬家"式的"把老苏区的一套硬放在新苏区里去"，而是要从当地环境出发，"倾听当地干部意见"，才能把新苏区的工作做好[①]。

根据中央组织部的指示精神，中共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于8月下旬在河连湾召开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县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县军事部长和保卫局长。会议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红军的影响，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二是做好打土豪、分田地，摧毁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工作；三是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到达苏区做好物资准备工作。这次会议是在西征战役结束、陕甘宁新苏区开辟和迎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背景下召开的，是陕甘宁省委、苏维埃政府驻河连湾期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推动新苏区的各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按照会议部署，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在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基层政权、搞好统一战线工作、为红军筹粮筹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第一，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基层政权。根据中央组织部的指示精神，陕甘宁省委在新苏区着力培养农村积极分子，发展党的基层组织。中共曲子县八珠区委建立后，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基础上，发展

① 《中央组织部给陕甘省委信》，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形成》，第399—403页。

积极分子李凤存、李万林、刘成福、李生财、李万财等人入党。习仲勋担任环县县委书记后，立即在洪德、环城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党的组织。在斗争中涌现出耿荣昌、耿荣华、杨满洲、杨富川、陈汉平、张德仁、张德禄、张善人等8名积极分子，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2月，中共合水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对外称民众抗日指导委员会），赖传珠任书记；3月，改建为中共合水县委，邹群峰任书记，下辖城关、板桥、西华池、店子、太白5个区委，29个支部，407名党员。同年2月，红十五军团进驻庆阳驿马关后，建立了驿马关中心区委，5月，成立了中共驿马关县委（对外称抗日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史梓铭任书记，下辖文门、马原、王原、桐川、什社、驿马关6个区委，有党员近百人。另外，还建立了豫旺县、定环县、豫海县、赤安县、固北县的基层政权和党的基层组织，截至1937年5月，陕甘宁省有中共党员296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新苏区发展的农村党员。

第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哥老会。哥老会是陕甘宁地区群体最大的民间群众组织，因此，团结哥老会是在陕甘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为了争取哥老会，1936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发布宣言，不仅向哥老会阐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和中国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严峻形势，而且认为"哥老会素以兴汉灭清、打富济贫为宗旨，在辛亥反满的革命运动中，哥老会曾积极参加过，陕北革命亦得到了哥老会同志不少的帮助、拥护与积极参加；如谢子长、刘志丹等诸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这种革命的精神，光荣的事绩，现在更应大大的发挥起来，为了救中国、救自己而奋斗。哥老会历来是代表民族志士及广大农民与劳苦群众的组织"，因此，在国难当头的严峻局势下，"我们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结成亲密的、兄弟般

的团结，共抱义气，共赴国难。”[①]次日，中共中央又指出“目前我们对于哥老会的策略，是在争取哥老会”，“西北地区是哥老会组织比较普遍的地区。因此，在创建西北大联合中，党特别严重的提出争取哥老会的问题”。[②]

党的号召得到根据地哥老会的积极响应。8月26日，陕甘宁省委在环县洪德河连湾召开了庆阳、环县等地的哥老会大爷会议，得到陇东各地哥老会的大力支持，到会的哥老会大爷、兄弟伙80多人，其中有来自西峰、镇原、三岔等白区的代表20余人。马锡五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哥老会的宣言，省委代表报告了目前的形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对哥老会的政策。哥老会大爷代表李荣、西峰镇徐大爷等发言，表明了哥老会的宗旨，以及今后在苏维埃领导下进行抗日工作、发扬过去参加辛亥革命光荣传统的决心。这次会议贯彻了苏维埃政府的宣言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团结了哥老会，使哥老会对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有了更多的了解。华池县的哥老会热烈接受了苏维埃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召开了哥老会大会，并组织了抗日救国会。

第三，组织地方群众，为红军筹粮筹款。1936年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会师后继续北上。为了保证红军的粮食供应，中共中央和西北办事处向陕甘宁省下达了筹集粮食3.3万石（其中1.6万石由军队筹集）的任务。为确保完成任务，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发出了《关于筹集粮食的指示信》，给各县分配任务，定边、盐池5000石，赤安、安边3600石，庆阳3200石，环县2700石，豫旺700石，并要求11月15日完成。[③] 陕甘宁省还成立了“动员委员会”，制定了粮食保管、运输及供给制度，以减少浪费。朱开铨亲

①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0—51页。

② 《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1936年7月16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第53—56页。

③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第404－406页。

自率团在豫旺、下马关发动群众，筹集了大批粮食、蔬菜、麦草和门板等物资，保证了这一任务按期完成，为三个方面军进入苏区和山城堡战役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供应。

中共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驻环县期间，通过李富春、蔡畅、萧劲光、马锡五、赖传珠等艰苦卓绝的工作和斗争，为扩大和巩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建立各级地方政权和革命武装，迎接红二、四方面军进入苏区，促进国共两党团结抗日作出了巨大贡献。山城堡战役后，省委、省苏维埃政府迁到华池元城子，西安事变后迁到曲子镇。1937年9月，根据抗战需要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随之撤销，其所辖地区划分为三边分区和庆环分区。定边、安边、盐池属三边分区；华池、曲子、环县、固北、定环属庆环分区。至此，陕甘宁省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四、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三科进驻环县

1936年，中国的政治形势正处在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重要关头。在这革命转变的关键时刻，加强学习教育和干部训练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任务。1936年4月，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抗日军政干部，党中央决定将1933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国红军大学"继续办下去（"中国红军大学"在长征时为陈赓、宋任穷同志率领的干部团；长征到达陕北后，改为红军学校）。

6月1日，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中梁山上闾家大院创办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随即改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简称"红大"），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罗瑞卿任教育长。下设3个科：第一科主要训练红军团以上干部；第二科主要训练营连级干部；第三科主要训练排班级干部。校部设在瓦窑堡，一、二科驻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又称一校；三科驻环县木钵，又称二校，对外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中央教导师。

中央教导师师长周昆，政委袁国平，教育长郭化若，政治部主任罗贵波，参谋长任质斌（当时对外身份是宣传科长兼民运科长），训练部长苏进。下辖四个团：第一团团长杨伯征，政治委员廖海光；第二团团长皮定钧，政治委员黄骅；第三团团长黄彦斌，政治委员黄欧东；特务团团长韦国清，政治委员陈仁麒。共有学员800多人，编为3个团。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二、四方面军的两个军事学校都合并到红大三科，遂改为4个团的编制。红大三科建校木钵时，红军西征刚解放了这里，地方政权尚未建立，股匪流窜乡里，木钵至庆阳还驻有东北军。因此，红大三科的任务是：一、学习、训练；二、维护社会治安，宣传发动群众，帮助建立健全地方政权；三、防止南线东北军进犯，并与之逐步接触，开展统战工作[①]。红大三科学员都是班排基层干部，"工农出身的占绝大多数，文化程度较低，其中还有不少文盲和半文盲"，因此，文化知识学习是三科的主要任务之一。毛泽东曾给红大校长林彪写信指出："三科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12月，红大三科第一期学员如期完成学习任务毕业了。[②]

西安事变后，驻庆阳城的东北军撤离了，红军中央教导师遂离开木钵迁往庆阳县城。陕甘宁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蔡畅率工作团也到庆阳城。工作团的任务是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扩大红军影响，发动群众起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建立党的组织和民众武装，开展反霸斗争。教导师的任务是完成自身训练学习任务，配合工作团开展工作，维护地方社会秩序，打击地方土豪劣绅，向国民党政府及其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红大三科在环县木钵办学校近半年时间，不仅锻炼提高了学员的综合素质，而且为清剿地方匪患、维护社会治安，开展统战工作，保护陕甘宁根据革命根据地西大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①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第13页。

② 李志民：《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之一）》，《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3页。

五、陕甘宁独立师的组建及主要战斗

陕甘宁省初建不久，新区工作刚刚开展，加之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处，敌情、社情都十分复杂。土匪张廷芝、赵老五、耿天海等在这一带活动多年，武器、马匹都相对较好，其手下的匪徒又多是一些亡命之徒。陇东新苏区创建以来，土匪武装及其他国民党地方武装经常对苏区进行袭扰。他们破坏乡村红色政权，残害人民，屠杀党员干部，闹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因此，组建一支坚强的地方武装，以配合和协助西方野战军西征作战，清剿土匪，保卫陇东新苏区的安全，就成了一大紧迫任务。陕甘宁省在西征主力红军的协助下，于1936年7月17日在曲子县花旗镇，以原陕甘宁苏区地方红军武装为基础，正式组建了陕甘宁独立师，由姚喆任师长，黎林任政治委员。陕甘宁独立师归属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萧劲光，政委赖传珠）领导与指挥，下辖4个团，每个团3个连，全师共有1300多人。12月，独立师指挥机关撤销，各团统归省委军事部指挥，改名为陕甘宁省独立第一、二、三、四团。

陕甘宁独立师第一团由红二十九军二五七团改编，团长杨瑞森，政委刘禄昌。二五七团原是由富县独立一营和独立二营的一个连合编而成的。独立一营是1933年11月下旬红二十六军在南梁建立的保安游击队发展起来的。这个游击队有180余人，战斗力比较强。独立二营是原富县游击队、甘泉游击队合编的。这两个营合编为二五七团后驻守劳山一带，阻止东北军向瓦窑堡的进攻。中共中央迁驻保安后，该团又在保安一带担任保卫党中央的任务。改编为陕甘宁独立师第一团后，主要随师部在陇东唐家台子、三岔、马岭一带活动，阻止东北军进犯，防范和剿灭地方股匪赵老五部。

陕甘宁独立师第二团是以中宜独立营为基础，并抽调洛川游击队、中宜游击队等地方武装组建而成。团长朱日亮，政委刘英。第二团成立后，由中宜地区开赴甘肃环县、固北作战。该团当时是陕甘宁

省委军事部的直属部队，归省委军事部直接指挥。在陕甘宁省委军事部副部长（兼政委）赖传珠的直接率领下，主要驻防三边一带。

陕甘宁独立师第三团由关中独立三团改编而成，团长陈国栋，政委初定为张仲良，后由刘永培担任。1936 年 4 月，新正独立营、新宁独立营、淳耀独立营等 5 个营合编为关中独立三团，4 月开赴曲子，主要以游击的形式参加剿匪作战。7 月，改编为陕甘宁独立师第三团，进驻三岔、马渠一带协助地方干部开辟新苏区。

陕甘宁独立师第四团由华池独立营及庆环、庆合游击队组成，团长黄克秀，政委任昌辉，下辖 3 个连。第四团组建后，进驻曲子一带开展剿匪斗争，主要任务是清剿散匪，警戒国民党军队向苏区的进攻。

陕甘宁独立师刚组建时，武器装备很差，弹药奇缺，条件十分艰苦。各团在装备上都差不多，每人一支步枪，五六十发子弹，两个手榴弹。连以上干部有驳壳枪，团以上干部有手枪。每连配备一挺机枪，部队统一军装。政治生活也比较正规，政治课主要讲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阶级斗争理论及党当前工作的形势和任务等。军事课主要是军事技术。

陕甘宁独立师成立以后，各部分别在陇东的曲子、环县、固原（现属宁夏）一带活动。第一团主要驻防并活动于曲子、三岔一带，开展剿灭赵老五等土匪武装的活动。当时，环县、曲子境内共有十余股土匪，其中赵老五股匪约 100 余人，该匪投靠国民党环县政府，作恶多端，为害最烈，经常袭击曲子、环县等地的县、乡苏维埃政权，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1936 年 11 月，赵老五率匪徒百余名流窜至马岭一带抢劫。第一团接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报告后，立即赶往清剿。在红军的坚决打击下，赵匪仓皇逃窜。第一团紧追不舍，在追击中将赵匪歼灭大半。团政委刘禄昌在追击赵匪的战斗中牺牲，由张明科接任团政委，并将保安县独立营编入第一团。此后，第一团移住三岔一带，相机打击敌人；12 月，第一团在三岔铁王山再次与赵老五土匪武装展开激战。因敌占据了有利地形，第一团几次强攻未克，遂

改变战术，由团长杨瑞森指挥部队正面佯攻，由政委张明科带领骑兵分队迂回到敌人背后发起猛烈攻击。在第一团的前后夹击下，赵老五土匪溃散逃窜，战斗胜利结束。战斗中，团长杨瑞森牺牲，陕甘宁省委军事部派汪祖美接任团长。

陕甘宁独立师第二团在陕甘宁省委军事部副部长兼政委赖传珠的直接率领下，驻防于靖边、定边、安边一带，开展剿匪斗争。此处曾经是陕北军阀高双城长期盘踞的地方。红军解放这一地区后，这里仍然流窜着高双城的一个骑兵营及国民党保安队、地方民团1000余人的武装。这些反动武装经常袭扰苏区党政机关，蹂躏无辜百姓，气焰十分嚣张。8月，独立师第二团在安边、定边交界的韩家渠与敌展开激战，敌人凭借兵力众多，弹药充足的优势，向独立第二团发动疯狂进攻。独立第二团利用险要地形，沉着应战，打退敌人多次冲锋。后因弹药告罄，只好沿山坡边打边撤。敌人见势愈加疯狂，穷追不舍。紧要关头，红三十军及时赶来增援，独立师第二团士气大振，立即向敌人发起冲锋，毙伤敌人400余人，残敌仓皇逃窜。这次战斗，独立第二团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伤亡100余人，团政委刘英负重伤，陕甘宁省委军事部派牛书申接替政委职务。完成这次歼敌任务后，独立师第二团返回环县，又参加了剿灭耿天海、赵老五匪部的战斗。9月上旬，独立师第二团在石家台歼灭耿天海匪帮，夺取了其据守的寨子；11月，又参加了山城堡战役。在此前后，独立师第二团在庆阳、环县、木钵地区积极与进攻苏区的东北军作战，阻止了东北军的推进。

陕甘宁独立师第三团接受改编后，在环县、曲子一带开展剿匪斗争。1936年秋，独立师第三团开赴镇原马渠和三岔一带，协助地方政府开辟新根据地。当时马渠的沈家寨据点是一个硬钉子，驻有敌民团武装50余人，团总是当地有名的恶霸，对新苏区威胁极大。9月，陕甘宁独立师师长姚喆亲自来到第三团驻地，指挥部队作战。第三团包围沈家寨后，敌负隅顽抗。第三团围攻三昼夜，最后用架云梯的办法攻破寨子，但土豪劣绅及民团团丁已从地道逃跑了。第三团缴

获银元、元宝一驮，粮食100石，还有许多布匹和衣服，补充了部队给养，基本解决了全团3个连的冬衣问题。战斗中没收的牛羊分给了当地贫苦群众。攻克沈家寨后，第三团在毛井、黑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这一带地域辽阔，人烟稀少，条件异常艰苦，尤其是吃水很困难，第三团克服困难，坚持斗争。不久，东北军3个团前来"围剿"第三团。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第三团撤至曲子，后又转移到木钵；东北军步步进逼，第三团边退边阻击敌人。在此前后，第三团还承担了收容掉队的长征红军战士的任务，先后收容掉队的长征红军战士500余人。

陕甘宁独立师第四团组建后，先随独立师师部在曲子镇附近驻防，清剿土匪，担任警戒任务。1937年7月18日，土匪张廷芝部进犯陇东苏区，红四团在团长黄克秀的率领下，投入了剿除这股土匪的战斗，给来犯的敌人以迎头痛击。二将川一仗，红四团旗开得胜，击毙敌团长李向银。7月20日，张廷芝土匪武装败逃华池县老爷岭一带，凭借天然屏障，据险抵抗。适值大雨倾盆，黄克秀命令第四团冒雨冲锋，连续突破敌人四道防线，当攻击第五道防线时，由于敌人居高临下，以密集火力封锁道路，第四团屡次冲锋都不奏效。在团长黄克秀的率领下，第四团战士毫不退缩，奋勇冲杀。战斗中，年仅27岁的黄克秀腹部中弹壮烈牺牲，参谋长何家流也血染疆场。黄克秀和何家流牺牲后，红四团指战员满怀悲愤，又向敌发起猛攻，并将敌包围在山上。穷途末路的张廷芝设假投降的骗局派人谈判。谈判中，张廷芝乘机潜逃。后来，陕甘宁省委军事部研究决定，由罗得胜接任第四团团长。

陕甘宁独立师的剿匪斗争，对于保卫陇东新苏区的红色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陕甘宁独立师的打击下，这一带的小股民团和土匪多数被消灭，大股顽匪虽未被彻底剿除，但都受到有效打击，其气焰也大大收敛。剿匪战斗中，由于条件非常艰苦，陕甘宁独立师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第一团团长杨瑞森、政委刘禄昌，第四团团长黄克秀、参谋长何家流等4名团级干部牺

牲，第二团政委刘英负重伤，连排干部和战士的伤亡也很严重。陕甘宁独立师经过战火的洗礼，愈战愈强。抗日战争开始后，陕甘宁独立师一、二、四团被改编为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三八五旅警备第七团，陕甘宁独立师第三团被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辎重营，继续驻守陇东，后来在反磨擦战斗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解放战争中又为解放大西北立下了不朽战功。

第三节　山城堡战役

一、红一、二、四方面军集结陇东新苏区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静宁、会宁会师后，中央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决定一面以部分兵力逼向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并在行进中拖延时间，争取控制西兰大道；一面迅速集中红一、四方面军主力进占黄河以西有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的各个战略要点，并于11月10日以前完成攻打宁夏的一切准备。宁夏战役的意图是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向北发展，在西兰大道以北、黄河以东、同心以南、环县以西消灭来犯的国民党军队，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作为宁夏战役的第一步，中央决定实施海（源）打（拉池）战役，由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一军正面阻击尾追之敌王钧部，红一方面军从其侧后进攻，将敌消灭在打拉池一带。但由于张国焘的干扰，失去了战机，宁夏战役计划落空。

1936年11月8日，鉴于敌情快速变化，中共中央提出新的战略计划，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均移至同心、环县一带待机。11月15日，根据胡宗南第一军加紧进攻，已进至豫旺堡地区的情况，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再次指示，"敌继续向我进攻，目前

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于统一战线。”[①]彭德怀在给各部首长的指示中也明确提出：“敌胡（宗南）、王（均）、王（以哲）有分三路向东追击可能”，“豫旺县豫旺堡以东山城堡、环县、毛居井地域人烟稀少，土寨亦多，地图与实地多不符，极有利于我军作战。我们应在上述区域威胁该敌二、三个师。”[②]据此，彭德怀命令少量部队担任诱敌任务，其他各部分别按照指定路线向该地区集中。中央同意了彭德怀的作战计划，并在复电中指示：“我军应于豫旺、洪德城间各个击破该敌，不击破则不能南进，因敌将继续穷追。”部署“一、四、十五、三十一共四个军，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靠近，集中全力准备打一仗，消灭敌之北路纵队。二方面军到环县附近休息，准备作打第二仗主力。”为集中指挥作战，军委主席团指令：“各兵团作战由彭德怀指挥之”[③]。中革军委还决定，集中主力打击追击速度最快的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军。对东北军则继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东北军参加抗日阵线。根据中革军委指示，彭德怀选定位于环县以北的山城堡为战场，寻机歼敌。

11月16日，红军各部开始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结。红一方面军向环县北部山城堡方向运动，红四军、三十一军向萌城、甜水堡方向运动。17日，敌中路第二旅在萌城被红四军、三十一军击溃，伤亡600余人，一架敌机被击落。此役大大迟滞了国民党军的疯狂追击，使其他红军从容进入山城堡地区。

二、山城堡战役

1936年11月18日，毛泽东、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朱德、周恩

①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铁流汇陇原》，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427页。

② 《彭德怀致各首长并朱、张、毛、周电》（1936年11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63页。

③ 《中央军委主席团关于我军在豫旺堡、洪德城消灭敌军及作战部署的指示》（1936年11月15日），《三军大会师》（下），第648页。

来、贺龙联合发出《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指示"各首长务须以最坚决的决心，最负责的忠实与最吃苦耐心的意志去执行，而且要谆谆告诉下级首长转告于全体战斗员，每人都照着你们的决心、忠忱与意志，服从命令，英勇作战"，"我们一定要不怕疲劳，要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械，粉碎这一进攻，开展新的局面，以作三个方面军会合于西北苏区的第一个赠献给胜利的全苏区的人民的礼物"。[①] 这个动员令对鼓舞红军将士的士气起了重要作用。

为吸取宁夏战役计划落空的教训，保证山城堡战役的顺利进行，11月18日晚，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连夜赶到洪德河连湾，代表中共中央欢迎和慰问红二、四方面军，并协助彭德怀指挥山城堡战役。19日，前敌总指挥部召开会议，周恩来与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等会面，协调各方面军作战，并对这次战役做了部署：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四、第三十一军在山城堡之东、南、北地区隐蔽，担任主攻任务，十五军团以小部分诱敌深入；红二方面军主力在山城堡和洪德城之间的水头堡集结，准备策应各方；第二十八军在红井子一带钳制敌左路军第一旅；二方面军六军及一方面军八十一师、特务团、教导营，在洪德城、环县城以西地区，迟滞东北军；陕甘宁独立师在环县城以北八里铺打阻击。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山城堡东南吕家湾。

11月20日，胡宗南部左路第一旅进占红井子，第九十七师跟进至大水坑；敌中路第一师第二旅撤回豫旺县城休整，第四十三师接替第一师向保牛堡推进；敌右路第七十八师推进至山城堡、小台子、风台堡等地，进入了红军的伏击圈。傍晚，胡宗南部七十八师的二三二、二三四旅进入山城堡红军伏击圈。21日下午2时，红军对山城堡之敌形成包围态势。随即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向山城堡发起攻击。当日黄昏，敌人开始向山城堡以北曹家阳台一带撤退，红军乘机发起总攻。红一军团一、四师一举攻占敌

① 《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1936年11月18日)，《三军大会师》(下)，第651页。

前沿阵地马掌子山、山城堡内，并歼灭了哨马营之敌，敌军顿时全线溃退。红军发挥近战、夜战优势，大胆穿插，分割消灭敌人，并对逃跑之敌实施追击，将溃敌大部压迫于山城堡西北山谷中。与此同时，向盐池、定边方向进攻之敌，也被红二十八军击溃。经过一昼夜激战，敌大部被歼。

山城堡战役共歼灭胡宗南部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和二三四旅两个团，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装备物资。23日午后，红军在山城堡旧庙里由杨尚昆主持举行了"庆祝山城堡决战伟大胜利大会"。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左权、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徐海东、程子华等领导参加。朱德、彭德怀、贺龙分别讲话。朱德在讲话中说："三大红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长征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在这次战役中，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彭瑞珍、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政委陈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二七九团团长高廷成等壮烈牺牲。

三、山城堡战役的意义

山城堡战役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打的第一个歼灭战，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邓小平、左权、杨尚昆、李富春、徐海东、黄克诚、萧劲光、陈赓、罗瑞卿、王震、邓华、刘亚楼等等20多位党政军主要领导同志都参与了这次战役。山城堡战役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与广大红军将士努力作战分不开的，也是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诱敌深入"军事战略思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是陇东苏区人民全力支援的结果。为保证山城堡战役取得胜利，红军一进入山城堡地区，当地群众就把自家的窑洞腾出来让红军住，锅让出来给红军做饭，水窖也让出来供红军饮用，还给红军送去了粮食、银元、牲口，派熟悉地形的群众担任向导。

甜水堡附近的群众慰问粮食20石，羊100多只、银元300块；曲子县八珠区赶运粮食50多驮；环县、固北县派出100多人为红军带路。战后，当地群众又积极配合红军打扫战场，抬运护理伤员[①]。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巩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会师后的红军休整和重整力量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山城堡战役结束仅20天，即1936年12月12日，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全面抗战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第四节　红军主力部队驻防陇东和奔赴抗日前线

一、红一方面军进驻陇东

山城堡战役结束后，红军各部均在陕甘宁边境的盐池、定边、环县之间休整待命。西安事变发生后，为了支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粉碎何应钦"讨伐军"的进攻，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红二方面军第二军、第六军，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由定边、环县地区南下，经庆阳、合水、宁县、正宁，进至蓝田、商县以南，协同东北军、十七路军防御敌东路集团军，力求歼其大部或一部；红二十八军、红三十二军、陕甘宁独立师，在环县附近牵制敌第一军；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在定边、盐池、吴起警戒宁夏之敌；红八十一师（后恢复红二十七军番号）东进延安。

①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第12页。

红军南下途中，曾经今天的庆城、合水、宁县、正宁等地，并短暂驻防。彭德怀和左权曾率前敌总指挥及所属部队经南义，于1936年12月25日到达宁县城。国民党县长王序宾亲笔书写"欢迎赴陕与张、杨两将军助力的千辛万苦的彭总指挥"等标语，组织夹道欢迎。我军战士在城关张贴抗日标语，高喊抗日口号，向欢迎群众宣传抗日道理。彭德怀与王序宾专门谈话一小时许，重申中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方针，勉励其为合作抗日尽心。第二天离去后，王即将宁县自卫队改为"西北抗日联军第一支队三营八连"，并在训话中称彭德怀率领的是抗日的部队。

12月26日，红军主力进至庆阳、正宁地区时，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敌东路集团军由潼关东撤，红军即在该地休整待命。但是，蒋介石被释放后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并指使其部队对西安进行军事压迫，以东线10个师、西南和西北线15个师向西安合围。1937年1月，国民党中央军重新进逼西安。1月5日，杨虎城领衔在西安发表通电，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和企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1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坚决要求南京政府立即下令停止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方高级将领在杨虎城的主持下，共同协商并拟定了具体的作战方案。红一军团主力奉命进至淳化、三原、耀县地区布防，红十五军团进至西安东南地区，红二十八军、红三十二军进至崇信、灵台地区，红二十七军（即八十一师）进驻洛川，准备支援东北军、十七路军作战。

由于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做了对付蒋介石"讨伐军"进攻的准备，加上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和杨虎城卓有成效的努力，以及国内外舆论压力，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从而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1937年2月初，进至淳化、耀县、三原一线的红一军团返回正宁、宁县以及旬邑一带驻防，军团司令部驻正宁宫河镇（时属宁县）北头村，政治部驻王录村，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住农户王度家，后勤部驻核桃峪；第一师驻正宁罗川春场村，所辖一团驻山河镇，三团驻罗川高

家台村，十三团驻代家店村；第二师驻宁县早胜镇，所辖五团驻中村，六团驻新庄；第四师驻旬邑县境内。不久，进至商县地区的红十五军团也返回陇东，进驻庆阳和西峰之间的驿马关一带，军团部驻驿马关，直属骑兵团驻庆阳桐川一带，七十三师驻西峰什社，七十五师驻镇原孟坝镇，七十八师驻彭原义门村。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在陇东开展了大量的扩红、补给、筹粮、整训等一系列战备工作。

当时，西峰镇是国民党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为甘肃地方军阀鲁大昌所盘踞，红军未能进驻，但红十五军团的驻防分布实际上对西峰构成了包围态势。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1937 年 8 月 6 日，中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全军集中到陕西三原、富平、泾阳地区，整装待命，并进行改编，做好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准备工作。8 月上旬，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奉命先后离开正宁、宁县，开赴陕西三原、富平参加改编。8 月 25 日，中央军委将红一军团、十五军团及陕南七十四师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其中第十五军团骑兵团编入一二九师）后，奔赴抗日前线作战。

二、红军援西军进驻陇东

1936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及四方面军直属机关和直属部队也先后渡过黄河，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的部署。因计划落空，西渡黄河的军队因国民党重兵阻拦无法返回，11 月 11 日，中央批准渡河部队请求，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为军政委员会主席、总指挥徐向前为副主席，组成西路军，向西打通国际通道。此后，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遭到马步青、马步芳 10 万军队的“围剿”，激战古浪、永昌、山丹、临泽、高台等地，节节失利。

1937 年 2 月 27 日，中央军委为了接应救援西路军，决定组成“援西军”急速西进。援西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左权

(后改为李达)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军:红四军,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红三十一军,军长萧克,政治委员周纯全;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袁任远;军直属骑兵一团,团长孔令甫,政治委员高锦纯。援西军组建后,立即由陕西淳化、三原地区出发,于3月中旬到达镇原、固原一线。这时,西路军彻底失败,援西军再继续西进已无意义,中央军委指示援西军就地驻防,一面收容和营救西路军失散返回以及被俘人员,一面加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补充物资,开展地方工作。援西军在镇原的驻防大致是:司令部和随营学校驻镇原县城,红四军驻屯字镇,红二十八军驻开边,红三十一军驻平泉、中原、新城,红三十二军和骑兵团分驻三岔、太平、孟坝、马渠一带。

援西军驻防镇原期间,首先尽最大的努力救援收容西路军战士。镇原位于西(安)兰(州)公路北侧,南面就是靠近西兰公路的平凉和泾川。援西军利用驻防地的地理优势,一方面在县城及平泉、中原、新城设立秘密接待站,一方面由政治部派出大批人员分散活动在泾川、平凉、固原和西兰公路沿线,设法收容失散的西路军人员,并书写和张贴了许多标语、通告,向失散人员指示联系红军的路线和地点。在援西军的帮助下,西路军许多失散人员经由镇原回到了延安。从河西化装只身返回的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就是途经镇原然后回到党中央所在地吴起镇的。

援西军规模最大的一次救援活动是1937年5月的平凉救援。当时,国民党军队九十八师派一个营将被关押在兰州的1300多名被俘西路军战士分军官队(130多人)和士兵队(1200人)押往西安。援西军侦得详情后,准备在平凉至四十里铺相机营救。援西军派出人员装扮成卖茶水的、卖"锅盔"馍的、赶脚的,分布在平凉至四十里铺沿线,把联络信号夹在"锅盔"馍里,与被押的军官队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被俘官兵又互相传送消息,约定在四十里铺分散逃奔镇原。当晚恰巧遇上风雨交加天气,军官队和士兵队的人员在援西军联络人员带领下,有400多名官兵逃出四十里铺回到镇原。援西军前后

共救援和收容西路军官兵1000余人。对于归来的西路军人员，援西军非常关心，刘伯承、张浩、宋任穷等首长亲自接见并经常去看望和慰问。在援西军的照顾下，归来人员理发、洗澡、换衣服、调剂和改善生活，体力得到很快恢复。同时，援西军政治部遵照中央指示，迅速进行审查甄别，除了个别确有叛变行为者外，一律予以信任，很快恢复了党的生活，重新分配了工作。

援西军驻防镇原期间，还开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使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得到了较大提高。1937年3月31日，中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在全党和全军中展开了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4月，中央委派任弼时到镇原，向援西军正式传达了中央的决定。援西军中的大部分官兵如红四军原属于红四方面军，而张国焘的错误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影响是很深的，因此，在援西军中深入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使广大官兵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划清界线，成为援西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在中央作出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后，援西军就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开始部署动员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在批判运动中，刘伯承等援西军领导人严格坚持把张国焘错误路线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区分开来。开始有些同志思想转不过来，就采取正面教育，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使这些同志在思想上逐渐认识到张国焘的错误和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损失。在学习批判运动中，采取和风细雨的说服教育，通过讨论、谈心等办法，使同志们的思想觉悟有了较大提高。红四军还写了《四五六三个月四军政治工作状况的报告》的总结，跟张国焘错误路线划清了界线。在开展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刘伯承还加强了军队的整顿和军事素质的提高。

援西军在镇原期间，国共合作已成大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援西军广泛开展了民众运动，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提出了“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团结抗日”的口号，得到镇原人民的广泛响应。为了搞好民众运动，援西军设了民运工作部，帮助地方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党员，在平泉、中原、新城建立了党

的基层组织，为镇原县委的建立和成立镇原县抗日民主政府创造了条件。民运工作部还召开了全县抗日民众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镇原县抗日救国联合会，贾联瑞任主任，各区乡都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在援西军的号召下，镇原县民众积极为抗日救国捐献物资。红四军在屯字整训的5个月中，当地民众向部队捐献小麦2000多石，糜子1000多石，还有草、料、骡、马等。园孟村的孟耀祖把家里的碉堡让出来做军部，又将周围40亩耕地让出来供部队做操练场，还捐献小麦500多石。为表彰其抗日爱国精神，孟耀祖的父亲去世后，第四军军长陈再道亲笔写了碑文；红军开赴抗日前线时，陈再道代表第四军给孟耀祖赠匾两面，一面书写“爱国可亲”，一面书写“民族先锋”。白把村的段乾元，是个骨科医生，陈再道和耿飚住在他家，对他的教育影响很大，他积极为红军伤病员诊病治疗，并捐献小麦50石。红军开赴抗日前线时，陈再道给段乾元赠“民族先锋”匾一面。开城乡（今属宁夏固原）张村张天和，给红军捐献小麦250石，活猪2头，上肖乡西岭村邢殿元，给红军捐献小麦30石，糜子10多石，麦草10万多斤，马1匹。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支援了红军，也表现出红军和庆阳人民的鱼水之情。

1937年7月底，援西军司令部在镇原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刘伯承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宣布取消援西军，部队立即开赴三原接受改编。8月，援西军离开镇原开赴三原，途径西峰肖金、宁县、旬邑、淳化等地，于8月下旬到达泾阳县桥底镇，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奔赴抗日前线。援西军改编后，在镇原县设立了“援西军驻镇原留守处”（对内称中共镇原县委），后改为“八路军一二九师驻镇原办事处”，主要负责指导帮助当地民众救亡运动和后方动员事宜，代表一二九师对外接洽以及收容西路军失去联络的官兵，并开展与国民党镇原驻军的联络工作。

三、红军中央教导师在庆阳的活动

1936年6月红军中央教导师进驻木钵时，曲子一带刚刚在西征

战役中解放，地方政权尚未建立，股匪流窜乡里，袭击地方干部和红军，抢劫人民群众的财产，扰乱社会治安，妄图颠覆新苏区的人民政权。在木钵以南的马岭、庆阳一线还驻有东北军。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中央教导师担负三项重要任务：一、学习训练；二、维护社会治安，肃清匪患，宣传发动群众，帮助建立健全地方政权；三、防止南线东北军进犯，并与之接触，开展统战工作。由于中央教导师同时又是抗大第三科，所以教学工作是其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毛泽东曾给"红大"校长林彪写信指出，三科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在教育和训练工作中，中央教导师按照"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以政治与军事并重、文化学习与军事训练并重的原则，积极开展教学活动。学习内容有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中国革命问题、抗日游击战争和一般军事常识等。在教育中特别重视政治思想教育，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边学习，边战斗，边劳动。中央教导师在完成培训干部任务的同时，还注意开展地方工作，广泛发动和团结各阶层群众，为陇东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西安事变后，驻庆阳的东北军一〇九师撤往西安，中央教导师遂离开木钵迁往庆阳接防。1937年春，中央教导师与红二、四方面军的两个随营学校合并组成抗大第二校，3月改称"抗大步兵学校"，对外仍称红军中央教导师，学员扩大到1400余人，多系红军中的班、排干部。学校主要领导人员未动，师部设在庆阳城内"永茂隆"商号院内。中央教导师迁到庆阳不久，陕甘宁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蔡畅率一个工作团也到了庆阳城。工作团的任务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红军影响，发动群众起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建立党的组织和民众武装，开展反霸斗争；中央教导师的任务是完成自身训练学习任务，配合工作团开展工作，维护地方社会秩序，打击地方土豪劣绅，向国民党政府及其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在省委工作团、中央教导师的组织和领导下，庆阳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省委工作团和中央教导师的主持下，通过宣传发动使群众逐渐觉醒之后，以庆城为中心的各界抗日救国会组织相继成立，包括青年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商人救国会、教育界救国会等。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庆阳县各界救国联合会，陆为公任主任，其职责是负责领导各界救国会的工作。在抗日民主政权未建立之前，各界救国联合会实际上起着行政部门的职能作用，是代表老百姓说话的地方政权组织，老百姓有事不再找国民党衙门，而是找救国会，救国会也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在建立群众组织的基础上，省委工作团和红军教导师筹建了庆阳县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对内称中共庆阳县工委），蔡畅任书记，陈时夫任组织部部长，赖传珠任军事部部长。工委成立后直接领导庆阳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工作。

中央教导师和工委直接领导了庆阳人民的"反冯灭霸"斗争。庆阳当时有八个大富豪，被称之为庆阳"八大家"。"八大家"不仅在庆城开有商号，在农村占有数千顷良田剥削农民，而且和官府相勾结，在政治上欺压老百姓。"八大家"之首冯翊清作恶多端，百姓十分痛恨。为了打击恶霸势力，中央教导师和工委决定发动群众开展"反冯灭霸"斗争。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反冯斗争既要打击地主恶霸势力，又要有利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所以，中央教导师和工委对"反冯灭霸"斗争进行了极为严密的部署：一是组织各界救国会整理揭发冯翊清贪污赈济款的罪行材料；二是培养好积极分子；三是利用中小地主、绅士同冯翊清的矛盾，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发动这股力量起来反对冯翊清。救国会把冯翊清等人的罪证材料送到师部、工委、国民党各级政府，控告冯翊清等人的罪状。

罪证确凿后，中央教导师迅速抓了冯翊清，并向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西峰专员公署和国民党庆阳驻军发了通电，还向社会散发了大批传单，把冯的罪行宣传得家喻户晓。冯氏家族的罪恶主要是：1、破坏抗日运动，破坏统一战线；2、贪污赈款，剥削灾民；3、勾结军队，虐掠商绅；4、依持权势，迫害乡民；5、假借公名，放赌抽利；6、破坏红军军誉，图谋不轨。公布冯翊清及其儿子冯墨、冯荣等人的罪状

后，在1937年4月14日召开了有300多人参加的声讨大会。5月6日在新城街口正式审判冯家父子。会场上悬挂国共两党党旗，审判会由国民党庆阳区公署代区长蔡用之主持，红军教导师政治部干部任质斌宣读起诉书，原告依次出庭作证。冯家父子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5月8日正式作出判决，判处冯翊清有期徒刑15年，剥夺公权10年；赔偿办理不力的赈款7000元，应计利息6300元，本利共计13300元。之前，因陈珪璋破城，冯翊清借势私收的2000元，由冯翊清如数交清，作为办理地方公利事业之用。冯翊清长子冯槩平日剥夺他人钱财、粮食，由其如数偿还，并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10年。冯翊清次子冯棠作为公务人员，滥用职权，故意杀害良民，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10年。在中央教导师和工作团的主持下，作恶多端的冯氏父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反冯灭霸”斗争的胜利，大大激发了庆阳人民起来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许多积极分子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在庆阳的群众基础更加坚实。

为了把反冯斗争进行到底，教导师于同年4月创办了油印小报《庆阳人民》，不定期出版，其主要内容是刊登反冯斗争中群众的控诉书和冯氏父子的罪行，以及有关冯案的布告等。“反冯灭霸斗争”取得全面胜利后，《庆阳人民》报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被改刊为《百姓的话》。不久，陇东特委创办《救亡报》，《百姓的话》随即停刊。

在中央教导师和工委的领导下，庆阳县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妇女解放运动。蔡畅和红军女战士深入妇女之中，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妇女加入妇女救国会。为了帮助妇女学习文化，重新办起了庆城女子小学，鼓励女孩子冲破封建势力进学校学习文化。蔡畅和红军女战士积极倡导妇女放足，在女子学校成立了“剪脚布”小组；废除买卖婚姻和童养媳陋习，争取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在蔡畅和教导师的帮助下，庆阳县妇女运动成为陇东历史上妇女解放运动的先声。觉醒的女性在参政参选、争取婚姻自由、开展放足运动、学习文化知识、拥军支前、救护伤病员等方面积极行动，涌现出一大批女性革命青年，

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积极努力。

教导师和工作团还办起了"庆阳县民教馆",馆内设有图书馆、阅览室,收有图书几千册;开办了夜校和识字班,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开展了扫盲识字活动,宣传革命道理,提高人民觉悟。

红军中央教导师在庆阳的活动,有力宣传了党的政策和主张,激发了庆阳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面抗战开始后,教导师学员也相继毕业,纷纷奔赴抗日前线。教导师撤并后,一部分干部进入八路军随营学校(韦国清任校长,张平凯任政委),开赴山西继续办学,一部分留陕甘宁边区工作。

第五节 陇东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一、庆阳各地的抗日救亡工作

1935年夏秋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庆阳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随之兴起。

中共中央到达陕甘边根据地后,党的中心工作仍然是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特别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争取和平民主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党的中心工作。1936年12月27日,

《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中指出："发动与组织西北民众，联合西北少数民族，扩大与巩固红军，把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根据地与策源地；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和巩固共产党的组织；党应准备实现一切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必要的改变，以适合于全国统一战线建立后的新环境。"[①]为贯彻党中央关于"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方针，红军各主力部队进驻陇东后积极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宣传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增进陇东人民对红军基本政策的了解，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活动，在驻防陇东期间，红军各部队组成了流动宣传队，深入山区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在边宣传、边肃清匪患的同时，开展减租减息等工作，使群众认识到红军纪律严明，爱护老百姓，是真正为穷苦大众谋利益、诚心抗日救国的军队。在红军的影响下，群众纷纷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从中涌现出不少积极分子，党组织及时吸收他们入党或参加红军，壮大了抗日力量。

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在陇东期间，亲自向群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启发群众的抗日觉悟。1936 年 12 月底红军南下途中，红一军团政治部在宁县南义井召开军民大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演讲，宣传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为了加强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邓小平还在南义井听取了宁县组织部部长王秉祥、统战部部长李积成的汇报，对党的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为解决部队供给不足，邓小平向长乐村村民穆平辉借粮 26 石。借条中承诺"将来按时价由本军政府负责归还。"借条上署有邓小平及正宁县县长朱门的签名。

红十五军团的群众工作开展得十分出色。军团民运部发动群众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及各界群众救亡团体。还根据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揭发清算了恶霸地主杨奎隆、汉奸特务谢富民的罪行，并没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第 125—126 页。

收了他们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劳苦人民群众。驻孟坝的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与援西军一起在当地建立了群众抗日团体和基层党政组织。由于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抗战爆发后，这些地方成为陇东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

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力量，红军部队在驻防陇东期间普遍把扩大红军作为重要工作，积极动员贫苦农民青年参加红军。仅陕甘宁省就在半个月内扩军700余人。1937年2月，新正、新宁两县的所有地方游击队被整编为关中第四游击大队，共计400人。3月，第四游击大队在富平补充到红四师中，扩充了红军主力。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时，陕甘宁地区的红军发展到74000余人，40000余支枪。

红军各部队在积极开展"扩红"运动的同时，还进行了投弹、射击、刺杀和攻防等学习训练，开展了体育、文化娱乐竞赛等活动，在各部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练兵运动。经过半年多的训练，红军素质大大加强，战术水平明显提高，成为全民族统一抗战的中坚力量。

二、陇东国统区党的各级组织的建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有利时机，在友军管辖地区积极开展建党工作，派民运干部开展救亡运动，以建立群众组织的方式，培养革命骨干，建立了党的组织，壮大了党的队伍。

当时，各部队开展工作的主要区域是庆阳、镇原、合水、宁县和正宁一带；党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建立党组织，先成立县区工作委员会，发展党员，然后再正式成立县委和区委；二是开展群众工作，建立抗日救国会，组织农会、青年救国会、工会、自卫军等群众组织；三是成立抗日游击队。

经过细致努力的工作，各部队先后在上述地区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组织，扩大了党的影响。红一军团在宁县建立了早胜支部（书记韩学敬），在正宁建立了纪纲支部（书记樊振贤）、宫河支部（书记周富

选），在旬邑建立了上官庄支部、太峪区支部等。红十五军团派民运部长张翼成赴陕甘宁省委请示后，建立了驿马关县委，县委内设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武装部和妇女部5个工作机构，组建了义门、什社、驿马关、桐川、王原、马原等6个区委，建立了1支有几十个人的县委警卫队。7月改名为驿马关工委。

三、抗日救亡运动在陇东普遍开展

为了加强与东北军的团结，中共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专门从事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当时驻陇东的东北军主要是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其3个师分别驻在庆阳、白马铺、驿马关、西峰镇、泾川、平凉、固原一带。受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派遣，中共党员窦志安到驻西峰镇的东北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当时，绥远抗战取得了收复百灵庙的胜利，在东北军中的共产党员就发动地方和部队，组织了援绥抗日运动，发动群众募捐，青年学生报名支援百灵庙事件。以此为契机，逐渐打开了在东北军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局面。西安事变发生后，原来的抗日救国会甘肃分会被改为"陇东各界各族抗日救国总会"，窦志安任主任，国民党西峰专员戎继五、东北军八六三团团长赵治宗任副主任；救国总会下设人民武装部、组织部、宣传部等机构，创办了《大众日刊》，宣传抗日救亡运动。

陇东抗日救国总会成立后，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起到了调动、督促、训练抗日人员的作用，调动辖区内的军、政、党（国民党）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训练，让他们接受抗日、民主思想。陇东抗日救国总会这一宣传和动员抗日的组织得到了驻庆阳大多数东北军官兵的拥护，因此陇东各地如镇原、宁县、合水、正宁、环县、庆阳以及平凉、固原等地都设立了抗日救国会。党在东北军中的抗日救亡工作不仅推动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抗日爱国运动，也推动了庆阳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内战基本结束，驻守在庆阳的红军各部队

帮助各地人民成立抗日救亡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陇东新开辟的苏区停止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广泛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经过发动群众和同上层开明绅士协商，在县、区分别建立各级抗日救国会。在工、青、妇、商各界也分别建立抗日救国会。除了红军教导师组织成立的庆阳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外，驻守陇东的其他红军部队也帮助当地成立了抗日救亡组织。

1937年初，红二师进驻宁县中村，3月帮助成立了中村抗日救国会，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维持地方治安，团结教育群众，书写标语和给部队动员粮草、保障生活供给。中村救国会还颁布了救国条约，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实行民主权利，改善人民生活，加强锄奸工作，铲除汉奸分子，巩固抗日后方，爱国人民团结起来救中国，救国会的会员都要参加本会的工作，拥护救国会，绝对接受救国会的领导，拥护国共合作，取消苛捐杂税，反对日本增兵华北，要求南京出兵华北迅速抗日，驱逐日本强盗出中国，欢迎烟民迅速到会报告戒烟等。

红一师驻正宁罗川期间，帮助建立了各级抗日救国会，如正宁县抗日救国会（会址设在罗川）、联保抗日救国会（会址设在东山头）、保抗日救国会（分别设在彭家川、雷村、东山头、南北堡子）等[①]，其中的保抗日救国会仍由当时的保长执行事务，但必须由抗日救国会通过。各级救国会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发动群众建立救亡组织，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等。1936年12月，陕甘宁省委工作团在合水县组织成立了各界群众抗日救国联合会。1937年4月，援西军在镇原县帮助成立了抗日救国联合会，贾联瑞任主任，并在新城、平泉、中原、屯字、太平、临泾、孟坝、马渠、三岔先后成立了抗日救国会。

抗日救国会是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参加救国会的不仅有共产党人士，也有国民党人士，既有贫苦农民、工人，也有开明地主、富农。

①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第221页。

如正宁县抗日救国会里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意在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正宁县抗日救国会成立时，国民党县政府机关、学生、部队及周围群众都参加了大会，会议由共产党员冯树勋主持，国民党县长讲了话，共同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抗日救国会是具有半政权性质的组织，凡是成立抗日救国会的地方，许多地方事务均通过救国会来解决。同时，抗日救国会也是抗战前夕党在国统区开展地方活动的主要方式，一些地方建立了不公开的党的基层组织，也是以抗日救国会名义公开活动的。这些组织的成立，一方面宣传了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团结了一批爱国人士，成为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范例。另一方面，抗日救国会不仅宣传了抗日，为红军筹集了粮饷，提高了群众觉悟，而且通过组织抗日救国会培养了一批抗日救国积极分子，吸收了一批积极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从事革命工作的骨干分子。抗战期间，庆阳各地党的基层组织和政权，大都是在抗日救国会的基础上产生的。

四、国共两党地方政权在陇东的划界谈判

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后，为了巩固关中特区和消除两个政权的对立状态，避免双方发生军事冲突，保证苏区政权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1937 年夏季，双方开始在关中进行划界谈判。西北办事处和关中特区派杨载泉、郭廷藩和红一师政治部主任邓华与国民党正宁县县长朱门进行谈判；王子宜、杨载泉、王秉祥与国民党宁县县长王序宾谈判。

经过谈判，双方就正宁与苏区的新正、宁县与苏区新宁的划界问题达成了协议。正宁与新正的谈判协议规定：新正县地界东起五畔，西南至半川、西沟、上南坡一线，东南为新正县，西北属正宁县，将原属苏区五区的长乐、西王阁、西五畔划归正宁。新正县辖 5 个区，28 个乡，87 个行政村，146 个自然村，5193 户，33468 人。新宁与宁县的谈判中，双方议定以西安事变当天双方占据区域为准确定归属，新宁

县将潘村峴子以西包括盘克镇归还宁县；平子半坡村虽在1934年就属于苏区但因未建立政权而归宁县，除此沿庞家川、黑庄子、马家崖窑一线，东为新宁，西属宁县。在达成协议后，因南仓群众强烈要求脱离国民党统治，进行协商后将南仓划归新宁县。划界后的新宁县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3个区，14个乡，人口1.3万余人。

这次划界谈判是在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行的。党从抗日大局出发，在有原则有条件的前提下，向国民党做了许多必要让步，把原属苏区的一部分让了出来，既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获得了社会的好评，又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以此为标志，陇东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三编

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庆阳的活动

（1937年7月—1945年7月）

第十章 党在陇东的组织建设

第一节 中共陇东特委和陇东统战区的形成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了维护和巩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进一步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在边区实行普选的议会民主制度，促进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转变。陕甘宁边区各级工农苏维埃政权改为抗日民主政权，并接受国民政府的指导。

陇东统战区是陕甘宁边区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过渡地区，党专门成立了陇东特委领导这一地区的工作。陇东特委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且一度受到王明右倾错误影响，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很快纠正了错误，为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巩固边区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一、中共陇东特委的成立及沿革

1937 年 7 月，为了加强对陇东国民党统治区党的领导工作，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陇东特委，机关驻庆阳县城，袁国平任书记，李铁轮任组织部长，任质斌任宣传部长，黄欧东任秘书长。陇东特委的主要职责是统一领导庆阳、合水、镇原、宁县、固原五个县委和驿马关、西峰两个工委的工作，党的基层组织在陇东特委的领导下逐渐增加，党员队伍迅速壮大。1937 年 8 月，为了加强平凉、泾川、崇信、隆德、华亭、庄浪等地党的工作，中共陇东特委决定将镇原县委改为中心县委，对外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129 师留守处"。9 月，又改为"八

路军129师办事处”，陈仁麒任书记，王永平任副书记。同年12月，驿马关工委撤销，所属党组织并入西峰工委。到1937年底，陇东特委领导的党的基层组织迅速发展，党员由原来的500余名增加到2900多名。1938年春，陇东特委改属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袁国平调离后，李铁轮任书记，黄欧东任副书记兼秘书长，陈仁麒任组织部部长，段德彰任统战部部长，吴铁鸣任宣传部部长。与此同时，中共陇东特委决定任质斌以中共陇东特委常委身份兼任镇原中心县委书记，负责指导平凉、泾川、华亭等县党的工作，并成立了中共平泾工作委员会，就近开展党在平凉的工作。7月，中共陇东特委决定成立中共平凉市委，张可夫任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赵守一任宣传部部长。平凉市委隶属于中共镇原中心县委领导。至此，中共陇东特委主要领导上述五县二委及平凉地区党的地下工作。

为了加强党对陇东地区的统一领导，1938年7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根据形势的新变化，决定将陇东特委与负责领导陇东根据地的庆环分区党委合并，马文瑞担任书记，使统战区的工作和边区的工作统一起来。第二次陇东事变后，为适应陇东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新形势，遏制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倒行逆施，巩固和发展陇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保卫陕甘宁边区的西南大门，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另行组建陇东分区。1940年4月，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庆阳县城成立，陕甘宁边区党委随即建立陇东分区特委会（简称陇东分委）。陕甘宁边区政府作出决定，将庆环分区并入陇东分区，庆环分区党委随之并入陇东分区特委会，组成新的中共陇东分委，马文瑞、段德彰先后担任书记。边区党委十分重视陇东党的工作，加强了陇东分委的领导班子，在原庆环分区党委的基础上，增加了三八五旅王维舟、耿飚、甘渭汉为分委常委。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后，陇东分委隶属于西北局，下辖环县、曲子、华池、庆阳、合水、镇原6个县委及宁县、平东两个工委。

二、陇东统战区的形成和对敌斗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之后，陇东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地区。一种是华池、曲子以及合水、环县、新正、新宁等部分地区的老革命根据地，这类地区不仅建立有苏维埃政权，而且大部分地区进行了土地革命。另一种是统战区。统战区又有两类不同的情况，一类是由红军西征时收复的苏区和新解放地区，这类地区大多建有苏维埃政权，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另一类是西安事变后由国民党统治区转变为统战区的地区，这类地区仍然存在着国民党的地方政权和地方保安部队，也有党的地方组织、八路军驻军和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而且一些抗日救国会已实际掌握和行使当地政权。这两类地区交错存在，使陇东地区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因此，国共双方共管和双重政权并存，是陇东统战区最基本的特征。陇东统战区的形成是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结果，它扩大了党在陇东的活动范围，壮大了抗日力量，有利于陇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能较好地合作抗日，陇东统战区国共双方基本相安无事，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发展。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国共双方在抗战路线上的分歧和矛盾日益尖锐，在陇东统战区国共双方的矛盾日趋凸显和激烈。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派员到属于陇东统战区的庆阳、合水、镇原、宁县、正宁等县任职，由在西峰设立的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并扩充地方保安团队，实行编组保甲管制。1938年冬，又在属于边区管辖的环县甜水堡设立国民党环县县政府。此外，国民党还增加了驻陇东的军事力量。至1939年11月，全区共驻扎6个保安大队、19个中队、1个骑兵队、1个追击炮分队。同时国民党第一六五师、九十七师等部队先后驻防陇东庆阳、西峰、镇原、宁县等地。

在陇东统战区，国民党陇东地方政权逐渐开始阻挠和压制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和八路军开展的民运工作进行种种限制和刁难。国民党陇东地方政权还支持和唆使属边区政府管辖的环县、华池、新正等地地主势力反攻倒算，强迫农民退还已分配的土地、房屋，继续偿还已废除的债务；在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和阻挠减租减息政策，增加粮款捐税，加重人民负担。党的各级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行为，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党加强对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的领导，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把形式上是群众团体的抗日救国会，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人民政权性质的机构；并按照1938年5月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从既成事实出发，重新收回地主夺去的土地、房屋和强收的租债等，退还给农民；在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有步骤地进行减租减息，实行群众合理负担，实行"二五"减租，打击地主势力的复辟活动。同时积极支持群众开展反对国民党政府征收苛捐杂税、加重人民负担的斗争，保护人民的利益。

三、纠正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

1938年夏季，由于受到党内王明右倾投降错误的影响，陇东统战区的工作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失。在"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指导下，中共陇东特委在具体工作中只讲联合，不讲斗争，放弃了独立自主原则，一些党组织和群众团体被破坏，党的队伍也受到削弱。如：把抗日救国会改为抗敌后援会，把抗日自卫军改为自卫队，并且要群众团体不得抓坏人、查禁赌博等等，也不得干涉政府工作，还取消了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组织。这些做法实际上是向国民党顽固派示弱，纵容其恣意妄为。面对这种情况，不少干部情绪消沉，感到革命没有前途，许多群众失去信心。陇东统战区的形势很快逆转，国民党顽固派的气焰嚣

张起来，他们在庆阳办了《新陇东报》，谩骂和攻击中国共产党。他们还通过区长、联保主任、保甲长恐吓群众和积极分子，限制抗日救国会的活动，并通过兵役人员抓壮丁当兵，妄图搞垮抗日自卫军。在环县、曲子等根据地，有的地主反攻倒算，收回已经分配的土地财产，有的地方反共势力抬头，而党的组织却不敢公开领导群众进行坚决斗争，造成了消极影响。

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陕甘宁边区党委派王若飞到陇东检查工作，纠正在王明右倾错误影响下的错误做法。庆环分区党委及时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参加分区党委扩大会议的有分区党委委员、各县县委书记以及八路军驻陇东部队的领导干部王维舟、耿飚、谢扶民等。王若飞在会上强调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既要坚持统一战线，又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能迁就国民党。会议着重批判了王明的右倾错误，提出在统战区积极地、主动地开展民运工作，巩固庆阳、合水等地的民运团体，普及群众工作在区乡的斗争策略，推动党在陇东的各项工作迅速发展。会后，陇东各级党组织正确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统战区恢复和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众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民众运动。陇东党的组织得到巩固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四、中共陇东特委在陇东统战区的工作

中共陇东特委成立后，主要完成了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在八路军驻防的统战区，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争取民主，改善民生，发展独立自主的民运工作，建立、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把陇东统战区发展成为民主、进步的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是向友区（即非八路军驻防的邻近地区）进行统战工作，扩大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党的

主张，建立和发展党的秘密组织，把党的影响扩大到全陇东地区。"[①]抗战初期，中共陇东特委对外称"陕甘宁边区政府驻陇东办事处"，各县委的领导机关以八路军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的名义出现，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陇东特委书记袁国平以教导师师长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驻陇东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公开活动，积极开展国民党上层公职人员的统战工作，并在国民党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作公开演讲，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各县委的领导干部也以民运会或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和国民党县区官吏直接打交道，减少了民运发展的阻力。1937年9月国共合作宣言《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公布后，特委及时发出《中共陇东特委给国民党部的公开信》，协商共同领导陇东各县抗日民众运动的问题。同时，特委还利用一切可能在国民党部队中进行统战工作。1938年春，甘军新11旅（刘玉堂部）开赴抗日前线路过庆阳时，由抗敌后援会出面，对他们进行支援慰问，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该军有不少原红西路军被俘战士逃跑出来想回到革命部队，经特委做工作说服他们又回去，这做法不仅对抗日友军起了巩固作用，也给友军留下了良好印象。甘肃地下党员张友生与该军秘密党组织联系，热情接待并鼓励他们在前线为党工作。

第二，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开展除奸反霸斗争。陇东特委发动群众揭发和斗争了庆阳城内"八大家"（大地主）的首户冯翊清的罪行，并将其惩办，伸张了革命正义，打击了反动势力，对地主士绅也起了分化作用。此后，一部分地主持中立态度，一部分表现得比较开明，支持民众运动。与此同时，陇东特委还支持群众反对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并对群众进行有组织的领导。经过斗争，一般以国民党政府作出让步达成协议而告终。在此基础上，陇东特委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参加抗日救国会，动员群众踊跃参军支援抗战，同时争取民主、改善民生，在基层乡镇大多实现了保甲长

① 季铁轮：《回忆陇东特委工作》，《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建设》，第438页。

的民选，开始实行“二五”减租。

第三，加强党的建设。到1937年下半年，陇东特委下辖的庆阳、合水、驿马关、镇原、固原等县委领导下的地区，普遍建立了支部和区委组织，绝大多数村都有支部、党小组或者有个别党员，空白点很少。为了开展白区党的秘密工作，陇东特委在平凉也建立起党的支部，并准备向西兰公路一线发展党组织，该支部曾介绍几个中学生到抗大学习，取得了一些成绩。1938年夏，陇东特委遵照中央的指示，以张国焘叛变逃跑为教训，进行了以反对思想麻痹、提高警惕性为内容的党员干部队伍教育工作。

第四，大力进行宣传教育，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为了使人民群众充分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政治影响，陇东特委大力进行宣传教育工作。陇东特委创办了《庆阳人民》（后改为《百姓的话》，开始为油印，后改为石印）报，不仅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在国民党军政团体中也有影响。该报宣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口号，刊登的有关时事新闻、八路军胜利等消息，无不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为了发展新阵地，打开新局面，特委还派遣一些同志去平凉开书店，销售合法的进步书刊，接近和争取进步青年。特委在新安旅行团到陇东演出时，热情接待，具体帮助，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救亡运动和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

总之，这一时期，中共陇东特委抓住当时国共合作抗战的良好时机，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统一战线、民众运动、党的建设、宣传工作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较好成绩。1937年冬，特委书记袁国平去中央汇报工作，得到了中央的重视。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说：“在西安，纠正了两党关系上的无原则倾向（迁就倾向），重新开展了群众斗争。在陇东，情况和西安大体相同。”

在统战区公开活动的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会（有的地方称抗敌后援会），主要工作是“教育群众，团结各个爱国阶层和民主人士，一致做好抗日后援工作。它在县委的领导下，统一管理着农会、工

会、青年救国会、妇女联合会、民众自卫军、民众教育馆、商人救国会、民众纠纷调解委员会等”。[①] 在党没有建立政权的统战区，抗日救国会很好地发挥了地方政权的作用。各地抗日救国会的成立，为党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庆环分区成立后的主要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陇东地区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分属于庆环分区和关中分区（今庆阳地区的环县、华池属于庆环分区管辖）。这一时期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由普选产生的，做了许多有益于民众的工作，深得群众的拥护。

一、庆环分区的成立及沿革

1937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撤销了陕甘宁省委和省政府，将其所辖地区分别划归三边分区和庆环分区管辖，同时成立了庆环分区党委和庆环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机关设在曲子。新成立的庆环分区党委隶属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负责陇东革命根据地党的工作。马文瑞任中共庆环分区党委书记，李景膺任组织部部长，李生华任宣传部部长，李瑞山任青年部部长，孙君一任秘书长。马锡五任庆环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王世泰任庆环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专署下设机构有民政、财政、教育、粮食、法律等处。庆环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初期，管辖华池、环县、曲子、固北、定边、定环（同年10月撤销）等县。

① 姚静波：《陕甘宁边区庆阳县政府琐记》，《陕甘宁边区陇东的群众运动》，第236页。

1937年10月，庆环分区党委在曲子召开第一次分区党代会，总结了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的工作经验，研究部署了征粮工作和领导抗战工作，决定在庆环分区各县进行抗日民主政权的选举工作。会后，庆环分区党委为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极其复杂和艰苦的环境下，大力发展党的组织，促进了党员队伍的迅速壮大，到1937年底，庆环分区党员人数由2000多名增加到3000多名。

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庆环分区行政区划做了调整，定边划归三边分区，同时撤销固北县。庆环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行政区划变为曲子、环县、华池3个县。1938年7月，中共中央和边区党委根据形势的新变化，对陇东党的组织作了适当调整，决定陇东特委并入庆环分区党委，组成新的庆环分区党委，仍由马文瑞担任书记。庆环分区党委统战部仍以陕甘宁边区政府驻陇东办事处的名义驻庆阳县城，领导原陇东特委所属统战区党的工作。

1940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庆环分区与陇东分区合并，原庆环分区各县统一受陇东专署直接管辖，庆环分区随后撤销。新成立的陇东分区机关设在庆阳，专员王维舟，副专员马锡五；公署由秘书室、民政处、财政处、教育处、经建处、粮食处、保安处等机构组成，并先后设立了边区银行陇东分行、陇东贸易分局、贸易分公司、税务分局、陇东法庭和邮电局等涉及金融、贸易、邮政、法律等各个领域的管理机构。下辖庆阳、合水、镇原、环县、华池、曲子6个县抗日民主政府。随着陇东分区的成立和两分区的合并，以庆阳为中心的陇东抗日政权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二、庆环分区第一次普选运动

1937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召开行政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等法规。《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规定："各

级议会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各级行政长官、乡长、区长、县长、边区主席由各级议会选举”,“各级政府直接对各级议会负责”,“选民对所选代表认为不称职的,得随时撤回改选之”。根据上述原则,《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进一步规定:“采取普通的直接的平等的无记名的选举制,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关于选举资格规定,除汉奸、法院判决剥夺公民权者和精神病患者外,“凡居住在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十六岁,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规定体现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恢复了地主、富农、绅士和资本家的公民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拥护抗日的党派都有竞选和参政的自由,从法律上确定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这两个文件的颁布,为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转变奠定了法律基础,由此,陕甘宁边区普选的议会民主制度初步确立。根据《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的规定以及为了实现由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从1937年7月开始,陕甘宁边区开展了乡级的选举工作。

为了做好这次选举工作,陕甘宁边区党委指出:“这次选举从本身讲,是由工农民主转到一般民主,由宝塔式的选举转到直接选举。政权形式也是由苏维埃转到民主共和的形式。”可以看出,一方面通过选举要实现根据地的政权由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的过渡;一方面,通过选举加强党在各级政权的领导作用,并通过选举把各阶层群众动员起来。

在庆环分区,1937年9月开始普选,共选出乡人民代表3332人(除华池外),候补代表811人;乡一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区正式议员1511人,候补议员132人;县正式议员363人,候补议员92人;区、县召开议会,选出边区正式议员40人,候补议员15人。在普选的基础上,庆环分区各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

1937年10月,环县在洪德河连湾召开第一届议会,选举成立环县抗日民主政府,刘昌汉当选为县议会议长,选举产生了由杨玉亭、

陈玉山、宋飞等11名委员组成的环县抗日民主政府，杨玉亭任县长，县政府设有秘书室、民政、财政、教育、建设、保安6个科和司法裁判处、税务局、合作联社等工作机构。环县抗日民主政府开始下辖环城、洪德、虎洞、山城、耿湾、马坊原6个区公署，后经过调整合并，1940年2月，甜水区收复后，归环县政府管辖。

1937年10月，曲子县第一届议会在曲子县纸坊沟召开，选举产生了曲子县抗日民主政府，苏耀亮当选为县议会议长，庆环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马锡五当选为县长（兼）。曲子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与庆环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合署办公，庆环分区各科长兼任县政府各科长。曲子县先后管辖八珠、曲子、天子、木钵、合道、土桥、马岭、三岔8个区公署及1942年1月成立的曲子市（区级市）政府。

1937年10月，固北县第一届参议会召开，选举产生了固北县抗日民主政府，阎志尊当选为县长，县政府设有秘书室、民政、财政、教育科和保安科、司法裁判处等6个工作机构，下辖毛井、车道、庙耳掌3个区公署。1938年4月固北县撤销后，其辖区并入环县。

1937年11月，华池县第一届参议会在大沟门召开，李湖当选为县议会议长，会议选举成立了华池县抗日民主政府，李培福当选为县长，逯月喜为副县长。县政府设有秘书室、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粮食、保安科和裁判处等8个工作机构。县政府机关初驻温台大沟门，后迁至悦乐镇。华池县抗日民主政府最初管辖白马、林镇、柔远、温台、悦乐、元城、吴旗、水泛、白豹9等个行政区。1940年6月，边区政府批准成立三边分区吴旗县，将华池县所辖吴旗、水泛两区划归吴旗县管辖。

1937年的选举运动，使党领导的原陕甘边苏区各县顺利完成了由苏维埃政府向抗日民主政府的转变。而陇东三县的普选工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边区具体实践的成功范例。

三、环县、曲子、华池等"老三县"在抗战初期的工作

陕甘边苏区各县完成由苏维埃政府向抗日民主政府的转变后，

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较大成绩，展示了边区政府的新面貌。

环县在制度建设和民主建设上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在制度建设方面，到1938年11月，各项会议制度、巡视检查制度、报告制度都得以逐步建立和完善。在民主建设方面，1938年6、7月间，改选和调换了群众不信任、工作有问题的乡长9人，9月又改选了2个区长。经过9月份的宣传，从10月开始，环县召开了复选会和乡代表会。此外，环县还对干部进行了审查和教育，处罚了一些错误严重的干部，其他干部经过教育，均有所进步和提高。

华池县在工作中坚决贯彻了民主制度。在选举过程中，真正体现了无阶级、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许多无党派人士当选为乡议员和乡长，甚至地主和富农也有被选为乡县议员的。从1937年到1940年，县、乡议会均开过两次，乡级议员及乡政府委员改选及调整过两次。在每次会议上，县、乡政府均向人民代表作了工作报告，欢迎大会的批评和指示。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事情，政府还问计于乡村群众大会。如征收救国公粮，羊毛税、发展牛羊、开荒计划等大小事情，都会在人民代表会议里讨论，甚至牛马吃田等群众争执，也是经过听取群众的意见来解决。各级干部的优良作风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肯定。上至县政府，下至乡长，都是穿着粗布衣，背着棉背包，靠双腿翻山过洼，工作中和老百姓食宿在一起，耕地种菜、看牛、养猪、喂鸡是政府的日常生活。一般来说，老百姓的生活要比政府工作人员好得多，老百姓感慨地说："自古以来常说升官发财，八路军是升官不发财。"

曲子县在工作中调整了各阶级的利益。一方面对土地革命时期群众已得的土地，政府负责保障；另一方面对没地耕种的农民，实行减租减息等办法，使"耕者有其田"。一方面对未开垦的荒地，发动群众开荒，3年不交租金；另一方面保护富有者现有财产的所有权。曲子县将以前百货销售的税收完全取消，使外面的商人陆续来到曲子经营，繁荣了当地经济。在实施民主制度方面，曲子县各级政府机关实现了平民化；人民热烈参加选举，乡村问题取决于乡参议会和村民

大会。政府保证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和居住的自由。截至1941年,共有767人参加了工人组织,3357人参加了青年组织,5484人参加了妇联组织。

"老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初创时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没有经验,也存在着工作责任不明确,干部素质参差不齐,工作方法简单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民主政权建设。这些问题在第二次普选之后基本都得到了克服。

第三节 关中分区成立后的主要工作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原由陕西省委领导的关中特区划归陕甘宁边区领导,关中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关中分区地处桥山山脉南端,北与陕甘宁边区相连,东、西、南三面同国民党统治区接壤。所辖赤水、淳耀、新正、新宁4县和双龙中心区,分属陕西旬邑、淳化、耀县、同官(今铜川市王益区、印台区)、宜君、黄陵和甘肃正宁、宁县各一部分,总面积7000多平方公里,为一北宽南窄、狭长的囊形地带,是守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南大门。

一、关中分区的成立

1937年10月,关中分区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将关中特区改为关中分区;将关中特区委员会改为关中分区委员会,习仲勋任书记,分区机关驻新正县马家堡(1941年迁至马栏镇);将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改为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霍维德任专员;将关中特区司令部改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张仲良任司令员。关中分区委员会隶属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归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隶属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领导。关中分区下辖新正、新宁、淳耀、赤水4县和淳化、旬邑八路军办事处。1937年底，关中分区所辖各县经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完成了由苏维埃政府向抗日民主政府的转变。这一时期，关中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顺利发展的环境中，对外与邻县友方都建立了良好的统一战线关系，设立工作机构，大量开展友区群众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对内则消灭了任雨霖、荀鸿运、夏老幺等股匪，安定了关中社会秩序，奠定了和平建设的基础。

为适应新的形势，担当起组织团结全分区党员群众迎接更为艰巨复杂的斗争任务，关中分区于1939年9月在旬邑县职田镇上墙村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关中分区成立以来的工作，并讨论决定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贯彻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和策略。大会选举产生了由习仲勋、张仲良、郭炳坤、张凤岐等13名委员组成的中共关中分区第二届委员会，习仲勋再次当选为关中分区委员会书记。

这一时期，关中分区各级党组织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灵活多样地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少数顽固分子，使统战关系遍及国统区国民党党政军机构和地方绅士、知识分子、商人、哥老会及其他社会组织。

为适应战争需要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抗战要求，结成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中分区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大量地，十倍地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知识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的指示，[①]积极而谨慎地在工人、雇工、青年学生中和战士中吸收了一批党员，使分区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78页。

为了正确贯彻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政策，维护关中分区民主政权和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关中分区党委书记习仲勋对周边地区国民党武装的统战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亲自与正宁县民团王大牙、寺村民团董恩多、彬县民团李仰之、旬邑县民团郭相堂、太峪镇民团文干卿、宁县民团庞铭胜、同官民团夏玉山等民团头目多次通信或谈话，进行宣传、分化、瓦解工作。在新的形势下，这些民团头目除少数顽固分子外，都对抗日工作起到了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减少了边区的压力。旬邑县驻职田镇民团头目马宏德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习仲勋的多方争取下，给关中分区送来长短枪 25 支，装备了分区部队。国民党驻武家堡保安团一个班长扛着一挺机枪投奔关中分区，习仲勋亲自同他谈话，并勉励说："这样的好事你做得越多越好。你这是为中华民族做好事。"

同时，关中分区委员会还注意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安排一些知名地方人士、社会贤达，发挥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此间先后将赤水县的士绅景玉田安排到县政府任财政科长，新正县老中医张治平、旬邑县的肖芝葆被聘为关中分区参议员。关中分区委员会领导经常深入各个村落，走家串户，调查了解社会现状和群众情绪，深入细致做抗日宣传工作。一次，习仲勋同关中分区委员会秘书长杨再泉到另外一个村庄看望群众，当他得知该村有位叫穆润身的在国民党军队任职时，便主动到穆家登门造访。他诚恳地对穆的父亲说："国共两党的仇恨，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就一笔勾销了，你儿子在国民党任职，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只要我们一致对外，共同抗日，我们就是好朋友。如果你儿子回家，我们还欢迎他，也保证他来去自由，家中有什么困难，我们也尽量帮助。"一席话使这位老人深为感动，表示一定要为抗日出力。

二、新宁县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工作

1937 年 2 月，国民党宁县政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政权进

行了划界谈判，沿庞家川、黑庄子、马家崖一线，以东属苏区新宁县管辖，以西属国民党政府管辖。1937年9月，新宁县在下齐家召开第一届议会（当时称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宁县抗日民主政府，穆天祥当选为县长（未到职，由陈含玉代理）。县政府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科和保安科、司法裁判处等6个工作机构，辖九岘、金村、湘乐3个行政区，14个乡。1940年先后成立了盘克区和宇村区。

1937年8月，新宁的宫河、早胜党支部相继成立，周富选、赵国英分别任支部书记，有党员16人（宫河10人，早胜6人）。党支部直属驻军政治部领导。当时，地下党组织主要以抗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配合部队发动群众捐献钱物，支援抗战；举办戒烟所，教育烟民禁食毒品；并了解国民党驻军及其活动情况，宣传我党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在驻军和地下党组织的宣传鼓动下，许多乡村的佃户、长工纷纷起来与当地土豪劣绅作斗争，使一些大地主不得不作妥协让步。1937年12月，陇东特委决定，在宁县统战区成立中共宁县县委。县委书记冯治国，组织部部长万成章，青年干事龚福清。县委驻地在宁县县城。当时，宁县县城驻有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〇团第一营，县委就和军队住在一起。由于当时刚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所以，县委的活动基本上是半公开的，县委负责人对外都有合法身份。冯治国是以陕甘宁边区政府陇东办事处驻宁县代表的名义到宁县的，万成章等是以三八五旅民运部的名义做工作的，龚福清以干部子弟名义送到宁县城关小学扫盲班上学，实际是在学校做青年学生的工作。县委下辖宫河（现属正宁）、早胜、南义井三个区委，300多个党员。冯治国等人利用合法身份，在国民党上层人士里面做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发展统战对象。1938年7月，陇东特委根据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撤销宁县县委。宁县白区地下党的工作移交中共新宁县委统战部，所辖基层党组织仍有3个区委：宫河、早胜、南义井（一个时期内曾与南义井区委失掉联系），以后又接收了平子区委。当时，国共磨擦尚不明显，基层区委、支部还能经常开会，了解情况，上通下达，防奸除特，并配合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做了

大量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使全县党员发展很快。到1939年初，党员人数增加到近600人。但是，由于在发展过程中审查不细，教育不严，有一部分党员质量较差。

1939年3月，上级党委决定，将宁县白区地下党的工作移交庆环分区党委。4月，中共庆环分区党委又决定，成立中共宁县工作委员会，并委派了组成人员。主要负责人3名：工委书记杨应志（又名杨宣武），宣传部部长张彦博，组织部部长李正良。工委驻地在宁县城，与三八五旅普备七团一营住在一起。工委下辖宫河、早胜、平子、南义井、西区、城关6个区委。早胜区有早胜、中村、院子3个支部，60多名党员；城关区有城关、连追（今春荣）两个支部，60多名党员；南义井区有南义井、寨沟、肖咀、什社4个支部，80多名党员；西区有和盛、太昌、新庄3个支部，50多名党员；宫河区有宫河、北极两个支部，80多名党员。县工委与区委秘密接头，单线联系，区委与区委、支部与支部没有横向联系，上下级彼此来往化装成小商贩或赶集卖柴草的，通报情况，联系工作。

宁县磨擦事件后，党员人数由原来的500多人猛然下降到不足300人，此后又有所减少。中共陇东特委决定对宁县工委领导成员适当调整。次年2月，工委书记杨应志调回，由刘国升（又名刘辉）任工委书记，王作义任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仍为李正良，不脱产委员刘永康，通讯员王文学，还有一名管理员兼炊事员。工委机关设在湘乐付家山一座古庙中，掩护名称为"陇东救亡书店"。工委下辖平子、早胜、宫河、和盛4个区委，每区约有党员30人左右，共有一百二三十人。县工委与我方驻军紧密团结，积极与敌人开展斗争。1941年，国民党在宁县搞社训，有的党员装扮成卖柴草的、说书的、算命的，进城了解国民党机关内部情报。1941年11月，宁县工委领导成员再次调整：李正良任工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刘永康，宣传部部长田生发，工委委员王培宵、董虎山。工委驻地迁至西华池。

三、新正县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工作

1937年2月，国民党正宁县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地方政权进行了划界谈判，划定了正宁县与新正县的界限，双方以东起五畔、半川，西南至西沟、上南坡头为界限，西北属国民党政府管辖，东南属苏区政府管辖。1937年7月，新正县在民主普选的基础上，在阳坡头召开第一届议会（当时称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左怀玉当选为县长。县政府与关中分区专员公署合署办公，专署的各个科就是县政府的各个科。1941年7月与关中分区专员公署分署办公，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科及保安科、武装科、裁判处7个工作机构，县政府驻阳坡头。新正县辖湫头、三嘉、长舌头、湫坡头、底庙5个行政区。1940年3月，湫坡头、底庙两个区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同年7月，新正县又建立了马栏区。

1937年7月，新正县委驻地由岘子村迁至车家沟，同年12月，迁至湫头镇。1938年5月，县委驻地再迁至马家堡。县委辖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军事部、青年部、妇女部6个工作机构，另辖5个区委。1938年7月，关中分区党委撤销新正县委，新正县5个区委归关中分区党委直接领导。1938年8月，关中分区党委设中共新正工委，田润芝任书记，驻地仍然在马家堡，新正县5个区委隶属新正工委。

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新正县人民对民主的要求和对建立人民政权的热忱被极大地激发出来。而抗日民主政权内民意机关的建立，司法制度的改进，学习、检查、报告等制度的建立，干部的培养和深造，官僚作风的克服，都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威信。新正县还取消了24种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税制，并减低税率，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具体可见下表：

新正县人民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前后负担比较表①

区别	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前的负担	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的负担
善秀区	8200 元	3971 元
怀兴区	2850 元	942 元
太和区	7640 元	3437 元
底庙区	7430 元	2502 元
高林区	8430 元	3721 元
总计	34550 元	14573 元

这个表是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的统计，可以看出，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新正县人民的负担减轻了一半以上。

四、中共关中地委的成立

1942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精神，关中分区警备第一旅与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合并为警一旅关中警备司令部。警一旅旅长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司令员文年生，政治委员张德生、副司令员汪峰、王近山、杨拯民，副政治委员晏福生、徐立清。同月，西北局根据中共中央"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工作效率、节省人力物力"的指示精神，决定将中共陕西省委与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合并为中共关中地委。

1943年1月，中共关中地委正式成立，由常委张德生（地委书记）、汪锋（统战部长）、张仲良（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文年生（警一旅旅长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司令员）和委员张中（地委秘书长）、惠庆琪（组织部长）、晏福生（警备司令部副政委）、张鹏图（副专员）、杜平、牛书申组成。地委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统一领导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和陕西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地委机

① 《陕甘宁边区陇东的经济建设》，第276页。

关仍驻马栏镇。

这一时期，关中分区党政军机关及学校全部迁驻马栏镇，相继成立了保安处、八一剧团。同时，为加强马栏根据地的基础建设，结合大生产运动，在关中地委的领导下，党政军群齐动员，在马栏相继建成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厂和仓库。修械厂主要是为红军和游击队修理、制造枪械和弹药。他们研制的"麻辫手榴弹"威力强大，在多次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 年至 1944 年关中分区还组织军民在马栏修建了大礼堂、小会议室、工字房和马栏七孔石桥。马栏由此成为关中分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第四节　党在庆阳领导的武装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庆阳地区领导的武装力量主要有八路军三八五旅和地方保安部队。三八五旅驻防庆阳正值八年抗战的艰苦时期，内外部环境恶劣，生活物资匮乏。面对困境，三八五旅不畏艰难困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动广大官兵、团结各阶层群众，积极改善生活条件，大力发展地方革命武装，肃清边区匪患，遏制了日本侵略者西渡黄河的企图，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和军事磨擦，保证了边区的生产自给，保卫了陕甘宁边区西南大门，经受了磨练和考验，为全国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党领导的地方保安部队积极配合八路军正规部队，为保卫边区、维护治安，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磨擦事件，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的成立与三八五旅进驻庆阳

为了保卫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在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从三个主力师中留下部分兵力留守陕甘宁边区，成立留守处。

南京国民政府任命萧劲光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留守处设在延安。八路军留守处对内改称留守兵团，萧劲光担任司令员兼政委。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成立东西两个地区留守处，“以神府、靖边、安定、志丹、扶施、甘泉、鄜县、洛川等县划为东地区留守处，以陈伯钧为主任，陈先瑞副之，驻洛川；以定、盐、环县、庆(阳)合(水)、正宁、旬邑、淳(化)县等县划为西地区留守处，以王宏坤为主任，王维州(舟)副之，驻防正宁。”[①]12月，留守兵团颁布命令，实行新的编制序列，将留守部队改为8个警备团，加上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旅部及所属七七〇团、富甘独立营和绥德警备区，共约1.5万人。留守兵团的主要任务是“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1937年10月，王宏坤、王维舟率领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旅部及所属七七〇团驻防在西地区留守处。三八五旅原为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改编为留守部队后到庆阳换防(这里原来驻守的是中国工农红军教导师)，旅部及直属队进驻庆阳县城北关田家城附近，附属机关住在附近。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千)团部驻防驿马关，一营营部驻宁县城，各连分驻宁县城和正宁县城；二营随团部驻驿马关、赤城一带；三营驻镇原县城。除了八路军主力部队外，还有地方部队警备二团和警备七团。警备二团是由延安警备部队派出并加入三八五旅建制作为预备队组建的，团长周求保；警备七团是由红军教导师和环县、曲子、华池等县的保安队合并改编的，团长袁渊，分别驻防庆阳、环县。1938年夏，警备七团改为隶属三八五旅，驻合水、宁县等地；1940年春，警备二团亦归属三八五旅，驻环县、曲子等地。

二、三八五旅在庆阳的主要工作

三八五旅在庆阳发动群众，团结抗日。三八五旅驻防庆阳之前，

①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驻延安并成立东西两个地区留守处》，1937年8月25日。

红军教导师曾在这里驻防。三八五旅接防后，一边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一切抗日力量团结抗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成立宣传队、影戏团，发动群众，传播抗日思想，坚持同国民党顽固派破坏边区、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做不懈斗争。

为了搞好抗日宣传工作，三八五旅成立了民运指导科，具体指导民众的抗日运动。民运科的同志深入群众，访贫问苦，采取多种措施，照顾生活困难群众。他们出面和地主交涉，买回土地，分给农民，号召老百姓抗捐抗税，反对高利贷，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减轻了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困难，缓和了地主同农民的矛盾，推动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广大民众参加抗日的积极性进一步高涨。为了动员一切抗日力量，三八五旅模范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势利导，帮助地方建立抗日自卫队，开展各种抗日活动。部队首长还主动给地主、土豪、绅士赠送进步书刊，鼓励他们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经过教育争取，一部分地主、绅士开始觉悟，主动减租减息，募捐物资，为抗日救国做贡献。到1940年普选时，许多党外民主人士被选进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任职。

当时，驻守陇东的国民党顽固派口头讲抗日、讲团结，却常常蓄意制造磨擦事件，挑起双方争端。驻西峰镇的国民党专员公署，经常向驻地派遣特务，组织国民军训练，同抗日自卫队分庭抗礼，在庆阳组织了一支对付抗日自卫队的"壮丁队"，每当民运科组织自卫军训练或集会，"壮丁队"就攻击其"扰乱社会治安"、"破坏抗日"，甚至带上"壮丁队"冲进会场捣乱、示威。面对"壮丁队"的破坏，三八五旅民运科积极和国民党政府交涉，并给予必要的还击。

为了同国民党反动派顽固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进一步唤起广大民众的抗日斗志，三八五旅更加注重文艺宣传工作。三八五旅初到庆阳时，由于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和地主"八大家"的残酷剥削，庆阳广大农民的生活极其贫苦，反抗剥削和抗日救国的意识还很淡薄。面对这一情况，旅政治部主任谢扶民着手成立了三八五旅文艺

宣传队，把宣传工作视为与敌人斗争的武器，自己动手制作灯光、道具、服装、布景、化妆颜料等演出必需品，利用军民集会、重大节日、乡间庙会、下基层慰问驻军等机会，采取话剧、歌剧、舞蹈、秧歌、讲演、快板、皮影等形式，为驻地军民演出以宣传抗战为主旋律的文艺节目。有一次在庆阳西门外庙会上，国民党县党部派人演出一些麻痹人民抗日斗志的剧目。宣传队队长何德庆立即带领宣传队员赶去进行抗日宣传。他们针锋相对，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战形势，演唱《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保卫祖国》等救亡歌曲，很快把一部分观众吸引过来。在与敌面对面的斗争中，不仅锻炼了每一个宣传队员，而且加强了他们与白区人民的思想感情。驻防庆阳8年间，三八五旅文艺宣传队排练演出了话剧《逃难曲》《反抗》《抗日去》《送郎上前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歌剧《松花江九一八》，歌舞《工人舞》《农民舞》《儿童舞》《纪念列宁》《面包舞》《东渡黄河》，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我们是抗日先锋》等，宣传了党的团结抗日方针和农村减租减息政策，发动群众起来抗捐抗税、反对高利贷，动员群众发展生产、缴粮支前、锄奸防特、破除封建迷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三八五旅在庆阳亲民爱民，树立典范。三八五旅留驻庆阳期间，全体指战员自觉遵守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尽量减轻群众负担。旅团首长身先士卒，带领干部战士苦干实干，自行解决驻防期间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同时，关心照顾当地群众，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建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谊。

由于国民党西安当局供给的军饷和物资犹如杯水车薪，随后又纯粹停止供应，致使全旅官兵的吃饭问题成为影响边防守卫和军事训练的一件大事。为此，全旅干部战士自己开荒种田，种菜养畜，开办磨坊、油坊、豆腐坊、粉坊等作坊，仅一年时间，就从根本上改善了部队的生活条件。为了改变当地军民有病没处治疗的状况，1939年9月，三八五旅在庆阳马祖庙组建野战医院（系三八五旅卫生部下属单位，人员由旅卫生部部分人员与原中央红军教导师医院人员合并

而成)。当时医院器械就几把镊子,药品只有十几种,仅有医务人员十余人,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他们自己调配膏药、泡制中药,推广西医,热情为当地大批贫苦农民和军烈属病人免费治病。既为部队指战员提供了服务,也为当地群众患者解除了病痛,受到了广大群众的交口称赞,给陇东人民留下了一个个难忘的印象。

旅长王维舟在陇东驻防的八年中,时刻要求部队遵守群众纪律,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拥政爱民,做到军民一家。对于人民群众的疾苦,王维舟更是时刻放在心上,关心如同亲人,他专门从延安请来医生给当地一老太太治疗甲状腺肿大疾病,为挖"白板土"充饥的民兵史华的妻子发救济钱粮和衣服,并给背柴人让路,被陇东人民誉为"王善人"。

三八五旅留守陇东期间,旅部直属机关先后帮助群众收麦达1.8万多人次,锄草达3000多人次;义务为群众治愈病人达1000余人;自运粮、炭,给群众节省人工、畜力各21626个。战士们还经常给群众挑水、扫院、打围墙、修房子。三八五旅对庆阳民众的深厚情谊,彰显了人民军队人民爱,人民军队爱人民的宗旨,给陇东人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三、陇东根据地的保安部队

1937年9月,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队、独立营、警卫队进行集中整编,成立保安部队,陕甘宁边区设保安司令部,高岗任司令员兼政委,周兴任副司令员,谭希林任参谋长。边区保安部队组织上受边区党委和留守兵团领导。

庆环分区保安司令部成立于1937年9月,隶属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驻曲子镇,下辖曲子、环县、华池、固北、定环、盐池、定边中心县的保安队和第五保安大队(1937年9月建立,1938年3月改为独立第五营,1940年8月隶属陇东保安司令部,1941年1月编入警备二团)、骑兵营(1937年9月建立)、教导营(1937年9月建立)、警卫队

(1937年9月建立)。1938年,三边分区成立后,盐池、定边划归三边分区,4月,固北县随之撤销。之后,庆环分区保安司令部只管辖环县、曲子、华池3个保安大队,黎林、王世泰、吴岱峰先后任司令员,马文瑞任政委。

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党委、政府和八路军留守兵团决定成立陇东特区军政委员会,管理庆环、陇东两分区的军政问题。8月,庆环分区与陇东分区合并为陇东分区,原庆环分区保安司令部改为陇东分区保安司令部,机关驻庆阳,下辖合水、庆阳、曲子、镇原、环县、华池6个保安大队,吴岱峰任司令员,马文瑞兼政委,白寿康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1年1月,陇东分区保安司令部并入三八五旅,以三八五旅为主组建陇东军分区,管理庆阳、合水、镇原、曲子、环县、华池6县地方武装,王维舟任司令员,马文瑞任政委(后为甘渭汉),耿飚任副司令员(后为陈伯钧),甘渭汉任副政委(后为方强),耿飚任参谋长(后为刘随春)。当时,陇东军分区辖陇东独立营(营长马福吉)、陇东分区警卫队(队长王福贵,指导员孙世英)、回民骑兵团(团长马思义,参谋长杨静仁)。1945年11月陇东军分区改为陇东警备区。

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成立于1937年10月,张仲良任司令员,习仲勋兼政委,下辖3个保安大队。次年6月,奉边区保安司令部命令,第一、第二保安大队改编为独立第一、第二营,不久两个独立营与第三保安大队合编为关中保安第三团。1942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设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部队,贺龙任司令员,徐向前、肖劲光任副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高岗、林枫、谭政任副政委,张经武任参谋长,谭政兼政治部主任,傅钟、甘泗琪任政治部副主任。联防军司令部成立后,将陕甘宁边区划分为陇东、关中、延属、绥德、三边5个警备区。12月,关中警备司令部与关中保安司令部合并,成立关中警备司令部,文年生任司令员,张德生任政委,汪锋、王近山、杨拯民任副司令员,晏福生、徐立清任副政委。关中保安第三团改为警备三团,关中警备司令部

下辖警备一、二、三团。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还建立了县级军事指挥系统。抗战初期，中共庆阳各县委员会成立了军事部，作为各县军事的主管部门，1937年7月至12月，合水、镇原、环县、曲子、定环、固北等县委先后成立了军事部。关中分区新正、新宁两县也成立了相应的军事机构。县级武装力量除了保安大队外，主要是自卫军、武工队、游击大队等。

陇东的保安部队在协助八路军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维持地方社会治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1年11月，林伯渠在第二届参议会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边区的保安部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保安队是从过去的游击队发展起来的，它是边区的子弟兵团，是在地方生了根的。它的特点，是富有地方性，长期艰苦斗争的锻炼，使它惯于分散行动……它配合了正规兵团保卫了河防，肃清了边区境内打家劫舍具有强大背景的土匪，铲除了他们在边区地界上的支点，如赵老五的甜水堡子，张廷芝的阎家寨子，使边区秩序获得了安全。"①

四、陇东分区自卫军的组建

自卫军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赤卫军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分基干自卫军和普通自卫军。1937年8月25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作出《关于改造赤卫军的决定》，指出："为了适应抗战环境与民主制度，赤卫军改名为抗日自卫军，它是半军事性质的群众武装组织，它是保卫边区的武装力量，它是抗日的后备军，这是自卫军目前阶段的性质。"为了便于集合起见，自卫军的编制一般以地理上接近为原则，按照班、排、连组织队伍。妇女单独编制，以便利工作和训练。自卫军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第261页。

以营为最高组织，直接归当地政府管理军事的人员指挥与领导。[①] 根据陕甘宁边区党委的决定，赤卫军相继改编为自卫军，截至1938年底，陕甘宁边区自卫军人数发展到14.5万余人，其中基干自卫队有2.18万人，并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指挥系统"[②]。

按照陕甘宁边区党委的统一部署，陇东根据地各县相继将赤卫军改编为自卫军或重新成立自卫军，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自卫军领导与指挥系统。1937年10月，庆阳县成立了民众抗日自卫军大队，王兴有任大队长，万成章任副大队长，其骨干力量是庆城中队，下辖4个分队，共100余人，同时各乡、区都建立了自卫队。1937年12月，新正县、宁县分别已有自卫军2430名、1963名[③]。1940年2月，庆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在原民众抗日自卫军的基础上，建立了庆阳县抗日自卫军大队，县长朱开铨兼任大队长，区建立了自卫营，乡建立了自卫连。至1942年，庆阳县自卫军得到快速发展，全县有普通自卫军25个连，2510人，基干自卫军12个连，845人。至1944年，环县基干自卫军有39个排，89个班，898人；普通自卫军45个连，76个排，215个班，2740人。华池全县编制基干自卫军5个连，15个排，41个班，共486人。普通自卫军32个连，71个排，196个班，2969人。[④] 华池县自卫军组建较早，实行以"区组营，乡组连，行政村组排班"的模式组建，发展较快，至1946年，共有自卫军2938名，其中普通自卫军34个连，74个排，197个班，共2557名；基干自卫军5个连，18个排，35个班，共381名。[⑤] 1937年，红军援西军到达镇原后，解放了镇

①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1939年)，甲1，内部馆存本1994年印行，第36－37页。

② 傅秋涛主编：《中国民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4页。

③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陇东的军事斗争》(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9－180页。

④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陇东的军事斗争》(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1页。

⑤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陇东的军事斗争》(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3页。

原三岔、马渠、方山等地，同年夏三岔区开始组建自卫军1个营，300余人；8月，马渠组建自卫军1个连，30多人，年底发展到90多人；1939年春，平泉、新城、中原3镇组建了自卫队，队员66人；1940年3月，镇原全县自卫军改编为1个营，各乡设立了自卫队。合水县自卫军建立于1937年9月，普通和基干自卫军被编为5个营，37个连，3053人，有长矛2197支，大刀146把，鸟铳160支。1940年2月，自卫军大队改编为人民武装大队。新宁县的民兵源于1942年成立的九峴井儿原游击队，有指战员23人，装备手枪2支，长枪17支。到1944年已经发展到有基干民兵791人，编为25个排，81个班，有快枪、土枪78支，马刀55把，长矛594杆。

自卫军因不时补充保安队或参军，编制和人数不稳定。据统计，到1942年，陇东分区共有自卫军、少先队14900人，其中基干自卫军4600人，普通自卫军7400人，少先队2900多人。自卫军设20个营75个连，少先队分14个大队69个中队。

抗战时期，自卫军是边区乡村基层社会的武装保卫力量，是在抗日根据地的特殊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是不脱离生产的民众武装，拿起武器是兵，放下武器是民。陇东根据地的自卫军和民兵组织，在发展根据地生产和建设、打击土匪武装、维持地方社会秩序和保卫根据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林伯渠所言："自卫军的普遍建立，使得边区处处成为打击敌人的堡垒。"①

五、回民骑兵团的成立

1939年1月至1941年6月，时属甘肃省的海原、固原（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海原县、固原县）地区的回民组织了3次大规模武装起义。1941年6月，第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马思义等率起义军余部200余人突破重围，进入陕甘宁边区的环县庙儿掌。环县党组织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第261页。

和苏维埃政府对起义军的到来表示欢迎，安排他们暂驻砖城子。马思义等三位起义军代表在环县受到环县党政领导和八路军警备二团的热情招待。在庆阳，陇东军分区司令员王维舟、陇东特委统战部领导设宴招待了他们，并详细询问了起义经过和当时的状况。在征求马思义等代表的意见后决定：进入边区的起义人员仍用原建制，不另整编，给养按照八路军标准由陇东军分区供给。

马思义等在庆阳期间，尾随的国民党军队不时侵入边区，偷袭起义军驻地砖城子，为了保护这支起义队伍，陇东军分区让其移驻苦水掌，不久又移驻离国民党统治区较远、条件较好的合水县上柳沟，并在各方面给以帮助和照顾。起义军驻扎上柳沟后不久，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带领来陇东进行慰问演出的延安歌舞团去为他们演出，中共中央还派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从延安专程赶来看望，并赠送"浩气长存"四字锦旗，鼓励他们的斗争精神。

1941 年 7 月，为了把这支回民军队改造为抗日军队，边区党政组织特意安排马思义、马智宽等 4 位代表到延安参观学习，同时派鲜维俊代表边区回协到陇东慰问他们。马思义、马智宽等在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先后接见了他们，向他们宣讲了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表示一定支持和帮助回族人民争得自由和解放，并保证不编散起义队伍。同时，在延安参观期间，经边区联防司令部和马思义等人商讨，将起义部队改编为回民抗日骑兵团，下辖 3 个连，马思义为团长，直属联防军司令部，由驻防陇东的三八五旅代管，西北局派杨静仁为党代表（对外称政治教官）。但由于起义部队成分复杂和起义军的家属仍滞留西海固，1942 年 1 月，回民骑兵团计划返回西海固地区，再次组织起义。经陇东地委统战部建议，回民骑兵团将老人和小孩留下，在曲子成立留守处。起义军离开边区后，再次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1942 年初，马思义等率领剩余的 30 余骑返回边区苦水掌。陇东军分区及时派人接应，给予安慰，安排他们回驻合水县蒿咀蒲。1942 年秋，回民骑兵团的人马陆续回归，增加到 80 余人，重新编为 1 个连，仍保留原来

番号，驻防合水太白开荒生产。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和尊重这支不足百人的回民武装，为了将回民骑兵团彻底改造为人民军队，“对他们进行了多方面的培养教育：调马思义、周尚义、马希杰等十余人到抗大和民族学院学习；在起义军中向战士进行抗日救国教育、民族政策教育、新民主主义革命教育以及宗教政策和自然科学的教育”。通过耐心教育和各方关怀，“使这支队伍干部和战士的政治觉悟有很大提高，开始接受党的领导”。后来，马思义、周尚义等起义领导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同年11月，回民骑兵团开赴延安，八路军陕甘宁边区联防军司令员萧劲光接见了全体指战员，并代表中共中央和边区联防军司令部正式给回民骑兵团颁发委任状，任命马思义为团长，杨静仁为参谋长，部队编为1个连。

1943年，回民骑兵团返回庆阳，仍驻防太白，开展大生产运动，开荒2000余亩，实现了粮、油、菜、肉和马草的自给。中共中央和庆阳党政军十分重视回民骑兵团，在各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这支队伍的成长，集中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对实践和宣传党的宗教政策，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467页。

第十一章 党领导的反磨擦斗争

第一节 战略相持阶段陇东的复杂局面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虽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携手抗日。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其反共立场，对中国共产党存在着极强的排斥心理。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后国民党中央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防共、限共的政策和措施。国民党顽固派也极力推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1月11日，国民党天水行营制定了《处理异党实施办法》的"绝密"文件，称陕甘宁边区为"伪边区"。政治方面，在边区周围各县"充实力量，逐步削弱伪边区"，"由陕甘省府督饬各该省保安处积极加强所有沿边各县之保安团队，并严限完成。万一有不能充实之县份，则调国军补充之"，"限期切实整编沿边区县份之保甲"。军事方面，为了"巩固沿边区各县，应由陕西保安处调保安团4团分别布置，以两团配备于南线之旬邑、耀县、洛川、宜川一带，以两团配备于北线之定边、横山、米脂、绥德、延川一带，并择适当地点屯驻统一指挥，期以实力推行政令"，"至宁夏之盐池、豫旺及甘肃之环县、庆阳、宁县一带，亦应同样办理，并得酌驻国军辅助之"。教育训练方面，要停办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结束八路军的"募补区域"，成立"陕北师管区"。[①] 12月，陕西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0页。

省政府提出了《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制定了限制中共的目标："（甲）消极的：防止异党活动，维持现状；（乙）积极的：制裁异党活动，恢复原状。"陕西、甘肃两省制定了防止中国共产党的原则、共同认识、情报沟通、军事联防等办法。在军事上：（甲）两省毗连各县，应择定若干地点，实行联防会哨；（乙）一方如采取军事行动，对方应予以声援；（丙）异党如有进攻某方之企图，应事先通知防范。如时间紧急时，亦得呈令有关区县遵办，不受省区之限制；（丁）保安团队及军事配备，应采取密切之联系与合作；（戊）原管县政府因情况混乱，指挥不便时，得由毗邻之县政府暂行指挥，不受省区之限制；（己）因联防所需之给养，由两省政府负担，事机紧迫时，得先有地方筹措，再行归报。

这两个办法的出台表明陕西、甘肃两省联合起来，共同从政治、军事方面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武装力量，而重点就是处于两省交界地区的陇东分区和关中分区。

一、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积极准备反共磨擦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为调查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活动，于1939年8月在庆阳设立了国民党甘肃省第三行政区党务通讯处，该处对内称"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陇东包围区调查统计室"，直接受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领导。主要任务是："防止异党活动，搜集异党情报；从事社会调查，建立通讯网络；发展特情人员，训练特工人员。"[①]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该组织在庆阳各县设有通讯员。1940年10月，陇东调查室与中统局西北督导区举办了"甘肃省陇东党务调查工作人员训练班"，至12月，共举办两期，训练特工182人。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如镇原县党政部门有国民党县党部执委、干事、区分部书记、镇长、县政府科长

① 庆阳地委党史办主编：《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第342页。

等。他们在学校也建立了组织，如在镇原中学发展成员10人，任务是监视进步教师、学生，防止共产党活动。

军统和其他军事系统也在庆阳建立了特务或情报系统。1938年2月，西峰建立了军统陇东组，逐渐渗透到各个部门，主要收集陕甘宁边区的各类情报。1941年，军委会办公厅特检处在西峰设立邮电检查所、西峰稽查所。1942年，第三十八集团军调查统计室建立了西峰小组。这些特务组织"白日在各路口哨卡盘查过往行人，搜身敲诈；黑夜到各村打门卸户，搜捕共产党员和区乡干部"。[①] 国民党在庆阳建立的各种特务组织，主要任务是搜集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报，伺机进行破坏活动。当时的国民党报纸《新陇东报》披露，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每月拨款3000元，以救济边区难民的名义，实行所谓"生产救济"和"难民训练"。实际上，对所救济的难民均施以政治训练，作为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刺探消息、当向导、做宣传之用。[②]

伴随着政治上的斗争，国民党对边区实行军事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主要是胡宗南的部队，采取的主要措施是：(1)以国民党正规军为主，各省地方团队为辅，构成沿边区的军事封锁线。(2)沿边区修筑内外层碉堡。内碉驻正规军，外碉驻地方保安队。以保安队为进入边区机动部队，如与边区发生军事冲突，正规军须立即出动支援(在抗日形势下，如共产党方面指责，责任由地方团队出面承担)。(3)在陕西三原、甘肃庆阳分设军事封锁指挥部。以彬县、洛川、宜川、庆阳、正宁为据点，各常驻师长以上军官一人，作为前线临时指挥官。(4)严禁正规军和地方团队沿封锁线补充兵员，并要注意军队风纪和军民关系。(5)沿封锁线各交通要道，设置盘查站，严密盘查出入边区人员。"以上由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负责执行，

① 慕思恭：《建国前镇原县国民党特务组织及其活动》，《庆阳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82－83页。

② 《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上)，第189页。

并计划相机'扫荡''囊形地带'(即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然后逐步向边区进攻。"[①]军事封锁的具体落实情况是:国民党军队在边区周围构筑了5道封锁线。每道之间相距数十里,整个封锁线的纵深达百里以上。每道封锁线由一个接一个碉堡群组成,每个碉堡群有1—2个母堡,还有若干个子堡。每座碉堡的周围有一道道散兵壕、外壕和鹿砦。每个碉堡群之间,有战壕相通。碉堡纵横交错,密如蛛网。仅在洛川至中部(今黄陵)相隔不过80里,第一道封锁线的碉堡就有518座之多。和这些封锁线相呼应的是包围边区的军队,国民党军队在边区的北、西、南三面(东面是日军)部署了19个步兵军,2个骑兵军,3个保安旅和17个保安队,共计40多万兵力。其中,封锁和包围边区南边的主要是胡宗南部,其部署是:第八十军以同官为中心,守备从宜川、洛川、耀县以北及其以西地区一线;第七十六军以三原、彬县为中心,右接八十军,守备淳化、三原、旬邑、彬州地区一线;第四十二军以平凉为中心,右翼联系七十六军,守备宁县、西峰镇、镇原一线;第五十七军则从固原到黑城镇、同心城一线担任守备任务[②]。陕甘宁边区南面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压力。

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磨擦的发端

陇东分区和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消灭边区、限制中国共产党活动的主要目标。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制造磨擦完全是受国民党中央和甘肃省政府的支持和指使。

早在1938年2月,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不久,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即通令陇东各县不得与边区政府发生关系。同年4月,为限

① 李秋龙:《国民党反动派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活动纪实》,《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② 范汉杰:《抗日战争时期胡宗南部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罪恶》,《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9页。

制甘肃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动，下令查封了60余种进步书刊和十几种进步报刊杂志，并指示陇东各县对八路军部队派员进行民运工作进行种种限制。同年11月，国民党镇原县县长邹介民为限制共产党领导民众的抗日活动，强行解散了镇原各地的抗敌后援会、农会等民众团体。国民党庆阳县县长下令解散各地群众抗日组织。国民党宁县县长取缔抗日救国会，禁止民间成立抗日救亡组织。

1939年3月10日，甘肃省民政厅厅长施奎龄给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的签呈中说："本厅认为对于陇东纠纷，应力使其地方化，严重化，即中央卸责于本府，本府诿之于三区专署，由三区协地方驻军和保安队予以抵抗之，殆事态扩大，则申请中央制止。以此办理，可驱其势力出陇东，败则由中央出头制止，且有词可假。其结果……将八路军调开陇东，共产党当俯首听命，如不服从，则中央有词可依据制裁。"3月13日，朱绍良将该计划电告行政院孔祥熙，孔给蒋介石的电呈中说："陇东形势日趋严重……据钟专员来电，职意较易伸缩，不但中央可诿为不知，本府亦可处于斡旋地位，既不失国际之同情，又可留收拾之地步。"5月31日，蒋介石复电称："所援第三专员应付八路军机宜甚妥，仍希饬令力行。"6月2日，孔祥熙复电第三区："缜密周详，至是佩慰，即督饬所属妥为应付。"在得到国民党中央和省政府支持后，国民党第三区专员钟竟成肆无忌惮地和八路军搞磨擦，立即下令："凡未经事前呈准在案，而假借共产党或八路军、新四军等名义擅自组织武装者，当地驻军得随时派兵遣散，不得有误。""发现有宣传阶级斗争、鼓动抗租抗税、罢课罢工、破坏保甲、扰乱治安者，应一律依法从严制裁。"

为了达到限制、消灭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国民党甘肃省当局专门规定了所谓的"八项方针和十二项原则"。其要点是：边区组织，在未奉中央明令及正式委派负责人时，应认为非法，不予承认；对于边区政府，应绝对避免行文关系。如必要时，亦应函由当地驻军转达；对于与特区接壤之地域，应遴选干员，充任联保主任保甲长，县长不时巡视，以提高人民信仰；县境驻有八路军地带，应严密监视，并随时注

意其行动；八路军如派员赴县进行民运或其他工作，应竭力防范，以能不令参加为原则，但万不得已时，应会同县党部或其他机关，据理交涉，依中央法规办理，并由县党部指导及县政府监督为原则。为了达到限制八路军的目的，一方面，国民党甘肃当局"调整专员县长人选，该省三区专员钟竟成、庆阳县长王致云、宁县县长方镇五等，皆属本党忠实党员，服务多年，志虑忠诚，堪资倚畀。"另一方面，整理保甲，"并举行公民宣誓，借以组织民众之效。"[①]同时，恢复曾于1936年6月被中国共产党领导当地群众推翻的国民党环县政府，县治设在甜水堡。这些都说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甘肃省地方当局在限制、取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方面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1938年，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在陇东制造磨擦事件。1938年3月，国民党驻合水县店子区区长王永清阻碍八路军购买军粮，七七〇团三营派士兵与其交涉，王永清将士兵"缴械扣留"。三营八连连长亲自去交涉，对方"不但不给购买，并反面大骂'土匪'，将我连长捆去，缴去武装。我罗营长闻讯率大兵一排前往救济[援]，该城上保安队当即开枪射击，并投手榴弹"。[②] 同年12月，国民党军队一五六师鲁敏团部抢占八路军七七〇团一营在白马铺、赤城一带防地，声言要消灭八路军。1939年1月15日，国民党同心县第二区区长白学士率民团抢劫环县毛井区六乡，拉去群众16名，锄奸主任1名，当做商品卖给该县政府充军。1939年1月至4月，类似的抢劫事件在庆阳县发生2起，环县发生1起，镇原县发生2起。[③] 此后各地类似的磨擦连续不断，逐渐演化为军事冲突。

---

① 《陇东纠纷概况及处理之经过》，《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上），第198页。

② 《陕甘宁边区周围磨擦事件调查材料》（1939年4月），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1939年，第501页。

③ 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抗战以来国民党内反动派武装破坏边区简录》，《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上），第144－146页。

第二节 陇东两次磨擦事件与反磨擦斗争

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地区制造磨擦事件的目的就是要威胁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陇东军民开展了针锋相对的反磨擦斗争，这些斗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政治智慧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一、第一次陇东磨擦事件

1939年4月8日，国民党第三战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钟竟成派西峰镇保安队到镇原县屯字镇，将中国共产党派去做民运工作的6名工作人员及当地抗敌后援会主任逮捕，押往西峰镇专署严刑审讯。随即又到中原镇（南三镇之一）逮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敌后援会3名工作人员。八路军忍无可忍，遂将国民党南三镇助理员扣押。4月21日，国民党第三区专员钟竟成将西峰保安队100余人及驻西峰镇的一〇五师1个营开进太平镇，又调集其他各县保安队900余人及西峰镇2个班，分头向镇原县城进发。国民党镇原县保安队为配合军事进攻，开出城外，城内的国民党机关也搬出城外。八路军因国民党保安队出城，遂将城门关闭。[①] 25日，留守城内的国民党保安部队20余人和常备队60余人，配合外部攻城，袭击八路军守城部队。八路军奋起还击，将其大部俘获，缴获长短枪42支。城内国民党保安部队被缴械后，城外围城部队对镇原城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事件发生后，八路军坚持守城，国民党军队一六五师及平凉方面约3个团的兵力向镇原城周围运动，双方形成对峙之势。

在镇原磨擦事件发生的同时，国民党在宁县也挑起了磨擦。早

① 《陕甘宁边区周围磨擦事件调查材料》（1939年4月），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1939年，第503－504页。

在1937年10月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〇团一营驻防宁县时，就遭到国民党宁县当局的反对，在住房、购买粮食方面处处刁难。胡宗南部形成对边区的包围后，国民党宁县当局一直想把八路军挤出宁县县城。因此，方镇五就任国民党宁县县长后，多次提出八路军退出宁县县城。其无理要求被八路军拒绝。1939年4月，镇原发生磨擦事件期间，国民党军队在宁县也做军事准备工作。21日，国民党军队一六五师一部进驻宁县，一部分驻于庙坪，一部分驻于五里铺，一部分驻于连道，合水县保安大队也进驻南义井，对驻防宁县的八路军形成包围之势。方镇五决定以保安队的力量消灭驻防宁县城的八路军七七〇团一营。中共地下党员将方镇五动手的消息告诉了一营，一营决定先发制人。4月29日，双方在宁县城发生冲突。在战斗中，方镇五的保安队被打死6人，伤12人，被俘400余人，缴枪400余支，方本人亦受伤。八路军完全控制了宁县县城，并打开县政府收缴了县府、党部及保安大队的文档和印信，方镇五率余部死守辑宁楼，双方成对峙局面。

1939年4月，由国民党挑起的国共两党军队发生在镇原、宁县的冲突，被称为"镇·宁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高度关注。中共中央书记处就"镇·宁事件"指示周恩来等人向蒋介石提出交涉："(甲)饬一六五师遵蒋前令返防全部退出陇东五县。(乙)庆阳、合水、镇原、环县、宁县仍属八路军驻防，任何友军不得进驻。(丙)令饬朱绍良速即电令西峰钟专员，撤退保卫镇原之各地保安队，停止进攻宁县之挑衅行为，一切问题听候双方派员秉公调查解决。"[①]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分别致电蒋介石、朱绍良等人，说明事件真相，要求双方派代表调查处理。蒋介石、朱绍良回电，表示同意派代表谈判。八路军派王观澜为代表，朱绍良派谭季纯为代表，双方于5月7日在庆阳驿马关进行谈判。在谈判期间，国民党不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陇东等地磨擦问题致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电》(1939年5月3日)，《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上)，第73-74页。

断挑起事端，致使谈判中断。为了给八路军施加压力，国民党代表谭季纯谈判中途返回兰州，后经八路军再三电邀，朱绍良又令谭季纯返回西峰继续商谈。6月9日，方镇五企图内外夹攻八路军，导致冲突再次发生，谈判不得不再次中断。6月23日，共产党提出了4项具体解决办法，并于26日派人到西峰欢迎谭季纯来庆阳，双方重开谈判。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为谭季纯、一六五师政治部主任任冠军、庆阳县县长王致云等4人，八路军方面的代表为王观澜、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政治部主任谢扶民、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千等4人。6月29日，国共双方达成了《镇、宁两县事件初步解决办法》，镇原和宁县恢复磨擦以前的状态，即镇原恢复4月20日以前的状态；宁县恢复4月23日以前的状态。

根据协议，八路军三八五旅镇、宁两县驻军打开城门，恢复原来状态，交还所缴获的国民党军队枪支、弹药，释放被俘人员，主动调整了两县的驻军。7月1日，第三区驻西峰保安队撤离镇、宁两县。2日，国民党一六五师撤回原防西峰镇、肖金两地，镇原和宁县两县县长也分别回城行使职权。国民党一六五师在给陈诚的报告中也说："一、驻镇原之保安队均于七月一日晚回抵西峰；二、一六五师部队于三日晨撤回西峰镇及肖金镇各防区；三、邹县长已入城，方县长已行使职权。"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第一次陇东磨擦事件终于平息。

二、第二次陇东磨擦事件

第一次陇东事件后，国民党第三区专员钟竟成不但不吸取教训，反而积极筹划，准备更大规模的反共磨擦。钟竟成在对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制定了《奸党对陇东之阴谋及我方对策之概述》，其中说："九月间我方决定以全力确保镇原，政治军事各方面力量均集中于此。十月间加派大批民运及特工人员，前赴镇原开展工作。"工作方法包括4个方面：(一)毁灭中共在群众中的威信，使其一切工作无法发展，并进而瓦解其原有之各种组

织，同时提高政府威信，扩大一切民众组织，使全体民众均在政府正确领导下组织起来。（二）对中共政工人员除以一切比较和平之方法（例如禁止民众与其往来等）加以封锁，使其不能下乡活动外，同时利用其本身之某些弱点，进行分化，以加深其动摇。（三）发展通讯网，采取复层组织，使中共一有行动我方立即详悉。在消极方面可以立即予以周密之监视，积极方面更可迅速而正确的决定有效之对策。（四）一切工作均以武力掩护进行。其步骤是："第一步以义警出面执行，保安队在幕后策应，表面伪作不知。基此要求，故积极充实义警力量，加紧训练，补充弹药。如义警万一力量不足，第二步方以保安队出面执行，即发生冲突亦所不惜。盖此时我保安队每至一镇，首先构筑坚固工事，以资防御，每处均驻一中队至少两分队，集中镇内，所有给养及下乡逮捕奸徒训练壮丁等，均由义警担任，保安队决不分散。"同时，为了牵制镇原方面的八路军，特令合水、庆阳两县县长恢复合水及庆阳三、四区的国民军训练。

1939年10月，为了加强对八路军的军事封锁和打击，限制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不力的镇原县县长邹介民被调走，CC[①]派分子孙宗濂被任命为镇原县县长。孙宗濂到任后，积极限制、镇压我党在当地举行的各种活动。11月19日，党领导的镇原县群众团体组织3000余人去县城向国民党县政府请愿，要抗战，要自由，强烈抗议当局镇压民众抗战，取消民众团体，破坏国共合作等做法。孙宗濂表面上答应了群众的要求，但事后逮捕了组织活动的王天林、陈三新等6名共产党员，并将其中4人活埋，1人枪杀，1人后死于狱中。

1939年冬，随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掀起和全国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的发生，陇东国民党地方当局再次行动，边区基层政权、八路军驻军都成为国民党驻军、地方武装力量和依附于国民党政权的土匪袭击的目标。

国民党宁县县长方镇五反共最积极，也最坚决，第二次陇东事件首

① 即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先从宁县爆发。1939年12月10日晚，方镇五率领保安队，在胡宗南第九十七师一部的配合下，突然袭击驻宁县八路军警备七团三营，挑起了第二次陇东磨擦事件。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庆阳地方当局一味扩大事态。11日，钟竟成先后派保安第十二、十三、十六中队增援宁县。12日，胡宗南第九十七师1个步兵营前往宁县增援。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下，警备七团三营撤出宁县城，随之被国民党军队占领。

在宁县事变发生之际，钟竟成与合水县县长翟大勋密谋，准备袭击驻合水县城关的警七团团部及特务连，钟竟成派第六保安大队十五中队进驻何家畔。12月11日，八路军警七团特务连1个班在去庆阳返回的当晚，被第六保安大队无理扣留，警七团团长袁渊与合水县长兼保安大队长翟大勋交涉，没有结果。因此，八路军先发制人，命令特务团包围了合水县政府及第六保安大队部，将30余人缴械，俘虏县长翟大勋等12人。12日下午，钟竟成派李鸿轩挑选精干保安队增援合水，在半路得知八路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合水县城，只得返回西峰。

同时，镇原的八路军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袭击。"镇原、宁县事件"后，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〇团二营奉命接替三营进驻镇原县城。就在国民党军攻打宁县城后，12月14日深夜，国民党镇原县县长孙宗濂率保安队400余人，突然袭击驻防的七七〇团二营，双方展开激战。次日晨，国民党九十七师五十八团1个步兵营、1个炮兵连，由屯字开赴镇原城东南，隔河用迫击炮向七七〇团二营阵地轰击，二营被迫放弃西城楼。双方激战两天后，因实力悬殊，八路军于16日撤出县城，镇原县城被国民党军占领。

在第二次陇东磨擦事件中，"环县事变"造成的影响最大。1939

年12月31日半夜，国民党环县县长刘谦派赵思忠[①]率部150余人攻打洪德区，抓走并杀害了河连湾小学教员王佑、洪德自卫军营长高三德，抢劫区政府公物以及工作人员未带走的被毯、衣物等，并将各种文件焚毁："合作社完全（被）抢去，并抢劫大洋五百三十五元七角，内有兵站计洋一百八十元。"在抢劫了洪德区后，1月1日赵思忠带领300余人，直达县城，"企图消灭本县保安队，捉杀工作人员，占据环县"。党领导下的县保安队出城迎战，"当场击毙六名，追至途中击毙四名，共十名，被捕十三名，负伤者十余名，并将赵老五之马亦击毙。该匪首亦负伤，收枪七支，并获锚（矛）刀、皮袄、手榴弹等"。1月3日，虎洞区的合作社、学校，第一、六乡政府也遭到抢劫和破坏[②]。1月4日至10日，虎洞、洪德、毛井等区又遭到赵思忠等股匪180余人的袭击，3个区政府的文件、桌凳、布匹等全被烧毁，附近群众损失大洋800余元，毛驴18头，骆驼12峰，麦子12石。15日至2月1日，赵思忠、张廷杰策动耿湾、车道、洪德、虎洞、环城5个区21个乡政府的自卫军叛变，先后杀害各级干部47人，抓走20余人，抢去步枪29支，合作社股金和抗日经费3600元，公粮130余石，群众牛羊万余只，粮食财物计数十万元以上。根据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调查，从该事变发生到2月，环县损失巨大，主要包括："（1）摧毁我区乡政府共十八处，其中区政府四处，计洪德区、虎洞区、耿湾区及车道区，乡政府十四处，计环城区四、五、六、七乡，洪德区一、二、四、五乡，耿湾区三、四、五乡，车道区二、三、四乡。（2）杀死、拉去我方干部共二十人。（3）摧毁我方学校四处，计：环城区一处，洪德区二处，虎洞区一处。（4）抢去我方合作社五处，共计五千元：环城区一处，损失千余元；洪

① 赵思忠，回排行第五，故环县人都称其为赵老五。1936年6月，红军西征解放环县后，赵思忠带领家眷及30余名匪徒逃到大、小方山一带，和国民党地方政府合作，成立大队，自任大队长，与红军和苏维埃政权为敌，多次袭击红军游击队、工作队。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赵返回甜水堡，势力发展到200多人；9月，在环县南政花儿山整编，自任"司令"，继续与抗日民主政府为敌。

②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43－45页。

德区一处，损失千余元；虎洞区一处，损失八百元；毛井区一处，损失千余元；车道区一处，损失千余元。(5)抢去我方公粮：洪德区八十石，耿湾区八百元(粮代金合二十多石粮)。(6)抢去我方枪支：长枪二十二支，计车道区八支，耿湾区十三支，环城区一支；短枪四支，计车道区一支，耿湾区一支，环城区二支。"[①]另外，这次事变中，全县有17个乡的自卫军叛变，"共强迫领去自卫军人数约二千余人。"[②]可见这次事变对党的基层政权的危害之大，环县北部党的基层政权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三、陇东的剿匪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活动着一些依附于国民党地方政权的政治土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些活动在陕甘宁边区的土匪受到沉重打击，有的退出边区，有的蛰伏下来，有的被国民党军队收编。抗日战争初期，红军主力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后，一些土匪又活跃起来，"张廷芝、李继俊先后脱离国民党部队，窜扰陕北西地及陕甘宁边区一带；范玉山骑匪窜扰三边一带；陈老大匪部窜扰清涧周围；关中夏老幺、陕甘宁赵老五两匪，名为民团，实际上完全是土匪行为，进行破坏边区活动"。[③] 据统计，抗日战争初期，在边区23县境内活动的土匪有40余股，4000余人，2000多支枪。这些土匪有的被国民党中央军收买、唆使，窜进边区境内进行袭扰、破坏，有的则受边区境内国民党县长和保安队支持、庇护，为非作歹，寻衅闹事，其中有些就是保安队"哗变"为匪的。活动在环县甜水堡和宁夏交界地区的土匪赵思

① 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抗战以来国民党内反动派武装破坏边区简录》，《陕甘宁边区统东的军事斗争》(上)，第148－149页。

② 高岗、王世泰：《关于环县自卫军叛变情况给林伯渠高自立的报告》1940年2月25日，《陕甘宁边区统东的军事斗争》(上)，第105页。

③ 郭洪涛：《彻底根绝土匪汉奸的破坏捣乱》，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年－1939年)，第447页。

忠是边区境内最大、也是危害最严重的一股。1939年，国民党依靠其势力恢复了环县政府，赵思忠也依靠国民党地方政府获得了"合法"的地位，被国民党环县政府任命为保安大队副大队长。

除了赵思忠股匪外，陇东还活动着一些股匪，如耿子平股，有25人，枪20支，在赵思忠领导下单独成股，活动于环县黑城岔、姬家原一带；缪福禄股，有30多人，依附于赵思忠，活动于环县姬家原一带；陈彦科股，有9人，枪8支，在环县一带活动；张生明股，有20人，枪20支，活动于华池与志丹交界地带；毛老九股，有16人，枪13支，与赵思忠有勾结，活动于环县虎洞一带；冯德禄股，有14人，枪14支，与赵思忠有勾结，活动于环县一带；耿天海股，有10余人，枪7支，与赵思忠有勾结，活动在环县一带。陇东的土匪主要活动在环县一带，而环县的土匪大多与赵思忠有联系。此外，在宁夏等地还活动着一些股匪，如豫旺二区周秉林、刘生德二匪有四五十人之众，有二三十条枪，自称民团[①]。这些股匪经常越境抢劫边区民众财物和破坏党的基层政权。

活动在解放区及其周围的股匪，给党的基层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很大的威胁。1938年4月12日，赵思忠部袭击了驻环县河连湾中共环县县委和县政府机关，县保安中队长张俊禄等7人牺牲。1938年12月，豫旺县的土匪周秉林、刘生德，勾结耿子平等匪，"乘隙入我车毛二区，捣乱行政组织，劫夺群众毛驴10余头，奸淫妇女"。活动在环县耿湾一带的"缪福禄、耿子平、史彦芳股匪横行，摧毁耿区组织，戕杀工作人员"。1939年6月，环县车道区自卫军连长乔炳章被土匪赵思忠杀害于苦水掌。同年9月23日至10月18日，环县耿湾、毛井、虎洞等区遭受土匪赵思忠的袭击，虎洞区乡长张建珍等人被俘虏，庆环分区保安科干事林有月被杀害，群众衣物、钱财被抢劫。12月，环县朱尾山土匪李彦才股80余人到毛井区仓库抢劫粮食，被八路军独立五营截击，缴获李匪步枪30余支，马10余匹。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第168页。

对边区政权和民众生活危害最大的是那些依附于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政治土匪，每当国民党地方当局制造磨擦事件时，这些政治土匪都是急先锋，如环县事变，即是政治土匪赵思忠所为。这些土匪的抢掠烧杀，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民党地方顽固派制造磨擦事件，破坏边区基层政权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国民党地方武装对陕甘宁边区一种变相的军事进攻。

因此，在第二次陇东磨擦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除了在政治上求得有利地位外，在军事上对那些死心塌地依附于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土匪也坚决予以消灭，以削弱国民党顽固派的力量。政治土匪赵思忠是对陕甘宁边区危害最大的一股，边区政府对消灭这股土匪十分重视。1940年1月30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给庆环分区专员马锡五发出指令："随时选择有利时机，将该匪消灭之。"[①]2月2日，又指出："对剿匪工作应严密布置，并打击一切汉奸之活动。再对于各惯匪应以肉体歼灭，至[只]对非惯匪而年轻可教育者，才争取之。仰即转饬该环县县长杨玉亭知照为要。"[②]2月3日，再次就剿匪问题发出指令，要求环县"一面发动自卫军、保安队配合警备二团严厉清剿，务期彻底根绝匪患。一面[令]各级政府及群众团体之工作人员提高应有之警觉性，随时注意不测之事变，避免无谓之损失"。[③] 按照边区政府的指令，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和三八五旅立即研究制订歼灭赵老五土匪的作战计划，以求尽快剿灭这股政治土匪，平息叛乱。"[④]为了配合剿匪行动，陇东地委和环县县委立即组织工作团全力以赴做好后勤工作，工作团团长由地委秘书处秘书长孙君一担任，副团长由县委统战部部长张镜如担任，县区乡各级干部参加工作团，深入农村积极动员送粮送草、抬担架，担任运输工作。环县、华池两县动员2000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41页。

②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41页。

③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52页。

④ 雷恩铭：《"环县事件"的回忆》，《陕甘宁边区统一的军事斗争》（上），第325页。

多名群众支前，配合部队作战。曲子县2月18日动员担架队员300名，并制担架30副，赴环县帮助军队消灭赵匪。

根据留守兵团的部署，1940年2月，八路军警备二团团长兼政委甘渭汉率1个步兵营、1个炮兵连赴环县剿匪，参加的还有分区独立五营营长刘懋功的2个连。2月16日，集结在环县的八路军警备二团、独立五营奉命进剿长期活动在环县的土匪赵思忠，次日攻打赵匪老巢甜水堡。就在当天，边区政府为配合八路军消灭这股惯匪，就环县清剿土匪及善后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一）环县为赵匪欺压最厉害的区域，非剿灭赵匪不足以巩固该区。（二）军事上剿匪，应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自己、瓦解赵匪同时进行。（三）平日对于赵匪扰乱一次，即应加紧对民众宣传一次，以团结民众与干部，使民众对赵匪痛恨加深，使干部与民众积极起来反对赵匪，而不是消极的畏匪或走到附和土匪。（四）县政府在赵匪每次扰乱后，或干部与群众正在发生动摇时，没有立即派出得力干部下区乡团结干部与民众，提高民众，而似乎应付不来，以至事件不是消灭反而扩大了。（五）目前一切工作是团结干部与民众，以巩固自己而消灭赵匪，征粮与扩兵工作方可完成。"①

在这次剿匪战斗中，除匪首赵思忠率少数残匪逃往固原七营外，其余追随赵思忠的缪福禄、万荣昌、耿子平等股匪首领被俘，经过公审后被判处死刑。其他国民党人员如县党部书记张志尹、县保安大队长赵鸣琴、大队副刘永祥等缴械投降，经教育后释放。收复甜水堡后，党建立了环县甜水区政府和基层党组织，环县统战部部长张镜如任甜水区委书记兼区长。

四、陇东反磨擦斗争的胜利

第二次陇东磨擦事件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陇东军民进行了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64-65页。

针锋相对的斗争。八路军各级将领发表通电，揭露事实真相，在政治上赢得了主动地位。1939年12月22日，萧劲光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各地行政长官与军事长官，说明宁县、镇原事件的真相，希望国民党当局"主持公道，制止异动，恢复团结，勿使局部事件日益扩大。"[①]12月30日，《新中华报》刊载了中国共产党12月25日发出的《朱彭副总司令等将领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的电文，署名的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一二〇师师长贺龙、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边区参议会议长高岗。通电指出："当此在我则抗日第一，团结为先，在敌则政治诱降，反共为亟之际，稍有人心，诚不至挑拨事端，制造磨擦，更不应枪口对内，遗笑友邦。……所望我蒋委员长国民政府维护法纪于上，全国党、政、军领袖与各界人士主持公道于下，痛亡国之无日，念团结之重要，执行国家法纪，惩办肇事祸首，取缔反共邪说，明令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及《处理过程的实施方案》，制止军事行动，勿使局部事件日益扩大。"

八路军诸将领的通电，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毛泽东在这场斗争中，曾字斟句酌地修改电文，直接领导反磨擦斗争。毛泽东在修改萧劲光的电文时，多次加上这样一些话："边区二十三县范围为蒋委员长所指定"，我军"对于原定二十三县并未越出雷池一步"。在修改萧劲光给蒋介石等人的一份通电中，毛泽东曾反复推敲，将其中一段修改为："目前日寇以师团之众大举西犯，柳林军渡相继失守，我河防部队正尽一切力量，予以痛击，连日战斗甚为激烈。大敌当前，覆舟堪惧，后方纷争，实属不宜再有。苟一方拼死杀敌于前，他方复乘机争夺于后，则不啻以刃资敌，前途危险，何堪设想？"这段话既是对蒋介石进攻边区的揭露，也是对顽固派与日伪勾

① 《萧劲光电请蒋介石等制止陇东顽固派的大举进攻》，《新中华报》1939年12月27日。

结的警告。在修改肖劲光致程潜、朱绍良的一份电文中，毛泽东加了“据闻一切行动均系根据新颁处理共党问题方案，下级不过照此方案执行而已”一句，点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在国民党上层是有“根”的。这样写，给程潜、朱绍良一个台阶下，对分化瓦解敌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毛泽东还在以肖劲光名义致程潜的一份电文中写道：“镇宁两城虽被袭占，无辜官兵虽被牺牲，下级人员虽极愤慨，然劲光至今未增一兵，无非体钧座之意旨，本团结之大义，力求和平解决之道。”“职意公平处理，撤兵为先，进占镇宁两城之兵不撤，即无以示诚意而服人心。专员钟竟成实为肇祸之主谋，庆父不去，鲁难未已，施以撤惩，出自钧裁。”毛泽东修改过的电文义正词严，字里行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以大局为重，忍让为怀和原则问题决不含糊的坚定立场。

在八路军将领的再三要求下，国民党甘肃当局决定派员调处。当时，关于国民党发动的军事磨擦进行了两个层次的谈判，一个层次是南方局与国民党高层的谈判，是关于国共整体关系的谈判，一个层次是边区政府派代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在南方局与国民党高层谈判中，中共中央专门提出了陕甘宁边区问题和陇东问题。1940 年 1 月 10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南方局的指示中指出，边区“要二十三县，少一县不行……非二十三县，不足保障八路军后方之巩固，且陇东五县、关中二县，绥德五县，久经划作八路防地，惟有直隶边区行政，才能避免冲突。”“陇东事件必须合理解决，我方派谢觉哉为代表。”[①]11 日，再次给南方局发出指示：“关于陇东五县自彼方进攻后，我亦开展游击战争，逮捕所有彼方人员，广泛发动民众运动，现彼方九十七师已撤退，表示和平，我亦停止军事行动，与保护已捕人员，但民运仍继续发展，决不

① 《中央关于边区等问题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给南方局的指示》(1940 年 1 月 10 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0)，第 245－246 页。

停止，现派谢老为代表，一星期内动身去西峰镇与朱绍良所派代表谈判。”[①]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中央的强硬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地方谈判，成为地方谈判取得成功的保证。

1940年1月，党决定派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为代表同国民党谈判，国民党也派甘肃省政府保安处参谋长李学谟为代表，双方准备谈判。毛泽东对这次谈判十分重视，亲自给谢觉哉写信，制定了方略，规定了谈判条件：“（甲）陇东六县（环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镇原）属边区二十三县范围，地方行政应即全部移交边区管辖，杜绝一切纠纷之源；（乙）边区及八路军保障［证］不向六县境外越出一步；（丙）在上列两条基本原则下具体解决彼方从六县撤退军队行政机关及此次纠纷中双方交换俘虏等事；（丁）如彼方不愿照此解决，则我只能承认双方停止冲突，暂维现状，交换俘虏，其他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②]

1月27日，谢觉哉到达庆阳，并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做了通报，准备进行谈判。但国民党地方当局反映冷淡。2月3日，谢觉哉带话给钟竟成：“本人奉命来庆调节纠纷，原抱最大诚意，不料政府竟遣调大军威胁，足证毫无诚意。望转知钟专员，迅速派代表来庆谈判，否则本人即回延安。”2月6日，国民党谈判代表、甘肃省政府保安处参谋长李学谟到达西峰。2月12日，双方在西峰镇开始谈判。国民党对武力解决八路军抱有极大希望，在谈判方面没有丝毫准备，谈判方案均为中国共产党代表提出。

谈判内容主要是：陇东六县本属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以内，六县范围内国民党军队及行政机关应即撤退；陇东六县在未明令划归边区前，暂维现状；释放被俘人员等。谈判期间，根据达成的口头承诺，

① 《中央关于边区与扩军问题同国民党谈判条件给南方局的指示》（1940年1月11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0），第249页。

② 萧劲光：《陕甘宁边区的反磨擦斗争》，《中共党史资料》第20辑，第47页。

八路军释放了被捕获扣押的部分国民党人员，包括原合水县长翟大勋。[①] 谈判一直持续到2月20日，因国民党地方当局把希望寄托在武力解决上，对谈判毫无诚意，因此谈判并无实质进展。

第二次陇东事件中，国民党虽然占据了宁县、镇原两座县城，但政治上显得愈加孤立被动。通过这次事件，中国共产党在陇东的力量得到了巩固和壮大，正式建立了庆阳、合水、镇原三县抗日民主政府，八路军和地方武装也得到了发展，八路军警备一团700余人，主力驻定边，一部分出入环县边境；警备二团900余人，驻环县甜水堡和曲子一带；警备八团1100余人，驻新正县湫头镇和新宁县九岘一带；辎重营200余人，驻新宁县襄乐镇、鲁家原等处。同时扩充了地方保安队、游击队和自卫军。这样驻守陇东的八路军主力部队达3000人，地方武装1000人，比事变前增加了一倍以上[②]，成为巩固和维护陇东根据地的主要力量。

第三节　关中分区的反磨擦斗争

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的囊形地带，东、西、南三面处于国民党胡宗南部的严密包围和封锁中。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分区制造磨擦的同时，在关中分区也制造了一系列磨擦事件。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关中分区军民齐心协力，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

一、土桥事件和旬邑事件

1938年12月15日，因黄河防线吃紧，八路军原设在黄河边上的

① 《军统西峰组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有关军事情报底稿》，《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上），第220－221页。

② 丁雅年等：《陇东的两次反磨擦斗争》，《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62页。

荣誉军人学校(原红军荣誉军人残废医院,以下简称荣校)由泾阳县云阳镇向关中分区转移。路经旬邑县城南的土桥镇城下时,遭到城内国民党保安队的袭击。次日,国民党保安队将部分八路军荣校伤残人员包围并强行扣压了路条。荣校在多方解释无果的情况下,被迫退回原来的防地。12月18日,国民党旬邑县政府又下令各保甲不准卖给八路军伤员粮食和蔬菜。荣校因粮草断绝,于1939年1月12日奉命向土桥开拔,又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包围,荣校派去谈判的人员也被扣留(后释放)。1月16日,国民党当局调集旬邑、正宁、彬县、淳化等5县保安队300余人及壮丁队500余人先后集结于土桥。22日,国民党陕西保安六团与三原、泾阳的保安团也相继赶到土桥,在国民党彬县保安司令郑伯庸的指挥下,以2000之众将荣校伤残人员重重包围,并鸣枪胁迫退出该地,为了避免被顽固派军队无故屠杀,荣校伤残人员被迫退至旬邑县城以北十里处的看花宫一带。这一事件时称土桥事件。八路军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为此事致电蒋介石,蒋介石回答说:"已告陕西省政府制止矣。"

1939年5月下旬,驻看花宫的八路军荣校采购员陈应通由云阳返回旬邑,途径甘峪坡时,被国民党驻旬邑保安大队暗杀。事件发生后,国共双方共同查验现场,确认系枪杀,子弹为陕西保安团配备的步枪所特有,且有群众证明为三个身着陕西保安团服装的士兵所为。因此,荣校派校务处副处长董志强等人和县长张中堂谈判,要求公开承认暗杀罪行,惩办凶手,赔偿损失,隆重安葬陈应通,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国民党县长拒不答应,斗争越来越激烈。在谈判尚在进行的时候,张中堂又密令将从乾县返回的关中分区参谋张科科在途经县城时抓捕,八路军驻旬邑办事处知道以后,即派办事处主任田润芝前去县政府谈判交涉,提出立即释放,张中堂当面答应,但田润芝刚一离开,就枪杀了张科科。

5月25日下午,荣校30多名学员前往国民党旬邑县政府请愿,要求交出杀人凶手,国民党当局拒不答应,且命令陕西保安第六团向请愿学员开枪,当场打死打伤学员代表9名。随后张中堂又率大队人马,向

驻旬邑县城的关中分区保安独立一营进攻。同时还调集邻近几个县的保安大队配合国民党保安第六团围攻关中分区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荣校请愿人员以手榴弹还击，关中分区保安独立一营闻声参战，双方展开激战，持续了七天七夜。后来国民党又调来陆军二十八师的八十一、八十二两个团增援，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经请示上级同意，八路军于6月1日晚被迫撤出县城。3日后，又撤至关中分区所在地马家堡。撤离县城时，荣校有17名重残人员掉队，被国民党保安部队杀害。这就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旬邑事件"。

党中央从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争取和平解决这一事件。关中分区委员会书记习仲勋和分区保安司令张仲良致信国民党保安九团尤泰山，晓以民族大义。信中说：当前应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为前提，而后方少数顽固分子，无端造谣，祸起萧墙，日寇高兴，汉奸窃喜，你应明察实情，悬崖勒马。尤泰山回信表示：作为中国军人在民族存亡之际，不能去打日本鬼子，实在惭愧。但我保证，在我的防区，绝不再向贵区前进一步。随后，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根据关中分区报告和党中央的方针，给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发了急电，谴责了张中堂一伙制造杀人掠地惨案的罪行，要求陕西省政府派员查处此案。电文指出："查敝军残废兵员，以抗敌余生，养息后方，前以移驻土桥，备受迫害，今又大遭屠杀，消息传来，痛心曷极！惟念国家处此危急存亡之际，袍泽之间，纵有差错，总宜容忍"。

毛泽东审阅这份电文之后，要求肖劲光同时致电蒋介石和程潜。肖劲光还就旬邑事件向全国发了通电，要求各界"一致呼吁，以彰公理，而警凶顽"。国民党顽固派杀人理亏，不得不派人调查处理。中国共产党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揭露了顽固派破坏团结，残杀抗日伤残兵员的罪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声援。

二、反蚕食斗争

1940年3月30日下午，关中分区军民在马家堡举行反汪拥蒋大

会，驻旬邑职田镇国民党预备第三师补充团一营突然用火炮和重机枪袭击马家堡。同时，向新正县四区看花宫一带进攻。关中分区委员会停止开会，分区部队紧急出动，击退来犯之敌。鉴于顽固派有大举进攻之势，经军政领导研究决定，分区各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及二师学员转移至距马家堡以北十余里的长舌头。

5月8日，国民党陕西保安四支队郭相堂、李仰之、苟福堂三个中队伙同国民党军预三师八团向关中分区新正县六区一、二乡进攻，当地民兵、自卫军奋起反击。5月19日上午，预三师以两个营的兵力会同国民党宁县保安及壮丁队千余人，侵占了新正县的西坡村一带。下午，国民党职田镇驻军又用迫击炮袭击马家堡，炸死八路军通讯员一名，炸伤群众6人。面对新的形势，关中分区委员会认为固守马家堡，不利于反磨擦斗争，为争取主动，决定分区机关和部队主动撤离马家堡。6月中旬，关中分区机关及部队转移至阳坡头村。

这一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磨擦不断加剧。国民党陕西保安队第二旅从马栏向刘家店一带袭击，山河方面的国民党甘肃保安部队向新正一区袭扰，正面以国民党军预三师为主力向关中分区部队进攻。先后占领了正宁、宁县、淳化、旬邑4个县城及关中分区新正县四区、六区和赤水县的官庄、梁庄等地6个区43个乡的地域。

为了反击敌人的蚕食，关中分区党政组织号召全区军民为保卫边区进行坚决而有效的自卫战争，各地迅速组织游击队，整顿自卫军，加强盘查放哨，实行坚壁清野。坚决的军事斗争使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振奋了全分区军民争取自卫战争胜利的信心，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

1940年2月，国民党军队在甘坡嘴修筑了一个碉堡，驻一个班防守，关中分区独立营侦知后，派出两个连，以一个排攻打碉堡；一个排深入县城附近活动，阻其增援；另一个连作后备援助。八路军晚上3点进行战斗，仅半小时就全歼敌人，缴获新式步枪12支，拔掉了这颗钉子。

1940年5月下旬，关中分区独立三营300人，由营长吴志升带领，从刘家店出发驻扎在油坊沟，准备消灭占领马栏的国民党一个

营。国民党为了增强马栏军事防守力量，又从岘庄调来一个营300多人直接去马栏。当行至转角时，与马栏游击队及独立三营侦察兵接火，三营后续部队立即从油坊沟口绕马儿沟抄其后路，并在马儿沟口架起重机枪设伏等待。马栏游击队侦察部队边打边退，诱敌进入了包围圈，三营指战员发起猛攻，以一个连的兵力攻击正面，其余部队两侧夹击。在强大火力攻击下，将其击溃，俘敌100余人，缴枪200多支。转角战斗结束的第二天，驻守马栏的国民党军闻风逃窜。

1940年5月，四、六区（湫坡头、底庙）失陷，国民党保安团团长李树铭带100余人驻东牛家坡村。为了拔掉这颗钉子，7月15日，八路军后防留守独立第一营营长罗春生，政委王四海，带领三个连400余人，以野外演习为名，到达康家园子驻扎。16日下午，营部作了战斗部署，组成突击组。当晚冒雨出发，天快亮到达东牛家坡村城下，选好突破口，立即架云梯登城攻击。从守军负隅顽抗，突击组战士加强火力反击，一举取得战斗胜利。俘100余人，打死打伤20多人，缴枪100余支，当场处决了团副，李树铭带伤逃脱。

1941年春，陕甘宁边区警备第一旅奉命开赴关中分区，文年生旅长率部首先在彬县以北的义石村、凤王山一带与来犯的胡宗南部及国民党地方保安队激战三天，将其赶回凤王山以南，后又转战旬邑土桥镇和正宁县，将来犯的国民党军队赶回原地，保卫了边区的南大门。

1942年下半年，国民党预备第三师为了巩固崔家河碉堡据点，控制边区前沿阵地，给进犯边区建立桥头堡，派兵侵占了边区范家原村，并修筑了一个大型碉堡，驻一营兵力防守，对边区威胁极大，闹得人民群众不得安宁，纷纷要求将其消灭。关中警一旅决定由三团副团长孙光指挥，一、二营参战，打掉这个据点。战斗打响后，白天攻坚未克，当晚突击队绕边盘山，打入碉堡内部，展开白刃战、肉搏战，加上堡外攻击，很快将敌歼灭，摧毁敌碉堡。

三、爷台山战役

爷台山位于桥山山脉的南端，海拔1313米，地势险要，易守难

攻，属于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南面的门户，是楔入国统区的凸出地带，南可进逼西安，东可切断咸榆公路。因此，国民党顽固派一直觊觎这个地区。

爷台山战役的直接诱因是淳化事变和方里事变。1945年，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祝绍周派亲信李静谋接任国民党邠洛区动员指挥部指挥官。李到任后，排除异己，安插亲信，不断寻衅滋事，激起官兵的强烈愤慨。6月26日晚，国民党陕西保安二团团长刘文华组织其部下击溃了李静谋的指挥部，并率部起义，投奔关中分区。这就是淳化事变。淳化事变后，驻防淳化县方里镇的国民党陕西保安三团团长曾海蕃下令捉拿前任镇长张锡畴。张锡畴派人与保安三团进步士兵余增贤联系，准备袭击曾海蕃的保安三团。7月5日，余增贤发动两个连和一个排起义，烧毁了10里封锁线上的碉堡。7月14日，方里镇外围据点被逐一攻克，保安三团团部被包围。曾海蕃于黄昏带20余人逃往耀县。这就是方里事变。淳化事变和方里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当局歪曲事实，大造舆论，说"淳化兵变是共产党给撑腰的"，"共产党遂乘机侵据淳化、通润、方里等要地……欲向三原、同、耀，夺取西安"等。以此为借口，蒋介石命令防守河防的国民党军队9个师，开往陕甘宁边区南线的同官、耀县、淳化、旬邑等地，准备从南线进攻边区。

7月21日至22日，国民党三十六军暂编五十九师、骑兵二师向爷台山关中分区保安纵队、关中警卫队、警一旅三团和新四旅七七一团的6个连驻军发起攻击，侵占了爷台山南10多个村庄。八路军坚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方针，与国民党军艰苦战斗七昼夜，因寡不敌众于27日奉命撤出战斗。国民党军随后占领了爷台山等地宽100里、长20里的地方。国民党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农具、家具、衣物、住房均被烧毁，人民群众遭受巨大灾难。据不完全统计，仅十里原、西坡、张家岭和刘家堡等村，就抢去小麦300多石，群众损

失高达4500万法币。[①]

为彻底粉碎国民党扩大内战的阴谋，防止其发动新的攻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命令新编第四旅、教导第一、二旅和三五八旅火速增援关中分区，成立了以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的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参战部队。张宗逊、习仲勋等实地勘察了地形并分析了敌我态势后，决心趁敌军立足未稳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全歼爷台山守敌，以彻底挫败国民党军侵犯边区的阴谋。

习仲勋在关中分区工作过6年，深谙当地地理人情，和当地群众有着深厚感情。在习仲勋领导下，关中分区各级地方政府积极行动起来。赤水、淳耀县迅速联合成立了战地工作团，具体负责担架、运输、向导、军鞋、筹粮、烧水、做饭和抢救伤员等各项支前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仅赤水县就组织支前队员1400人，出动担架400多副，筹集军粮6万余斤，送军鞋1万余双。[②] 8月8日晚23时，参战部队全线出击，经过3天激战，终于在8月10日夺回爷台山，赶走了来犯的国民党军队，收复了全部失地，取得了爷台山自卫反击战的彻底胜利。爷台山自卫反击战，重创了国民党军暂编五十九师，全歼入侵之敌5个连，毙敌营长、副营长各1名，俘敌连长以下官兵100多名，缴获轻重机枪19挺及大批枪支弹药。

爷台山战役的胜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指出："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领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在这宽一百里、长二十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我们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让国民党轻轻易易地占我们的地方，杀我们的人。当然，寸土必争，并不是说要像过去'左'倾路线那样'不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这一回我

① 《咸阳党史资料征集通讯》，总第39期。法币是当时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1945年100元法币可以买到一条鱼。

② 《马栏革命简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页。

们就放弃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七月底放弃，八月初收回。"谷台山战役的胜利，揭露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粉碎了国民党向陕甘宁边区发动的军事进攻，保卫了边区，保卫了延安和党中央，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对巩固边区和随后的解放战争都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节 陇东分区的成立

国民党顽固派搞磨擦，"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不仅没有达到削弱共产党的目的，反而使共产党通过反磨擦斗争扩大了在全国的影响，增强了力量，巩固了在边区的领导地位。

一、陇东分区抗日民主政权的成立

第二次陇东磨擦事件后，中国共产党将原统战区庆阳、合水的国民党政权"礼送出境"。[①] 为了维护边区的安全，巩固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决定"组织陇东分区专员公署，管理庆阳、合水、镇原三县政府，并分别成立该三县县政府"，任命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为专员，朱开铨为副专员兼庆阳县长。并要求："(一)努力使庆阳、合水、镇原三县之行政完全做到归边区管辖，一切工作制度均能边区化。(二)目前应努力争取群众，巩固内部团结。在庆阳、合水、镇原、宁县等4县之扩军和募捐等，暂时均停止，候群众稳定后再决定举行。在组织清洗隐藏的坏分子。把干部中有政治问题的经过审查后处理之。(三)组织县府的干部待派来之外，可要求庆环帮助外，再不足由边府继续增加。(四)对附近友区，仍应建立统一战线关系。(五)县长就职后施政方针的报告均已拟就，请书写

① 耿飚：《三八五旅在陇东》，《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上)，第230页。

张贴于各要道与村镇。(六)组织县府经过及群众情形,请随时见告。"[①]边区党委和政府还任命了新成立的各县县长和主要科的科长。可见,为了在统战区建立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边区政府做了周密的安排。

1940年1月,庆阳县政府筹备小组成立,人员以抗敌后援会成员为主。2月,宣布成立庆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朱开铨到任时,干部奇缺,除了上级派来的保安科长郑自兴和秘书秦平等同志外,仅有秘书姚静波、张冰泉和行政管理员王子厚,通讯员李振海等数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县委县政府物色人才,充实各科室人员,组织人力物力重修北关大石桥,调拨粮款,放赈救灾。为了便于巩固新政权,将过去的行政区缩小划分为6个区,后来又设立了庆阳市和新堡区,共辖1市6区45乡政府。[②]

同月,合水县抗日民主政权宣布成立。边区政府任命高朗亭为县长。下设一科(民政)、二科(财政)、三科(文教)、四科(建设)和保安科及裁判处(类似法院)。各科长和裁判员亦由边区政府任命。县政府还成立了临时委员会(参议会未成立前的临时参政机构),吸收地方公正绅士协助政府各项工作。此时,县以下的基层政权仍沿用国民党时期的保甲制度,直到1941年5月,乡选后才正式更名为区、乡政府和行政村、自然村等。

3月1日,镇原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马渠镇宣布成立,并发布了布告,公布了8条施政方针,主要是:实行总理遗嘱,唤起境内民众,努力抗战救国事业;实行民族主义,讨伐汉奸汪精卫;实行民权主义,民选县、区、乡三级政府,保障人民有抗日救国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实行民生主义,废止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发展农工商业,

① 《陕甘宁边区关于建立陇东专员公署及成立庆阳、合水、镇原县政府的函件》(1940年2月11日),《陕甘宁边区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第72-74页。

② 朱开铨:《陕甘宁边区庆阳县政府工作报告》(1941年9月14日),《陕甘宁边区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第299-230页。

改善人民生活；拥护八路军，巩固抗日后方等。[①]

上述三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后，边区政府要求各县"改选保甲长，以民主方式，洗刷坏的保、甲长；扩大与成立各县保安队；继续开展民运工作。"[②]要求各县以民主的方式迅速实现由旧政权向新政权的过渡。

4月20日，陇东分区正式成立，管理庆阳、镇原、合水3县行政。5月1日，发表了告陇东同胞书，就关于陇东专员公署成立的一些问题向陇东民众做了解释和承诺。专员公署成立的目的是："第一，为了巩固抗日后方，坚持对日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第二，为了健全边区行政组织，实现民主政治，使整个边区负担起抗战应有的模范作用。第三，为了配合全国进步，克服陇东政治环境中的一切倒退逆流。"专员公署向广大陇东民众作出了三项承诺："第一，遵循总理遗嘱，唤起陇东民众，为抗战建国事业共同奋斗到底。特别要为彻底肃清汉奸汪精卫及其徒子徒孙们奋斗到底。第二，实现新民主主义政治，除汉奸外，人人有绝对的言论、集会、结社、居住、走路、读书、武装抗日等民主权利。另外，各级政府一律民选，取消过去一切黑暗设施和包办方式，真正做到还政于民。第三，尽量改善抗日人民生活，取消苛捐杂税，实行三成减租，二分减息，[③]优待抗属。开办免费学校，救济失业青年，救济灾民难民，发展工商业，调剂地方经济；肃清汉奸土匪，安定社会秩序。"并对陇东民众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主要包括积极参加抗战动员工作；积极参加宪政运动；积极投资工农商业，发展陇东地方经济；破除迷信，禁止缠足，戒烟戒赌，不买卖仇货，接受教育和监督抗日政府等八个方面。[④] 陇东分

① 《陕甘宁边区镇原县政府布告》(1940年3月1日)，《陕甘宁边区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第93-94页。

② 《陕甘宁边区政府通报》(1940年3月)，《陕甘宁边区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第92页。

③ 即地租减去30%，借贷利息减去20%。

④ 《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告陇东同胞书》，《陕甘宁边区陇东的革命斗争》(上)，第80-82页。

区专员公署告陇东同胞书充分体现了新成立的政权是一个抗日民主的政权，是一个为民众谋利益的政权。

二、中共陇东地委的成立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级党组织关系的决定》（简称《九一决定》），强调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对党政军民实行一元化领导，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群团工作的现象。中共陇东各级党委认真贯彻执行《九一决定》精神。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撤销陇东军政委员会，将陇东分委更名为陇东地委，确定陇东地委为陇东分区的最高领导机关，负责领导全分区党政军组织，马文瑞、段德彰先后担任地委书记；地委书记兼任地方部队政治委员，地委领导成员由陇东地方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组成。陇东分区各县县委也按照这个格局进行了调整，确定各县委为一个县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工作上，实行党政分开，党委对政权系统实行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不搞包办代替，下级党委认真执行同级参议会及政府的决定和法令，对参议会及政府工作的领导，只能通过自己的党员去实现。陇东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正确处理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坚持按照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教育党员干部把服从党的领导看成是服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与纪律。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上，无论机关、学校、工厂，有3名党员都建立党的支部，农村则以行政乡为单位建立党的支部。通过对《九一决定》的贯彻执行，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陇东根据地的贯彻执行，使陇东党组织逐步得到发展壮大。

第十二章 陇东抗日根据地党的建设

第一节 建立党的组织与扩大党的队伍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的领导下，在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陇东地方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在党组织广泛建立的同时，党的队伍获得巨大发展。至1945年3月，陇东分区共有党员5051人，其中抗战期间发展党员4342人，约占党员总人数的86%。在政治思想、组织纪律、作风建设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渐走向成熟。

一、根据地党组织的发展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党组织的发展，认为要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任务，建立强大的党组织是必需的。中共中央清醒地意识到，当时党的组织力量落后于党的政治影响和形势需要，许多重要地区党组织力量弱小，甚至尚无党的组织。因此，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员队伍，成为当时迫切而重要的任务。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要打破发展党员中的关门主义倾向，打破在统一战线中忽视党的发展甚至取消党的发展的倾向，要大胆地把党组织的大门向积极进步的工人、雇农、革命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及勇敢坚决的下级官兵敞开。要使发展党员成为每一个党员及各级党部经常的重要工作之一，进行经常的检查与推动。1939年9月21

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组织部发出《关于巩固和扩大党组织的指示信》，再次要求严密巩固和扩大党的组织，对此前工作中不敢介绍学生及知识分子入党等倾向作了批评，强调有计划地发展党的组织，必须把发展组织当成一项经常的工作，每个党员必须把发展组织当成经常的责任。

陇东地处抗日后方，又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陇东党组织肩负着领导陇东人民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从财政、物力、人力各方面支援抗日前线的重要任务。所以，这个时期尤其注重和加强党组织建设，并获得快速发展。当时，庆阳地区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实行了土地革命，建立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如庆环分区和关中分区所属各县；一部分是在西安事变后新开辟的地区，实行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区别于苏区或老区，叫统一战线区。根据这两类地区的不同情况，陇东党组织采取不同形式和策略，建立党的组织，大力发展党员，加强党的建设。

陇东党组织不断发展的同时，名称和隶属关系也发生相应变化。抗战前期，陇东党组织主要包括：庆环分区党委（1937 年 9 月—1940 年 8 月）、隶属于关中分区的新正和新宁县的党组织、中共陕甘宁省委（1936 年 5 月—1937 年 9 月）、中共陇东特委（1937 年 7 月建立，1938 年 7 月并入庆环分区党委）。1940 年 9 月以后，主要是中共陇东分区特委会（简称陇东分委，1943 年改为陇东地委）以及由其领导的建立在陇东根据地周边国统区的宁县工委、平东工委等。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党组织得到巨大发展，基本构建起县、区、乡、村党的组织系统，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保障了各项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

各级党组织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精神，陇东党组织对发展党员工作高度重视，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到 1939 年底，"友区和新区新发展党员有 1000 多名，全分区共有党员

7000多名"①。

1942年,陇东特委书记马文瑞在工作总结中,将工作成绩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打下了党的工作基础,发展党员五六千名,在干部本地化的过程中,提拔和培养了大量本地党的干部,县政府、区乡级干部和群众团体主要由本地干部担任,有利于党的工作开展。第二,根据中共中央和边区党委的部署,完成党在各个时期工作中心任务,如1939年党中央号召生产自给,"陇东党认真执行了中央这一号召,开始了生产自给运动。几年来,已经达到了生产自给的目的";1941年工作重点是为克服困难,进行运盐、征粮和送粮以及推行国债,1942年工作重点是审查干部等。陇东党组织都按时完成任务,尤其是在经济困难时期"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财政动员任务,如征粮、运盐等"。第三,领导陇东人民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做出了相当成绩,"如农业上开垦荒地达30万亩,合作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增办国民小学100多所,还有7所完全小学,一所中学"。②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陇东根据地党组织和党员队伍不仅得到发展壮大,而且成为各项工作的中坚领导力量,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

二、国统区党组织的发展

1937年7月以后,在陇东特委的领导下,党组织在陇东抗日根据地周边国统区得到迅速发展,到1937年底,在庆阳、合水、宁县、驿马关、固原、西峰等国统区发展党员1500余名③。

1939年10月,中共甘肃工委代理书记罗云鹏前往延安,参加西

① 马文瑞:《陇东党的工作》1942年4月13日,《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建设》,第168页。

② 马文瑞:《陇东党的工作》1942年4月13日,《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建设》,第169页。

③ 马文瑞:《陇东党的工作》1942年4月13日,《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建设》,第161页。

北工委召开的会议。会议对中共甘肃工委的工作进行了讨论，根据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日益加剧的形势，指示工委注意改变工作方法，采取措施开展秘密活动。罗云鹏回到兰州后，积极贯彻会议精神，为能多渠道与党中央保持联系，除继续通过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与党中央保持联系外，决定再开辟一条从兰州到延安的地下交通线。经讨论研究，建立地下交通线的任务由工委委员兼靖远县委书记郑重远负责。经过郑重远等人千里跋涉、依靠群众、实地勘察的不懈努力，一条从兰州经靖远、海原、固原、庆阳到延安的地下交通线，终于在1940年初开通。党中央的指示和工委的信件，通过交通员不断传递于兰州与延安之间。1940年6月，中共甘肃工委遭到破坏，这条交通线受到严重影响。

中共甘肃工委遭到破坏后，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与上级失去联系，面临的形势和所处的环境十分恶劣，甘肃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处于抗日战争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建立甘肃党的领导机构。1942年3月，西北局民运部部长贾拓夫主持召开原甘肃工委负责人座谈会，当时在延安的原甘肃工委负责组织工作的郑重远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了甘肃工委的工作经验和教训，提出恢复甘肃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领导机关的建议。4月1日，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提出："为了甘肃工作能与宁夏工作密切配合，并帮助宁夏工作的开展，同时由于甘肃宁夏两省的地理历史的相属关系，以及少数民族的普遍分布关系，应设立一甘宁工委，以指导甘宁两省工作。"[①]座谈会后，西北局在庆阳专门设立"陇东调查站"，由朱敏、方晨等人负责，调查中共甘肃工委被破坏后，甘肃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及党员的情况，为恢复党在甘肃国民党统治区的领导机关做准备。

1942年8月，西北局作出《对甘肃工作的决定》，认为"甘肃党自

①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甘肃党史资料》第五辑，1988年内部版，第426页。

1940年领导机关破坏后，两年来由于某些暴露干部的撤退及组织关系的隔绝，所以基本上保留了党的组织基础，正因为如此，一般干部党员对党的'精干隐蔽，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还未深刻了解或不知道。因此，党员中表现'乱冲乱闯'的左的毛病者有之，表现'没有前途'的消极情绪者亦有之。党的组织上的混乱状态还未结束，党外的社会群众活动也是非常薄弱的。此种情况，要求党迅速的整顿甘肃党的工作。""为了有计划地整理与推进甘肃的工作，决定重新建立甘肃工委，驻在边区境内，领导外面甘肃党的工作。"并要求甘肃党组织"应设法在宁夏、青海建立党的组织"。[①] 根据西北局这一决定，贾拓夫派陈成义、李仰南到庆阳先行开展工作，不久又派孙作宾、刘杰、丁志明、万良才等到庆阳开展工作。1942年10月，中共甘宁工委在庆阳正式成立，书记孙作宾，委员陈成义、李仰南等。中共甘宁工委成立后，派李仰南、穆德彪到盐池和三段地调查了解宁夏情况。1943年7月，因受"抢救失足者运动"影响，甘肃地下党被诬陷为"红旗党"，甘宁工委负责同志几乎都被隔离审查。甘宁工委的工作暂时由陇东地委统战部副部长朱敏负责。后来，朱敏也被隔离审查，刚刚打开局面的中共甘宁工委的工作被迫中断。

中共甘宁工委从成立到结束仅存在几个月，所做工作虽然有限，但它认真总结了建立和发展地方党组织的经验教训，明确了工作任务和方针，为后来发展党组织工作提供了借鉴。

同一时期，为了打破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共平泾工委、新区工委和后来的中共平东工委先后在镇原新城、三岔、马渠等地建立秘密交通站和联络点，承担与兰州、西安、重庆等地的联络、部分物资采购及护送人员出入延安等任务。

在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不断挑起磨擦事件的复杂严峻局面下，国统区党组织在搜集传递情报、营救党内被俘同

①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甘肃党史资料》第五辑，1988年内部版，第426页。

志、采购急需稀缺物资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第二节　党的宣传教育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党组织的快速发展和党员队伍的迅猛壮大，对新党员加强思想教育，进一步纯洁和巩固党的组织，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针对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承担的重要任务，陇东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结合党员干部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等实际情况，开展了大量具有针对性和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工作。

一、干部的教育培训

1937 年 9 月，庆环分区党委在曲子县东沟岳王庙创办分区党校，庆环分区党校是陇东地区创办最早的一所干部学校，也是党在甘肃省的第一所干部学校。分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彭飞兼任校长，教员由分区党委委员、党委各部门和专员公署各负责同志兼任，主要有吴广文、李景膺、马仰西、孙明等人。培训对象主要是庆环分区所辖各县属科、部、局以及区级干部。在教学安排上不仅重视理论学习，还注重社会实践活动。1937 年 12 月，庆环分区党校选派部分学员前往华池、曲子、环县等地开展征粮、征兵的宣传动员工作。经过一段社会实践活动，又返校学习，使理论辅导与工作实践密切结合，庆环分区党校以岳王庙三间破庙和四孔菩萨土窑洞为教室、宿舍，在缺少桌凳、纸笔等学习用品的艰苦条件下，坚持开办了两期学习班，为根据地培养德才兼备的党政干部近 100 名，至 1938 年夏停办。

1938 年 9 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对党的建设作了全面部署，通过了《关于各级党委暂时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文件，制定了党员队伍建设的方针、政策，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决定加强党对干部的教育，加强

党校教育，号召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提出了党的宣传方针。1938年，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陇东根据地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在职干部教育，主要是提高地方党政、军事干部的文化、政治、军事素质，以适应革命战争和政权建设的需要。各级党组织根据当地干部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政策理论水平不高的实际，采取在职学习和离职培训相结合的形式以提高干部素质。在职学习主要是通过办夜校、办补习班，学习文化和政治理论，离职培训主要以举办培训班的形式进行。

1938年至1939年底，庆环分区党委先后举办7期区、乡干部培训班，培训区乡干部149人；共举办各种长短不一，不定期学习培训班28期，离职参加学习和培训的各级干部1046人（次）。同时还选派干部离职参加边区党校、分区党校、陇东中学干训班的学习和轮训。对干部教育一般是先从学习文化入手，逐步过渡到历史、地理、政治理论的系统学习。1939年，陇东各县的干部教育机制初具规模，仅环县就成立区级干部识字组11个，乡级干部识字组40个。在干部教育中还注重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1940年，陇东分委组织分区、县两级干部系统地学习《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下册）、《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上册）等理论书籍，提高领导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1940年下半年，陇东分委制定干部教育长远规划，加强干部正规化教育，积极为全分区培养德才兼备的地方干部。1941年至1945年，中共陇东分委和陇东地委共举办干部培训班12期，先后培训县、区干部3000多名。

妇女干部的培训培养受到格外重视。1938年到1939年底，庆环分区党委以及曲子、华池、环县、庆阳等县举办了妇女干部培训班，共培训妇女干部67人。1941年陇东中学代为培训妇女干部24名，1943年陇东中学对教学进行调整时，更加注意对妇女干部的培养和提高，专门开设妇女干部培训班，对妇女干部进行妇女运动史、政治常识、妇女卫生常识等方面的教育。

1942年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

定》，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共陇东分委贯彻《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精神，把干部教育与整风运动紧密结合，认真学习整风文件，联系实际进行思想、工作检查，使干部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教育。陇东分委主要领导干部普遍到中央举办的陕北公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中共中央党校离职学习。1943年以后，陇东地委、专署为使在职干部教育正规化、制度化，在分区和各县、区成立学习指导委员会，各乡成立学习小组，建立健全各项学习考核、奖惩制度。规定在职干部可根据自己的文化水平及其他具体条件，选择学习科目，但每人至少必须学习一门。规定地、县级干部每人每天学习两小时的学习制度。县以上干部除进行业务教育外，还进行理论学习；区级干部以学习文化为主，政治教育与业务教育为辅；各级县委分期分批组织训练团深入乡村，巡回对区、乡、村三级干部进行训练。乡村干部以识字、扫盲为主。1944年下半年到1945年上半年，陇东分区各县举办的区、乡干部训练班共培训区、乡干部522人。

1943年，陇东地委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第一”的指示，对陇东中学的教学进行调整，增加对干部教育的任务，开设地方干部训练班（简称地干班）。地干班培训的对象主要是区、乡级干部和少量的县级干部，教学原则是“因人施教”、“学以致用”和“理论联系实际”，目的是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政策水平，增强群众观念和革命观念。陇东中学地干班从1943年招收第一届学员开始，到1947年上半年，共培训干部308人。

陇东党组织除了加强正面教育外，还通过对犯错误干部的严肃处理，进行反面教育。经过严密审查，陇东党组织对犯有严重错误的10名区级干部、21名乡级干部分别给予党纪处分，对个别违法乱纪的干部予以法律制裁。

陇东党组织通过干部教育，纠正了影响党内团结的教条主义、经

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错误倾向，增强了新老干部之间的团结，培养了各级干部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和扎扎实实开展工作的作风，各级干部的文化素养和理论水平有了普遍提高。

二、党员的教育培训

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后，各根据地党组织大力加强发展党员的工作，党员队伍得到急速发展。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陇东地区各级党组织在工人、雇农、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中，大力宣传教育，培养发展了一大批新党员。至1937年底，庆环分区党委和陇东特委已有党员6000多名，1938年到1939年上半年又发展党员1600多名。由于短时间内党组织急速发展，党员队伍迅猛壮大，出现了在新发展的党员中搞突击、审查不严、普遍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等问题，如环县某支部书记在一天之内就发展5名党员。这种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造成了党员队伍不纯，使党的组织与抗日群众团体的区别在某些方面模糊起来，严重影响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针对党组织和党员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党中央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使党组织的发展回到正确轨道上。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提出已有相当数量党员的地方一律停止发展，集中进行巩固工作。1939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后，陕甘宁边区党委开始部署巩固党的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陕甘宁边区的部署，陇东分委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同时，以进行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为基础，开展对基层党组织的巩固工作。在发展党员时，尤其注重党员的培训和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在巩固工作中，各级党委举办了两期以上区乡干部培训班，提高区乡干部党性素养和工作能力；对党的干部进行了审查；召开了分区党员代表大会和各级支部党员大会。

陇东分委把支部教育当作对党员教育的基础工作之一，重视对

党员的思想和作风教育，重视和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明确规定党支部教育的方针是：提高支部和党员文化水平，使每个党员懂得怎样做一个合格党员。在党支部教育中，根据每个党员的政治素质、文化程度和实际工作表现，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思想和作风教育。

1940年2月至8月，庆环分委、陇东分委在党员中普遍开展了一次审查工作，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工作作风进行整顿，纠正强迫命令、贪污腐化、违反群众纪律等作风问题，进一步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加强党员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在审查工作中对缺乏党的知识、不了解党纪党规、犯有这样或那样错误的党员，进行帮助和教育，提高对党的认识；对那些突击发展、经过教育觉悟仍很低的、不起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党员，劝其退党；对少数立场不坚定者、投机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坚决清除出党。陇东分委派干部深入群众，对基层干部进行说服教育，对有些错误严重的干部给予纪律处分。乡级干部受撤职处分的有21人，区级干部受处分的也不少，个别错误十分严重的，不仅给予党内处分，还受到法制制裁，合水某区委书记就因贪污了二三十两鸦片及数百元被判刑3年。①

1942年，陇东分委书记马文瑞在总结陇东党的建设工作时指出，陇东分委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从分委到各县委，开办训练班，对区乡级干部进行训练。第二，在区乡支部中办流动训练班，对党员进行教育。第三，继续审查党员干部的工作。第四，在友区继续加强党的秘密工作。"②

通过整顿、教育和学习，清除了不合格党员，纯洁了党的队伍，加强了学习和教育，提高了党员队伍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统一了思想，教育了干部，陇东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变得更加巩固、成熟，为各项

① 马文瑞：《陇东党的工作》1942年4月13日，《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建设》，第167－168页。

② 马文瑞：《陇东党的工作》1942年4月13日，《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建设》，第168页。

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三、《陇东报》《关中报》等报刊的创办

1937年10月，陇东特委创办了《救亡日报》，张文华任社长兼主编。报纸八开两版，开始每周出一期，后改为五日刊，每期发行300多份。当时陇东特委对外名义是"陕甘宁边区陇东办事处"，报纸"以激进的民主主义抗日态度出现"，主要以农民、商人和军队干部战士为读者对象，发行范围在陇东特委所辖各县，刊登的主要内容为抗战前线的消息和地方民众运动、地方工作情况等。[①] 陇东特委与庆环分区党委合并后，《救亡日报》出版175期停刊。1938年3月，陇东特委在原《救亡日报》基础上创办《救亡报》，作为特委的机关报，该报出版474期后，1942年7月改版为《陇东报》，毛泽东亲自为其题写报头。次年，陇东特委改为陇东地委后，《陇东报》成为地委机关报，陇东地委宣传部部长吴铁鸣任社长。

《陇东报》是在《救亡报》的基础上创办的，但期数从第一期记起，扩大了版面页，为四开四版，出版周期先为周报，后为五日刊。《陇东报》创刊时正值根据地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办报经费、场地、人员都比较紧张，如报纸是用质地较差的土纸印刷，编辑、刻钢板、油印都在一个大房间，工作人员包括社长、编辑、记者和刻钢板的工人总共不过五六人。[②] 后来随着根据地经济的好转，《陇东报》也有所发展，1945年抗战胜利前，印刷由原来油印变为石印，发行量也增加到1000份左右，人员增加到10余人。解放战争开始后，随着战争环境的到来，《陇东报》随陇东地委机关转移到华池一带，毛驴驮着印刷机、油墨、纸张，石印机过于笨重，在转战中不方便，就改为油印。尽

① 张华：《忆<庆阳人民报>和<救亡日报>》，李楠主编：《甘肃革命文化史料选萃》，第375-376页。

② 张忠诲整理：《红色新闻摇篮——<陇东报>》，《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页。

管人员减少到五六人，但报纸没有停办，到1949年8月3日庆阳全境解放，《陇东报》共出版408期。

抗战时期，《陇东报》是庆阳最有分量和影响力的报纸。作为党报，主要职责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人民，武装人民，提高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宣传陇东根据地党政军民对敌斗争的英雄事迹；宣传形势，指出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反映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成就。总之，《陇东报》在宣传政策、教育群众、鼓舞人心，建设发展和巩固陇东革命根据地等方面发挥了其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9年，为了指导关中分区军民建设边区和进行反封锁、反磨擦斗争，时任关中分委书记的习仲勋决定创办分委机关报，以利于坚持长期斗争。他的提议得到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的同意。1940年4月，《关中报》创刊于关中分委机关驻地新正县雷庄村，并组成关中报社，分委宣传部部长高仰云兼任社长，胡炎任主编。《关中报》创刊时，报头由习仲勋题写；后又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高岗题写。该报最初是油印、四开两版的周刊，1941年4月创刊1周年时，改为三日刊、两版，毛泽东欣然执笔为其题名。1944年9月，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办的《部队生活》与《关中报》合刊，改为五日刊、四开版的石印报。警备区政治部派出3人常驻报社，专门负责"部队生活"专版。后来又兼出《学习导报》《大众读物》《时事要闻》等油印报。此时报纸的发行量由400份增加到800份左右，1945年达到1400多份。1945年7月，《关中报》又改为三日刊、两版。抗日战争胜利后，还不定期编发《时事要闻》，每期发行400多份。

《关中报》结合各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办得有声有色，多姿多彩，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良好口碑，被称为"黄土地孕育的红奇葩"、"战火中飞出的金凤凰"。在西北局召开的宣传部长会议上，它被一致认为是在边区各分区的报纸中办得较好的。1944年10月，在陕甘宁边区文教群英会上，它被赞誉为边区地方报纸的模范。12月，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也给予它高度评价——"《关中报》办的最好"！《关

中报》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鼓动群众支援边区建设的热情，鼓舞抗日胜利的信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中报》是党和人民的连心桥"的比喻，生动地概括了它的历史使命和作用。

此外，陇东、关中的各级政府、八路军和解放军驻军以及各机构还创办了各种报刊。如红军教导师驻防庆阳期间，政治部创办了《火焰报》，主要任务和内容是报道部队的工作和活动，并对陇东统战区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民众运动等主要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论。八路军三八五旅机关报《民众先锋》，1940 年 4 月创刊，1946 年停刊，主要报道部队的军事斗争和部队建设，曾被国民党列为查禁的报纸之一。三八五旅七七〇团机关报《大生产战斗快报》，1943 年春创刊于华池县大凤川，次年七七〇团离开陇东后停刊，以反映七七〇团在大凤川的学习、生产和练兵等活动，总结交流典型经验，褒扬英雄模范人物为内容。抗大七分校机关报《抗大》（原名为《抗大生活》，1943 年抗大七分校迁至陇东后改名为《抗大》）1945 年 11 月停刊，共出版 78 期，以宣传抗大七分校的教学、生产为主。中共新宁县委机关报《新宁报》，1944 年 10 月创刊，主要配合全县工作进行宣传和报道，1946 年停刊，共出版 50 余期。此外，还有中共镇原县委宣传部的《群众生活》、中共陇东地委统战部主办的《陇报简讯》、中共陇东地委秘书处的《工作参考》、三八五旅政治部的《部队通讯》、三八五旅警七团的《边防战士》、八路军教导旅的《战旗》及该旅一团的《前哨》、新四旅的《反攻》、十六团的《冲锋报》、警三旅政治处的《战士导报》、七团的《战士先锋》等。

《陇东报》《关中报》等报刊，虽然出版时间长短不一，但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陇东革命根据地政治、军事、社会和人民生活情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陇东新闻事业的先声。这些报刊宣传了党的抗日救国政策，表彰了模范典型，鼓舞了民心士气，不仅记录了陇东革命历史，而且还充当了时代的喉舌，吹响了鼓舞人民奋勇前进的号角。

第三节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地区的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坚持团结抗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战胜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攻势、经济封锁和军事挑衅，使陇东根据地不断巩固发展，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一、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

在陇东革命根据地，陇东各级党组织严格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政策上作了一系列规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形成了各阶级、各阶层、各领域、各民族团结合作的良好局面。

政治上，实施抗日民主政治制度。陇东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与边区其他地方一样，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纲领建立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代表抗日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意志。在实行普选的议会民主制度的指导下，地主、富农、绅士、资本家等也享有公民权，团结了一切赞成抗日赞成民主的人们，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扩大。

为了搞好统一战线工作，陇东根据地在政权建设上有四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陇东分区党委和专署高度重视普选工作，把普选工作作为加强和完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大事来抓，在各次普选工作中成立"陇东分区选举委员会"等专门机构，对各县的选举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安排和指导，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宣传，保证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二是陇东根据地人民把普选作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积极参与，并在选举实践中创造出各种适应当地民主选举的方式。三是在政权

人员结构组成上贯彻"三三制"原则，各级参议会、政府委员会人员组成都严格按照"三三制"原则，政权人员中共产党员的比例都在三分之一以内。四是在1942年的改选中，贯彻了抗日政权建设中"精兵简政"的方针，于1943年完成了对政权机关的精简整编，使陇东各级政权机构设置更趋合理，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加强了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

经济上，实行统一战线的经济政策。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确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为调动各阶级、各阶层的抗日力量，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及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实行"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等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在已分配土地的地区，保证农民已分得土地的既得利益，颁发土地证，承认地权；在没经过土改的地区，停止分配地主的土地，实行减租减息，保护地主土地的地权和佃户的租佃权，调整租佃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缓和阶级矛盾，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从1937年到1940年初，陇东根据地开始宣传和实施"减租减息"政策，由于当时存在统战区等特殊情况，减租工作开展得不彻底。1940年9月，陇东根据地全面开展减租减息工作。1942年至1943年，陇东根据地又进行了大规模认真细致的减租减息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和地主的利益都得到保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陇东根据地在全面实行"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同时，还贯彻中共中央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实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一致的发展工业、商业贸易、财政税收、金融以及奖励和保护私人工商业等方面的政策。

民族关系上，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平等团结工作。陇东分区及新正、新宁县境内有一些回族居民，其中一部分聚居在镇原县三岔乡和新正县的龙嘴子、孟家河、西渠一带，曲子、环县等地也有散居户。到1941年，陇东根据地回族居民总计约350多户，1500多口人。陇东、关中两分区及当地党和政府，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政治上实行民族平等，保障他们的民族自治权利，尊重其宗教信仰与风俗习

惯，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帮助他们发展民族文化教育；在生产、生活上给予大力扶持与照顾，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陇东根据地在民族工作中，按照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指示精神，把实行民族自治，建立民族自治政权，作为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治保障。早在1934年冬，新正县龙嘴子回民乡就成立了临时革命政权。1936年7月，关中特区的新正县成立了龙嘴子回族自治乡，建立了陇东第一个民族自治政权。在1941年边区第二次普选中，陇东根据地在政权建设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了镇原县三岔回族自治乡、关中分区新正县一区一乡等回族自治乡，回族群众自己选举产生乡议会、乡政府和出席县参议会的议员。新正县还推选出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回族特邀参议员。陇东分区各县共有6名回族县参议员。1941年，新正县帮助回族群众修建一座清真寺，组建回族抗日游击队。为更好地开展民族工作，1942年边区政府在陇东分区专署、关中分区专署设立民族事务科，镇原、曲子、环县等县政府第一科设有民族事务科员1人。

陇东根据地党和政府还重视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事业。1937年秋，新正县在回族聚居区的龙嘴子、杨家台成立两所伊斯兰小学，还在各村开设读书班、夜校，请回族教师任教，教授回、汉两种文字。1940年，新正县政府第三科成立回民教育管理委员会，聘请两名阿訇参加管理，并拨款修缮了龙嘴子清真寺。镇原县政府在回族聚居区三岔乡创办一所伊斯兰小学。1939年至1941年，陇东分区为方便回族群众，先后在曲子市、环县庙儿掌、镇原三岔建起3座清真寺。1941年，新正县成立边区文化协会关中分会回民支会，1942年成立回民研究会，专门研究回族历史文化与宗教信仰等。由于陇东根据地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但本地的回族群众在这里安居乐业，还吸引着根据地周边国民党统治区大批回族群众陆续进入根据地生活。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当地汉族群众十分注意民族团结，回、汉群众和睦相处，形成了民族团结、共同抗日的局面。

在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各方面实行的统一战线政策，调动了

陇东根据地内部各阶级、各阶层群众的积极性，缓和了矛盾，减轻了阻力，使广大群众团结一致，一心一意投入到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中。

二、国统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1939年6月，八路军总政治部下发《关于争取友军，孤立反共顽固分子的策略》。1940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中，再次强调争取友军的问题，指出：必须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而在友军中则须开展交朋友工作，以便争取200万军队继续抗日。但是国民党政府不断制造磨擦，破坏团结，在陇东革命根据地屡屡制造事端。从1943年冬开始，国民党从河南抗日前线调第十七军高桂滋部驻防固原，执行包围、封锁、蚕食陕甘宁边区的任务。1944年，第十七军移驻平凉、固原一线。第十七军是一支陕北的老牌部队，其各级军官和士兵大多与陕甘宁边区有乡土、血缘关系，而且他们还曾在北岳地区与八路军共同抗战。为了争取这支部队，中共陇东特委统战部于1944年冬在庆阳专门成立中共十七军工作委员会（简称十七军工委），由统战部部长朱敏及中共环县委员会书记李世臣、镇原县委书记陈致中、三八五旅四团团长白寿康、中共甘肃工委军事科长丁志民等人负责。

通过中共十七军工委的大量工作，第十七军从军、师、团、营、连各级军官到士兵，很多人与边区建立友好关系。陇东地委还多次派环县干部齐应凯去固原，通过该军辎重团团长、高桂滋的亲信齐天然（齐应凯叔父）与高桂滋建立联系。并给高桂滋送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通过长期做工作，高桂滋表示他的部队绝不打八路军；齐天然还帮助边区建立了由固原经王洼子至三岔的秘密交通线。

十七军四连排长许建章，曾是山西牺盟会决死队员，国共合作初期曾在山西国民党军官教导团受训，接受过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对

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深恶痛绝。十七军工委派镇原县保安科侦察员孙克录深入固原第十七军驻地，与许建章建立联系。经边区党组织做周密细致的工作后，许建章决定弃暗投明，率兵起义。1944年6月，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工作，绝大多数官兵已决意参加革命，许建章召开起义士兵动员会，宣布起义。在八路军接应部队的帮助下，起义军顺利到达董家渠。中共镇原县委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庆祝起义取得胜利。会上，县委书记陈致中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高度赞扬起义官兵的革命精神，并代表中共十七军工委和陇东地委向他们表示问候和敬意，热忱欢迎他们加入革命阵营。这一天，镇原四乡群众听到国民党部队起义的消息后，纷纷赶至会场，敲锣打鼓，喜庆联欢。

取得策反工作胜利后，为了继续加强对国民党第十七军的统战工作，十七军工委又分别在镇原三岔和环县苦水掌设立两个联络点，通过各种渠道与国民党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副军长兼新编第二师师长高增基及第八十四师师长艾杰山等接触。经过数次主动联络和沟通，中共十七军工委与高增基、齐天然等建立起融洽的关系，党组织及时派出一名地下工作者，常驻高增基家中，保持双方的密切联系。此后，在高增基和齐天然协助下，国民党第十七军将驻扎在王洼子一带的部队撤至固原北川一带驻扎，陕甘宁边区西线对峙缓解，再未发生战事。由于这一地区的封锁减弱，周边的商贸活动日益频繁，边区内的土特产可以运出去，边区外的日用百货布匹也可以送进来，当地的经济有所恢复，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除争取国民党第十七军外，陇东根据地还贯彻中共中央优待俘虏的政策精神，做了大量争取友军的工作。关中分区在新宁县的盘克、新正县的漱头以及职田镇等地设立“收容友区官兵招待所”，收容和教育在反顽斗争中被俘的国民党官兵；并规定凡国军官兵携枪投归者，发给路费5元，奖励30元，仅在1940年7月中旬，国民党预三师周开勋部士兵投诚者就有15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中共十七军工委的统战工作得

以延续。1945年12月，中共十七军工委委员丁志明和陇东地委秘书长孙君一派遣环县县委统战部干部艾青山到居住在固原县的国民党十七军副军长高建白家中，向中国民主同盟西北负责人杜斌丞传递了解放区党组织的秘密信件，加强了解放区党组织、固原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十七军三方面的联系与合作。不久，国民党十七军与陕甘宁解放区保持的友好关系，引起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怀疑，于1946年将该军调往甘肃武威驻防。至此，中共十七军工委的历史使命也告完成。

为了做好边区周围国民党地方公职人员及各方面上层人士的争取工作，陇东根据地除统战部门单独活动外，还通过边区的商业贸易部门、设在红白边界的检查站以及保安部门开展工作。如1940年以后，陇东特委曾派统战干部窦志安任镇原三岔贸易公司副经理，指定三岔独立营参谋高俞修负责孟坝、马渠、三岔等各检查站工作。他们通过做生意与国统区商人、军政人员广交朋友，宣传边区情况和各项政策，通过他们采购运进边区所需物品。为了争取中间人士和进步分子，关中分区发布《告友区公正绅士书》，晓以民族大义，宣传团结抗日。通过团结和争取工作，使国统区的一些上层进步人士与边区建立了长期的友好关系，做了许多有益团结抗战的工作，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

关中地区的地下交通线建设也取得显著成效，派出联络员建立党的地下联络点（情报站）100余处，建立了一条由西安通往边区的地下交通线。在正宁县，党组织团结争取为人正派、交际甚广的国民党正宁县商务会长、山河镇“大顺通”商号张振襄（字赞臣），在他的牛坡酒坊成立秘密联络点，为游击队传递情报。他还购运物资，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多次出资疏通关节，掩护营救干部战士10余人。

国统区统一战线工作的有效开展，缓和了根据地周边环境，促进了商贸交流，活跃了根据地经济，缓解了根据地的经济困难，扩大了党的影响力。

第四节　陇东党组织的整风运动

遵义会议以来，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但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彻底清算这种错误，党的干部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同时随着大量新党员的加入，党组织的不断壮大，抗日形势的日益复杂，中国共产党面临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的严峻考验。为了解决新问题，迎接新任务新挑战，巩固抗日根据地政权，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加强党的建设，解决党内的思想矛盾，提高党员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已经势在必行。陇东根据地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上述问题，有些方面还表现比较突出。作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思想上进行一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统一认识，就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

一、整风运动的发动

1942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针对党组织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重要任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日，毛泽东又在宣传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党开始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党建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陇东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队伍迅速壮大。新入党的同志大部分出身农民，思想上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东西，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考验。陇东是革命老区，许多同志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因此，有个别党员摆老资格。同时，由于处在抗战后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派遣特务，用各种方式对革命队

伍进行分化瓦解和破坏活动，陇东解放区个别党员干部在新的斗争形势下没能经得起考验，丧失了革命立场，甚至公开投敌叛变，在党内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如在陇东反磨擦斗争严酷而复杂的环境中，原八路军驻镇原县城的七七〇团第三营营长张怀兴，被国民党镇原县县长邹介民用"美人计"拉下水，泄露军事机密，幸好被及时发现未造成重大损失；原中共镇原县委宣传部部长赖辉煌、新城区委书记陈贵起等40余人公开叛变投敌，使镇原县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

陇东根据地党的工作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对干部的思想作风教育不够，干部工作中的"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作风还很严重，表现在掌握和执行政策上经常发生左或右的偏差"。显然，陇东党组织和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党八股等问题，干扰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引发了一些问题。正如李卓然在分析总结环县事变教训时所说："三年来和平环境所产生的太平观念，自满自足、因循苟且的倾向及边区经济的发展，影响到内部阶级关系的变化，影响到少数党员思想上的蜕化变节，影响到商人道德与资本主义思想在党内的某些发展。所有这些，都是便利于外来敌人的侵袭，替外来的坏分子开辟道路的根源。"①

根据中共中央整风运动的部署，结合陇东党组织和党员中存在的实际问题，陇东地区及时进行了整风运动。1942年2月下旬，关中分区党委在马栏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精神和部署关中分区的整风运动；3月18日，陇东分区党委召开全区干部学习动员大会，部署整风运动。同时各县也相继召开会议，进行整风动员，整风运动在陇东革命根据地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二、整风运动的开展

1942年4月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准备整顿三风工

① 李卓然：《论环县事变的教训》，《共产党人》第8期，1940年7月，第39页。

作致各地党委的信》，对边区的整风运动进行了具体部署，要求“各省委、分委、县级组织，自六月一日起到八月三十日止为各地方学习和研究中央决定的二十二个文件[①]的期间……到九月一日以后各地开始检查工作。这样各地方的党在时间上有了充分的准备，且随时可以把延安的经验运用到各级党的组织中去，使各地整顿三风工作获得更大的成功。”[②]5月30日，西北局再次发出《关于在各分区和各县学习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等22个文件的指示》，规定整风学习时间为6个月，自1942年4月1日开始。

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部署，陇东的整风运动做得很扎实，学习阶段从1942年3月开始至1943年3月结束。陇东地委专门成立了由马文瑞、王维舟、马锡五、段德彰等人组成的学习总委员会，组织指导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22个文件。特委、专署等机关及各县相应地成立学习分委会，进行组织指导学习。同时，陇东特委将《救亡报》改为《陇东报》，刷新内容，扩大篇幅，增加副刊，以配合整风运动。各学习单位建立了秘书制度，“负责分配与保存文件、会议记录、搜集质疑问题，检查学习笔记，汇总讨论情况，向总学委汇报”[③]。

在整风运动初期，陇东解放区主要采取集中学习的办法，组织学习班，如分区政府系统的各个学习单位根据文化程度的不同，分成两

---

① 22个文件是：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改造我们的学习》、《论反对自由主义》、《〈农村调查〉序言》，刘少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康生《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报告》、《痛斥党八股的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列宁、斯大林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斯大林论平均主义》、《李来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教育政策》、《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红军九次代表大会论党内部正确倾向》和《宣传指南》。

②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2年），内部资料1994年印行，第124页。

③ 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庆阳地区志·党派志》第4卷，第227页。

个学习小组，提出不同要求：曲子、环县、镇原也按干部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两个组，"甲组采取听报告，自学讨论的方式进行学习，乙组采取上课的方式进行"。区、乡整风运动开始后，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学习方法，庆阳县、曲子县"或召开联席会议，以会代训；或开办训练班，培训力量"。关中分区的新宁县"以区为单位，由区委组织进行，县委抽调部分干部和小学教员赴各区帮助学习，县委领导经常巡视检查。在学习方法上，根据绝大部分区乡干部文化程度低，采取上课的方式进行，边学习边讨论"[①]。

6月，在学习整风文件的基础上，针对党组织内部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股不正之风，陇东分区各级党委展开了全面的思想检查和工作检查。此阶段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和教育相结合，反省与批评相结合，运用中央整党文件的精神来检查党员思想作风上存在的错误，查找不正之风存在和滋长的根源。通过查找和揭露三股歪风，在陇东分区各级党组织中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其主要表现形式是老干部中的经验主义倾向，新干部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反对宗派主义，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个别党员干部存在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以及闹独立性的倾向；以及反对党八股的斗争。

陇东分区党委还在各级党政机关中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发财、贪污腐化行为和对落后意识倾向的斗争。为了巩固整风所取得的成就，陇东分区党委制定了工作制度、纪律守则和奖惩制度，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经常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执行党的政策。

三、审干工作与抢救运动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

① 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庆阳地区志·党派志》第4卷，第227页。

定》，指出各地党政军民机关中，已被混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要求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运动，以检查工作和纠正错误思想。根据中央决定精神，1943年4月，陇东根据地整风运动进入审查干部阶段，直至当年10月底结束。

5月7日，西北局发出指示，要求进行系统的干部审查和工作检查。陇东地委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部署，安排各县重新组织干部整风学习。9月6日，陇东地委举办整风训练班。审干工作初期，陇东地区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和风细雨"式地教育干部，对有错误的干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让那些犯有错误的干部向各级组织交清问题，不隐瞒个人的历史和错误，基本上达到了弄清问题，坦白错误，提高思想认识的目的。

随着审干运动的开展，由于对敌特分子的渗入和破坏作出过于严重的估计，审干工作出现了一些偏差。1942年11月，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用"逼、供、信"的办法强迫原甘肃地下党、陕北公学学员张克勤承认是"特务"，进而制造了所谓甘肃地下党是"红旗党"（意指党组织外红内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冤案。"红旗党"事件波及到甘肃省的大部分党组织，许多在陇东工作的原甘肃工委的领导和党员被打成"红旗党特务"。康生在延安的做法，纷纷为各地审干所效法，用"逼、供、信"的方法迫使怀疑对象坦白。7月15日，康生在延安中央直属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强调"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还有一些失足的人至今没有向党坦白"，"他们要在这紧迫的时间中挽救自己，而共产党员们也要在这短促的时间内抢救他们"[①]。此后，根据地开始了"抢救失足者"运动。

由于受"甘肃红旗党"错案的牵连和"抢救失足者"运动影响，陇东的审干运动由原来的"和风细雨"转变为举办训练班，大抓"特务"、"反革命分子"，以"抢救失足者"。9月16日，整风训练班举行

① 《中共党史编年史》第3册，第1292页。

开学典礼，“要求参加训练班的同志向党说老实话”①。训练班的开学，标志着陇东“抢救失足者”运动开始。被送到训练班受审的干部主要是从国统区投奔到边区的同志，如“镇原县的干部中，凡是从国统区来的都集中到地委训练班去了”②。审干运动中，陇东分区许多干部受到打击和伤害，训练班的人数从9月份的23人上升到11月份的129人③。在各种各样的审查之下，一些人被迫承认是国民党、三青团、复兴社成员、CC分子、日特、蒋特、阎特或者是“托派”等，各县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一些冤假错案，造成了严重后果。如原华池县县长第五汉杰在审干运动中自杀身亡④。“抢救运动”不仅发生在机关单位，而且在乡村也多次召开“现场坦白大会”，迫使一些农民也交待自己是三青团、复兴社成员或者是CC分子。有的采取划指标的方法，如华池县“有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复兴社’，也被列为怀疑对象，强迫交待。这样的人全县达四百多人。”⑤

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关中分区也出现了扩大化现象。1943年8月23日，关中地委在对新宁县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认为，“国民党反动派敌探奸细，在新宁已有相当普遍的组织基础，反革命活动极为严重”。要求“目前新宁党的工作应以锄奸防奸为一切工作的中心”。错误地认为新宁“特务如麻”，在审干运动中按比例划分特务数量，使大批干部和群众被当作“暗杀队”、“便衣队”、“CC系”成员进行批斗，并逮捕关押20余人⑥。新正县也同样出现了偏差，县长郭存信等5人被判为特嫌，停职反省⑦。

---

① 《中共陇东地委关于整风训练班工作报告（草案）》（1943年11月10日），《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建设》，第171页。

② 李天明：《镇原县的整党整风》，《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建设》，第476页。

③ 《中共陇东地委关于整风训练班工作报告（草案）》（1943年11月10日），同上，第177页。

④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第116页。

⑤ 华池县志领导小组：《华池县志》，第69页。

⑥ 宁县志编委会《宁县志》，第452页。

⑦ 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庆阳地区志·党派志》第4卷，第227页。

随着"抢救失足者运动"问题的不断暴露，党中央逐渐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断采取措施纠正错误，最后决定停止运动，进行甄别工作。7月30日，毛泽东及时发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指示。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纠正逼供信的错误。10月9日，毛泽东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1944年2月，西北局转发《中央书记处关于审干的指示》指出，对各种情况如果不加分析区别，将所有坦白分子都认定为特务分子，就会犯严重错误。5月，陇东地委召开分区干部大会，提出"加速甄别工作"，要求"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做出合乎事实的结论"。对错划为"特务"的，要"恢复其名誉，尽可能恢复其原职或相当于原职的工作"①。6月，陇东地委召开县委书记、县长会议，提出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进行甄别。8月12日，中共陇东地委又发出《为甄别工作给各县委的一封信》，要求各县委加速甄别工作，并对如何进行甄别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②。陇东各级党委通过甄别工作，恢复了错整干部的名誉。

1943年10月中旬至1944年底，是陇东根据地整风运动的总结提高阶段。陇东各级党委按照中央学习总委员会部署，组织党员干部重新学习整风文件，根据中央关于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审干方针，认真总结整风以来的经验教训，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犯错误同志进行真诚的批评和帮助，促使他们改正错误，放下包袱，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对错整的党员干部，按照中央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给予彻底平反；党组织向受害者赔礼道歉，取得他们的谅解，被迫害致死的给予昭雪。1943年底，陇东地区的整风运动基本结束。

---

① 《段德章同志在分区干部大会上关于审查干部与反奸问题的讲话提纲》，中共庆阳地区党史办：《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建设》，第195页。

② 《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建设》，第196－199页。

1942年至1944年底的整风运动，既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它对克服抗战中的严重困难，创造了精神方面的有利条件。党在陇东进行的整风运动，虽然后期出现了一些偏差，走了一段弯路，但在清除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方面，广大党员干部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不仅重新教育和训练了党内经过长期斗争保留下来的一批老干部，而且教育训练了抗战初期入党的大批新党员，进一步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坚持和发扬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使得陇东各级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团结和巩固，促进了根据地各项工作深入发展，巩固和发展了陇东抗日民主政权。

抗日战争时期，是陇东党组织发展史和自身建设史上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陇东党组织不断发展，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在革命实践中表现优秀的知识分子、农民等被大量吸收入党。同时，陇东根据地积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健全组织制度，严格组织纪律，审查党员成分和进行整风运动等措施，使陇东根据地的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思想上更加坚定，组织上更加巩固，作风上更加优良，建立起"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组织。正是由于党的建设上取得巨大成效，有了党的坚强领导，陇东根据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勃勃的局面。

第十三章　陇东根据地的抗日政权建设

第一节　陇东抗日政权建设及巩固

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1937 年 11 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为陕甘宁特区，各级工农苏维埃政权改为抗日民主政权，由苏维埃民主制度改为议会民主制度。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陇东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认真贯彻落实“三三制”原则、“精兵简政”政策、“五一施政纲领”等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调动各阶级、阶层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陇东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得到巩固和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陇东是陕甘宁边区的西南大门，肩负着巩固根据地，保卫边区的重要责任，因此，陇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受到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陇东根据地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各项政策、法令的同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开创性的有益探索，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积累和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三三制”的试验与推行

为巩固团结，动员抗战，发扬民主，克服困难，1940 年 3 月 6 日，毛泽东在《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第一次提出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政权原则：“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

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①]认为“三三制”政权，能够争取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步骤。3月11日，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再次强调建立“三三制”政权的问题，并指出“在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统治的区域，只要是不反对共产党并和共产党合作的党派，不问他们是国民党，还是别的党，应该允许他们有合法存在的权利。”[②]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中央局（1941年5月13日与西北工委合并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指出：不仅在民意机关要实行“三三制”，而且在政府机关也要实行，让党外人士参加政府机关的实际工作；在选举中不仅要充分贯彻“三三制”的政策，而且要深入群众，检查过去政府各种社会政策与立法的实施是否真正合乎“三三制”，合乎的政府要以立法承认，不合乎的加以修正。[③] 为此，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起草委员会，依据“三三制”政权的精神起草新的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提出抗日政权建设中的“三三制”原则：“本党愿与各党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只占1/3，以便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政治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中2/3的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

① 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1－743页。

②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50、751页。

③ 《边区中央局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信》（1941年1月30日），中央档案馆等：《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40－1941年），甲2，第302、303页。

意孤行，把持包办。"[①]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的指示及《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颁布，对推动陇东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建设，培养党的各级干部同党外人士合作的民主作风，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建设"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更好地贯彻实施"三三制"原则，积累经验，1940 年，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首先在绥德、陇东两分区进行试点。9 月，陇东分区先后召开分区临时参议会、各县临时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通过聘请的方式，邀请党外民主人士参加参议会和政府工作。在第二次普选中，陇东分区党委、专署在政权建设中十分强调和坚持"三三制"原则及政策，在经过试点工作的基础上，1941 年的民主普选活动中开始全面推行"三三制"原则，得到党内外各界人士的普遍拥护。对这段时间陇东的"三三制"普选工作，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中指出，"陇东分区做得比较认真"。但是，陇东根据地各县在这次普选中的结果，共产党员人数在新产生的各级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中仍超过 1/3，并未真正建立起"三三制"政权。如环县选出的 11 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 8 名；华池县 5 名县常驻议员中，有共产党员 3 名；庆阳县 7 名政府委员中，有共产党员 4 名；新宁县 9 名政府委员中，有共产党员 5 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民主作风深得民心，共产党员能够同人民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事，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另一方面因为陇东是老革命根据地，广大群众对共产党有深厚感情。因此，在普选中人们极愿投票给共产党员，这样就造成在新产生的县、乡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中共产党员人数超过 1/3 的现象。

针对 1941 年普选没有完全贯彻"三三制"政权建设原则的问题，《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进一步强调贯彻"三三制"。1942 年 3 月 4 日的社论指出：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甚至占了绝对多数的情况，

① 甘肃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一辑），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86 页。

一方面说明了边区人民对共产党员的信任和拥护，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对"三三制"研究、了解和贯彻不够。社论同时要求给予补救，方法是"落选的非党议员，政府可以酌量聘请"；"非党候补议员，可以由党员正式议员辞职，使之补上"；"政府委员也可以由党员辞职，另选一些有能力、有名望的党外人士参加工作"[①]等。3月13日的社论则号召"我们一定要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实行三三制！"[②]1942年3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规定各县参议会和政府中，"共产党员超过1/3的，应该自动提出辞职，由无党派候补议员补充"[③]。

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指示，陇东分区各县及时召开县参议会，对县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进行改选，解决1941年普选中各级政权中共产党员超过1/3的问题。陇东分区专署先后4次发出指示，要求在政权建设中严格执行"三三制"原则。在改选中酝酿确定县、乡两级政府委员和参议员时，党组织主动限制自己的候选人，积极替其他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提出候选人，帮助他们参加竞选，使共产党员在各级政权中占有的比例始终保持在1/3以内。当选的共产党员如果少于1/3时，就选多少是多少；若超过1/3，则主动提出辞职，由其他党派或无党派民主人士递补。曲子县共选出参议员946名，共产党员298名，占31.5%；国民党员9人，占1%；非党人士639名，占67.5%。就阶级成分而言，地主21名，富农45名，中农173名，贫农687名，雇农9名，工人21名，商人8名。新宁县609名议员中，共产党员110，仅占18.1%；新正县408名议员中，共产党员108名，占22.5%；庆阳县1028名议员中，共产党员180名，占17.5%；华池县522名议员中，共产党员174名，占33.3%；合水县677名议员中，共产党

① 《充实县级三三制》（社论），《解放日报》1942年3月4日。

② 《实行三三制——贯彻党的领导》（社论），《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

③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8页。

员144名，占21.3%[①]。环县1941年选出的11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8名，1942年改选时，谢正和等5名共产党员主动提出辞职，改选后的9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3名。其他各县政权中，共产党员超过1/3的也都纷纷提出辞职。新正县11名政府委员中有共产党员3人，不足1/3。共产党员的这种主动谦让，与党外人士真诚合作的精神，使党外民主人士深受感动，极大地促进了民主政治在陇东抗日根据地的贯彻实施。经过改选，陇东根据地各县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均达到了"三三制"原则的要求。

在陇东各县的乡级普选中，"三三制"原则同样也得到认真贯彻。在乡政府委员选举中，县政府规定在7名乡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最多不能超过3人，对于超过3人的进行了补选，使其基本符合"三三制"原则[②]。

"三三制"是抗战时期陇东根据地民主政权的主要形式，为陇东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三三制"的实行，使陇东根据地民主政权团结了社会各阶层，赢得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使根据地政权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在政策的实践当中，消释了其他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及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各阶级对抗日民主政权的犹豫和怀疑，给各党派和各阶层民众提供了参与政府工作的机会，调动了各阶层民众抗日和建设边区的积极性，不仅为赢得抗战的胜利，而且为党在全国建立政权和成功执政，进行了有益探索并积累了经验。

二、"精兵简政"政策的贯彻与实施

陇东抗日根据地建立后，陇东分区的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抗日民主政权逐步建立健全，党政干部人员也相应地有较大增长。但是随

① 《陕甘宁边区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第794页。

② 《曲子县政府第一科1942年全年民政工作报告》，《陕甘宁边区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第336页。

着严重经济困难的到来，“鱼大水小”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为克服根据地严重的物资困难，适应变化了的客观情况，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陇东分区结合整风运动开展了“精兵简政”工作。

1941 年，国民政府停发对八路军的军饷，并对陕甘宁边区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封锁，限制日用品进入边区和边区的土产出口，导致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入极为困难的时期。1941 年 11 月，为应对困难局面，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民主人士李鼎铭等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该提案不仅在参议会上获得高票通过，而且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①。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②

1941 年 12 月 4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向各专员、县（市）长发出指示信，提出“精兵简政”的原则和要求。此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把“精兵简政”当作政府的中心工作之一，成立了专门的整编委员会，制定了整编方案。1942 年 1 月，边区政府发布《关于各级行政组织区划编制的规定》的通令，根据边区各分区人口、地域、自然、经济状况与政治环境等条件，划分不同等级，并以此编制配备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将超编的人员精减下来，使行政机构真正做到少而精。其中，陇东分区被划为甲等，关中分区被划为乙等，两分区对所属各县也划分了等级，庆阳县为甲等，环县、曲子、新宁、镇原、合水 5 县为乙等，新正、华池两县为丙等。同时，各区乡也划分了等级，陇东分区共划分甲等区 22 个，乙等区 14 个，丙等区 2 个。新正县 4 个区中，2 个为乙等，2 个为丙等。不同地区不同等级的划定，为“精兵简政”工作进一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 4 月版，第 502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 册），第 264 页。

步顺利展开做好了准备。

陇东分区专署按照《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和《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领》的规定，着手裁撤不急需的机构，合并性质相近的机构，精简缩小行政机构，裁减超编人员。陇东分区在精兵方面，缩编分区主力部队及指挥机关，减少非战斗人员，加强地方武装和发展民兵。在简政方面，整顿各级组织，紧缩机构和人员编制，加强基层，提高效能。分区专署将其所设处一律改为科，并进行了裁撤、合并和缩小，将原6处1室合并为2科1室，即一科（管理民政、教育事宜）、二科（管理财政、经济建设、粮食等事宜）和秘书室；保安科改为保安分处，裁判处改为司法处（1943年改设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陇东分区的原交通运输局和调查站等单位撤销；地方卫生所与三八五旅医院合并；陇东分区税务局与庆阳县税务局合并。同时，实事求是，灵活掌握政策，如后来又根据实际需要恢复粮食科，成立分区邮电局。

陇东分区各县政府也相应地精减机构，将县政府所设6个科室合并为3个；同时撤销区公署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助理员，总设大区助理员3人，小区助理员2人。适当缩小乡的规模，全分区由原来的226个乡增加到239个乡。陇东分区在精简机构工作中，依照甲、乙、丙3个等级分别配备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并将超出编制的人员精减下来，使机关真正做到少而精。陇东分区还对群众团体的专职人员相应进行精减，如陇东分区工会将原有脱产干部60人精减为20人，并取消区工会主任一职。

1942年8月，西北局发出《关于贯彻精兵简政的决定》，指出：精兵简政不仅是裁减冗员、紧缩机关，而且必须建立合理的工作制度、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尤其指出在对待精减人员问题上，"应以达到各得其所为原则，必须具体按照每一人员之工作历史、工作才能、工作经验、政治条件，按照党与非党干部政策原则，加以恰当处

理。任何粗枝大叶、任意放弃干部人员的倾向，都要严格防止"①。陇东分区在精简工作中，十分注意政策的贯彻执行，把精简机构、人员的合理安排、加强基层建设等很好地结合起来。陇东分区把工作能力强的干部充实到县政府机关、生产部门和区、乡基层单位中去，有89名干部调动工作，既使上级机构变得精干，又使基层工作得到加强。1942年2月，分区第一次精减整编工作结束。1943年1月，西北局高干会议之后，陇东分区及县、区、乡各级政府普遍进行第二次精简整编，于5月底完成。分区专署在精简前共有工作人员44人，经过精简，配备干部25人，事务人员6人，减少了13人，各县行政机构精简后，配备干部112人，事务人员35人，减少64人。如华池县精减干部20人，新宁县精减干部22人。对精减下来的编余人员通过派出学习、转送生产部门或退伍等途径，都作了妥善安置。如合水县县政府精减13人，其中4人送延安学习，7人转到生产部门或其他工作岗位，2人到行政村工作。新正县县政府精减5人，其中1人派往生产部门，2人派出学习，1人退伍，1人派任乡长后回家。由于处理慎重，安排适当，编余人员都高兴地服从组织安排。

陇东分区及新正、新宁两县实行"精兵简政"后，不仅缩编了政府工作人员，减轻了群众负担，充实了基层政权和生产部门，加强了公安、司法工作，更主要的是各级政府建立健全了政府工作制度，如工作汇报制度、干部管理制度、行文制度、文件管理制度、巡视检查制度等，使行政事务管理和干部管理逐步走向正规化、制度化，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的目的。广大干部也进一步改变了工作作风，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面向群众，提高了工作责任心，都能廉洁奉公，艰苦奋斗，为人民利益忘我工作，从而密切了党、政府和群众的联系。

① 《西北局关于贯彻精兵简政的决定》(1942年8月1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2)，第178页。

三、第二次普选运动的开展

1937年6月20日，陕甘宁边区提出在开展民主政权普选运动中的《民主政府施政纲领》。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1月，陕甘宁特区（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提出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为国民政府的特区。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合作的新协议，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1937年11月10日，边区政府发出通令，将政府改名为陕甘宁特区政府。1938年1月，陕甘宁特区复称陕甘宁边区）根据十大纲领制定了《特区政府施政纲领》，部署开展民主政权普选运动。1939年4月4日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确指出，施政纲领是为了拥护团结、坚持抗战、争取最后战胜日寇，根据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结合边区实际情况而制定，并作为边区一切工作的准绳。1941年，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总结边区建设的实践经验，重新制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共21条），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于同年5月1日公布（因而又称"五一施政纲领"），广泛征求意见，同年11月正式提交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后在全边区贯彻实施。

"五一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了边区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与各党派各群众团体实行民主合作的"三三制"政权政策，成为边区实行民主政治和其他方针政策最根本、最重要的依据和准则。为了使选举运动正确地实行党中央提出的"三三制"原则，建立起真正模范的新民主主义政权，1941年1月30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出《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指出：普遍地在边区各地实行改选各级政府，建立自下而上的各级参议会的选举运动，是一件伟大的工作。同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指出"未经过选举的地区，各级政府都是临时的，必须由老百姓选举，才能叫正式政府"，要求"各

级参议会决定今年都要改选，未成立的都要成立”，并规定进行各级政府和参议会选举的具体时间表：2月至3月为选举的宣传准备阶段；4月至5月实行选举，开乡（市）参议会，组织乡（市）政府；6月至7月新选的县及等于县的参议会召集开会。8月新选的边区参议会召集开会。[①] 为了使选举能够顺利进行，边区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文件加以规范。2月7日，颁布《陕甘宁边区各级选举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了办理选举的专门机关、县乡选举委员会人数、选举委员会主任职责，还规定了选举过程中监票员、司票员、开票员、记录员的职责和注意事项等[②]。在乡选开始前夕，边区政府又发出指示，强调选举工作在政权建设中的主要作用，指出：“我们一切工作实际做在乡市；人民对于议国事管国事最关心而且最多的在乡市，乡市选举工作不深入，那就好比地基不实固，上面就无法建立起宝塔来。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忘记乡市工作是我们最弱的一环，人民不满意和意见多的是乡市机关。因此必须用大力做乡市选举运动。”[③]

根据边区政府的时间安排和指示，陇东分区及时对选举从时间、方法等方面作了安排。1941年3月25日、4月5日，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先后两次向各县发出指示信，对选举工作进行全面部署。3月25日的指示信指出：“选举工作不论曲、环、华3县群众已有习惯，不论庆、合、镇3县还是破天荒的盛举，都应普遍的、深入的宣传动员，真正造成一种热潮”。4月5日的指示信，则强调指出：“目前三大任务——民主、经建及整理和扩大武装，究竟什么是中心？我们的答复是‘民主建设为中心’。”“三大任务的重心还是民主建设，而民主建设的第一着就是选举运动，所以目前工作最中心的一环是民主建设”，“民主建设是开展一切工作的骨髓”[④]。同时，成立陇东分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第51页。

②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第64－67页。

③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第278页。

④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208页。

区选举宣传委员会和选举工作团，制定《陇东分区选举宣传委员会选举运动宣传大纲》，解释和说明普选工作，组织分区干部深入各县，成立各县选举委员会，加强对选举工作的领导。根据边区选举条例和分区对选举的指示，各县根据本地情况制定了选举办法。如庆阳县以布告的形式发布了15条选举办法。

1941年3月，陇东分区各县根据边区政府的安排拉开了选举序幕。各县成立了选举工作团，分赴各区、乡进行普选宣传工作，并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环县选举委员会以学校学生为主组织了3个宣传队，由县级干部和学校教员带领下乡宣传民主选举。合水县选举委员会编写印发《合水县选举指南》的小册子。新正县选举委员会组织了28人的工作团在马栏区进行乡选试点。9月和10月，陇东分区华池、环县、曲子、庆阳、合水、镇原等县均在先行直接乡选的基础上，先后召开县参议会，选举产生县参议会正、副议长，常驻议会议员；选举产生县政府委员、县长；选出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员和候补议员。在选举中，陇东分区十分重视动员妇女参加选举，许多优秀妇女当选为各级参议员和政府委员。庆阳市桐川区选举的187名乡参议员中，有妇女参议员26名；庆阳市政府委员会7名委员中，有2名妇女委员。1941年7月下旬，关中分区的新正、新宁两县召开县参议会，进行民主普选。新正县选出乡议员405人，其中共产党员161人，国民党员242人；女议员10人。阶级成分为雇农25人，佃农165人，贫农186人，中农20人，开明绅士2人，商人7人。①

1941年10月，陇东分区普选和换届工作全部结束。在第二次普选中，根据边区选举条例的规定，陇东分区各级政府成立选举委员会以加强指导，并组织大批干部下乡进行宣传和组织，调动了群众的参选积极性，激发了群众的政治热情，使得选举获得了巨大成功。许多地方在选举投票之日像过节一样，男女老幼齐出动，乡村平时不常出

①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38页。

门的姑娘媳妇们，穿上新衣服成群结伴上路，老太太也骑着毛驴，从几十里外赶去参加投票，气氛热烈、民主。在这次普选中，陇东分区参加投票选举的选民达到80%至90%，有的地方高达95%以上。

1941年进行第二次普选期间，是陇东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重要阶段，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三三制"原则和"精兵简政"政策。1941年的普选虽然成效显著，大力推动了民主政权建设，但在选举中没有坚决的彻底贯彻"三三制"原则，1942年进行了改选，1943年根据"精兵简政"原则进行了精简整编。所以，从政策的延续性和内容的持续性上说，第二次普选也包括1942年的改选和1943年的整编。

第二次普选运动在形式上有许多创新，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参选。陇东分区党委和专署针对边区群众文化落后、部分选民不识字、自然条件差、山大沟深、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等实际情况，创造出许多方便群众的选举方法，比如："投豆豆"、"柞(伸)胳膊"、"烧香洞"、"画圈圈"等。对于因各种原因不能到会参加的选举者，则采取"背箱子"的办法，派工作人员背着流动票箱，挨家挨户送票收票，让群众都能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充分保障了各阶层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这次普选活动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度高，参选率高，取得很大成功。而且，选民以主人翁精神，对投票认真负责，把值得信任的"好人"选进了各级政权，淘汰了不称职干部，巩固了基层政权，进一步推动了陇东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四、参议会制度的实施

为了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从1939年至1946年，陕甘宁边区在延安召开过三届(共4次)参议大会。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它的主要职责是：听取政府工作报告，检查政府工作，决定边区各项重要决策、法令及军事之重要事项，选举边区参议会议长、副议长及常驻议员，选举决定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及政府委员，选举决定边区高

等法院院长。在参议会闭幕期间，责成常驻参议员监督政府执行大会全部决议，监察及监督边区各级政府的政务人员，审理政府工作。

陇东根据地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组织由参议会、政府委员会、司法机关三部分组成。《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分区一级不设参议会。但同时也规定，在所属各县未成立参议会之前，可以召集临时参议会代行参议会职权，负责管理和监督各级政府，各级参议会成立后即行撤销。根据上述规定，1940年9月18日至26日，陇东分区临时参议会在庆阳县县城举行。原定出席会议议员75人，实际出席50余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张邦英参加了会议，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王维舟、副专员马锡五分别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选举刘仲郯为分区临时参议会议长（当年10月刘仲郯病故，由任绍亭继任），段德彰为副议长，通过了有关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议案。会议通过的《为加强陇东团结配合全国坚持抗战到底案》，着重强调团结抗战问题，指出“团结与抗战不可分割”、“只有团结才能抗战到底”、“陇东为西北屏障，能否巩固影响甚巨”；《为求回、汉两族更加亲善和好，抵抗日寇侵略案》提出，回、汉两大民族应该以国家至上，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并提请在回民多的区域建立清真寺和回民学校。可见参议会的决议案，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都很强，主要解决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按照《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和《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规定，县参议会每半年举行一次会议，每两年改选一次，并规定县参议会是县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县政府服从县参议会，对上级政府及县参议会负责，领导和执行全县政务。县参议员由全县人民选举产生，设正、副议长。由议员中选出常驻议员5人（正副议长为当然常驻议员），组成县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在参议会休会期间，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并负责监督县政府对县参议会决议案的执行情况，听取县政府的工作报告，向县政府提出建议，派代表出席县政府委员会会议，必要时决定召开县参议会临时会议。两个《条例》还规定县参议会职权为：选举或罢免县长、县政府委员及地方法院院

长；监督及弹劾县政府、司法机关的公务人员；决定本县地方经费收支事项；制定与否决本县单行法规；批准县政府民政、财政、粮食、建设、教育及地方军事等各项计划；议决县长、县政府委员会交议事项和本县人民及群众团体提请审议事项，督促和检查县政府执行参议会议决的事项；决定本县应兴应革重要事项等。根据上述规定，各县举行了相关的会议。

华池县：1941年9月29日至10月4日，第二届一次参议会在悦乐召开，选举王德明、黄生华为正副议长，李培福为县长，选举高自立、李树林、路志亮（女）、段长富、王定邦、高明山为华池县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1942年2月27日至28日第二届二次会议召开，会议为贯彻"三三制"原则，改选了县参议会和县政府，选举刘维舟、史九功为正副议长，李培福为县长；1945年5月间第二届三次参议会召开，通过并颁布了《华池县土地租佃暂行办法》，对华池县各种形式的地租租额作了明确规定；1946年2月12日至18日第三届一次参议会召开，选举扈宪章、高明山为正副议长，李生华为县长，选举李培福、刘生枝、杨俊五为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议员，李生发为候补议员。

环县：1941年10月2日至7日第二届一次参议会召开，选举白耀卿、杨志贤为正副议长，陈玉山为县长，选举杨俊卿、米阿訇（回族）、吴廷发、张明觉、莫文骅、尤祥斋（女）为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1942年4月间第二届二次参议会召开，根据"三三制"原则，改选了参议会和县政府，选举徐锡龄、杨志贤为正副议长，陈玉山为县长；1944年第二届三次参议会召开，主要讨论了县政府工作；1946年2月12日至18日第三届一次参议会召开，选举王保民、韩正平为正副议长，陈巨奎为县长，选举何思敬、杨志贤、刘清俊、韩正平为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议员。

曲子县：1941年10月1日至5日第二届一次参议会在曲子完小召开，选举苏耀亮、王世五为正副议长，逯月喜为县长，选举王世泰、马锡五、苏耀亮、许志鸿、王世五、马阿訇（回族）、李焕章、杨桂兰

（女）、杨生稼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员；1942年5月16日至19日第二届二次参议会召开，根据“三三制”原则，改选了县参议会和县政府，选举苏耀亮、王世五为正副议长，逯月喜为县长；1946年1月21日至27日第三届一次参议会召开，选举王邦宁、郭兆林为正副议长，李正林为县长，选举马锡五、杨生稼、朱启明、罗迈、郭兆林为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议员。

庆阳县：1941年10月1日至4日第一届一次参议会召开，选举孙君一、田雨亭为正副议长，陆为公为县长，选举任绍亭、谢觉哉、贺新民、王维舟、李欣陶、马文瑞为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议员；1942年6月2日至7日第一届二次参议会召开，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陇东地委代理书记段德彰、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到会并讲话，会议通过了土地、婚姻、加强地方武装等提案21件；1946年2月12日至21日第二届一次参议会召开，选举田雨亭、蔡得旺为正副议长，杨福祥为县长，选举谢觉哉、李合邦、田绍锡、杨凤林为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议员，任绍亭为候补议员。

合水县：1941年10月10日第一届一次参议会召开，选举杜子川、杜佑承为正副议长，王仕俊为县长，选举李子川、李云如、杨正甲、白烈飞（女）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员，郭维汉为候补委员；1942年4月29日至5月3日第二届一次参议会召开，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驻军代表及陕甘宁边区选举工作团20多人参加了会议，根据“三三制”原则，改选县参议会和县政府，选举李子川、杨正甲为正副议长，王仕俊为县长；1946年2月16日至20日第三届一次参议会召开，选举雷庆地、杨正甲为正副议长，张云山为县长，选举杨正甲、路志亮（女）、赵国栋为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议员，薛绍汤为候补议员。

镇原县：1941年10月2日至6日第一届一次参议会召开，选举陈致中、杜云程为正副议长，康子文为县长，选举杜洪源、薛宗华、陈致中、孙世涛、张彦儒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员；1946年2月9日至15日第二届一次参议会召开，选举李焕章、杜洪源为正副议

长，王子厚为县长，选举杜洪源、李焕章、鲜维俊（回族）为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议员，张彦儒为候补议员。

新正县：1939年4月第一届一次参议会召开，选举关中分区专员霍维德兼县长，并决定新正县政府与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合署办公；1941年7月25日至29日第二届一次参议会召开，选举李科、郭廷藩为正副议长，郭进亭为县长，选举霍维德、李科、郝明珠（女）、马生福（回族）、李占成、胡秉坤为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议员；1942年5月26日至6月2日第二届二次参议会召开，会上贯彻了"三三制"政策精神，新选出的9名县政府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共产党员只占3名；1942年9月4日至6日第二届三次参议会召开，主要讨论征粮、乡选工作；1944年8月27日至30日第二届四次参议会召开，主要部署了征粮工作；1946年1月7日至13日三届一次参议会召开，选举李科为议长，郭廷藩为县长，选举习仲勋、高锦纯、汪锋为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议员，蔡登宵为候补委员。

新宁县：1939年下半年第一届一次参议会召开，选举康润民为议长，路思温为县长；1941年7月25日至30日第二届一次参议会召开，选举史梓铭、赵正贤为正副议长，李积成为县长，选举史梓铭、文年生、杨治国、孟宪云、宋福禄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员；1942年10月第二届二次参议会召开，根据"三三制"原则，改选了县参议会和县政府，选举杨伯伦、高庆云为正副议长，李积成为县长；1943年2月第二届三次参议会召开，主要讨论了开展国民经济建设和减租减息工作；1944年8月26日至30日第二届五次参议会[①]召开，讨论了征粮等工作，选举惠世恭、王英杰为正副议长，刘永培为县长；1946年1月第三届一次参议会召开，选举何聚才、张贵元为正副议长，王立成为县长，并选举杨伯伦、张德生、高俊岳为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议员，赵彦忠为候补议员。

由于当时条件限制，陇东地区各县参议会召开的时间和次数并

① 新宁县二届四次参议会情况不详。

不一样，有些地方几乎每年都按时召开，有些县召开的不及时。会议的主要内容为选举正副议长、议员、县长，选举出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议员，讨论"三三制"政策的贯彻实施、征粮任务的部署等各方面工作。参议会上所提意见和建议，针对性、操作性强，都是为解决某方面问题或进一步加强某项工作的，可见参议会制度为陇东抗日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节　陇东抗日根据地的法制建设

随着陇东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建立和完善，在陇东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根据地的公安、司法机关逐步健全，法制建设和法制工作迅速发展。1942年陇东分区实行精兵简政以后，加强和健全司法、公安组织机构，根据地的法制工作进一步加强。1943年，"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产生，表明陇东根据地的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陇东根据地新民主主义司法制度基本确立。

一、司法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司法制度建设是政权建设的重要方面。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1944年1月6日在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边区政权既是人民自己的政权，则行政与司法的分立也就没有意义，司法工作应该在各级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进行'。就是说，它是整个人民政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之它的任务也就应该是保卫中国、保卫人民、保卫政权。"[①]在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指导下，陇东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高度重视司法制度的建立、完善和贯彻实施。陕甘宁边区司法组织的基层单位是县或相当于县的市。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1937年7月，边区各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时，“依照国民政府司法组织系统，各县裁判部改名为司法科，裁判员改称司法承审员”。12月，边区召开各县司法承审员联席会议，决定“将司法承审员更名为裁判员，司法科改称裁判处，裁判处受理第一审案件”。根据上述规定，陇东根据地的华池、环县、曲子、固北、定环、新正、新宁等7县设立了裁判处。

随着抗战的发展和抗日力量的壮大，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边区政府，在司法制度方面很快摆脱了南京国民政府司法体系的束缚，逐步建立起具有边区特色的独立自主的司法体系。1938年8月，边区高等法院发布第4号通令，决定在各县（市）建立裁判委员会，作为基层司法机关，从事第一审判决。根据高等法院的通令，陇东各县在1939年至1940年先后设立由县委书记、县长、保安科长、保安大队长和裁判员组成的裁判委员会。裁判委员会的建立，使根据地的审判制度有了雏形。1941年12月，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发布第278号训令，决定在部分县（市）建立地方法院。根据这一训令，1942年4月，庆阳、新正成立地方法院（1943年4月改为司法处），受理第一审案件，设院长兼庭长1人，推事2人，书记长1人，看守员、法警、公差、伙夫各1人。1942年以后，陇东分区还开始普遍实行人民调解制度，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民事纠纷或轻微刑事案件的调解和审理。人民群众参与行使司法权，积极参加法制建设，是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法制进一步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志。

1943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县司法处组织条例草案》。《草案》规定：陕甘宁边区所辖各县，除设地方法院外，概由各县司法处受理辖内第一民、刑诉讼案件。县司法处设处长一人，审判员一人，书记员一人，法警二人。县司法处处长由县长兼任，审判员协助处长办理审判事务。司法处受理较重大的民事案件，“经过侦讯调查后，须将案情提交县政府委员会或县政务会议讨论，再行判决”[①]。根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64－165页。

据该条例，环县、镇原、合水、华池、曲子和新宁的裁判处更名为司法处，处长由各县县长兼任，设裁判员、书记员2至3人。基层各区设立调解委员会，由3至5人组成，乡政府设仲裁员1人，以调解处理部分民事纠纷及轻微的刑事案件。在部分乡政府还建立了人民仲裁委员会、模拟法庭的形式由人民群众自己解决纠纷。

陕甘宁边区虽然不算幅员广阔，但人口稀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对民众的司法诉讼和执法有诸多不便。为了便于民众诉讼，1943年3月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颁布《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分庭组织条例草案》。《草案》规定：为便利诉讼者上诉，在边区政府所辖各分区内的专员公署所在地，设置高等法院分庭，受理不服各该分区内所辖各地方法院或县司法处第一审判决上诉的民事、刑事案件。高等分庭设庭长1人，推事1人，书记1至2人，法警1至2人。除延属分区不另设高等法院分庭外，其他分区须立即依照组设。[①] 依据该条例，1943年4月16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正式设立，马锡五兼任分庭庭长，石静山为推事，设书记1人。陇东分庭作为边区高等法院派出的第二审司法机关，主要负责"受理庆阳、合水、环县、曲子、华池、镇原6县司法处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案件"。同月，边区高等法院关中分庭成立，专员张仲良兼任庭长，管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中宜5县司法处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案件。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的设立，标志着陇东解放区司法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既方便了诉讼人的上诉，也有利于案件的及时解决，保障了司法公正，对边区司法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从边区的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来看，抗日战争时期"在边区与国民政府间的合法关系尚未解决期间，暂行确定两级两审制。县司法处（或地方法院）对县政府（或市政府）负责，进行初级审判；高等法院及其分庭对边区政府负责，履行终审职权"。边区"实行了专员兼高等法院分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第154－156页。

庭庭长，县长兼司法处长”[①]的体制，是从根据地实际情况出发，以服务人民为出发点，办案便民，因此得到人民的拥护和赞扬。

二、马锡五审判方式

陕甘宁边区在司法建设上最成功的标志和最具典型意义的经验是“马锡五审判方式”。马锡五（1898—1962）是创建陕甘边苏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担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全国抗战开始后，他先后担任庆环分区、陇东分区专署副专员、专员，1943 年兼任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开始从事司法工作。他作风上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亲临现场勘查，实事求是地了解案情，不仅纠正了一些错判案件，而且解决了一批疑难案件。他注重以调解方式处理民间纠纷，对人民群众进行民主和法制的宣传教育，深受广大群众欢迎，被群众亲切地称颂为“马青天”。

1943 年 3 月，马锡五在华池县巡视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根据《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公开审理“封芝琴婚姻案”（封芝琴是著名评剧《刘巧儿》主人公的原型），果断地支持封芝琴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主的大胆行动，依法合理解决她和张柏儿的婚姻案件，赢得了当地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普遍好评。这个案件的审理迅速传遍边区，在宣传边区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婚姻自由制度，教育人民，鼓励妇女解放运动等方面产生了良好效果。新中国成立后，以这一案例为素材，改编的评剧《刘巧儿》被拍成电影，在宣传新婚姻法、支持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等方面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1944 年 8 月至 9 月，马锡五巡视检察镇原、曲子、环县的司法工作，在处理镇原县新集二区余家湾的土地纠纷案时，充分尊重群众意见，坚持以法律为原则，对案件客观公正地作出判决，使拖延多年的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8 辑，档案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2－23、22 页。

纠纷迅速得到圆满解决。在曲子县视察工作时，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亲临现场勘察，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纠正了曲子县司法处错判的苏发云兄弟"谋财杀人案"，使这个疑难案件最终真相大白，受到当地群众的交口称赞。

在马锡五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作风引导下，陇东的司法工作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蔚然成风，解决了一大批遗留多年的疑难案件。如合水县县长兼司法处处长王仕俊在合水县三区通过实地调查了解，协助区助理员、农会主任成功调解群众土地纠纷，使多年未决的诉讼缠案得以平息。

马锡五审理案件的方法，很快引起边区高等法院的高度重视并在全边区推广，促进了边区司法工作的根本转变，边区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1943 年 12 月，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副院长谢觉哉向毛泽东汇报马锡五的办案经验，得到毛泽东的首肯。1944 年 1 月 6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号召"诉讼手续必须力求简单轻便，提倡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以便教育群众，判决书必须力求通俗简明，废除司法八股。"[①]1944 年 3 月 13 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评论文章，把马锡五的审判方式归纳为：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原则，坚决执行政府的政策法令；审判方式是座谈式而不是坐堂式，是"民门"而不是"衙门"；"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这就是充分的群众观点。"[②]

在陇东根据地产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充分体现了司法工作中科学的态度、民主的精神、法制的原则、利民的方针，为抗日根据地的司法工作树立了一面旗帜。马锡五审判方式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各抗日根据地司法实践中普遍推广后，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了新民主主义司法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国统区的一些人士也对"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了极大兴趣。1944 年 6 月，《国民公报》一名记者到边区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8 辑，第 23 页。

② 《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解放日报》1943 年 3 月 13 日。

了解司法工作后写道：实行马锡五审判方式，使审判与调解结合为一，是边区司法的新猷。与陕甘宁边区交界的国统区民众也纷纷找马锡五审判，而不愿去国民政府的法院起诉。

陇东根据地司法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司法实践的不断推进，是陇东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陇东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和司法工作者，在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实际情况，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打击日特汉奸，惩治犯罪，解决民事纠纷，保护人民权益，维护根据地的社会秩序，促进根据地的法制建设，巩固抗日政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真正"使司法工作完全符合于保卫抗战利益保卫边区民主政权与人民利益的需要"①。而且，以马锡五为代表的陇东司法工作者，在司法实践中屡有创新和创造，为陇东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的建立、补充和完善，做出了积极探索和重要贡献，为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有益借鉴。"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等理念，对新中国司法建设和司法工作影响深远，至今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第三节　陇东抗日根据地的支前活动

在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下，在陇东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和人民建立起一种新型军民关系。在"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等活动之中，陇东根据地军民形成了血肉相连、亲如一家的鱼水关系。"军爱民，民拥军"的良好关系极大地加强了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团结和巩固，筑成了一道保卫陕甘宁边区西南大门的钢铁长城。

一、拥军优属工作的开展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实施抗日民主政治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第22页。

制度，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开展文化教育建设，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为坚持持久抗战，使边区成为巩固的抗战后方，解除抗日前线将士的后顾之忧，陕甘宁边区开展了拥军优属工作。边区政府先后制定颁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义务耕田队条例》《陕甘宁边区优待抗属代耕工作细则》《陕甘宁边区调整军政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暂行办法》《陕甘宁边区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陕甘宁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等一系列制度和法规，为边区的拥军优属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根据这些制度规定，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陇东根据地积极开展拥军优属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陇东抗日根据地是1936年即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光荣的拥军优属传统。抗日战争时期，陇东人民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参军参战，踊跃支援前线，为巩固根据地自发地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在陇东各级党组织和民主政府的组织和领导下，每逢过年过节，学校都组织秧歌队，群众主动筹集慰劳品，由党政负责同志带队慰问当地八路军驻军和军烈属，帮助他们向部队亲人写信，鼓励部队指战员杀敌报国。为解决军烈属的生产生活困难，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群众，组织常年性或季节性代耕队，为他们代耕代收，砍柴担水。对一些生活有困难的军烈属，政府不仅减免公粮捐税，而且还发放救济粮款。1938年春节，陇东分区拨救济款692元、粮食13石、硬柴5000余斤，解决110户抗属的生活困难。各地民主政府也经常组织群众集粮集物，使军烈属的生活有了保障。如在1941年，曲子县组织群众代耕队，为全县723户抗属代耕田地1353亩，筹集和发放救济粮食14.9石，现金784元；抗日群众团体发动1600人参加帮助抗属，慰劳粮食1.7石，现金125元。

1943年1月，陇东分区专署召开扩大的政务会议，专门讨论拥军问题，决定农历腊月十五日至正月初五为"劳军月"，并成立劳军委员会，由分区党政领导和抗敌后援会负责人、分区参议会的3位参议员共同组成，马锡五任劳军委员会主任，领导陇东分区的拥军优属工

作。在劳军委员会的领导下，陇东分区迅速掀起拥军优属热潮。在劳军活动中，对参加抗战的国民党军队的军人家属，与八路军军人家属受到同样优待。1943年9月，陇东分区开展了当年第二次大规模的拥军活动。庆阳市各乡给八路军捐款122050元，以及鞋、袜子、肥皂等物品。庆阳市商会召开了商民大会，会上声讨国民党顽固派准备发动内战的罪行，提出拥军捐款的建议，与会的217人捐款22.4万元，会后将捐款送往三八五旅旅部。1月和9月，陇东分区两次拥军活动共捐献现金503677元，猪肉1510斤，羊65只，鸡538只，酒12担，各种蔬菜4627斤，以及毛巾、鞋袜、肥皂、牙粉等物。1943年春节，庆阳县驿马关、赤城和庆阳市的群众慰问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部及七七〇团，送大匾一面，捐送烧酒、毛巾、白麻纸、布鞋、袜子、肥皂等物和现金7459元。

1944年农历正月，陇东分区掀起轰轰烈烈的慰劳部队的热潮，各县群众纷纷组织起来开展拥军活动，慰问当地的八路军驻军部队，各种慰劳品总价值超过100万元。正月二十九日，庆阳市举行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拥军大会。华池县拥军工作显著，是陕甘宁边区的"双拥模范县"。春节期间，华池县党政领导干部和群众带着慰问品羊55只、猪肉和现金等，冒着大风雪前往大凤川，慰问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〇团指战员。当年华池县在开展拥军活动中，慰问部队的慰问品有猪肉470斤、羊61只、硬柴10万斤。1945年，慰问部队猪肉688斤、羊60只、蔬菜365斤、木炭2万斤、硬柴28万斤、鞋1300双。陇东根据地拥军优属工作的普遍开展，密切了党群、干群、军民关系，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陇东根据地人民还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形式拥军支前，开展军民文化共建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伴随着根据地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丰富多彩、热火朝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迅速开展起来，一大批群众自编自演歌颂党和政府的好领导、歌颂八路军英勇抗战、歌颂军民鱼水情的优秀作品相继产生，受到广大军民的欢迎。其中一些优秀的文艺作品，传遍了整个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如：

《边区十唱》《军民大生产》《送郎当红军》《十杯酒》《做军鞋》《拥军歌》等。每逢春节等喜庆日子，根据地的党组织和民主政府都组织机关、学校的宣传队、群众业余剧团、秧歌队等到当地驻军部队慰问演出，与当地驻军部队举行文艺联欢，开展抗日军民文化共建活动，鼓舞八路军指战员的斗志，活跃部队的精神文化生活。军民文化共建活动密切了军民关系，促使了边区社会文化新风貌的形成，同时也为边区新民主主义文化增添了异彩。

二、拥政爱民运动的开展

1942年，陕甘宁边区掀起拥军优属热潮的同时，也开展了拥政爱民运动。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在1943年春节期间，留守兵团各部队和边区政府同时开展拥军拥政运动月活动。1943年1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每年农历正月为八路军部队的"拥政爱民月"。1月25日，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发布《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和《关于拥政爱民运动月的指示》，确定1943年2月5日至3月5日为全边区部队拥政爱民月，规定每年春节前后，要向地方政府和人民贺年，增进军民感情。

陇东根据地驻军热烈响应中共中央和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的决定，迅速掀起拥政爱民运动热潮。驻防陇东的八路军三八五旅、陇东军区，对拥政爱民运动进行了周密安排部署，决定1943年2月1日至28日为陇东驻军的拥政爱民运动月，并制定了包括服从政府法令、维护群众利益、听取人民意见等9项内容的《拥政爱民公约》，组织各地驻军实施。

陇东根据地驻军普遍实行拥政爱民教育，加强部队纪律，军队自己动手生产，以减轻群众负担，自己运粮草，以节省民力，并帮助群众耕、耘、收、打；帮助群众砍柴、挑水、治病、办学校、救济难民、训练民兵；春节期间各地驻军都派干部和战士向附近群众拜年、闹秧歌、开展军民联欢。不仅驻军开展了一系列拥政爱民运动，军烈属也积极

参加生产自救，减轻政府和群众负担，以实际行动报答党和政府的恩情，涌现许多模范人物，新正县三区一乡的模范抗属张花英就是一例。1939年，她动员丈夫参加八路军后，经常给丈夫送鞋袜、衣服和零花钱，给予关心和支持，鼓励丈夫在部队搞好工作。她主动承担家务劳动，孝敬公婆，解除丈夫的后顾之忧。她还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1944年纺纱45斤，织布13匹。1944年12月，她被新正县选为劳动英雄，出席陕甘宁边区群英会，《解放日报》报道了她的模范事迹。

三、陇东人民全力支前

在陇东各级党组织和民主政府领导和组织下，陇东根据地人民在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的同时，还积极开展拥军支前工作，为抗战支前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抗战极为困难的时期，陇东根据地人民积极开展生产运动，踊跃支援抗日前线，倾其所有捐赠物品，慰问八路军前线抗日将士。1939年，根据地群众捐献毛袜1118双、毛手套1267双、毡袜子1872双、羊皮手套890双、现金1046元。1940年，当八路军百团大战的胜利消息传到庆城，广大群众纷纷捐资劳军，慰问八路军部队。小商贩梁月亭原在国统区西峰经商，饱受国民党军队的欺压，来到边区的庆阳城经营。他处理掉自己经营的一部分商品，购得50件毛衣、100双袜子、50双手套转送给参战的八路军将士。仅在1943年的9个月中，陇东分区各县共捐现金503677元，猪肉755公斤，羊68只，鸡838只，蔬菜23135公斤，以及黄酒、毛巾等物品。抗战八年间，根据地广大妇女共做军鞋20多万双、袜子5万双，纺线3000多公斤，织布8万多丈，捐粮10多万公斤，捐猪、羊、鸡5000多只(头)，柴草约10万公斤，以及蔬菜等物，有效地改善了部队的食宿与给养，支持了抗战事业。

为保障前线抗日将士和边区政府的粮草及物资供给，陇东根据地人民勤俭节食，争交救国公粮公草，帮助部队运输给养，积极参加战勤服务。从1941年至1946年，陇东分区共交救国公粮21.4万石，

年均为3.6万石。陇东根据地人民还按照边区政府战时动员法令和规定，积极参加战勤服务。1939年，环县出动牲口500头为八路军部队运送被服。1941年至1943年，新正县先后组织投入人工9997个，出动担架463副，大车1025辆、驮畜5134头，为八路军部队转送伤员，运送粮草物资，并派民夫12020人次修筑工事。仅在1942年，环县动员民夫14617人次，支援八路军修筑工事，抽调牲畜703头，转送军粮军火等抗战物资。从1943年至1945年，华池县共组织出动人工193886个，畜力58150个，运输粮食12404石，饲料296229公斤，以保障抗战前线对军需物资的需要。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根据地人民积极响应党中央全民抗战的号召，广大青年踊跃参加八路军和人民武装部队。陇东根据地到处出现妻子动员丈夫、姐妹动员兄弟、母亲动员儿子、爷爷奶奶动员孙子参加八路军的感人事迹。1939年，环县有202名青年应征入伍。1939年12月，华池县120多名青年应征入伍，元城区抗日自卫军营长高文秀，带领自卫军一个连集体参加八路军，受到陇东分区嘉奖。1939年到1945年，华池县有1734名、新正县有1016名青年参军。1941年，新宁县有110人参军。1945年7月，陇东分区在全区扩招兵名额为2850名，广大青年积极应征，征兵任务如期超额完成。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地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是民主政权建设的成功实践，宣传了民主革命思想，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丰富了陇东人民的民主政治生活，改善了陇东人民的生活条件，密切了陇东地区各党派、各界人士之间的合作，巩固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保障了根据地人民的人权、财权，得到了各阶层的衷心拥护，创造了陇东地区革命史上的奇迹，展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的光辉前景，它所创造的政权建设方面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全国作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第十四章 陇东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建设

第一节 陇东根据地的减租运动

一、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处理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陇东和关中分区根据这一政策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减租运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党的土地政策发生了相应的变化。1937年7月，中国共产党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主动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做法。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正式提出在特区内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并将其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写进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在政治上可以动摇封建统治，在经济上可以削弱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这一政策是党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处理土地问题、发动农民抗日的主要政策。它兼顾农民和地主两方面的利益，把发展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有利于团结大多数地主抗日。

为了深入推进减租减息，中共中央于1942年1月制定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2月4日又发布《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这两个文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减租减息政策及执行办法作了明确规定：减租减息政策的目的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实行减

租减息后，须实行交租交息，保障地主的地权、财权和人权，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对于富农则削弱其封建部分，鼓励其资本主义部分的发展。文件还指出，实行减租减息，必须放手发动和组织群众，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实行"三三制"的民主政治。在群众发动起来后，要注意纠正"左"的偏向，同时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对顽固不化的地主，必须给予打击，但不是一切打倒。在中央上述政策的指导下，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掀起了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高潮。

陇东抗日根据地是最早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地区之一。抗战时期的陇东分区和关中分区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上建立和扩大起来的抗日根据地，在土地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是华池、曲子、环县和新正、新宁县的部分区乡，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建立了革命政权，已经历过土地革命，基本废除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绝大部分地区把土地分配给了农民，基本做到了耕者有其田。也有一部分地区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又停止了没收地主土地的工作，没有进行土地分配或土地分配不彻底，曲子县的一部分乡村就属于这种情形。另一类是在1940年3月第二次陇东"磨擦事件"后，正式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的庆阳、合水、镇原3县及新宁、新正县的部分区乡，这些地区没有经历过土地革命，土地相对比较集中，大多数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

从地权关系来看，经历了土地革命的大部分地区，地主的土地被分配，土地归农民所有。未经历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土地仍然归地主所有，土地资源的占有是不均衡的。据镇原县1941年征粮时的不完全调查，全县33405人，有耕地349259亩，平均每人应占有耕地10.5亩，而实际上62户大地主，933口人（占总人口的2.8%），就占有土地81810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23.4%。

在土地分配不均的地区，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主要通过租种地主的土地从事农业生产和维持生活。地主主要通过定租、包山租、活

租、伙种[①]和安庄稼等租佃形式剥削农民。其中又以定租最为普遍，剥削也最严重。农民在极其苛重的剥削下，平常年景交纳了地租以后，已经所存无几；若遇荒年，就只有请求缓交，记在地主账上变成欠租；往往旧账未清，新欠又来，日积月累，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沉重的封建剥削，严重地妨碍着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和农民参加抗日民主建设的积极性。只有实行减租，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效率，增强抗战力量；同时，也使农民在取得减租利益之后，发展农业生产，能够以一部分交给地主作地租，以争取地主参加抗战。

二、已经土改地区的减租减息

华池、环县、曲子、新正、新宁等县虽然在抗战前进行过土地革命，但由于战争的影响，土地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在这类地区的减租减息中，首先要确保农民的既得利益，巩固土地革命的成果。1937年9月，边区政府决定颁发土地所有权证，并进行土地登记，以法制的形式，确保农民已经取得的土地所有权。9月2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土地所有权条例》，规定凡农地、林地、牧地、房屋、荒地、水地及其他水陆资源，除公共性质的以外，凡土地所有人，必须依本条例向当地县政府领取土地所有权证，并以此作为土地所有权的"唯一凭证"；在该所有权证发出以后，原有关于土地所有权的各种契约一概无效。条例还规定了"土地所有权证"的颁发和申请登记具体办法。

《条例》颁布后，华池、环县、曲子认真宣传党的土地政策，及时组

① 定租：系按土地单位面积规定租额，无论年成丰歉，佃户均按规定租额缴纳，租额一般占平常年收获量的三至五成；包山租：是指定某一座山或某一大片土地承规定租额；活租：是根据收获量，由地主、佃户双方按成分配，活租额一般对半分；伙种：是由地主出土地等生产资料供佃户耕种，收获以地主所出生产资料成数分配，一般分为主六佃四。

织成立土地登记委员会和土地清查委员会，开展土地登记工作，为得到土地的农民确定地权，颁发土地证。宣布土地所有权证为土地的唯一凭证，原有的各种契约一律作废。对返乡的地主和富农，同样分配给一定的土地和房屋。1940年底，土地登记、颁发土地证和清查工作基本结束。

在减租减息初期，少数地主豪绅违抗政府法令，散布谣言，欺骗和恐吓群众，并采取撤佃、重新丈量、高额收租、明减暗不减等方式抵制。当时革命政权初建，匪患尚存，群众怕地主、土匪会卷土重来，因而不敢大胆开展斗争。针对这种状况，陇东根据地各县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制定地权纠纷处理条例，发动佃户同不法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公开处理一批夺地逼租的典型事件。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解决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土地纠纷问题，保证了减租减息运动的顺利进行，激发了群众生产积极性。同时，根据边区政府减租减息条例，积极协调租佃关系，做到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并重，达到合作互惠，促进生产发展。经过各级政府和农会干部的共同努力，不少地主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能够按照边区政府租佃政策法令办事，各地还出现了许多主动减租减息的开明地主，而且曲子、华池、环县、新宁、新正等县都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减租办法，减租减息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未经土改地区的减租减息

陇东分区的庆阳、合水、镇原3县和新宁县四、五两区及新正县马栏区，未经历过土地革命，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度没有受到根本性打击，占农户大多数的贫雇农没有或很少占有耕地。这些区域由于土地问题尚未解决，地主通过定租、活租、包山租、伙种和安庄稼等租佃形式残酷剥削农民，贫、佃农负债累累，生活极其困难，严重地妨碍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因此，这些地区是

实行减租减息的重点地区。

从1937年中共中央提出"减租减息"政策，到1940年初根据地行政统一前，新宁县及庆阳、合水部分地区认真执行了减租政策，其他地区也积极进行了大量宣传工作。但这些地区大多数属统一战线区域，由于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减租减息工作未能真正落实。1940年2月，陇东"反磨擦"斗争胜利后，陇东根据地行政得到统一，庆阳、合水、镇原3县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在第一届参议会上讨论减租提案，确定减租率。9月，陇东分区召开临时参议会，通过了"三七减租"（即原租一斗减三升）法案及关于1939年底以前所有欠租一律豁免的决议，分区专署发出了实行减租减息的布告，各县也制定了一系列实施办法，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宣传动员。

1942年初，中共中央相继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先后发布了《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和《租佃条例草案》等文件，正确地解决了减租运动中的政策思想偏差问题。陇东分区专员公署指示庆阳、合水、镇原等县认真组织干部研讨减租政策，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11月，陇东分区专署向各县发出指示，把庆阳、合水、镇原3县普遍实行"二五"减租[①]作为中心工作。各县按照分区指示召开了租佃会议，通过了"二五"减租的决议。分区各县针对减租中出现的问题，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减租交租的补充办法，规定定租一律按1937年以前的原租额减少25%；活租、伙种地主所得不能超过收获量的30%；1937年后地主不实行减租规定多收的租额要一律减去；交租以38斤斗计算，不能私自增减；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土地另租他人，未经佃户同意，不得改定租为活租或伙种；原佃户有续租的优先权；开垦地主荒地者有永租权；遇天灾人祸，地租应酌情减免；地主以各种名义破坏土地政策行为者，坚决制止，不听劝告者依法处理。在减租减息中也照顾到地主利益，告知农民应交

① 老百姓将租用地主土地劳动收成的25%交给地主，其余归百姓。

租交息。

1942年冬，结合征粮，中共陇东分委和分区专署在庆阳、合水、镇原3县部分区、乡分别组织减租工作队进村，成立了各区、乡减租委员会、租佃小组等组织，召开租佃会议，丈量土地，查账算账，订立新约等，开展了以算账、换约、退租为主要内容的减租斗争。1943年春，陇东地委重新部署减租减息工作，组织各县抓典型，总结经验，推动全分区减租减息工作深入发展。各县组织减租减息工作队深入农村，依靠农会组织，调查租佃关系，废除旧约，重立新约，把地主收回的土地退还给佃户，巩固减租的成果。对于一些采取诱骗威胁佃户、收讨陈租、明减暗不减等手段阻挠和破坏的不法地主，农会干部组织召开租佃会议，领导佃户同地主进行说理斗争，清算账目，订立新约，迫使地主不得不减租减息。庆阳县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引导开明地主自动提出减租；镇原县对自愿减租的地主通报表扬，同时对个别不交租交息的佃户进行批评，督促按额交纳。这样以来，使不少地主改变了态度，自觉执行减租减息法令，当众烧毁了多年的陈账。到1944年底，庆阳、合水、镇原3县114个乡中，有73个乡实现减租减息，普遍废除旧约，订立新约，共落实减租亩数22.84万亩，减免地租188万公斤，3县减租工作全部完成。

1945年3月，陇东地委对分区减租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针对一些中小地主减租工作不彻底的情况，作出《关于减租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县普遍开展减租复查工作。各县在复查中对一些地方存在的明减暗不减、地主无理收地、拒不退租等问题进行坚决纠正，使全分区的减租工作进一步健康发展。据统计，庆阳、合水、镇原3县得到减租减息利益的佃户有3757户，减租地共为2284195亩，减租93833石。

减租减息政策在陇东根据地的贯彻执行，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激发了农民生产抗日的积极性，为以后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调整了根据地各阶级、各阶层的关系，团结了各阶层人民，巩固了根据地，支持了长期抗战。

第二节 陇东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

一、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与陇东根据地的困难局面

全国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相当一部分是国民政府颁发的军饷和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1938 年，外援占边区整个经济收入的 51.6%。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作战逐步转向敌后战场，而国民党则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集中力量限制和削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的军饷，截扣海内外进步人士给边区的捐款和物资，并加紧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断绝边区的一切外援，禁止任何粮食、物资流入边区，企图困死、冻死、饿死边区军民，致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日益陷入困境。在此情况下，陕甘宁边区作为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必须承担中央机关、边区各级党委政府和八路军留守部队给养和其他人员的吃穿与财政开支。全边区各类脱产人员计 1939 年 4.9 万人，1940 年 6.1 万人，1941 年 7.3 万人[①]。这些人所需的生活资料和必需的事业经费，以及公家所有的 8.666 万匹牲口的草料消耗都压在农民肩上，平均每 10 人要负担一个脱产人员。陇东根据地作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切的困难和负担，都要义不容辞的承担一部分。

为了渡过难关，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争取抗战胜利，1939 年 2 月 2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 年，为克服边区严重的经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年第 1 版，第 500 页。

济困难，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为坚持长期抗战，巩固抗日根据地，陇东分区党政军机关积极贯彻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总方针，响应"自己动手"的号召，执行边区政府以农为主、发展经济的生产自救方针，带领陇东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二、陇东分区及各县机关的大生产运动

在大生产运动中，陇东分区及各县机关带头参加，作出了表率。分区党政机关的战士、工作人员及各级领导干部都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开荒种地，种粮种菜、养猪养羊、打柴烧炭、开设作坊、发展手工业，开展生产自救，努力解决衣食供给和办公费用，减轻群众负担，取得了显著成绩。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运动动员大会，时值春播季节，陇东、关中分区各县积极响应。关中分区新宁县利用春播时机组织机关干部开荒，县委和抗敌后援会开荒140亩，政府开荒120多亩，保安科开荒160亩，保安大队开荒约300多亩。环县在春播生产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县政府播种春麦、豌豆约190亩，保安队播种约60亩，保安科及警卫队播种约25亩，县委播种10余亩，各机关共垦荒数百亩；区乡级耕种土地823亩，垦荒百余亩；不仅机关积极耕种，还调剂解决了农民耕牛、种子、农具不足的问题。

皖南事变后，陕甘宁边区掀起了新一轮大生产运动高潮。1941年，陇东分区机关和各县政府机关开垦荒地3000多亩，种地6000亩以上，一年即达到衣食自给有余，并解决了大部分办公费用，减轻了人民负担。各县机关生产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43年，环县县、区、乡三级政府机关开垦荒地2300多亩，收细粮200多石，饲养大牲畜160多头，基本上满足了生活需要，并解决办公经费开支的64%以上。华池县政府机关计划开荒56亩，实际开荒102亩。新正县机关干部每人开荒4亩，种熟地4亩，做到衣食自给有余，解决了大部分

办公经费开支。新宁县委、县政府干部、县保安队战士七八十人，坚持一边工作，一边战斗，一边生产，收获粮食420多石。陇东分区专署警卫队至1943年开荒种地达190多亩，烧炭2万斤，全年蔬菜自给，每周可吃猪肉一次、吃羊一只，每年发夏衣两套、衬衣一套及新棉衣、棉被、毛毯等。各党政机关自己生产，达到丰衣足食，还自动上交粮物支援边区，调剂救济灾区和安置移民生活。

1943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对领导大生产卓有功绩的王震等22名党政军领导干部进行隆重奖励。关中分区党委书记习仲勋、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分区专员马锡五、华池县县长李培福被授予生产英雄称号，毛泽东分别为他们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面向群众"。

三、部队、学校的大生产运动

从1941年开始，陇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纷纷组织起来，开垦荒地，扩大耕种面积，掀起了大生产运动高潮。

大生产运动中，八路军驻陇东部队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生产积极性最高，成绩也最突出，电影《我们是八路军》就是八路军当年在庆阳开展大生产活动的真实纪录。王维舟、耿飚率领的三八五旅进驻陇东后，为了解决当时的生活困难，立即开展了生产自救活动。他们在庆城等驻地挖修窑洞、开荒种粮、饲养畜禽、伐木烧炭、种棉种蓝、兴办工厂等，一年内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部队吃住等生活困难。1942年，三八五旅响应中共中央"自力更生"的号召，向全旅发布了"一把镢头一杆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大生产运动命令。旅长王维舟带头生产，组成了"王维舟生产小组"，在庆阳城周围开荒30余亩。三八五旅在大生产运动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被群众称之为"抗日之英雄，生产之好汉"。1943年，在边区高干会上，王维舟被评为劳动英雄，毛泽东亲笔为他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1941年8月，为了执行"屯垦"政策，旅长王维舟与副旅长兼参

谋长耿飚亲自带人到华池县大、小凤川和豹子川勘察，将大凤川定为全旅屯垦点，抽调3个营率先开赴大凤川，开始大规模垦荒。1943年4月，三八五旅七七〇团1000多人，在团长张才千、政委宋景华、副团长卜万科的带领下，进入荒无人烟的大、小凤川屯垦。旅部成立了大生产委员会，专门领导大生产运动，并给每个连队配备了20对耕牛。部队规定，每人每年开荒30亩，交细粮3石。部队进驻大凤川后展开了劳动竞赛，每人每天挖荒1亩，最多的开荒4.5亩，全年平均每人挖地62亩，劳动模范李发财创造了挖地72亩的纪录，当年全团每人生产细粮5石。

1944年春节前，七七〇团召开了屯垦庆功授奖大会，会上表彰了全团各营、连75名生产劳动英雄。副团长卜万科荣获陕甘宁边区甲等劳动英雄称号，毛泽东在卜万科的甲等劳动英雄奖状上亲笔题词："向前发展"。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曾经高度赞扬三八五旅在大凤川的屯垦工作。1944年夏季，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三八五旅政委甘渭汉带领一个国际参观团来到大凤川，实地查看八路军部队的大生产运动成果。这个参观团里不仅有国际知名人士，还有外国新闻记者，他们在大凤川七七〇团的驻地和东华池抗大七分校的生产基地进行了四五天的考察。

经过两年艰苦的努力，七七〇团共开荒地3.4万亩，生产粮食数千石，修建营房400多间，架设"七七桥"一座，修筑公路50多里。同时还利用大、小凤川一带的森林资源，办起了山货加工等作坊10余处，开展木材加工、山货编织、酿酒、采蜜、挖药材、烧木炭、割漆、熏香、狩猎等多种副业生产。仅蜂蜜一项，就收入1万多元。部队还养牛、羊、猪、鸡、兔等，不仅解决了肉食供应，还用皮毛制作了不少被服，做到了粮食满仓，蔬菜有余，牛马成群，猪羊满圈，使昔日荒凉的大、小凤川变成了米粮川。

1944年11月7日，七七〇团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满载着屯垦的胜利成果，离开华池县大凤川，向豫西嵩山地区出征，奔赴抗日前线。离开时勒立的纪念碑如今仍在。八路军七七〇团在大、小凤川

屯田垦荒，在边区创造了又一个“南泥湾”，为战胜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减轻陇东人民的负担，建设和保卫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驻防庆阳的八路军部队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驻宁县的警备一旅，1943 年在金村庙一带开荒 2000 多亩，一季打粮上千石。专署警卫队在庆阳城外张家沟种地 140 亩，1943 年又开荒 50 亩，并派人进山烧炭 2 万斤，解决了吃饭、穿衣、取暖问题。三八五旅警五团，当年在高家嘴、驿马关等地开荒数千亩，解决了部队的部分粮菜困难，还涌现出了段怀义、文世贤等数十位开荒英雄。该旅所辖警二团二连，经过 1942 年至 1944 年三年的努力，共开荒 1700 多亩，每年收获的粮食足够全连两年使用。时由三八五旅代管的陇东回民骑兵团，1943 年至 1944 年间在合水县太白开荒耕种 2000 多亩，基本实现了粮、油、菜、肉与马草、马料的自给。

陇东根据地的学校在大生产运动中成绩也很显著，特别是抗大七分校和陇东中学。抗大七分校是陇东根据地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大生产的标兵。1943 年，抗大七分校师生开进华池县东华池、豹子川和合水县平定川等地办学。抗大七分校当年开荒 8197 亩，收获细粮 1250 石，蔬菜 52 万多斤，挖窑洞 450 孔，解决了吃住问题。在垦荒中，涌现出劳动模范 59 名，突击手 564 名。1944 年全校开垦荒地达 6 万多亩，收获细粮 5650 余石，生产蔬菜 300 万斤，还养猪 1300 余头，羊 1100 余只，牛百余头，校女生队 300 余人，除参加开荒种菜、打柴烧炭、背粮、喂猪外，还纺线织布，到 1944 年 11 月底，共纺线 553 斤，缝棉衣 2860 套，织毛袜 810 双，织手套 489 副。当年广大学员在完成自己生产任务后，还帮助农民收割庄稼 2 万个工日。

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抗大七分校因地制宜，就地兴办起油坊、磨坊、粉坊、食堂等副业作坊和造纸厂、木器厂、砖瓦厂等工厂，组织驮骡队赴陕西三边运盐，在合水县办起了“永和公社”商店，在西华池开分店一处，在东华池建筑了 30 孔石窑洞和能容纳 2000 余人的大礼堂，把昔日荒凉贫穷的东华池建设成了欣欣向荣的新城镇。

陇东中学在开展大生产运动期间，师生共同奋斗，开垦荒地，种

菜种粮，喂猪打柴，修建校舍，自制教学用品，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1943年春，学校师生先后在高楼塬、二谷塬、丁家湾开荒地110亩，收获粮食33石，蔬菜5000余斤，草3万斤，其他收入约1.5万元。1944年，陇东中学又开荒1000多亩，收获粮食180多石，马铃薯5.5万斤，白菜7.5万斤；纺棉线50多斤，捻毛线132斤。陇东中学开展大生产运动，坚持勤俭办学，不仅克服了经济困难，而且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实践观点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通过生产自救运动，陇东根据地各驻军、学校的粮食、蔬菜达到了半自给或完全自给的水平，不仅使抗日根据地渡过了困难，而且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自给经济，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在当时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军队不要发饷，机关、学校不要政府负担，完全由自己供给，这是一个创造，对于支持抗日民族解放事业发挥了重要的物资保障作用。

四、群众的大生产运动

1941年，在陇东分委领导下，陇东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大规模地开展起来。陇东分区及所辖华池、曲子、环县、庆阳、合水、镇原和关中分区所辖的新正、新宁县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分别成立了生产委员会，认真贯彻中央“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和边区政府提出的“以农业为主，工商业次之”的发展方针，带领分区人民群众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陇东根据地地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除庆阳县人多地少外，其余各县大都人少地多，到处都有可供开垦的荒山荒坡。在大生产运动中，党、政、军、民、学一起出动，上山进沟，开垦荒地，发展生产。为鼓励和发展农业生产，抗日民主政府规定新开垦的荒地地权归开荒者所有，3年免征公粮，收获归己。在边区政府领导下，陇东抗日根据地群众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1939年至1943年，陇东分区

共开垦荒地40多万亩，关中分区的新正县开荒在10万亩以上，仅1943年，陇东分区就新开垦荒地22.6万亩，比原耕地面积扩大了十分之一，增产细粮5万石（每石约150公斤，计750万公斤），相当于陕甘宁边区当年粮食增产总数的三分之一；运盐7.6万驮。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大部分农民实现了耕三余一，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民生活有较大的改善。其中以华池县成绩最为突出。1943年与1938年相比，华池县耕地面积增加了12.2万亩，是边区大生产运动中开荒最突出的县之一，被评为边区大生产模范县。

陇东根据地多数为山区，地广人稀，耕作粗放，加之干旱少雨，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在大生产运动中，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积极教育、引导和帮助农民改进传统的耕作技术，精耕细作、消除虫害、提高农业产量。大生产运动开始后，陇东分（地）委、专署把开发水利资源、扩大灌溉面积作为一项大事来抓，发动群众开渠引水浇地。从1940年到1945年底，先后在庆阳刘家庙、合水县葫芦河和段家川、新正县小沟泉等地动员群众开挖渠道多处，使全分区的水浇地面积达到11.18万亩，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在开荒种粮的同时，陇东分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还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组织引导广大群众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其他副业。首先是发展种植业，种棉种蓝，纺线织布。陇东历史上没有种植过棉花，棉布都从外地运进。大生产运动中，试种棉花获得成功。1942年，全分区共种植棉花740多亩，收获皮棉7400余斤。1943年，分区各县都种植棉花，仅庆阳县就种植棉花1100亩。1944年，全分区棉花种植发展到3万亩，收棉约15万公斤。自此，各级政府动员妇女开展纺线织布的竞赛活动。1943年，庆阳、合水、镇原3县妇女纺线1.16万公斤，织土布10.8万米。1944年，全区有纺织妇女1.4万人，当年织布5.6万余匹（一匹为4.2丈），大大缓解了布匹紧缺的困难。其次是发展畜牧业，政府以贷款扶持等措施，大力发展畜禽饲养。1943年全分区大家畜发展到11.5万头，羊66万余只。畜牧业的发展，既给群众增添了生产畜力，也提供了紧缺的皮、毛等副产品。

为了鼓励战时生产，激发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和劳动创造力，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还先后颁布了《人民生产奖励条例》《督导民众生产运动奖励条例》等，对在大生产运动中做出突出成绩的人民群众给予奖励。1939年1月，边区举办了第一届农业竞赛展览，受奖农民2000余人；1940年1月，边区举办了第二届工农业生产展览，奖励劳动英雄3000余人。这些展览会和获得奖励的劳动英雄影响到整个陕甘宁边区社会。1942年大生产运动再次掀起高潮后，各地先后举行各种展览会和奖励劳动英雄大会，一时在根据地掀起了向劳动英雄学习的热潮。1943年11月1日至5日，陇东分区在庆阳县城召开首届生产展览及劳动英雄大会，到会军民商学近万人，盛况空前。有54名劳动英雄受到表彰奖励，评出甲等劳动模范5名，乙等18名，丙等31名。在陇东首届生产展览会上，各县和各单位送来农展品共1100多种，工业展品200余种，优良牲畜10多种，各类艺术品400多种。

11月26日至12月16日，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与生产展览会在延安举行。参加大会的有各条战线的英雄代表200余人，其中陇东分区59人。华池县的劳模代表、外号"气死牛"的开荒英雄张振财被选入主席团，并和新正县创立"义仓"的模范共产党员张清益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华池县城壕村被评为大生产模范村。12月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接见并宴请与会劳动英雄。宴会发言中，张振财向中央领导人介绍了他领导变工队的经验和成绩，得到了高度重视。12月9日，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举行座谈会，亲切接见了张振财、张清益和孙万福等17名代表。其中和张振财主要谈变工扎工问题，谈话从下午持续到深夜。

会议期间，张振财主动向大会递交了《创造模范行政村的计划》。1944年，张振财带领城壕村变工队实现了"耕一余一"。12月，张振财第二次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再次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首创"义仓"的张清益，1944年又获陕

甘宁边区"劳动英雄"称号,1945 年再获陕甘宁边区"特等劳模"称号。1945 年 6 月 12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关于普遍建立义仓的命令》。于是,由张清益在新正县首倡并创建的"义仓",在边区 23 县中得以普遍建立起来,张清益的名字也由此载入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史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与生产展览大会后,庆阳、新正、合水等县分别召开了群英评奖大会,奖励劳动英雄。这些表彰奖励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开展。

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粉碎了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巩固和发展了抗战后方。陇东大生产显著的经济建设成果,既支持了边区,又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使陇东成为特定时期重要的物资保障供给基地。据统计,陇东抗日根据地从 1941 年到 1946 年共交救国公粮 21.4 万石,在陕甘宁边区享有"陇东粮仓"的美誉。

五、互助合作运动

抗战初期,边区政府在关于农业生产的指示信、训令中都强调组织农民集体劳动。为了规范各种劳动互助组织,边区政府在 1939 年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劳动互助社暂行组织规程》,规定劳动互助社的宗旨是调剂边区劳动力,养成农民群众互助劳动习惯,提高劳动热忱,促进农业生产。

根据边区政府的有关规定,陇东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向农民大力宣传以自愿为原则的劳动合作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农业生产实践中,陇东、关中分区形成了一些传统的劳动互助组织。综合陇东各县资料,互助合作组织形式主要有 6 种:一是扎工队,一种集体组织劳力向外出雇的形式。许多短工组织起来,外出雇工做活,多流行于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二是搭工组,当地亦称"搭种"。一般由本村同宗同族或邻居等数户群众自愿结合起来,常年搭帮生产,有人出人,有畜出畜,合理折算畜工、人工,彼此替工或折付

适当报酬。三是变工组，经政府倡导，由本村若干户群众组织而成，人力、畜力合理搭配，实行人工变畜工，畜工变人工。四是义务耕田队，亦称代耕队，是由政府号召下组织起来的一种帮济性质的生产组织形式。五是唐将班子，陇东分区移民区普遍流行的一种生产互助组织形式，主要用于秋天生产，也有用于开荒生产的。其组织者叫包头，二头目叫领头，管账的叫书班，有严格的规约。六是羊头会，流行于陇东民间的一种互相制约、管护农田的组织形式。由乡村长者主持，各户集资宰羊会餐，宣布农田管护规约，要求村民共同遵守。若有违规者将羊头挂其门首，并按规约受到惩罚，故名"羊头会"。

这些互助组织是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由相邻5户以上的农民自愿结合起来的，自力更生、互助帮助，以达到共同发展生产的目的。1939年，曲子、环县、华池三县共有48549人参加各种劳动互助组织。其中，参加劳动互助社的22749人，参加义务耕田队的6904人，参加妇女生产组的13611人，参加儿童杂务队的5278人。关中分区的新正、新宁两县，分别有3973人和5712人参加上述四类互助组织。

在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随着生产的发展，工副业的开展，生产项目的增多，陇东分区生产互助组织参加人员由少到多，组织由小到大，由临时到固定，由搞农业生产发展到变工拦洪漫地、新修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和贩运等行业，而且帮助移民、难民开荒种地，建立家业。还将这种变工形式与拥军优抗、支前等结合起来，甚至和文化教育结合起来，变工队休息时读报纸、呼号子、演节目、互相对唱，既发展了生产，也丰富了群众的精神生活。

在大生产运动中，这些自发的劳动组织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关注，要求各县普遍提倡变工和扎工。《解放日报》也发表社论，肯定"变工"和"扎工"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1942年底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号召各县大力发展互助合作，促进农业生产。会后，陇东地委、专署依据本地特点，坚持群众自愿、典型示范的原则，一切从各县的实际情况出发，注意利用和改造民间旧有的合作形式，加强对变工、扎工的组织领导，适当延长互助时间，使之逐步演变为固定的、常

年的互助组织。

1943年春耕时期，关中、延属（缺1个县的统计）和陇东3个分区共有4588个变工队，参加的劳动力32081人；扎工和唐将班子553个，参加的劳动力5919人；开荒队75个，参加的劳动力1365人。其中陇东分区共有劳动力61626个，春耕期间参加互助合作的劳动力为19045个，占总劳动力的28%；夏耘期间参加互助合作的劳动力为22317个，占总劳动力的33%。关中分区参加互助组织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36%。

陇东互助合作运动是陇东根据地人民群众的一大创造。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提高了劳动效率，极大地促进了陇东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农业合作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六、安置移民难民和改造“二流子”工作

陇东地区人口稀少，加之大部分青壮年相继应征入伍或到外地工作，劳动力奇缺。在大生产运动中，陇东分区及各县开展了安置移民、难民和改造“二流子”的工作，先后安置了大批从沦陷区和国统区迁来的移民、难民，鼓励和帮助他们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当时，边区政府颁发了《优待移民条例》，规定凡进入边区居住的移民、难民，政府负责安置，帮助解决生产生活困难。不论老户或移民、难民开垦公荒者，所开荒地的土地所有权为开荒者所有，3年免交公粮，并免去其他公勤任务。陇东分区党委、专署根据本地实际，制定了优待移民、难民的条例和细则，在耕牛、农具、种子及口粮等方面予以优待，并提供农贷帮助，奖励移民参加生产。1942年，陇东分区各县安置难民529户，2281人。1943年，流入陇东的移民日渐增多。1月，陇东分区在驿马关、西华池、九岘、西坡等地设立了移民、难民接待站。当年陇东根据地（包括新正、新宁县）共安置移民难民2100户，7487人，当地政府为他们调剂土地9340亩，发放农业贷款37.8万元，帮助他

们开荒2552亩，当年生产粮食6.4万公斤。从1942年至1943年5月，仅新正县就安置难民1264户，在当地政府扶持和群众的帮助下，他们大量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

由于各级政府、群众的扶持帮助，陇东根据地的移民、难民经过努力，大部分一年之内粮食就可自给，二至三年后即可独立生产。随着生产资料的增加，部分移民、难民达到了中农或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移民、难民的大量迁入，不仅缓解了陇东根据地劳动力少的问题，而且使大片荒山荒沟得到了开发利用，移民、难民自身的生活条件也得到极大改善。

陇东分区在大生产运动中还对"二流子"进行了改造。当时，群众把根据地内那些吸食大烟、聚众赌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称作"二流子"。1943年初，陇东分区有"二流子"1122名。为把这些人教育和改造成为自食其力、对生产和抗战有用的人，分区及各县政府颁布了许多改造"二流子"的政策，进行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并采取了一些强制生产的措施，帮助他们戒烟戒赌，改掉好逸恶劳的恶习，使他们拿起农具从事生产，逐步改邪归正。这一工作在当时声势浩大，效果也很显著。1944年，全分区各县共改造"二流子"732名，当年他们开垦荒地3000余亩，人均开荒4亩多。大生产运动中改造"二流子"的工作，对发展生产、转变社会风气和巩固自卫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之，陇东根据地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为粉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节 陇东根据地的工商业和财税工作

一、创建地方工业

抗战以前，陇东几乎无地方工业，一切工业用品都靠外面输入。从1938年起陇东分区的地方工业开始建立，并在大生产运动中得到迅速发展，相继办起了一批初具规模的军、民用产品加工厂，产品除保证根据地内的军需民用外，还有部分外销。陇东地方工业包括公营工业、合作社营工业、手工业、个体私营工业等多种成份，种类也比较齐全，有纺织、造纸、被服、制革、印刷、卷烟、酿酒、油坊、染坊、化工、农具等。

从1938年开始，在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带领下，陇东各县普遍兴办供销合作社，并以此为基础，发动群众集资入股，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开办小型工厂、作坊，逐步形成规模。1938年，在边区政府倡导下，由曲子县政府牵头，在曲子县城创办公属职业工厂一处，时有工人14名，这是陇东开办公营工厂的开端。同年，华池县办起供销合作社。随后，中共陇东特委、庆环分区专署和保安司令部集资股金3.5万元，向边区政府贷款2万元，合办了救亡工厂；庆阳县联社办了利民工厂，这些工厂成为陇东分区创办最早的地方公营工厂，有效地推动了全分区公营工厂的发展。

1939年冬至1940年9月，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禁止布匹、棉花等生活必需品进入边区。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陇东分委、分区专署在加强对原有公营工厂的领导，提高产品质量和数量的同时，根据需要充分发动群众，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采取集资、入股、贷款等办法发展地方工业。于是，一批以纺织业

为主的公办、合作联社办、群众户办企业陆续建起，并逐步形成规模。到1941年10月，陇东分区工业发展迅速，办起各种工厂10余处。以纺织业为主的工厂主要有利民工厂、克己工厂、民生工厂、济民工厂及镇原、环县、新宁、新正、华池等县办的纺织厂等。此外，还建有益民造纸厂、黎明火柴厂、华丰卷烟厂、肥皂厂、制毡厂、毛毯厂等。1941年，陇东根据地由各县政府直接经营的公营工厂达到17个。这些工厂的产品质量逐步提高，产量也逐渐增多，基本满足了军需民用。1942年，分区专署和三八五旅合办的救亡工厂和利民工厂，年产大布千余匹。1943年两厂合并为"联合工厂"。到1945年底，陇东分区公营工厂达到28个，有职工1000余人。公营工业成为陇东根据地地方工业的骨干。

在公营工业的带动和促进下，陇东根据地各县的合作社营工业和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仅在1941年大生产运动中，曲子、华池、合水、环县、镇原、新宁等县都通过集资和贷款，办起合作社纺织工厂。这些合作社工厂有政府与群众集资合股创办的，也有各机关单位为生产自给而经营的。合作社营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个体手工业的发展，成为根据地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陇东根据地在发展工业中，还积极支持和保护私人工业，大力扶持和发展私人个体手工业，进一步促进了陇东工业的发展。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鼓励扶持私人工业发展的规定，陇东分区各级党委、政府鼓励扶持一些地主、商人投资创办工业，欢迎边区以外的商人到陇东投资发展工业，制定对私人投资工业给予贷款、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陇东分区一些地主绅商看到在政府支持和帮助下创办工业利润丰厚，纷纷弃地弃商投资办工业。

为解决群众穿衣问题，陇东分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村妇女积极参加纺线织布活动。1940年，庆阳、曲子、镇原3县从事纺织业的农村妇女有1042人。1942年，陇东分区6个县从事纺织业的妇女达到4427人，纺线34039斤，织布15756丈，合4689匹。1944年10月，陇东分区为进一步发动妇女从事纺织业，发放纺织贷

款3300万元，把万余名农村妇女组织起来纺线织布。1944年底，全分区参加纺织的妇女达到1.5万人，纺纱32.3万斤，织布1.5万匹。陇东农村纺线织布业已成为陇东分区手工业生产的支柱产业，不仅使群众穿衣自给有余，促进了物资交流，而且推动了其他手工业的快速发展。到1945年，陇东分区个体手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分区各县合作、民办各类手工业发展到11个行业，作坊达到320家，从业人员517人，为解决军需民用手工业日用品起到了重要作用。

陇东地方工业、手工业的发展，保障了工业日用品可以实现部分自给或全部自给，战胜了国民党对根据地经济封锁造成的严重困难，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同时造就和培养了一批能工巧匠和企业管理人才，为日后陇东根据地工业的大规模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发展商贸事业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前，陇东根据地的商贸业十分落后，商品种类不多，流通不畅，商人以外籍为主，商贸交易多集中于县城和交通沿线的镇点。抗日战争时期，陇东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陇东根据地在大力发展地方工业的同时，还注重沟通根据地内外物资交流，发展和繁荣根据地商业贸易，增加财政经济收入。根据地民主政府对公营、合作、私人商业都给予大力扶持和引导，采取自由贸易、发展根据地内的商品流通等一系列措施，保护商人自由经营，发展私人商业贸易，多设集市，繁荣市场，建立消费合作社，调整进出口贸易，促进了根据地商业贸易的繁荣和发展。

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银行在延安创办集金融、商业、贸易为一体的光华商店。1939年7月，庆环分区专员公署在曲子县设立光华商店曲子分店。1940年8月，庆环、陇东两分区正式合并，边区光华总店拨款150万元（边币，下同），在庆阳县成立光华商店陇东分店（群众习称联合商店）。随后，又在西华池、驿马关、孟坝、三岔等地设立7个支店。延安光华商店共设8个分店，庆阳分店和曲子分店是

光华商店所有分店中，除绥德分店之外两个规模较大的分店，营业额占光华商店总额的35%左右。1945年，光华商店陇东分店已拥有总资金1.3亿元，支店发展到13个，包括关中分区的新宁、新正县3个支店，成为陇东根据地公营商业贸易的主体。

1941年初，边区政府在光华商店下设光华盐业公司、西北土产公司。不久，又成立了边区贸易总公司，统管盐业公司、土产公司和光华商店的业务。这三个总公司全部设置在延安，各分区均设有分公司。同时又按实际需要，在分公司下设立若干支公司。这些商店、公司在陇东各县也先后设有分公司和支公司，主要外销当地的皮毛、药材、食盐等土特产；购进土布、棉花等生活日用品，目的是为机关干部和部队筹集资金，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陇东贸易分公司成立于1941年6月，起初设在庆阳县城鹅池洞，后来曾先后转移曲子、元城、悦乐等地，工作人员达100余人，同时下设西华池、赤城、驿马关、曲子、孟坝、三岔、苦水掌等7个支公司。分公司和各支公司还分别办有以盈利和便民为目的的小工厂。各支公司收购的物资、收入的现金，都要上缴分公司，分公司又依序上缴边区贸易总公司，由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按计划调拨支援部队，供应全体机关干部和全边区人民生活的需要，以此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保证抗战需要。

在光华商店的带动下，陇东分区各县、学校及驻军也自筹资金创办了一批公营商店、店铺。如陇东地委、专署、八路军驻军三八五旅，不仅在庆阳城分别办有“德丰源”、“庆丰源”、“八一商店”，还在各县、镇办有分店。1942年后，仅合水县的西华池就设有各类公营商业店铺30多家。

在陇东商贸战线上，有一支实力雄厚、闻名遐迩的脚骡运输队。运输队筹建于国民党实行经济封锁的1940年。1941年上半年，中共陇东分委、分区专署根据皖南事变后根据地面临的经济形势，通令各县扩大运输队，帮助光华盐业公司等运销食盐，自力更生解决干部的给养问题。随着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到1943年，全分区共有大小运输队30多支，驮畜1400余头。1943年，光华商店总店和盐业公司合

并，组成边区光华盐业公司。陇东分区也在两个分店的基础上，组成陇东盐业分公司。分公司下设赤城、驿马、曲子、孟坝和西华池5个支公司，职工总数约80人。分、支公司的领导和业务骨干由各上级公司层层委派，一般人员由专署和各县政府调配。行政上以当地政府领导为主，业务和财务受上级公司垂直领导，资金由公司系统逐级下拨，收入物资层层上交，由总公司统一平衡，调配供应。1943年，边区食盐走私严重，陇东市场也不例外，造成市场不稳，边币贬值。边区政府决定实行食盐统销，凡大批量销往国统区的食盐，都由各级盐业公司组织专卖。陇东盐业分公司接受食盐统销任务后，控制食盐货源，打击不法商贩的走私活动，在国民党严密封锁边区的情况下，利用食盐从国统区换回大量的布匹、棉花和其他生活用品，为保障边区军民的生活供给做出了重要贡献。

合作商业机构，初称消费合作社，后称民办合作社，再称供销合作社，是以自愿为原则的群众集体经济组织，是公营商业的重要补充。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号召各地自办合作事业，发展经济建设，解决群众困难。当时陇东分区合作社以经营商业为主，兼营运输业、手工业，合作社组织有分区办的，也有县、区办的，在创办时间上也不一致。曲子、环县、华池的合作事业多创办于1937年10月，合水、镇原、庆阳的合作事业多创办于1938年3月。到1938年底，陇东分区（含庆环分区和新正、新宁两县）共有民办合作社27个；1942年，发展到38个，总资金441.6万元（边币）；1943年，发展到47个，发展最快的是华池和庆阳县；1944年，陇东分区民办合作社猛增到99个。合作社商品卖给抗属的货物实行八折优惠，而且当时私商不收边币，但合作社收边币，并且一般比私商便宜，既增进了军民关系，又对巩固边区金融起了很大作用。

在公营商业的带动下，陇东根据地的私人联营和个体商业也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西华池是陇东商业重镇之一，到1943年，各种店铺、饭馆、客栈达到百余家，各种小摊贩75户。不仅西华池如此，其他各县、镇亦然。陇东分区所在地的庆阳县城，原有规模狭小私商

铺面40余家，到1943年，已有一大批私人商号的店铺，一般小商小贩也有百余户。驿马、什社、马岭等乡镇也有许多商业店铺和小商贩。总之，私人联营和个体商业成为公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的补充部分，使陇东商业经济逐渐形成了以公营商业为主体，合作社营、单位机关联营、私人联营和个体户营并存充满活力的商业体系。

陇东分区商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全区贸易事业的发展。陇东分区在西华池、赤城、驿马关、孟坝、三岔、苦水掌、长舌头、湘乐等处关隘乡镇设立了8处对外贸易口岸。贸易口岸设立货币兑换所、税卡、贸易公司、土产公司、盐业公司等机构，负责管理和承办贸易业务。陇东分区实行"以货易货"的政策，与边区以外的各行各业商户做生意。1941年6月，陇东贸易分局成立，先后在西华池、曲子、驿马关等地设立贸易站，有计划地调剂对外贸易，向国统区输出本地食盐、皮毛、中药材、羊毛等土产，从国统区输入边区紧缺的布匹、棉花、药品等日用品及军用品，争取贸易平衡，并积极帮助合作社商店及私人商店发展贸易。根据地内外的商人想方设法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积极开展商贸活动，使根据地的市场得到发展和繁荣。

为发展和繁荣商业贸易，促进物资交流，陇东根据地党政组织还采取措施，增设集市，定期或不定期举办物资交流大会和骡马交易大会。全区各县乡镇都增设了集市，保护商贩自由买卖，鼓励群众发展多种经营，形成了公营、合作、私营商业全面发展，铺点、摊点、货郎担活跃城乡的繁荣贸易局面，使根据地的市场集市贸易逐渐繁荣兴旺起来。陇东根据地主要市场有庆阳、曲子等。庆阳是分区专署所在地，是陇东各县中商人最多的县；曲子地处庆阳、定边公路上，为货物集散之地。1940年秋，陇东分区先后在驿马关、镇原孟坝等地举办骡马交易大会，大会买卖牲口大多免征税费，边区、国统区群众纷纷前往参会，进行物资交流，边区抗战剧团、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到会宣传演出，为大会助兴。1942年5月，陇东分区举行了为期10天的骡马交易大会，6月2日的《解放日报》以"陇东举行骡马大会"为题进行报道："万商云集，贸易鼎盛，与会者不仅有边区各县群众，并

有友区人民，包括陕、甘、宁、青、晋、豫省等远近客商。每日从早至暮，市集上熙熙攘攘，车马络绎不绝，大会上百货俱全，最多的是牛、骡、马等牲畜，在5000匹以上，大多外地客商买之。"1943年5月，陇东分区又举办了规模更大的骡马交易大会。

商贸业的发展，互通了陇东根据地的物资交流，活跃了经济，增加了财政收入，粉碎了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使根据地渡过了经济难关，为巩固后方、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三、加强财政、金融和税收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金融、税收和生产是相辅相成的经济统一体。在陇东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陇东根据地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和商业贸易的繁荣，使陇东分区的财政、税收不断增加，经费和物资供给的困难逐步得到克服，财政基本达到收支平衡。1936年9月，陕甘宁省分库更名为庆环分库，驻地曲子镇，是陕甘宁边区最早设置在陇东境内的金融办事机构。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银行在延安成立财贸办事机构光华商店。1939年7月，设立光华商店曲子分店代办金融业务。1940年7月，陕甘宁边区银行陇东分行成立，下设西华池、驿马关、曲子3个办事处。1942年1月至1944年春，陇东对外贸易不断扩大，陇东分行又在三岔、孟坝、赤城、环县、苦水掌增设货币兑换所，基本形成陇东的金融网络。

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决定在边区内停止使用法币，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即边币）。为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陇东分行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利用期买期卖外汇，吸收法币和外汇，促使边币信誉提高，流通范围扩大，边币和法币比价稳定在二比一。1941年汇出3059万元，汇入2462万元；1942年汇出5521.5万元，汇入8.599亿元。1944年，陇东分区完成边币和法币兑换金额达2.57亿元。当

年，边区政府发行建设公债500万元，分配给陇东分区90万元，实际完成94.3万元。为支援陇东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陇东分行积极筹集资金发放农业、工商业等各项贷款。1941年发放贷款27.6万元，1942年发放贷款10.8万元，1944年发放纺织贷款3300万元，扶持1万名妇女发展纺织业。1943年关中分行给新正县发放农业贷款150万元。

陇东根据地建立后，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改革税制，规定按收入纳税，实行合理负担。1940年5月，根据边区政府颁布的《货物税暂行条例》，陇东分区依法征收货物税。1941年6月，陇东分区税务分局在驿马关成立后，在分区各县建立起6个税务支局和14个税务卡，税务网络基本形成。陇东分区税务分局在税收工作中，逐步把过去零星分散的税收转变成较为正规的税收制度，依照既要增加抗战能力，又不加重人民负担的原则，不搞过头征税，使人民满意，政府增收。1943年，陇东分区开始实行农业累进税，规定80%的农民都要负担救国公粮任务，对通过行政手段动员超交的，必须如数退还，当年陇东分区共退还超交公粮7000石。

金融和税收事业的发展，使陇东根据地的经济逐步摆脱困境，从1944年起基本上达到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盈余。1944年全分区财政收入14.3亿元，支出14.1亿元（均为边币）。陇东根据地财政金融与税收事业的发展，对于打破外部封锁，发展根据地经济，平抑物价，增加财政收入，支持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特别是农副业的发展，陇东根据地的工业、金融与商业贸易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为巩固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节　陇东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及卫生工作

一、小学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根据地的文教事业得到全面发展。陇东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创和发展，不仅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而且以其卓著的成绩和鲜明的特点，为陇东老区乃至全国新文化运动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一批专业文艺工作者来到陇东深入生活，同当地人民群众的文艺创作相结合，使文化艺术异彩纷呈，教育卫生事业蓬勃发展。

陇东老解放区从一开始就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使广大群众不仅在政治上，同时在文化教育上得到解放。1934 年 11 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把文化事业作为根据地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各级政府中设立了文化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文化教育政策，积极开办学校，使文化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因陇东根据地进一步巩固扩大，形势相对稳定，教育事业得以全面发展，特别是以小学教育为主体的学校教育蓬勃发展起来。从 1937 年到 1940 年，庆环分区和陇东分区认真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国防教育”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的“普及教育”指示和规定，在教学内容上执行党中央提出的“改变教育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的教育方针，积极发展小学教育。到 1940 年，陇东分区环县、曲子、华池、庆阳、合水、镇原 6 县共有学校 278 所，其中完全小学 11 所，模范小学 18 所，普通小学 190 所，女子小学 9 所，私学 50 所。1939 年，新正县有小学 77 所，其中完小 3 所，共有学生 2293 人。1940 年，新宁县有小学 31 所，其中完小 2 所，共有学生 1068 人。各学校从学制到教学内容都进行了整顿和改革，规定完小学制为 5 年，普小学制均为 3 年；各学校都采用边区教育厅编印的教材，教学方法也形式多样。

从 1941 年到 1943 年，陇东根据地的学校教育逐步向正规化的

方向发展。1941年10月，边区教育厅针对各地片面追求学校、学生数量，忽视教学质量的问题，召开第四届各县教育科长会议，作出"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的决定。陇东分区贯彻边区教育会议精神，专署召开政务扩大会议及分区各县完小校长联席会议，研究讨论学校教育正规化问题。从1942年2月开始，对全分区各类学校进行整顿，裁并学校，提高质量。经过整顿，全分区小学由1941年底的156所减少为69所，学生人数由3927名减少为2744名，教员也由224名减少为151名。这次精简提高了教育质量，但由于过分强调正规化，小学裁并过多过快，学生数量大量减少，使一些儿童失去上学的机会。从1943年开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认真贯彻整风精神，总结教育工作经验，清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纠正工作中的偏差，端正了办学方向和教育指导思想，使学校布局更为合理，教师更为优化，学校教育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1944年10月，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提出"民办公助"的办学方针。陇东根据地在贯彻边区文教会议精神中，根据实际需要改革教育，既注意学校数量的增加，又重视教学质量的提高，全分区掀起群众性办学热潮，许多劳动英雄、知名人士和广大群众积极集资办学。如合水县西华池小学原校长杨振甲，带头捐款5000元，并动员西华池街公营、私营商店集资47万元，帮助西华池小学维修校舍、添置桌椅及教学设备；曲子县回民参议员李秀如，多方奔走，带头捐资助学，在曲子街办起一所伊斯兰小学。由于调动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小学教育事业有了较快发展。到1945年，陇东分区共新建民办小学160所，私学88所，占学校总数的89.2%，在校学生达到5172名。各级政府加强对私学的管理，采取逐步淘汰或进行改造的方法，使其成为新型学校。镇原县孟坝乡西坳村小学"贾其昌先生私学模式"经验，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表扬，在陇东分区进行了推广。

抗战时期陇东根据地的学校教育，是一种逐步走向成熟的新型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这种教育使广大工农劳动大众享有教育的权利，成为教育的主人。教育的目的和任务是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

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学生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培养学生的阶级观念、劳动观念和群众观念及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养成民主作风和集体主义观念，使之成为政治上坚定、有文化、会工作、守纪律的革命者和建设者。在教学内容上，废除封建陈旧的一套，如《三字经》、四书五经之类，代之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内容，即统一采用由边区教育厅编印的新教材。同时，学校还开展了丰富而有意义的课外活动，进行军事体育训练，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开展社会宣传。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了让学生死记硬背和填鸭注入式等旧的教学方式，采用启发式和讨论式，让学生积极主动学习；在教学原则上，强调学用一致，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教学管理上，实行政府与教育行政部门双重领导，并请当地群众代表参与管理，实行群众路线；在教育经费上，1938 年以前实行由政府负担的免费教育，之后小学教育经费主要由地方自筹解决，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勤俭办学；在教师队伍建设上，政府十分重视对教师的培养，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并关怀和尊重教师。这种新型的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干部，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和各项建设事业，同时对陇东地区的社会改造和移风易俗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探索积累了成功经验。

二、中等教育

随着陇东根据地小学教育的迅速发展，小学生在完成小学学业后的升学问题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陇东根据地没有一所中学，随着陇东解放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在陇东解放区建立中等教育，不仅成为老区教育事业发展的自身需要，而且成为当地政治、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1940 年 3 月，边区政府应陇东分区的要求，决定在陇东分区创办陇东中学。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委派陆为公、孙萍前往庆阳城筹办。他们在分区党政机关的领导和支持下，本着边区政府“少花

钱，多办事。要想尽一切办法，能在半年开学”的指示精神，利用庆城南街一座旧文庙作校址，一边修建校舍，一边动员招收学生。在经费不足2000元的困难条件下，历时仅5个多月，就完成了陇东中学的筹建工作。1940年9月1日，陇东中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为学校题写校名，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分别题词。

陇东中学是一所包括师范班在内的普通初级中学，受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直接领导。陇东中学的教育方针是：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培养抗战救国人才。陇东中学开学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陇东分区特委书记马文瑞兼任校长，赵长远为副校长，陆为公为教导主任兼总务主任，孙萍为副教导主任。陇东中学创办之初只有11名教职工，首届招生122人，设为师范、中学、预备（文化补习）3个班次，学制为1年。1940年11月，学校根据边区政府“提高国民教育质量”的要求，对学校进行全面整顿，学制改为2年，充实教学内容，增设教学机构，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使学校逐步走向正规化。同时，学校开展生产自救活动，初步解决了生活困难和经费不足的问题。1941年春秋两季，学校都招收了新生，增加了教学班，扩充了教职工队伍。据当年9月份统计，学校共有教职员工28人，学生247人，设6个班次。1942年秋，学制改为3年。1943年，陇东地委、专署为大量培养和培训地方干部，在陇东中学开设地方干部训练班。1944年10月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召开后，陇东中学教学改革深入开展，教研机构相继成立，教学质量逐步提高。到1945年，陇东中学教职工增至37人，有教学班7个，学生330人。1948年3月，陇东中学奉上级指示停办，改为陇东分区党校。

陇东中学是边区政府在陇东根据地创办的第一所完全新型的中等学校。从开办之日起，这所学校即遵循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坚持正确的教育方向，把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重点培养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并且注重把思想政治工作融于具体的教学内容之中，从而对树立学生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陇东中学在注重课堂教学的同时，积极组织师生参加社

会活动。1942年7月20日，以首届陇东中学毕业学生为主的陇东学生观光团一行53人赴延安参观学习，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毛泽东给观光团的师生们讲了话。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学生代表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学生代表给毛泽东献上绣有"人民舵手"的锦旗一面。陇东中学把学校教育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把教书与育人统一起来，培养和锻炼了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提高了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是新民主主义教育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1940年到1948年陇东中学坚持办学近8年，共培养出毕业生（不含中途调出参加工作者）523人，绝大多数走上革命道路，其中许多人成长为党政军的高级干部。陇东中学的建立，是陇东老解放区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灵活创新的办学思想，高效务实的学校管理，客观实用的培养目标以及现代人文道德教育方法的运用，不但为陇东文教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为新中国教育制度的确立进行了有益尝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陇东老区以至我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抗战时期，陇东根据地的中等学校除了陇东中学外，鲁迅师范学校、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关中师范）、陕北公学新正分校等中等学校也在陇东根据地的新正、新宁办过学，其办学时间虽短，仍为边区培养了一批小学教员及教育行政管理人员，更为后来陇东发展中等学校教育提供了初步经验。

鲁迅师范于1937年春创建于陕北延长县，是一所培训小学教员及初等教育行政工作人员的学校。1938年4月，根据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决定，鲁迅师范迁至关中分区新正县马家堡。这是设立在陇东境内最早的一所中等学校。鲁迅师范在新正县办学共计16个月时间，毕业了5个班（含1个速成班）的学生，培养了300多名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才，为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0年3月15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关中师范，在新正县第三区马家堡正式成立。关中分区党委书记习仲勋兼任校长，王

佰勋任党支部书记，刘瑞芬任副校长。为保证师生安全，3月20日，学校迁到离新正县马家堡约20里的三嘉塬索罗村。学校的课程参考边区教育厅颁发的《边区师范学校章程》，开设了国文、政治、数学、历史、地理、自然、社会科学、教学法、美术、音乐等。根据当时战争形势的要求，还增设了军事课以及补充课、课外报告。根据关中分区形势发展的需要，学校提出"巩固教学，保卫关中"的口号。所谓"巩固教学"，就是使干部师生精诚团结，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认识，把学校办好；所谓"保卫关中"，就是要求学校积极配合当地党、政、军，动员群众参加反"反磨擦"的武装斗争。因此，学校成立了一个宣传教育委员会，每周组织宣传队去关中分区所在地长舌头集市搞一次宣传活动。学校还响应边区政府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积极开荒种地。1940年5月24日，由于形势危急，学校奉令开始往新宁县傅家山迁移。同年8月中旬，又由傅家山迁到新宁县三区后掌村。11月24日晚，师生又急行军迁到陕甘交界的蜈蚣洞。关中师范成立后，在不到一年时间内4次迁移校址，反映出战争年代的特殊形势给学校办学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迁址马栏后，关中师范更名为马栏师范，培养了大批战争急需人才，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后，面临日趋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了加快培养政治理论干部，中共中央于9月份决定在延安成立陕北公学。1938年春，陕北公学在新正县澉坡头区看花宫乡办了一个分校。新正县分校学生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经常举办球类比赛、军事演习；每周定期举办文娱晚会，常常有上千人观看。此外，学校还组织学生到附近的何家山开荒种地。陕北公学新正分校自1938年春开办，至1939年6月撤离，培养出上千名学员。1938年毕业的学员，大部分奔赴抗日前线；有些回到大后方做了地方工作。女学员大部分上了医科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学员成为党在各条战线的中坚骨干。

三、抗大七分校

1941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以八路军一二〇师教导团和抗大总校一个大队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校址设在山西兴县李家湾。1943年2月，为了贯彻中央关于抗大要"艰苦的坚持教育，保存和培养干部，准备反攻"的指示，七分校奉命迁到陇东分区的合水，改称陆军中学；5月，中央决定恢复抗大七分校，陆军中学编为该校第一大队，共1500余人，校部驻合水老城镇。同时期，晋察冀边区抗大二分校附中师生1500余人奉中央指示，在校长江隆基带领下辗转到达合水，并入七分校，其中8个男生队编为抗大七分校第二大队，女学员编为两个女生队，直属学校领导，驻华池豹子川张岔。1944年1月，晋冀鲁豫边区抗大三分校1100余人，来到合水编为抗大七分校第三大队，驻扎在平定川。4月，校部、第一大队和女生队迁到东华池一带。抗大七分校共有教职工800多人，学员5000余人。中央军委任命彭绍辉为校长，张启龙为政委，俞楚杰为副校长，杨尚高为政治部主任。

抗大七分校师生响应党中央、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带着党中央交给的镢头、枪杆子、笔杆子"三件宝"，在陇东的深山老林里开荒种地，练兵习武，学习文化，经受锻炼，争做抗日救国的有用人才。他们初来时没有住处，就自己动手修窑洞，建房子；没有吃的，就自己动手开荒种地解决吃饭问题。抗大七分校师生一面劳动，一面学习。学习的课程有政治、军事、文化3门主课。政治课以培养学员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精神为宗旨，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注重对学员的思想教育。学习内容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整风文件等。军事课分为军事理论课和技术操练课。军事理论主要学习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以及朱德的军事著作。技术操作练习强调从战术、装备、

作战对象和作战条件等实际情况出发，把总结作战经验与对敌作战特点、训练与实践结合起来，目的在于使每个学员掌握一套带兵打仗的真本领。训练的主要内容有队列教练、兵器性能、投弹刺杀以及游击战术、通讯、爆破等。文化课教学依照因材施教的原则，把学员编为小学班、初中班和高中班，分别开设不同的课程。中学班开设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还选学俄语、日语。小学班以识字教育为主。当时学习条件很差，学员们用子弹壳制笔，用桦树皮当纸，垒起石板当桌子，搬来石块做凳子，在沙土上练字。尽管非常艰苦，但学员们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积极学习，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当时，七分校的文艺活动也开展得丰富多彩，校文工团及各大队经常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如《豹子川大合唱》《难民区》等。文艺活动的开展，既活跃了学员生活，又培养了一批优秀文艺工作者。文工团长陈博解放后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第三大队队长任白戈解放后成了作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1946年7月，抗大七分校3个大队先后离开陇东去接受新的任务。七分校在陇东历时3年，在艰苦的条件下，学员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为部队生存和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做出了贡献；为中国革命培养了许多通讯、机要、报务、测绘、摄影、炮兵、文艺、医务、财会和军事、政工干部，这批学员毕业后，分赴全国各战场，成为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和中坚力量；学员与当地的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感，使革命的种子在山区群众中深深扎根；培育和实践了抗大精神，使其成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激励和鼓舞着一代代的青年人。抗大七分校的历史不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重要的一页，而且在陇东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四、社会教育

在大力开展学校教育的同时，陇东根据地开展的社会教育和干

部教育也卓有成效。

社会教育是以文化、政治、卫生和群众文艺活动为主要内容，以不影响生产和工作为原则的民众教育，目的是扫除广大工农群众中的文盲和半文盲，提高成人的民族意识和政治文化水平。陇东的社会教育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兴起。1935 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陇东的镇原、环县、华池等地，之后随着陕甘宁省委、省政府成立，红军教导师等部队在陇东境内驻扎，在他们的组织领导与帮助下，陇东的社会教育事业以不同形式日渐发展。

1936 年陕甘宁省委帮助曲子县建立列宁俱乐部，开展识字扫盲及文艺活动；1937 年 2 月，红军教导师帮助庆阳县建立陇东根据地第一个民教馆，面向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教育活动。陇东的社会教育事业全面系统地开展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 年秋，陕甘宁边区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社会教育事业，提出“发展民主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的社会教育方针。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号召在全边区开展“扫盲识字突击运动月”活动，当年冬季形成高潮，仅环县、曲子、固北 3 县就办冬学 58 处，学员 719 名；识字班 369 处，学员 2424 名；夜校 20 处，学员 225 名。陇东根据地各级党政组织为配合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因地制宜地开展社会教育，还创造出冬学、夜校、识字组、民教馆等多种多样的教育形式。1939 年春，毛泽东发出“为消灭文盲而斗争”的号召，陇东根据地按照边区政府社会教育方针，积极发展社会教育事业，到 1940 年底陇东分区 6 县及新正、新宁县相继创办了民众教育馆、俱乐部以及剧团等社教组织。其中各县共办冬学 80 处，学员 1334 人；夜校 239 处，学员 3182 人；识字班 374 个，学员 2390 人；半日校 62 个，学员 1124 人。

1942 年，中共陇东分委、陇东分区专署按照边区教育厅的指示，对全分区以冬学为主的社会教育组织进行整顿，提出“重质量为主”的要求。陇东分区各级党委和政府结合整风运动，对社会教育工作中存在的过分强调正规化的偏向进行纠正，按照群众需要和自愿的

原则，进行相应改革，强调社会教育以识字为主。陇东党政组织广泛动员群众自愿参加文化学习，并注意对群众进行政治和科学教育，从实际出发安排教学内容，把学习文化和群众的实际生活、生产需要结合起来。社会教育使用边区教育厅统一编写的《民众识字课本》《抗日三字经》《日用杂字》《庄稼杂字》《卫生课本》等教材，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具体生动。此外还学习庄稼栽培、纺线织布、妇婴卫生、珠算记账、公文知识等。教学组织形式灵活多样，方便群众，仅冬学就有全天、半日、成人、儿童、妇女、一揽子冬学等。教学方法丰富多彩，生动活泼，除课堂教学外，还大量的在田间地头、村边院落进行分散与集中的教学，注重学习实效。另外，还广泛组织读报组，既学习文化知识，又学习时事政治。

陇东各级党政组织还积极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共同开展社会教育工作，这是对以往单纯靠政府创办教育事业制度的重大改革，有效地促进了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当时，陇东各级党政组织除号召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和支持办学外，还积极动员劳动英雄、变工队长及各地较有影响人士出面组织社会教育，借助他们的影响动员群众共同开展社会教育工作，政府则根据情况予以指导。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华池县城壕村张振财，为城壕村制定了两年半消灭全村文盲的计划，并积极组织领导全村的识字运动，后来还将识字组发展成为相当正规的夜校，用开荒、入合作等办法解决全村识字运动经费。张振财创办社会教育事业的成功经验赢得了党和人民赞誉。教育家蒋南翔于1944年10月2日在《解放日报》撰文，对张振财领导的识字组给予很高评价。由于各级党政组织的努力，以及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根据地社会教育出现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1944年底，庆阳县有冬学148处，参加学习的有2800多人。镇原县有冬学120多处，参加学习的有2300多人。根据地15岁至40岁的群众，凡参加扫盲学习的，一般识字都在500个左右，不少人达1000字以上，一般都能读书看报，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社会教育的广泛开展，不仅大大提高了陇东民众的文化水平，促进了根据地新思想、新道德、新风

尚的普遍树立，而且大大激发了陇东民众的抗日觉悟，推动了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五、群众文化事业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陇东根据地的文化事业也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根据地各级政府响应党中央提出的为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而斗争的号召，把群众文化事业当做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加强组织领导，并充分发挥各县民教馆的具体指导职能和各级中小学的带动作用，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

（一）新戏剧运动及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

1936年11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烽火剧团在环县吕家湾上演了抗日戏剧，为参加山城堡战役的广大指战员鼓气助威。这是革命戏剧在陇东的最早活动。1940年，边区抗战剧团60余人在团长杨醉乡的带领下，来到陇东根据地演出话剧、秦腔、道情、歌舞和电影，并在沿途张贴标语、漫画，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号召解放区人民举办冬学、夜校，提高文化，历时百天，影响很大。1945年下半年，边区联政宣传队在陇东解放区开展文艺宣传活动，他们在陇东驻军部队上演了许多反映部队生活的剧目，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同时，联政宣传队还到庆阳、曲子、合水等地收集资料，创作演出了《纺织英雄刘鲁氏》《种棉花》等23个剧目。联政宣传队在陇东解放区历时136天，这是边区剧团在陇东解放区的一次重大文艺宣传活动。

在陇东经久不衰并做出巨大贡献的还是土生土长的陇东剧团。陇东剧团的前身是庆环农村剧校，也称“一斗麦剧团”。1939年6月，为了宣传抗日政策、活跃边区文化，庆环分区在曲子镇创办了陇东第一所艺术学校——庆环农村剧校。剧校成立后，庆环分区领导人马锡五等亲自关怀过问剧校的工作，指导改编抗日剧本，引导剧校走上为抗战服务的正确轨道。当时群众亲切地称剧校为“马专员戏

班子”。在分区的关怀和群众的热情支持下，剧校为陇东各地农村业余剧团培养了大批文艺专业人才和骨干，并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创作和编排了《破奸计》《再上前线》《排长起义》《坚壁清野》等许多宣传抗日救亡的爱国剧目，到陇东各县进行宣传演出。1940年，在专署专员马锡五亲自指导下，陇东分区以庆环农村剧校为基础，组建起陇东剧团，积极创作和演出反映根据地现实斗争生活的剧目，剧团的文艺骨干也不断得到充实，剧团成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创作和演出水平都有明显提高。

陇东剧团长期深入基层为群众服务，以根据地现实生活为题材，排演了《白毛女》《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刀》《王三宝转变》等许多剧目，深受广大群众欢迎。1941年秋，边区教育厅为了更好地开展社会教育工作，调陇东剧团赴延安鲁艺学院受训学习并汇报演出，受到党中央领导和边区政府的称赞，毛泽东亲笔为剧团题词：“向前进，勇往直前！”成为剧团人员前进的动力。受训期间，博古、周扬等许多中央领导和戏剧界知名人士分别讲授了政治文艺理论、表演导演技术和美术音乐等课程。同时，剧团还到工厂、部队、学校、郊区参加了社会实践活动，受到了“延安精神”的熏陶，提高了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1942年秋，陇东剧团返回庆阳。此后，陇东剧团一直扎根于陇东人民群众生活的沃土之中。在陇东剧团的带动下，全分区各县均先后组建业余剧团，自编自演了许多反映根据地革命和建设的文艺节目，活跃群众生活，鼓舞人民抗战热情，促进了陇东群众业余文化活动的兴起。边区抗战剧团、战火剧团、关中剧团、三八五旅和抗大七分校宣传队等也先后到陇东各地巡回演出，推动了陇东群众文化活动的发展。1949年8月兰州解放后，陇东剧团奉调赴兰，改为陇东文艺工作团，不久改为甘肃省文工团，1953年改为甘肃省话剧团。

从庆环农村剧校到省文工团，陇东剧团编演的剧目都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群众生活基础，起到了宣传政策、教育人民的作用，极大地推动和丰富了陇东的群众文化活动。1942年，全区各县认真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开展文艺普及运动。延安一批专业文艺工

作者先后到陇东体验生活，指导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使全区群众文艺活动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在戏剧方面有陇东道情、大鼓说唱、秦腔、眉户等，形式多样，活动普遍；在民歌方面有革命历史歌谣、信天游、劳动号子和酒曲等；在社火表演方面有新秧歌、地故事、高跷、云朵子、灯舞、跑旱船等；在美术创作方面有剪纸、面塑、石鲁雕刻、版画、漫画等。此外，还整理了大量的民间传说、革命故事，推广了“高原唢呐”、“田间快板”等。一些剧团骨干和农民业余作家在创作中，利用群众熟悉的民间曲调，填上宣传抗日生产、歌颂边区政府和人民领袖的新歌词，唱起来顺口，听起来通俗易懂，深受群众的喜爱。如配合大生产运动的《兄妹开荒》《边区十唱》（即《军民大生产》）《订生产计划》《合作化人员》等，配合扫除封建迷信的《山神算卦》《常大郎拾元宝》《王三宝转变》等，配合文化教育的《夫妻识字》《上冬学》《讲卫生》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活跃繁荣的群众文化活动宣传了党的政策和主张，倡导和树立了新风正气，也丰富和满足了劳动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新秧歌运动与陇东民歌

在陇东群众文艺的百花园中，与陇东剧团争奇斗艳的还有两朵璀璨耀眼的艺术奇葩——陇东新秧歌和陇东民歌，一度风靡陇东，闻名遐迩。陇东新秧歌和陇东民歌经过民间艺人和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加工创造，并赋予革命的内容，其形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得到升华，使这两种有着浓郁地方特色的艺术门类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秧歌是庆阳传统的民间舞蹈。抗日战争时期的陇东根据地，曾以开展波澜壮阔的新秧歌运动而闻名于全边区。作为边区新秧歌运动中一支浩大的队伍，陇东新秧歌以其崭新的面貌、质朴的风格和卓著的功绩，在根据地革命文艺史上书写了灿烂的一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陇东地委、行署更加重视对新秧歌运动的领导，1943 年组织各县秧歌队创作并演出了一批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新秧歌，使传统文化推陈出新，展示新的内容，创

造了灿烂的革命文艺。每逢年节或重大庆祝活动，几乎所有村镇都要耍秧歌，到处敲锣打鼓，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人们扭秧歌、跑旱船、打腰鼓、打霸王鞭，载歌载舞，歌唱边区生活安定、五谷丰登的新气象，歌唱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好领导，把群众性的文化活动推向高潮。

“新秧歌运动的旗帜”——刘志仁就是杰出的代表。新宁县南仓村的刘志仁对旧社火的形式大胆改革创新，把秧歌的唱调和跑故事的舞蹈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实实在在反映根据地群众生产生活的新秧歌剧。由刘志仁领导的五六十人的社火队，几年间先后演出了由他亲自编排的20多个新秧歌剧，这些秧歌剧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调，填写上新编写的故事和歌词，受到群众极大欢迎，流传甚广。刘志仁带领的社火队年年都有新创作、新内容、新演出——《新开荒》《新小放牛》《九一八》《卢沟桥》《新阶段》《自卫军受训》《救国公粮》《新放脚》《新十绣》《反磨擦》《保卫边区》《生产运动》《百团大战》《新三根》《边区好政府》等，这就是他们的社火越闹越红的原因。群众赞扬说：“南仓社火耍的红，区里县里都有名。里头有个刘志仁，离了刘志仁，新故事就耍不成。”1944年11月，刘志仁光荣出席了边区文教大会，获“特等艺术英雄”称号，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为其颁发了“新秧歌运动的旗帜”的奖状。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他，并送给他一条毛毯。翌年1月，他又被边区群英会授予“特等文教英雄”称号。周扬在文教代表大会的报告《开展群众新文艺运动》中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刘志仁和他的南仓社火队，堪称为群众新秧歌运动的先驱和模范。”

庆阳县三十里铺乡社火头黄润是陇东新秧歌运动中涌现出的又一位优秀农民剧作家。他带领的庆阳县三十里铺社火队，编演了一大批源于现实生活、泥土气息浓厚的秧歌剧，如《夫妻开荒》《懒瘸转变》《劝二流子务正》《算命先生》《变工队》《二五减租》等，群众看了不仅感到亲切生动，真实可信，而且深受教育。曾以《二五减租》秧歌剧在陇东分区秧歌大赛中夺魁。1944年11月，在边区文教大会上，

黄洵以他在社火秧歌革新编演方面的卓越成绩，荣获甲等艺术奖。毛泽东主席接见他时鼓励说："听说你们的秧歌演得很好，我们要看。以后你们要多演、多唱、多宣传，把你们周围的群众都发动起来。"

1944年1月，中共陇东地委召开分区文艺座谈会，确定陇东分区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为，以戏剧为主，采用民间艺术形式，向工农兵群众做普及宣传教育；加强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与政治教育；大胆创作，设立创作奖；化整为零，深入到农村、连队中去，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文艺演出活动；加强对各宣传队和剧团的政治领导。在陇东群众文化活动中，群众业余创作十分活跃，专业文艺工作者与当地民间艺人孙万福、汪庭有等密切配合，创作出一批优秀的民歌作品。《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十绣金匾》《军民大生产》等唱红全边区的三首民歌，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曲子县农民孙万福，从小喜欢作诗编歌，有出口成章的本领。在火热的大生产运动中，他先后创作了《歌唱毛主席》《边区人民要一心》等热情洋溢的诗歌，在当时的《解放日报》《陇东报》发表的就有20多首。1943年他因在大生产运动中改良耕作技术成绩突出而出席了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在党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座谈会上，孙万福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近毛泽东，用双手紧紧抱住他的肩膀激动地说："大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账也还了，地也赎了，牛羊也有了，这都是您给的！没有您，我们这些穷汉子爬在地上，一辈子也站不起来！"说完这句话，他用颤抖的声音即兴创作编唱了民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孙万福的创作才能一时轰动延安，周扬专门在《解放日报》上撰文介绍他，并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可真算得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经作曲家贺敬之修改润色和谱曲后，在整个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广泛流传，久唱不衰，成为传世之作。

与《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相映争辉的是"艺术英雄"汪庭有编唱的《十绣金匾》。汪庭有，原籍陕西商县。1936年前后，汪庭有从国统区逃到边区新正县定居下来，学做木活，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汪庭有怀着对革命领袖、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感激和热爱，利用陇东群众喜闻乐见的《绣荷包》曲调和表现手法，边劳动边编唱，创作出长达10段80句的优秀颂歌《十绣金匾》。1944年11月，在边区文教代表大会上汪庭有获甲级艺术英雄称号，其作品《十绣金匾》被评为边区文艺佳作。艾青专门在《解放日报》上撰写长文介绍他。后经专业文艺工作者的提炼和润色成为《三绣金匾》，使其成为一首鼓舞人民团结战斗的颂歌。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去世后，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又对《三绣金匾》进行了再创作，使其又变成为一首献给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颂歌。时至今日，每当人们唱起或听到《绣金匾》时，仍有着催人泪下的艺术震撼力。

1943年，张寒晖一行十多人从延安徒步来到陇东分区华池县的悦乐、城壕一带，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文化工作方针。他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手法，给陇东民歌《推炒面》编入新词，加工提炼出《军民合作歌》，这就是后来流行于全国的《解放区十唱》，又名《边区十唱》《军民大生产》。这首雄壮欢快的歌曲，产生于庆阳，凝结着人民艺术家、歌曲《松花江上》的作者张寒晖的心血，是散发着陇东黄土地丰厚情韵的艺术珍品，记述着一个轰轰烈烈的岁月，讴歌了一个艰苦奋斗、乐观向上的时代。

富有革命思想和浓郁乡土气息的陇东民歌及其新秧歌，成为不少专业文艺工作者研究的对象，他们因此而创作出了许多有名的诗篇和歌舞，堪称民族艺术的瑰宝。著名诗人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就是根植于陇东民歌这块沃土上的佳作。陇东社火中的云朵儿（又名地飘儿），其轻柔飘逸、婀娜多姿的舞蹈形象，在20世纪50年代经著名舞蹈家戴爱莲提炼加工，改编成为轰动国内外的《荷花舞》。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的文艺创作也呈现多姿多彩的繁荣景象，其中取材于陇东民间故事的短篇小说《乌鸦告状》、植根于陇东民歌沃土上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都是脍炙人口的艺术佳作。周扬、艾青、蒋南翔、穆青等撰写的《一位不识字的劳动诗人孙万福》

《汪庭有和他的歌》《陇东文化运动中的新人物》《庆阳农民的"新社火"》等反映陇东根据地新生活的通讯报道，内容新颖、文字精美，很多被重庆新华日报转载，成为新闻作品的典范。边区文艺工作者以华池县温台区四乡（今悦乐镇）女青年封芝琴争取婚姻自主故事为素材，编写了鼓词《刘巧团圆》和剧本《刘巧儿告状》，以后又改编成评剧《刘巧儿》，轰动了陕甘宁边区。新中国成立后，评剧《刘巧儿》拍成电影上映，由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主演，影片影响所及，几乎是家喻户晓，"刘巧儿"也成为新中国妇女解放的象征。庆阳县城胡仙川的剪纸1930年就在国外发表。1942年，边区政府派出专业文艺工作者古元、力群等深入陇东搜集整理民间剪纸艺术，并借鉴陇东剪纸创作了木刻剪纸，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艺术形式的发展。在根据地时期广为流传的陇东道情，经甘肃省戏曲剧院改革，一本道情剧《枫洛池》名扬京华，周恩来、朱德、陈毅观看后非常称赞，由陇东道情而得名的陇剧，已成为闻名全国的一个独特剧种。

陇东根据地群众文化的发展，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发展生产和巩固边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夺取抗战胜利的精神武器，使陇东根据地从文化落后地区发展成为文化先进地区，为巩固和建设边区做出了贡献。

六、医疗卫生事业

陕甘边根据地创立之前，陇东没有专门的医疗机构，缺医少药，仅有少数游医和零星药铺。根据地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群众疾苦，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医务人才，设立医疗机构，到抗日战争时期，在陇东分区的努力下，陇东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得以快速发展。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华池县南梁成立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医院，是陇东根据地内最早的医疗卫生机构。1936年12月，中央红军教导师进驻庆阳，所属医院驻庆阳马王庙。中央红军第

三十军三十四团卫生队也随军进驻镇原县屯字镇。1937 年 9 月，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在曲子县曲子镇成立后，分区保安处设立卫生队，有医务人员 10 余人。卫生队除为分区干部和当地驻军服务外，坚持经常下乡为群众看病，宣传卫生常识。1937 年冬，八路军三八五旅军医处随旅部驻庆阳县城，有医护人员 20 余人；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卫生队随团部驻庆阳县驿马关；接着警备第二、第七团分别在曲子、合水组建起了两个卫生队，有医务人员 70 人，这些医疗单位既为部队指战员服务，也接收当地群众患者。1939 年秋，三八五旅军医处与原红军教导师医院合并为三八五旅野战医院，共有医务人员 30 余人。1941 年，边区卫生处又从白求恩和平医院调来数名医术较高的医生，分别担任内科、外科、手术室和传染科主任，加强了医院的技术力量，陇东各地病人纷纷前来就医。为方便病人，野战医院在庆阳县和华池县悦乐镇开办 2 个保健药社，并开设门诊部，积极为当地群众医治疾病。1942 年 1 月，陇东分区正式在庆阳县城设立卫生所。

1941 年初，陇东分区根据边区政府的指示在曲子县、华池县、环县等地设立了医药供销处，并要求各县开办保健药社，促进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同年 4 月，陇东分区在部队医疗单位支持下，在庆阳举办医疗培训班，培训卫生人员 120 多名，为分区各县培养了一批医疗卫生骨干。陇东分区各级政府还注重团结教育当地民间的中医、游医，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发挥医疗技术和特长，壮大了医疗卫生队伍。1942 年，陇东根据地各县建立县级保健药社。为解决当时医疗卫生经费困难，各地政府积极鼓励群众集资入股，创办合作社性质的保健药社，解决医病吃药的困难。在创建合作药社中，按照边区政府规定的“股东、抗日军人及其家属吃药，一律九折”、“药社盈利 30%，按股分成”等鼓励集资办药社的政策，不仅较好地解决了群众医病吃药的困难，也激发了群众集资创办卫生药社的积极性，陇东各地先后办起多个保健药社。各地合作保健药社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就地采集药材，研制加工成许多种中成药品，为群众医病解痛。在出现流行性传染病时，保健药社对贫苦农民

免费医疗和赠送药品，使广大群众减轻了疾病的痛苦和生活负担。如曲子县保健药社于1941年初建立后，在两年时间里为群众治病11444人次，研制成中成药品20余种，给群众免费送药品价值62万余元，药社资金由2000多元发展到700万元。

1943年下半年，三八五旅野战医院与陇东分区卫生所合并，改为陇东地方医院，除为干部、战士服务外，还积极为农民群众医治疾病，并经常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为群众服务。1944年，曲子县突发猩红热和耳下腺炎传染性疫病，陇东分区医院即派出医疗队赴曲子、马岭一带医治，与曲子保健药社医护人员积极配合，很快控制了疾病的流行，治愈患者200余人，免收医药费57万余元。1944年7月14日，《解放日报》报道了曲子保健药社为百姓免费治病送药的事迹。陇东地方医院在成立后的一年内，共为农民群众节省医药费487万元。1945年春，三八五旅第五团卫生队在合水县西华池开办民生医院，开诊两个月，即免费治疗贫苦农民和军烈属病人452人。

1945年1月，陇东分区在庆阳县城成立了中西医药合作研究会，开办分区保健总社，中西医互相学习，用土办法研制出不少新药品，治愈了许多顽症和疑难病患者。驻陇东的三八五旅、抗大七分校等单位，也为地方基层政府和群众捐助卫生费，帮助筹办保健药社，经常派出医疗队巡回治疗，为人民群众看病送药，深受欢迎。

陇东根据地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和保健工作。1939年4月7日，《新中华报》发表了《卫生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的社论，指出搞好卫生运动是完成抗战建国大业的重要任务。为此，必须广泛地进行卫生教育，使全体军民对卫生运动有自觉的注意，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制定适合于实际情况的卫生法规，定期举行清洁运动，有计划地改良环境卫生，普及必要的卫生设备。根据这一精神，1941年陇东根据地各县普遍成立了卫生委员会，定期布置卫生工作，对县城和乡村、农户的环境卫生、饮食卫生和妇婴卫生的内容提出了具体要求，订立了卫生公约，并经常督促检查各县卫生工作进展情况。

在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工作中，各级政府卫生委员会、民教馆、文建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除积极向广大群众进行破除封建迷信、讲究卫生、预防疾病的宣传，开展放足运动，宣传卫生科学常识，组织群众揭露巫神、马脚害人骗钱的把戏，开展反巫神活动外，还采取定期不定期检查、开展竞赛评奖、上黑板报公布等方式，使其经常化、制度化，收到了较好的效果。1942 年，陇东分区结合大生产运动，以“摆擂台”、“打擂台”互相挑战、应战的方式，开展群众性的讲卫生运动，建立卫生模范点。1944 年，分区各县都举办新接生法训练班，不少区、乡也举办新接生法训练班，妇幼卫生保健水平大大提高。新正县雷村举办的新接生法训练班成绩突出，受到边区政府的表彰奖励。分区各级机关干部深入农村动员和组织群众修改茅厕、畜圈，改良水井、水源，逐步改变农村不讲究卫生的陋习，开展卫生防疫，净化卫生环境，使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明显提高。

在开展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中，涌现出了许多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1943 年 11 月，陇东分区医院被边区政府评为边区卫生系统先进单位，荣获集体奖。1944 年 10 月，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代表大会上，华池县保健药社被评为卫生战线先进单位，获集体奖，《解放日报》曾两次报道了他们的事迹；曲子县保健药社主任庞克道荣获卫生战线甲等英雄称号，《解放日报》多次报道其开办中西医训练班、帮助各区成立药社、研制新药品等为群众服务的典型事迹；新宁县窦家湾村、华池县城壕村 3 年多未有大的疾病流行，婴儿成活率达 98% 以上，获边区特等卫生模范村称号；新正县农民郭德林全家 4 年无人生病，被评为卫生模范家庭，《解放日报》分别作了报道。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陇东根据地的文教卫生事业得到了全面发展。陇东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创和发展，不仅仅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而且以其卓著的成绩和鲜明的特点，为陇东老区乃至全国新文化运动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第五节 陇东根据地的历史功绩

一、陇东根据地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西大门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庆阳各级党政组织正确贯彻党在抗战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为团结抗战、巩固后方、发展经济、支援前线作出了优异成绩，成为建设陕甘宁边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示范区。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可以说陕甘宁边区的安危直接关乎抗战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前途。这里东临天堑黄河，北接广袤沙漠，西南是防御的重点。陇东分区是边区的西大门，关中分区是边区的南大门，是保卫边区和党中央安全的前沿阵地，所以陇东根据地始终居于特殊而重要的战略地位。

军事建设始终是陇东根据地最主要的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保障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后改为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并派三八五旅驻防庆阳。在留守红军和八路军的帮助下，根据地各级党政组织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使抗日民众武装和自卫军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分区成立了保安司令部，各县成立了保安大队，保护交通要道，锄奸反霸，揭露和打击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维护地方治安，战时配合主力作战，担架运输，护送伤员。这些抗日救亡运动，给前方抗战以有力支持。

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妄图以武装进攻蚕食根据地，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军政组织。陇东分区既是边区“反磨擦”的主阵地，又是保卫陕甘宁

边区的第一道防线。陇东各级党委、民主政府和八路军陇东留守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关于"陇东工作应在不破裂整个统一战线的总原则下,扩大独立自主的工作精神"及党中央、毛泽东关于"陇东、关中对边区关系很大,我们不能让步"的指示,坚持自卫原则,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在中共中央、边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八路军留守部队及陇东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入"反磨擦"斗争,将国民党部分县、区的反动势力"礼送出境",在庆阳、合水、镇原3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陇东"反磨擦"斗争的胜利,结束了国共两党政权同时在陇东各县并存的局面,陕甘宁边区的行政区划得到巩固和统一,保证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安全。

二、陇东根据地是陕甘宁边区的主要后勤保障基地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首当其冲。陇东根据地是边区一块可靠、巩固的大后方,一方面要承担抗战物资和经费的供给,另一方面又要加强自身的巩固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巩固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陇东根据地深入人心,民族抗战意识不断增强。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和巩固,各界抗敌后援会及各种抗日组织的建立,抗日民众武装自卫军的扩大,抗日宣传的广泛与深入,都有力地支持了前方抗战。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坚持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陇东抗日根据地人民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认真执行党中央的"十大政策",在经济建设上实行减租减息、互助合作,调整了土地政策,改善了各阶级的关系,努力发展生产,开展生产自救,从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全力支援抗日前线。根据地人民踊跃交纳救国公粮,帮助部队运输给养,捐物捐钱慰劳将士,自愿报名参军参战,安置优待移民难民,尽其所能地支援抗战。

在陕甘宁边区,陇东和关中分区是产粮较多、经济相对较好的地

区。占陕甘宁边区总面积30%、总人口五分之一的陇东根据地，是当时闻名边区的"陇东粮仓"。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当局对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央及边区机关10多万人的供给十分困难，还要给前方运送粮食及各种物资。陇东根据地人民以抗战大局为重，努力克服困难，为支援边区、支援前线，积极踊跃地缴纳救国公粮。陇东根据地党政军民还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全面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与此同时，八路军三八五旅所属各部队、抗大七分校等也在陇东摆开了大生产的战场，创造了雄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大生产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成果，一方面供给支持了边区，一方面为抗日前线提供了大批物资，使陇东成为特定时期重要的物资供给基地，为支援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陇东根据地是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

抗战时期，边区的凝聚力来自党的群众路线。陇东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和工作人员中形成的密切联系群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成为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楷模。1943年春，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华池县县长李培福被树立为陕甘宁边区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毛泽东为他们分别题词"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忠心耿耿，为党为国"、"面向群众"，给予了高度赞扬，为模范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树立起了一面旗帜。

四、陇东根据地是建设陕甘宁边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示范区

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互相配合，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对坚持长期抗战直至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陕甘宁边区是敌后抗战的总

后方，创建陕甘宁边区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全边区军民的首要任务。陇东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政府始终模范执行党中央所制定的指导抗日战争以及解放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基本政策，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教育的全面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许多新思想在这里涌现，许多新经验在这里创造。陇东根据地成为抗战时期全国最文明、最进步的地区之一，在创建陕甘宁边区模范抗日根据地并使之成为新中国雏形的过程中，发挥了宝贵的实验、示范和带头作用。

（一）陇东根据地是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制度的实验地

抗日根据地的建设首先是政权建设。陕甘宁边区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榜样，陇东根据地则是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制度的实验基地。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等法规颁布后，陇东的苏维埃政权即从各方面向抗日民主政权转变。在接着开始的第一次民主普选运动中，陇东成为陕甘宁边区最早实行民主制度的区域之一。1940年3月，党中央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原则。陕甘宁边区首先在陇东、绥德两个分区进行试点。到1945年10月，先后经过三次民主普选，"三三制"原则在陇东得到了自下而上普遍彻底的贯彻。陇东分区的普选，曾多次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表扬，民主化建设的经验曾在全国各根据地推广，为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二）陇东根据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孕育地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形势和边区建设的需要，陇东根据地较早地开创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文化事业，并以其卓著的成绩和鲜明的特点，为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新文化运动增添了光辉篇章。抗战开始后，陇东根据地先后创办了《陇东报》《民众先锋》等20多种报刊，宣传革命真理，教育、鼓舞人民和打击敌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陇东根据地的文化活动更是充满生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此期间，延安一批专业文艺工作者深入陇东挖掘素材，创作了小说、诗歌、戏剧、通讯等许多载入文

学史册的优秀作品。《刘巧儿抗婚》故事轰动了陕甘宁边区，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和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诞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有力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庆阳民歌，被誉为"黄土歌魂"。在数以万计的歌颂党和人民领袖的红色艺术经典歌曲中，从陇东根据地革命沃土中诞生并迅速唱红陕甘宁边区、响彻中华大地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绣金匾》《军民大生产》三首民歌，对于宣传革命、瓦解敌人起了巨大的作用，成为经典之作，至今传唱不衰。

（三）陇东根据地是新中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发源地

1943年，陇东分区专员公署专员、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马锡五在司法实践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通过审理华池县"封芝琴（刘巧儿原型）婚姻案"等典型案件，逐渐形成独特的审判方法，党中央、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称他的审判方式为"马锡五审判方式"。其基本特点是注重调查研究、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诉讼手续简便易行、实行审判与调解相结合。马锡五审判方式与历来的"坐堂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所带来的司法廉洁和司法便利之风使人耳目一新，甚至受到国民党统治区司法学家的赞扬。马锡五审判方式不仅作为民事诉讼，而且作为整个陕甘宁边区司法工作的原则在各解放区广泛推行，标志着新民主主义诉讼制度的确立，从而使解放区的司法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解放区的法制建设树立了一面旗帜。马锡五审判方式对中国法制史和人民司法制度影响深远，它是中国法制史和人民司法实践中惟一以人名冠名的审判方式，时至今日，这一闪烁着党的群众路线光芒的审判方式仍对人民司法实践起着十分重要的启迪和指导作用。而封芝琴这一典型婚姻纠纷案例，成为当时边区的特大新闻，轰动了陕甘宁边区。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陇东各级党政组织正确贯彻党在抗战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为团结抗战、巩固后方、发展经济、支援前线作出了优异成绩，成为建设陕甘宁边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示范区，为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其历史功绩彪炳史册。



第四编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庆阳的活动

（1945年8月—1949年10月）

第十五章 党在陇东解放区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第一节 陇东解放区的民主运动与民主政治建设

一、抗战胜利后陇东的形势

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领导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国人民历经8年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传来，历经磨难的陇东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以各种方式欢庆这一伟大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内战两种可能性并存。为了粉碎国民党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专政，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企图，领导人民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分析了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提出了斗争策略，为中国共产党党内应对内战作了思想准备。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全面阐明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及和平建国的六项紧

急措施。由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方针和措施适应了当时的形势需要，因而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蒋介石在垄断受降权利、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同时，向东北、华北、中原等战略区调集大量军队，包围解放区，准备点燃内战之火。同时为了欺骗人民和世界舆论，在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商谈国事"。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真面目，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随后决定派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飞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经过43天的谈判和会内会外的交涉与斗争，终于同国民党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被迫签订了停战协定。1月13日，国共双方各自下达命令，"停战协定生效"。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经过反复协商，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宪法草案、军事问题等五项协议。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表明，虽然国民党并没有停止内战的准备，内战危险依然存在，但国内"和平民主"的局面已初步形成。

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6年6月下旬全面内战爆发，在这10个月内，虽然国共双方武装冲突时有发生，但政局总体还是相对和平稳定的。在陇东，这种相对和平的时期还要长一些，基本上延续到了1947年2月底，即国民党开始对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为止，总共有1年半时间。但在这段时期，由于陇东解放区是陕甘宁边区的西大门，三面临敌，国民党顽固派对解放区的军事包围仍然有增无减，政治经济封锁更为严密，特警破坏日趋加剧，在接壤区的武装挑衅日益频繁。陇东解放区军民深明大义，为贯彻中共中央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双十协定"、《停战协定》签定之后，陇东分区和各县都召开群众大会，热烈拥护"两协定"，欢庆政协会议的召开和政府组织、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的通过，决心与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

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在思想上，中共陇东地委及时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学习中共中央先后发表的《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关于日本投降后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指示》等重要文件；学习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的演讲和报告，以及连续发出的一系列党内指示。在全区广大党员中开展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既坚持和平建国又准备打仗为内容的思想教育活动。在政治上，陇东地委继续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开展和平民主运动，注意做国民党基层保甲人员、党务警特人员及社会名流、各类军队（包括土匪武装）官兵的统一战线工作；坚持贯彻"三三制"民主原则，进行乡、县、边区三级大普选，原任参议员、政府委员，不论出身、党派、信仰如何，只要不赞成内战，坚持进步与民主，一律重新当选。在经济上，大力医治战争创伤，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减租减息，努力发展生产，建设新家园。在军事上，迅速进行军队整编，巩固后方，准备迎接国民党挑起的内战。在党的建设上，陇东解放区所属各县的组织与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组织紧密联系，分工协作，共同开展工作。

二、甘肃工委的恢复及其活动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甘肃的各级组织及其领导下的各级政权、军事、群众团体组织全面巩固，迅速发展。党组织分为两大系统：一是陕甘宁边区所属陇东分区和关中分区所辖甘肃境内的中共组织；二是中共甘肃工委恢复后，在甘肃国统区相继恢复和建立的中共组织。在中共甘肃工委领导下，党的甘肃地下工作全面展开并得到了迅速发展。

（一）甘肃工委的恢复

中共中央和中央西北局十分重视甘肃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曾先后发出《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文件》《中

央关于蒋管区群众斗争的指示》《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等重要指示，采取措施恢复党在甘肃国统区组织，使国统区人民的爱国民主斗争在党的领导下，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抗战胜利后，为加强对甘肃国统区工作的领导，粉碎国民党的进攻，配合西北战场的军事斗争，中共中央于1945年9月在陇东地区（庆阳）恢复了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甘肃工委），负责开辟甘肃、宁夏两省国统区党组织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由中共陇东地委副书记朱敏兼任甘肃工委书记。甘肃工委是解放战争时期党在西北国统区最早恢复的组织，下设组织、宣传、军事、社会等4个工作部门。此时，由于原甘肃工委主要领导与骨干在"抢救运动"后尚未甄别平反，与国统区各级党组织及党员的联系长期中断，情况不明。甘肃工委恢复后的半年内，由于工委机构不健全，恢复工作只在边区周围进行，工作进展不大。1946年春，中共中央西北局将原甘肃国统区党组织负责人孙作宾、陈成义等陆续派来庆阳，参加甘肃工委的领导工作。3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孙作宾任甘肃工委副书记，陈成义任工委委员。12月，西北局为进一步开展甘肃工作，健全工委领导机构，又决定由孙作宾任甘肃工委书记，工委委员陈成义任组织科长，陆为公任宣传科长，丁志明任军事科长，薛浩平任社会科长，刘仁达任秘书长。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西北局又先后增派徐国珍、黎光、李培福为工委委员。中共甘肃工委的恢复，加强了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的领导，初步打开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局面。

（二）甘肃工委的主要活动

甘肃工委恢复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十分重视对党在甘肃国统区工作的指导。1946年6月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针对内战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向陇东、关中地委及甘肃各工委发出《对目前国民党区工作紧急指示》，指出目前内战危机日趋严重，为了打败蒋介石对边区人民及西北民主势力的进攻，各地委、工委应紧急动员起来，集中所有力量，采取一切办法，加紧与有效地开展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尤其是军事工作，保卫陕甘宁边区。此指示发出后，中共中央西北局

又派人到临洮、渭源、陇西、徽县传达西北局指示，部署各项工作。

1946年6月底，国民党统治集团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驱动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对陕甘宁边区的武装挑衅也不断加剧。为了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配合西北战场的军事斗争，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迅速推动党在甘肃的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于7月24日召开了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甘肃地下党工作，指出全面内战已经爆发，陕甘宁边区面临着敌军大举进攻的局面，全边区军民应紧急行动起来，坚决保卫边区，打退敌人的进攻。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要求大力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内的中共组织，在可能开展游击战的地区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为实现这一目标，甘工委和陇东地委于8月中旬决定立即组建中共陇南特委和陇南游击队，同时成立中共华平和平西两个工委及其领导的武装。要求三个特(工)委及其武装在8月底前打出边区，与中原突围到达陇南的三五九旅互相配合，建立陇南根据地。由于三五九旅先于8月29日进入陕甘宁边区，三支武装力量打出边区后失去军事策应，途中又遇数倍敌军的围追堵截，遭受损失，中共陇南特委、平西工委及其武装被迫于9月中旬返回边区。9月下旬，陇南特委、平西工委撤销。10月初，华平工委返回边区后，改为中共平东工委。同年12月8日至1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再次召开会议，研究甘肃党的工作，印发了《西北局讨论甘肃工作的记录》。会议调整了甘肃工委领导成员，提出了发展革命力量，开展武装斗争的总任务，并确定"目前甘肃工作的总方针是放手发展隐蔽力量，准备开展游击战争"。甘肃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级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考察党员状况，恢复原党员的关系，并积极发展新党员，重建各级党的组织，使党在甘肃国统区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

1946年11月至1948年11月，甘肃工委在陇东地委的配合与帮助下，从恢复党在陇南的组织中共徽县工委入手，新开辟了陇右地区党的组织工作和武装斗争，组建了甘南民变工作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创建陇渭工委，恢复和建立了平东工委、皋榆工委、海固工委以及

宁县直属工委，接通了清水、武山等地的组织关系，使地下党的活动遍布于除河西以外的整个甘肃国统区。同时，建立了一些地下交通线，传递情报，掩护和护送从兰州、西安等地进出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干部和知识青年。仅从镇原、合水这条交通线护送出入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就达900多人次。

国民党胡宗南等部侵占陇东解放区后，甘肃工委与陇东地委一起撤至华池悦乐、元城、山庄一带，坚持以陇东为基地，把党的工作向国统区推进，领导全区乃至全省的爱国民主斗争，发动和领导国统区的兵运、工运、学运、农运及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和抗丁、抗粮、抗税斗争，继续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其中陇右、平东、皋榆、海固、宁县等地方工委就是在这期间建立的。这些工委及其党员在全省各地建立游击队，搞兵运，反抗国民党政权，袭击国民党驻军，并领导全省各族各界人民反对国民党的残暴统治，组织抗丁、抗税斗争，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在正面战场的斗争。1947年3月13日，宁县工委领导的白区武工队，在郭家胡同全歼国民党政府军新一旅1个营，受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的通令嘉奖。是年春，宁县工委派人与国民党县、镇和各阶层建立秘密联系。国民党县、镇部门43人及自卫队长以上10人，与工委保持秘密关系。

1948年11月，甘肃工委召开了工委扩大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逐渐转向城市，要求各地大力加强统战工作、民族工作、群众工作和情报工作。会后，党在国统区的组织迅速发展，全省各地相继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当人民解放军进入全面的战略反攻阶段后，甘肃工委又全力支援陇东沦陷区的收复和向甘肃国民党统治区推进。1949年1月，甘肃工委在华池县元城子东沟举办"新区干部训练班"，为接管新区培训干部。5月，以新区干训班教导队为基础，成立干部学校，为将要接管的新区配备干部。到6月，中共甘肃工委已在全省42个县市中建立有党的组织，下辖地级工委5个，县级工委17个，区工委30个，党支部1300余个，地下党员达到1.6万多人，比1948年底增加了一倍多，使党的力量基本上遍布全省各地，工作

渗透到各阶层。与此同时，党领导的地方武装也迅速发展，除皋榆工委外，各工委都建立了自己的游击队；党的统战工作、群众工作、少数民族工作亦得到全面加强，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解放甘肃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开始进军甘肃，甘肃工委随军西进。7月2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以甘肃工委为基础成立了中共甘肃省委。

三、陇东解放区党的组织建设

抗日战争后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陇东分区党的组织得到普遍发展。在广大农村，普遍以乡为单位建立了党的支部；在机关、单位、学校，有3名以上党员的地方，都建立了党支部。有些地方支部以下还设了小组。经过整风运动，陇东分区广大党员队伍的政治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到解放战争时期陇东各级党组织更加巩固。陇东党组织领导陇东人民为保卫家园和支援西北解放战争乃至全国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党在陇东建立的地方组织可分为三部分：一是陇东分区所辖党组织，二是关中分区所辖新正、新宁县的党组织；三是1945年9月甘肃工委恢复后，所属陇东国民党统治区的宁县工委和镇固工委。到1947年2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攻陇东前，陇东党的组织机构及其所属县、区组织发展概况是：

（一）陇东分区所辖党组织

从抗战胜利到1947年2月，中共陇东地委书记先后由段德彰、李合邦担任，李合邦、朱敏、王月明任副书记。中共陇东地委隶属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驻庆阳县城（1947年2月后，地委机关转移到华池境内）。

地委工作机构有：秘书处，秘书长白向银；组织部，部长陈致中（后王德明）；宣传部，部长高郎亭（后李合邦），副部长宋养初；统战部，部长朱敏（后孙作宾），副部长刘文山、孙作宾；《陇东报》社，社长

兼主编王作易，副社长兼副主编景昌之。1946年5月增设社会部，部长王德明（后李握如），副部长黎光。

陇东地委所辖区以上党组织概况：中共环县委书记李世臣，县委先后设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社会部5个工作机构，辖环城、洪德、虎洞、耿湾、毛井、车道、甜水7个区委；中共曲子县委书记刘国声（后王邦宁），县委先后设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4个工作机构，辖八珠、曲子、天子、合道、木钵、土桥、马岭、演武8个区委和曲子市委；中共华池县委书记贺建山，县委先后设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3个工作机构，辖白马、柔远、悦乐、温台、元城5个区委；中共庆阳县委书记刘泽西，县委先后设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青委会、妇委会6个工作机构，辖高迎、新堡、三十里铺、赤城、驿马关、桐川6个区委和庆阳市委；中共合水县委书记李子川（后高锡堂），县委先后设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社会部、青委会、妇委会7个工作机构，辖城区、西华池、店子、太白、肖嘴、盘马6个区委及西华池市委；中共镇原县委书记万成章（后刘文山），县委先后设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青委会、妇委会6个工作机构，辖孟坝、柳州、石佛、马渠、新集、三岔、王寨、交口河、太平、万安10个区委。

（二）关中分区所辖新正、新宁县的党组织

解放战争时期，新正、新宁2县隶属关中（三原）地委及专署领导。1946年1月国民党胡宗南部侵占新正县的三嘉、马栏、湫头和新宁县的月明、西坡等地。5月，新正、新宁人民在关中地委、专署的领导下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根据中央指示以保佃为主，适当照顾了各阶层利益，并积极开展练兵，回击敌人。

关中分区新正、新宁县所辖区以上党组织概况：中共新宁县委书记李科（后李笃信），县委先后设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3个工作机构，辖湫头、三嘉及后属陕西的杨坡头、湫坡头、底庙、马栏6个区委；中共新宁县委书记惠世恭（后李科），县委先后设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3个工作机构，辖九岘、金村、湘乐、盘克、宇村5个区委。

（三）中共甘肃工委所辖宁县工委、镇固工委组织概况

中共甘肃工委恢复后，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大力发展国统区党的组织，在可能开展游击战的地区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在陇东国统区加强了对宁县工委的领导。1947年8月，由甘肃工委所属平东工委负责在镇原西南与固原、平凉交界地区组建了中共镇固工委。在甘肃工委领导下，宁县工委、镇固工委加强了党在国统区的各项工作，积极组织武工队、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

中共甘肃工委所辖宁县工委、镇固工委组织概括：中共宁县工委书记白生彩，县委设组织部、宣传部2个工作机构，辖宫河、平子、春荣3个区委；中共镇固工委书记高俞修，负责镇原西南、固原东南及平凉草峰部分地区地下党的工作，下属38个支部，703名党员。

（四）陇东党组织的思想教育和整改工作

抗战胜利后，陇东党、政、军及统一战线和群众团体组织都得到快速发展壮大。内战爆发前，陇东各级党组织领导人民一方面积极争取和平民主，另一方面认真做好粉碎国民党进攻、保卫家园的战斗准备，并全力配合主力部队自卫作战。其间，中共陇东地委坚决贯彻中共中央、中央西北局关于党的建设的一系列决定、决议和指示，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有力保证了党对革命战争的坚强领导。

在自卫战争准备阶段，陇东党组织在全区广大党员中开展了以战备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教育活动。1945年12月15日，陇东地委向全区各级党组织发出《关于目前形势和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对战备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使全区党政军民认清时局，投入紧张的战备工作。从1946年1月开始，国民党陇东当局为配合胡宗南、马步芳部进攻边区，开始了对陇东解放区的骚扰和破坏。从此，陇东解放区由相对和平稳定阶段转入自卫战争阶段。陇东各级党组织领导人民一方面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方面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广泛深入地宣传活动。陇东地委与专署在领导全区积极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和建党建政工作的同时，在各县普遍进行了学习军事技术及民兵训

练工作，并动员群众坚壁清野，为保卫家园做好自卫准备。

为使各级党组织在自卫战争爆发后能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陇东党组织在向全体党员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认真加强自身建设和党务工作。1946 年 3 月 16 日，中共陇东地委组织部发出《关于支部改选工作的意见》，要求通过改选加强基层支部的领导力量和党务活动。在支部改选工作中，要求彻底检查支部工作，审查党员，选出好的支部领导；通过支部改选加强党员思想教育。这次改选支部工作历时 3 个月，改选后全区共有农村支部 248 个，改选过程中审查登记党员，全区党员达到 5000 多名。9 月，根据边区政府的指示，针对分区机关庞大、机构重叠、行动不便等状况，分区党政机关适时地进行了整编精简，工作部门减少三分之二。11 月，中共陇东地委组织部对全分区干部进行了审查登记，整顿了干部队伍，准备迎接内战的到来。

四、陇东解放区的第三次普选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并为此作出了实质性努力。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新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边区政权的民主建设。陇东分区按照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统一安排，继抗战时期开展的两次普选运动之后，又进行了第三次普选运动，进一步加强了政权的民主化建设，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团结局面的形成。

1944 年 12 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作出关于进行边区第三次三级（边区、县、乡）民主普选的决定，并责成边区政府组织好这次普选。根据边区参议会的决定，1945 年 2 月 28 日，边区政府召开政务会议讨论了边区第三次选举事宜，并决定聘请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各民族人民代表及劳动英雄 11 人组成选举委员会，由谢觉哉任主任，刘景范任副主任（后任主任），领导这次选举工作。8 月 4 日，边区政府再次召开政务会议，要求各分区选择一个乡先行试点，

以取得经验，并决定从延安大学行政系及其他机关、学校抽调一批干部，开办短期选训班，然后分赴各地协助选举工作。会后，陇东专署组建了普选试点工作团，安排专人带领6名干部在庆阳县高迎区三乡进行了普选试点，总结经验。

边区政府在总结过去两次民主选举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和任务，在九、十月间先后发出几个重要文件，规定了这次民主选举的指导原则和方针。其中1945年10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发出的《关于今年乡选工作致各专员、县（市）长的信》，强调在选举运动中要认真贯彻"三三制"的精神，并要求各级政府要充分发扬民主，团结人民；放手发动群众，检查政府工作和人员；教育干部，整顿作风，改进工作，自由选举，选举好人；健全民主制度，加强地方自治。同时还根据试选乡的经验就如何贯彻选举方针、进行宣传鼓动、开好代表会、加强选举工作的领导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

10月中旬，边区政府派出80多名干部，组成11个工作团分赴各分区和县协助工作，选举工作在边区各县普遍开展。陇东各县（市）都举办了区乡干部和选举工作人员的训练班，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有关选举工作的文件，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初步检查了政府工作。随后，边区选举工作团与县区选举工作人员深入到乡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乡选工作。每个乡的选举工作，大体上都要经过宣传政策、登记选民、检查工作、改选代表（县和边区为参议员）与选举政府领导成员四个步骤，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检查政府工作和选举代表。

检查政府工作的方法是乡政府向选民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不仅要讲政府为人民做了什么事，有什么成绩，而且要讲有什么困难和缺点。不仅乡上的干部这样做了，而且许多县上的领导干部也在村民或乡代表会上这样做了。代表的选举以自然村为选举单位，在检查工作结束后进行。为了贯彻"自由选举，选举好人"的方针，乡代表候选人的产生采用选民"自由提出，经过民主讨论，集中表决"的方式进

行:正式选举采用差额选举的办法,候选人一般不超过应选人的二倍。乡代表选出后,乡上即召开乡代表会议。乡代表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并决定今后的工作和选举乡长两件大事。

乡选的同时,各乡按照规定的名额选出了县参议员和边区参议员。在乡选的基础上,各县先后召开了新选的县参议会。各县参议会的程序一般都是听取和讨论县政府的工作报告,审查代表的提案,并通过相应的决议;选举县参议会的正副议长及常驻议员和新一届县政府领导成员。

为了使这次普选活动顺利地在陇东开展,陇东分区专员公署及各县非常重视对选举工作的组织领导,在选举试点的基础上,专门召开各县长联席会议,传达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关于今年选举工作的训令》,讨论各地在普选时应注意的问题。各县分别召开了区委书记、区长及县级干部扩大会;区召开乡级干部会。层层讨论、布置选举工作,并普遍进行试选活动。在试选取得经验后,从10月初到12月初,各县召开了乡人民代表会,选举产生了乡长和出席县参议会的议员。

12月25日,陇东分区各县及新正县、新宁县的普选工作完成。经统计,开展选举的共有49个区、307个乡、848个行政村,3003个自然村,60361户、330719人。陇东分区各县及新正县、新宁县通过普选,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相继改为人民政府。各县人民政府成立情况是:

新正县人民政府。1945年10月,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改为人民政府。1946年1月7日至13日,召开了三届一次参议会,选举郭廷藩为县长,徐长甲、杨宗耀为常驻议员。辖杨坡头、湫坡头、底庙、马栏、北极、新民(以上今属陕西省管辖)、湫头、三嘉8个区政府。

新宁县人民政府。1945年9月,新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改为人民政府。1946年1月7日至13日,在梁掌召开第三届参议会,选举王立成为县长,何聚财、张贵元为正、副议长。辖九岘、金村、湘乐、盘克、宇村5个区政府。

曲子县人民政府。抗战胜利后曲子县抗日民主政府改为人民政府。1946年1月21日至27日，在曲子镇召开第三届参议会，选举李正林为县长，王邦宁、郭兆林为正副议长。辖八珠、曲子、天子、合道、木钵、土桥、马岭、演武8个区公署及曲子市政府。

环县人民政府。抗战胜利后环县抗日民主政府改为人民政府。1946年2月12日至18日，在环城召开第三届参议会，选举陈聚奎为县长，王保民、韩正平为正、副议长。辖环城、洪德、虎洞、耿湾、毛井、车道、甜水7个区公署。

镇原县人民政府。抗战胜利后镇原县各级抗日民主政府改为人民政府。1946年2月9日至15日，在孟坝镇召开了二届一次参议会，选举王子厚为县长，李焕章、杜洪源为正、副议长。辖孟坝、柳州、石佛、马渠、新集、三岔、王寨、交口河、太平、万安10个区政府。

华池县人民政府。抗战胜利后华池县抗日民主政府改为人民政府。1945年2月12日至18日，在悦乐召开第三届参议会，李生华当选为县长，庞宪章、高明山为正、副议长。辖白马、柔远、悦乐、温台、元城5个区公署。

庆阳县人民政府。抗战胜利后庆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改为人民政府。1946年2月12日至18日，在庆阳县城召开二届一次参议会，选举杨福祥为县长，田玉亭、蔡德旺为正、副议长，刘宪庭、田仲祥、李兴旺为常驻议员。辖新堡、三十里铺、赤城、高迎、桐川、驿马6个区公署和庆阳市政府。

合水县人民政府。抗战胜利后合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改为人民政府。1946年2月16日至20日，在老城镇召开三届一次参议会，选举张云山为县长，雷庆地、杨正甲为正、副议长。下辖城区、西华池、店子、太白、肖咀、盘马6个区公署及西华池市政府。

陇东解放区的第三次民主普选，不仅实现了解放区抗日民主政府向人民政府的职能转变，而且促进了解放区的各项工作。首先，普选充分保证了人民的民主权利，调动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普选中村民参加投票的人数达到82.5%，曲子、环县等地区达到了

87%，镇原三岔回民乡达到了100%。投票方式灵活多样，便于群众理解和接受，并注意动员妇女参加选举工作。普选坚持"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使各阶层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和公正人士被选进各级政权中来。陇东各县选出的6041名（缺华池县）乡代表中，有工人21人，贫农3497人，中农1313人，富农152人，地主41人，商人3人，其他各界151人；选出的304名（缺庆阳县）县参议员中，有工人4人，贫农127人，中农122人，富农26人，地主9人，商人5人，其他各界13人。同时，普选中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检查了地方工作。据统计，陇东分区各县群众提出关于政策、工作、干部作风方面的意见共有8734件，仅曲子县天子区900多户群众，其中378户占总户数40%群众提意见377件。在普选中选民选择自己信任的人到政府里面工作，淘汰了少数违背群众愿望、工作不努力、作风不正派的工作人员。庆阳、合水、镇原、华池、曲子、环县共有58名不胜任工作的乡长落选，有90名有能力、办事公道、受群众拥护的人当选。其次，普选中坚持了"三三制"原则，使一批非中共人士选进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构。1945年普选后，华池、环县、镇原、新正、新宁5县选出乡代表3724人，其中共产党员924人，只占25%；华池、合水、曲子、环县4县共选出县参议员179人，其中共产党员64人，只占36%。非中共人士占了相当比例。普选真正体现了"三三制"的民主精神，进一步团结了社会各阶层人士，扩大了民主政权的阶级基础。

在陕甘宁边区各县民主选举的基础上，1946年4月2日至27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召开。出席议员139人，其中陇东分区议员20人，关中分区所属新正、新宁二县议员8人。会议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刘景范为副主席，马锡五为高等法院院长。会议选举高岗为边区第三届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4月11日，《解放日报》公布陕甘宁边区各县县长、参议会议长名单。李鼎铭在题为《边区人民的伟大胜利》的报告中，对这次选举进行了总结，对陇东根据地的选举给予很高评价。

陇东解放区的普选，是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实践，丰富了陇东人民的民主政治生活，保障了人民的人权、财权和民主政治权利，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密切了中国共产党和各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之间的合作，巩固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得到了各阶层的衷心拥护。陇东解放区的民主选举，对全国和平民主运动也有着重要影响。

五、陇东人民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希望有一个和平建设的局面，休养生息，治疗战争创伤，因而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表示强烈的不满，掀起了大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而国民党对人民的正当要求却进行镇压，连续制造了昆明一二一惨案、重庆较场口事件、南京下关惨案等，并派特务暗杀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

国民党在镇压全国民主运动的同时，也加紧了对甘肃人民的黑暗统治。1945 年 10 月，国民党政府为了粉饰其独裁统治，在甘肃进行参议会选举，组成了维护其反动统治的新工具。国民党特务还采取恐怖手段，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946 年 2 月 25 日，国民党特务在兰州沙沟监狱秘密杀害了关押达 6 年之久的中共甘肃工委副书记罗云鹏等人。

针对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活动，陇东各界群众开展了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1945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发表后，陇东解放区各界人士认为，《宣言》是建设新中国的“路标”，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大公无私和真诚的，是为中华民族、全国人民谋利益的。9 月 18 日，关中分区的工会、农会、青联会、妇联等群众团体，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要求严惩汉奸卖国贼，扫除和平建国的障碍。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陇东分区、关中分区纷纷举行群众集会，表示要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敦促国民党认真实行政治协商会议作出

的各项决议。11月17日，西北局宣传部召开会议，决定宣传方针以“坚决反对内战、保卫边区、建设边区、争取全国和平建设新时期到来”为中心内容。

在陇东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影响下，早就向往边区民主生活的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学生掀起了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6月16日，西峰镇发生国民党100多名驻军官兵闯入庆阳师范学校暴力殴打学校师生和市民的严重流血事件，造成20多人身受重伤，100多名师生和群众受轻伤，学校设备财产被砸毁。这就是“六·一六”庆阳师范学校流血事件。事件发生后，国民党驻军为掩人耳目，声称庆阳师范有共产党分子搞破坏，并扬言要查出共党分子，进行惩处。

庆阳师范学校流血事件的发生，引起西峰镇和陇东国民党统治区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应。陇东各界群众纷纷声讨国民党部队的残暴行径，支持庆阳师范师生的抗暴斗争。候补“国大”代表田绍玺、陇东教育界名流杨正甲等发表言论，声援庆阳师范师生，痛斥国民党部队的暴行。庆阳师范师生罢课两周、西峰商界罢市一周以作抗议，各县学校师生也纷纷表示声援。边区《解放日报》《陇东报》等及时报道了这次流血事件，揭露反动军队的残暴行径，声援西峰师生和革命群众的正义斗争。陇东中学师生还直接致函庆阳师范学校，慰问受伤师生，捐赠医疗费8500元(法币)。由于得到边区和国统区广大群众的声援和支持，庆阳师范师生的反抗斗争最终迫使国民党驻军换防，撤离西峰。

陇东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也影响到国民党爱国官兵。1946年，在镇原境内发生了两起国民党爱国官兵起义。1946年1月，胡宗南部第二十五师五十四团1个班在太平镇起义，奔向解放区。此后，胡宗南部第九十七师1个团由黑渠口开往宁夏盐池，途经马渠时，团长马海涵带领20多人起义，投奔解放区。类似情况，在正宁、合水、庆阳各县境内都有发生。解放区军民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热烈欢迎起义者，并给予妥善安排。愿意参加人民解放军的编入部队，愿意

回家的发给路费。这些做法，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

第二节 陇东解放区的生产运动

一、土地改革工作

加强解放区建设的中心问题，是根据广大农民群众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领导农民废除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土地制度改革，把地主占有的大量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摆脱几千年来的封建压迫和剥削。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根据地普遍进行了减租减息运动，但各地减租减息工作进展很不平衡，抗战胜利后又有少数地主采取各种手段，变相提高租额，拒不减租或明减暗不减。因此，在陇东解放区的部分地区，地主对佃农剥削的情况还比较严重。这种情况既打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又严重妨碍着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为了适应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陇东解放区初步开展了减租清算、土地征购等土地改革工作。

（一）减租清算

减租清算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在解放区实行的土地改革政策的一项主要内容。在陇东解放区，是继土地革命时期进行土地改革后的又一次重大的土地改革措施。

1945 年 12 月 15 日，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指出，要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借以激励大多数农民的革命热情。1946 年 5 月 4 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清算减租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剥削，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并强调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

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党应坚决拥护群众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的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7月2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依据《五四指示》精神，制定了《关于减租和查租的指示》，要求“在减租已较彻底的绥德和关中一带，应以复查和保佃为主；在减租尚不彻底不普遍的陇东庆阳、合水、镇原一带，应以减租、退租、勾欠、换约、保佃为主”。[①] 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分配过土地的曲子、环县、华池3县及新宁、新正的另一部分地区，则以复查保佃为主，土地所有权一般不动。随后，边区政府派出3个工作组，分赴陇东、绥德、三边分区各县进行复查保佃工作。

陇东分区在边区政府工作组指导下，组织了5人委员会，由陈致中、白向银、李培福、刘泽西等人参加，专门研究复查减租工作，并派干部在庆阳县的几个区进行调查。经过1个多月的调查试点工作，取得了基本经验，讨论制定了17条政策。然后，在庆阳、合水、镇原等县全面展开减租清算工作。坚持个别清算与一般清算相结合的原则，规定一般退租从1940年算起，个别恶霸地主从1937年起退；没钱粮清退时可折成土地或财产；清查地主来历不明的土地，退还原主；原佃户有当、买土地的优先权；站年汉[②]已结为夫妻者可分得一份土地，力争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都可以得到在数量、质量上大体相当的土地。

庆阳、合水、镇原在复查清算工作中根据不同情况，采取诉苦清算、说理斗争和协商等方法，保证了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3县清算工作从1946年8月开始，到当年11月完成，历时4个月。3县的2240家佃户，从169户地主（清算53户，彻底减租116户）手中收

①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6页。

② 站年汉是陇东地区的一种婚姻习俗，即青年农民无偿地为有女无儿的家庭劳动3年，可与该家女子结为夫妻，并分得一份田产。

回过去多交的租子折合土地55980亩，其中买地45400多亩，当地9242亩，赎地263亩，夺回被霸占地1075亩。每家佃户平均获得土地25亩。同时得到粮食512.2石，牛54头，驴64头，羊247只，窑洞583孔，法币305566元；勾欠粮食约计219石，牛6头，羊60只，银洋20元，法币11850元。

在减租较彻底的新正县，查租清算工作尚未展开，就遇上敌军进犯。新宁县查租清算工作主要在湘乐、盘克、宇村3个区进行，农民共得土地11492亩，窑洞132孔，粮食14.55石，银元22个，财物有石磨、石槽等共83件。

减租清算运动，使农民重新得到了失去的土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激发了陇东人民保卫边区、保卫家乡的革命热情。

（二）土地征购

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超额土地，是解放战争时期采取的又一项土地政策，在陇东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进程中，曾产生了一定影响。

1946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为实现耕者有其田向各解放区政府的提议》和《关于研究答复制定土地政策中几个问题的指示》，提出采用土地公债形式征购地主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农民，以实现耕者有其田。9月2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试行土地公债办法草案》。11月上旬，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三届二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征购地主超额土地问题。12月2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28日，边区政府又在给各分区的指示信中要求"陇东分区之庆、合、镇三县，安边、鄜县及关中分区各县未分配土地地区，应在继续发动群众，深入查租的基础上，进行征购分配，务须于明年春耕之前彻底完成土地改革"①。

1946年底至翌年初，陇东解放区进行了土地征购运动。陇东分区先后在庆阳新堡区三乡、合水城关区板桥乡进行了试点。1946年12月24日至1947年1月9日，中共中央派康生、陈伯达、胡乔木、马

①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03－204页。

文瑞等到庆阳县高迎区六乡(王家塬乡),开展诉苦清算与土地征购工作试点。陇东地委书记李合邦、分区副专员李培福以及庆阳县、区、乡的干部参加了试点工作。庆阳高迎区六乡共有人口1033人,耕地9793亩,有540人无地或少地,17户地主拥有土地占全乡总耕地面积的54%,地主王轩一家有地2000亩,佃户40户。土改工作组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清算减租征购土地,共征购土地1900亩,分配给了68户无地及22户少地的农民,颁发了土地证,使全乡97%的土地为农民所有,群众对此非常满意,一致要求将王家塬改名为"农民塬"。

12月间,华池县的悦乐、曲子县的马岭等区,着手清查土地,重点解决地主违法收回土地及农民间的地界纠纷问题。清查中,根据陇东地委《关于解决曲环华一些土地问题的决定》,凡地主非法收回的土地应全部归还农民,农民之间的土地纠纷视双方经济情况调解。凡土地革命时未经宣布分配的土地,除依法实行减租、退租、勾欠外,其超额部分以"献地"方法处理。华池县从33户地主手中共收回土地8556垧(每垧3亩),除留公地外,剩余7878垧全部分给了170户农民。悦乐区至1947年2月就有100多户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地4337亩、粮食33石、牛9头、羊236只、窑洞49孔、房37间。曲子县天子区共清查出9669亩土地,全部调剂给了65户佃农,人均22亩。马岭区三乡共调剂3713.5亩。试点中对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实行了"砍大树"的办法,对有出租土地的富农实行"割掉封建尾巴"的办法,除给其留足自耕部分外,其余土地全部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无"大树"可砍、无"封建尾巴"可割的地方,则在农民间相互调剂。工作组还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收回了三十里铺天主堂"洋地主"霸占的土地。

新宁县的九岘、金村两个老区主要是归地,在土地不大动的原则下调解农民间的土地纠纷。湘乐、盘克为半老区,进行了查租、退租,到1947年3月中旬,农民共得到土地11492亩,其中查租、退租、顶地1780亩,献地8070亩,清算1472亩,其他170亩。盘克区90%的地

主富农献出了多余的土地，无地少地农民户均得地16亩。湘乐区在清算地主庞永肖的大会上，佃户赵得奎、王清海等与庞永肖当面对质，算出1941年至1946年共多收租子90石，折地290亩，当场立了新约。1947年6月，关中分区抽调21名干部，帮助新宁县进行第二期土改，盘克区再次清算出地主赵孟贤超收租子97石；金村区清算出土地2900垧，窑洞153孔，都分到了农民手中。在土改斗争中，不少妇女冲破束缚，纷纷走出家门参加斗争。如地主宋百有的陈账老约，就是女佃户提供线索从羊圈里挖出来的。

开展土地征购工作，在减租基础上解决了土地分配不均衡的问题，调动了人民群众生产和支援战争的积极性，为进一步开展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

1947年1月，陇东地委决定在华池、曲子、环县实行土地改革，进一步解决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及其他土地纠纷问题。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了以马明方为团长、常黎夫为副团长的工作团，在曲子县马岭、庆阳县三十里铺一带开展土改。3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发动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先后侵占了陇东解放区的大部分地区，这项工作受到了严重干扰，但并未完全中断。当地党组织和政府仍利用战争间隙，在30多个乡继续进行土改工作，基本解决了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增强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为争取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发展生产，改善民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发动全面内战，继续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政治、经济封锁。国民党甘肃省政府颁布的《修正甘肃省封锁特区禁运物品暂行办法》，明令规定食用类6项、服用类3项、燃料类3项、医药类24项、五金类3项以及电器、文具、货币等对边区实行禁运，并禁止国统区与解放区的经济联系和生活往来。在边境要道上，设立盘查哨卡，拘押往来客商，盘查往来行人，企图断绝解放区

的物质来源。加之陇东地区1945年遭受严重灾旱，边区人民遇到了空前的经济困难。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陇东解放区采取多种措施，做了多方面的工作，积极发展生产、努力改善民生。

（一）发展农业生产

陇东解放区和关中解放区的新正、新宁两县，大部分区乡当时尚未进行土地改革。由于土地被封建地主阶级所占有，农民受雇工、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束缚了生产力；农业自然条件比较差，长期受干旱、霜、雹等灾害困扰，粮食产量低而不稳，人民生活仍很贫困。抗战胜利后，陇东地委、专署发动和组织群众，继续发扬大生产运动精神，大兴农田水利，扩大灌溉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全分区水地面积达到了111798亩，为保障军民生活和支援战争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陇东分区地域宽阔，人口较少，由于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连年征兵，多数青壮年应征入伍或参加革命工作，留下来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壮年劳动力已经不多，而且约占总人口一半的妇女又几乎全部缠了小脚，劳动受到影响，还有少数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不参加劳动生产，所以劳力缺乏是当时发展农业生产的突出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陇东专署提出“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任务”，使妇女成为生产建设的主力军。同时，继续加强“二流子”改造工作，并不断招引移民难民到解放区安家落户，开发建设边区。这些措施对发展生产和繁荣解放区经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继续广泛推行变工互助，提高劳动效率，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也为后来的农业合作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陇东分区各级政府还特别注意发动群众，开展劳动竞赛，培养各类先进典型，大张旗鼓地宣传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并给予表彰奖励，努力推动陇东的生产建设。镇原县在1945年涌现出300多名劳动英雄与模范生产者。1946年，新正县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评选张在英、胡继福、郭进宝、赵世贤等人为劳动英雄和先进生产者，

受到表彰奖励。华池县的城壕村、新宁县的窦家湾、新正县的雷庄、史家窑等村，曾多次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模范村。对于出席各级劳模大会的劳动英雄，解放区各级政府热情招待，鼓乐迎送，披红戴花，提高其社会地位，使他们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这些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事迹教育鼓舞了人民，对生产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通过努力发展生产，1946 年陇东解放区各级机关、部队、学校的生活大大改善，基本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标。陇东地区的生产建设成绩，使解放区财政经济状况有了进一步的改善，支持了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和战争。1946 年 7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鉴于延安机关众多，人马集中，粮食供应不足，命令陇东分区华池县调运 600 石粮食至志丹县旦八仓库，再由志丹县转到延安，该任务限 9 月中旬完成。接到命令后，华池县组织近千人的运输大军，征调 1800 头毛驴，义务为延安输送粮食，保证了中央机关的供给。

（二）发展工业、手工业和副业

抗战胜利后，陇东根据地经过努力，初步建立了军工、被服、制革、造纸、化工、纺织、印刷、卷烟、酿酒、油坊、染坊、农具制造、副食加工等工业和手工业生产门类，工厂和工人数量逐年增加，产品产量和质量不断提高，逐步形成公营、合作社营、群众合营、个体私营工厂及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共同发展的工业体系。1946 年仅合水县西华池市一地，就拥有公、私纸烟作坊 10 多家、皮革作坊 18 家、木器厂 5 家、铁器厂 4 家、染坊 14 家。

纺线织布（包含毛纺、毛织）是陇东手工业生产的支柱产业。其中华池县地广人稀，适宜发展畜牧业，从而使发展纺织业在原料上有极大优势。而棉花在华池试种成功更提高了群众对纺织业的信心。在华池县党政组织的积极提倡、贷款资助、启发鼓励下，群众积极发展纺织业，不仅创造了一定利润，而且解决了部分穿衣问题。1945 年华池县共有纺织点 37 个，纺车 1004 架，织布机 46 架，掌握纺线技术的人达到 797 名，掌握织布技术的人达到 43 名，纺棉线 299.12 斤，毛

线254斤，织棉布152丈（毛布未计）。陇东解放区还大力开展以工副业生产为龙头的多种经营，扩大棉花、烟叶、蓼蓝种植面积，提倡养蜂、养蚕、养兔，栽植果树，组织狩猎，加工山货等。1945年，全分区种蓼蓝4000余亩，其中镇原、曲子县并列为全区第一。

（三）发展商业贸易

陇东解放区在发展农业、工副业的同时，还大力发展商业贸易，沟通内外交流，增加了根据地人民的经济收入。1945年，陇东光华分店已拥有资金1.3亿元，下属支店也由原来的7个增加到13个（含新宁、新正3个），成为陇东商业贸易的总龙头。光华商店主要经销皮毛、甘草、食盐等土特产品，兼收土布、棉花等。其目的是为部队和机关干部筹集资金，供应给养，服务于战争的需要。在光华商店带动下，陇东各县、有关单位以及驻军、学校也都纷纷自筹资金兴办公营商号、店铺。人口稀少的华池县，到1946年也成立了贸易公司，并在柔远、元城、白马庙设立了贸易货栈。

陇东商贸战线上最著名的代表要数西北贸易总公司陇东分公司，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脚骡运输队。1947年春，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向陇东发动进攻，陇东所有运输队都为战争服务，集中起来跟随分区和各县的党政机关一起转移。6月以后，对运输队实行整编，将300多人、1500多头驮骡编为一个运输总队，总队下面又分编了3个大队，分别承担分区机关和各县机关的物资供应任务。

陇东解放区所产食盐，不仅是群众生活的必需品，也是平衡进出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重要杠杆。抗战胜利后，陇东解放区运盐的力量主要有四支：一是长途脚户，依靠运盐获利为主要经济收入；二是短途脚户，主要从事农业但又以兼营运盐为其重要副业；三是饲养牲畜的农户，利用农闲时期驮运食盐供自己家里食用或赚钱；四是边区以外的长途脚户，他们主要以贩运食盐出口盈利为目的。1947年1月，陇东贸易分公司在《1946年陇东食盐运销情况》报告中称：陇东食盐出口向为边区之首。

（四）反封锁斗争。

为了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陇东解放区努力发展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和商贸公司的通商贸易，将边区盛产的食盐、牲畜、皮毛等利用各种渠道运销出去，换购国民党统治区的医药、棉布、枪械等物资，以满足解放区的需要，增加根据地的经济收入。陇东解放区在与国民党统治区接壤的环县、镇原、庆阳、新宁、新正县边界地区，扩建集市，发展贸易，减少税赋，吸引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群众向边区贩卖生活日用品，解放区人民可在市场上采买到紧缺的棉花、布匹等物品；利用解放区群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亲戚朋友等关系，秘密采购药品、五金等解放区紧缺物资，运进边区。同时在西华池、赤城、驿马关、孟塬、三岔、苦水掌、长舌头、湘乐等乡镇开辟了贸易口岸，专门设置货币兑换所、税卡、贸易公司、土产公司、盐业公司等机构，管理与承办进出口解放区货物的业务。

合水县城以南约30公里的西华池处于交通要道，这里大小道路纵横交织，便于穿越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是解放区出口食盐的重要口岸。庆阳县所属的赤城、驿马关两地地势平坦，出入贸易便利。驿马关距国民党甘肃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地西峰镇只有15公里，距赤城30公里，距长武50多公里，又靠近麟游山区，交通便利。孟坝镇系镇原县八大镇之一，地处平原，南通陕西凤翔、宝鸡等地，为陇东重要产粮区。驿马关、孟坝两地也是当时重要贸易口岸。

距平凉120公里的镇原县三岔镇，是平凉客商到定边的转运之地。陇东牲畜在此口岸出口较多，解放区在这里多与回族商人进行贸易。环县苦水掌西接固原，北连甜水堡、下马关等偏僻地域，国民党经济封锁不太严密，外地商人在这里与陇东解放区的商贸公司进行贸易，经此口岸转运定边等地的物资数量很多，主要是牲畜、皮毛等商品。

解放战争初期，虽然国民党进行经济封锁，但解放区军民采用各种有效办法，与国统区商人互相配合，不断冲破封锁线，运入了解放区急需的货物，同时也将许多土特产运出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互通有无，解决解放区物资的部分需求。陇东根据地卓有成效的生产

建设和商业贸易，使解放区财政经济从严重困难中挣脱出来，渡过难关，支持了战争。同时也改变了陇东解放区的经济条件，提高了党政军民的生活水平，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积累了生产建设经验，培养了一大批财经管理和技术人才。

第十六章 党领导下的陇东解放区的自卫战争

第一节 党加强陇东解放区的武装力量

一、陇东军民整军备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不断对陇东解放区进行军事挑衅。为了粉碎敌人的挑衅，陕甘宁边区和陇东分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及时进行应战准备。

194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作出《关于加紧备战的指示》。按照西北局指示，陇东地委号召陇东军民紧急行动起来，进行备战。12月15日，陇东地委向全区各级党组织发出《关于目前形势和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对内战的危险性作了分析，指出国民党向陕甘宁边区进攻的军事部署正在加紧进行，局部的袭击、抢劫、破坏随时可能发生，要求各级党政军领导同志要认真贯彻执行西北局的指示，提高警惕，迅速进入全面的备战状态。在以最大的努力完成扩兵任务之外，应加强整训主力部队、警卫队、游击队。特别是要把培养地方武装作为主要工作之一，组织小型的不脱离生产的游击小组或民兵小组，以便战争发生后带动民兵参战。在这个指示中，陇东地委提出全面备战工作，加强地方武装，训练自卫军，组织游击小组或民兵小组，动员群众修筑工事，加强侦察警戒工作，精简机关，扩大生产运动，加强对敌区工作等9项工作任务。

陇东地委的这些指示，各县委认真讨论并付诸实施，党政组织认真开展对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时事教育工作，要求党员和干部认清当前严峻形势，做好战斗准备。同时，动员群众构筑工事，扩大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全区党政军民投入了紧张的战备工作。

1945年9月，在极其严峻的形势下，中央军委对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进行了整编，将晋绥野战军和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内划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驻陕甘宁解放区的其他部队，仍沿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番号，王世泰任司令员（代），高岗任政治委员（代），徐向前任副司令员，谭政任副政治委员。不久，高岗、谭政、徐向前工作调动，中央军委再次调整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组成，王世泰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王维舟、阎揆要为联防军副司令员，张仲良为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为参谋长，领导边区部队的战备工作和自卫反击作战。

联防军下辖部队，初期为教导第一旅，旅长兼政委罗元发；教导第二旅（兼延属军分区），旅长黄永胜，政委邓华；警备第一旅（兼关中军分区），旅长高锦纯，政委张德生；警备第三旅（兼三边军分区），旅长贺晋年；新编第四旅，旅长张贤约，政委徐立清；第三八五旅（兼陇东军分区），旅长王维舟，政委马文瑞。全军总兵力约3.2万余人。

1945年11月，陇东军分区改编为陇东警备区，三八五旅兼管陇东警备区。1946年3月，根据《中央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指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进行精简整编，共裁减10个团、12个营、67个连，复员2700余人。教导第一旅与教导第二旅合并为教导旅；第三八五旅并入警备第三旅，警三旅兼管陇东警备区。整编后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下辖：警备第一旅，旅长兼政委高锦纯；警备第三旅，旅长黄罗斌，政委李合邦；新编第四旅，旅长张贤约，政委徐立清；教导旅，旅长兼政委罗元发；新编第十一旅兼三边军分区，旅长曹又参，政委高峰。全军共2.8万余人。部队人数虽减少了4000人，但一部分年龄大的老兵和一些体弱有病的干部战士得到了安置，精干了部队。

陇东各地遵照西北局和地委的指示，积极加强地方武装建设。

1945年秋，陇东分区合水、环县、曲子、镇原及关中分区的新正、新宁等县，先后建立11支游击队，在边界地区开展反特锄奸斗争，打击进入边区抢劫财物、骚扰破坏的国民党军队和特务。10月，陇东警备区以庆阳、环县、曲子、镇原4县警卫队合编为陇东分区独立营，营长雷震，政委牛健民，下辖4个连，驻防镇原县人民政府驻地孟坝镇，担任警戒任务。11月，环县将扩大的新兵和从警卫队选拔的骨干共计280人编成环县独立营，营长连锡玉，副营长王俊岐，下辖3个连，在环县与敌交界的地区担任警戒。

为保卫陕甘宁边区，陇东解放区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军。1945年底到1946年初，经过形势与任务的教育，陇东解放区广大青年认识到内战不可避免，必须加强人民自卫武装，纷纷报名参军，全区扩充兵员1609人，其中庆阳县392人，合水县294人，华池县185人，曲子县299人，环县227人，镇原县212人。这些兵员，除环县扩大的新兵编为独立营外，其他各县留少部分补充警卫队、游击队，大部分补充了当地驻军，加强了人民自卫武装力量。

除了加强地方武装外，陇东各县还普遍整顿了民兵，健全了民兵组织。1945年冬，陇东分区各县及关中分区的新宁、新正县，都达到了县设民兵大队部，区设民兵营，乡设民兵连，村设民兵排的目标。其中：庆阳县建立民兵营7个，辖基干民兵连7个，有民兵1010人；普通民兵连43个，有民兵6054人。曲子县建立民兵营7个，辖基干民兵连7个，有民兵1348人；普通民兵连39个，有民兵4288人。环县建立民兵营7个，辖基干民兵连7个，有民兵981人，普通民兵连45个，有民兵2770人。镇原县建立民兵营6个，辖基干民兵连6个，有民兵878人，普通民兵连34个，民兵2502人。华池县建立民兵营5个，辖基干民兵连5个，381人；普通民兵连34个，2557人。各县、区、乡长分别担任民兵大队长、营长、连长，并配备一位专职人员担任副职，主管民兵工作。据1946年2月1日《华池县人民政府关于四年来的工作向第三届参议会的报告》记载，华池全县有民兵2938名，其中普通民兵2557名，编为34个连，74个排，197个班；基干民兵381

名，编为5个连，18个排，35个班。每区均设立营部，区长兼营长，另设一副营长，区委书记兼营政委；县上设立大队部，县长兼大队长，另设大队副，县委书记兼政治委员，领导民兵工作。

二、反击国民党的军事挑衅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尚未胜利之时，就调动重兵围困陕甘宁边区，进行武装侵犯，派遣大批特务进入边区进行侦查破坏、搜查情报，对边区实行政治、经济封锁。抗战胜利后，他们一面空喊和平，一面加紧部署内战。为此，国民党首先为其武装进攻陕甘宁边区大造舆论，污蔑陕甘宁边区是"中共所制造的特殊地区，亦可谓破坏军令、政令、扩充地盘的大本营。"[①]处陕甘宁边区西大门的陇东解放区，成为他们进攻的主要目标。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叫嚷要"制止中共暴行，铲除红色陇东"。在陇东，国民党统治的各县都先后举行了反共集会、游行。在大造舆论的同时，国民党加紧了军事"围剿"的各种准备，先后调集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十几万正规军，陈兵固原、镇原、宁县、平凉、泾川、长武、旬邑、彬县，对陇东解放区实行重兵围困，不断派出武装部队侵入边区，进行破坏活动。地方保安团、自卫队，亦不时向解放区进行军事挑衅。甘肃省第三区（庆阳国统区）被列入国民党"国防部重点装备地区"，扩充警察和地方保安团队，配备新式武器装备。还将"陇东保卫区调查统计室"改为"陇东调查统计局"，直接受国民党中统局领导，并扩大分设西峰、合水、正宁、灵泾、固环、三边、彬州、镇原8个分室，每室配备1名主任和15名通讯员。国民党还派遣大批特务混入陇东、关中等分区，进行干扰破坏，搜集情报。至1945年8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在陇东各地共建立起各种特务机构49个，共有职业特务1317人，设立特情点及打入边区的特务

① 蒋介石：《特天字第70号密令》，1946年12月30日。见北京大学《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4册），第192页。

789人，形成以彬县、耀县、西峰为中心向陇东、关中以至整个陕甘宁边区全面推进和渗透的特务破坏网络体系。

1945年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又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在这之后，国民党军队依然向边区发动进攻，抢劫枪支财物，抓丁派粮。1945年12月26日，驻固原国民党军队400多人，进攻镇原县三岔区，占领老爷山，打伤陇东分区独立营战士和当地群众多人。陇东军分区独立营和三岔区游击队奉命进行自卫还击，重新收回了三岔区。

在关中分区，国民党军多次派兵向新宁县、新正县进攻，抓丁索款，宰杀群众猪羊；派遣特务搜集情报，拘捕干部群众；派人员到解放区强行编制保甲，强令解散人民选举产生的区乡政府；在边界地区增调军队，抢修碉堡、工事，进行军事挑衅。驻新正、新宁两县的解放军警一旅部队和游击队、民兵，在关中分区党委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多次打退敌人进攻，抓获多名敌特便衣，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的军事挑衅，保卫了边区，保卫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1945年11月7日，陇东、关中分区分别于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举行大会，强烈抗议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调动百万大军进攻解放区的挑衅行动，号召军民高度警惕，坚决保卫解放区。同时，通电全国，呼吁和平，要求国民党立即撤出进攻解放区的军队，要求美国政府尊重中华民族的独立，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与援助国民党进行内战。群众大会揭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使人民群众了解了真相，争取了民众，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为应对国民党挑起大规模内战作了思想和战略上的准备。

第二节　党领导下的自卫战争准备工作

一、自卫战争动员

1946年，国民党军队加紧了对陇东解放区的封锁和包围，积极策划军事进攻。5月，国民党在西峰召开了反共内战动员大会，强迫群众游行，制造内战舆论。此后，国民党即加紧在陇东集结大批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其中在华池县的周边地区，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了马鸿逵部的两个骑兵师，计6354人的兵力。1946年夏，又将青海马步芳的整编八十二师马继援部及甘肃保安一团调进陇东。随后，胡宗南将原驻关中的十七师四十八旅、七十六师二十四旅增调陇东，加上原驻陇东一四四旅、新一旅、骑兵一旅等部，共集结嫡系中央军5个旅和两个整编师的马家军杂牌部队。同时，陇东的国民党甘肃第三行政区专员公署也以西峰为中心，加紧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组织训练民团，扩充反共自卫队、保安队，并不断派遣特务进入陇东解放区，进行破坏和捣乱，加紧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国民党甘肃省政府还通令颁布了《甘肃省第二（平凉）、三（庆阳）两区联防会哨所巡逻办法》《甘肃省第二、三两区联防会剿实施方案》，调整和改组了第三区及所属各县政权机构，使之"向战争体系转变"，进行"围剿"陇东根据地的全面准备。国民党第三区保安司令部制定了《甘肃省第三区警备实施计划》，对陇东地区的保安队、自卫队、警察队的兵力部署、联防"汇剿"地点、盘查哨及瞭望哨的设置、防御工事的修建、国民兵的组训、联保连坐等作了周密部署。到6月下旬，国民党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已达15万人。1946年底，国民党当局再次加强了对陇东地区的军事布防，除在西兰公路沿线和重点城镇增兵外，又调遣新二师进驻镇原、西峰一线。至此，国民党对陇东的军事"围剿"准备已经完成。

针对陕甘宁边区及陇东解放区面临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陇东地委也加紧部署反击准备工作。1946年5月2日，西北局发出给边区各地的紧急指示电，要求边区军民加紧作好自卫战争的

准备工作。6月3日，西北局发出《关于紧急动员准备战争保卫边区的指示》，对边区党政军民的备战工作提出了五项具体要求：此后，西北局又多次发出指示，要求边区全体军民认清形势，提高警惕，实行劳武结合，生产与备战结合，一切服从于自卫战争，坚决击退任何敢于进犯之敌。西北局负责人习仲勋还就警惕国民党军事进攻问题专门致电警三旅旅长黄罗斌等，指出：请通知有关方面注意，警惕国民党军队进攻，免受损失，同时在军事上应有所准备，防止突然袭击。我们的戒备之心不可无，应严防国民党制造借口，进行挑衅。根据西北局的指示，陇东解放区的党政军机关立即动员起来，进行战争准备。陇东专员公署及时发出指示信，要求各县动员群众，为驻陇东的解放军部队准备充足的粮草，以适应作战需要。

7月1日，陇东各界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5周年大会。大会强烈谴责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的行径，声援中原人民解放军，号召全区军民奋起自卫，保卫边区。7日，陇东分区在庆阳城举行纪念七七事变9周年大会，痛斥蒋介石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外奴颜婢膝的行径，号召广大人民团结起来，保卫边区。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党内指示，各解放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英勇地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8月21日，陇东地委在《关于防止胡匪[①]蚕食清剿的通知》中指出，胡宗南部近来对解放区不断进攻蚕食，首先以重兵驻扎重要村镇，然后分兵进行"清剿"。解放区党政机关和各级干部要迅速行动起来，动员群众坚壁清野，防止被敌特捕杀，遭受损失。26日，陇东专署专员朱开铨在发给所属各县县长的命令中，指出陇东已进入战争状态，命令各县从速行动，支援解放军进行自卫反击作战。遵照上级指示，陇东分区、关中分区以及两分区所辖各县均成立战争动员委员会，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全面备战。

10月12日，西北局召开会议，研究边区的备战工作问题，决定将

① 指国民党胡宗南的军队。

边区的工作重点立即转移到自卫战争的轨道上来，此后，全边区便以战备为中心工作，开始全面的动员，准备对付国民党强加到边区人民头上的大规模军事进攻。11月10日，陇东专员公署、陇东警备区联合发出戒严令，指出：国民党对边区的进攻已经开始了，大战瞬即展开，解放区的党政军民应迅速紧急动员起来，予进攻者以坚决的回击。决定自11月20日起，全分区实行紧急戒严。

陇东广大军民响应党的号召，紧急动员起来，积极投入战备，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掀起了参军支前的热潮。1946年，陇东解放区报名参军者有1450名，其中庆阳290名，合水250名，镇原250名，曲子290名，环县250名，华池120名。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员800名，其余编入陇东分区地方部队。10月，陇东分区独立团在镇原县孟坝镇成立，团长马福吉，政委党永亮，参谋长牛占彪，政治处主任杨继清，全团共辖3个营，1000余人枪。独立团以原陇东分区独立营为第一营，编为3个连，共400余人枪，营长雷震，教导员牛健民；以镇原县动员的新兵为主，编为第二营，辖3个连，共300人，营长冯学诚，教导员刘永孔；以合水动员的新兵170余人和该县蒿咀区游击队50余人编为第三营，辖3个连，营长王有功，教导员岳万俊。独立团成立后，团部和一、二营驻守镇原县孟坝、马渠、三岔，三营驻守庆阳县的赤城，配合警三旅保卫边区西部边界。与此同时，新宁县从所属5个区中选拔精干民兵200余人，组成新宁县独立营；新正县在县保安大队的基础上，组成新正县独立营。两县独立营成立后，驻守边界地区，配合警一旅保卫边区边界。1947年1月5日，陇东分区在战争动员工作的报告中指出：经过各种努力之后，群众已初步发动起来，如太平镇、南义井的老百姓已将敌人的碉堡平毁；全分区基干民兵从4000余人发展到6000余人；已普遍训练了民兵干部和一批爆破人员；重新组织了担架队和运输队；准备了一批粮草，一旦打起来，就能保障参战解放军的需要。

1947年3月，国民党以23万大军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陇东解放区的合水、庆阳、镇原及环县，华池、曲子的部分地区被

占领。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由庆阳县城转移到华池境内的城壕、元城、悦乐、刘坪等地，继续领导陇东人民开展对敌斗争。由于陇东解放区进行了有效的战争动员，根据地人民战胜敌人的信心很足，广大军民士气很高，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二、开展练兵运动

面对蒋介石集团积极准备内战的形势，1945 年 12 月，陇东解放区所属各级政府认真贯彻党的“练兵、减租、生产”三大任务，切实做好自卫战争准备工作。28 日，陇东地委发出的《对目前形势和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要求党政军各级领导同志提高革命警惕，以有备无患的精神，进入全面战备状态，不断扩大地方武装，切实执行练兵计划。根据地委指示，驻陇东解放区的三八五旅、警一旅、回民骑兵团及陇东分区独立营、环县独立营、各县游击队以及广大民兵，开展了军事训练。各部队突出抓了投弹、射击、刺杀、爆破、守城、近战、夜战、侦察等技术与战术的训练。关中分区于 1945 年 11 月 16 日举办了为期半个月的民兵干部培训班，使参训的民兵干部学会了步枪射击、投弹及班、排、连长的指挥要领。

1946 年春，陇东分区所辖正规部队和各县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练兵的指示》，普遍开展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大规模群众性练兵运动。从分区到各县、乡，逐级举办战术、战勤培训班，仅曲子、环县、庆阳、华池、镇原 5 县，就有两万多名游击队员、基干民兵和自卫军战士参加了整顿和训练。他们既学政治又学军事。政治方面，着重进行形势时事教育，增强士兵战胜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决心和信心；军事方面，正规军、游击队、自卫军着重练习射击、投弹、刺杀等技术，民兵着重练习造雷、埋雷、爆破技术及战勤服务。在自卫战争的准备中，解放区各级政府发动群众铸铁、熬硝，训练爆炸技术等。为了让民兵掌握制造地雷、炸药技术，1946 年 10 月

至11月，各县分别举办了爆破训练班。陇东分区的两万名基干自卫军与普通自卫军进行了整理与训练，各县大队部均举办了一次至两次的自卫军干部训练班，全区有800多人学会了爆破技术，华池县有70%的民兵、自卫队员学会了造地雷。仅曲子、华池、环县、庆阳、镇原5县即发动群众熬硝1.5万斤，有的县区专门设立了硝厂，准备充足的造雷原料。关中分区还组织各县民兵营长以上干部参加爆炸训练班，经过两星期的训练，就学会了铁雷、磁雷、花车雷、踏板雷的制造和使用方法，且能以手榴弹和迫击炮弹改造地雷。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全分区的练兵备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一是两个月扩大民兵700人，县、区、乡分层次进行训练；二是各县分别举行了7至10天的爆破训练班，参加者全都掌握了制造炸药、制作地雷的技术；三是准备普通担架1450多副，配备抬担架人员近9000人；准备机动担架126副，配备人员810多名；组织运输队192个，配备人员2600多人、大牲畜9700头；四是建立通讯联络站137处，配备人员900名；建立哨站108处，配备人员121名；五是庆阳、合水、镇原3县组建游击中队8个、277人，配发轻机枪3挺、步枪143支、手榴弹190枚。到1947年，陇东解放区8县共有8个游击大队、41个游击中队、3900多人，还有民兵、自卫军队员5521人。通过练兵扩军，陇东解放区部队和民兵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大大提高。

第三节 “迎王”战役

一、全面内战的爆发与三五九旅等部的突围

三五九旅原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部。1944年12月，三五九旅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由陕甘宁边区南下，与新四军第五师在鄂、豫、皖、湘、赣5省交界处，创建了有60余县的中原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调集2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原根据地蚕食进攻，到全面内战爆发时，根据地仅存原面积的十分之一，处于敌人层层包围之中。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在完成对中原解放区的包围之后，彻底撕毁停战协定，电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中央军和地方部队共30万人，公然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内战全面爆发。在重兵压境、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遵照中央军委“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为保存力量、争取主动，中原解放军主力共6万余人，在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领下，于6月26日晚分南北两路开始突围。其中北路为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第二纵队第十三旅、第十五旅一个团、第三五九旅等部共1.5万余人，由李先念、王震率领，29日晚从河南信阳南突破敌平汉路封锁线，向西转移。蒋介石急忙调重兵在南阳、襄樊、紫荆关等地进行截击。中原突围部队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突破敌数道防线，夺取战略要点紫荆关，于8月初进入陕南的商县境内，与中共商洛工委及商洛游击队会合。

中原解放军主力到达陕南时，胡宗南准备以19个旅约15.5万人的兵力，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进攻。同时胡宗南急调5个旅的兵

力，企图围歼王震部。8月12日，王震部兵分两路，分别向汉中地区进军，16日王震率主力到达留坝县以东地区，致电中央请示下一步行动。17日，中共中央致电王震："我们希望你率所部进至陇南后，即在两当、徽县一带分散游击，建立陇南游击根据地，对于目前牵制敌人，帮助五师及粉碎蒋介石向整个解放区进攻，帮助必大，对于将来我军向南发展则是一准备步骤。"19日，王震奉命率部开始向陇南进军。20日，中央军委致电王震："能在文（县）、武（都）、成（县）、康（县）、陇南一带创造游击根据地意义很大。如不能即北移，边区已准备三个团接应你们。"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察觉王震部意图后，立即调集9个整编旅严密封锁（四）川陕（西）、西（安）兰（州）两条公路，在陕甘交界处层层设防，在陕西沿甘肃东部的宁县、镇原一带设立据点，防备三五九旅突围北上，同时强征民工在宁县良平、平子、米桥及正宁山河镇一线挖掘了宽3丈深2丈的堑壕，设立碉堡、哨卡、据点，企图阻止三五九旅进入边区。青海马步芳部也在隆德、静宁、华家岭一带密集布防。驻固原、镇原、西峰、泾川、彬县等地担任封锁陕甘宁边区任务的国民党军队，也力图阻止王震所部进入陇南或返回陕北。

为了牵制敌人，中共中央电令王震率领第三五九旅继续北上；李先念率领其余部队在陕南活动，伺机建立鄂豫陕根据地。8月19日，王震率三五九旅由陕南出发，兵分两路北上，胡宗南即调整编第三十六师、第七十六师、第九十师及骑兵第一旅围追堵截。王震率领东路两个团，急行军三天两夜，在行军途中与追击堵截之敌作战5次，于22日后成功穿过川陕公路，渡过渭河，穿越陇海铁路，到达陇县一带。西路第七一七团由副旅长徐国贤率领，进入甘肃徽县、两当，北渡渭河，翻过六盘山，越过西兰公路，向陇东挺进。中共中央通知驻关中、陇东的部队和党政机关做好准备，迎接三五九旅。

二、陇东解放区军民发起"迎王"战役

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围攻，接应三五九旅北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调动主力部队南下接应。8月22日，三五九旅已北进至陕甘宁边区附近地区，联防军部队遂于23日在边区南线发起"迎王"战役（即迎接三五九旅战役）。这次战役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为左翼兵团，从长武、彬县出击；警三旅为右翼兵团，向合水、镇原、泾川方向出击；警一旅组成若干游击队，活动于旬邑、新正地区，迷惑和牵制国民党军。地方部队、游击队和民兵配合主力行动。关中分区警备第一旅首先向盘踞旬邑、耀县之敌展开攻击；新四旅、警三旅，进占宁县金村、庆阳驿马关、合水西华池等地。

8月26日，各部队在当地民兵配合下，向敌军发起攻击，经过3天激战，警三旅先后攻占敌军要点镇原太平镇、宁县南义镇，歼敌200余人；新四旅攻占宁县平子镇、良平镇、长武凤翔镇，歼敌300余人；警一旅攻占正宁山河镇、旬邑县底庙，歼敌600余人。29日，各部队向敌纵深推进，新四旅沿泾河南岸向泾川方向推进，为三五九旅打通过泾河的通路；警一旅加紧在旬邑、正宁地区活动，牵制追击王震部队的敌军；警三旅向东进占屯字镇，威逼镇原县城，并派出侦察分队向泾川方向延伸，与王震部队取得联系；陇东分区独立营围攻黑渠口守敌，迎候徐国贤所率部队。8月底，解放军将国民党军队设在新宁、新正、镇原解放区边界封锁线上的碉堡基本摧毁，为三五九旅顺利返回边区扫清了障碍。8月29日下午，王震率领三五九旅旅部和所属七一八、七一九团战胜国民党军队的追堵夹击，胜利到达镇原屯字镇。

在迎接三五九旅回陕甘宁边区过程中，陇东解放区各级人民政府除了准备大量劳军物品、救护伤病员、组织担架、盘查放哨以外，还配合解放军打击敌特，扫除障碍。其间，陇东分区对三五九旅将要经过的镇原、庆阳、合水3县的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做好了迎接王震部队的充分准备。分区还成立了慰劳委员会，专门负责这项工作。陇东专员公署给各县发出指示，要求"凡军队路经的地方，所吃的粮食和草料，不要限于专署有无指示，而各县应当自行处理"；"在部队经过时，应发动群众给军队送柴、送面、送水果、送草、送料，并发动沿

途村庄群众给部队烧米汤、烧开水，帮助军队调剂吃饭、住宿的地方，以示慰劳”；“合水县应在城关附近发动群众磨五六十石麦子的面粉，以解决部队到时吃饭问题”，并动员柴禾5万斤以解决解放军的燃料问题，调查摸清房子和窑洞，以解决部队的住宿问题；在军队不经过的地方如曲子、华池、环县也应做迎接的准备工作，“曲子应动员羊150—200只，环县应动员100—150只，华池县除应动员羊100只左右外，还应动员柴火5万斤，送合水县”①。为迎接三五九旅回边区，新宁县人民踊跃支前，在平子战斗中集中40万斤粮食和大批熟食供应，仅九岘粮站蒸馍就放满了4个窑洞，烙馍垒满高台戏楼。

为了保证三五九旅安全休整和顺利回到延安，王震部队进入解放区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部队仍坚持在与国民党军队接壤的边界地区，阻击尾追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以及地方保安团队，予以重大杀伤。1946年9月2日，在太平阻击国民党军队警三旅五团和七团，在刘家大山崾、枣林一带，予国民党胡宗南部九十师六十一旅一八一团以沉重打击，歼敌200余人，俘敌中校副团长以下数十人。与此同时，中共甘肃工委和陇东特委，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还组织了陇南特委和平西工委、华平工委，并派出3路武装，于9月3日向陇南、固原、平凉地区出击，先后在固原、隆德、泾源、平凉、华亭等县与敌战斗，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积极配合了“迎王”战役。4日，“迎王”战役胜利结束，参战各部陆续撤回边区。迎王战役历时9天，人民解放军共歼敌1300余人，胜利地完成了掩护王震部队回到解放区的任务。

三、陇东解放区人民欢迎三五九旅

8月29日下午，王震率三五九旅到达镇原屯字镇。毛泽东得知

① 《陇东专员公署指示》1946年8月29日，《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第14－15页。

三五九旅与边区部队胜利会师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亲自起草致王震电文："庆祝你们到达边区的胜利。"1946年9月14日的《解放日报》记载了屯字镇会师的动人场面："大群欢迎者分立在道路两旁蜿蜒数里，千万双眼睛，望着王将军……成担的西瓜，成群的猪羊，送向中原弟兄的宿营地……国民党统治区的老百姓，也成群结队地提着酒壶和纸烟来慰劳。"

30日，在地方工作组引导和警三旅部队掩护下，王震部队进驻太平镇，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日，徐国贤部在陇东分区独立营掩护下，经镇原县武沟进入马渠，受到中共马渠区委、区政府和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31日，王震、徐国贤率领部队在镇原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孟坝镇胜利会师，受到陇东分区工作组、镇原县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三五九旅将士自中原突围到与迎接部队会师，历时63天，日夜兼程2500多公里，同敌人浴血奋战90多次，历尽千辛万苦。他们到陇东后，陇东军民像迎接亲人一样组织接待慰问。三五九旅路经镇原时，镇原县人民为其补充了大量衣物和食品，广大指战员深受鼓舞，士气空前高涨。王震代表部队向镇原游击队赠送轻机枪1挺，步枪10余支。9月1日，王震率部东进，经王寨进入庆阳县。2日到达陇东分区首府庆阳县城，受到陇东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接待。当天，庆阳党政军民冒着大雨，手捧慰问品，在离城五里外排成长队，等候王震部队。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代表西北局、边区政府和保安司令部赶赴庆阳，迎接三五九旅官兵胜利北返，并亲自率领庆阳地委领导在庆阳城外迎接。庆阳城内男女老少挤在大街小巷，家家户户沿街摆着堆满食物的桌子。部队经过时群众都蜂拥上来给战士们戴光荣花，献上一杯杯香冽的美酒。乡亲们还编唱歌谣迎接三五九旅："怪不得喜鹊乱飞翔，环江东河闹嚷嚷，原来是王震部队回家乡。炒鸡蛋黄又黄，摊煎饼香又香，慰问咱们的子弟兵；人民江山万年长。"

在陕南汉中和主力部队分兵行进的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在没有电台联络的不利情况下，艰苦转战30天，取道陇南、两当和六盘山，

在平凉以西冲过西兰公路，然后经孟坝进入边区。9月8日，七一七团与三五九旅主力部队在庆阳胜利会合。三五九旅在庆阳休整半月后，经合水进入陕北。9月27日，三五九旅部队返回延安。延安人民高举写有"威震华夏"四个大字的横幅，簇拥着三五九旅英勇的战士们，走进了延安城。29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了欢迎三五九旅胜利归来的大会。

在迎接三五九旅的行动中，庆阳民众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作出了巨大贡献。王震部队所到之处，群众主动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搬运粮食和武器，护理伤病员。期间陇东分区各县为慰问部队筹集面粉8.55万公斤、小米81.7万公斤、蒸馍5500公斤，猪200多头，羊1000多只，鸡7000多只，蛋3.22万个，青菜4.66万公斤，柴33万公斤；马料1.4万公斤，饲草4.15万公斤；为部队做送军衣2500多件，军被937床，军鞋9646双；支出招待费及支援经费89.68万元；组织担架600多副，动员民工1.39万名，畜力1.89万头。解放区人民的热情援助，有力地保证了"迎王"战役的进行。这次战役军民齐心协力，英勇杀敌，是陕甘宁边区军民取得的解放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

第四节 陇东解放区的自卫作战

一、陇东解放区军民打退国民党军队的局部进攻

1946年,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包围陇东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没有立即进攻陕甘宁边区,但对陇东解放区进行了一系列局部挑衅进攻。陇东解放区军民坚持自卫战争原则,团结战斗,进行了有力反击,多次打退国民党军队发动的军事进攻,保卫了解放区的安全。

7月23日,国民党胡宗南部第四十八旅一四二团1个营进攻新宁县方家寨子,该乡民兵奋起自卫,击退了进犯者。30日,该团3个连携迫击炮两门、机枪两挺,进攻新宁县丁家川,又被当地民兵击退。8月18日,该团百余人配合国民党正宁县反共游击队、自卫队,再次进攻新宁县,被该县一区民兵击退。27日,驻旬邑县关庄国民党军队向新正县边境进犯,解放军警一旅部队在新正县游击队配合下,消灭国民党军1个连,缴获机枪2挺、步枪50余支、子弹4000余发、手榴弹两箱,摧毁敌碉堡9座。9月17日,驻正宁山河镇的国民党第四十八旅一四二团一营,向新宁县一区三乡进犯,警一旅与新宁县民兵配合,将其击退。11月12日,国民党胡宗南部驻正宁县永和的1个营向新正县进犯,新正独立营奉命阻击,代理营长王凤鸣指挥部队英勇作战,毙国民党军队18人,俘30余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和物资,国民党军队余部狼狈逃窜。20日,国民党胡宗南部新一旅1个营、2个保安中队偷袭驿马关,陇东分区独立团三营在民兵配合下,击退胡部。12月17日至18日,同民骑兵团在环县毛井区游击队配合下,两次击退国民党骑兵第二旅进攻。27日,警三旅五团一、三营,袭击侵

占镇原县太平镇的国民党军1个加强连，毙俘其60余人，缴获重机枪1挺、步枪40余支，解救被抓壮丁200多人，部队发路费助其回家。12月30日，国民党胡宗南部四十八旅一四二团，十二旅三十五团、三六七团，一二三旅三六九团，突袭占领新正县的三嘉、湫头，新宁县的月明、西坡及马栏等地，未及转移的群众惨遭杀害。1947年1月1日，警一旅二团一连在新正县300多名民兵配合下，与侵占西坡的国民党军队一四二团激战，歼其120余人，夺回了部分失地。8日，陇东分区遵照边区政府电令，抽调10名科级干部组成工作组，前往关中前线作战争动员工作。

陇东、关中军民坚持人民自卫战争，自1946年6月至1947年1月，多次击退侵犯边区的国民党军队，歼其2000余人，保卫了解放区，震慑了国民党军的挑衅行径，增强了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军队的信心。

二、陇东人民踊跃参军支前

1946年6月30日，西北局发出《紧急动员，准备战争，保卫边区》的指示。11月初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三届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把动员一切力量，粉碎蒋军对边区的进攻列为当时最紧迫的战斗任务。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号召在全边区开展群众性的参军运动，动员广大青年踊跃参军，积极参加民兵自卫军训练，配合正规军保卫边区，保卫家乡。11月11日，朱德和彭德怀号召全边区青壮年男女要以“抢我一粒粮，还我一滴血”的精神参军参战。11月1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强调，要把所有的人力物力组织起来，一切服从、一切为着自卫战争的胜利。同时，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紧急动员起来保卫边区》的社论，呼吁全边区人民要拼性命洒热血，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丰衣足食的生活，保卫党中央。11月14日，陕甘宁边区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同时发布改组各县领导机构以适应战争需要的命令。

陇东解放区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号召，紧张动员起来，全力扩大和整训地方武装，加强自卫力量。陇东解放区30万人民，人人备战，从机关到学校，从工厂到农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扩军备战、参军支前热潮。母送子，妻送夫，干部、劳模、参议员带头，兄弟争相参军，复员军人自动归队的感人场面，在陇东解放区处处可见。陇东解放区成千上万的子弟，一批又一批报名参军，补充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兵源。全分区1945年至1946年扩大武装力量3000多人。镇原县从1946年9月28日至10月2日召开区长联席会议，部署动员新兵工作。在动员过程中，各区注意做好宣传，向群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真面目，并以国民党军队杀害群众、抢掠财物的事例，揭露反动军队的罪行，激发人民群众的义愤，动员群众踊跃参军参战。孟坝区两天内报名参军50多人。孟坝区七乡几个青年报名入伍，邻里乡亲们拿来大家凑的5担馍、6条毡、11条被子、每人一双新鞋欢送他们。镇原县三岔一乡有个佃户叫刘义，1947年初扩兵时，夫妻俩都想叫儿子刘长德去当兵，但互相又怕对方不同意。当村主任来家动员的时候，刘义心生一计，想试探他的老婆，拿起一把刀子，气呼呼地说："谁要把我儿子领去当兵我就和他拼命！"妻子见状急了，忙去夺下刀子说："咱娃娃当兵是人民大事，儿子是我养的，我愿意叫去！"刘义大喜，夫妻高高兴兴送子参军。《解放日报》报道了这件事，并编诗赞扬："夫妻同心各有意，送子当兵保边区。赤胆忠心称模范，拿刀吓人原是计。"刘长德入伍后被编入独立团警卫班，1948年在环县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有的地方群众还为军属和新战士摆席吃饭，送物送钱，场面热烈感人。至1946年底，全区仅镇原、环县、曲子、庆阳4县就有地方武装7000多人。1947年，在残酷的游击战争情况下，陇东根据地8县共扩兵6000名，其中5000名送往主力部队，1000名补充了地方部队和各县游击队。据不完全统计，到1947年底，陇东分区及新正、新宁两县共有8个游击大队（或独立营）、41个游击中队，3900人，另有民兵、自卫军队员5521人。

人民群众不仅踊跃参军参战，更是积极送交公粮，全力为当地驻

军、地方部队和党政机关供给粮食和牲畜草料，动员一切力量为部队转运粮草和军用物资。据资料统计，1946 年至 1947 年，陇东分区交公粮 7.34 万石，饲料 15.6 万石，饲草 890 多万斤。解放区还组织担架队，以供战时需要。1946 年，陇东分区共组织担架 4097 副，20485 人。其中 10 至 11 月，准备普通担架 1421 副，人员 8935 人；机动担架 126 副，人员 817 人。组织运输队 192 个，人员 2616 人，牲口 9693 头。建立通讯联络站 137 处，配备人员 900 人，马 45 匹；建立哨站 108 处，121 人。[①] 不仅成立了担架队，而且在后勤保障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陇东解放区组织的近万人的担架队，准备了设有水壶、草篷的担架 1600 余副，随时准备出动，参加战场勤务、抢救工作。曲子县将全县的担架队员以乡为单位，进行了专门训练。全区组织了 5000 余头毛驴的运输队，在战争动员中曾转运粮食数千石，草 10 余万斤，保证了军队的后方转运工作。解放军打仗全靠两只脚走路，鞋袜消耗量极大。因此，做军鞋成为支前的一件大事，而这件事全由广大妇女承担。陇东解放区的广大妇女利用劳动间歇和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一针一线，不仅完成了政府下达的“任务鞋”，而且做了大量的“慰问鞋”。1946 年，陇东分区 6 县共做军鞋 3.86 万双，磨面数万斤。所有这些为解放区军民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提供了有力保障。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 1947 年 2 月，国民党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前夕，解放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全民动员，从军事到物资方面进行了充分准备，战争动员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 经过战争动员和减租斗争，群众逐步发动起来，革命觉悟提高了，如太平镇、南义井，战争中老百姓破坏碉堡，抬伤病员，送水送饭，均积极踊跃。2. 全分区基干自卫军从 4000 多人扩大至 6000 多人，训练了大批民兵干部与爆破人员，扩大整理了担架运输。3. 义务转运了大批

①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公室编：《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第 147 页。

粮草，保障了战时的军需供给。"[①]所有这些准备工作，成为陇东解放区取得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重要保证，有力支援了其他解放区的人民战争。

① 《陇东分区1946年战争动员工作总结》1947年1月5日，刘凤阁主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下），第109页。

第十七章　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保卫战的序战
——西华池战役

一、国民党军队对陇东、关中分区的大举进攻

1947年2月，蒋介石调集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共计34个旅25万余人，发动了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

当时，国民党在陇东地区就集结了十七师第四十八旅，七十六师第二十四旅、一四四旅，新编第一旅，骑兵第一旅和青海马步芳部整编八十二师等兵力，而陕甘宁边区的解放军只有晋绥军区第一纵队（辖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的新四旅、教导旅、警一旅、警三旅、新十一旅等，共7个旅3.2万余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面对强敌的进攻，2月1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以第一纵队及新四旅、教导旅、警一旅、警三旅共6个旅，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由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统一指挥陕甘宁解放区境内的部队，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胡宗南为了掩盖其偷袭延安，诱使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主力西移的阴谋，开始大举进攻陇东和关中分区。在这之前，胡宗南为了控制延安侧翼，有意将解放军主力吸引在陇东，以便闪电式袭击延安。1947年1月，胡宗南就以3个旅的兵力合围关中分区机关，陇东的新正县首当其冲。国民党第四十八旅一四二团、十二旅三六五团、三六

七团、一二三旅三六九团从西南方向向新正县发动进攻。新正县委立即组织群众坚壁清野，疏散群众。当敌推进到新正县的湫头、三嘉一带后，关中分区警备队和新正县独立营顽强阻击国民党部队达40余天。1947年2月5日，新正县被敌占领，关中分区和新正县党政机关转移到宁县麻子掌一带。同月，胡宗南军又向新宁县发动进攻，进占了二、三、四、五区各一部分。2月8日，胡宗南部第二十九军十七师四十八旅一部，向庆阳县赤城一带发动进攻，陇东分区独立团三营受命阻击。三营指战员利用有利地形打退敌人的一次次冲锋，歼敌100余人，掩护当地干部群众安全转移。由于敌众我寡，三营也受到较大损失，傍晚撤出战斗，赤城被敌人占领。2月18日，胡宗南部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两个整编师、7个整编旅共13个团的兵力分东西两路向关中分区再次发动进攻。驻守关中分区的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的新四旅、警一旅在地方游击队、民兵和独立营的配合下，坚守战略要地，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掩护关中分区及各县党政机关安全转移。2月20日，在人民群众完成坚壁清野后，新四旅、警一旅主动撤离关中，进入延属分区待命，准备参加延安保卫战，关中分区大部沦陷。

二、陇东解放区大部沦陷及党政机关的转移

胡宗南部在占领了新正、新宁县之后，为了诱使解放军主力西移陇东，然后乘机攻击延安，达到一举消灭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目地，从1947年2月开始，即令其暂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指挥十七师四十八旅、七十六师二十四旅、一四四旅、新编第一旅、骑兵第一旅和马步芳整编八十二师沿凤环公路向陇东解放区大举进攻。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关中、陇东分区的地方部队、游击队和民兵，积极配合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掩护地方党政机关安全转移，人民群众在完成坚壁清野后，实行疏散撤退。各县组建的游击队、武工队，坚持留在原地开展

斗争。据此精神，陇东地委、专署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战略撤退，将党政军机关转移到北部山区。

2月28日，国民党新编第一旅向镇原孟坝方向进攻，二十四旅、一四四旅和骑兵第一旅向庆阳方向进攻，四十八旅何奇部向合水方向进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的警三旅在陇东分区独立团、回民骑兵团及各县游击队、民兵的配合下，在孟坝、驿马关、板桥一线实施抗击，掩护陇东分区及镇原、庆阳、合水、曲子等县党政机关及群众转移。在孟坝阻击敌人的陇东分区独立团一、二营，利用人熟地形熟的有利条件，先后在孟坝、唐家塬和大、小方山等地节节抗击，歼敌数百人，掩护镇原县党政机关安全退入环县山区。3月2日，独立团撤出战斗，在大、小方山一带休整，镇原县被敌占领。

向庆阳方向进攻的国民党七十六师二十四旅常德部、一四四旅沿凤环公路北上，2月29日凌晨，首先与驻防驿马关的警三旅五团三营及当地游击队发生激战。战斗开始后，胡宗南部先用迫击炮袭击，然后向三营的几个阵地同时发起进攻。三营战士多次击退敌人的猛烈进攻，激战约两小时，敌军伤亡数十人，三营伤亡13人。因敌我力量悬殊，解放军主动撤出战斗，驿马关失守。胡宗南部向庆阳县城逼进，3月1日庆阳县城被敌二十四旅占领。陇东分区党政机关、中共甘肃工委机关及庆阳县党政机关，在警三旅五团一、三营和分区独立团三营的掩护下，安全撤至华池县悦乐、山庄一带。五团一、三营和独立团三营退至庆阳县北二谷原，与警三旅旅部会合。独立团三营到华池悦乐保卫陇东分区党政机关，警三旅旅部率五团向合水挺进，2日进至柳沟一带。

在板桥抗击敌人的警三旅五团二营与合水县游击队配合，边打边撤，掩护合水县党政机关安全转移到子午岭山区，3月2日撤出战斗，与旅部团部会合于柳沟一带，敌四十八旅遂占领合水大部地区。至此，陇东分区的镇原、庆阳、曲子、合水四县被敌占领。环县、华池两县也遭国民党八十一师、八十二师袭击破坏，大部被敌占领，未及撤离的人民群众遭受蹂躏，大量财产粮食被敌抢劫。

1947年3月4日，侵占庆阳的胡宗南七十六师二十四旅撤往驿马关、西峰，陇东分区独立团一部配合庆阳游击大队暂时收复庆阳。4月8日，国民党马步芳部八十二师一〇〇旅谭呈祥部又占庆阳县城，庆阳县委和县政府撤往华池山区，庆阳县再次沦陷。4月11日，国民党马鸿宾部八十一师马惇靖部侵占环县，环县党政机关转移至华池元城一带。4月15日，马步芳部八十二师侵占曲子，曲子县党政机关转移至该县八珠原一带。5月2日，胡宗南部和马鸿宾部各一部侵占华池的悦乐、元城、将台、菩萨山等地，陇东分区党政军机关、中共甘肃工委及华池县党政机关转移至山庄、高台一带。马继援亦率八十二师一部进驻宁县。至此，陇东分区大部被国民党军占领。

三、西华池战役

1947年3月3日，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侦悉胡宗南部整编二十九军十七师四十八旅，在旅长何奇的率领下孤军进入合水西华池，企图抄近路返回关中。四十八旅旅部率第一四三团驻扎城内，第一四二团在城郊张家山、七里店、李家庄、唐家沟圈、史家庄诸点布防。集团军根据敌情，决定组织新四旅、三五八旅、独一旅和警一旅第三团、警三旅第五团等部发起西华池战役。

当日晚，新四旅、三五八旅隐蔽包围西华池城。独一旅、警一旅三团、警三旅五团，分别向板桥、赤城方向进军，准备阻击敌增援部队。4日凌晨，包围西华池城的解放军向敌发起猛攻，至上午11时，攻占敌一线防御阵地，占领西华池城北部街区，包围了国民党四十八旅一四三团，并歼灭其大部。四十八旅旅长何奇受重伤（后毙命），副旅长万又麟接替指挥，急电胡宗南派兵增援，并命令一四二团向一四三团靠拢，死守阵地，以待援兵，但被解放军警三旅五团阻于城外，无法与旅部和一四三团会合。12时，新四旅、三五八旅进入城区，予敌以重大杀伤，占领大部街区。下午3时，国民党部队用炮火向解放军阵地轰击，新四旅、三五八旅被迫从城内撤出，国民党军又占领西华

池城。夜幕降临后，新四旅、三五八旅再次突入城内。

5日晨，国民党一四二团由唐家沟圈、李家庄一带冲破警三旅五团防线，冲进西华池南大街，企图与在北大街的一四三团会合，先后发起五次冲锋均被新四旅打退。下午3时，胡宗南派3架飞机向西华池新四旅和三五八旅阵地进行轰炸、扫射，造成较大伤亡，新四旅和三五八旅遂暂缓攻势。18时30分，解放军从南向北发动了全面总攻。三五八旅派出小分队接连拔掉敌人三个重机枪阵地。在野战集团军的英勇进攻下，敌一四三团、一四二团阵地很快被突破。国民党部队又以重炮向北街和西街狂轰滥炸，大片民房被炸毁，很多无辜居民被炸死，新四旅和三五八旅部队再次遭受较大伤亡，被迫暂停进攻。

6日晨，野战集团军接到参加延安保卫战的命令，撤出战斗，向延安急进，未能掩护西华池城内居民全部撤离。穷凶极恶的万又麟下令残部向未及撤离的群众进行血腥屠杀，500余人惨遭杀害[①]，73户被杀绝，590余间民房、店铺被烧毁，西华池城变成了一片瓦砾焦土。7日，残敌向南进窜。

西华池战役是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攻延安的侦察战，也是国民党军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以来，解放军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揭开了陕甘宁边区保卫战的序幕，在延安保卫战中有着重要意义。此战有力打击了胡宗南部的嚣张气焰，击毙少将旅长何奇，共歼敌1500余人，俘敌营长以下1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使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计划再次推迟，围攻陕甘宁解放区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受到重创。野战集团军主力部队撤离后，陇东地方部队、合水游击队、武工队继续与敌战斗，缓解了延安西线的压力，为进行延安保卫战赢得了时间。但是，这次战役后期未能很好地掩护群众撤离，使数百名无辜

①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下），1992年3月内部版，第123页。另一说有200余人被杀，此处根据汪泽海、文世贤回忆文章《激战西华池重创胡匪军》所述。

群众惨遭杀害，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在这次战役中，新宁县干部群众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实行全民总动员，全力以赴支援前线，共为部队供应面粉2.2万斤，小米1.6万斤，干粮近万斤，组织担架840副，运输骡马1200头(匹)，做军鞋1200双，全县组织2000多名游击队员、民兵及干部群众随军修筑工事、抢运伤员、输送弹药。有30多名学生参加了伤病员的救护工作。仅盘克一个区就为部队派出向导150名。由于新宁县在西华池战斗中出色地完成了支前任务，关中地委于1947年4月21日为新宁县委书记李科、县长王立成各记功一次。

四、午亭子战斗和细嘴子战斗

1947年3月15日，国民党胡宗南部整编第七十六师新编第一旅第一团占据宁县县城后，派出一个加强营约400余人，由一名中校副团长率领，于3月21日进占午亭子。午亭子位于合水县东南紧靠宁县和陕西富县三角地带的子午岭山中，地处陇东分区和关中分区要冲。敌人占此要点，企图切断关中分区与陇东分区之间的联系，断绝解放军后方供给。七十六师新编第一旅一团进占午亭子后，与驻新宁县的胡宗南部两面夹击，妄图消灭新宁县人民武装力量。为确保后方安全，警三旅五团奉命歼灭午亭子之敌，警一旅负责打援策应。

警三旅五团在当地民兵配合下，22日早晨6时抵达午亭子山前预定地点后，当即发起攻击。五团第二营从正面进攻；第三营从右侧插到敌后切断退路；第一营除一个排警戒外，主力由左翼插入敌军之后，迅速将敌包围。待各营进入指定位置后，第一营迅速向敌发起猛烈攻击。战斗至中午12时，敌军被迫全线收缩，退至一高地固守。为全歼敌军，五团及时调整部署，第一营从右侧攻击，第二营从左侧攻击，旅警卫连从正面攻击，第三营为预备队。下午1时，警三旅组织迫击炮压制敌火力，并将阵地附近的枯木干草打燃，战火借助风势迅速蔓延，敌军顿时陷于混乱败退，警三旅乘势取得战斗胜利。

午亭子战斗，警三旅五团以三个营围歼胡宗南部一个加强营，形成绝对优势。战斗中步兵、炮兵密切协同，对敌实施三面包围，隐蔽接近敌人，突然发起进攻，速战速决，拔除了敌人插入根据地的一个钉子。虽然战斗中解放军、民兵阵亡近百人，但毙敌90余人，俘敌副团长1名，士兵130余人，缴获轻机枪4挺，掷弹筒7具，步枪57支，各种子弹3万余发，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士气。

1947年4月，胡宗南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一旅三团开赴正宁三嘉塬，攻打细嘴子据点。该据点驻国民党正宁县自卫队一个分队。敌人利用有利地形负隅顽抗。警一旅三团二营和当地游击队与敌人相持两天，第二天中午截获罗川驻敌增援的情报后，将计就计，进行战斗部署。第三天上午，一个连伪装成增援敌军。在敌援军到达之前1个小时，二营正面部队和伪装成的增援军在南庄子塬假装交战接火。二营一部佯作败退，且打且走，绕过细嘴子据点，向锦章方向撤去。伪装成敌增援部队的解放军鸣枪紧追，追到细嘴子据点前，化装成敌增援部队连长命令站在城头待援的敌自卫队全部出动，追击解放军。当敌人进入二营的埋伏圈后，遭到迎头痛击，二营未伤一兵一卒，全歼敌40余人，夺取了细嘴子据点。细嘴子战斗是解放区军民主动出击消灭包围之敌的成功战例，显示了军民团结御敌的智慧。

五、国民党重点进攻给陇东人民带来的空前劫难

国民党胡宗南等部队占领陇东革命根据地后，大肆捕杀革命干部和群众，破坏人民政权，奸淫虏掠，摊粮要款，拉丁派夫，杀人放火，对所有百姓家大肆进行抢劫破坏，锅、盆、碗、勺全都砸烂，牛、羊、猪、鸡杀食一空。衣物被掠夺，房屋遭毁坏。胡宗南军进占新宁县后，逐户抢掠，纵火烧毁民房，甚至把大粪倒入面缸内，在饭碗里撒尿，可谓坏事做绝，天良丧尽。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或砸或烧，家家户户被洗劫一空。胡宗南部队还烧了农民刚运上场未碾的小麦，其所

过之处场上麦垛被焚烧殆尽，未上场的小麦在地里放火烧掉。国民党军队所过十余个村庄，火光升腾，焦烟弥漫，呛人肺腑，田间、麦场烟火多日不散。胡、马军队奸淫妇女，迫害百姓，残害革命干部和群众，其手段之残暴，目不忍睹。马继援部在新宁县的木瓜原杀死新四旅生产科长荀麻子，将2名解放军伤员活活打死在土炕上，追杀6名武工队员于岳木川，在康家原打死县统战部长张树成，于绣花楼打死县干部赵立贤、付德显，残杀宽鼻梁村群众李自有，将其头颅割下挂在柳树上；金村3名民兵被捆在树上活活剐死。[①] 1947年4月，马鸿宾八十一师侵占环县全境后，搜挖群众藏粮3800余石，军鞋1800余双及大批物资，杀害干部6人，掳掠4人，策反41人自首；[②] 5月，胡宗南、马鸿逵部占领华池悦乐、元城、将台，烧杀掠抢一月有余，抢去群众法币943万余元，银元1509块，粮食1701石，烧毁饲草9.3万公斤，破坏农具371件，枪杀牲口283头，使3389户农民横遭祸害。[③] 在镇原，6月至7月，国民党军队、民团等在三岔、马渠、庙渠及大、小方山一带抢劫群众毛驴和财物。[④] 同月，马步芳部八十二师袭击曲子县演武区，掳去区长白盘庚、民兵营长乔述明等干部18人。随后在合道、木钵、八珠等地大肆抢劫群众财物，群众损失粮食36石，麦草3万余斤，鸡、羊不计其数，食盐135余公斤，土布缎子40余丈，还有衣服被子、瓷器、家具、口袋等物。[⑤]

胡宗南、青马军队大肆劫掠后，陇东、关中解放区田地荒芜，家破人亡，一片凄惨景象。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支持地主豪绅向人民反攻倒算，把土改中农民分得的土地一律从农民手中夺回，对土地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进行报复打击和残害。他们在占领区强行编查户口，实行保甲制度，并推行以反共为目的"自卫建设"，扩充地方武装，组

① 马西林、王创林：《陇东革命斗争史》，甘肃人民出版社，第152－153页。
②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公室编：《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第408页。
③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公室编：《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第454页。
④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公室编：《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第345页。
⑤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公室编：《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第417页。

建保安团、“自卫队”，组织所谓民兵，编组预备队，建立了一整套反动地方武装力量体系。国民党西北行辕陇东指挥所一次就拨给国民党甘肃省第三区保安司令部步枪690支，用以武装各县“自卫队”。同时，他们征收“警捐”、“特产税”、“地方自卫捐”、防城费、公事费、工旅费、慰军费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逼得百姓走投无路，有的全村弃家逃走，陇东解放区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

第二节　陇东解放区军民的反攻斗争

一、陇东分区军事力量的加强

陇东大部分地区被敌侵占后，由于警一旅、警三旅奉调东进，参加延安保卫战，陇东地区只剩下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独立营及民兵武装坚持斗争，敌我力量悬殊，形势空前严峻。但是，陇东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坚持在敌后发动和组织群众，指挥地方武装力量，机动灵活地开展人民游击战争，牵制和消灭敌人，为反攻作战创造条件。

1947年2月，国民党部队向关中分区发起进攻后，陇东地委即要求“分区全体干部军民必须团结一致，准备全面的游击战争”。2月14日，陇东分区专署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确定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总方针，以整训民兵、战争动员和土地改革为中心任务。与此同时，陇东地委为贯彻西北局关于“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乡不离乡”，坚持就地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的指示精神，决定成立河西工委，负责在环江以西的镇原、庆阳、曲子部分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开展对敌斗争。河西工委由陇东分区副专员谢怀德任书记，地委副书记王月明任副书记，成员有：甘肃工委委员、组织部长陈成义，镇原县委书记刘文山，曲子县委书记李正廷，原环县县委书记李世臣，庆阳县委副书记赵云山，军分区独立一团政委党永良。2月26日，陇

东分区专员公署发布了紧急动员令，号召分区"全体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粉碎蒋胡进犯，保卫边区，保卫陇东，解放西北而斗争。"①

1947年3月，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习仲勋在彬县大佛寺召集关中分区党政军负责同志开会，对关中分区游击战争以及配合主力作战作了部署。军事由警一旅旅长兼政委高锦纯统一领导，警一旅一、三团休整后配合野战部队在关中周围作战。其他地方武装，包括游击队、武工队坚持在关中斗争，伺机向外发展。会后，习仲勋随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部到达关中分区以北的新宁县盘克原武洛村。

为了应对严峻的斗争环境，陇东地委和分区专员公署开始大力扩充地方武装。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关于加强陇东地委领导的决定》，提出加强领导的措施，调整地委、专署领导班子，任命张仲良为陇东地委书记、专员公署专员，李合邦改任地委第一副书记，王月明任第二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谢怀德任第一副专员。与此同时，将陇东警备区改称为陇东军分区，不再由警三旅兼管，单独成立军分区领导机关，张仲良任司令员兼政委，徐国珍任副司令员，李宗贵任副政委，何远平任参谋长，胡友之任政治部主任。调整后的地委、专署和军分区，统一领导陇东地方部队及各县游击队、独立营及民兵开展游击战争。

陇东军分区成立后，原独立团改称独立第一团。以环县独立营为基础，成立了陇东分区独立第二团，田保华任团长，韩明政任副政委，下辖3个连，共300余人。回民骑兵团在原1个连基础上又扩建1个连，共200余人。陇东军分区的成立和所辖地方部队的扩建，使军分区成为一支拥有3个团、1600余人的地方部队，增强了保卫解放区的力量。

二、各县游击大队的组建和根据地军民的奋起自卫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从1947年3月起，陇东分区各县先后成

①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公室编：《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第157页。

立了游击大队，由县长兼任大队长，县委书记兼任政委，各县游击队下编二至三个中队，有游击队员70至100多人。新宁、新正两县的独立营改归县游击大队领导。各县游击大队成立后，在陇东军分区统一领导下，与各县的武装力量紧密配合，广泛开展游击战，运用麻雀战术四处袭扰敌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3月4日，侵占庆阳的国民党军队南撤，陇东军分区独立第一团一部配合庆阳县游击大队收复庆阳县城，县委、县人民政府也进入城内工作，安定群众，恢复秩序。3月13日，合水县游击队在石秀山、胡宗彦、唐凤仪等指挥下，配合万青山领导的宁县武工队，在合水段家集郭家胡同全歼国民党胡宗南部新一旅1个营，缴获一批枪支弹药，陕甘宁边区政府传令嘉奖。22日，警三旅五团在新宁、合水游击队配合下，全歼进犯午亭子的胡宗南部新一旅一团1个营，毙敌90余人，俘敌中校副团长以下130余人。[①] 同月，镇原县长王子厚率游击队深入敌占区孟坝镇，活捉便衣特务3名，割敌电线10多里，切断了敌县城与北部4镇的联系。该县武工队连续出击敌开边、黑渠口等据点，烧毁敌营房7座，摧毁敌碉堡6处。庆阳县赤城区委书记王甲率游击队在白马铺击退敌一个营，冒死组织群众安全转移军粮数百石。4月5日，新正县独立营八连，在五顷原全歼国民党陕西保安六团侦察队14人。

4月8日起，国民党马鸿宾整编第八十一师、马步芳整编第八十二师，在胡宗南部新一旅的配合下，大举进攻陇东解放区，企图消灭陇东、关中分区地方武装，以便集中兵力与西北野战兵团作战。4月21日，陇东地委发出《关于坚持全面游击战争的决定》，号召陇东军民团结一致，坚持敌后游击战争，配合西北野战兵团坚决打击敌人，收复失地。陇东军分区对所辖部队重新进行了部署，命令独立二团、回民骑兵团在环县一带作战，刘明山、马思义任正副指挥，陈致中任政委；独立一团三营在庆阳、合水、华池3县配合游击大队开展游击

① 《甘肃省志·军事志》上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711页。

战争；独立一团一、二营为机动部队，随分区机关活动于东华池、大小凤川，保卫分区领导机关；镇原游击大队单独活动，坚持在敌后袭扰敌人。同日，新正县游击队袭击石底子国民党镇公所，歼灭镇长以下40余人。4月25日，环县车道游击队在豆城子与国民党顽匪张廷杰部激战9小时，重创敌军。4月30日，敌骑二旅第四团分三路进犯华池县元城区，陇东回民骑兵团英勇阻击，掩护区乡干部群众安全转移。

7月3日，回民骑兵团与环县游击大队配合，一举捣毁国民党马惇靖八十一师卡得荣部毛井砖城子兵站，缴获面粉2500公斤，豌豆1万公斤。月底又在甜水堡沙坡子清剿土匪耿兆玺部，毙俘敌13人。从此，回民骑兵团的名声大震，敌人闻之胆战心惊。7月19日，新正县独立营八连又在皮房店伏击敌陕西保安六团的一个连，歼敌20余人，缴获轻机枪3挺，步枪50支，子弹万余发。

1947年3月至7月，陇东解放区的军民在党中央和根据地党委领导下，团结奋战，取得了自卫战的重大胜利，使进犯延安的西线敌军陷入人民游击战争的包围之中，粉碎了国民党妄想一举消灭陇东解放区人民武装，进而包围延安的图谋。

在自卫反击战斗争中，陇东、关中解放区人民在敌后坚持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吸引和牵制了西线之敌，正规部队和各县游击队、独立营、武工队及民兵得到了锻炼、发展和壮大，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战略反攻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三、红土嵚峴战斗

1947年5月，国民党部队攻占华池县元城一带后，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干部群众，到处抢夺粮草。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陇东分区党政军负责同志于5月中旬在华池县元城子召开会议，作出了“集中兵力，选择有利地形，歼灭敌人一部，以打击敌人反动气焰，鼓舞干部群众的斗争意志”的决定。根据会议精神，陇东分区独立一团决定

在距元城20公里，距柔远城15公里的红土崾岘设伏。这里山大沟深，道路崎岖。下面悬崖峭壁，中间一条羊肠小道，只容一人一马通行。独立团准备以3个营的兵力歼敌几个连至一个营。5月18日，陇东分区独立一团和回民骑兵团以小股便衣部队将国民党马继援第八十二师骑二旅四团二连的一个加强排和保安队18人诱进伏击圈发动攻击，不到10分钟就胜利结束战斗，俘敌排长以下34人，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20支，手枪1支，战马32匹。战斗中独立一团团长马福吉不幸牺牲。

四、土桥事件

4月15日至5月31日，国民党整编八十二师马继援部侵占曲子全境。曲子县组织起8支游击队，分别在环江两岸开展游击活动，不时打击敌人。5月24日，陇东地委所属之河西工委召集各县、区、乡干部、游击队共约400人在曲子县土桥区（今属庆城县）东庄塬开会，主要研究发动群众、保护粮食、组织游击队、打击敌人等问题。会议由陇东分区专署副专员谢怀德主持。为防敌人破坏，开会时与会人员分散住周围村庄，并相继三天不断变换会议地点。26日，河西工委得到敌已向土桥方向快速出动的情报，遂决定立即分路向北突围。在突围中遭到了国民党骑二旅四团一部的袭击，阵亡30余人。镇原县委副书记孙久德等60余人先后在野狐沟被俘，被关押于马岭、曲子，后被西野部队解救归队。“土桥事件”也称“野狐沟事件”，客观上由于对敌斗争环境险恶，参加会议人数多，目标大，会期长，虽然做了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但因保密工作不够，给敌人以偷袭的机会，使地方干部遭受巨大损失。

第三节　陇东战役

一、将台、悦乐、老城战斗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兵分两路进犯延安。为保卫陕甘宁解放区，16日，中共中央决定将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扩编为西北野战兵团（简称"西野"），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委，张文舟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刘景范任后勤部司令员。下辖第一纵队、第二纵队（辖独立第四旅、第三五九旅）和教导旅、新编第四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于13日到18日在延安东南的临镇、金盆湾、牛武、茶坊一线打响了著名的延安保卫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共歼敌5000余人。18日，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央机关撤离延安。19日，人民解放军撤离，胡宗南部于当日占领延安。西北野战军撤出延安，转入敌后，采用蘑菇战术，先后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共歼敌1.4万余人。

1947年4月8日至5月12日，国民党西北行辕马步芳之子马继援第八十二师（陇东兵团）、马鸿逵之子马敦静第十八师（宁夏兵团）、马鸿宾之子马惇靖第八十一师（海固兵团）趁解放军主力与胡宗南作战之机，先后侵占陇东分区的庆阳、合水、曲子、环县、悦乐、将台等城镇和三边分区的安边、宁条梁等地，到处烧杀抢掠，对解放区地方武装和党政机关进行"清剿"，陇东、三边形势趋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彭德怀、习仲勋等认真分析西北战场局势，共同研究下一步作战计划，认为当时胡宗南集团主力正在集结休整，不易寻找歼灭战机，加之西北野战兵团在延安东北作战已经出现粮食供应困难，与其坐等战机，不如主动出击，打击"青、宁二马"。遂决定野战兵团主力西出陇东，歼击马步芳、马鸿逵有生力量，收复陇东地区后南下关中或北上三边，以调动胡宗南主力，相机歼灭。

1947年5月21日，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向陇东挺进，发起了陇东战役。在彭德怀、习仲勋亲自指挥下，按照预定计划分左、右、中三路向西隐蔽前进，第一纵队为右路，以消灭曲子、元城敌人作为目标，并

向庆阳以北、华池推进；第二纵队为左路，包括教导旅，消灭合水之敌，并准备歼击由西华池、盘克、宁县方向增援之敌；以新四旅、兵团总部和直属队为中路，以消灭悦乐、阜城并攻击庆阳之敌。5月26日，彭德怀、习仲勋在行军途中又接到毛泽东电报，对陇东战役进行了具体指示。彭德怀、习仲勋率西北野战兵团冒着大雨，昼夜兼程，于28日至29日先后翻越荆棘丛生、梢林密布的子午岭山区，到达陇东华池县怀安、悦乐和合水东部地区。

西北野战军总部进抵陇东后，很快侦悉到国民党军在陇东的分布情况，及时对野战兵团作出战斗部署。5月29日、30日，陇东战役首先在华池将台、悦乐和合水老城打响。四路纵队按照预定方案和部署，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并发起攻击。

将台战斗：国民党马惇靖八十一师主力第六十旅一七九团，驻守将台及附近菩萨山、王家原地区。解放军右路第一纵队三五八旅和教导旅在张宗逊、廖汉生的指挥下，于5月30日零时向敌人展开攻击。由教导旅担任主攻，华池游击队配合，激战至3时许，一七九团放弃阵地西逃，解放军追击，歼其大部。随后又向王家原守敌攻击，经过激烈战斗，攻占全部阵地，歼敌一部，残敌溃逃。解放军七一五团第二营布防南沟门，任务是截断敌军退路和打击可能增援之敌。七一五团第一营于1时开始攻击，2时攻占1340高地，全歼守敌。独立第一旅第七一四团对菩萨山之敌展开进攻，以一部从东面佯攻，主力从侧后攻击。4时攻占大部阵地，歼敌大部，残敌窜至郭沟门西山最后一个碉堡顽抗。经过激烈战斗，到5月31日拂晓全歼这股顽敌，俘虏上校团长马殿邦以下1000余人，将台地区收复。

悦乐战斗：解放军中路新编第四旅于5月28日进驻中庄原、杜家河一线隐蔽集结，准备打击悦乐守敌胡宗南骑兵第二旅第三团。29日，第七七一团进至悦乐南，阻击合水方向可能增援之敌。22时，第十六团由柳树峁出发，第一营绕路进至悦乐西南准备由中庄、郭家沟向李家湾进攻；第二营准备由西沟、寇家沟门向李家湾、悦乐村进攻；第三营准备由东南向西北助攻，并堵击可能逃跑之敌。30日凌晨

2时，第一、二营发起进攻，激战至9时，除南沟门主阵地未攻克外，其他阵地全部占领。接着一、二营开始总攻南沟门阵地，10时许全歼守敌骑二旅三团600多人，俘敌骑二旅少将副旅长陈应权、骑二旅三团少校团长汪韬，缴获战马394匹及各种武器弹药与物资。解放军伤亡副团长1人，战士40多人。

老城战斗：合水守敌为第八十二师骑八旅一部及甘肃保安第二团，分驻合水老城及附近地区。骑八旅是马继援的精锐部队，由其堂叔马步銮任旅长，进攻陇东解放区时常打先锋，疯狂捕杀、镇压革命群众。王震率领西北野战军左路第二纵队和三五九旅及独立第四旅一个团，于5月28日进至老城以东10公里的蒿咀铺，并于次日拂晓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以独立第四旅主力待机于合水县城西、南地区，迎击增援之敌。晚7时，解放军向合水守敌发起攻击，经过一夜激烈战斗，占领了老城外围的二郎山、南寺原及东关等要点，并爆破了第一道障碍，但城垣未被突破，守敌依托城北制高点葫芦把及城垣顽抗。合水之敌被围，马继援急令骑八旅旅长马步銮率领旅直属部队及骑兵第一团1000余人驰援合水守军，进至合水南十里铺华庆寺、白马沟地区，受到第四旅顽强阻击，歼敌200余人，1个连覆没，余部被击溃。解放军俘获战马400余匹。30日，攻城部队又激战一昼夜，仍未破城。31日，解放军一度攻入城内，但又被敌军逐出。其时，马继援又派八十二师师长马全义为总指挥，率一〇〇旅及骑八旅第二团，分南北两路驰援合水守敌。敌骑八旅第二团约1300余骑，迂回至葫芦把原与攻城部队激战，并与城内守军取得联系，使守敌坚守城垣的信心倍增；敌第一〇〇旅亦逼近合水。由于作战良机已失，王震当机立断，将攻城部队撤出战斗。当日下午，第二纵队撤出合水城，配合教导旅击溃增援的敌一〇〇旅，向曲子方向挺进。

将台、悦乐、合水战斗，西北野战兵团共歼敌3200余人，自身伤亡2500余人。虽然西北野战军遭受很大伤亡，但是给敌精锐部队以重创，有效打击了来犯之敌。战斗中，陇东独立团和华池、合水游击大队紧密配合，人民群众给予了大力支援。华池县全县总动员，给部

队带路、抬担架、救伤员、运输弹药、供应给养，并协助部队侦察敌情，追杀逃敌。战斗结束后，彭德怀、习仲勋到悦乐短暂停留，表扬了华池干部、群众支援革命战争，英勇对敌的顽强精神。

二、曲子、环县战斗

陇东战役第一阶段取得胜利后，彭德怀、习仲勋从面临的敌情和扩大战果考虑，决定避开国民党的阻截部队，调集主力向环县进攻，围城打援，歼灭马步靖第八十一师主力三十五旅。作战部署是：第一纵队新编第四旅围攻环县城；第二纵队于环县城东南及西北协助攻城，并准备打援；教导旅集结于环县城以西打援；陇东分区独立团向三岔、驿马方向展开游击，牵制敌人；军分区骑兵团担任洪德方向警戒。6月4日，西北野战兵团到达曲子，国民党八十二师残部闻风而逃，西北野战兵团遂收复了曲子，解救了土桥会议时被俘的镇原县委副书记孙久德等人，并在马岭、曲子地区进行短暂休整。

6月9日西北野战兵团各部由曲子地区出动，向环县挺进。13日先后抵达环县城附近地区。14日，第一纵队及新编第四旅在环县西北5公里处击毁国民党向环县赶运物资的汽车10辆。15日，第一纵队和新编第四旅及教导旅同时对环县城西北二十里沟口、河连湾一带之敌第三十五旅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国民党军撤回环县城及其附近主阵地，企图依托县城及附近玉皇山、王家原固守。

15日23时，西北野战兵团各部对环县城发起总攻。16日凌晨1时，第一纵队三五八旅第八团和七一六团占领敌王家原前沿阵地，并连续向纵深冲击，遇敌顽强反抗，伤亡过重，没有攻破敌人主要阵地。16日3时左右，新四旅七七一团由城西北向玉皇山、玉皇庙守敌攻击，连克敌军两个碉堡后，与敌形成对峙。第一纵队独一旅七一四团于城北沿环江向北关据点攻击。第二纵队三五九旅由城东南向北攻击城东原，教导旅与陇东分区独立一团担任砖城子、三岔方向警戒。11时，解放军各部队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强攻敌军阵地，激战至13

时，敌全线动摇，三五八旅攻占了敌防守的主阵地王家原和玉皇山，歼敌一部，把残敌压向环县城内。接着又迅速攻入环县县城，守敌全线溃败，由城东突围后向北逃窜而去。

收复环县县城后，第二纵队向北追击100余里，在洪德城追歼逃敌一部。环县战斗胜利结束，西北野战兵团予敌八十一师以重大打击，歼敌1177人，俘敌3000余人，击毁敌汽车10辆，缴获各类枪支797支，大炮19门，骡马447匹，并缴获弹药、汽车及大量物资。马鸿宾经营多年的重武器，全部被西野部队缴获。

环县战斗结束后，西北野战兵团在环县短暂休整。野战军司令部驻环县老城内郑文源家中，彭德怀、习仲勋、甘泗淇等首长接见了陇东地委书记张仲良、专员李培福，环县党政军领导人陈致中、陈聚奎、谢占儒等，彭德怀对环县工作作出指示："(1)抓紧环县各级政权恢复工作；(2)组织一支剿匪部队，清剿环县境内残敌与土匪；(3)为野战部队准备粮草等，做好解放大西北的支前工作。"①

6月25日，西北野战兵团主力自环县挥师向北，收复三岔镇和甜水堡后，向三边(定边、安边、靖边)挺进。30日，野战兵团主力接近定边城郊。到7月8日，歼灭国民党整编八十一师一部，余部不战而逃。西北野战兵团迅速收复了定边、安边、靖边和盐池等地，陇东战役胜利结束。

西北野战兵团从5月21日至7月8日，在陇东与三边的南北长370余公里、东西宽180余公里地域内，沉重打击了"青马"和"宁马"两股顽敌，共歼敌4800余人，缴获骡马近千匹，及大批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有效补给了部队。经过陇东战役，西野收复了华池、曲子、环县3县全境和庆阳、合水两县的北部地区，给坚持敌后战争的陇东军民以极大的鼓舞，为这些地区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创造了条件。在这次战役中，陇东地委、专署组织领导分区独立一团、回民骑兵团

① 陈玉山：《收复环县，进军三边》，刘风阁主编：《陕甘宁边区统东的军事斗争(下)》，第381页。

和华池、合水、曲子、庆阳、环县的游击队、武工队、民兵积极参战支前，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西北野战军首长和部队的赞誉。

陇东战役的胜利，沉重打击了盘踞在陇东的国民党整编第八十一和八十二师，发展壮大了西北野战兵团，为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赢得了有利的战略形势。正如当时新华社记者评论所说："陇东胜利意义，不仅简单表示几块地方被收复一些侵犯军的被消灭；她对人民军队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并形成了有利的战略形势。由于陇东是边区著名的农产区……这就给人民军队今后足够的粮食供给；由于陇东位于西兰公路中段的北翼，现在这条公路沿线上的蒋胡军，兵力十分薄弱，因此陇东可能成为人民武装良好的出击地带。这次陇东胜利，又给予杂牌军以严厉的教训"。①

三、九岘阻击战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战略反攻，为了迎接战略反攻的到来，加强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后方工作的统一领导，有力支援西北野战兵团，中央军委于7月20日决定贺龙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下辖晋绥军区、陕甘宁边区各军分区及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骑兵第六师②。7月31日，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西北野战军（简称"西野"）。前委书记、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副政委习仲勋，参谋长张文舟，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副参谋长王政柱，后勤部司令员刘景范。下辖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晋绥军区拨归，辖独立第二、第三、第五旅；

① 1947年6月27日《边区群众报》。

② 原国民党驻榆林二十二军八十六师及榆林保安指挥部保安九团，于1946年10月13日在胡景铎将军率领下起义，11月4日，起义部队与新十一旅一起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下辖3个团，师长胡景铎。次年4月驻防合水县店子区，就地募兵筹饷，8月调离合水，参加宁县九岘阻击战。

其中独立第三旅仍留晋绥地区作战)及教导旅、新四旅,共有8个旅,约4.5万人。西北野战军的成立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扩大,为西北战场上的战略反攻做好了准备。

1947年夏,王世泰、习仲勋指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转战陕西境内,不断打击国民党胡宗南部,并摧毁了敌人在关中分区建立的绝大部分据点。6月下旬,联防军所属警备第一旅(旅长兼政委高锦纯),警备第三旅(旅长黄罗斌、副政委高维嵩)和骑兵第六师(师长胡景铎、副师长胡拯民)等部北上环县,打击敌人。转战月余后,于8月上旬开始南下,8月11日至新宁县九岘、金村、牙村、梁掌等地进行休整。此时,国民党第八十二师为了配合胡宗南部进行沙家店战役,再次大举进犯陇东和关中地区,对西北野战军实行东西夹击。

8月13日,马继援得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进驻九岘塬等地,遂调集所属步兵第一〇〇旅、骑兵第八旅及独立骑兵第五团和师直部队共7个团的兵力向九岘扑来。他以独立骑兵第五团为先锋,第一〇〇旅为右翼,骑兵第八旅为左翼,师直属四个独立营为后卫,师司令部随左翼前进,企图从南北迂回包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14日,联防军侦悉敌骑兵300余人抵麻子掌、绣花楼一线,企图袭击驻梁掌的我关中分区党政机关,分析后认为是敌小股部队出扰,决定在九岘塬东南地区设伏,歼灭该敌。决定由新正游击队前去诱敌,警一旅三团在新庄、西洼一线构筑工事,阻敌上塬,骑六师携辎重集结于桃树庄以东地区,警三旅五团由九岘塬以北直插敌后,断其退路,歼敌于九岘沟内。

15日晨联防军各部到达指定位置。上午10时许,联防军司令部发现马继援的兵力不是几个营,而是几个旅,随即决定迅速撤退,以摆脱敌军。但因道路狭窄,多处被沟壑阻隔,严重影响了部队的转移速度。11时许,敌1个骑兵旅、1个步兵旅由九岘塬南北两个方向夹击而来。鉴于敌情有变,联防军司令部遂令警一旅三团和警三旅五团和骑六师在西洼等地阻击敌人,并令五团一部击退包抄至联防军后方的敌骑,打开芦邑庄通往上畛子的道路,以保证主力部队和关中分区党政机关安全转移。三团和五团接连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后,

迅速撤离阵地。战斗中五团一营副营长王胜富壮烈牺牲。18时，桃树庄以西阵地被马继援部占领。当晚，联防军继续东撤。

16日晨，警三旅五团抵上畛子，敌追兵又迅速逼近，五团迅速占领两侧山梁进行阻击。13时许，敌骑兵一股突破五团阵地，追击正在转移的联防军辎重队和关中分区机关，敌主力则继续向五团发起围攻。为了分散敌人兵力，掩护主力和分区机关东撤，五团遂向槐树庄方向边打边撤，15时才摆脱敌人的追击。从上畛子突破的一股敌骑兵很快追至骆驼巷以西，警一旅二团奉命在此阻击敌人4小时，警一旅三团撤至万家梁一线，与二团交替阻击敌人，才遏止住马继援部的进攻势头，随后又在黄土坡、雕翎关一带，予尾追之敌以重大杀伤，使关中分区和联防军辎重队得以脱离危险。16日傍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关中分区机关向北转移撤入陕西黄陵县境内。同时，马步芳恐其八十二师被解放军围歼，急电马继援速向合水、宁县、西峰撤退。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九岘塬开展的阻击战（亦称"西洼至雕翎关抗击战"），由于战前敌情不明，判断失误，在大敌猝然而至的情况下，联防军陷于被动。在逆境和劣势情况下，虽然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解放军指战员能够正确指挥，随机应变，仍然毙伤和俘虏敌2000余人，保证了关中分区和联防军辎重队的安全转移，阻止了敌八十二师向东援助的企图，保证了西北野战军主力实施沙家店战役的左翼安全。

九岘阻击战后，驻陇东、关中的联防军警一旅、警三旅、骑六师于9月份组建为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王世泰，政委张仲良。

四、陇东解放区大部地区的收复

陇东战役之后，国民党西北行辕撤销陇东作战指挥所，派马鸿宾为陕甘宁边区"剿匪"司令，试图挽回残局。此时，陇东解放区的华池、环县、曲子和庆阳、合水、新宁、新正等县的部分地区已经收复。8月20日，沙家店战役大获全胜。24日，人民解放军在关中分区地方兵团和游击队配合下，收复了新宁、新正县全境。各收复地区很快恢

复了人民政权，继续进行土地改革，扩建地方武装，掀起了踊跃支前和战勤服务的热潮。陇东地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西北局指示，先后发出《关于配合主力争取陇东自卫战争胜利的指示》《关于加强民兵工作的指示》，大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陇东军民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越战越强，牵制了大批敌军，有力地配合了西北野战军主力作战。

西北野战军还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并产生了深远影响。环县县城收复后，彭德怀和习仲勋把在将台战斗中俘虏的国民党军新编八十一师一七九团上校团长、马鸿宾的侄女婿马殿邦请到西北野战军指挥部，作了一次深入长谈。谈话后，决定优待、释放马殿邦，让马殿邦返回宁夏做马鸿宾的统战工作，并给足路费，派专人和马匹护送。这对1949年9月马鸿宾父子率部起义产生了重要作用。

第十八章 陇东解放区的游击战争与西府陇东战役

第一节 全面坚持游击战争

一、陇东地委发布《关于全面坚持游击战争的决定》

为了不断打击敌人，陇东军民一方面积极配合西北野战军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作战，一方面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巧妙地同敌周旋，四处打击驻防陇东的国民党八十一师、八十二师和地方保安部队，不断收复失地，恢复根据地党组织，有力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全国的战略反攻和陕甘宁边区沦陷区的收复。

1947年初，国民党军队占领了陇东解放区的镇原、庆阳、环县、新正4县和曲子、华池、合水、新宁的大部分地区。面对严峻的形势，陇东地委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精神，作出了《关于全面坚持游击战争的决定》。《决定》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救其垂死的统治，集中一、二十个旅的兵力进攻陕甘宁边区，妄图将我党我军驱出西北。但反动派不但永远达不到目的，且已造成了自己严重的军事危机。"[①]《决定》在分析了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后，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面前虽然还有一段困难时期，但是这不但不能把我们吓倒，而

①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下），1992年3月内部版，第123页。

且使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利用这个时期提高我们的部队和干部，锻炼出十几支有力的游击队，建立几大块坚强的根据地，以便迅速配合全边区的反攻，驱逐敌人出陇东并向甘肃发展。"[①]《决定》强调："陇东全面游击战争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对暂时局部的严重困难必须有充分的精神准备。"[②]《决定》对开展宣传工作、坚持游击战争和游击队建设、加强内部团结和与人民的团结、开展赏功罚过运动、开展敌军工作和敌占区工作等5方面工作进行了部署。《决定》根据"现在陇东许多地区已被敌人分割，将来可能更加分割"的情况，要求"各地区的领导必须着重独立自主，各地区的主要负责人和游击队必须准备随时与上级联系中断，单独负责解决坚持全区游击战争的一切问题"[③]。6月13日，陇东地委发出《关于配合主力争取陇东自卫战争胜利的指示》，7月26日又发出《关于反清剿斗争给各县的指示》。陇东地委的这一系列决定和指示，为开展陇东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制定了政策，做出了具体部署，为夺取斗争的胜利做了重要准备。根据地委的指示精神，陇东各级党组织、基层政权、广大党员干部和地方武装力量就地坚持斗争，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与进犯的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游击战争。

二、陇东军民开展全面游击战争

1947年8月8日，环县游击大队在甜水堡沙坡子击溃国民党环县保安团敬明君部，毙敌17人，俘敌15人，并缴获步枪21支及其他军用物资一批。9月初，新正县独立营八连奔袭敌彬县香庙镇守敌，

①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下），1992年3月内部版，第124页。

②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下），1992年3月内部版，第124页。

③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下），1992年3月内部版，第127页。

一举攻破碉堡两座，毙敌10多人，俘敌100多人。中旬，环县游击大队、县警卫队在三郎店击溃国民党环县自卫队，毙敌6人，击毙其总队副慕长禄。在艰苦的斗争中，陇东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1947年9月28日，陇东地委发出扩兵工作指示，在全区掀起参军运动。从10月开始，陇东各县遵照地委《关于全面坚持游击战争的决定》和扩兵工作指示，大力开展宣传和征兵工作。到12月底，全区实现扩兵5000余人（包括扩大的游击队在内）的目标，其中合水扩兵700人，华池扩兵550人，环县扩兵800人，庆阳扩兵1150人，曲子扩兵1000人，镇原扩兵800人，陇东军分区正规部队发展到3400余人。11月，华池县所属的柔远、悦乐、白马、温台等5区的游击队和一部分新兵共计380人，被改编成华池独立营。12月，曲子县游击大队的一、三、四中队和一部分新兵共300余人，被编成曲子独立营。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1948年1月，在各县扩兵的基础上，陇东解放区对部队进行了扩编，先将独立一团扩至3个营，达到2000多人枪。又在华池、曲子两个独立营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了陇东军分区独立二团，下辖2个营，共700多人枪。回民骑兵团也补充了兵员。在扩军和整编的基础上，各部队充分开展教育和训练，加强统一指挥，提高了战斗力。

在扩兵和加强训练的基础上，陇东解放区军民展开深入广泛的游击战争。1948年2月19日，陇东分区的独立一团、二团各一部配合环县游击大队在环县毛井的高滩滩与国民党六十一师卞得荣部激战4小时，歼敌40余人，缴获枪40支，战马40余匹，子弹1万余发，六〇炮1门。3月26日，合水县游击大队全歼国民党合水县西华池乡自卫队，俘敌20余人，缴枪26支。

1948年三四月间，陇东分区的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对敌出击更加频繁。3月4日，陇东军分区独立二团三营在曲子南五里桥，与国民党环县自卫队第二大队王世五部发生激战，王部溃败。5日，独立一团、回民骑兵团和环县游击大队，在马坊川与国民党八十一师三十五旅一〇四团的一个支队及敌环县自卫队一、三大队遭遇，激战数小时

后，敌全线溃逃。23日，独立一团一营、曲子县游击大队二中队，在土桥击溃国民党环县自卫第二大队，毙俘敌4人。28日，镇原县游击大队奔袭三岔南堡子，敌向南逃窜，游击大队追至牡丹洼，歼敌11人，俘敌保安队长李玉章以下29人，收复三岔镇。

4月初，为了进一步加强地方武装建设，整编地方人民武装，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并对陕甘宁晋绥各军区、军分区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编制。陇东军分区改称第四军分区，徐国珍任司令员（代），李合邦兼任政委，下辖的陇东独立一团改为陕甘宁边区警备十三团，陇东独立二团改为陕甘宁边区警备十四团，回民骑兵团改为陕甘宁边区回民骑兵团。

4月12日，奉上级命令，陇东分区警备十三团、警备十四团和回民骑兵团从曲子八珠原出发，到合道川陶洼子、唐台子一线进行短期休整。4月17日，国民党八十二师骑八旅、一〇〇旅1个团、独立骑兵五团及甘保三团、六团共7个团的兵力，从镇原、庆阳、曲子方向奔袭我正在休整的部队。18日上午，敌驻西峰的独立五团由驿马关出发，经庆阳的野狐沟和曲子的西沟，与甘保三团从三十里铺北上，集结于曲子镇，随后由当地许应南匪部引路到达木钵，遭到三边回民骑兵团的迎头痛击，敌立刻缩回曲子、五里桥一线。下午，敌骑八旅的两个骑兵团、一〇〇旅的一个步兵团越过大小方山到达环县天池以东，经曲子合道川北上向陶洼子扑来。敌甘保六团从镇原出发经演武、黄家山、小湾掌向唐台子、合道方向扑来。此时，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徐国珍去外地开会，分区政治部主任李正廷和十三团团长陈应堂受命指挥。为避免与强敌决战，他们决定警备十三团留一营抢先占领胶泥湾崾峴，构筑工事，掩护大部队撤退。19日8时，当一营撤至胶泥湾崾峴时，敌人也已赶到并疯狂发起攻击。接着魏家塬的敌骑八旅、一〇〇旅一个步兵团、骑五团、甘保三团对一营进行夹攻。一营营长马宇民指挥部队沉着应战，集中火力封锁崾峴口子，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深夜，当分区机关和部队转移到安全地带后，一营才撤出战斗，向马坊塬转移。战斗中，为了大部队的安全转移，坚守前沿阵

地的一营一连因寡不抵众，大部分战士英勇牺牲，103人只突围出高峰、沈万祥等5人。21日，陇东军分区部队完全摆脱敌人，在樊家川、八珠地区休整总结。

胶泥崾岘阻击战，由于战前警戒不严，被敌人摸清了情况，进行远距离奔袭，造成仓促应战，使部队受到较大损失，牺牲100余人，被俘20人。但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十三团一营指战员不怕牺牲，以小部队掩护大部队撤出包围圈，歼敌200余人，取得了阻击战的胜利，充分显示了陇东地方部队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胶泥崾岘阻击战后不久，6月3日，曲子县游击大队二中队在陇东军分区十三团1个排的配合下，在马岭区野狐沟桑树崾岘袭击了国民党环县自卫队二大队一、三中队，活捉副大队长许应南以下48人，缴枪40余支。6月16日，陇东分区十三团、十四团一部配合回民骑兵团，在合水店子全歼国民党甘肃保安一团二中队及店子自卫队，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18支。

三、陇东、关中解放区人民在游击战争中的英勇表现

在游击战争中，陇东、关中解放区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战斗英雄和人民功臣，立功受奖者达300多人。1947年2月11日，边区政府通令嘉奖：率领30人突破敌200人重围、坚决保卫王郎坡的新正县一区四乡模范民兵连长赵思泰和排长巩守信；指挥新宁县一区三乡民兵击退顽军35次进犯，坚决保卫贾峪川的民兵连长李生金；10枪击毙8个敌人以及单枪攻破敌碉堡的神枪手刘治全和路进礼。同年4月14日，陇东地委作出决定，由分区专署颁布命令：给在对敌斗争中坚决勇敢，做出优异成绩的镇原县长王子厚、四区区委书记陈宗祥，庆阳县县长杨福祥、县委副书记赵云山、统战部副部长贾庆礼，合水五区区长石秀山、保安分处外勤股长薛浩平、孟坝外勤干部余凯及延安工作团谢玉田等9人各记大功一次，并号召分区全体军民向他们学习。关中分区专署通令嘉奖了新宁县委书记李科、县长王立成、

大队副郝伯雄。新宁县一支队指导员、抗大毕业生胡治德英勇善战，1947年夏在白虎村创下了自己无一伤亡而毙敌12名、俘敌4名的伏击战例，受到关中分区司令部嘉奖。合水县石秀山领导五区游击队，同敌人战斗数十次，缴获各种枪支172支，夺回粮食100多石，成为一支英勇善战、群众拥护、敌人害怕的模范游击队。1947年5月23日，边区政府发布嘉奖令，表彰了石秀山并颁发其"新民主主义奖章"一枚。

在游击战争中，许多优秀的陇东儿女血洒疆场，壮烈牺牲，以他们的鲜血和生命为革命铺就了胜利之路。木钵区委书记李向华、游击队长李建成，1947年5月在八珠原杏树沟为掩护八珠区兄弟游击队转移而遭敌包围，宁死不当俘虏，双双站着自杀。合水店子区民办合作社主任彭贵次子、肖嘴区委副书记彭振刚被敌人杀害后，彭贵送五子彭振怀入伍，并在大会上高声说："我有5个儿子，振刚牺牲振怀补，再留两个作预备！"1948年4月彭贵被敌人抓捕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1947年冬，新宁县游击一支队指导员胡治德不幸被捕，被敌人拴在马尾上，从湘乐一直拖到宁县城，后被活埋。新宁县武工队队长邵培田遭敌包围后，以死相拼，因重伤被俘，残暴的敌人把他的头割下来悬于宁县城门示众。还有牺牲在南京雨花台的环县县委统战部部长秦明、被叛徒杀害的正宁回民游击队指挥员王世英、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的陇东独立一团团长马福吉等，都是党的先进分子和陇东儿女的优秀代表，是陇东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第二节　西府陇东战役

一、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

1947年3月至12月，西北野战军在党中央的直接指挥下，共歼

灭国民党军6.69万多人，地方武装、游击队和民兵共歼灭国民党军1.4万多人，使西北战场上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在这一有利形势下，为研究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的基本任务和各项政策，1948年1月，彭德怀司令员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西北野战军第一次前委扩大会议，会议作出《西北人民解放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指出：西北野战军已由"防御转入进攻，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并指出：西北野战军进入蒋管区后的基本任务有两项，"一个是大量消灭敌人；一个是建立根据地"。在根据地建设问题上，《决定》还就在新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群众武装、建党建政、平分土地等问题和扩大反胡宗南部统一战线，争取宗教迷信帮会组织，保护学生、教职员工和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取消国民党、三青团及国民党政府等各项新区政策做出了明确规定。在大量消灭敌人的问题上，《决定》指出：必须灵活地坚决执行十大军事原则，采用新的方式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党和部队的组织建设，善于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军事训练，成立野战军组织财政经济委员会，保证部队物资供给。

西北野战军第一次前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即转入外线反攻作战。西北野战军前委又于1948年1月29日在米脂县吕家沟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具体讨论和部署南下作战问题。

国民党军队在全面防御失败后，采取了"分区防御"和"总体战"方针。针对敌人部署，中共中央、毛泽东及时指示西北野战军，在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后，向延安、宜川线出击，得手后向该线以南、渭水以北进攻，建立渭北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西北野战军制定春季作战方案。2月12日，西北野战军离开志丹、绥德、米脂等地南下，发动宜川、瓦子街战役。3月3日，宜川、瓦子街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3万余人。此后，西北野战军转入第二阶段作战，于3月5日至4月5日获得了"黄龙山麓战役"的胜利，歼敌约3200余人，支援和配合了中原解放军作战，扩大了解放区。

二、西府陇东战役

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后，调动国民党裴昌会兵团北援，此时西府[①]、陇东地区，除泾阳、耀县、淳化一线有敌暂编第二旅、新编第九旅、骑兵第二旅；西安有青年军第二〇三师；甘肃镇原、西峰有马步芳部第八十二师外，其他14个县兵力空虚。就连胡宗南集团重要后方供应基地宝鸡，也仅有敌第七十六师师部等2000余人守卫。鉴于这种情况，西北野战军决定发起西府陇东战役，伺机夺取宝鸡，调动裴昌会兵团及延安、洛川守敌，并寻机歼灭。

4月7日，西北野战军主力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四纵队、第六纵队由黄陵、澄城西移。12日，集结于关中马栏、转角、照金、庙湾地区，做好了战役准备。13日，西北野战军总部在马栏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部署西府陇东战役。

4月17日战役开始，西北野战军兵分三路向西府、陇东之敌发起进攻。第二纵队、第四纵队为左路，18日攻占陕西永寿长宁镇，占领了永寿县城（监军镇），斩断了西兰公路。19日至22日，左路军又歼灭了扶风守敌，占领了武功以西的绛帐车站，斩断了西安至宝鸡的铁路交通。与此同时，中路第一纵队与右路第六纵队也分头行动，于4月17日攻占甸邑、职田镇等地，18日肃清了长武至淳化间泾河两岸之敌，渡过泾河。随后又连续攻占了彬县、麟游、长武、灵台等县。4月23日，三路大军继续前进，很快控制了陇海铁路，包围了宝鸡。4月25日，西北野战军开始向宝鸡发起进攻。经过一昼夜激战，攻克宝鸡，歼敌2000余人。胡宗南察觉西北野战军攻取宝鸡的意图后，即令裴昌会兵团及马步芳部第八十二师共11个旅的兵力，星夜向宝鸡前进，企图夹击西北野战军于宝鸡地区。

西北野战军为摆脱被国民党军两路合击的被动局面，4月28日

① 指西安以西的泾河、渭河之间的地区。

拂晓前撤出宝鸡北上，向陇东地区转移。裴昌会兵团、李振兵团尾追西北野战军主力北上，企图南北夹击西野主力于宝鸡以北的狭小地带。28日，西北野战军主力在凤翔西南灵山、蔡家坡一带与裴昌会、李振兵团激战后，野战军总部命令六纵队北上进军镇原屯字镇，并以屯字镇为据点，吸引"马家军"，掩护野战军主力渡过泾河，向东北方向转移，以便集中歼灭"马家军"。

5月3日，西北野战军主力占领崇信县城，当日夜经泾川、平凉之间的花所镇、王村地区，通过西兰公路及泾河，继续北撤，计划以第六纵队进至屯字镇地区，第二纵队进至泾川西北集结。并于6日以第六纵队巩固屯字镇，策应第一纵队夺取肖金镇，尔后以第一、第四纵队夺取西峰镇。此时，国民党军企图以整编第八十二师，配合裴昌会兵团，围歼西北野战军于屯字镇、西峰镇、宁县以南地区。

5月5日，西北野战军先头部队第六纵队进抵镇原县屯字镇。国民党马继援整编第八十二师步骑兵共3个团从镇原东进，先行堵击，进而从东、西、北三面，将六纵教导旅包围。屯字镇为一土城，方圆仅几百米，城南依城垣有一道宽20余米、深30余米的浅沟，城东、西、北三面是开阔平原，六纵队所属新四旅，尚在开进途中，距屯字镇还有10多公里行程。教导旅所属第三团被敌军阻击于镇外。六纵队教导旅当即部署兵力，阻击敌人。

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得知教导旅被围，即令教导旅固守待援，吸引敌军，为主力歼灭马继援部创造条件。教导旅以土城为依托，接连打退敌军的多次进攻。当日晚，国民党第八十二师特务团、山炮营等部增援，敌军总兵力达到5个多团，连续发起猛烈攻击，企图以优势兵力吃掉第六纵队教导旅。六纵队一面将情况电报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一面令新四旅前往增援。

5日夜，新四旅赶往解围，教导旅第三团也投入战斗，与国民党军发生激战，虽攻占部分阵地，但未能接近城垣与被围部队沟通。国民党后续部队投入战斗后，马继援亲自督战，拼命进行反扑，阵地你争我夺，几经易手，双方都遭受严重伤亡。解放军新四旅十六团政治委

员常祥考、一营教导员刘宾、二营教导员史晋昌等英勇牺牲。在旅长陈海涵指挥下，教导旅在城内忍受饥渴之苦，与数倍于己的敌军浴血奋战，顽强抵抗国民党军的攻击，杀伤敌军800余人，自身伤亡500余人，旅卫生部副部长王仲斌、二团政治处主任赵明月壮烈牺牲。

彭德怀亲临屯字镇附近观察地形和敌情，拟定作战计划，决定第一、第四纵队于5月6日拂晓由党原镇、玉都庙赶往屯字镇，会同第六纵队歼灭围攻屯字镇的马继援整编八十二师。6日下午3时，除第一纵队三五八旅被胡宗南第六十五师所阻外，其余部队均抵达屯字镇附近，对包围屯字镇的马继援部进行反包围，形成内外夹攻的态势。但在战斗中，因各纵队协同不好，形成逐次冲击，因而仅给马继援八十二师以重大杀伤，未能全歼该敌。此时，胡宗南两个整编师正向屯字镇逼近，国民党空军也派出10多架飞机向西北野战军狂轰滥炸，形成敌我包围、反包围的裹夹混战局面，使西北野战军围歼马继援八十二师的计划难以实现。

在敌情变化于西北野战军不利的情况下，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命令教导旅突围。6日晚，在新四旅等部接应下，教导旅从屯字镇东南角突围，顺沟底东撤。7日凌晨第六纵队机关及教导旅分三批依次从屯字镇南部翻沟上原，到达屯字镇对面约5公里的王庄，与西北野战军大部队会合，随后向东转移。

西北野战军转入陇东地区后，马继援即令其独立骑兵第五团和甘肃保安第五团进驻肖金镇，企图配合胡宗南部堵截围歼西北野战军。5月6日，西野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即向肖金镇进军，包围了守敌，激战8小时，给敌以重大杀伤。与此同时，该旅第十一团抢占肖金镇东南8公里处的三不同，构筑防御工事，以保障主力前进道路上的安全。7日晨从屯字镇撤退的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向肖金以东地区转移。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命令第四纵队在屯字镇至肖金镇的公路沿线，构筑野战工事，转入机动防御，掩护主力东移。5月7日，彭德怀在王庄指挥部队向肖金、西峰镇撤退，由新四旅担任掩护，且战且退，第四纵队进至三不同地区，又与追上来的马继援部激战，双方伤

亡惨重。

马继援得知西北野战军主力从屯字镇向东转移，即率八十二师主力追击。7日上午8时，马继援部在肖金镇以西15华里处的马头坡、南头李家等地追上了西北野战军后卫部队第一纵队独一旅。该旅指战员在旅长王尚荣指挥下，与敌展开激战，打退敌人步骑兵的多次冲击，遏制了敌人的攻击势头，使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和兄弟部队摆脱了敌人的纠缠。第六纵队新四旅在肖金镇西南显胜尚咀、宁县西沟等地与马继援部遭遇，展开激烈战斗，该旅十六团团长袁学凯和战士们一起，与攻上来的敌人肉搏，多次打退敌人的集团冲锋，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在危急关头，七七一团政委张世功率领党团员扼守前沿，杀退敌人的冲锋，稳住了阵地。17时，新四旅在转移中又与马继援骑兵团多次激战，部队被冲散，遭受较大伤亡。

5月7日上午，西北野战军东撤先头部队第四纵队警三旅第七团包围了宁县城。不久，第六纵队和第四纵队主力也转移到宁县城郊。宁县守敌为马继援部八十二师直属工兵营和师特务团1个连，加上宁县自卫队共有1300余人，城内关押着俘获的解放军及地方人员800余人。第四纵队计划攻占宁县城，消灭守敌，为主力东进打开通路，并解救被俘人员。5月8日下午，警三旅第七团渡过马莲河，抢占东原后，向宁县城发动攻势。第七团在第五团的配合下，首先消灭了南山和东原等外围敌人，又以大炮轰击敌军据点、工事。战斗至天黑，城未攻下，警三旅奉命撤出战斗。城内被关押的解放军被俘人员，听见枪炮声，以为解放军发起了攻城战斗，便奋起响应，组织越狱暴动。他们以门板为掩体阻挡敌人的子弹，有的用土块、石头攻击敌军看守人员，有的搭成人梯爬上坑院，冲向敌人，夺取武器。敌工兵营长谭腾蛟急令属下疯狂屠杀，300余名被俘人员英勇就义。这一事件史称"宁县五八惨案"。

5月8日凌晨，马继援率骑八旅、独立骑兵第五团及一〇〇旅二九八团赶来支援宁县守敌。这时，西野各部正向东转移。为了掩护主力东移，警三旅奉命撤至宁县城东南十里铺、南桥子一带阻击敌

人。南桥子有两条峴道，相距千余米，南高北低，两边为狭谷，警三旅以第七团为主力，构筑工事阻击敌人。上午9时，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机关通过南桥子。不久，马继援部尾随追来。警三旅集中火力，打退敌人的多次冲击。敌军从正面攻了几次，未见奏效，便组织骑兵从九龙河沟迂回，包抄第七团后路，战场一时出现紧张局面。警三旅坚决阻击敌人，旅部随即命令第五团投入战斗。旅长黄罗斌亲自到七团指挥战斗。第四纵队司令员王世泰、政委张仲良也留在南桥子后面的清华村，决心和两团指战员共同完成阻击任务。全旅指战员士气大振，五、七团紧密配合，英勇抗击敌人，马继援部终未能越南桥子阵地一步。黄昏，警三旅胜利完成阻击任务，奉命撤退，五、七团交替掩护，向后方转移。

警三旅从南桥子撤退后，继续担任断后任务，按照上级命令，在宁县以东良平镇再次阻击敌人。5月9日上午12时，该旅第七团进至良平城，团长冯有才、政委许发善立即部署兵力，一营据守城西北外围要点，卡住咽喉地带，二、三营和团直属队据守城垣，封锁通道。

10日上午9时，马继援八十二师主力齐集于良平土城周围。11时，敌人开始全力攻城。七团沉着应战，打退敌人的多次冲击，战斗非常激烈。下午2时，国民党军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攻占了一营扼守的土围子附近民房及要点，一营遂撤入城内。部队英勇奋战，半天之内打退了敌人10多次冲锋，牢牢地守住了阵地。战至天黑，七团利用夜幕突围，连夜东去与主力靠拢。马继援部惧怕深入革命根据地后被歼，遂退回宁县。西北野战军遂摆脱国民党部队追击，12日转移至关中分区的马栏、转角、高王镇解放区休整。

西府陇东战役历时近1个月，西北野战军大兵团行动，深入敌后，转战千里，先后收复了延安、洛川、旬邑等城镇，并一度解放陕西、甘肃两省境内14座县城，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军有生力量，共毙伤俘敌21940余人。解放军也遭受了较大损失，其中屯字战斗是解放战争中发生在陇东最险恶、惨烈的一战。西府陇东战役将西北解放战争的战场推进到国民党统治腹地，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

在政治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巩固和扩大了解放区，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使人民解放军军需得到补充，为继续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拉开了陇东全境解放的战幕。

三、二谷原[①]战斗

在西北野战军进行西府陇东战役的同时，陇东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为了配合战役，迎接西北野战军北上陇东，决定发起收复庆阳失地的战斗，以牵制驻西峰、镇原的国民党第八十二师。

1948年4月28日，西北野战军开始向陇东转移。4月29日，三边分区地方兵团和陇东分区地方兵团遵照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的命令，兵分东、西两路向庆阳北部地区挺进。西路由陇东军分区司令员徐国珍率领十三团、十四团、回民骑兵团，共2500多人，由环县经木钵、曲子向庆阳北部的贾店子、二谷原一带迂回；东路由三边军分区司令员郭炳坤率领铁八团、蒙汉支队、骑兵团共3000多人，由三边经华池元城、新堡进入庆阳玄马樊家庙村以北柏树原一带，合力收复庆阳县城。30日，两路部队在庆阳城西北的樊家庙地区会合。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电令陇东分区和三边分区组成临时前方司令部，由郭炳坤任司令员，徐国珍任副司令员，司令部驻樊家庙二谷原附近的罗家庄。陇东回民骑兵团随司令部驻防，陇东十三团驻二谷原头侯家崾岘以南一带；十四团驻东川贾店子以东蒲家原一带；庆阳游击队驻贾桥。三边分区铁八团、骑兵团、蒙汉支队驻西川三十里铺、四十里铺一线。

经侦察得知，庆阳城内驻有李鸿轩甘保一团四个中队及新堡乡、三十里铺、凤城镇几个自卫队，并有当天从驿马关赶来增援的保三团一部，总兵力1000多人。庆阳外围的兵力是马继援的八十二师，大部分集中在彬县、长武一线，少部分驻守西峰镇。据此部署围城计

① 古称"庆原"，也有"二轱原"、"二轱辘原"的写法。

划，陇东军分区部队向正北方向，三边军分区部队从西北方向，庆阳县游击队从东北方向，向庆阳城运动，形成对庆阳的包围，次日拂晓发起总攻。

30日，前方司令部命令十三团在二谷原畔用迫击炮、轻重机枪，向城内之敌发起攻击。但李鸿轩率团丁固守城门，未予还击，并密电驻宁县的马继援八十二师骑兵团火速增援。

5月1日拂晓，庆阳游击队刚到东塬封台子，就发现国民党八十二师骑五团从肖家原下山，向二谷原方向运动，距庆阳游击队仅有一沟之隔。庆阳游击队迅速将敌情向前方司令部作了汇报。司令部立即决定暂停攻城计划，命令十四团一营在侯家崾峴准备正面阻击，十三团坚守樊家庙，游击队在罗家庄原畔准备侧击，陇东回民骑兵团配合十四营准备二线阻击增援之敌。

上午8时，国民党骑五团向十四团三营前沿阵地齐家崾峴发起攻击，三营多次打退了敌人的冲锋。敌因几次冲锋未见奏效，便出动全部骑兵全面进攻，由于地形不利，十四团三营伤亡惨重。敌骑兵又向前方司令部驻地进逼，司令部、陇东回民骑兵团只得北撤。为了掩护司令部安全撤退，十四团一营、十三团三营，与敌展开了殊死搏斗。经过两小时激战，解放军接连失利。为保存实力，部队撤至樊家庙与柏树原一带，被敌军隔成两半。在危急关头，徐国珍司令员命令回民骑兵团团长马思义率部在罗家庄侧击敌人，增援十三、十四团，但遭到齐家崾峴敌伏兵的轮番冲锋，回民骑兵团一连连长马思珍不幸中弹落马，部队伤亡严重，十三团、十四团处境更加险恶。与此同时，庆阳城内的甘保一团团长李鸿轩率保安队向二谷原十三团发起进攻，埋伏在齐家崾峴的敌骑兵也向十三团侧后迂回进攻。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一、二营分两路从二谷原突围，在樊家庙与十四团、回民骑兵团会合后，重新组织战斗。这时，三边分区铁八团（步兵团）赶来增援，十三团炮兵连用炮火猛烈袭击敌骑五团，敌骑五团开始混乱。乘此机会，十三团、十四团和回民骑兵团一起向敌人发起反冲锋，给敌以较大杀伤，敌一营长被炸死，敌骑五团、甘保一团仓皇逃回庆阳城，

下午4时战斗结束。由于敌情变化，陕甘宁边区联防军放弃了收复庆阳的计划。

二谷原战斗，陇东、三边分区部队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根据敌情变化，灵活使用战术，以英勇顽强的英雄气概，给敌以重大杀伤。虽未实现收复庆阳之目的，但在国民党八十二师背后猛扎一刀，有效牵制了敌人，积极地配合了西北野战军进行的西府陇东战役。

第三节　陇东国统区党的工作

一、中共宁县工委的主要工作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共宁县工委下辖宫河、早胜、平子、南义井、西区（辖新庄、和盛、太昌）、城关[①]6个区委，17个支部，300多名党员。1945年秋到1946年底，中共宁县工委又在城关、南义井、什社等地发展了一批党员。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宁县工委的工作移交合水县委，由合水县委统战部部长白生彩负责。为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宁县工委建立了一支以地下党员为主的武工队，侯青山、王俊喜先后任队长，寇来宾为指导员，有队员12名，长枪10多支。

宁县工委努力做好党的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宁县国民党统治区，党能够站住脚，党组织得到发展，成功的统战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南义镇是宁县到西华池的必经之路，敌人在这里遍设关卡，严格搜查，给解放区向国统区转送文件、人员制造了重重障碍。为了打开通道，宁县工委设法与驻守的国民党第十七军接触，经常向十七军官兵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利用其同国民党嫡系部队的矛盾，建

① 包括春荣，过去叫武汗，也有进宽的写法。

立友好关系。同时,宫河区委又与不满国民党腐败的南义镇镇长曹佩玉建立关系。有一次曹佩玉打开城门,接应解放军安全过镇,消灭了一股敌军。

1946年底,宁县工委改称宁县县委,合水县委副书记白生彩兼任宁县县委书记,万青山任组织部长,米坚任宣传部长,机关仍设在西华池。1947年2月,宁县县委直接划归甘肃工委领导。3月至6月,由丁志明任书记。7月至9月,合水县委书记李科兼任书记,万青山任副书记。9月,宁县县委书记由合水县委书记刘永培兼任,潘光亚任副书记,吕建洲任组织部长,马宗瀛任宣传部长,王俊喜任武装部长,委员有刘永康等。

1946年底,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进攻,到1947年元旦,敌人已侵入新宁县的西坡乡[①]。宁县成为国共双方相争的战略要冲,先后在宁县的平子镇、九岘西洼及合水的西华池、午亭子等地发生激战。在残酷的斗争形势下,宁县工委的党员坚持斗争。

1947年2月,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共陇东地委召开统战部长联席会议,之后,将原属陇东地委统战部领导的宁县县委划归甘肃工委领导。在甘肃工委领导下,宁县县委逐步恢复旧有组织,首先对城关党组织进行了审查整顿,早胜、宫河、倍吉[②]等地的党组织也初步接上了关系。

1947年9月22日,宁县县委副书记万青山等在武工队掩护下,准备接近春荣"打击坏人,清除特务"。万青山等人经盘克上庄子时被敌发现遭到尾追,撤退时因道路生疏误了时间,造成严重损失。宁县县委部分文件落入敌人手中,万青山一行2人受重伤,2人被俘。上庄子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甘肃工委十分重视,多次发出指示,并调宁县县委主要负责人潘光亚、吕建洲到甘肃工委机关驻地研究工作。宁县县委对事件及时调查处理后向上级写了报告,拟定

① 今属正宁县管辖。

② 即现在的彬县北极镇一带。

了《宁委在上庄子事件后对宁县地下党的工作方案》，从思想教育入手，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明确了工作重点和任务，并对已暴露的党员作了妥善安置。1948年2月，甘肃工委发出《对宁县工作指示摘要》，要求宁县县委开展以下工作：第一，对旧组织深入了解，慎重地进行个别审查。有问题的、不起作用的洗刷，能用的用。但对同志的政治问题应持极严肃的负责态度，经审查没有问题则依此了解其他支部。第二，工作重心要跳出旧圈子，开辟新工作，不在旧圈子花费时间，放手发展群众工作，组织"自家人"，在群众工作基础上建立党的组织。第三，领导思想切忌依赖大军，等待大军，要在大量发展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建立武装工作。第四，党的组织路线是依靠贫雇中农为骨干，但地富及中上层分子如果积极活动做革命工作，愿意入党也可发展，不能忽视敌后方各阶层反蒋反胡的作用。第五，开辟新的工作，主要依靠几个干部迂回到敌后去活动，放手开展群众工作，积极的准备搞武装（群众性的）斗争，并同时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准备迎接开展后的局面。第六，同关中地委发生联系，就近请示领导。

甘肃工委对宁县工作的指示，对宁县党的工作在受到挫折后重新恢复有重要指导作用，也为以后工作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1947年冬以后，宁县党的工作由"消极隐蔽、孤立分散"状态改为放手开展活动。宁县县委对全县各级党组织进行整顿，加强组织建设，促使群众工作、统战工作、武装斗争、支前工作全面展开。将全县分为3个大区，分别派出工作组开展整顿。整顿方法是先与领导人接上关系，对整个地区的工作情况加以了解，然后逐支部、党员进行严格审查教育。重新建立小组、支部，选举负责人，建立会议汇报制度等。总计全县接受审查教育的党员有131人，发展新党员90人。

1948年10月6日，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和陇东地委书记李合邦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汇报宁县工作取得的进展，提出了宁县工作的方针和任务。11月，甘肃工委将宁县县委改称为宁县工委，直属甘肃工委领导，宁县县委副书记潘光亚代理书记，吕建洲、韩学敬为委员。此后，孙作宾还于11月27日、12月30日和1949年2月7日，多次致

信宁县工委，指出宁县工作要注意的问题，及时给予指导。到1949年6月宁县工委和新宁县委合并时为止，共辖有宫河、平子、春荣3个区委，25个支部，党员222人。

宁县工委在甘肃工委和陇东地委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不仅出色地开展国统区的统战工作，而且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发展党的组织，有力配合解放区的各项工作，为国统区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二、国统区人民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随着国民党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对陇东人民的统治更加暴虐，陇东国统区的农民、学生以及士兵等不断以各种形式展开了同国民党政府的斗争。

1946年春，宁县米桥小学的毕业生米世春、米瑞祥、马先觉等7人毅然越过国共边界线，投奔边区，他们被新宁政府介绍到延安求学，后转入马栏的关中师范。国民党政府发现学生进入边区后，惊恐异常，立即逮捕学生家长为人质，又密报胡宗南部第四十八旅，逮捕了米桥小学校长米炳炎和教导主任刘万友。米炳炎、刘万友在彬县屡受酷刑，横遭摧残，米炳炎出狱后不久死去，刘万友被开除公职。但国民党的残酷镇压，未能打击进步师生奔赴解放区的决心。1949年，米桥小学又有毕业生和教师多人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

1947年，镇原县南三镇农民组织起来一支游击队，活动在中原、平泉、新城、开边、黑巢口一带，领导农民建立秘密农会，开展抗丁、抗粮、抗税斗争。

国民党在陇东的暴虐统治不仅引起了青年学生和农民的不满，也引起了国民党部分官兵的不满，不断有人弃暗投明，加入革命阵营。1947年1月，国民党旬邑县民众自卫队第一大队五中队一分队28名士兵杀死队长，携带武器投奔解放区。不久，该大队5中队又有30多人携带武器举行起义，向解放军投诚。同年5月，国民党甘肃省保安第七团一部20多人，在副团长柴茂森率领下，从孟坝开到三岔

的吴家大原，宣布起义。国民党士兵的不断起义，动摇了国民党军队的军心，受到边区党组织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十九章 陇东解放区的土改和整党整军运动

第一节 陇东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一、第一次刘坪会议及其影响

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后，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于1947年7月至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和整党的重大决策，1947年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陕西省绥德县义合镇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传达了全国土地会议精神，作出关于彻底完成边区土地改革和开展整党工作的决议。12月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司令部发布《坚决实现土地法大纲》联合布告。

在中央精神指引下，是年底，土地改革运动在陇东已经收复的县、乡、村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12月上旬，华池县白马区五乡首先开始土改，前后历时一月有余。但在土改过程中，白马乡也出现了诸如全部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土地、牲畜、庄基、农具、粮食，把人赶出家门等"左"的偏差现象。

1947年12月15日至1948年1月1日，为了贯彻落实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义和镇会议精神，陇东地委在华池县紫坊畔刘坪村召开了整风暨土地工作会议。会议由地委书记李合邦、西北局组织部部长马文瑞主持。参加会议的有陇东分区党政军负责人和

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及部分区委书记、区长，华池县部分乡的主要干部和平凉边界工作人员共380多人。会议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为预备会。出席会议的有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分区各机关负责人及分区独立团政委，分区科级干部也列席了会议。会议主要检查汇报了地、县委在对敌斗争和土改工作中，在指导思想、政策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干部作风和干部政策等问题。会议发扬民主，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进行检讨，畅所欲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统一了地、县党委领导的思想。

第二阶段是正式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扩大到各县的区委书记、区长和华池县部分乡的主要负责干部及分区部分工作人员。会期14天。会议以"查阶级、查立场、查斗志、查思想"为主要内容进行"四查"整风，总结经验教训。大会动员后，分11个小组进行自查，在揭摆问题、查找根源的基础上，针对"党内存在的队伍不纯"和"严重官僚主义"问题，决定在全分区开展"四查"，整顿干部作风，提出了9条具体解决办法，对与会干部思想震动较大。会议评估了陇东分区以往的土地改革，认为陇东分区不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减租和征购本身不能解决问题；二是存在着地主、富农倾向。针对存在的问题，会议确定了贯彻土改的8个问题：一、关于新富农问题，他们的出身不同，处理时在态度方式上应有区别，但有恶霸行为者例外。对其土地处理同于旧富农，浮财一半也可动，动多少、如何动，根据不同的人，应由群众处理。二、富农的浮财一般说不动，但在特殊条件下，可根据不同的人与群众的意见处理。三、旧成分的定划问题。今天经济上、思想上已变了的，可按今天情况定，但需注明其过去历史。如现在思想不变，即应按照原来的成分定。四、运输业一般不动，因为此对一般群众生活有利。但在特殊情况下，可根据群众意见处理。五、请会[①]问题，无剥削者，可不取消，相反者废除。六、富农开的油坊，如群众要分也可以，但不要分垮。七、地

① 当时陇东地区比较盛行的一种民间无息或微息借贷形式。

主富农党员不要参加农会。八、天主堂地也发动群众分了。[①]会议还决定在华池、曲子、环县老三县开展土地改革。

第三阶段主要进行总结和处理。对揭发出有问题的干部，通过个人检讨、大会批评教育后作出结论。

刘坪会议通过开展"四查"整风，克服了怯敌怕战思想，增强了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信心，对统一党内思想，整顿党的组织和工作作风具有重要作用。会议研究部署了土改工作，对解放区土改不彻底和党内队伍不纯的情况估计过于严重，存在急躁情绪，对干部思想教育方法简单粗暴，组织处理不够慎重，工作中出现了"左"的偏向，会议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干部。

刘坪会议结束后，陇东地委抽调300多名干部，组成5个工作团，首先分赴老三县开始土地改革运动，在华池县的元城区、柔远区，曲子县的木钵区、八珠区，环县的环城区共5区25个乡进行土改试点，也称第一期土改，一场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土改工作团团长的具体分工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江隆基、华池县委书记贺建山在元城区，陕甘宁边区政府卫生署署长王治邦、陇东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宋养初在八珠，陇东地委副书记王月明、镇原县人民政府县长王子厚在木钵，环县县委书记陈致中在环城，庆阳县委书记杨安仁在柔远。

在土改试点开始后的10多天中，由于许多干部缺乏工作经验和受刘坪会议整风工作的影响，放任或者附和农民自发的平均主义要求，发生了政策掌握不准和侵犯中农利益的"左"的偏向。在发动和组织群众时，提出了一些不符合党的政策的口号；在划分阶级成分时，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明确的政策界限，把部分中农错误地定为地主和富农，侵犯中农利益，引起中农不满；在工作方法上存在着不恰当的方式，对地主"扫地出门"，"使用了肉刑，错斗了不少基本群

① 《刘坪会议结束时李合邦书记的总结报告》(1947年12月28日)，刘凤阁主编：《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337—338页。

众，造成农村团结中的裂痕"[①]。华池县元城区二乡二村共37户农民，土改试点中定为地主、富农的达13户，占全村总户数的35%。土改试点中出现的这些偏向，虽然发生在局部地区和工作初期，但妨碍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健康发展，影响了根据地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第二次刘坪会议与纠正"左"的偏向

中共中央发现土改运动中出现"左"的偏向后，立即采取措施进行纠正。1947年党的十二月会议后，中共中央对土地改革的政策和策略，做了更加完善的规定和说明，重新发布了《怎样分析阶级》《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1948年1月，公开发表了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1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向毛泽东写了《关于土改中一些问题》的报告。报告反映，在已进行土改的农村中发生极"左"偏向，即少数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虽则事不普遍，但影响所及，人心不安。20日，毛泽东在给中央局的信中指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的这些意见"[②]，并指示转发全党。

为了贯彻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精神，及时纠正陇东土改试点中出现的"左"的偏向，陇东地委于1948年1月中旬，在刘坪村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土改工作团团长、组长参加的联席会议，又称第二次刘坪会议。会议组织学习了中共中央的两个文件和任弼时的讲话。中共中央西北局派人传达了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重要指示。会议在认真学习、领会党中央和西北局精神，端正思想认识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和纠正陇东分区土改试点工作中的"左"的偏向问题，强

①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中共庆阳县委：《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建设》，1995年9月内部版，第29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第270页。

调土地改革必须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会议分析了发生"左"的偏向的原因，提出了纠正的方法和原则，掌握了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正确标准，认识了土改工作中团结中农的重要性，明确了保护知识分子及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政策，坚决反对乱打乱杀、对犯罪者采用肉刑等"左"的行为，并对受到错误处理的部分干部予以平反。

第二次刘坪会议贯彻了党中央和西北局的精神，及时纠正了试点工作中的"左"的偏向，使陇东根据地的土地改革运动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三、八珠会议、元城会议与土改试点工作的完成

第二次刘坪会议之后，陇东分区土改试点工作得到顺利发展。1948年2月13日，陇东地委在曲子县八珠村召开了各区工作团长联席会议。会议学习了毛泽东《关于分三类地区实行土地改革问题给李井泉、习仲勋等的指示》，明确了在半老解放区[①]应完全实行土地法、彻底平分土地。但在老解放区，土地大体上早已平分，即是大体上早已实行了土地法，在这里不是再来一次平分，而是进行调剂土地、填平补齐等工作。

会议研究总结了前一段工作，在马文瑞指导下确定了一些具体措施，强调指出：坚决执行废止肉刑的决定；革命前的地主、旧富农在革命后生活真正下降，停止剥削在5年或3年以上者，必须改变其成分；必须名符其实地执行巩固和团结中农；在土地问题上，不再实行平分，用"抽补调剂"的办法解决。

八珠会议是陇东分区土地改革工作的转折点，确立了土改实行"抽补调剂"的政策。此后，陇东分区土改由平分土地转向了"抽补

① 半老解放区：毛泽东在《关于分三类地区实行土地改革问题给李井泉、习仲勋的指示》（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将全国土改运动的形势分为老解放区（老区）、半老解放区（半老区）和新解放区（新区）三种情况。半老解放区指日本投降后至1947年9月全国大反攻时两年内所占地方。

调剂"土地。

在陇东老解放区土地改革试点工作顺利发展、土改任务大体上已经完成的情况下,1948年3月25日,陇东地委在华池县元城召开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土改工作团团长联席会议,总结土地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精神,决定此后工作中应把纠正土改中的偏差当作中心工作来抓,配合生产动员进行纠正错误等善后工作。会议对新旧富农的区别、中农的划分、高利贷等10个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会议指出:原来要求新富农、中农拿出其财产献给贫雇农的做法是错误的;各工作团要重新审定成分,并尽可能退还由于错定成分等原因而没收、征购或调剂错了的财物。西北局组织部部长马文瑞在会上讲话,强调必须加强对生产的具体领导。元城会议进一步纠正了土改工作中的偏差,为土改试点工作的完成扫清了障碍。

会后,各工作团贯彻会议精神,纠正了土改试点中错定的成分,进行了财产归还工作,并召开大会向群众宣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承认和纠正在工作中出现的错误。没收错了的财物未分配的全部退还原主,已经分配了的进行适当的退赔处理。

在土改试点期间,陇东地委先后于2月5日、3月15日、4月16日、25日发出通知,就新旧富农的区别、新富农土地财产等问题做出政策解释,指导土改工作不断深入发展。土改工作团经过深入调查后认为,由于老解放区早已建立了革命政权和进行了土地改革,地主在这里已不能形成为一个社会阶层,如试点的5个区25个乡,只有一户地主、4户富农和一户高利贷者,仅占5516农户的0.108%,因而封建的土地制度在这里已不存在。此外,自抗战以来,中农已占农村人口的2/3,贫雇农人数已大大减少,尽管一些贫雇农缺地少地现象也还存在,但劳动农民内部阶层毕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样,华池、曲子、环县即为土改较为彻底的地区,按中央精神绝无再平分土地的必要,应该用抽补方法调剂土地以解决少数贫雇农缺地的问题,同时亦不能侵犯中农利益。

经过三个半月的工作，到1948年4月下旬，陇东老解放区3县5区25个乡的土改试点工作胜利结束。这次土改试点贯彻"抽补调剂"方针，通过接收地主和旧富农的土地、公田、庙产等财产及在自愿原则下的中农、新富农的土地调剂，共调剂出12.4万多亩土地给缺地的贫雇农，中农自耕的土地没有动，并进行了土地登记，普遍发放土地证，确认地权，实行查田定产，确定农业税，这样就解决了685户无地和905户少地农民的土地要求，占开展土改试点地区总户数的29.6%、总人口的20%。

土改试点地区土地占有情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地主由土改前的人均80亩下降为人均21.6亩，新富农由土改前的人均40.5亩下降为人均24.7亩，中农由土改前的人均24.2亩下降为人均21.8亩，贫农由土改前的人均17.5亩上升为人均21.2亩，雇农由土改前的人均7亩上升为人均29.3亩，基本实现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的"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的要求。

土地改革基本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改变了旧有的农村生产关系和农村各阶级对土地的占有量及他们的经济地位。虽然调剂土地仍带有平均主义色彩，但这次土改从根本上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经过确认地权，使拥有土地的农民安心生产，从法律上保障了"耕者有其田"的新制度，农民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生产和支前的积极性更加高涨。

土改试点工作结束后，1948年5月20日，陇东地委作出了《关于一九四八年一月至四月土改工作的总结》，在认识土地变化基础上，就"土改方针"、"划分阶级成分"、"发动与组织群众"、"斗争地富"、"抽补调剂"、"群众路线"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既肯定了取得的巨大成绩，也指出存在的"左"的偏向及原因，总结了经验教训，为以后陇东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深入开展积累了经验，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启发。

四、陇东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完成

陇东老解放区3县5区25个乡的土改试点工作结束后，更大范围的土地改革运动在陇东解放区全面铺开。

为了指导土地改革运动正确发展，中共中央于1948年5月重新印发了《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在通知中指出，这两个文件中除一小部分现在已不适用外，"其余全部是在现在的土地改革工作中基本上适用的"。7月15日，西北局召开边区地委、工委书记、宣传部长联席会议，决定结合农村整党，继续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争取在1949年春季以前完成基本区[①]的全部土改任务。

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精神和部署，8月29日至9月9日，陇东地委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西北局7月15日会议精神，安排部署下半年土改、整党工作。会议决定，曲子、环县、华池3县秋冬工作分两期进行，三类安排：第一类，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试点的华池县柔远、元城，曲子县八珠、木钵，环县的环城5个区，土地问题已彻底解决，秋冬以整党为中心，结合处理土改遗留问题，确定地权，颁发土地证。第二类，华池县白马、温台区大部，悦乐区的一部，曲子县天子、演武、合道区的一部分地区，经过上年春、秋的土地调剂，无地、少地农民土地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但由于发生"左"的偏向，要重新审查和解决问题，然后颁发土地证，确定地权。第三类，曲子、环县大部分地区及华池悦乐区的部分乡村，虽然内战时期已经分配了土地，但未进行土地调剂，应先调剂土地，然后颁发土地证，确定地权。县委书记联席会议结束后，9月16日，陇东分区在华池县悦乐区六乡

① 基本区：陕甘宁边区根据当时土改运动和军事斗争形势，将各地分为基本区（包括老区、半老区）、新区（新解放区）、接敌区（边沿区）、游管区（敌占区）等不同地区。基本区土改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普遍颁发土地证，确定地权。

进行发放土地证试点工作，计划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分两期发放。第一期在曲子县的曲子、合道，华池县的白马，环县的环城、虎洞5个区19个乡进行，以确定地权。9月20日至10月15日，各县先后召开了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部署土改、整党工作，土地改革在陇东解放区没有进行土地调剂的区乡全面展开。

1949年春，环县土改工作团在环县的洪德、虎洞、环城3个区的5个乡开展工作，历时75天。通过抽补调剂、评产丈地，共调剂出土地5140.3亩，使38户无地和96户少地农民分得了土地，重新颁发了土地证，确定了地权。

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江隆基率土改工作团在华池县的30个乡（全县34个乡）进行土改。共有1348户无地少地农民分得7.87万亩土地，2700亩留作公地。曲子县的土改工作团由陇东分区党校和县、区、乡141名干部组成，经过55天的紧张工作，共调剂出土地2.49万亩，236户无地少地农民获得了土地。

土地调剂工作完成以后，陇东解放区各县按照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关于调剂土地确定地权的布告》规定，开始丈量土地，进行土地登记，确定地权；实行查田定产，确定农业税，"以率（税率）计征"；普遍发放了土地证，确认地权，由政府依照法律保障其不受侵犯，使农民吃了定心丸。

五、关中分区新正、新宁县的土地改革

《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关中分区同其他解放区一样，根据实际情况有步骤地在基本区内开展了土改工作。关中分区的土地改革起初也存在"左"的偏向，后来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精神加以纠正，决定老区的土改不再搞土地平分，而以抽补调剂、确定地权为主。

1948年9月上旬，关中地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了习仲勋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讲话，地委组织部部长王秉祥就土地问题作专题发言。会议纠正了土改初期出现的"左"的偏向，决定老区不再提平分

土地，应以颁发土地证、确定地权来安定人心，发展生产，全力以赴支援解放战争。存在问题的地区，要在配合调剂土地的基础上整党整政。会后，新正、新宁土改工作于1948年底相继开展，至1949年3月结束。

新宁县由于受战争影响，湘乐、盘克、宇村等区的17个乡暂时无法进行土改。关中地委决定在上述区乡加强对敌斗争，摧毁国民党设立的保甲制度，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和乡村政权。在九岘、金村两个区和盘克区的任掌等11个乡进行抽补调剂等土地调整工作，合理分配土地、评定产量、确定地权。新宁县委抽调20名干部，在二区三乡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在11个乡中展开。主要是将地主、富农未报的黑地和公地、义田、绝户地及部分富农、中农多余的土地调剂给缺地和少地的农户。抽补的办法主要是通过民主大会评议和个人自愿的原则。经过3个月紧张工作，11个乡共调剂出土地2104.4亩，200户无地少地户分得1300亩土地，其余土地留作安置移民。另外还有129户无房的农民分到窑洞260孔、房屋3间及其他物资等。

陇东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基本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打碎了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使广大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踊跃参军参战，组成运输队、担架队随军担负战勤任务，支援前线，为陇东和甘肃全省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新宁县"农民分得土地后，当即捐出流通券15000余元拥军，并积极砍柴拾粪，准备春耕"；新正县"某乡被敌占领后，群众躲开敌人的严密监视，偷偷将油饼、白面送给解放军战士和民兵"；庆阳县"高迎区六乡实行土地公债后，80户翻身农民发起劳军运动，他们手提酒壶、肉菜，慰劳守卫边防的解放军战士"；[①]青年农民积极参军，壮大了革命力量，土地改革成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坚实基础和根本保障。

①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第412页。

第二节 陇东解放区的整党整风和新式整军运动

一、整党整风运动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高潮的到来，党的组织迅猛发展，党员数量快速增长，但党内也出现了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等问题。为了纠正存在的问题，保证土地改革和党的各项工作健康发展，根据全国土地会议精神，从1947年冬季起，全国各解放区进行了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1947年1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义合会议，部署整党工作，并在部分农村基层组织中进行了试点，取得了经验。1948年3月，习仲勋在绥德义合、延家川两区工作团会议上讲话指出，整党工作是改进和提高农村一切工作的关键。

陇东解放区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大都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在革命战争和发展生产中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总体情况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成分和作风不纯等问题。1947年2月，陇东解放区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后，由于思想准备不足，在部分地区的干部中，"发生了缺少斗志的严重混乱现象"，"被敌人占据的地区，乡村党政组织多被摧毁，群众失去领导"，存在"领导上的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工作上不坚决执行党的政策，不能维护党的统一领导"[①]等问题。这些问题，对发挥党在农村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完成土地改革，支援人民战争是不利的。

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安排部署，陇东解放区的整党工作与土改工作同步进行。1947年12月15日至1948年1月1日，陇东地

①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中共庆阳县委：《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建设》，1995年9月内部版，第289、290页。

委召开的刘坪会议，也是一次整党整风会议，对犯有严重错误的11人分别作了组织处理，其中开除党籍的6人，给予警告处分的3人，撤职1人，判刑1人。另外，对会议期间私自逃跑的1人予以处决。刘坪会议通过"四查"整风，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思想觉悟，纯洁了干部队伍，为土改和各项工作的开展做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1948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决定除尚未巩固的新区以外，一切党的支部，均应公开，把关门整党变为开门整党。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6月，西北局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土改与整党指示的初步意见》。7月22日，毛泽东批复表示同意。随后，西北局召开边区地委书记联席会议，根据中央精神，全面安排了农村整党工作。8月29日至9月9日，陇东地委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精神，安排部署整党工作。此后，陇东解放区各县都开始了整党工作。整党工作中，陇东解放区各级党组织贯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说服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巩固区农村广大党员中开展了"三查""三整"为基本内容的整党活动。方法上，采取"打通思想，组织整顿，纪律制裁"[①]和经过党的支部，邀请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及党员干部的方法，自上而下地进行。步骤上分三步走：第一步，召开党员大会，进行党员动员，公开党组织，发动群众揭发问题；第二步，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三查""三整"；第三步，犯错误的党员干部作检查，自我教育，进行组织处理，接收新党员。

整党整风后期，各县委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和干部分别给予党纪处分，全分区共处分党员干部412人；对混进党内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清洗，开除出党的有

①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中共庆阳县委：《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建设》，1995年9月内部版，第40页。

280人。在整党过程中,个别地方曾出现一些"左"的偏向,陇东地委按照中央有关指示,及时进行了纠正。到1948年底1949年初,陇东解放区的整党整风基本结束。

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精神,关中分区也开展了整党整风。1947年9月9日,关中地委作出《关于巩固与发展党的决定》,1948年3月12日又发出《关于一九四八年组织工作任务与方针》。关中地委还召开扩大会议,专门就整党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根据地委的安排,新正、新宁两县的整党工作与土地改革同步进行。新正县委在九岘、金村两个区和盘克区的任掌乡等开展了整党工作。1948年10月16日至25日,新正县委在蜈蚣洞召开了县、区、乡党员干部"三查"整风会议。新宁县委抽调20名干部,在二区三乡进行了试点,取得经验后普遍在11个乡中展开。

整党整风中建立健全了党的基层组织,各乡、村普遍建立起了党的支部或党小组,曲子县原有党支部44个,被敌破坏了6个,经过恢复重建,发展到48个。整党的开展,使各级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涌现出了一批新生力量,全分区共提拔分区、县、区、乡干部355人。整党中还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华池县原有党员875人,发展到984人;曲子县原有党员996人,发展到1010人。到1948年底,全分区6县共发展新党员1403人,壮大了党的力量。

陇东解放区经过整党整风,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纯洁了党的组织,健全了基层党组织的民主生活制度,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尤其是通过对基层党组织和政权、农会的整顿改选,使党在农村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得到了增强,为土改和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二、新式整军运动

随着人民解放军队伍的壮大,解放战士[①]成分增加,农村激烈的

① 指由原国民党军队中被俘后加入人民解放军的战士。

阶级斗争在部队中也有所反映，在个别干部和战士中暴露出惧怕艰苦斗争，违犯群众纪律，不知为谁当兵打仗，甚至战斗中临阵脱逃的问题。因此，1947年7月至9月的全国土地会议在决定开展土改、整党工作的同时，也提出了整军问题，朱德总司令员在会上指出：我们的军队需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加以整顿，需要一个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的运动，使军队在思想上达到一致拥护土改，组织上纯洁严密。

西北野战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是1947年冬开始的。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诉苦就是诉旧社会和反动派剥削压迫劳动人民之苦。通过诉苦，"很自然地提高了阶级觉悟，凝结为阶级仇恨。大家认识到，只有打倒国民党政府，消灭其军队，建立人民政府，分田地，组织合作社，才能解放自己，消灭剥削阶级"。①

在诉苦提高阶级觉悟基础上开展的"三查"，主要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通过查阶级，揭露了隐藏在人民解放军中的一些国民党特务及其破坏阴谋，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通过查工作、查斗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了指战员对人民军队性质的认识，增强了干部战士之间，老战士与新战士之间，翻身农民参军战士与解放战士之间的理解和信任，达到了部队的空前团结。

在开展诉苦、三查运动的基础上，西北野战军还在部队中实行了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使部队达到了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得到改善、军事上提高了战术技术的目的。在新式整军运动中，对俘虏的教育改造，采取团结、改造、溶化的方针，澄清了许多解放战士存在的"吃谁家的粮，当谁家的兵"的糊涂思想，提高了阶级觉悟。

陇东军分区利用战斗间隙，在所属部队和游击大队进行了以诉苦为中心的政治整军工作和单兵战术为主的军事训练工作。陇东、关中两分区还抓了民兵组织的整顿建设。陇东分区有千余名原国民党士兵，经过诉苦和改造教育，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纷纷要求参加解放军，"彻底消灭反动残余力量，给冤死的父母兄弟报仇"。

---

①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51页。

新式整军运动是一场以阶级教育为中心的思想教育运动，对于提高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指出："此次胜利如此显著，原因甚多…… 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① 对新式整军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4页。

第二十章　陇东全境解放与支援解放大西北

第一节　陇东解放区的收复

一、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党组织的日益壮大，党内产生了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倾向。迅速走向全国胜利的形势，迫切要求在全党范围内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坚强核心。1948年以后，中共中央多次发出重要指示，要求在全党各级组织中建立请示报告制度，认真开展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现象的斗争，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真正实现全党意志、行动与纪律的高度统一。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了关于加强请示报告制度和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两个决议。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在边区党政军群各系统广泛深入地开展学习运动，进行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维护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使西北各级党政军群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上思想上同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完成党中央所赋予的解放大西北的伟大任务。

国民党军队进犯陇东后，部分解放区沦陷，全分区形成了敌占区、游击区和巩固区3个区域。党组织的分布情况是，敌占区有党支部99个，游击区有党支部41个，巩固区有党支部100个。在战争形

势下，敌占区和游击区党组织的正常活动基本停止，各组织主要负责人都亲自参加武工队、游击队，约有1/3的干部参军参战。在这种情况下，对全区党组织实行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有一定困难，党内发生了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现象。1948年以后，随着形势好转，一些敌占区被收复，党组织恢复，全区新发展党员近800名。进一步加强对各级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就显得非常重要。

陇东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中央和西北局精神，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开展了以下工作：

建立健全各项制度。一是健全了党委会制，建立与加强具体领导分工负责制。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陇东地委规定实行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大事务均须提交党委会充分讨论并做出明确决定，然后付诸执行。地委规定3个月为一期，检查党委制的领导。二是建立请示报告制度。陇东地委规定，凡是中央和西北局的决定，必须严格遵守，正确执行。凡是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及条例等，必须订出本地区执行的具体计划与实施细则等。凡是开展的重大活动必须上报西北局。各县委对地委的指示决定等，亦应本着这个精神执行。三是建立巡视制度，每月有计划有重点地下去巡视一次。四是建立汇报制度，地委要按期向西北局报告工作，各县要按期向地委报告工作，各部门要1个月一次汇报工作。

建立和扩大党内民主生活。按照党的章程规定，1949年4月开始，陇东各县陆续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改选了县委常委会。陇东地委要求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充分发挥党的集体智慧和集体力量的作用，坚决防止由少数人或个人包办决定重要问题的不良倾向。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规定，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切实保障党内民主生活在集中领导下有组织、有秩序、有纪律地进行。要求各级党委把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紧密结合起来，不可偏废。各级党委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分歧意见。

调整组织机构，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49年5月，西北局批

准陇东地委与甘肃工委分开办公。8月，西北局批准成立宁县县委和西峰市委。结合整党的进行，群众组织得到健全和发展，陇东各县普遍建立了妇女委员会和青年委员会。

加强学习，培养干部。陇东地委提出，地委委员要加强理论学习，深入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央关于土改整党工作的指示等文件。根据形势发展需求，陇东地委党校还集中加强了管理、政治、军事、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干部培养力度，准备在陇东解放后参加接管。

加强组织部门工作。陇东地委根据中央组织部《关于组织部门业务与报告请示制度的通知》精神，明确了各级组织部门的工作任务与业务内容，加强了组织部门工作。

陇东各级党组织开展的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等工作，进一步严格了党的纪律，发展了党内民主生活，保障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为陇东老解放区迎接全境解放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准备。

二、陇东、关中分区部队向敌发起攻势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会议研究了解放战争的形势，提出全党的战略任务是，在从1946年7月算起的5年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关于西北战场，中央军委要求西北野战军继续独立作战，争取平均每月歼灭敌人正规军1个旅左右，狠狠打击并牢牢牵制敌胡宗南部及"青宁二马"军队，使之不能抽兵增援中原等战场。九月会议后，人民解放军发起秋季攻势，先后取得了济南战役和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的胜利。

1948年，西北野战军发动春季攻势之后，胡宗南部缩短防线，采取重点机动防御的战略方针，以确保西安与关中平原的安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西北野战军前委决定，以打胡为主，不停地发动局部

进攻，坚决粉碎胡宗南重点机动防御体系，有效配合和策应兄弟野战军的战略决战。从8月到11月，西北野战军在渭北洛河流域先后组织实施了澄邠战役、荔北战役、冬季攻势战役，取得重大胜利。从发动春季攻势以来，西北野战军在1948年间共歼灭国民党军约16个师11.5万人，收复和解放县城12座。

在全国战场和西北战场胜利形势的鼓舞下，陇东解放区的地方武装力量和游击队、武工队、民兵等，积极主动地向敌占区出击，消灭敌人，壮大自己，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

8月4日，陇东分区十三团一部在镇原游击大队及武工队的配合下，在大方山击溃国民党甘肃保安第三团共300余人的抢粮队，毙、俘敌17人。30日，回民骑兵团在环县游击大队配合下，在小南沟店子川进剿黄少武、汪兴民土匪武装，击毙匪首黄少武以下11人，俘敌3人。

9月1日，镇原游击大队突破敌镇(原)固(原)防线，深入到敌占区的黑渠口、羊千原、大户原、孟坝等地，持续开展游击战11天，打击了国民党地方势力，扩大了党的影响，鼓舞了敌占区人民。

10月10日，三边分区独立团一部在环县山城刘家口子与国民党环县自卫队第三、第四中队激战，毙俘敌22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26支。13日，西北野战军骑二旅一部在合水太白塬全歼国民党合水自卫队第二中队，击毙敌中队长以下3人，俘敌38人，缴获步枪42支。29日，庆阳县游击大队在王寨瓦窑坡与国民党蒲川自卫队发生激战，毙敌3人，俘敌23人，缴获步枪21支。同日，镇原游击大队从马渠一夜急行军至王寨原，包围歼灭国民党王寨乡自卫队，毙敌2人，俘自卫队队长以下94人，受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部的通报表扬。

11月16日，庆阳游击大队在西川下吴旗，击溃国民党马岭自卫队，毙敌5人，俘敌10人。21日，陇东分区部队一部在镇原城子杨乡，袭击国民党镇原县自卫队，毙敌3人，俘敌10人，缴获步枪31支，美制炸弹40枚。

12月15日，合水游击大队在石坡村埋伏，全歼合水县自卫队队长带领的征粮队，击毙自卫队队长等3人，俘敌20余人，缴获步枪20余支。

12月16日，西北野战军骑二旅和合水游击大队进攻合水，击毙国民党合水谍报队队长何有，国民党党政军人员弃城，一部逃往西峰，一部移驻板桥乡的孟家桥村，合水县城[①]再获解放，这是国民党军队侵入陇东解放区后，陇东地方武装收复的首座县城。

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陇东军民欢欣鼓舞，士气高涨，持续不断地向国民党陇东驻军和地方保安团队发起攻势。1月9日，庆阳县县长杨福祥率领庆阳游击大队，在药王洞歼灭国民党新堡自卫队，毙俘敌20人。26日，合水县游击大队奔袭西华池，在无一伤亡的情况下，全歼国民党合水县自卫队1个分队及西华池乡公所之敌，俘敌35人，缴获步枪24支，子弹500余发及其他物资一批，受到陇东军分区的通令嘉奖。

陇东解放区地方武装力量配合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的对敌作战斗争，阻扰了国民党主力部队和地方保安团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引起了国民党当地驻军对陇东分区部分县、区的疯狂反扑。1949年1月中旬，驻防平凉等地的国民党第八十二军[②]一〇〇师调集2个骑兵团与1个保安团，共约1500余人，兵分三路，于18日袭击曲子县演武区政府和曲子县政府机关，捕去区长白盘庚等干部18人。19日扑向元城、柔远、东华池等地，奔袭陇东分区机关。陇东分区领导机关及时撤离，但有7名干部群众被害，20余人被捕，陇东分区贸易公司万余斤棉花等物资被抢走或烧毁。

面对国民党部队和地方团队的侵袭，陇东解放区地方武装力量积极应对，主动出击，坚持反攻。3月8日，镇原游击大队和武工队攻

① 今老城镇，当时称城关镇。1949年7月21日中共合水县委、县政府机关从北掌堡子迁回城关，9月又迁至西华池。

② 原为整编八十二师，1948年5月扩编为八十二军。

占黑渠口，俘敌黑渠口镇长以下4人，摧毁碉堡4座。13日，新正游击队与旬邑、彬县游击队在王家河击溃国民党彬县、旬邑县保安队，毙敌6人，俘敌37人。21日，陇东分区部队在镇原县游击大队配合下，袭击驻防三岔何家峴子的国民党固原县自卫队，俘敌中队长以下11人，摧毁碉堡3座。

4月21日，镇原县游击大队在新集唐家原、昔宿逵击溃国民党柳树乡公所自卫队，毙敌7人，俘敌5人。27日，合水游击大队围攻驻柳树堡的国民党合水县自卫队二中队二分队及店子乡常备队，炸开城垣，全歼该敌，毙俘敌50余人，缴枪50余支。

5月8日，回民骑兵团、庆阳县游击大队在庆阳县桐川乡张家老庄与国民党庆阳县自卫队四中队、桐川乡常备队激战，歼敌一部，进逼庆阳县城。19日，国民党庆阳县政府官员及驻城的甘保二团逃往西峰，20日陇东分区首府庆阳城收复，22日，中共庆阳县委及庆阳县人民政府回驻庆阳县城。

陇东解放区军民在反攻行动中，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力量。1948年9月17日，陇东军分区为了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对各县游击大队的战斗任务、活动区域、进攻目标等作了统一部署，要求各游击大队采取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或奔袭穷追的战略战术，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摧毁敌保甲组织，恢复人民政权。11月，为适应战争形势需要，中央军委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称西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张经武任参谋长，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第四军分区复称陇东军分区（1948年春，陇东军分区奉命改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第四军分区），同时加强了军分区的领导力量，张仲良任司令员兼政委（后徐国珍代司令员，政委李合邦），西北野战军驻陇东骑二旅政委王再兴兼任陇东军分区副政委，何远平任陇东军分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高松山任第二副司令员，李正廷任政治部主任。同时，陇东地委发出《关于在全国秋季大捷时应保持警惕的通知》，号召陇东军民时时提高警惕，坚持不懈地开展对敌斗争。

在人民解放军攻势凌厉的形势影响和地方革命武装力量的沉重

打击下，盘踞陇东地区的敌人人心浮动，纷纷设法寻求出路。1949年2月13日，国民党旬邑县长郝登阁率保安团等党政军人员430人起义，携轻机枪17挺，步枪200余支，无线电台一部，移驻新正县的长舌头，受到关中分区代表的欢迎。5月24日，国民党正宁县参议长先子灵等率领该县3个中队在山河镇起义，向陇东分区交出六〇炮1门、轻机枪10挺、步枪501支、炮弹170多箱、枪榴弹12箱、手榴弹24箱，以及1223石粮食和电话总机等物资，加速了国民党陇东统治势力的崩溃和陇东胜利解放的到来。

三、陇东解放区的收复

1948年后，陇东解放区军民不断向敌人发动进攻，开始逐步收复失地。到1948年6月，先后收复了环县、曲子、华池3县县城，县委、县政府迁移到县城工作。与此同时，环县的环城、耿湾、洪德区，曲子县的八珠、木钵、曲子区，华池县的元城、白马、柔远、悦乐、温台区，合水县的太白、城区、店子区，庆阳县的高迎、新堡区，镇原县的三岔、柳州区，新宁县的宇村、九岘、盘克区，新正县的湫头、三嘉区都相继收复。各区委、区政府都迁移到原驻地开始工作。

1948年7月，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在西北野战军和陇东地方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下，盘踞在陇东的国民党军队处境艰难，龟缩在一些主要城镇和交通沿线苟延残喘。陇东解放区军民主动出击，有效打击敌人，到1949年6月，又收复了合水、庆阳、镇原、新宁、新正5县，县委、县政府相继迁移到县城[①]。这一时期还先后收复了环县的虎洞、毛井、车道、甜水区，曲子县的天子、合道、土桥、马岭、演武区，合水县的西华池、肖嘴、盘马区，庆阳县的三十里铺、赤城、驿马、桐川区，镇原县的马渠、石佛、新集、孟坝、王寨区，新

① 解放战争时新正县人民政府驻阳旅头，后迁到永正的岭上村。1949年8月8日又迁至山河镇。

宁县的金村、湘乐区，新正县杨坡头、湫坡头、底庙、马栏区，这些区、乡的党政机关也先后迁移到原驻地工作。

1949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三原分区[①]所辖的新正、新宁两县划归陇东分区管辖。新正县复称正宁县，新宁县复称宁县。在此基础上，陇东分区随即进行全面战争动员，要求不惜一切人力、财力、畜力，支援解放大西北；发动群众肃清一切反动武装，摧毁一切反动组织，恢复人民政权，恢复革命秩序，恢复生产及其他工作。

陇东军民的对敌反攻斗争，不仅恢复了陇东解放区，为陇东全境的解放扫清了障碍，而且为解放大西北提供了坚强保障。

① 1949年4月将关中分区专员公署迁至三原县，并更名为三原分区专员公署。

第二节　陇东全境的解放

一、陇东追击战和陇东全境解放

1948年至1949年4月间，由于西北野战军主力集中于陕西境内，国民党在陇东也无力量大规模进攻，陇东无大的战事。

为了加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统一领导，1949年1月15日，中央军委指示西北野战军改称为第一野战军（简称"一野"），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阎揆要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刘景范任后勤司令员。太原战役胜利后，为了加速西北解放战争的发展进程，1949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华北军区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和第十九兵团调归第一野战军。至此，第一野战军共拥有兵力4个兵团12个军约35万余人，连同西北军区所属兵力，西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达到了41万余人，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超过了敌人，彻底改变了以往敌强我弱的状况，为加速大西北的解放奠定了强大基础。

1949年7月10日，第一野战军发起扶眉战役，经过5天的激战，歼灭国民党胡宗南部4个军4万余人，胡宗南的主力基本被消灭，残部退守秦岭山区。国民党依靠胡宗南反攻大西北的美梦破灭，只好寄希望于盘踞在陇东的马鸿逵、马步芳部，妄图保住陇东这块战略要地。"二马"在西北野战军的步步紧逼下，只得退守华亭、固原、平凉等地，企图扼守甘肃、宁夏之间的咽喉要地，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

在这一有利形势下，第一野战军遵照党中央的部署，兵分两路，打出陕西，于7月21日向平凉地区推进，揭开了解放甘肃的序幕。7月中旬，正宁县山河镇国民党党、政、军人员见大势已去，仓皇向宁县

逃窜。7月底，人民解放军发动了陇东追击战役。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骑二旅一路所向无敌。国民党正宁县自卫队的周致祥、雷同春两个中队逃至宁县城。在此之前，宁县的国民党县长赵俊斌已带部分县府人员和自卫队3个中队西渡马莲河出逃。因马莲河暴涨，周、雷的自卫队难以过河，龟缩在城关、庙嘴坪等处。7月26日午夜，十九兵团六十三军一八八师骑二旅一部，从政平疾驰宁县城，消灭正宁县自卫队，击毙中队长雷同春。27日攻克宁县城。原留在县城的宁县自卫队大队长王建荣和被击败的周致祥率残部向南义井方向逃窜，解放军穷追不舍，在马户村将其歼灭，王建荣等人化妆逃跑。赵俊斌一行逃到镇原太平镇后，仅带亲信逃往兰州。其余自卫队员走投无路，由中队长马树升带回宁县缴械投降。宁县全境获得解放。

宁县解放后，十九兵团又兵分两路向镇原、平凉挺进，由于北部有陇东分区的地方部队压境，西南方向解放军势如破竹，对西峰守敌形成了包围。西峰守敌惊慌失措，连夜弃城向镇原方向溃逃，在驿马关一带，被陇东分区警备十五团截击一部分，俘虏1000余人。西峰全城空虚。28日，不发一弹，西峰解放。同日，十九兵团六十四军一九一师和骑二旅进兵镇原，在陇东分区十三团、十四团和回民骑兵团的配合下，于镇原县城南的左家坡头歼灭了西逃的国民党庆阳县、合水县自卫队500余人，镇原获得解放。至此，庆阳全境宣告解放。国民党在陇东的统治被彻底推翻，陇东全境回到了人民手中。

在第十九兵团等向陇东挺进的同时，第一野战军的第一、第二兵团一路向西，势如破竹。7月29日，相继解放了张家川、清水、秦安、武山、华亭等县城和安口镇，30日解放了平凉和泾川、静宁、通渭等县城。8月2日攻克固原城，歼敌5000余人。第十九兵团控制六盘山天险后，完全切断了国民党"青宁二马"的联系，又解放了隆德、西吉、海原等地。8月5日，第一野战军在陇东地区的追击战役结束，共歼敌万余人，为整个大西北的解放创造了条件。8月26日，兰州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在甘肃统治的覆亡。12月11日，甘肃全境解放。

在整个陇东的追击战役中，陇东军民积极配合第一野战军作战，

不断向敌占区发动进攻，同时还参加了解放西峰、正宁、宁县、镇原的战斗，为整个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

二、陇东解放区的接管工作

随着陇东解放区的收复，陇东党组织开始安排部署各解放区的接管工作。1949年4月23日，陇东地委成立了以惠庆琪为主任的六人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全分区在职干部联系本部门业务和将要接管的对象，学习党的城市政策、土地政策，开始为接管工作做准备。6月，陇东地委发出关于庆阳收复工作的指示，指出发动群众是收复工作的中心环节，通过反特务欺压、反不公、反贪污等斗争，提高群众觉悟，以访苦、谈苦，启发群众提出解除痛苦的办法开展工作。但不要急于全面展开，首先只在巩固区，从个别的问题着手，取得经验逐步推进；对已经"登记的敌伪人员、特务人员、必须分别（主要、次要、特工、一般、有罪、无罪、罪轻、罪重、自愿、被迫等）情节予以适当处理"。在收复中"加强军事活动与政治瓦解工作，掩护与帮助做好收复工作"①。6月12日，陇东地委成立由李培福、李正廷、徐宗耀等10人组成的庆阳收复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和开展陇东新解放区的接管工作。7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陇东分区改称庆阳分区。庆阳全境解放后，地委抽调部分干部，深入到各县、区指导帮助开展接管工作。当时，庆阳分区面临的局面十分复杂，一方面解放战争在继续进行，支前和武装斗争的任务十分艰巨；另一方面新解放区的接管任务十分繁重。国民党占据的重要城镇虽被夺了回来，但其基层的反动政权还存在着，国民党的保甲组织仍然完整，军警特务还逍遥法外，反动的残匪势力还在残害人民。因此，做好新解放区的接管和新政权建设工作，困难很大。为了保证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庆阳分

①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第493—496页。

区各县成立了接收工作委员会，具体领导组织接管工作。接收委员会下设接收工作组，分别进行各项接收工作。

庆阳分区接管工作大体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全面接收国民党县、乡（镇）、保、各机关单位和学校、仓库、企业及各种档案，摧毁国民党乡镇保甲组织，建立起区、乡、村人民政权。

庆阳县城本是原陇东分区的首府。自1947年2月29日至1949年5月19日，被国民党占领约2年零3个月。解放后，为了搞好收复工作，庆阳县政府成立了临时工作委员会，陇东分区抽派党政军干部50多人，配合庆阳县组成5个工作组，分工进行庆阳五乡的收复工作。庆阳县政府明确规定，凡在战前分得和征购的土地所有权，一律有效，并发动贫雇农向地主展开猛烈的斗争。群众发动起来后，庆阳县政府立即解散国民党基层政权的保甲组织，摧毁国民党政权的保甲制度，恢复人民政权的工作。庆阳县原辖7个区，43个乡，5月份收复后，逐步将新堡、高迎、庆阳市、三十里铺4个完整区及赤城、桐川、驿马3个区的大部分国民党基层政权彻底摧毁。7月底，庆阳县全境解放，残存的国民党基层政权也被摧毁。接收了国民党政权遗留下来的粮食200余石，麦子花料13余石，麦草1万余公斤，硬柴2500余公斤以及其他办公家具、文件、枪支等。登记了376名国民党政权人员和特务，其中71人申请悔过后，具保释放。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打击了暗藏的敌特和便衣探子的破坏活动。庆阳县在接收中比较好的执行了地委的政策。

镇原县接管工作自上而下进行，先城镇后乡村，先查封，后点交，在完成县政权的接收后，又发动群众摧毁了国民党基层保甲组织，在9个新区、118个乡建立了人民政权，各区都按县委的规定办法处理了伪乡保人员。马渠乡人民政府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当场逮捕了两个坏保长。肖金区（当时归镇原管辖）在处理保甲人员时，斗争了两个坏保长。全县共接收国民党县、乡、镇等机关单位422个，人员603人；学校教职员工478人；党团、特务等各种文卷123宗，文件6本，行政、军事、财经等文卷11549卷；小麦7052石，饲料6850公斤；

银元765枚，铜元4746枚；电台3部，收音机3台，柴油发电机1台，手摇马达2台，收发报机7台、电话机27部；骡马82匹。还接收邮电局及职工32人，县立中学1所，教职工28人。接收后，5天内恢复了各区电话线路，半月左右学校开学，市场营业，一切都基本恢复正常[①]。

正宁在1949年6月就摧毁了西坡、山河、永和3个区的全部和永正、罗川两个区的大部国民党基层政权，建立了人民政权。7月，解放军解放正宁全境后，群众的后顾之忧解除，接管工作进展顺利。县政府委派工作组深入乡村，首先宣布国民党基层保甲组织为非法组织，并停止其保甲人员的一切非法活动，然后深入群众，宣传动员，了解情况，在提高群众认识的基础上，由下而上进行选举，先建立村政权，选举村长，后了解物色乡长人选，经审查后，在群众大会上提出，由民主选举产生乡长。在有地下党组织基础的地方，则指定委派地下党员充任乡长。这样，正宁县在解放后的半个月内，政权的接管工作和建设工作顺利完成。全县共接管国民党正宁县政府及6个乡镇64保，接收国民党党、政、特人员158名，捕获归案和自动投案的武装人员210名。在正宁县接收工作中，新正县委、县政府暂驻全县中心永正城内，接收工作就绪后，泰分区指示于8月迁回山河城内办公，正式改称正宁县。

宁县为了接管旧政权，举办了干部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有解放区的乡支书、民兵连长和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学生，约170人。7月29日，县委任命了新解放的14个区镇干部，之后分赴新解放区各乡镇，接管乡（镇）、保、甲政权，建立区、乡、村等行政机构。他们还制定了《接收宁县工作计划》，规定了对国民党县政权、党部、武装自卫队、教育文化设施、公共设施和企业、货币、监狱等的接收办法。为使接

①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第507页；《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第362页。

收顺利进行，还发布了《安民布告》和《戒严布告》[①]。8月，宁县人民民主政权正式建立。

此外，合水等县均在8月上旬完成了收复区和新区的接管与政权建设工作。

接管工作完成之后，根据庆阳分区的指示，开展第二步工作，主要是对原国民党党政军特骨干人员进行登记和管训。从8月10日开始，共登记县、乡（镇）工作人员和党团分部书记、税局课长、各种武装分队长以上人员340人，对其中147名人员进行为期20天的集中管训和审查。然后分别情况，按照录用、遣散、管训教育和法办等方式进行处理。另外还将被俘的1400名国民党地方自卫队人员，集中在西峰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改造教育。改造后部分人员参加解放军，编入陇东分区警备十五团，其他人员发给路费遣散回家。

到1949年10月上旬，庆阳分区接收工作基本结束。新解放区和收复区所有的区、乡、村政权机关全部建立，区、乡、村干部大都配齐，人民政权开始正常运转。全分区8县1市，共恢复和建立了50个区、294个乡、2595个行政村的地方政权组织[②]。庆阳全区共接管中学3所，完全小学44所，初级小学500余所，学校全部复课。工厂开始生产，商店开门营业，集贸市场恢复贸易。全区的政权接管和政权建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三、西峰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成立

西峰原系国民党甘肃省第三行政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进攻边区的重要据点，敌特组织和人员盘根错节，社会关系极为复杂。为此，庆阳分区指示庆阳县必须认真做好西峰的接管工作。1949年7月23日，陇东地委制定了关于接管西峰

① 宁县志编委会：《宁县志》，第481—485页。

② 张克复主编：《甘肃老区概览》，第198页。

的计划，在庆阳县贾店子成立了以陇东分区党委副书记李正廷为主任、西峰市委书记王彪和西峰市人民政府市长田绍锡为副主任的西峰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组织领导和负责接收工作。7月27日，国民党政权弃城逃跑，28日西峰解放。29日西峰军管会从庆阳县的玄马进驻西峰并发布告示，宣告正式成立并开始办公。军管会由李正廷、黎光、徐宗望、王彪、田绍锡、陶继尧、冯学成、侯生成、陈平波等9名同志组成，下设秘书室及政务、军事、文教、公安、财经等处，各处又下设若干小组，共有工作人员90多名。军管会是西峰军管期间最高权力机关，主要领导和负责接收工作，办理接收事宜，维持社会治安。军管会一成立，就立即积极开展工作。8月1日，经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成立了西峰县级市，王彪任中共西峰市委书记，田绍锡、贺玉卿分别任市长、副市长。市委设组织、宣传二部，市政府设一、二、三、四科及公安局、税务局。管辖什社、六寨（今陈户一带）、政和（今后官寨一带）、蒲川（今邵家寺一带）、董志、彭原及驿马关区。军管会一方面对进行接管的干部进行城市政策和纪律教育，另一方面积极做工人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工作，对他们的生活困难给以必要的关心，在发动人民群众的基础上，8月4日西峰市军管会和市政府宣布废除国民党基层保甲组织和西峰各级国民党基层政权，接收国民党党政机关和人员，登记党团特人员，收容管制敌特分子。8月9日，在西峰城区成立了四个区公署。据统计，军管会共接收国民党基层政权大小机关51个，收容散兵游勇、保安自卫队人员130余名，登记国民党政权机关工作人员400多名。26日，各区所辖的62个居民小组全部成立，并经群众同意选出小组长154人。9月11日，各级人民政权正式建立，包括5个乡政权，15个村政权。另外，共接收中学2所，完小4所，普小7所，学生近千名，各学校于9月1日前后全部开学复课。市军管会还及时逮捕了原国民党陇东清乡总司令谭世麟、便衣队长王镇东（1950年镇反时均被处决）及反革命分子付元祥。9月26日，奉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电令，西峰市结束军管，撤销军管会机构。

第三节 陇东人民支援解放大西北

一、为新区培训和输送干部

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急需培养和训练大批懂得管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党务的干部随军前进，参加接管和建党建政等工作。1948年3月11日，陇东地委和专署决定，将陇东中学（当时在华池元城油坊嘴）改建为陇东地委党校，贺建山任副校长，专门负责干部的培养与训练，使干部教育形成以专业党校为主、离职培训与在职锻炼相结合，正规学校教育与半日校、夜校、补习班并举的培养、培训格局。1949年5月30日，陇东地委又将党校改名为陇东分区干部学校，李景亭任书记。学校增设班次，扩大学员招收量，拓宽培训内容，增设课程和门类，为收复和接管工作培训各类干部。至7月，共培训干部889名，其中460名干部到陇东新解放区参加了接管和政权建设工作。8月，陇东军分区选调干部、战士400名，到平凉、天水、会宁地区参加组建地方武装和军分区机关。这一时期各县也举办培训班，加快干部培训步伐。华池、环县、镇原、庆阳、曲子、合水、新正、新宁8县，两年内共办干部培训班40多期，培训干部1140多人，向区内外新解放区输送干部1300多名。分区和各县的统战、民政、经济、妇女、青年团等系统，也都分别举办各种培训班，培训了一批从事专业工作的干部。

陇东解放区的干部培训取得了显著成效，给新解放区的接管和新政权的建立输送了大批干部，保证了新解放区各类干部的需要，保障了新解放区的接管、建政工作顺利完成，同时为全省的建政建军输送了一大批干部，为甘肃乃至西北解放做出了贡献。

二、参军参战

解放战争时期，陇东解放区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一批又一批报名参军，补充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壮大了人民军队。在陇东战场上进行的大大小小数十次战斗中，都得到了陇东解放区人民的支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进行自卫战争，陇东分区征兵1090名；1946年，陇东、关中分区积极响应西北局参军号召，迅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参军参战、支援战争的热潮，陇东分区在很短时间内，报名参军的有1450名，为主力部队输送800名，其余编为3个独立营，并补充各县游击队和搜山队。1946年8月27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四旅与胡宗南军队在平子战斗中，临近战场的米桥、良平、平子一带有100多名群众配合作战。1946年11月，在新宁的一次战斗中，该县有180名青年自动参军。1947年初，国民党军队向陇东发动进攻后，在残酷的环境中，陇东解放区军民在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8县共扩兵6000名，其中有5000名送到了西北野战军，补充了主力部队，还有1000名补充到陇东分区地方部队和各县游击队中。在午亭子战斗中，新宁县组织上千人参加支前。1947年5月，边区政府要求动员2.6万人参军，陇东分区遵照指示，三次发出通知要求各县以扩大游击队的方式进行扩兵。这次征兵活动中，在4个月之内陇东征兵5000多人，补充到主力兵团，其中庆阳1150名，曲子1000名，镇原800名，合水700名，华池550名，环县800名。[①] 同年6月到8月，关中分区征兵3000名；[②]年底，再次决定扩兵1045名，其中新宁100名，新正300名。[③] 1948年1月，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形势的发展急需补充大批兵源。陇东解放区此时仍然处在开展

①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第160页。
②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第163页。
③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第167页。

游击战争的困难阶段，面对解放区缩小，地方青壮年减少的情况，陇东父老乡亲踊跃支援前线，将优秀青壮年送到部队。华池县就有400名青年参军，新正县有410名青年参军。8月以后，陇东解放区又掀起了参军热潮。到1949年7月，有1万多名陇东儿女参军入伍，其中：环县征兵500名，仅7至9月新正县征兵129名。同年7月18日，陇东地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分区征兵以"扩大游击队，肃清地方土顽，巩固后方治安，保护人民，发展生产"为口号，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动员。新解放区虽不广泛动员，但经一般号召后，人伍者先编入游击队训练，再补充地方兵团。当时解放军所向披靡，青壮年人伍积极性空前高涨，陇东地方部队迅速扩大到2000多人，各县游击队也扩大到2900多人。

这些参军的庆阳儿女许多血染疆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环县和曲子县在解放战争中就有296人阵亡，252人受伤致残，约占参军人数的20%。[①] 据华池县志记载，在革命战争时期，华池县有3360多名青年参军，相当于男性青年的60%，其中180余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华池县林镇乡沟口村，战争年代全村8户30余人，参军的就有9人，贫农白大妈把自己的3个儿子都送上了前线。

三、踊跃交纳和运送支前粮草

解放战争期间，陇东解放区由于自然灾害和遭敌蹂躏，群众生产生活非常困难。但是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陇东人民节衣缩食，倾其所有，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大力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战争爆发后，庆阳各县每年都有支援解放战争的公粮任务。据统计，1946年陇东分区交公粮1.65万公斤，附加粮（饲料）2.75万公斤，饲草20万公斤；1947年交公粮4.4万石（细粮），饲料10.1万石，饲草425万公

①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第232页。

斤;1948年交公粮5.5万石,饲料5000石,饲草275万公斤;1949年夏季征粮24.9万石,秋季征粮23.9万石,饲料4.8万石。从1946年至1949年,庆阳(包括正宁、宁县)共交公粮9246.75万公斤,面粉3145.2万公斤,饲草720万公斤,饲料445万公斤。完成公粮任务的同时,完成借粮23.3万石,折合3495万公斤。以1948年33.1万人口计算,解放战争时期庆阳人均负担公粮385公斤,饲料95公斤,饲草21.75公斤。1949年7月,为保证第一野战军军需用粮,陇东分区各县共向泾川、平凉一线运送小麦2660万公斤,小米400万公斤,面粉1400万公斤,豆子320万公斤。

陇东解放后,为支援解放大西北,陇东解放区出动驮畜1400头,从镇原向瓦亭运送米面50万公斤,饲料10万公斤。在7月5日至9月5日的两个月中,环县出动驮畜先后向固原、同心、豫旺前线转运白面13.5万公斤,米2.76万公斤,向平凉运送小米15.94万公斤。7月,陇东分区在西峰城外、镇原县城、宁县焦村设立了3个供应转输站,每日在西峰磨面7.6万公斤,合水、华池两地磨面4万公斤,镇原县城及附近村镇磨面10万公斤。这些面粉集中到转输站后运往前线,保证了部队的粮食供应。8月,第一野战军开始向兰州进军,陇东解放区的庆阳、合水、曲子、环县、镇原、宁县等县,给瓦亭前线运送小米668万公斤,饲料100万公斤;宁县、正宁两县向平凉转运小麦600万公斤,饲料100万公斤;镇原、环县两县向固原转运小麦2000万公斤,饲料12万公斤,保证了第一野战军部队的粮食供应和战马的饲料需要。庆阳人民的无私援助,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的快速推进和全面胜利。

四、分化瓦解敌人

为了更有效地打击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土匪,瓦解保甲政权,开辟新解放区,陇东解放区在开展武装斗争中,利用一切机会大力开展攻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其主要方法:一是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

人民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二是写劝降信和警告信,披露战争真相,交代我党对敌政策,鼓励敌方人员改变立场,站到人民一边来;三是在敌人内部寻找关系,建立秘密内线联系,策动敌方人员起义。通过以上工作,对敌人阵营起到了有效分化瓦解作用,敌方人员中不少人改恶从善,弃暗投明。1947 年春,新正县独立营包围了驻防雕翎关的敌陕西省保安第十团,经过政策宣传和食宿接待,先后有百余人逃出敌营,投向革命。这个县被抓获的 30 余名敌保长、保队副、保书记及特工人员,经过政策感召,均表示重新做人,不再为敌效劳。新宁县先后和敌方各部门、各阶层的 160 多人建立了秘密联系,其中县级 9 人,镇级 34 人,自卫队分队长以上 10 人。被争取过来的敌方人员,身在敌营,暗中为党和人民做事,秘密护送革命干部,主动传递情报。庆阳县武工队深入敌占区,采用各种方式进行政治宣传,使一些敌乡长自动辞职,不再为国民党效力。经过多方争取,国民党县长张国桢也转变了立场,在解放军收复庆阳县城时,宣布解散县自卫队,封存粮食,保护公用设施,原封不动地将县城交到人民手里。镇原县武工队、游击队到处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开展政治攻势。1947 年 5 月,国民党保七团一部 20 余人投诚,1948 年先后争取过来敌班长 2 名、士兵 6 名及便衣特务 1 名。合水县经过政治瓦解,仅 1948 年就有 9 名敌保长停止反动活动。1949 年上半年,国民党正宁县各级军政人员,在强大政治攻势下,接连起义投诚。3 月,月明乡 36 名乡丁在保长率领下起义;5 月,县党政官员及自卫队共 800 多人宣布起义,交出了大批枪支弹药和物资。1949 年 7 月至 8 月的一个月中,经过反复宣传和争取,全区就有 569 名敌匪分子向人民政府投诚。政治瓦解大大动摇了敌人军心,有力地配合了军事进攻,是战胜敌人不可缺少的策略和手段。

五、开展战勤服务

陇东解放区人民组织担架队,参加了解放西北的战斗。1947 年

全区组织担架1515副，人员7575人，动员牲畜1364头，为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投入人工2.12万个，畜工21.4万个。1948年，陇东、关中两个分区共出动担架3170副，队员16950人，动员牲畜2127头，关中抽调护士110人，杂务人员165人。陇东组织长期担架1620副，队员8100人；短期担架1110副，队员5550人。①

在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中，从瓦子街战役、扶眉战役到兰州战役，从陕甘黄土高原到河西走廊，都留下了陇东解放区担架队和运输队的足迹。宁县长期担架队随部队转战到甘肃青海等地，如李生贵长期担架队，1948年7月随军出征，1949年11月回来，历时1年零4个月，经历过扶眉、兰州等战役，一直转战到张掖等地。② 李兴治带领宁县四区长期担架队，随部队到兰州、青海、张掖等地。③ 谢占儒率领的由环县、曲子、华池县支前队组成的陇东支前大队，包括担架队和运输队，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8月，历时8个多月，辗转陕西、甘肃两省，经过大小数次战役，徒步跋涉4000多公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④ 曲子县担架队在出征前给部队写下了保证书。环县、华池、合水和陕北民工担架队1300余人，随军转战5000余里，经过扶眉战役和兰州战役，以无比坚毅的精神，团结互助，克服困难，日夜不息的转运伤员，搬运炮弹、面粉，帮助医院工作。1949年7月扶眉战役胜利后，第一野战军数十万官兵西进，急需地方支援。陇东解放区动员全部人力、畜力和车辆，日夜不停地开往前线。在部队途经的交通要道，每15公里设一个供水站，昼夜不停地为过路的解放军供应开水和食物。陇东解放区还组织了1个战勤服务队，有队员800名，在随解放军西进中修桥补路，押送俘虏。

陇东担架队在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华池、

①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第34－36页。
②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第490页。
③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第494页。
④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第512页。

合水、环县担架队受到部队的嘉奖，分别获得第一野战军颁发的“巩固模范”、“坚持到底”、“完成任务”的锦旗。[①] 1949 年新正县组成 350 余人、担架 77 副、驮畜 40 多匹的支前大队，跟随第一野战军第三师为解放西北积极服勤，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荣获“奋勇前进、积极支前”锦旗一面，立大功者 6 人，双功者 5 人，小功者 12 人，支前模范 10 人，分别受到嘉奖。

制作军鞋是陇东解放区妇女对解放战争的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最大最繁重的战勤动员之一就是做军鞋。为保证部队需要，陇东解放区千家万户的妇女们积极开展做军鞋运动。制作军鞋的办法是由政府布置任务，每双军鞋领 6 至 8 尺布做原料和手工费，但当时经济困难，有的在领不到布匹时也按时完成军鞋任务。1946 年 10 月布置给陇东分区军鞋 10500 双，其中 3000 双慰劳三五九旅；[②]11 月 14 日，专署又发出指示要求全区制作军鞋 1.8 万双，其中庆阳 4000 双，合水 3200 双，镇原 2200 双，曲子 3300 双，环县 3000 双，华池 2300 双。[③] 1946 年，陇东分区为驻军警三旅和三五九旅送军鞋 3.86 万双。1947 年至 1948 年，陇东解放区 8 县共为第一野战军送军鞋 9.95 万双。1947 年 9 月，关中分区动员做军鞋 2.15 万双，其中新宁 4000 双，新正 3600 双；[④]次年 1 月，关中分区再次布置军鞋 8000 双，其中新正 3500 双。[⑤] 3 月，边区政府分配陇东分区在不足 1 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军鞋 4 万双，每双发布 7 尺，其中合水 1 万双，曲子 3000 双，环县 1 万双，华池 8000 双。[⑥] 同年又布置军鞋 1 万双，其中曲子 1500 双，环县 2000 双，镇原 3000 双，华池 2000 双，庆阳 1000

---

① 《陕北陇东担架队随军转战五千余里，完成任务胜利归来》，《甘肃日报》1949 年 10 月 26 日。

②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第 200 页。

③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第 202 页。

④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第 204 页。

⑤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第 209 页。

⑥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第 210 页。

双，合水500双。[①] 1948年5月，陇东分区发出指示信："为保证军鞋供给，除1948年布置的5万双军鞋外，特再布置1万双"，其中曲子5500双，华池3500双，环县1000双，要求于6月20日以前完成。[②] 1948年10月，陇东分区再次布置了制作军鞋的任务，要求至1949年7月，完成5万双军鞋，"全是义务动员，根据解放区人口，每5至6人平均1双鞋(大约1家1双)"，分配给环县7000双，华池5800双，曲子9500双，镇原8200双，合水8100双，庆阳1.15万双。[③] 1949年，陇东解放区8县为第一野战军送军鞋11.6万双，袜子2000多双，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动。根据现有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在解放战争期间，庆阳解放区共承担军鞋任务25.46万双，[④]这些军鞋不包括群众自愿捐献的部分。以1948年庆阳人口计算，平均每户承担军鞋任务4.2双，每个妇女(包括老少全部)做军鞋1.7双。在做军鞋中，广大妇女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如新正县湫头村马贵仁一家在1948年做军鞋多达36双。[⑤]

解放战争中，陇东解放区人民多次组织慰问团，带着慰问品，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慰问解放军指战员。1946年至1949年，陇东解放区8县为解放军指战员赠送的慰问品有粮食1000万公斤，饲料600万公斤，羊1500多只，大肉2.5万公斤，鸡5000多只，鸡蛋5000公斤，瓜果15万公斤，蔬菜150万公斤，军鞋5000多双，袜子2000多双，流通券8万余元，纸烟200多条，还有肥皂、毛巾、牙膏、慰问袋等。这些慰问品表达了陇东解放区人民对子弟兵的关怀，密切了军民关系，激发了部队指战员战胜敌人的斗志，增强了争取革命胜利的信心。

①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第214页。
②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第223页。
③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第216—217页。
④ 马西林、王创林：《陇东革命斗争史》，甘肃人民出版社，第201页。
⑤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第620页。

六、救治伤病员

解放战争中，陇东解放区人民怀着对人民子弟兵的深情厚意，无偿供应部队和革命干部的吃住，收容失散掉队的解放军官兵，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掩护救治解放军伤病员。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人民军队和地方党的干部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浴血奋战，不怕牺牲，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仅陇东籍的烈士就有1815名。广大人民群众视部队和干部如亲人，不仅倾其所有养育他们，而且冒着生命危险收容安置伤病员，掩护将士和革命干部，不少群众为此献出了生命。1947年国民党军队占领庆阳后，许多群众为保护解放军，上演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在午亭子战斗期间，国民党逼迫新宁群众张老汉、退伍军人杨占山带路，遭到拒绝后将他们杀害。在午亭子附近，因不肯吐露机密而被活埋的群众仅挖出尸骨的就有11人。1947年西野的伤病员寄养在新正县群众家中的就有467名，仅8月一次就寄养120多名。县、区、乡干部和群众一起日夜操劳，为他们洗衣做饭，治伤治病，站岗放哨，问寒问暖。二区一乡群众赵宗发一家护理伤员7名，敌人来时，他把伤员一个个背进梢林藏好，敌人走了，又一个个背回护理，饭菜调花样，侍奉如亲人。三区七乡王兴才家住有3名伤员，老母亲拐着一双小脚不停地为他们洗头洗脚，换药洗伤，送吃送喝。一个重伤员不能动弹，她接屎端尿30多天，伤员感动得直哭。合水县五区樊老汉被国民党部队抓住，问乡长、村长在哪里，老人不肯告诉，国民党军队就严刑拷打，他还不说，最后被推下石崖牺牲了。[①] 马家军占领曲子期间，曲子县天子区五乡年已六旬的高老汉，把镇原县长王子厚藏在家里，后被人告密，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吊打三次，终没说出实情。[②] 合道区三乡农民

① 《合水樊老汉掩护干部光荣牺牲》，《边区群众报》1947年5月9日。

② 《不怕胡匪鞭打绳吊曲子群众保护干部》，《边区群众报》1947年9月2日。

王义，敌人带他去捉乡长，到乡长家门口他借口喝水，进去给乡长使了眼色，乡长得以逃脱。敌人知道后，把他打得皮开肉绽。事后他说："我没有黑良心！"华池县白马区七乡仅有90来户人家，1947年敌兵来犯，恶战后全乡养护了1000多名解放军伤病员。新宁县一区二乡龙池村群众张喜旺，千辛万苦赚来3块大洋，买了一头大肥猪杀掉，专为30多名伤员补养身体。该县中村乡群众杜伯林，变卖家产为伤员治病，敌人知道后把他抓去严刑拷打，罚他服苦役3个月。1947年9月，宁县工委副书记万青山在盘克遭敌袭击，身负重伤后得到10多名群众掩护治疗，他们全遭敌人毒打，但无一人告密。屯字镇战斗后，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救护了数百名伤员。许多群众把自家为老人准备的棺材抬出来，盛殓烈士遗体，共掩埋400多具烈士遗体。农民赵兴才救了一名伤员，藏起来精心护理，用5斗麦子换来药膏为其治疗伤口，伤好后他趁黑夜用毛驴将这位战士送到县北归队。敌人知道后到处抓他，赵兴才只得流浪他乡，直到解放后才回到村里。华池县柔远乡刘沟村有位田大妈，养育了当时在陇东地委宣传部工作的宋养初、杨兵夫妇不足3个月的儿子宋心鲁。她精心照料宋心鲁这个革命后代，经常背上他钻梢林躲敌人，直到解放前夕，杨兵才前来接走小心鲁。宋心鲁不忘这位以她的乳汁把自己养大的老区母亲，以后经常来信联系不断。1946年三八五旅卫生部部长秦光远夫妇随部队离开庆阳开赴前线时，将自己刚刚出生、无法带走的女儿秦雪萍交庆阳县城关镇黑泉沟村张能宽抚养。国民党部队占领了庆阳县后，在群众家中寻找、杀害我军遗留子女。为了躲避国民党部队的搜寻，张能宽抱着孩子在山沟里躲藏了近三年时间。1950年秦光远夫妇才将4岁的女儿接回。

在解放战争中，陇东地方干部和群众还收容了大批失散的解放军战士。1947年8月九岘战斗后，西北野战军在撤退中有不少人在子午岭迷路，误入梢林之中。新正县一区区长带领群众入山收容士兵近千人，仅警一旅战士就有300多人，养伤休养后，送他们到耀县归队；同时搜集到枪400多支，大炮2门、炮弹10多箱、战马13匹以

及其他物资。在安置伤病员、收容失散人员的同时，人民群众以生命掩护战士、游击队员和地方干部。新宁县一区二乡康家原有位董大妈，让被敌追捕的县独立营管理员段英占躲在自己家中，当敌人来搜时，她双膝跪地，称段是亲生儿子，生病忌见生人，骗走了敌人。1947年5月底，陇东分区领导谢怀德、刘文山在庆阳县野狐沟遭敌包围，幸在一拾粪老汉掩护下才得以脱险。合水县蒿嘴铺有个魏大妈，她的家就是游击队的食宿店，3年解放战争中，给部队战士和干部吃饭就用去粮食2000多公斤。宁县盘克刘逢浩家，3年内供给战士、干部吃饭用粮18石之多。1949年1月，马匪军袭击元城时，当地农民高刚带孙子以放羊为掩护，暗中保护陇东分区贸易公司藏起来的3大窖物资。当敌捉住他拷问时，他不仅不供，还使眼色让孙子去向游击队报信，并想引开敌人，结果遭敌枪杀。当地有一个18岁的青年杨宽天，放羊时遇到马继援匪兵问路，当他得知敌人要去追杀分区贸易公司人员时，便连说"不知道"，匪军脱掉他的上衣，用杀头来威胁，他还说："杀了我也不知道！"匪军朝他迎面就是一刀，额上顿时鲜血淋漓。匪军又在他头上连砍几刀，残忍地将这位英雄的老区人民的儿子杀害。屯字镇战斗中，当地群众从火线上救护解放军伤员数百人。人民群众把解放军指战员当成亲人，站岗放哨，日夜操劳，求医买药，洗衣做饭，精心照顾，使他们恢复健康返回了部队，其中：六纵70多名战士失散，隐藏在当地地下党员段治财门前沟内，国民党军要到沟内搜查，被他设计骗走，晚上他立即找到向导，把战士全部送走。随后他又遇到4名失散战士，将他们隐蔽3天，亲自带路送入边区。在解放战争时期，像这样保护干部、战士的英雄事迹不胜枚举。

陇东解放区人民还主动为部队侦察敌情，提供情报，设哨盘查，肃反除奸，给解放大军顺利挺进以极大的帮助。3年战争期间，共设立各种哨站组织800多处，截获重要情报300多份，破获敌情报组织10余个，抓获敌特100多名，处决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土匪头子200余人。陇东全境解放后，全区仍盘踞着顽匪和国民党反动武装1030余人以及一批敌特人员。人民群众积极配合政府肃顽除敌，至

1949年8月底，共歼灭和接收投诚的反动武装和敌镇、乡工作人员1296人，其中投诚569人。

解放战争时期，陇东人民用鲜血与汗水谱写了一曲曲支援前线的英雄赞歌，他们的光辉事迹和吃苦耐劳、忠诚勇敢的献身精神永载史册。陇东解放区军民为全省、全国的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和重大牺牲。

第四节　庆阳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

一、新宁、新正两县划归陇东分区

1949年6月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三原分区所辖的新正、新宁两县划归陇东分区管辖。21日，三原地委接西北局通知，新宁县、新正县归陇东分区管辖，宁县解放后，新宁县即撤消，其属正宁县的辖区则归回原治；新正、新宁两县所属的旬邑、宜君等县部分辖区也划归原治；原中心区建制撤销，马栏区划归旬邑县管辖。25日，陇东地委、三原地委和新宁县、新正县党政主要负责人在五顷塬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新正、新宁复称正宁、宁县，改属陇东分区。将新正、新宁县所辖原正宁、旬邑、宜君、宁县所属地域各归原治。原新宁县一区瓦沟圈、西坡、芦子坪、南堡子4个乡及原宁县所属宫河全镇12个保划归正宁；原正宁县所属平子三个半保编入宁县。陇东、关中分区还举行了两县交接仪式。庆阳全境解放后，8月8日，新正县正式改称为正宁县，县委、县政府机关迁回山河镇办公。8月西峰市设立后，陇东分区共管辖8县一市，即：庆阳、华池、合水、环县、曲子、镇原、正宁、宁县和西峰市[①]。

① 1950年6月，曲子和西峰市建置取消。

二、陇东分区的易名与庆阳地委的组成

1949年7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确定甘肃划分为庆阳（即陇东分区）、平凉、武都、岷县、临夏、会宁、武威、酒泉分区和兰州市。庆阳地委由王秉祥、李生华、赵怀璧、刘明山、党永良、赵彦杰、惠宪章七人组成。自此，陇东分区即更名为庆阳分区。8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成立县级西峰市，并公布庆阳分区辖庆阳、合水、宁县、正宁、华池、曲子、镇原、环县8县和西峰市。同日，庆阳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迁回庆阳县城办公，9月13日，又迁至西峰市（今西峰区）。8月19日，中共甘肃省委成立，拟将中共陇东地方委员会改为中共庆阳地方委员会，隶属甘肃省委领导。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改为庆阳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李生华任专员，隶属甘肃行政公署领导。次日成立了中共宁县委员会。

11月1日，甘肃省委决定中共陇东地委正式改称中共庆阳地委，中共庆阳地委启用新印章。当时地委工作机构大部分是陇东地委工作机构的延续，设有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干校和《陇东报》社等工作机构。同日，新成立的中共庆阳地委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甘肃省委的指示通知各县：中共庆阳地委由王秉祥任书记、赵怀璧任副书记兼秘书长，惠宪章任组织部长，程非任宣传部副部长，赵彦杰任社会部长。庆阳军分区领导亦同时被任命，刘明山任军分区司令员，党永良任军分区政委。庆阳分区各县（市）党政领导是：中共环县县委书记魏俊杰，县长谢占儒；中共曲子县委书记王统，县长胡礼新；中共华池县委书记王生弟，县长袁凯成；中共庆阳县委书记赵云山，县长蔡德旺；中共合水县委书记雷庆地，县长胡宗彦；中共镇原县委书记马万里，县长张彦儒；中共宁县县委书记何聚财，县长罗金财；中共正宁县委书记罗文蔚，县长王立成；中共西峰市委书记王彪，市长田绍锡。

刚刚成立的庆阳地委重点抓了新解放区的工作，主要有接收和

改造旧政权，肃清匪特，安定社会秩序，逐步建立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等。

10月11日到20日，庆阳地委在西峰召开庆阳分区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地委书记王秉祥作了题为《关于收复区、新区四个月份工作的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会议主要总结了前一时期收复区和新区的工作，布置了下一步任务，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决定党在新区的工作重点由反霸逐步转入普遍反霸，继续剿匪肃特，巩固新政权；在收复区主要是继续深入开展反倒清算斗争，调剂土地，整顿乡村政权；在老区也进行部分土地调剂，并在调剂的基础上，颁发土地证，确定地权，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三、庆阳地方武装的剿匪肃特行动

1949年7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对陇东军分区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同时以庆阳、曲子、合水3县游击队为基础，编成陕甘宁边区警备十五团，军分区副司令兼参谋长雷霆兼任团长，分区政治部主任冯学诚兼任政委，共约1000余人。将环县、华池、镇原、新宁、新正县的游击大队分别改编为县独立营，归军分区指挥。1949年10月4日，根据甘肃省军区命令，陇东军分区将警备十五团扩编为陇东警卫团，团长雷震（兼），政委冯学诚（兼），副团长毛至善，副政委王汝东。[①]分别从宁县独立营抽调420人和正宁独立营抽调180人编为第一营，教导员耿占元，副营长赵德荣，副教导员杨云山，下辖四个连；从原警备十五团三个营抽调500人编为第二营，营长唐凤仪，教导员赵生鹏，副营长李永忠，下辖4个连；从镇原独立营抽调450人编为第三营，营长郭桂林，教导员何世民，下辖3个连。改编后的警卫团有近2000人，武器装备齐全。在陇东分区党委和军分区的领导指挥下驻守陇东，保卫着新生的人民政权。

①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陇东的军事斗争》（下），第57页。

陇东解放后，溃散在各地的原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潜入边远农村及深山丛林，与土匪、特务和反动会道门纠集在一起进行破坏，奸淫掳掠，袭击基层政权，杀害乡村干部和共产党员，严重危害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特别是环县、镇原、曲子等县，匪情十分严重。为安定社会秩序，保障基层政权和人民群众的安全，中共庆阳地委领导全区军民，进行了剿匪肃特斗争。

陇东军分区部队在协助庆阳分区和各县接管新区、维护社会治安的同时，集中力量进行剿匪肃特斗争。根据匪特情况，分别采用分路合击、远距离奔袭、合围包剿等战术，剿灭分散于山区的国民党军残部和土匪、特务。剿匪战斗于1949年8月开始，至11月底基本结束。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地方保安团队、土匪武装2100余人，俘虏分队长以上军官230多人，捕获国民党特务数百人，缴获步枪1919支，轻机枪28挺，重机枪3挺，六〇炮2门，各种子弹4万余发，骡、马、驴112头，其他军用物资2000余件，电台40余部。剿匪战斗的胜利，安定了陇东解放区的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政权，为各项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四、庆阳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

庆阳全区解放后不到两个月，国民党政府在庆阳的所有机构全部被摧毁，新的人民政府全部建立并得到初步巩固，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均已转入正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逐步巩固政权，进一步发动人民群众，让人民参与政府管理，享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便于研究今后的方针和具体实施办法，中共庆阳地委于9月24日作出了《关于召开县（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要求各县（市）分别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并对代表会议的召开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原则规定。根据庆阳地委的指示精神，庆阳全区9个县（市）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宣传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推选参加代表会议的人民代表。人民群众也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到这次选举活动，十分慎重地选举和

审查候选人。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选举出了参加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根据正宁、宁县、西峰、曲子、镇原、庆阳六县（市）选举代表的情况统计，在选举出的代表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中党政军民干部184人，占总数的38.8%；工人37人，占7.8%；农民135人（回族4人），占28.5%；知识分子62人，占13.1%；商人19人，占4%；士绅17人（阿訇2人），占3.6%；妇女20人，占4.2%。[①] 为保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顺利进行，各县在会前都成立了筹备会，对工作报告、提案、代表审查、会场布置、代表生活等事宜都做了充分准备。

在认真准备的基础上，1949年10月到11月，庆阳分区各县（市）相继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部分职权。会议代表充分讨论了解放后3个月的工作，检讨了政府工作和干部思想作风，对今后剿匪、肃特、反霸、土地、征粮、支前等几项重要工作的政策问题进行了认真地研究，通过了数百件议案。仅西峰市就收到各界人民代表的提案191件，经提案委员会审查修正后，有77件涉及治安、生产、建设、妇女、文教的提案，经过代表会议表决，一致通过。会议还选举产生了各县（市）人民政府的领导成员，组成了县（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县（市）各界人民代表会常委会，作为闭会期间常驻机构，处理日常事务。

庆阳分区各县（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各级人民政权的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为人民代表大会的正式召开奠定了基础。

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以后，庆阳分区集中全区人民的意见，根据庆阳的实际，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农村。在新解放区则由重点反霸转入普遍反霸，减轻租债，恢复生产，发展农会，改造乡村政权，树立贫农阶级优势，为全面土改创造条件。在收复区主要是继续完成土地调剂，巩固革命秩序，整顿乡村组织机构和恢复发展农业生产。通过不懈的努力，庆阳全区经济开始恢复，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

① 牟付立、曲涛：《陇东老区政权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35页。

逐步改善，庆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跨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转变的历史新时期。

后　记

《中国共产党庆阳历史》(第一卷)在省、市领导的关心指导和各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经编委会成员的共同努力,历近两年多时间的编撰,终于成书,今已付梓。

《中国共产党庆阳历史》(第一卷)设4编20章70节,共37万字,图片118张。采取以年为经、以事为纬、分期划块、纵横结合的编写体例,基本遵循《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一书的历史脉络来划分历史时期,在内容上则根据庆阳党史的特色重点来设置章节,记述时限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上限,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下限,记述范围以现行庆阳行政区划为准,对历史上发生在本市区划范围而非现行区划范围的党组织活动,也做了必要的简述。

《中国共产党庆阳历史》(第一卷)的编写始于2007年5月,前期作了一些必要的资料征集和专题资料的准备工作。2010年2月初,在继任党史办主任张桂山主持下正式启动编写,2月底完成编写大纲,并组

织市内熟悉庆阳党史工作的专家学者讨论修改后，委托河南大学教授黄正林撰写，2011年4月完成第一稿，市委党史办作了修订补充后，于7月初送省委党史研究室审读。按照初审意见，7月底，市委党史办邀请陇东学院曲涛教授讨论提出新的编写大纲，确定7名同志在一稿的基础上重新编写。具体承担编写任务的人员：第一、二、三、四章，陈宗斌；第五、六、七章，刘秉政；第八、九章，张国定；第十、十一章，王永魁；第十二、十三章，文世芳；第十四、十五、十六章，赵晓红；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章，刘崇刚。在编撰过程中，多次召开协调会、讨论会，规范体例，研究解决有关学术问题。在扎实挖掘资料、反复讨论研究、多方求证把关的基础上，至2011年底完成第二稿。此后，张桂山主任统稿，文世芳协助，又经过三次大规模修改完善，于2012年5月底送省委党史研究室二审，同时送黄正林、曲涛教授等审读。8月中旬，省委党史研究室在兰州专门召开评审会，反馈审读意见，原则通过评审。市委党史办按照二审意见作了全面修改完善，又报省委党史研究室三审修订后，于10月下旬报送中共党史出版社审订印刷。

本书在编撰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各级领导、上级业务部门、市内外有关单位和专家学者的关心重视和大

力支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张晓兰，省长助理、市委书记夏红民，原庆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周强和庆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栾克军在本书的编撰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闾晓辉，原市委常委、秘书长樊得智非常关心该书的编写工作，多次提出重要的指导性意见。中共党史出版社、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的主要领导对本书的编撰出版给予了格外的关怀和厚爱。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杨元忠、副主任刘玛莉、伏晓春，副巡视员李荣珍及王一林、王亚民、孙英、李军等党史专家对书稿进行了认真审阅，提出了非常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河南大学教授黄正林、陇东学院政法经管学院院长、教授曲涛等自始至终参与书稿的编写审订工作，指出了许多史实方面的错误，提出了许多中肯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市财政局在经费上给予及时保障，确保了该书的顺利出版。特别是中央党史研究室挂职的张国定、文世芳、王永魁同志参与了该书的编撰工作，加快了编撰进度，指导我们规范了党史著作编写体例，受益匪浅。民间收藏人士张仁民也提供了珍贵的革命历史照片。这里谨向对本书编撰出版工作给予关心指导、热忱帮助和辛勤努力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参与人员和有关部门，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本书编撰中，尽管编写人员殚尽竭虑，倾注了全部心血，但由于编写时间紧张和业务水平所限，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和纰漏，敬请各位领导、专家和读者提出批评指导意见，再版时作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

编　者

2012 年 10 月

附图一：

庆阳地区境内党组织分布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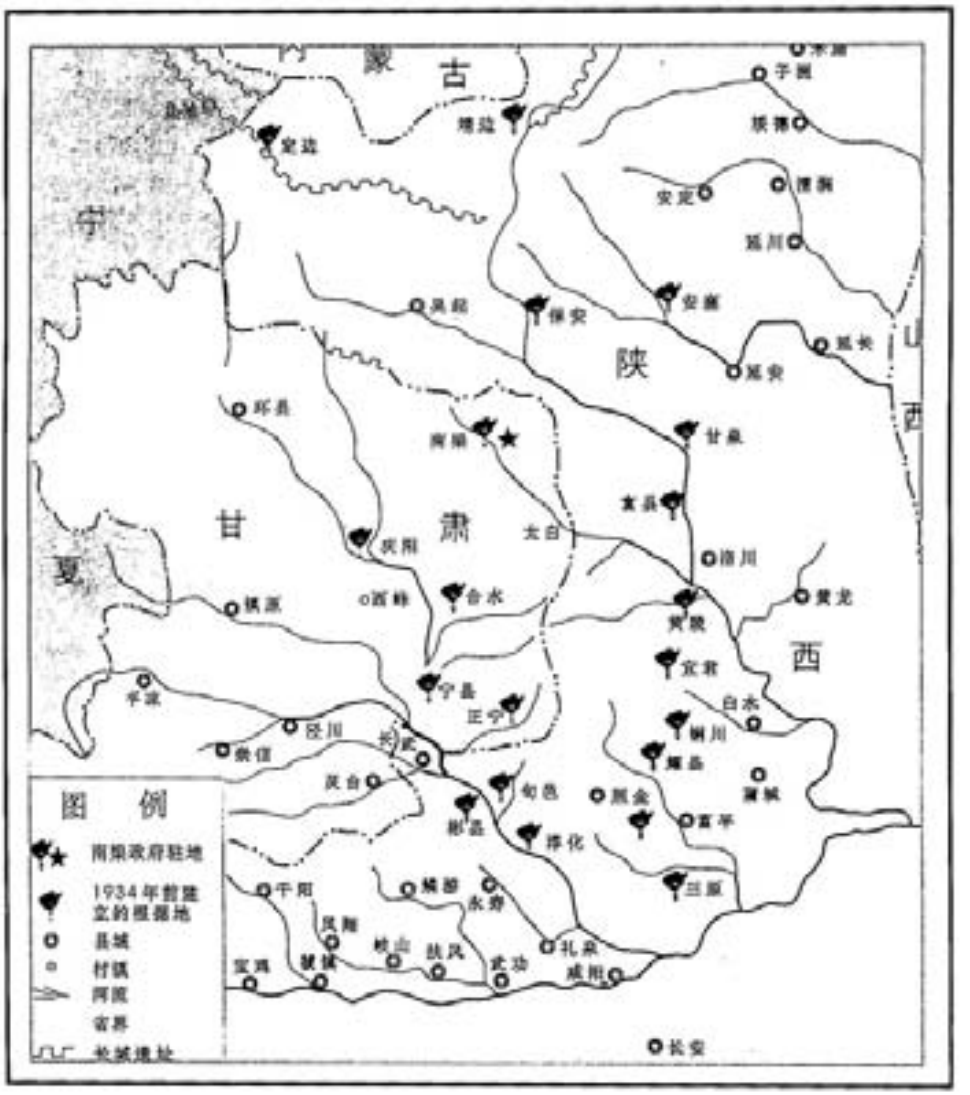
1927年9月—1937年9月



附图二：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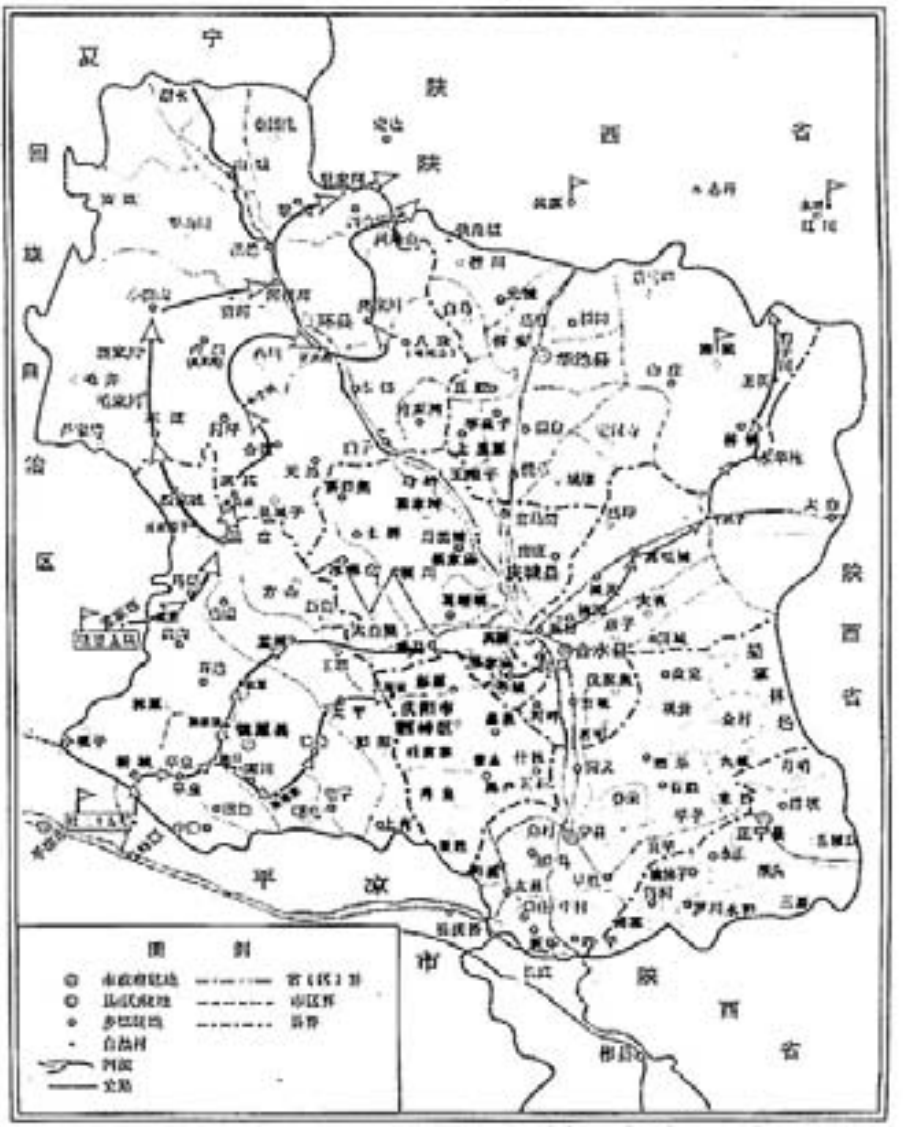
1932年2月—1935年2月



附图三：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红二十五军长征通过庆阳路线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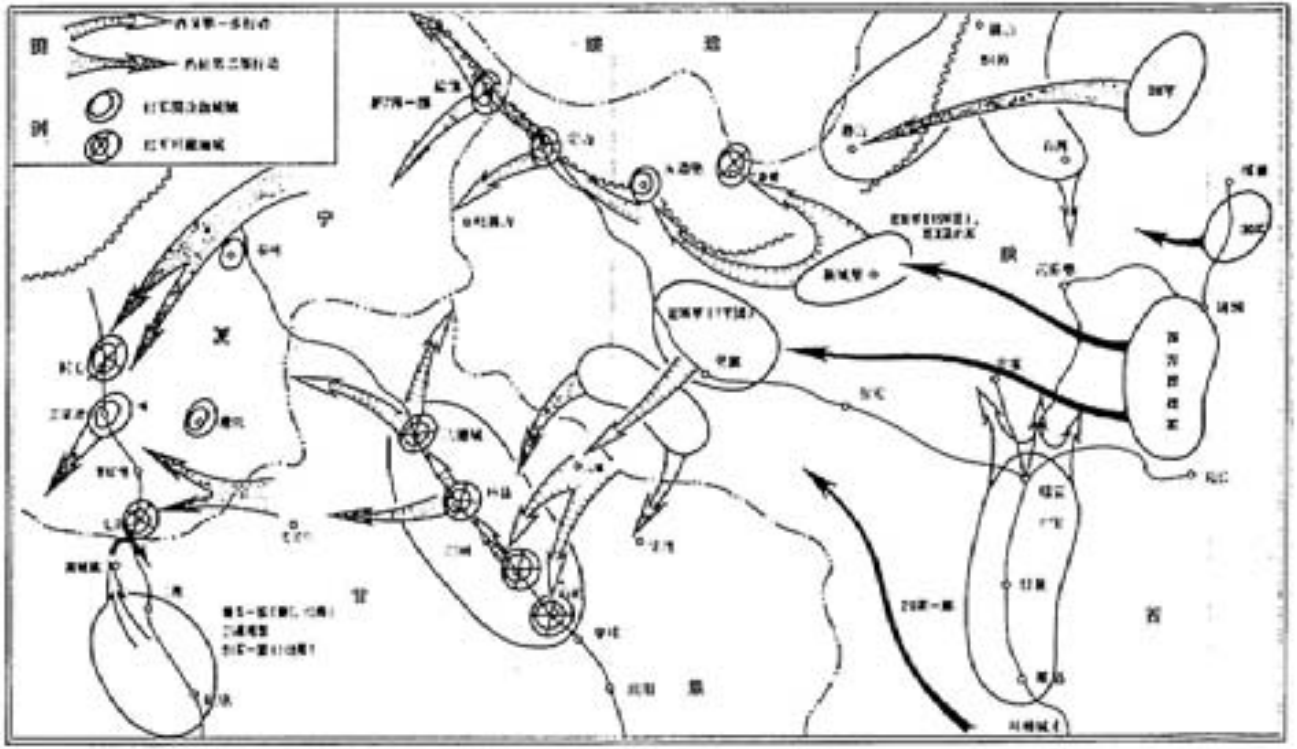
1935年8月30日—10月16日



附图四：

红一方面军西征战役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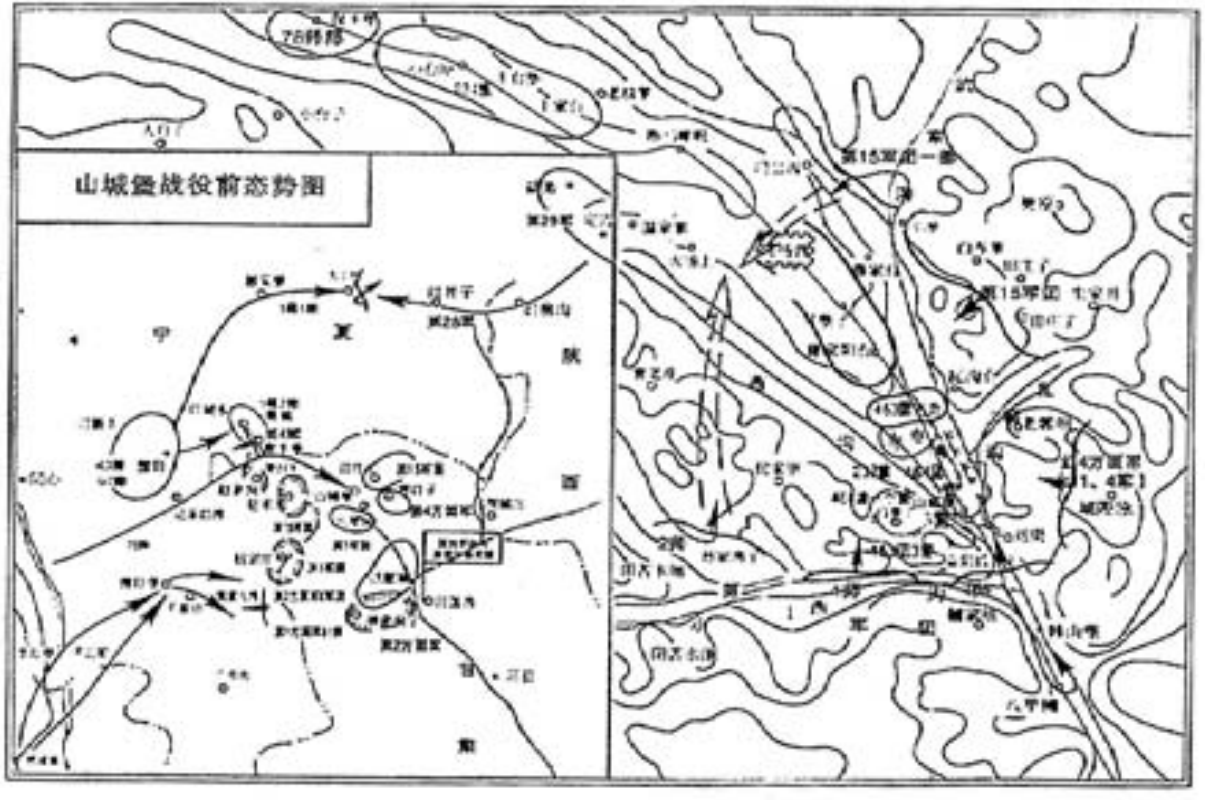
1936年5月19日—7月下旬



附图五：

山城堡战役示意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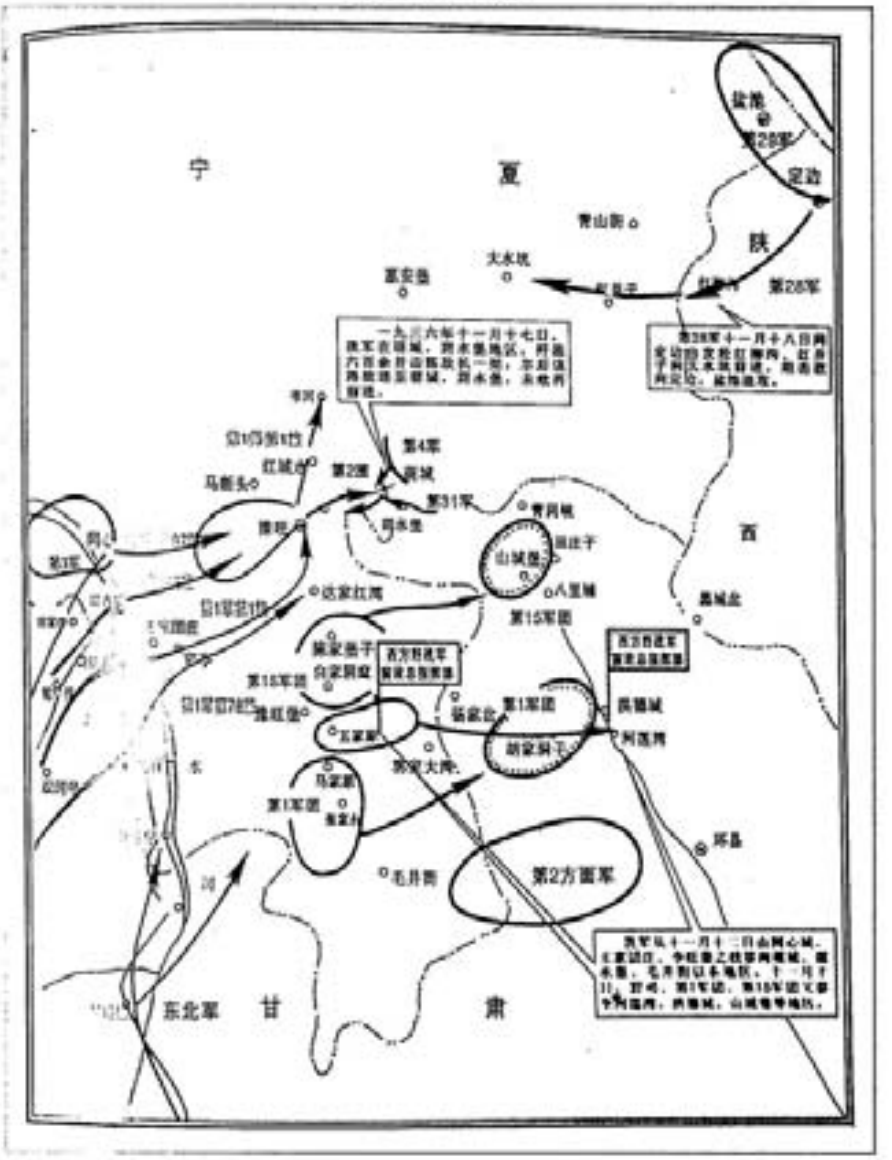
1936年11月



附图六：

山城堡战役示意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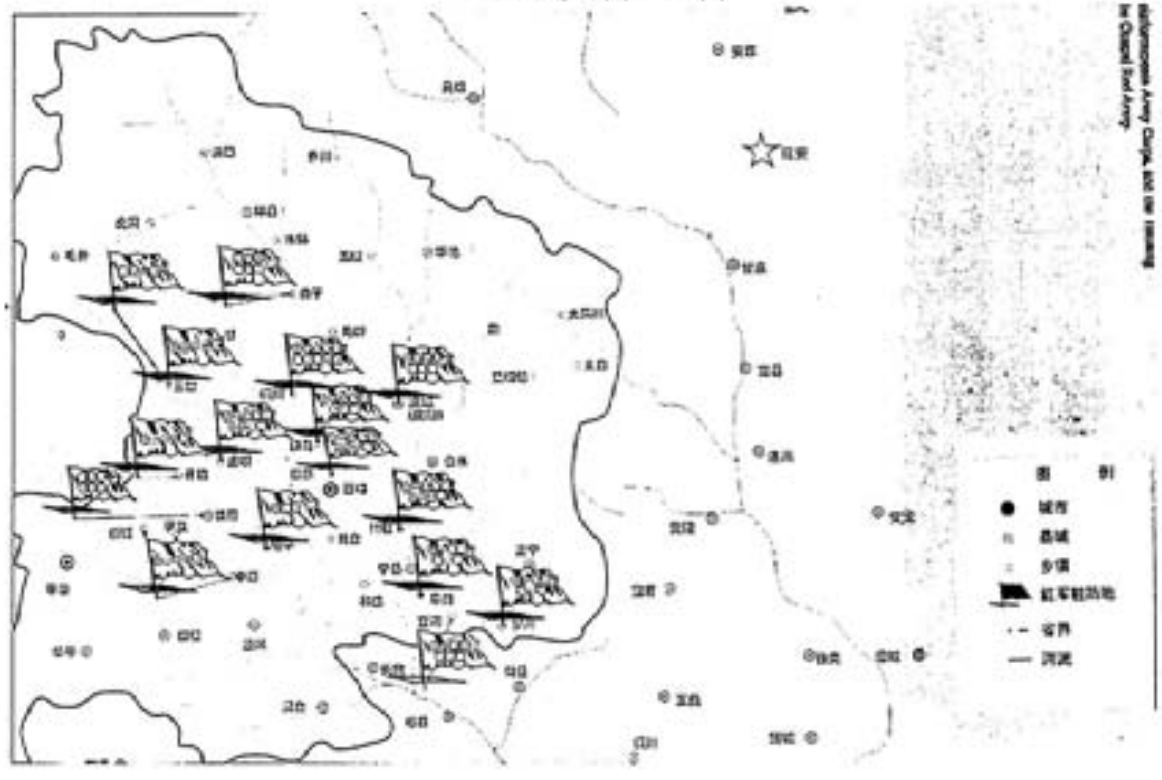
1936年11月



附图七：

红一方面军、援西军、中央红军教导师驻陇东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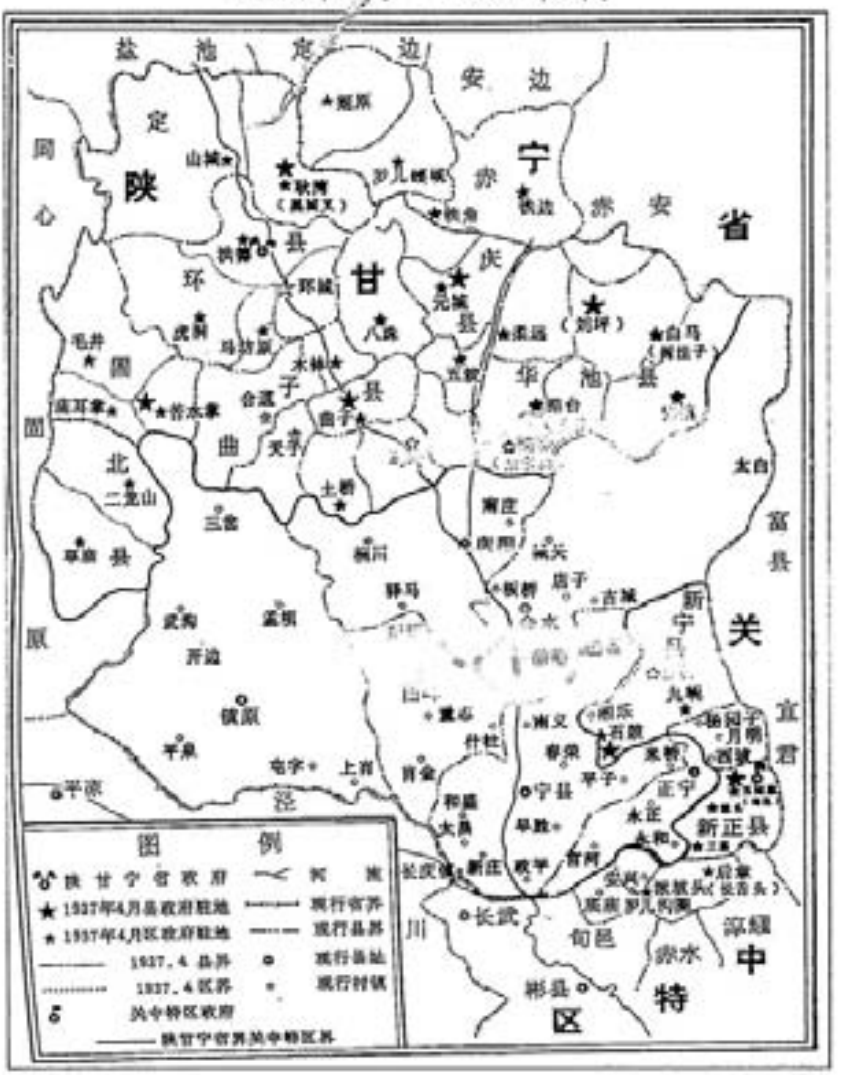
1937年2月—8月



附图八：

陕甘宁省、关中特区时期所辖陇东苏区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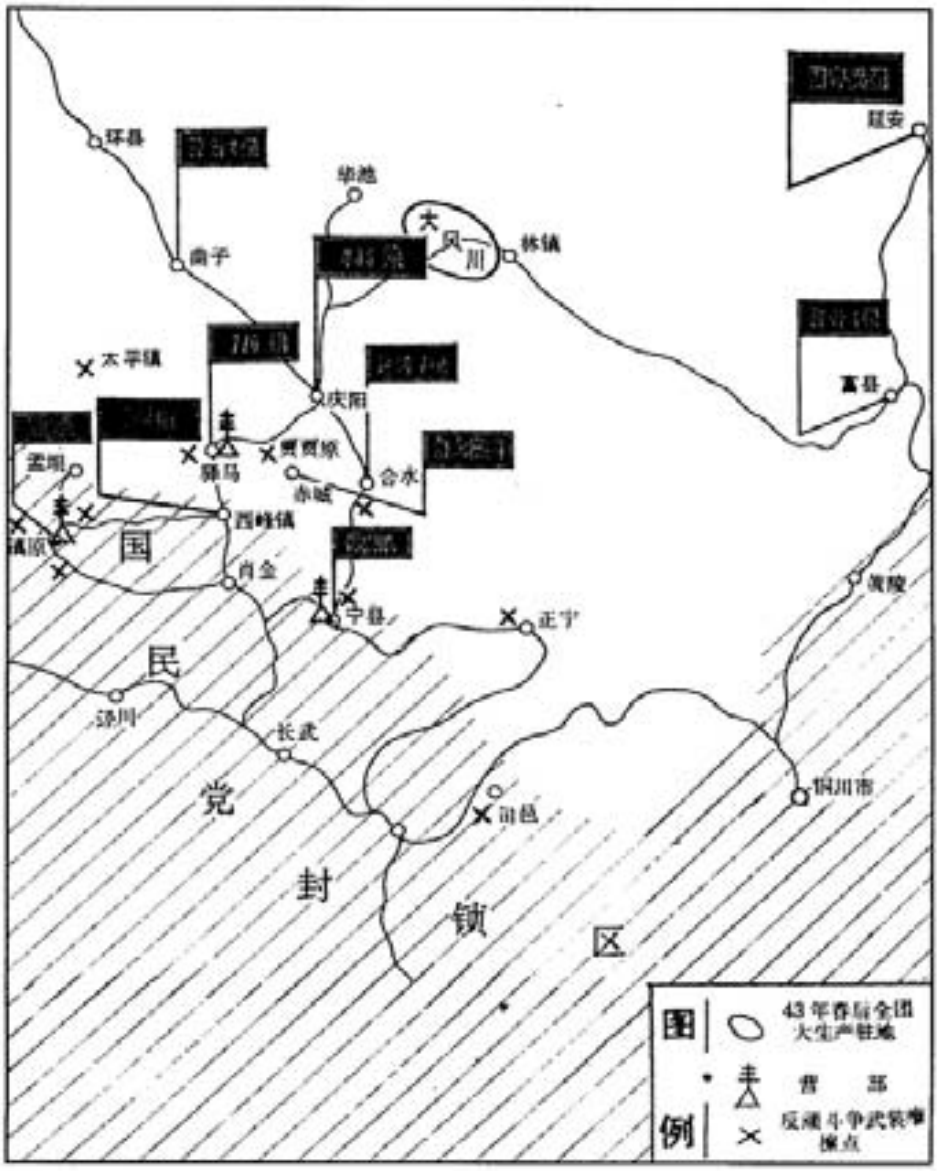
1936年5月—1937年9月



附图九：

八路军留守陇东示意图

1937年10月—1945年8月



附图十：

陇东分区（含关中分区新正、新宁县）行政区划图

1940年8月—1945年8月



附图十一：

陇东分区（含关中分区新正、新宁县）行政区划图

1945年8月—1949年8月



ISBN 978-7-5098-1869-2
9 787509 819692 >
定价：60.00元